



stormtroopers

A
New History
of Hitler's Brownshirts

新 一 部 历 史 冲 锋 队

纳粹党打开权力大门的暴力钥匙，
民众动员与街头政治的独特标本。

一部全面回顾冲锋队 / 褐衫军历史、组织、文化与心理，
完整深入讲述其历史的开创性著作。

别拿“现在的时代出了问题”来安慰自己，时代出了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正确的；它的野蛮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不和它同流合污，就表现出了人性。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德〕丹尼尔·西门子
著

姚
译

[德] 丹尼尔·西门子 *Daniel Siemens*

历史学家、纽卡斯尔大学欧洲史教授，主攻现代欧洲（中欧）史，研究涉及大众传媒和新闻史、德裔犹太人史等方面。

2006 年获得柏林洪堡大学近代史博士学位，留校担任助教。2006 年秋，在比勒费尔德大学担任近代史讲师。2011 年至 2014 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历史学院（UCL-SSEES）担任 DAAD Francis L. Carsten 近代德国史讲师。2017 年 10 月，加入纽卡斯尔大学，担任欧洲史教授。

姚军，福建厦门人，曾在知名外企及国内券商供职，2006 年起开始从事 IT 书籍翻译，并逐步涉猎科普、军事、文史等领域，译著甚丰，已出版军事历史类译著有《二战精锐系列》、《决胜诺曼底：登陆战中的科学、工程与特种装备》、《秘密武器：影响深远的二战军事科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与战术的历史》、《阿登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军服、徽标与武器图解百科》、《红色方案：法国的崩溃》等。

stormtroopers



A New History of Hitler's Brownshirts

Daniel Siemens

著者「德」丹尼尔·西门子

译者 姚军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冲锋队

一部 新历史

stormtroopers

A New History
of Hitler's Brownshir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 (德) 丹尼尔·西门子著；姚军译. —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142-2896-0

I . ①冲… II . ①丹… ②姚… III .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IV . ①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5284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5886

STORMTROOPERS: A NEW HISTORY OF HITLER'S BROWNSHIRTS BY Daniel Siemens

Copyright © 2017 by Daniel Siemen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Co., Ltd.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著 者：(德) 丹尼尔·西门子

译 者：姚 军

出 版 人：武 赫

责任编辑：尚 蕾

责任校对：岳智勇

责任印制：杨 骏

装帧设计：郭 阳 赵 菲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wenhuaafazhan.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印匠彩色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412 千字

印 张：35

印 次：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8.00 元

I S B N : 978-7-5142-2896-0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010-88275710

别拿“现在的时代出了问题”来安慰自己，时代出了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正确的；它的野蛮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不和它同流合污，就表现出了人性。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¹

经历暴力的侵犯，人民才能团结起来。

——沃尔夫冈·索夫斯基²

目录
CONTENTS

致谢 / 1

前言：狂暴之夜 / 1

◀ 第一部分 ▶

第1章 战后德国的动乱和纳粹冲锋队的起源 / 2

秩序之战 / 3

冲锋队的建立 / 6

妨害公共安全 / 11

关键的1923年 / 17

政变余波 / 29

第2章 冲锋队的街头政治——危机时刻的动员 / 34

初期改革 / 35

从小集团到群众运动 / 38

纳粹制服与当局 / 45

对冲锋队的嘲笑 / 51

暴力活动的升级 / 55

失业和社会动荡在冲锋队中的影响 / 61

农村地区的褐衫军 / 68

冲锋队暴力的危险 / 78

第3章 青少年的“褐色崇拜”和魏玛共和国的暴力活动 / 84

好斗的男子汉气质 / 86

女性纳粹激进主义 / 93

情感需求的满足 / 96

冲锋队的经营 / 104

吸烟政治 / 107

现代十字军 / 114

与魏玛国防军的关系 / 126

◀ 第二部分 ▶

第4章 恐怖、刺激和失望 / 132

复杂的情绪与新机遇 / 124

追捕并羞辱敌人 / 139

反应 / 152

凌驾于法律之上 / 156

“钢盔团”的整合 / 160

德国学术界的纳粹化 / 162

洗劫国家 / 170

团结与不满 / 174

第5章 “罗姆清洗”与纳粹同性恋者的神话 / 176

摊牌 / 177

“帝国杀人周” / 183

纳粹积极分子的同性恋神话 / 193

后果 / 197

◀ 第三部分 ▶

第6章 冲锋队在1934—1939年的改革 / 204

追寻新任务 / 206

定义“民族共同体”的范围：反犹太暴力活动 / 213

对德国社会的渗透 / 222

奥地利军团 / 230

在苏台德和梅梅尔地区的活动 / 233

外围组织的崛起 / 241

第7章 街头战士变身农民？冲锋队与东欧“德国化” / 243

早期殖民活动 / 244

齐格弗里德·卡舍与冲锋队强化的殖民计划 / 248

农民与意识形态支持者 / 258

为东欧“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出贡献 / 262

第8章 二战中的冲锋队 / 265

冲锋队与国防军 / 267

战争的开始 / 272

冲锋队“统帅堂”旗队 / 277

共产党的宣传 / 285

总督府辖区、保护国和斯洛文尼亚的辅警 / 287

大后方 / 294

战斗到最后一人 / 298

面对失败 / 303

日常的狂热 / 310

第9章 冲锋队外交官与东南欧的大屠杀 / 312

外交部里的冲锋队员 / 314

幕后的斗争 / 316

组织斯洛伐克大屠杀 / 320

同一模式的各种花样 / 324

冲锋队外交官产生的影响 / 334

为名誉而战 / 336

◀ 第四部分 ▶

第10章 “无罪”：二战后冲锋队在德国的遗产 / 34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冲锋队 / 344

冲锋队队员是“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 / 353

残缺的故事 / 358

记忆的政治 / 360

结语：冲锋队与民族社会主义 / 367

注释 / 377

致 谢

虽然本书的封面上只有一个署名，但如果没有许多同事、团体和朋友的慷慨相助和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始于2012年4月18日希瑟·麦卡勒姆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当时是耶鲁大学出版社普通图书发行人。当时，我作为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弗朗西斯·L. 卡斯滕讲师，在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院（UCL-SSEES）教授现代德国史。希瑟邀请我用英文写作冲锋队的“新权威历史”，但当时我对此没有理睬。我的自然反应是：“褐衫军？不想再来一次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很快就埋头于档案资料和旧报纸里。在许多摆放民族社会主义史书籍的书架上寻找某一本书成为我的锻炼方式。

过去五年里，我很幸运地在两家很优秀的大学里工作——伦敦大学学院和比勒菲尔德大学，它们都为思想辩论和个人研究提供了理想的机会。我特别感激西蒙·迪克森、阿克塞尔·科纳、迈克尔·伯科威茨和安德烈亚斯·格斯特里希在英国给我的支持，回到德国后，则要感谢我的任教资格委员会成员——托马斯·维尔斯科普、英格丽德·基尔舍尔-霍尔泰、米夏埃尔·维尔特、维利巴尔德·斯泰因梅茨和彼得·舒斯特——他们于2016年阅读了本书的早期版本，并接受它作为一篇任职资格论文。特

别要感谢托马斯·维尔斯科普，他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和真正的朋友，在过去几年里给了我极大的支持。2013年到2016年，我在不同的大学、会议和研讨会上有机会讨论本项目的各个方面，为此我要感谢阿恩德·鲍尔坎珀、弗兰克·博施、胡贝图斯·布赫施泰因、诺贝特·弗雷、乌尔丽克·冯·希尔施豪森、西尔维娅·克斯佩尔-比尔曼、加布里尔·梅茨勒、马库斯·M. 派克、吉姆·C. 普里梅尔、黑德维希·里赫特、马丁·萨布罗、德西蕾·邵茨、迪尔克·舒曼、西比尔·施泰因巴赫尔、尼古劳斯·瓦克斯曼、安妮特·魏因克、理查德·F. 维策尔、米夏埃尔·维尔特和格哈德·沃尔夫。

伦敦大学学院、比勒菲尔德大学、弗里茨-蒂森基金会、墨卡托基金会以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人性和艺术学会慷慨地支持本项目的档案研究。我非常感谢历史学同行塞巴斯蒂安·潘维茨和珍妮·菲克曼，他们提供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时间和支持，组织俄罗斯和美国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来源。在本项目开始的关键阶段中，豪克·延森和来自汉堡明镜出版社档案部的团队提供了极好的工作环境。项目后期某段时间，来自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个团体在主任安妮特·迈尔的领导下，对慕尼黑时期的档案和图书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我在本书中的一些想法也在其他书籍和刊物中出现过。第10章的几个部分基于我题为“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书写冲锋队的历史：法律战略和编史学上的长期后果”的文章，刊登于2016年的《现代欧洲史》杂志上。第7章一个稍有不同的版本在2017年的《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刊登。我要感谢这两家杂志准许在书中使用修改后的这些文本。

许多朋友、同事和前冲锋队队员的家族成员分享了他们有关纳粹时

期的知识和想法，从很多方面帮助完成本书，在此无法一一列出。我要感谢：格莱布·阿尔伯特、博扬·阿列克索夫、约尔格·巴贝罗夫斯基、吕迪格·博吉恩、罗伯特·比尔施耐德、斯蒂芬妮·博德、基尔斯滕·本克尔、克里斯蒂娜·布劳纳、理查德·布特维克-帕夫利科夫斯基、布鲁斯·坎贝尔、扬·达尼鲁克、赫塔·道布勒-格梅林、斯特凡·多林、齐格林德·埃因格尔、克里斯蒂亚娜·埃森贝格、伊沃娜·法布里斯、胡安·路易斯·费尔南德兹、安德烈亚斯·弗雷塔格、杰拉拉丁·冯·弗里塔格·德拉贝·金策尔、马里奥拉·菲尔斯特、维托·吉龙达、芭芭拉·哈赫曼、沃尔夫冈·哈尔特维希、梅拉妮·哈特劳布、伊丽莎白·哈维、丹尼尔·赫丁格、苏珊·海姆、拉拉·亨施、本杰明·C. 赫特、汤姆·希尔、斯特凡·霍德勒、约亨·洪格、戈兰·胡蒂内茨、梅尔文·英格尔比、黑宁·冯·雅戈、玛蒂尔德·雅明、福尔克尔·卡舍、约翰·凯恩、埃格伯特·克劳特克、约纳斯·克莱因豪斯、尼可拉斯·克拉温克尔、亚历山大·克兰茨、克里斯托弗·克罗伊茨米勒、安雅·克鲁克、斯特凡·拉芬、斯特凡·伦施泰特、马尔特·卢丁、克里斯托弗·路德、卡尔·卢策、斯特凡·马林诺夫斯基、卡罗琳·梅茨格尔、德克·A. 摩西、伊夫·米勒、松克·奈策尔、爱德华·尼兹南斯基、阿明·诺尔岑、赖纳·奥尔特、鲁道夫·帕克萨、温弗里德·佩措尔德、苏珊娜·平齐科娃、扬-菲利普·蓬普隆、斯文·赖夏特、亚娜·雷米、托马斯·雷乌斯、克里斯蒂亚娜·罗特兰德、克里斯蒂安·舍默特、马库斯·施马尔茨、麦克·施梅茨纳、扎比内·斯赫罗延斯、埃克哈德·施泰因梅茨、延斯·蒂尔、尤塔·维格曼、托比亚斯·温斯特尔、安德烈亚斯·维尔申、亚历山大·扎廖诺夫和本杰明·齐曼。

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希瑟·麦卡勒姆、梅丽莎·邦德和玛丽卡·利桑德罗以极大的热情，为本书的创作过程提供指导。两位匿名的审稿人提供了认真、令人鼓舞的反馈，帮助我形成了本书中的关键论点。我同样非常感激莎拉·福格尔松和理查德·梅森，他们在不同时刻认真编辑我的手稿，确保作者不会掉进非母语者容易遇到的陷阱里。最后，尽管冲锋队歌曲的歌词令人毛骨悚然，马塞尔·克鲁格仍然毫不退缩地改进了我的翻译。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当然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为本书带来最大益处的是生活中与历史无关的各个方面。目睹我的孩子走出他们的第一步，养成自己的个性，总令我更努力进步。扬、埃米莉亚和玛格达莱娜——我的“同谋犯”——近距离见证了本书的创作。尽管我很多时间不在家，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和支持的态度。我亏欠你们太多，无法言说。

丹尼尔·西门子

比勒菲尔德，2017年1月

前



言

前言：狂暴之夜

狂暴之夜

无数圣徒的形象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的黑暗；变成活灵活现的漫画将他包围：一半是敌意，一半是荒谬。

——奥古斯特·朔尔蒂斯，1931年¹

在德国东部的上西里西亚省，1932年8月9日是一个凉爽的夏日，晚上的空气异乎寻常的清新。这是康拉德·彼得楚赫（Konrad Pietrzuch）²最后的几个小时，这位35岁的失业工人来自波滕帕——距离波兰边境仅3公里、人口不到1000人的隐秘小村，属于托斯特-格莱维茨地区。彼得楚赫和弟弟阿尔方斯以及68岁的母亲玛丽亚一起，住在村子里一座破旧的小屋内。他们家里的墙上以圣像作为装饰，没有任何窗户。³

8月10日凌晨，一家三口还在睡梦之中，一群人包围了他们的房子。这些人来自周围的村庄，是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en，SA）当地分部成员。Sturmabteilungen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暴风特遣队”或者“突击队”，但是“冲锋队”或者“褐衫军”的称谓更令人熟知。他们在彼得楚赫家门前停下，打开没有上锁的房门喊道：“起床，你们这些该诅咒的波兰共产党人！举起手来！”接着，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进入房间，把玛丽亚推出屋外，将康拉德拖下床残暴地殴打，之后其中一人在附近的小屋里向他开枪。与此同时，阿尔方斯被迫面朝墙壁站着，遭到了同样野蛮的殴打，按照他的说法，冲锋队员们使用了台球棍或者警棍。阿尔方斯头部受了重

伤，血流不止，暂时失去了知觉。根据他后来在法庭上的证词，痛苦的折磨持续了半个小时。将近凌晨2时，袭击者最终开车离开，前往附近的布罗斯拉维茨村（今波兰兹布罗斯瓦维采）。此时，康拉德·彼得楚赫已经死亡。⁴

法医魏曼博士的验尸报告揭示了这场攻击的野蛮程度，他发现康拉德·彼得楚赫尸体的伤情：

共有29处受伤，其中两处相对不重要。尸体的脖子周围有极其严重的擦伤。外颈动脉完全被切断。后部有一个大洞。死亡原因是外颈动脉的血经过喉部涌入肺部造成窒息。彼得楚赫所受的致命伤肯定是他倒在地上时受到的。此外，颈部皮肤的擦痕显示，这绝对是脚踢所致。除了这些伤处之外，彼得楚赫全身都受到了打击。他的头部遭受钝刃短斧或者棍子的重击。脸上的其他伤痕看起来是台球棍造成的。⁵

考虑到伤害的程度，当局担心彼得楚赫饱受虐待的尸体将立刻成为政治攻击的目标。因此在这一罪行揭露之后，他们没收了尸体，以便“避开共产党人的眼睛”，避免他们拍摄尸体的照片用作宣传。⁶

虽然这一罪行特别野蛮，但绝不是孤立事件。实际上，只要对1932年夏季的德国报纸匆匆一瞥，就可以发现每天都有关于纳粹攻击的报道，主要的目标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但是也有针对犹太人的攻击。⁷据犹太自由主义报纸《中央联盟报》报道，仅在1932年8月6—9日，上西里西亚城市兴登堡（今扎布热）、格莱维茨（格利维采）和博伊滕（今

比托姆）就都发生了炸弹和手榴弹袭击。⁸历史学家将1932年夏季纳粹冲锋队在西里西亚的所作所为描述为名副其实的“恐怖活动”，这些事件发生在7月31日的德国国会选举之后，此次选举确立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并没有产生一个由希特勒掌权的政府。⁹

波滕帕杀人案很快成为全国报纸的头条新闻，这主要归功于一项新的“反政治恐怖主义”紧急法令，该法令在攻击实施前的午夜生效。¹⁰以弗朗茨·冯·帕彭为总理的政府凭借这项反恐怖立法，要求对带有政治动机的杀人犯处以极刑，以竭力阻止每天出现、正在迅速变得难以控制的政治暴力活动。根据新法案，犯下政治死罪者将由新建立的特殊法庭尽快宣判。已经变得脆弱不堪的德国企图依靠这项立法，保持对动用武力的垄断，但是它所传递的信息基本无人理睬，成为了几个月后魏玛共和国最终垮台之前的最后一次此类尝试。¹¹从1926年起成为纳粹党柏林和勃兰登堡大区领袖的约瑟夫·戈培尔正确地预测，这一最后努力将是徒劳的。1932年8月10日，在明显还不知道波滕帕杀人案的情况下，他在日记中写道：“柏林打来电话：新的紧急法案和戒严令……但是这些都将无济于事。”¹²

8月11日，谋杀案发生后仅过了一天，警察就逮捕了9名嫌疑犯：矿工、冲锋队小队长奥古斯特·格劳普纳（生于1899年）；矿上的镐手、纳粹党员鲁芬·沃尔尼查（生于1907年）；电工赖因霍尔德·科蒂施（生于1906年）；冲锋队中队长、计时员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勒（1898年出生）；前警员路德维希·诺瓦克（1891年出生）；矿工希波利特·哈达米克（1903年出生）及卡尔·查亚（1894年出生）。他们还逮捕了两名在罪案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客栈老板：冲锋队队员保罗·拉赫曼（1893年出生），他还兼任波滕帕

的村长；格奥尔格·霍佩（1889年出生）在附近的特沃洛格村经营一家冲锋队酒馆。¹³其他四名参与者已经逃走，包括当地肉贩、主要嫌疑人之一保罗·戈隆贝克。¹⁴从这些人的出生日期和职业可以看出，攻击者是25—43岁上西里西亚男子的典型代表。历史学家理查德·贝塞尔是研究纳粹崛起对西里西亚重要影响的专家，根据他的说法，这次攻击的领导者至少“拥有稳定的中层职位”，说明了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自然而然”地领会、实施暴力攻击甚至政治谋杀，认为此类行径是合情合理的。¹⁵

1932年8月19日—22日，所有被拘捕的嫌疑犯在博伊滕特别法庭接受审判。历史学家亨宁·格伦瓦尔德将波滕帕审判中发生的内讧描述为一次“名副其实的选美比赛”：争斗的一方是汉斯·弗兰克（后来成为了克拉科夫的“总督”）控制下的民族社会主义律师联盟；另一方则是新成立的冲锋队“法律咨询局”，由冲锋队首席律师瓦尔特·吕特格布鲁内领导。¹⁶考虑到案件的重要性，弗兰克和吕特格布鲁内都为取胜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威胁他们的对手和当地纳粹律师，向被告赠送礼物以赢得他们的支持。这场内讧最终给被告造成了损害，因为纳粹法学家之间的竞争“使顺畅、高效的法律援助实际上无法进行”¹⁷。由于证人和被告提供的详细证词，以及被告广为人知的政治态度，法官确认了看上去很可信的犯罪事实。从时间顺序看来，1932年8月9日晚上，布罗斯拉维茨的冲锋队第26突击队队长诺瓦克安排一队冲锋队员实施“令这一地区恐慌”的政治暴力行动。¹⁸此后，这队人马乘车前往附近特沃洛格村霍佩家的小酒馆，那是另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聚会地点。霍佩是驻特沃洛格的冲锋队第27突击队队长，他为这些人提供了额外的武器，指示他们前往波滕帕。那里的客栈老板拉赫曼用大量烈酒和香烟招待了冲锋队员，很显然，拉赫曼和他的朋友、当地肉

贩戈隆贝克一起，提供了当晚要袭击的4个人的姓名。¹⁹彼得楚赫就在袭击名单上，只有他在袭击中丧生，这纯属巧合。在这一晚上，酩酊大醉的纳粹分子还接近了其他两所房子，但是未能成功实施进一步的袭击。

拉赫曼后来声称，谋杀名声在外但无害的麻烦制造者彼得楚赫，“政治”只是一部分原因，个人动机也起到了作用。拉赫曼的旅馆是纳粹的巢穴，彼得楚赫不仅多次辱骂酒馆的客人，还在前几年里支持波兰叛乱分子²⁰，而且，这位客栈老板害怕彼得楚赫公开揭露他经常在附近森林里非法狩猎。²¹一份共产党人的传单声称，拉赫曼作为村长，曾经拒绝向失业的彼得楚赫兄弟发放社会福利。²²在这种情况下，和魏玛共和国末期的许多暴力事件一样，“政治”和“个人”动机相互纠缠。

1932年8月22日，博伊滕特别法庭宣判5名攻击者死刑：拉赫曼的罪名是“煽动政治谋杀”，科蒂施、沃尔尼查、格劳普纳和米勒的罪名是“出于政治动机杀人”。霍佩因“煽动危险的身体伤害行为”而被判两年徒刑。其余3名罪犯（哈达米克、查亚和诺瓦克）获释。²³被告人的反应是高喊“希特勒万岁！”和“打倒司法体制！”。²⁴审判期间，正如媒体强调的那样，他们在法庭上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冷淡和几乎称得上活泼的幽默”。他们以法西斯礼问候参加审判的多名纳粹官员，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西里西亚冲锋队首脑埃德蒙·海内斯，对死刑的威胁也似乎没有过多的烦恼。当地的一份纳粹报纸表达了对这种行为的支持，扬言如果法庭“敢于做出死刑判决”，全国将会出现抗议的浪潮。²⁵事实证明这一预言，至少在当地和社会的特定阶层是如此：判决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当地纳粹支持者举行了一些抗议活动，他们聚集在法院周围的街道上，对法官施加压力。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报道：“法院周围的骚乱非常严重，不得不出动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

和自动手枪的警察。”随着冲锋队的支援部队从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赶来，纳粹至少在那个特殊的日子统治了博伊滕的大街小巷——不仅在法院附近，也包括更偏远的城区，多家商店和一家社会主义报社大楼的窗户被砸碎。犹太店主们关门闭户，拉上了百叶窗。²⁶

判决之后，西里西亚冲锋队领袖、从1930年起兼任纳粹党国会议员的海内斯大胆预测“德国人民很快将做出不同的判决”。他补充道，博伊滕审判将成为德国觉醒的希望之光。²⁷几个小时以后，他在附近一家咖啡馆的阳台上向大批追随者重复了这一信息。²⁸海内斯陶醉于自称的法官身份。十二年前（1920年），当他成为“自由军团”下属单位“罗斯巴赫旅”成员，在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国家战斗时，就曾经“判决”并处决了一名所谓的“叛徒”。虽然德国法院于1929年5月最终因为他的罪行判处其入狱5年，但海内斯很快支付5000马克保释金而重获自由，并很快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骄傲地自称“袋鼠法庭^①的法官”。²⁹

1932年7月31日的全国选举之后，纳粹党成为了德国国会第一大党，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将上西里西亚的局部事件转化为对国家政府的政治攻击。博伊滕的宣判公之于众后几个小时，希特勒发出一份电报，宣称他“毫无保留地忠于”这些攻击者，谴责死刑判决是“最粗暴血腥的判决”。他正式为5名死刑犯辩护，尖锐批评冯·帕彭的保守派政府，宣称改变判决是民族的需要，目标是为了团结更广泛的纳粹追随者：“从现在开始，你们的自由关系到我们全体的荣誉，与做出这种判决的政府斗争，是我们的职

① 即私设的非法法庭。——译者注

责。”³⁰赫尔曼·戈林同样向这些罪犯发出了一封鼓励的电报，并向其家人提供了1000马克。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甚至前往博伊滕，探望了狱中的冲锋队员。³¹

尽管波滕帕杀人犯的罪行在德国和国际媒体上引起了普遍的愤慨，但纳粹领导人仍然为他们公开辩护，如果看了1932年8月24日希特勒以其名义在纳粹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家》上发表的长篇“宣言”，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以比平时更夸张的语调说道：

在我们的殉道者中，有300名遭到屠杀的党员同志——其中有一位简直可以称得上被大卸八块了。此外还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受伤……只有一切都走到极端，对赤色力量有组织屠杀和罪行的恐惧无法忍受，才能让冯·帕彭的“国民政府”警醒，采取行动……任何一位心中藏有为民族荣誉和自由而战情绪的人，都会理解我为什么拒绝加入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府……我们应该将“民族”一词从理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的真正精髓是博伊滕做出的反德意志民族判决所点燃的火焰。冯·帕彭先生用民族战士的鲜血，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德国历史上。³²

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因为对政治对手的诽谤而臭名远扬，他为波滕帕案件的纳粹宣传添上了又一个典型的音符：反犹太主义。戈培尔于1927年创立、此后担任总编的柏林纳粹报纸《攻击日报》的社论，以粗体字印着“犹太人是罪魁祸首”。³³他一再重复这个口号，但并没有确定罪行和他的指控之间有何逻辑联系。戈培尔的策略在纳粹追随者中简单而有效：他

将他们对判决的愤怒和失望，以及对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局势的相同感觉，都转移到常见的替罪羊（犹太人）身上。戈培尔甚至对犹太人发出了暴力的威胁：“总有一天，国家行政当局应该承担其他的职责，而不是保护那些背叛人民的人逃避人民的愤怒。”³⁴面对这种造谣中伤以及种族迫害的号召，当局的反应是命令《攻击日报》停刊一周，但没有造成持续的影响。

通过歪曲事实、利用它们构成明确的政治威胁，希特勒和他的扈从们吸引了数百万追随者，特别是冲锋队，该组织在1932年夏季期望可以立即夺取政权，而不是继续袖手旁观。“众望所归”之下，纳粹领导层猜测，在根本意识形态冲突和种族仇视的政治气候下，没有太多人会关心一名普通工人的命运，尤其他还可能是前波兰叛乱分子。³⁵希特勒可以依靠冲锋队每天制造新的流血事件。³⁶在这种情况下，波滕帕杀人案的细节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他们的政治解读会存活下来。纳粹党及其宣传机器尽一切努力将波滕帕杀人案的罪责转移到受害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更普遍的“犹太-马克思主义体系”上。³⁷下面的诗歌据说是一名普通冲锋队员写的，发表于1932年9月初的一份西里西亚纳粹报纸上，充分说明了这种角色转换：

博伊滕！

博伊滕！它矗立在地平线上。

依然闪耀着鲜红色的光芒。

博伊滕！五位同志受到指控，

死神在他们背后潜伏。

德意志！难道你没有听到他们的危险？

没有听到千百万人的呼喊？

这呼声穿过大街小巷，响彻大地：

我们要让同志们获得自由！

这是一支鲜血凝成、为自由而战的军队。

我们只有一位领袖、一个信念和一杆旗帜，

永远忠诚，不畏牺牲。

我们的信仰就是人民和祖国。

对领袖的忠诚是立身之本。

我们将勇敢地战斗到死

倒在城镇和大地上。³⁸

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彻底的转换：罪案中真正的受害者、遭到谋杀的彼得楚赫又一次被“消灭”了，只不过这一次用的是巧妙的言辞；而5名被判死刑的杀人犯成了英雄，被颂扬为忠于纳粹事业的勇士，得到了数百万同胞的支持。纳粹领导人提出的借口，正说明了英国记者F.A.沃伊特1932年所称的“可怕的德国政治生活野蛮化”。³⁹根据纳粹报刊的一篇文章，被谋杀的彼得楚赫是一名“波兰恶棍”，是“很久以前就被剥夺在德国土地上生活权利”的“亚人类”。⁴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纳粹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在更广为人知的《20世纪的神话》（1930年出版于德国）一书中，他以类似的措辞证明，杀死彼得楚赫这种私刑行为是正当的——他将这种做法描述为“对不近人情的法律唯一可能的纠正措施”。罗森贝格解释道，在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中待遇不同”。日耳曼民族被号召起来，在“雅利安人”、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之间做出类似且可能致命的

区分。⁴¹

但是，纳粹党领导在1932年秋季遇到了严重的麻烦。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这些冲锋队员被处决，形势将变得“无法忍受”。⁴²他担心，那会导致失去耐心的纳粹分子施加极大压力，与希特勒所称的“断头台政府”之间的直接对抗将难以避免。⁴³不管这种对抗的结局如何，都将终结纳粹夺取政权的所谓“合法特性”。他们很幸运，在各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下，1932年7月20日政变（“普鲁士政变”）之后落入天主教保守派冯·帕彭手中的普鲁士州政府做出了让步，将死刑判决为终身监禁，刑期从1932年9月2日开始。⁴⁴这样，纳粹党保住了致力于法制的伪装。

边境心态

波滕帕杀人案是那一个时期相当典型的案例，将一战后的困苦生活与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的暴力行为联系起来。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先前的怨恨情绪，在德国民族主义派系内部和其他一些中东欧国家形成了后来的暴力模式。⁴⁵至于实际的罪行，冲锋队与该地区其他民族主义组织之间的紧密协作是关键。被判处死刑的两名年轻袭击者（赖因霍尔德·科蒂施和鲁芬·沃尔尼查）实际上还不是冲锋队的正式成员，而是上西里西亚自卫团的成员。20世纪30年代初，这两个组织严重重叠，这至少可以从沃尔尼查也是纳粹党员的事实中看出来。⁴⁶入狱之前，两人都住在布罗斯拉维茨的“冲锋队之家”，在那里参加准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是占领街道和森林边缘、准备枪战并为突击部队的袭击积蓄力量。⁴⁷

上西里西亚自卫团是一个官方容许的准军事组织，创立于一战之后，目的是对抗波兰人，保卫德意志帝国和重建的波兰之间竞争激烈的边境地区。⁴⁸1918年秋季，波兰人开始要求将上西里西亚地区纳入新波兰，由于煤矿储量丰富，从19世纪开始，该地区已经发展成德意志帝国的工业中心之一。德国主要政治家和公众都强烈反对这一想法，坚持民族自决，并提出论据称，虽然该地区波兰族人势力很强，但德国人仍占主导地位。他们进一步声明，对于因最近的军事失败而遭受重创的国家经济，这些领土是不可或缺的。⁴⁹1919年到1921年之间，出于“再波兰化”该地区多样化人口的宗教式热忱，波兰人发动了三次暴动，这无助于平息上西里西亚城乡高涨的民族情绪。⁵⁰

德国“自由军团”的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对立的态势，这个民兵组织由彼得·冯·海德布雷克、维尔弗里德·冯·勒文费尔德和霍斯特·冯·彼得斯多夫等人指挥，不仅参与和波兰人的战斗，还迫害所谓的德国“叛徒”，从而说明不仅在语言和种族上，政治边界上的竞争也十分激烈。⁵¹上西里西亚自卫团所谓“特殊警察”的创立者海因茨·奥斯卡·豪恩施泰因（后成为柏林冲锋队首批成员之一）在1928年的一次审判中声称，他的组织为200起“袋鼠法庭杀人案”负责。^①“袋鼠法庭”一词取自中世纪日耳曼人的一种惩罚方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代表着极右翼行凶者对“叛徒”发动的政治谋杀。⁵²德国“自由军团”还仓促地处决了多名所谓的波兰

① 关于“袋鼠法庭”一词的起源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来自司法程序上的“跳跃”，即故意忽略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有的认为来自袋鼠的袋子，指法庭在某些人的袋子（掌握）之中。——编者注

间谍。⁵³一位前“自由军团”成员后来嘲讽地宣称：“杀死这些流氓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没有用子弹。”⁵⁴但是，在1922年对自由军团“埃尔哈特旅”成员的起诉书中，就连莱比锡的检察官都将德国民兵组织有组织的反犹太行动描述为合理的自卫。他认为波兰人的攻击是“在外国势力帮助下”进行的，意在“摧毁德国国家及经济秩序”，这些行动是击退他们的必要举措。在这些文件中，德国检察官暗指盟国管制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一战后，德国上下普遍批评该委员会同情波兰。⁵⁵

这些潮流虽然是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出现，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仍然可以从上西里西亚冲锋队的民族主义和强烈反波兰情绪中得到反映。该组织坚定的反民主思想与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政治信仰紧密相连。魏玛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特别是德国东部边境的防御）采取宽容的态度，许多德意志族人对此非常失望。⁵⁶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西里西亚冲锋队成功地变身为前“自由军团”部队的合法继承者。⁵⁷它的宣传言论很大程度上依赖这种对比，得到了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等极右翼人士的传播，这位前“自由军团”领导人后来也加入了冲锋队。⁵⁸特别是，在靠近德国边境的地区，冲锋队以名副其实的边防军自居，号召捍卫国家统一，对抗东面的捷克人和波兰人，以及西面的法国人。⁵⁹从后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种边境心态的影响不仅限于冲锋队。纳粹夺取政权之后，西里西亚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多次组织其成员的“训练营”。这些为时两周的课程是为提升德国教师“边境意识”而设计的，“边境意识”的定义是对西里西亚在“泛德意志东部地区”特殊作用的种族与历史认知。⁶⁰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许多教师对波兰及其保护国法国有很深的敌意。现在，他们骄傲地吹嘘所谓的“德国边境视角”，将这些态度和思路传授给他们的学生。⁶¹

这种心理取向尚未在冲锋队的现有研究中引起足够的重视，⁶²但它确实是将冲锋队的身份维持到1945年的首要意识形态推动力。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德国扩张主义政策与冲锋队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之后遭遇的严重危机恰好同时出现，冲锋队通过准军事训练、体育锻炼、意识形态教育和后来在二战中积极作战，树立了该组织提升“德国民族性”的形象，这也成为了其继续存在的关键。最晚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在第三帝国边境之外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37—1939年，苏台德和梅默尔地区的许多德意志族人参加了冲锋队，证明了该组织至少在融入第三帝国的地区拥有持久的吸引力。⁶³

1933年1月底纳粹接管政权之后，冲锋队的历史仍然充斥着暴力、仇视和斗争。至于波滕帕案件，当第一批政治犯于3月23日进入在奥拉宁堡、达豪和其他地方新建的集中营时，希特勒释放了早已定罪的冲锋队杀人犯。⁶⁴这些原来的犯人现在面对上西里西亚媒体的“欢呼”，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联盟”在1933年10月递交给国联的一份请愿书中对此提出了申诉。波兰人联盟宣称，由于这些杀人犯现在已经被官方当成英雄，人数处于劣势的波兰人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安全感。⁶⁵接下来的几年确认了他们的忧虑，发生的情况甚至超出了最悲观者的意料。作家奥古斯特·朔尔蒂斯出生于博拉提兹（今捷克博拉蒂采），是土生土长的上西里西亚人，在1959年的自传中，他反思了上西里西亚充满暴力和流血冲突的历史，阴郁地写道：“中欧的这个地区似乎仍处在中世纪。一代又一代，每个人都在普鲁士和波兰国界上被撕裂。人民的自由意志被敌对双方剥夺了；他们受到欺凌、追捕、洗劫，甚至在路边遭到屠杀。”⁶⁶

1932年波滕帕谋杀案后的二十年里这种模式也一直延续。与之相对应

的是，纳粹夺取了政权，该党以极端暴力的形式实施高压强制服从政策，尤其是在下西里西亚和上西里西亚地区。多年以后，德波边境和向东的领土都成为了集体屠杀和民族灭绝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染之地”。⁶⁷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冲锋队是应为这种民族与政治仇视极端化负责的组织之一。借用伊安·克肖的结论，纳粹德国的残暴是“体制的一部分”，⁶⁸人们也同样可以说，冲锋队的残暴是该组织的一部分——不仅是实际行动的一种手段，也是其宣传、成员间交往以及最终确认其民族社会主义身份的核心要素。

恶棍、杀手、政治流氓

尽管波滕帕杀人案骇人听闻，但它只是1927年到1932年之间令德国震惊的数百件政治动机犯罪中的一件，作为一个序曲，它预示了1933—1934年第三帝国建立之后对政治对手及其他所谓的“敌人”发动的系统性迫害。每一件罪行都有助于动摇公众对魏玛共和国的信心，让人们感觉到它无法成功地抵挡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浪潮。魏玛共和国是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但绝不是从1919年成立之后就注定失败的。⁶⁹虽然纳粹冲锋队不是参与暴力冲突的唯一一个准军事组织，但从数量和质量上说，它都对政治暴力的兴起发挥了显著作用。⁷⁰在1932年7月31日全国选举的前夜，紧张局势升级了。仅在1932年6月和7月，德国与政治相关的街头暴乱、枪击、斗殴和暗杀就造成三百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⁷¹在濒临内战的政治气候中，如果不是兴登堡总统关于政治恐怖活动的紧急法令生效后发生的第一起严重政治罪案，波滕帕杀人案可能只不过是地方性报纸的头条新闻。

波滕帕杀人案包含了许多我在下面的章节中要加以详述的元素：冲锋队政治暴力的形式与动机，民主国家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威胁做出的反应，以及它们对德国与邻国从19世纪起的边境冲突的利用。1933年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之后，冲锋队仍是纳粹党的“禁卫军”，至少根据官方的宣传，是其价值观、态度和战斗准备的象征。该党期望，每位冲锋队成员都代表着“最理想的民族社会主义者”⁷²，并且成为德国（男）青年的行为榜样，这部分建立在“自由军团”神话的基础上，但也加入了常与20世纪30年代德国出现的“强身派基督教”和“保守革命”相关的新趋势。⁷³不过，1934年6月30日到7月2日之间，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和数十位追随者在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中被杀，严重阻碍了冲锋队塑造第三帝国政治形象的野心。根据史学家们达成的共识，这些事件使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剩下的十一年中沦为“运动中的二线宣传组织”。⁷⁴

在这种人所共知的背景下，对冲锋队的新研究不一定需要理由，但似乎有必要解释其意图、范围和方法学。本书将阐述，上面对冲锋队崛起与衰亡的叙述不仅不完整，而且掩盖了“褐衫军”对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大批德国人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持续到纳粹统治之后。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 科泽的说法，冲锋队是一个“贪婪的机构”，一个以对其成员“包罗万象”的要求为特性的组织，但其基础是自愿服从、忠诚和献身。这样的组织试图“在其圈子中包含完整的人格”。⁷⁵整个第三帝国存续期间，冲锋队都是根据政权需要及希望打造德国男人的重要组织，但它也使普通的冲锋队员能够参与纳粹的项目。⁷⁶从这个意义上看，在1945年之前冲锋队与政治是高度相关的——这与冲锋队的主流历史研究结论相悖，主流的观点强调，从1934年“长刀之夜”后，冲锋队完全失去了权力

和影响力，认为冲锋队晚期人数仍然可观，但与政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汉斯·莫姆森有一段著名的诠释，称纳粹政治是一个“日益极端化”的过程，特别是在根绝犹太人的态度上，⁷⁷按照他的说法，现存文献对晚期冲锋队的结论是，该组织“日益粗俗化”了。

这种评估是误导性的，它给人带来一种印象：1934年后的冲锋队只热衷于某种怀旧的“酒友关系”——这种论调是战后许多冲锋队积极分子最先提出的。这种看法无视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发动战争之前的重要活动，包括在1935年夏季达到高潮、1938年6月和11月再度兴起的反犹太暴力活动；无视冲锋队对二战的贡献；也无视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周之前，冲锋队在德国国内及占领区纳粹政权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下面的研究将涵盖从1921年纳粹首次在慕尼黑组织冲锋队开始，到1945年冲锋队因德国战局最终崩溃而停止运作为止的整个时期。⁷⁸而且，我们还将探索盟军占领德国的过渡阶段，以及1949年两个德国建立后各自管辖区内对冲锋队及其罪行的处理。我将提出理由说明，这些法庭对二战后十年内冲锋队历史的编纂方式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最后，我们将以一部全面的纳粹主义社会史为背景，重新评估冲锋队的重要性。

考虑到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第三帝国、二战及大屠杀的历史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任何一位研究人员都不敢声称熟悉这些领域的所有细节⁷⁹——以冲锋队为中心的著作数量之有限令人吃惊。除了对冲锋队社会诉求及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存在争论之外，现有研究著作对该组织的诠释相当统一。⁸⁰绝大多数的著作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34年之间，明显将重点放在冲锋队激进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后果。⁸¹恩斯特·尼基施在他《卑贱恶魔的帝国》（1953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

一书中对冲锋队的评估就是早期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尼基施写道：

冲锋队是一个反精英组织；它吸引的都是一些内心堕落脆弱的人。在冲锋队中，所有犯罪倾向都得到纵容。冲锋队营房是恶习的巢穴；那里充斥着不愿劳动的人、酒鬼、失败者、同性恋者、恶棍和杀人犯，他们策划着自己的恶毒攻击，试图用这些罪行“唤醒”德国。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儿子们在褐衫军中经过了黑社会的训练，其人员素质反映了德国中产阶级人性的堕落。⁸²

尼基施原来是一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937年曾遭受纳粹监禁，后来被任命为东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个人对纳粹的愤恨与同时代的政治学说相符，至少在冲锋队问题上是如此。受过教育的西德人和东德的社会主义政权都认为，冲锋队的暴力倾向和缺乏道德是法西斯统治的基石，但理由稍有不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里，冲锋队的暴力活动常常被用于说明民族社会主义是不合理、不正当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暴民统治”。这种说法的弦外之音是明显的辩护，因为这种形象与所谓中产阶级试图“缓和”纳粹过度行为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可能会说，冲锋队被描绘成“狂热的纳粹分子”，与之相比，即使是纳粹政权的支持者和正常的纳粹党员也可以得到正面的形象。在最好的情况下，后一个群体可以认为自己是“有策略”或者“正直”的纳粹分子。在共产党当政的东德，人们的看法更矛盾一些：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冲锋队在20世纪30年代初犯下的暴力罪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有时候会出现在公审中，特别是那些对共产党人实施的暴行。但是，20

世纪50年代起，说服原褐衫军成员为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利益工作占据了上风，对罪行的控诉相应减少。在两个德国里，对冲锋队的蔑视态度一直占据上风，至少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有影响的记者和作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看来，援引一位受人尊敬的西德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说法，冲锋队不过是伪装的暴民，是“有政治偏见的犯罪团伙”。⁸³历史学家汉斯·布赫海姆在1965年同样认为，“冲锋队暴徒”是“古怪军人传统最邪恶的形式”⁸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L. 夏勒甚至声称，许多冲锋队领导人是“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⁸⁵。

但是，这种言语刻薄的评估告诉我们的更多是战后历史学家们的偏好，而不是冲锋队的社会现实。与这些评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1年警察部门内部的一份《关于激进组织作战原则》的备忘录中强调，在冲锋队员里“毫无疑问有许多宝贵的人才”，领导他们的是“高素质的领导”。⁸⁶卡尔·奥托·佩特尔是魏玛共和国晚期的一位“民族革命者”，他在第三帝国时代流亡，后来成为了将美国“垮掉的一代”诗歌引入西德的媒介。他早在1965年就正确地强调，撰写关于冲锋队的文章，难点在于不能满足于重现冲锋队的“管理方案”和命令。相反，佩特尔认为最重要是有说服力地解释在这种“复杂行政框架”下，两类冲锋队成员是如何共存的：一类是“理想主义者，另一类则是拥有‘虐待狂恶棍的丛林心态’的人。”⁸⁷这对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冲锋队的“理想主义者”和“虐待狂”——这里坚持使用佩特尔的术语——难以区分，有时甚至完全无法辨识。

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关于冲锋队的重要研究著作直面这一挑战。前述的早期文献通常强调冲锋队的“罪犯特性”——应当承认，鉴于到直

至20世纪50年代末，许多德国人仍然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不幸走入歧途的“好思路”⁸⁸，这是该国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新研究著作的作者们更仔细地观察了冲锋队的社会构成、心态和政治组织。彼得·默克尔关于冲锋队员自我形象，马蒂尔德·雅明关于冲锋队领导层以及所谓“罗姆清洗”之后存在的问题，以及理查德·贝塞尔关于1933年之前冲锋队在西里西亚的崛起及政治暴力的著作都是开创性的，它们成为了最新研究的基础。彼得·隆格里希极具创意的冲锋队政治史出版于1989年，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领域重新出现的兴趣告一段落。⁸⁹

20世纪90年代起，关于冲锋队的研究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首先，是将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与更新的尝试相结合，编写暴行历史的一系列著作，它们往往从行为学和微观历史的角度出发，有时甚至出现了故意的对比设计。这些研究强调，冲锋队构成了“暴力团体”，这些团体鼓吹过度行为与纪律性相辅相成的特殊“生活方式”。⁹⁰斯文·赖夏特从2002年起撰写的专题论文令人印象深刻，对比了德国冲锋队和意大利的“黑衫军”，成为这一思想学派有影响力的著作。⁹¹其次，在许多关于纳粹夺取政权的局部研究，关于德国警察、司法及早期集中营的历史研究中，同时分析了冲锋队历史的重要方面。⁹²此外，还出现了家庭成员探索拥有“冲锋队生涯”的亲属过去经历的书籍。这些书籍大体上以本人的记录为基础，往往包含与个人投身冲锋队动机有关的信息——此类信息在国家档案中鲜少记录。⁹³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著作受到了新文化史的启发。这些研究文献的作者对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的“躯体形象”很感兴趣，分析了纳粹主义者的仪式和象征，特别是具有浓厚法西斯意识形态特征的死亡崇拜。⁹⁴其他一些著作则探索两次大战之间准军事组织的性别

特征，详细研究“纳粹同性恋者”的旧观念或者重新审视纳粹积极分子与各教会之间的关系。⁹⁵

新视角

虽然不能将冲锋队说成是尚待研究的主题，但目前为止对其历史和发展还没有任何全面的叙述。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不仅将多条松散的线索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对来自多个国家十余个国家及地方档案馆研究信息的介绍，产生比以往的著作中更多层次、更平衡的观点。⁹⁶这个研究项目旨在提供第一部全面的冲锋队历史，结合广泛的档案研究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彻底分析，重新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评估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历史和西方现代史上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强调。首先，如上所述，冲锋队的历史经过全面研究的部分仅到1934年夏季之前。尽管布鲁斯·坎贝尔在二十年前就发表了开创性的文章，敦促学者们不要忽视后期冲锋队的作用，但是只有少数历史学家响应他的号召。⁹⁷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将提出理由说明，历史学家将研究工作集中在魏玛共和国（纳粹曾蔑称其为“Systemzeit”，意为“体制时期”）后期冲锋队实施的暴力活动上，造成两个问题模糊不清：（1）冲锋队不仅在“长刀之夜”中存活下来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末局部地卷土重来这一事实；（2）该组织帮助纳粹渗透到德国社会的程度。1939年，冲锋队仍然有130万之众——大约相当于1932年时的3倍。⁹⁸直到1945年，冲锋队的暴力动员和训练整合都是纳粹“民族共同体”的特征。在过去的十年里，德国现代史研究人员对这一术语的适当性和它所特指的

社会性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至少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族共同体”是很受欢迎的政治承诺，但从来都不是社会现实。然而，这一辩论的参与者并没有给予冲锋队足够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当前的研究不仅对辩论有实证上的贡献，而且对其讨论模式和初步结果提出了批评意见。⁹⁹

其次，总括冲锋队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所形成的全面观点，使我们可以在对比和跨越国界的情况下，比以前更清晰地看待冲锋队。¹⁰⁰我们不仅仅以一战之后中欧大部分地区的“白色恐怖”和墨索里尼1922年成功夺取政权为背景，去看待冲锋队早年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承认，冲锋队在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具有跨国特性——包括所谓“奥地利军团”（冲锋队的一个分支，由1938年德国兼并奥地利之前在德国避难的奥地利纳粹分子组成）¹⁰¹的出现，以及20世纪30年代末冲锋队从地理上扩充到纳粹帝国兼并领土。到1942年，冲锋队不仅存在于前捷克斯洛伐克领土，而且出现在阿尔萨斯、斯洛文尼亚、瓦尔特高和波兰“总督府辖区”。这些地区冲锋队的历史实际上不为人所知，使我们得出“德国化”问题的重要见解，这一问题的定义是，将这些地区的人转变为纳粹文化和种族标准承认的“正派”德国人。因此，对于关注党卫队、德国外交部以及德意志族人定居问题所涉机构的优秀研究实体来说，我的分析也是一种补充。¹⁰²至于“冲锋队外交官”——20世纪40年代初派驻东南欧附庸国的冲锋队最高层人物，本书将阐述这些冲锋队将领们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他们是暴力活动的专家，与大屠杀的实施直接相关。

再次，虽然冲锋队涉及的身体暴力程度很高，特别是在狂暴的1933年，但是从国际社会看来并不突出——至少和20世纪的极端群体暴力事件相比是这样。¹⁰³不过，在审视特殊环境和时机下暴力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时，

冲锋队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例子。暴力活动不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且具有相当的优势，因此常常被以“目的理性”的方式运用。¹⁰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产生了经济上的赢家和输家，而且阻止个人体验兴奋感和归属感，面对这种情况，正如德国哲学家、学者扬·菲利普·雷姆茨马最近指出的那样，运用暴力能够提供关键的好处。¹⁰⁵这是一种退出策略，中产阶级基于谨慎规划、服从于普遍道德观念的考虑方法被自由（摧毁）、个体自主的感觉和重大物质及精神收获取代。因此，暴力可以实现特定形式的愉悦感，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无法找到替代品，那么它就具有特别的吸引力。¹⁰⁶因此，许多思想家不相信资本主义改革，而信奉暴力革命是“历史的催化剂”，是摧毁僵化政治体制的新社会运动的一种合理“手段”。¹⁰⁷人们可以由此推断出：如果通过暴力实现暂时的个人自主可以看成服务于更高目标的合理手段——例如服务于国家或者神的意志（理想状况下可能两者兼有）——这种几乎不受限制、但自证合法的暴力活动也将通过相对稳定的群体认同而给行动者带来好处，这种认同并不一定弱于他们所对抗的业已确立的道德秩序。¹⁰⁸

暴力的两面

正如本书将要阐述的，从许多方面来看，冲锋队动用暴力是一种目的理性和自主的选择。然而，拥有危险的武器不仅能够吓阻对手，而且还能将其使用者提升到与主流社会及其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的地位，一个精心建立、具有高度技巧的宣传系统能够鼓励狂暴的个人，使他们感觉自己是为国家和上帝而战的“现代十字军”，能够合法地向异教徒开战，甚至成为

人类的代表——这一切都不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冲锋队队员们独有的。显然，本书是在特定时间框架内介绍一个特殊组织及其成员的历史书籍，而不是系统比较今天之前暴力形式及制度的长期研究著作。但是，尽管有所保留，冲锋队的历史在许多方面仍是20世纪政治、媒体报道、暴力和草根激进主义相互交织的例证。

聚焦于如此广泛的话题需要严格的方法，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对方法论做一些额外的解释。本书的焦点是暴力活动及对个人、战略及文化的影响，但也涉及冲锋队这样的组织能够整合的力量。我将特别关注暴力动员及训练整合的过程。对于冲锋队员来说，这两种现象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纳粹运动不仅将暴力活动作为动员其支持者与敌人斗争的手段，还用它来训练全体人民，特别是其积极分子。暴力活动的第一种作用在1933—1934年之前起主导作用，而在第三帝国后期占上风的是第二种作用。不过，即使到后期，通过暴力活动进行训练整合的过程也总是包含着动员的因素——反之，早期的动员同时也对冲锋队员起到了训练的效果。¹⁰⁹

暴力活动史这一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了很大的拓展。¹¹⁰1914—1945年有时被称为“欧洲内战时期”，是对暴力活动研究感兴趣的历史学家特别关注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它们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伤亡，还因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它们对以政治自由化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发起了挑战。¹¹¹民族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变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右翼独裁主义”的变种，它已经在一个广泛的跨国对比性研究领域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那就是对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出现的、替代旧极权主义思想的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及政权的研究。¹¹²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在跨国对比的框架中，认真

地审视这些运动采取的政治暴力形式。¹¹³实际上，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至少在其初期）现在已经日益被当作欧洲现象的一个变种，而不再被解释成德国现代史“特殊道路”的基石（“特殊道路”是有影响的比勒菲尔德社会史学派特别推崇的一个框架，将德国现代史与想象中的其他欧洲国家发展史做负面的比较）。¹¹⁴随着第三帝国的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变得过于暴力，在二战期间进一步激进化，纳粹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实施了一项毁灭和大屠杀计划，奴役和杀害了该政权认为“不受欢迎”的数百万民众，其中最突出的是欧洲犹太人。¹¹⁵

当前的研究遵循这一跨国史学趋势，但并没有忽略冲锋队的民族特性，分析了冲锋队暴力活动模式的改变及其影响，从该组织早年作为真正的准军事自卫联盟，到全盛时期成为一项暴力社会运动，再到纳粹政权时代，冲锋队转化成为一个起到辅警作用的群众组织，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减弱。¹¹⁶为清晰起见，我有时候将这些不同的阶段称为第一（1920/21—1923年）、第二（1925/26—1933/34年）和第三冲锋队（1933/34—1945年）。为了充分介绍不同的时期，以及政治活动形式的改变，我遵循斯文·赖夏特的开创性著作，依靠暴力行为的行为学分析。赖夏特运用两次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的例子，成功地说明用行为学研究社会互动，能够协调组织结构与行动、意识形态和日常习惯。通过分析纳粹激进分子的日常活动，他们共有的世界观和他们（对自己所采取行动）的“主观归因”，有可能重现冲锋队中特殊的“共同体”模式。¹¹⁷不过，我还将重新评估赖夏特的主要论点——在冲锋队中，实施暴力和共同体的感觉是相互交织的。¹¹⁸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他的分析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我将探讨赖夏特的论点与第三冲锋队现实的契合程度，从而努力澄清

冲锋队的历史是断裂还是延续的。

在审视冲锋队实施的暴力活动时，我分析了其中包含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结构因素。¹¹⁹前两种形式不言自明——身体暴力是直接袭击某人的身体，而心理暴力是有意识地企图损害他人的健康——而文化和结构暴力以及象征性的暴力形式很难定义，也更难在回顾中加以评估。除了人际关系上可能有害的意图之外，这种暴力也是更大规模社会与政治进程的结果。¹²⁰因而，后几种暴力形式模糊了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因为他们最终都向对方施加了力量，责任更难以认定。

无须理会这些实际问题，用两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为什么这种研究需要对暴力活动有广泛的理解。首先，1930年前后，冲锋队在一个工人阶级居住的社区举行了一次公开游行，尽管没有人受伤，但此举对参与者和政治对手来说都意味着暴力挑衅。其次，几年后纳粹独裁统治确立时，一群身穿制服出场的冲锋队员就足以恐吓潜在的异议者和旁观者。¹²¹这不仅仅是占领公共空间的一种华丽姿态，每个人都知道，即使是看上去很平静的一群冲锋队员，也可能很快地诉诸身体暴力，许多人同样知道，向警察或者司法机关求助通常是无用的，甚至可能直接招致麻烦。¹²²最新研究证明，冲锋队暴力活动的这种结构因素——其成员的“行动力”¹²³——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都保持着。托马斯·屈内最近强调，在第三帝国里，即使“同志关系”这样看起来无害的概念也包含着好斗和最终灭绝的倾向¹²⁴，遵循他的方向，当前的研究不仅涵盖冲锋队有形的暴力活动（像媒体、法庭文件和回忆录中叙述的那样），还将注意力放在不那么“壮观”的冲锋队社交及社区组织形式上，研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一种归属与排斥相辅相成的社会气氛，正是这种氛围将中欧变成一个“暴力之地”，使构成和平时期人

类交往的安全形式不再有效。¹²⁵纳粹于1934年完成政权接管之后，冲锋队身体暴力活动仍然相对有限，但由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认为，涉及冲锋队的暴力事件实际上比第三帝国法庭和警察记录所表现的更为频繁，“褐衫军”心理和文化暴力产生的永久性威胁与其他纳粹机构相结合，是他们持续拥有权力并产生社会影响的原因。

但是，将历史分析集中在作恶者和他们所在的结构框架上仍然是不全面的。关于冲锋队的书籍实际上也要谈及他们实施暴力的受害者。接下来我将探究冲锋队员们的意图、行动和心态，但我也希望公平地对待20世纪20年代初到1945年遭遇冲锋队暴力冲击的所有人。对历史上的暴力活动进行分析不是为其寻找借口，但势必导致某种和解——这是研究和撰写本书时我牢记的一个事实。¹²⁶

论证的方针

下面的10个章节根据年代和主题排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3章）概述了早期的冲锋队，从1920/21年诞生于慕尼黑到十年后转变为一种受控的社会运动。我将以魏玛共和国日益对立与仇视的政治文化为背景，分析冲锋队的组织和政治史。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和20世纪20年代议会各党的文化背景，20世纪20年代末冲锋队的崛起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仅从这种环境并不足以解释1926—1933年该组织的“成名史”。因此，本书的任务是将冲锋队的制度与政治史融入对其日常暴力活动的研究之中——既有容易察觉的暴力活动，也有语言上浮夸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的这两种形式是紧密相关的。我的研究更详细地剖析了从20世纪20年

代末开始不断增加的（政治）冲突，以便阐述一种政治策略的机理，这种政治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暴力与恐怖的传导特性为基础建立的。同样，我也重新评估了冲锋队的重要性，它是纳粹在民意测验中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冲锋队内部对纳粹党虚伪的“合法道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不满。最后，本书的这一部分将探索冲锋队内部对立集团的政治动机和自我理解，一般认为，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格雷戈尔和奥托·施特拉塞尔兄弟，以及1931年被驱逐之前的柏林冲锋队指挥官瓦尔特·施泰内斯。我将阐明，认真审视冲锋队历史可以证明，这段历史并不是纳粹党宣传中企图描绘的那样，是简单地“迈向权力”，而是更为复杂的发展道路，其间充满了冲突和内部的争吵。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第4章和第5章，研究了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初期的关键作用。在纳粹政权建立的前两年（到1934年夏季为止），冲锋队是负责监禁和杀害政治对手的最重要组织。虽然过去三十年关于冲锋队恐怖活动的局部与地区性研究书籍相当多，但我们仍然缺乏超越特定罪行的简单重述和人物传记，综合考虑冲锋队准警察暴力行为的形式与目标的专业概述。¹²⁷因此，本书深入分析了冲锋队的暴力行为如何深植于德国从民主国家向独裁国家转变的进程中。我们用案例研究说明，冲锋队如何与纳粹党领导层、警察、司法机构互动，阐述更大的趋势。可以证明，冲锋队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暴力行为难以控制，甚至威胁到前些年为暴力政治文化兴起做出贡献的人。而且，我研究了作为个体的冲锋队员对这些暴力行动（自身和同伙的行为）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如何融入纳粹主义者对时代的更广泛理解。通过仔细研究个人观点和冲锋队暴力行动的系统化影响，本书不仅能够提供冲锋队的更完整面貌，还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纳粹独裁统

治的确立。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介绍了1934年7月初发生、今天被称为“长刀之夜”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罗姆、数十名冲锋队高级官员以及纳粹主义其他著名对手被杀。我将重新评估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新文献，全面研究这些事件，特别关注它们的中长期影响。

本书的第三部分（第6—9章）分析了相当一部分领导集团成员被杀之后，冲锋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幸存，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社会的军事化做出贡献，并且参与了二战的准备工作。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德国及奥地利的反犹太暴力活动之外，关于这一时期冲锋队活动的著作并不是很多。为了全面描述1934—1939年的冲锋队，我将在第6章中证明，不应该仅仅将焦点放在引人注目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上，还应该考虑冲锋队的结构特性，它转变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中。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褐衫军”越来越多地涉及与并吞奥地利和梅梅尔地区、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相关的准军事任务。第7章将阐述，冲锋队领导人甚至制定了东欧殖民计划，这一任务最终被迫移交给与之竞争的党卫队。在第8章分析的战争时期，冲锋队的大部分成员加入了国防军。不过，一些战斗部队——特别是冲锋队“统帅堂”旗队——完全由冲锋队员组成。纳粹主义早期的“政治战士”概念以升级的形式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们不是在德国的街头与布尔什维克作战，而是战斗在俄罗斯平原上。第9章将首次全面分析派驻东南欧国家充当德国“使者”的冲锋队高级将领们的任务与行动。我将论证，任命他们不仅是将德国外交置于纳粹党控制之下的一次尝试，还试图将在这些国家屠杀当地犹太人的外交准备委托给忠诚的纳粹积极分子和狂热的反犹太分子。尽管冲锋队不再是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纳粹组织，但这些例子说明，它仍然是一个由“坚定的”纳粹积极分子组成的网

络，这些人对战争和大屠杀都做出了“贡献”。

本书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包括第10章和结语）所关注的是1945年之后冲锋队遗留的影响。我将首先阐述，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第三冲锋队在第三帝国中无足轻重的理解方法很受欢迎，它成为了一种司法辩护手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次，我将说明这种偏袒的观点很快被早期编写的冲锋队历史接纳，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对冲锋队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我将最终重新评估冲锋队在整个纳粹主义历史中的作用，目的是抛砖引玉，推动超越狭隘时间及空间界限的进一步研究。

从上面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很重视纳粹的“情感文化政治学”以及指导其积极分子的自我形象。¹²⁸因此，我的目标是说明冲锋队真正的影响力——它不仅是在1934年之前的德国街头针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犹太人的民兵组织，还是一个在纳粹政权后期保持活跃的组织。冲锋队员自诩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承诺的化身，也是以种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捍卫者。大部分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都有各种充分的理由轻视褐衫军，但是无法贬损这一信念的力量。当时平等社会的理念大行其道，对这种社会的定义是每个人都要承担同样的基本社会责任，在这种背景下，那件褐色制服对社会团结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视。整个20世纪，平等主义思想在德国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承诺更为其增添了力量，将人们的期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利用了这些期望，但是将它认为具有合法社会权利的人和因为基本意识形态、种族或社会原因而被排除在外者截然分开。纳粹党的“民族共同体”概念建立在民主政党同样珍视的民族与阶级团结基础上，但是该党歪曲了这一思想，按照种族和意识形态路线为其设置条件，同时培育独裁统治

和弥赛亚式的领袖迷信，这与民主参与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¹²⁹

民族社会主义者将具有超凡魅力的终极独裁统治与大众对民族归属感的渴求结合起来，事实证明，这不仅对被边缘化者具有吸引力，对贵族阶层来讲同样如此。当末代德皇之子、绰号“奥威”的奥古斯特·威廉皇太子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公众场合穿上冲锋队制服，甚至代表纳粹党发表政治演说时，许多人都将他看成傻瓜。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象征性的姿态似乎证明，纳粹正在实现着某种有相当价值的目标：一个真正而非想象的共同体，可以将德国爱国者团结起来，不管这些人是街头的普通民众，还是出身最高贵家庭、住在城堡中的贵族。政治领袖、君主和民众中的“神圣同盟”思想已经确立，正如19世纪初的政治神话——对抗拿破仑·波拿巴所率领的法国军队的“自由之战”，纳粹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不过，纳粹党是一个现代政党，它不会主张以高贵出身为基础的王朝，而是倡导建立在个人美德之上的“元首之国”。¹³⁰希特勒经常在纳粹党集会和公开演讲中穿着冲锋队制服，似乎是为了确认纳粹党的承诺：在他们的国家里，每个德国人不管社会背景如何，都可以因为拥有必要的领袖特质和正确的意识形态信念而登上巅峰——即便如此，他仍将是同辈中的佼佼者。¹³¹

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之后成为一片废墟，纳粹关于种族架构下平等的承诺并没有被人们遗忘，这可以从德军士兵被美军俘虏时仍公开为冲锋队辩护的事例中得到证明。前德军中校赫尔穆特·里希特曾说，他仍然相信民族社会主义的“理念”，将自己称作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等纳粹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并宣称他认为后者是民族共同体的基石：“在冲锋队里，工厂经理和工人是平等的，中队长的地位甚至在工厂经理之上（如果后者不

是中队长的话)……我们需要的只是与人民的亲近感;这就是一种新生事物。”¹³²一位前国防军军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是在知道这对自己没有好处的时候,这就强烈地说明尽管冲锋队的直接政治影响有限,但战争期间它的形象已经铭刻在德国人的心中。对于坚定的纳粹主义者而言,直到1945年,冲锋队仍然是纳粹意识形态及统治的核心元素之一,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它仍然代表着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承诺:“种族概念上”的纯粹德国人的社会参与感和民族归属感。¹³³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部 分

第1章 战后德国的动乱和纳粹冲锋队的起源

枪支和手榴弹不允许带进剧院。

——《慕尼黑市政府令》，1919年5月8日¹

纳粹冲锋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出现的“跨国准军事暴力区”的典型产物，因此本书首先分析该组织及多个其他右翼准军事联盟产生的环境。²本章聚焦的地区是巴伐利亚州，此外还要附带地提到邻近的符腾堡州和奥地利，因为冲锋队在那里创立并运作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法西斯主义而言，一战的影响难以估量。这场战争为一种新的心态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正是这种心态造成了接下来二十年里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冲突。³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军事改革家们就将军队定义为“国家的学校”。战争年代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军队对社会有着更加广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向这个国家的青年贵族们灌输受人尊敬的美德和军人的纪律性，而是借由前线的大规模杀戮和德国内部的严重食物短缺，最终摧毁了这些美德赖以存在的旧秩序，并为解放之前被排除在政治和军事领导阶层的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女性）做出了贡献。⁴正如历史学家约恩·莱昂哈德最近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提升期望值的革命”，它从

根本上形成了欧洲人对政治及社会的观念。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普通士兵从1916年就开始日益轻视现有的政治和军事当局，发明了新的敌对性词汇，以及描述归属与排斥的新语言。⁵在战争期间的军人报纸、信件和日记中，可以找到特殊形式的辛辣讽刺，它们在停战之后都转化为一种更为狂暴、对立的政治语言，促成了两次大战之间尖锐对抗的政治气候。⁶

秩序之战

1918年11月的革命导致德皇退位，为德意志帝国转变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铺平了道路，在此后的几年中，一大批新的准军事组织在德国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证明了国家对合法动用武力的垄断局面被打破，而且证明了一个事实：千百万普通民众此时觉得有必要将政治抓在自己的手中。1919年春夏，临时性的国防军建立，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它的规模限制在10万名士兵和6000名军官，至少从官方数字上是如此。⁷这意味着，大部分曾在帝国军队中作战的士兵现在成了冗员。虽然许多人解甲归田，但是相对重要的少数人加入了新的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补充了新国防军的部队，尽管在政治上和财政上依附于年轻的民主制度，但只表现出了部分的忠诚。到1921年，大约有40万人参加了德国的准军事活动。在这段时期，“自由军团”部队和其他半官方“政府部队”共有70至400支。⁸某些部队完全从原帝国军队中招募，其他则是短命的乌合之众，人数不满五百。初期，这些半合法部队有助于保证德国边境安全，特别是东部和东南部边境。可是，他们返回德国心脏地带之后，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日益严重的政治暴力，这也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早期特征。⁹他们并不是冲

锋队的直接先驱；根据对德国“自由军团”的最新研究，这些准军事化部队的成员中只有1%—5%后来加入了冲锋队。¹⁰

上述情况在巴伐利亚最为极端，1919年的政治动乱——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来又在国防军和国家承认的准军事组织（如“埃尔哈特旅”¹¹“埃普自由军团”¹²和“奥伯兰自由军团”¹³）联合干预下解散——为所谓的巴伐利亚“秩序的单元”打下了基础。这是一次区域性的发展，其特征是德国人非常小心翼翼地接受了新的民主秩序，并且在政治上、法律和财政上越来越愿意支持各类民族主义组织。¹⁴在共和国初期，巴伐利亚政坛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民团”：这是由格奥尔格·埃舍里希领导的爱国自卫组织。在当局眼中，“民团”支持政府实施法律与秩序的努力，但是他们最终促成了保守政治的激进化，帮助温和的爱国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形成持久联盟。尽管德国政府建立了所谓“防务专员公署”——一个由国防军军官组成的网络，旨在监督“民团”运动，但埃舍里希及其副手鲁道夫·坎茨勒在巴伐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坚持其组织自主权，并且操纵一项政治进程，为将巴伐利亚及其首府慕尼黑转化成“大规模反革命联合体总部”助力。¹⁵

1920年春季，“民团”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拥有35万名成员。虽然许多成员在政治上温和，他们的意图是捍卫巴伐利亚王朝的传统、上帝和祖国，反对“革命的罪恶”和令人厌恶的“普鲁士人”的政治影响，但是这项运动也为未能融入国防军正规部队的军人和“自由军团”成员提供了家园。在“民团”保护下，“蔑视其守旧的狭隘思想以及‘巴伐利亚式尚武精神’”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加入被称为“地区旗队”或者“帝国旗队”的机动旅，这些部队兵力最多时达到3万人。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这里建立持久



这张照片描绘的是1919年慕尼黑市中心的一条街道，背景是圣母教堂的双塔。左边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坐在一辆装饰着骷髅图的汽车里。左上角原文意为“政府军用机枪粉碎一小群德国共产党”。然而，更贴近一点看，观众会发现一个大子女人，就在最右边的士兵身旁，她的形象已经被消去了。同样消失的还有走在她前面的一个人。因此，被拍摄的真实街景相当平静。修饰照片是为了夸张地表现战后巴伐利亚的政治局势，同时证明针对极左势力的暴力——有时十分极端——具有正当性。

性的关系网，与巴伐利亚政府和军队代表建立正式的秘密联系，接受训练和武器，最重要的是，他们凭借一些活动赢得了公众的承认，这些活动越来越无助于稳定民主秩序，其目标是在下一次合适的运动到来时挣脱这种秩序的羁绊。¹⁶

巴伐利亚政府（最初由社会民主党【SPD】的约翰内斯·霍夫曼领导，从1920年起由保守的巴伐利亚人民党【BVP】独立候选人古斯塔夫·利特尔·冯·卡尔领导）对这些发展持宽容甚至支持的态度，很快引起了协约国的怀疑，它们反复要求解散德国准军事部队。但是直到1921年6月，当时

的巴伐利亚“强人”冯·卡尔才在保留个人意见的前提下，同意解散巴伐利亚“民团”以及与之对应的全国性组织“埃舍里希组织”。¹⁷尽管这些措施对1919—1921年的巴伐利亚地区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但同时造成巴伐利亚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对抗日益尖锐，德国此时控制在第一大州普鲁士的手中，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前一直把持着该州的大权，将其打造为“不可思议的民主基石”。¹⁸然而，在整个德国，许多民众仍然质疑这种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甚至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与之和平相处的人，都对其他选择保持开放态度。

巴伐利亚“民团”运动的崛起与衰落构成了纳粹冲锋队建立的背景，特别是在三个因素上。首先，新建立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在1920年2月24日之前称为DAP——“德国工人党”）组建准军事部队时，恰逢巴伐利亚政治风向右转。但是至少在初期，与“民团”组织和其他“爱国组织”中的数十万人相比，纳粹运动在德国无足轻重。其次，由于“民团”运动，秘密筹资和武装、不回避政治谋杀的准军事集团在巴伐利亚成为了被广泛接受的政治元素。¹⁹最后，“民团”培养了这样的思想：一战之后，参与德国政治需要个人的奉献——既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战士。因此，即使是最激进的组织——纳粹冲锋队很快就成为其中一员——也可以在公众面前扮演法律和秩序的合法捍卫者。

冲锋队的建立

民族社会主义者编纂的历史声称，纳粹党的“体育运动部”（冲锋队原来的名称）是在手表制造商埃米尔·莫里斯领导下，于1920年11月12日建

立的。²⁰这一天，一群纳粹纠察队员保护在慕尼黑皇家啤酒馆举办的党员集会，对抗来自“共和保卫联盟”的抗议者。²¹尽管这个随意选择的日子为冲锋队的建立提供了浓厚的神话色彩，却浓缩了一段更长的过程。实际上，冲锋队的组织是从1919—1920年开始逐步发展的，与NSDAP/DAP的政治组织及日益壮大的“民团”运动并行，最终于1921—1922年清晰地确定了其政治准军事组织的特性。²²从技术上说，冲锋队及其母党NSDAP是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协会”的注册社团组织。除了1923年11月希特勒发动政变后的一段时期，NSDAP和冲锋队被宣布为非法之外，这种法律地位都是有效的，直到1935年，纳粹党最终成为一个公共机构。²³

但是，建立专门的保卫部队支持党的工作并不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专利。民族社会主义者甚至没有声称这一名称以及冲锋队的“品牌”是他们的创意，1919年，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党魁埃哈德·奥尔就开始为自己、社会民主党会议以及党举办的集会组建保卫部队，这些部队最初称为“奥尔卫队”或者“皮策卫队”（得名于第一任指挥官弗朗茨·克萨韦尔·皮策）。²⁴组建这些卫队，是对1919年2月21日库尔特·埃斯纳遇刺事件的直接反应，埃斯纳是战前的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领袖，死前任该州总理，刺杀他的是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安东·格拉夫·阿尔科·奥夫·瓦利。²⁵从1920年11月10日起，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还正式组建了会场纠察队。次月，这些部队常常被称为“SA”，意为“突击队”或者“会场纠察队”。慕尼黑的社会民主党突击队总部由预备役中尉威廉·布伊松²⁶领导，根据警察的数字，包括在附近城市弗赖辛、因戈尔施塔特和罗森海姆的人员，该部队有2000—5000人。²⁷巴伐利亚当局1923年10月取缔社会主义准军事组织，之后几个月，左翼分子的“突击队”并入新的“帝国战旗德国现

役军人与共和支持者同盟”，这是社会民主党1924年2月22日在马格德堡创立的全国性准军事防务组织。²⁸

最初的纳粹冲锋队与奥尔卫队类似，被称作“希特勒卫队”，²⁹因此，严格来说，它即使不是完全效仿社会民主党，创建由该党指挥的自卫部队，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但是，不久以后，两个组织之间的重要差异开始显现。社会民主党突击队存在的理由是国家不愿意为该党的会议提供充分的保护，而且事实证明，当局没有能力保证左翼政治领袖的人身安全。然而，纳粹党的“体育运动部”几乎无法自称为防御性组织。早在1920年，纳粹分子就组建了突击队，在此前未曾遭受过攻击的巴伐利亚州城市大街上侮辱和伤害政治对手。³⁰该党的暴徒们还打断宗教会议、高喊反犹太口号，并在剧院上演以遭谋杀的库尔特·埃斯纳事迹改编的戏剧时攻击观众。³¹他们还骚扰慕尼黑旅馆中的协约国委员会代表，并闯入慕尼黑艺术厅的餐厅，辱骂在场者“生活糜烂”。³²冲锋队标榜其目标为“摧毁”所有允许犹太人发表讲话的政治会议。³³当局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有严重分歧。早在1921年2月，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就在给警察的一封急件中表达了对纵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坚决反对”³⁴，但警方认为，与社会主义者相比，纳粹冲锋队只是一个小程序，至少在1923年之前是这样。³⁵

历史学家通常将1921年8月21日视为纳粹冲锋队的正式创建日期。³⁶这一天，纳粹党报《民族观察家报》发表宣言，敦促“德国青年”加入新的“体育运动部”，准备必要的反犹太“恶战”。纳粹声称，这个“外族”将继续阻止德国人民认识由国耻和外国控制形成的痛苦现实。这一宣言包含了接下来数年间纳粹宣传中不断重申的一些成分。纳粹党这个新部分的目标是“团结年轻党员”，为该党提供“攻城锤”。至于意识形态作用，纳粹党的

野心是创建一个组织，保持德国人民的国防意识。很显然，冲锋队既是党的保卫力量、又是意识形态教育工具，这种自始至终令敌我双方都十分困惑的双重特性，在第一篇宣言中就已经根深蒂固。纳粹党宣言的华丽辞藻与这些部队非常低调的早期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未来的冲锋队直接视为精锐团队，号召他们塑造德国的命运：“未来需要你们的服务！”³⁷

这一公开宣言发表之前两周，1921年7月29日，希特勒和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埃尔哈特是战后德国极右派系的领导人物之一，刚刚在慕尼黑设立了总部。他委派前海军陆战队中尉尤利乌斯·汉斯·乌尔里希·克林奇组织纳粹党的“自卫”部队，后者时年22岁，是原“自由军团埃尔哈特旅”成员，来自下卢萨蒂亚吕伯瑙，是新教资深牧师约翰内斯·保罗·克林奇和妻子乔安娜·多罗特娅的长子。³⁸克林奇之前是卡普政变^①的积极参与者，1921年夏初迁移到慕尼黑。他抵达后几周，埃尔哈特交给他一项任务，“渗透”到竞争的极右组织中。纳粹自卫部队是克林奇在巴伐利亚首府的第一个目标。³⁹

参与希特勒与埃尔哈特之间交易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希特勒将进一步接近巴伐利亚军人与保守派政治领袖的圈子，他年轻的自卫部队将得益于克林奇等人的军事专业技能。另外，被朋友和拥护者昵称为“老板”的埃尔哈特希望通过希特勒获得公众的支持，并在纳粹党中建立一个由自己支配的新政党。⁴⁰和被对手称为“卐字旗下的大蜘蛛”、在20世

^① 卡普政变（全称卡普－吕特维兹政变），1920年3月，魏玛政府根据《凡尔赛条约》下令解散志愿民兵组织，引起国防军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兹和来自东普鲁士的国会议员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政变，政变迅速遭到失败。——编者注

纪20年代初处于民族主义组织中心地位的前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⁴¹一样，埃尔哈特也是极右势力中的关键人物，在全德国享有同一信念的年轻积极分子中，他有着神一般的声誉。他住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是出于政治原因，并借此发展了与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以及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紧密纽带。⁴²他利用由训练有素的军人转变而来的恐怖分子，将他们组成被称作“执政官组织”的秘密恐怖网络。最终，他不仅向早期的冲锋队提供后勤服务，还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支持。⁴³相反，希特勒当时只不过是一位有前途的、在地区内有知名度的政治演说家，仍然需要仰赖那些更容易接近武器和巴伐利亚上流社会的人。⁴⁴

因此，早期的冲锋队接受埃尔哈特的军事指挥（通过克林奇），据说只接受希特勒的“政治指挥”。⁴⁵此时，巴伐利亚首府的冲锋队员至少有241名男人和男孩，组成21个小组，根据当局掌握的成员名单，他们的年龄大多数在17—24岁。⁴⁶因此，选择23岁的克林奇作为指挥官似乎很符合逻辑。除了从军的经历之外，他是一个成年人——当时的法定年龄为21岁——而且体现了“年轻人领导年轻人”的要求，这正是德国青年运动的要素。⁴⁷但是，由于其涉嫌卷入一个月前德国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被谋杀一案⁴⁸，克林奇于1921年9月14日被拘捕，他的指挥中断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迪特里希·冯·雅戈可能代表他行使指挥权，直到1921年12月初克林奇获释返回岗位，他在这个位置上一一直留任到1923年3月，才被赫尔曼·戈林取代。⁴⁹从早期冲锋队领袖的名单上可以看出，冲锋队在那几年里保持着一致的特征：虽然大多数普通成员是没有实战经验的年轻人，但他们的领袖是从在一战德军担任领导职务的少数民族社会主义者中选出的。⁵⁰

妨害公共安全

早期的纳粹积极分子大部分来源于中下层和工人阶级，但贵族出身的前军队领导人很快占据了重要的地位。⁵¹从新闻简报和警察文件中找到的普通冲锋队队员姓名中，可以初步了解早期冲锋队的社会构成，特别是在没有更可靠统计数字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职业有面包师、锁匠和店主，但也有一些学生、一个农民、一名中尉、一名烟囱清扫工和至少两名警官。⁵²

这些年轻人不一定受过深刻的政治教育，但是他们经历了战后政治不稳定和全社会困苦时期，并从近距离感受了革命者和准军事部队的过度暴力。这些十几岁的男孩和年轻男人成长于战争年代，因德国的强大和文化上的优势而自豪，他们还没有像某些历史著作上所说的那样被“野蛮化”，⁵³但是他们确实缺乏战前的经历，无法用这种经历引导自己度过战后的动乱时期。

从任何标准看来，第一批冲锋队在最初一段时间都非常温和。他们没有与政敌交战或者在街上游行，小队长们都首先忙于组织自己的队伍，这些队伍通常不超过10个人。1921年8月26日，加入冲锋队的号召刚刚发出两周，指挥官们就注意到“缺乏纪律性”的现象，两个月后，他们强调“守时”应该是最重要的美德，也是加入“严密组织”的基本先决条件——这也就说明，在第一批冲锋队员中，为政治目标献身的思想存在波动。⁵⁴在1921年和1922年冲锋队于慕尼黑举行的“控制之夜”活动中，解密的警方报告清楚地表明，尽管希特勒常常参加这些会议，但在奉命执勤的冲锋队员中，只有一半人员到场的情况屡见不鲜。纳粹党的活动最初在一些旅馆

中进行，如靠近伊萨尔门、之前是纳粹党首个办公地点的施特内克勃劳酒店，或者距离市中心玛丽亚广场仅一箭之地的赫格勃劳酒店。据警察描述，这些会议的气氛“活跃”“幽默”“振奋人心”，人们演奏钢琴，载歌载舞，在四周蹦蹦跳跳。⁵⁵希特勒通常到得很晚，但是他的演讲“激励”了年轻的纳粹追随者。从警察报告中可以判断，即使是最乏味、最常规的冲锋队聚会，都会因希特勒的演讲转变为成功的夜晚，最后通常以响亮的喝彩声告终，然后，醉醺醺的年轻人们摇摇晃晃地回家。

希特勒的讲话最多持续两个半小时。有时候他会讲述自己一战期间在李斯特团的故事，但通常会转到“犹太人问题”和纳粹党未来的崛起。⁵⁶“我们要掀起对所有事、所有人的仇恨”，他在1922年4月6日的一次集会上高呼，引用了16世纪宗教革命的历史性范例。他认为，信仰是民族坚强意志的先决条件，也是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正如马丁·路德利用时代的热情推动宗教改革，民族社会主义者应该传播并利用当前的反犹太情绪。⁵⁷如果批评者谴责希特勒的党为“毫无顾忌、粗俗、野蛮的暴民”，他只会更高兴，他高声叫嚷：那种苛责只会有利于他的党，使其更令人生畏、更广为人知。⁵⁸

我们如何解释，成百上千的慕尼黑工人、学生和推销员会受到这种政治煽动的鼓舞？由于旧秩序没有任何稳定、合适的替代品，简单的答案在战后的巴伐利亚越来越受欢迎。早在1919年，慕尼黑的一份煽动性传单上就曾经声称：“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含义就是由犹太人组织和领导的罪恶暴政。”⁵⁹这些宣言为接下来的几年定了基调，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战争年代出现的反犹主义思想风行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将“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定义为叛国者，将各种缺陷和经济政治问题都归罪于所谓的“犹太-马

克思主义阴谋集团”的影响。⁶⁰尽管纳粹的仇恨宣传令许多信徒甚至右翼极端分子都感到厌恶，但其基本原理得到了广泛的接受。20世纪20年代的巴伐利亚舆论相当程度上建立在清晰的敌我之分上（巴伐利亚对德国、爱国的德国基督徒对以国际为导向的犹太人及布尔什维克）。不管纳粹冲锋队做什么，他们往往都从一个事实中获益：巴伐利亚的许多德国人将他们归入爱国者的范畴，因而认为他们的动机值得尊敬。⁶¹法律专家和广大民众一度认为，青少年犯罪活动比例高企是文化变革和社会退步的可怕信号⁶²，年轻纳粹分子的激进政治思想虽然有些过度，但可以看成是更美好未来的模糊承诺，只有坚定无畏的政治斗士才能实现它。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以及有影响的中上阶层将冲锋队的激进思想和暴力活动仅仅视为防御性行动，是对所谓“11月罪行”的合理反应，以及社会混乱的结果。相当一部分德国民众对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掌权的解释也与此类似。保守的《巴伐利亚州报》评论道：“总的来说，法西斯分子从战后时期大部分民众的失望中汲取力量，因为后者没有得到承诺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他们还得益于民族主义与民族意识、国际压制与命运共同体的对立。”⁶³

纳粹冲锋队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发生在1921年11月4日，希特勒当时在慕尼黑黑皇家啤酒馆一次纳粹党集会上讲话。当晚，在一场持续20分钟的争斗中，46名冲锋队员可能将“近400名犹太-马克思主义暗杀小组人员”（希特勒的说法是“犹太-马克思主义战士”）赶出了大厅。在后来的报道中，这一数字被夸大为“800名马克思主义者”。⁶⁴这些数字当然高估了，但是这一故事成为了第二个有力的“创始神话”，为冲锋队接下来数年里的自吹自擂定下了基调：纳粹报纸和书籍一次又一次绘声绘色地叙述着，勇敢的冲锋队成功挫败了远强于自身的对手，证明了该党思想的优越性，这种思想能

够使他们的积极分子表现出超人的力量和不凡的勇气，反过来也就证明了它的合法性。⁶⁵

纳粹将冲锋队奉为带领德国摆脱犹太人“证券交易所恐怖”的解放运动先锋，但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不过是“心态幼稚的粗暴之徒”。⁶⁶政治上的左派很早就认定纳粹是即将到来的政治威胁，尤其是在发现巴伐利亚警察、魏玛国防军和冲锋队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后。人们很快就知道，魏玛国防军向冲锋队提供使用武器的特权，警察和检察官经常对这些好斗分子的罪行表示同情。⁶⁷然而，将早期的冲锋队看成装备齐整、纪律严明、强干有力的组织，是具有误导性的。冲锋队拥有武器，但基本上是街头武器：警棍（昵称“橡胶”）、铜指环、刀子、棍子和鞭子。有些队员拥有轻武器（称作“打火机”），然而很少使用。⁶⁸慕尼黑有流言称，纳粹分子至少在某个场合下向冲锋队员分发手榴弹，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成疑。⁶⁹在任何情况下，早期冲锋队发动的真正战斗很少——如果确实发生了这种事件，通常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啤酒馆冲突的特性，造成的破坏不过是横飞的啤酒杯和打断的桌腿。在巴伐利亚的许多“爱国主义组织”中，冲锋队那些相对年轻、缺乏经验的男孩只是局部的麻烦制造者，而不是重要的政治因素——至少在1923年春季之前是如此。

而且，第一批冲锋队也没有给大众留下具有一致特性或者决心的印象。他们甚至缺乏合适的制服，褐衫1924年才推出，1926年底才成为强制要求。⁷⁰起初，冲锋队员穿着便服参加会议，只以“卐”字臂章作为标志。1922年11月，纳粹党推出该组织的第一种制服，包括灰色马裤、带有红色臂章的风衣以及滑雪帽。⁷¹同年的7月或者8月，该党组织了一个“冲锋队自行车部队”⁷²，这是走向十年后冲锋队复杂组织子网络的第一步；其中汽车

冲锋队（Motor-SA，1934年转入NSKK——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军团）、海上冲锋队（Marine-SA）、骑兵冲锋队（Reiter-SA）以及先锋（Pioneer-SA）和信使冲锋队（Messenger-SA）最为重要。⁷³不过，这些下属单位早期只存在于纸面上。到1923年夏季，纳粹党只拥有两辆摩托车和两辆适合于运输人员的卡车，而且他们的驾驶员（其中包括埃米尔·莫里斯）常常无法来报到。⁷⁴

关于冲锋队自行车队在巴伐利亚首府以南五十多英里的温泉小镇巴特特尔茨活动的一份警察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冲锋队早期活动的特性。1922年8月15日（星期日）正午前后，18名二十多岁的纳粹党员在克林奇率领下抵达巴特特尔茨。自行车手们停在市中心朱姆·奥斯瓦尔德勃劳饭店，在这家旅馆门前立起一面上有硕大“卐”字的红旗，象征性地占领了它。这一挑衅行为导致当地治安官被召到现场。他预料到将会发生暴力行为，于是警告冲锋队员们不得骚扰任何人，但没有进行其他干预。下午1时许，可能是因为喝了一些啤酒，这个冲锋队自行车小队在纳粹旗帜后面排成队列，一边高唱“民族歌曲”，一边在街上游行。他们穿过伊萨尔河，来到靠近温泉公园、更高级别的公园旅馆。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巴特特尔茨少有的犹太居民之一尤利乌斯·黑尔曼，他是中上层犹太人中受欢迎的人物，纳粹也深知这一点。经过酒店前时，年轻人们高唱臭名昭著的埃尔哈特之歌，这首歌最后重复着“赶走犹太人！”的歌词。不出所料，犹太旅馆的一些客人出来与骚扰者对抗，称他们为“无赖”，并用当时流行的手杖击打他们。此时，当地警察介入，让大多数纳粹分子表明自己的身份。领头的克林奇要求那些暴力对抗冲锋队员的宾客也必须亮明身份，但根据警察的说法，由于旅馆宾客和主人都拒绝出卖自己的同胞，这一企图失败了。最

终，当地警察将纳粹分子送回家，把这一事件的相关卷宗移交给慕尼黑的同事。攻击者是否因为自己的行动得到惩罚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们并不害怕惩罚。克林奇甚至在受到盘问时威胁警察：“我们会回来的，你将看到，一切都会改变。我们是警察局的常客，不害怕它的惩罚。那不会改变我们，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狂热。”⁷⁵

据克林奇说，1922年夏季，冲锋队自行车小队几乎在每个周日和公共假期都前往慕尼黑附近的不同地点。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巴特特尔茨事件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且不只体现在所表达的反犹太情绪上。⁷⁶冲锋队在巴特特尔茨的所作所为还包含了社会学研究称为“表达性暴力行为”的多种特性，这种暴力行为的定义就是“为暴力而暴力”。当然，这种场合并非完全不存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思想，但它主要是挑起暴力对抗的手段。冲锋队的短途旅行始于几个小时的锻炼（例如骑自行车），接着是象征性占领城市中的某个核心公共场所（旅馆），在那里上演男性社交的仪式，高潮则是成功地激怒旅馆中富有的犹太宾客。这种旅行给男青年们带来了关键的好处：增强对身体及其力量的体会，通过展示力量感受男子气概的机会，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享受集体的“乐趣”。⁷⁷

尽管这种流氓行为在法律上是对公共秩序的妨害，但巴伐利亚警察没有改变他们的看法——冲锋队的行为与其他爱国团体没有差别。1922年8月，警察没收了纳粹为庆祝冲锋队在慕尼黑存在一周年而公开展示的大幅反犹太海报——海报上包含了措辞强烈的反犹太口号，犹太组织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种族迫害召集令”⁷⁸——但他们通常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描述为“远足”，只是以聚餐和体育活动延续着战前的德国青少年运动。如果当局承认纳粹党的活动存在某种“军事元素”，官方文件就会强调，所

涉单位“始终没有武装”。⁷⁹即使巴伐利亚警察蓄意淡化冲锋队对公共秩序的威胁，也无法否认，纳粹激进分子的“战斗价值”确实有限。20世纪20年代，恩斯特·罗姆是魏玛国防军和多个极右翼准军事联盟之间具有影响力的中间人，他在1928年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到早期的冲锋队：“毫无疑问，这几百名队员训练有素，他们在任务中倾注热情和意志，忠诚于希特勒本人。他们的训练当然很困难，也无法体现出全面的军事价值。在战斗中，他们不能与经过训练的部队相提并论。”⁸⁰

关键的1923年

尽管军事力量有限，在公众面前出现也往往是临时的决定，但冲锋队——以及少数高调的公众演说家（如希特勒或者在巴伐利亚广受关注的《民族观察家报》记者赫尔曼·埃塞尔）——逐渐成为公众眼中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尤其是在纳粹党未能在德国国会或者任何地区议会获得席位的情况下。⁸¹在这个阶段，纳粹党没有参加选举是因为希特勒认为，虽然成为议会内部“有原则的反对派”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他承认纳粹缺乏强有力的媒体，因此声称不能期望该党接触到更广泛的选民，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竞选活动。而且，希特勒公开承认，他的党只有少数几名合格的公众演说家，大部分骨干只能制造“空谈和幻梦”。⁸²在这一背景下，对于该党的反犹太宣传，部署冲锋队员是更可靠的选择，特别是因为在这种局势下，有秩序的行为和强大的体力比语言天赋更为重要。

1922年底到1923年11月之间，魏玛共和国经历了1919年在动荡中成立之后的第二个“危机年”，纳粹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地参与同政治对手的冲

突，慢慢地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与此同时，这些事件也巩固了纳粹在民族主义阵营的声誉，它被看成一个由特别坚定的年轻人构成的组织。墨索里尼率领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于1922年10月“进军罗马”，夺取政权，进一步鼓励民族社会主义者公开活动。⁸³由于早期的冲锋队仍然只是一个传统的“自卫联盟”而非党指挥的军队，以推翻德国政府为终极目标、在巴伐利亚发动一场准军事政变的计划不仅受到冲锋队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也受到了进入其“百人队”的年轻人的欢迎。因此，1923年11月之前该组织在巴伐利亚的活动特征是街头暴力，这不仅证明了早期冲锋队的高度攻击性，还证明了纳粹党所采用的策略：逐步破坏公共秩序的稳定，终极目标是造成一种局面，使极端民族主义者夺取政权的企图为公众所接受，被视为对祖国的拯救。

当时的剪报可以证明，在巴伐利亚和邻近的奥地利（奥地利冲锋队是汉斯·莱希纳于1922年创立的），冲锋队的暴力行动与日俱增。1922年6月19日，维也纳发生了“大规模斗殴”，在希特勒的一次演讲之后，纳粹冲锋队与多达400名共产党人冲突，多人受伤，15名参与者被拘捕。⁸⁴此次事件中冲锋队至少受到了共产党质问者的挑衅，而后来的事件清楚地说明，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积极地为暴力活动打下基础。1922年8月29日，慕尼黑店主戴维·海斯和19岁的儿子路德维希在打算清除商店窗户上的反犹太宣传册时遭到袭击，被一群在附近等待受害者出现的冲锋队员痛打。虽然当地警察逮捕了在场的多名冲锋队员，但其中只有一人被起诉，量刑也很轻，仅入狱一周。⁸⁵ 1922年9月，在一场当局禁止的大规模聚会之后，慕尼黑街头第一次回荡着“打倒犹太人！”的喊声。⁸⁶几周后，1922年10月14日和15日，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巴伐利亚州北部科堡县的法兰克尼亚市举行了“德

国日”民族主义活动。到场的大约500名冲锋队员中，大部分是从慕尼黑乘坐火车前来。到达后，他们立刻多次在街头和啤酒馆与政治对手冲突。不过，他们在享有盛誉的新教爱伦堡宫教堂参加祈祷，这一象征性姿态深受科堡中产阶级的欢迎。⁸⁷与将冲锋队员描述成虔诚献身的民族战士的媒体不同，同情政治左派的报纸报道了“赤裸裸的街头恐怖”和科堡“最为野蛮的暴政”。同时代的人都很清楚，这些街头暴力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了预先的安排，因为许多纳粹攻击都是随着一阵口哨声开始的，几秒钟以后，冲锋队员就开始袭击对手和普通路人，这往往出乎后者的意料。⁸⁸

从科堡归来仅仅几天，30—40名纳粹激进分子袭击了巴伐利亚首府德国剧场的咖啡厅，据说是在一名犹太客人抵达之后。他们投掷啤酒瓶，至少砸毁了10扇窗户，但是也遇到抵抗，咖啡厅的客人们奋起反击，至少打伤了一名攻击者。⁸⁹1922年12月21日，10名手持橡皮警棍的冲锋队员进入慕尼黑克伦泽大街一家犹太人经营的公共食堂，质问女服务员“你是不是犹太女人？”，企图偷走犹太全国基金会的募捐箱，并反复喊叫：“犹太吃货们什么时候到？”警察抵达时，这些麻烦制造者早已离开。⁹⁰在这几周和几个月中，冲锋队在商店、咖啡厅前面以及餐厅内屡屡挑衅，试图激起言语上的抗议，然后实施身体暴力，这成为了巴伐利亚公共生活中不受欢迎的“常规”事件。⁹¹

反犹太暴力活动的增加伴随着冲锋队的进一步扩张，1923年春季，冲锋队在巴伐利亚“爱国主义联盟联合部队”中获得了领导地位。仅在首府慕尼黑，这些部队就有大约3万人之众。此时冲锋队内部领导的变更表明，该组织正在从好斗但能力有限的“自卫部队”网络转变为小规模准军事部队，是真正能够得到相当数量武器、以干预巴伐利亚州政治为目标的“自

卫联盟”。结果是，1923年3月，赫尔曼·戈林取代克林奇，成为冲锋队的领袖。后者越来越难以阻止数量快速增加的冲锋队员，但是这一领导变更的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和埃尔哈特之间逐渐疏远。从此之后，克林奇成为戈林的参谋长，不过两个月之后就辞职了。⁹²到这个时候，巴伐利亚首府的冲锋队包括3个分部，每个分部有300人，组织成3个“百人队”，下面再分为4个突击队（人数最多为25人）。⁹³预备役上尉威廉·布鲁克纳（20世纪30年代被提升为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希特勒的首席副官）从1923年初开始管辖慕尼黑的3个突击队，它们分别由卡尔·贝格尔、鲁道夫·赫斯和约瑟夫·贝希托尔德指挥，贝希托尔德很快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阿道夫·希特勒护卫队”的指挥官，这支部队是后来的党卫队的核心。⁹⁴此时，整个巴伐利亚州的冲锋队员数量已经达到约3000人，组成了40个“百人队”。大约三分之二的百人队驻扎在慕尼黑城内或者周围，这不仅是因为冲锋队招募数量越来越多，还因为有些部队（如“罗斯巴赫工作组”和某些“前线士兵团体”）全体转投纳粹党。除了这些冲锋队核心部队之外，1923年初，邻近的符腾堡和图林根州，以及萨克森州、鲁尔地区、汉堡市、汉诺威市和哥廷根市也有冲锋队存在。奥地利还有数千名冲锋队员，准备在需要的时候越境支援。⁹⁵

公开集会、招募新党员以及宣传活动并不总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这从1922年12月11日发生在符腾堡州格平根镇的所谓“鲸窖之战”中可以看出。当地的纳粹党分部规模很小，他们计划以“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未来”为口号召开一次公开集会，但是地方当局立刻援引纳粹前几天在附近斯图加特和盖斯林根实施的暴力事件，禁止这次集会。尽管如此，12月11日晚上，60—90名武装冲锋队员从慕尼黑乘坐火车抵达格平根，随同前

往的有臭名昭著的“皮亚护士”（埃莱奥诺雷·鲍尔）^①和行动指挥官、退役中尉和奥伯兰自由军团战士恩斯特·冯·威斯滕哈根。⁹⁶希特勒亲自指示他的慕尼黑追随者，不惜一切代价召开这次会议。然而，从他们抵达时起，就遭到了当地工人的强烈抵制。纳粹分子在小镇街头高唱“爱国主义”歌曲，数百名工人以“工人的马赛曲”应和，谴责他们的对手是“谋杀拉特瑙的罪犯”——指的是1922年6月24日右翼恐怖分子刺杀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的事件。在某一时刻，对抗升级了。双方开了数十枪，各有四五人受伤。当地警察最终设法将慕尼黑冲锋队员押回火车站，他们从那里离开。深夜，愤怒的格平根工人袭击了从蒂宾根前来参加纳粹集会的学生，造成20人重伤。⁹⁷

虽然纳粹宣传中将这次相当不成功的“远足”称作党史上的一段传奇，巴伐利亚仍然是冲锋队的主要活动场所。因此，1923年5月1日——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节日上，民族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破坏公共秩序，以便证明建立一个独裁军政府是自卫的需要。冲锋队出动了“爱国主义联盟”人员（总数2000—2500人）中的将近半数，决心以拯救巴伐利亚免遭共产党人政变之害为名，扰乱社会主义者的节日游行。⁹⁸大部分冲锋队员是慕尼黑当地人，但有一些来自附近的兰茨胡特、弗赖辛和巴特特尔茨，他们收到了冲锋队指挥部一封几乎没有伪装的电报，奉命参加行动：“立刻寄出所有帽子！”⁹⁹慕尼黑警察5月3日在一份政府通稿中的报告与其

^① 埃莱奥诺雷·鲍尔（1885—1981），唯一参加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的女性，纳粹政权宣传中理想的纳粹妇女。——编者注

公开声明形成鲜明对照，没有再强调这些部队对德国青少年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也不再强调其预防共产党人暴动的作用，而是指称这些部队的领导人物明显正在将其手下驱赶到“极右翼民族主义”阵营。¹⁰⁰现在，冲锋队已经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巴伐利亚警察局长承认“多年以来，警察与这些组织紧密合作，以防止政治左派的暴乱”。而且，这些组织越来越多地携带武器，包括火炮和迫击炮，其中一部分是从附近魏玛国防军兵营中同情他们的士兵那里得到的。¹⁰¹尽管这种合作有明显的风险，但警察局长仍然相信，任何对抗极右翼联盟以保证公共秩序的尝试都不可能成功，这间接承认了一个事实，当局前几年对极右翼分子的容忍以及和他们的秘密合作已经失败。这些举措并没有加强政治稳定，反而削弱了它。¹⁰²

社会民主党报纸《慕尼黑邮报》与警察的观点截然相反，称1923年5月1日的事件表明，纳粹冲锋队的真正特性是“纯军事战斗部队”。根据这家消息灵通的报纸所言，“冲锋队官员”已经表达了坚定的战斗精神，反复宣称在与左翼派系发生大规模冲突时，魏玛国防军将站在他们一边。《慕尼黑邮报》还提供了冲锋队武器的详细图解：

每名突击队队员都有一支现代化军用步枪、一个子弹袋和一条编织腰带。手榴弹分队拥有整箱的杀人武器；每人的腰带上插着三枚手榴弹，而且还配备一支勃朗宁手枪……树丛后面驻扎着一个120毫米野战炮连，炮口对着特勒辛费尔德工人的方向……担任军事指挥的戈林上尉大摇大摆地展示他的勋章。¹⁰³

慕尼黑魏玛国防军指挥官奥托·冯·洛索明显同情纳粹党，¹⁰⁴他后来否

认国防军向冲锋队提供了加农炮，但确认发放了轻武器。不过，他坚称爱国主义联盟在5月1日下午返还了所有武器，并且抱怨道，媒体对这一话题的报道耸人听闻，只会帮助法国当局找出隐藏的武器库。¹⁰⁵

5月1日集中在机场阅兵场的普通冲锋队员中有许多青少年。有流言称，连慕尼黑的高中学生都参与了这次行动，如果人们注意到从1919年革命起，大学和高中生频繁加入正规军，充当“临时志愿者”¹⁰⁶，对此现象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打内战比在学校里从书本上学习更加有趣，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这一发展证明了越来越流行的一个观点：政治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很重要，还需要每个人的全身心投入。这种观点绝不仅限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学生先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澄清了这种实用主义逻辑：“拳头是许多事物的综合体……由于它以短暂干脆的方式直接触及对手的身体，因此不能忽视。”¹⁰⁷一本德国拳击杂志在1923年同样为这种特殊态度杜撰出朗朗上口的格言：“思想保护不了自己，你必须抓起拳击手套。”¹⁰⁸

现实中，大部分冲锋队员似乎更依赖武器而非拳头，他们通常攻击较大群体中的单个对手。来自巴伐利亚人民党（BVP）的保守派人士、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弗朗茨·施魏尔对纳粹持批判态度，他在1923年6月8日的州议会上说道，民族社会主义者为人熟知的策略就是，派出两三名身着制服的人员经过慕尼黑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后面尾随着五六十名便装的同伙，向政治左派挑衅，激怒对方发动进攻。如果少数身着制服的冲锋队员遭到袭击，他们的同伙就会“报复”。这位部长宣称，参与这种活动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不成熟的年轻人”，他向公众保证，警察已经采取有效措施，打击首府年轻人中日益增多的暴力行为。¹⁰⁹

施魏尔的评论与社会学家兰道尔·柯林斯的新发现一致，后者关于暴力行为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可，在他的理论中强调，即便是我们认为特别暴力的人——早期冲锋队员就是例子——也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做出暴力反应，这些情况能够产生特殊的“情绪动力”。¹¹⁰冲锋队领袖的任务就是创造这种条件，这对单个冲锋队员与政治运动的纽带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他们又要避免真正的暴力活动升级。在这种背景下，施魏尔乐观地声称这支部队不成熟，只是表面上正确。他强调，只要武装部队忠诚于政府，冲锋队的小伙子们不会对国家造成任何实质性威胁，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领会警察的双重作用：既是国家的一个工具；又是保证一个隔离空间，让高度仪式化的冲锋队暴力行为以可控方式反复发生的力量。

正如上文所述，冲锋队在巴特特尔茨实施的暴力行为说明了警察的这种双重特性：虽然治安官的报告强调，他的行为避免了这场政治暴力升级为严重的身体对抗，但是却罔顾一个事实：占据公共空间，使民族社会主义者有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宣传（开始在旅馆，然后在街头），更遑论以很低的风险利用与警察象征性对抗产生的“兴奋”，对具有暴力倾向的年轻冲锋队队员们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从其他一些例子甚至可以看出警察的直接共谋行为：1921年10月19日晚上，数十名冲锋队队员自发决定游行到慕尼黑主火车站，决心“打击路上遇见的每一个犹太人”。尽管警察在场，他们仍然至少在车站大厅里殴打了一名男子，直到一名巡警将这位早期纳粹暴力受害者护送到袭击者的打击范围之外。冲锋队员们继续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威胁公众，高唱反犹太歌曲，例如以著名的《博尔库姆之歌》改编的如下歌曲：“扁平足、鹰钩鼻和卷头发的犹太佬，本不应享受德意志的生活：把他们扔出去！把他们扔出去！”¹¹¹然而，前述格平根事件则

揭示了纳粹策略的局限性。纳粹党实际上需要警察的保护，其挑衅才能获得成功，否则公开的暴力行动爆发之后，结果将难以预料。

1923年5月，民族社会主义者推翻政府的动员一无所获，此后纳粹党及冲锋队的声望遭到了一定损失，不管是在较广泛的巴伐利亚民族主义阵营，还是在普通党员中都是如此。愤怒的冲锋队员们要求清除冲锋队军事领导层中不够格的人员，哀叹武器上的损失，抱怨纳粹党总部是“妇女之家”，敦促实施适当的档案管理。¹¹²正如秘密线人向巴伐利亚当局报告的那样，纳粹党和冲锋队在1923年夏初还经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一部分原因是希特勒与埃尔哈特分道扬镳，另一个原因是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在纳粹党活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此时的冲锋队领导人更愿意接受以外币支付的薪水。据首批纳粹历史学家之一康拉德·海登说，官员们每个月能得到80—90瑞士法郎的可观收入。¹¹³直到希特勒周游整个德国，得到前海军中尉、纳粹党员赫尔穆特·冯·米克捐赠的500美元（在这一高通胀时期，相当于大约4亿“纸马克”），该党和冲锋队的经济危机才暂时结束。¹¹⁴

正是这种政治与军事领域半地下合作的气候，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造就了一些最为引人注目的职业生涯。恩斯特·罗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此前曾是巴伐利亚军队中的一名职业军人，于1919年的动乱时期首次参加了“埃普自由军团”，从5月起负责组织慕尼黑的保安部队。在这一任期中，他帮助“清理”了警察中的自由主义和左倾官员，从而实现了包括冲锋队在内的准军事联盟、魏玛国防军及警察之间的友好关系。¹¹⁵直到人生的最后关头，罗姆的信念和思想不仅是由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还深受一战军官经历的影响。同时代的康拉德·海登将其描述为“充满激情的政客，但却不理解政治”。¹¹⁶



常常被夸大的“战时经历”背景，成为了大相径庭的个人的共同特质，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德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都较为普遍。例如，传记作家奈杰尔·琼斯对罗姆同时代的英国法西斯主义领袖、花花公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合于罗姆——尽管两人在民族、社会和教育上有着根本的差别。两人都有着“对民主制度和平民生活的蔑视；对混乱和拖延缺乏耐心；几乎不计代价地渴望行动和效率；享受暴力和军队生活”。¹¹⁷与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其他极右翼领导人物（如匈牙利的米克洛什·霍尔蒂或者魅力不凡的罗马尼亚军团运动领袖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类似，罗姆和许多早期冲锋队领袖的理想和意图是创造一个军事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对领袖毫无保留地忠诚、为民族献身是最高尚的美德。历史学家通常将罗姆描绘为“军事暴徒”，但除了是一位失去根基的职业军人之外，他还是一名巴伐利亚民族主义者，对维特尔斯巴赫王朝^①有着深深的怀旧情绪。¹¹⁸

关于罗姆的文献很多，特别是埃莉诺·汉考克于2008年出版的详细传记，但他对1923年啤酒馆暴动之前的纳粹冲锋队有何影响仍然很难评估。毫无疑问，他在1919—1923年的巴伐利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与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极端组织交好的关键人物，这些组织也日益成为巴伐利亚州反马克思主义联合力量的非正式成员。然而，汉考克关于罗姆是“纳粹党守护神”，“在1923年5月1日之前纳粹党所有重要事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①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建立的王朝，1180—1918年统治巴伐利亚，该家族中还出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德意志国王。——编者注



恩斯特·罗姆的这张照片描绘了他的不同世界。它拍摄于1928年至1930年间，地点是他的玻利维亚临时居所。罗姆穿着玻利维亚军队的全套制服，但也佩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在他身后，人们可以看到玻利维亚的旗帜，以及上面的德意志帝国战旗。左边桌子上镜框里可能是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肖像。

观点似乎有些夸大其词。¹¹⁹在这本“二次文献”中，大部分关于罗姆的信息取自他1928年发表的自传，书名充满了自信——《叛国者的历史》。¹²⁰自传的作者不久后离开德国到玻利维亚任军事顾问，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20年代末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进入冲锋队的领导层，但是他对以调查记者的身份登上舞台也毫无兴趣。在自传出版之前的岁月中，罗姆的活动通常远离公众视线，只是偶尔出现在当局的文件和报纸专栏中。他更多的是一名权力掮客，而不是耀眼的政治化军人，他关注的是利用已经证明的组织才能和与魏玛国防军及“自由军团”的良好关系，向右翼准军事武装提供武器（并帮助其躲避德国政府和盟国的注意）。

到1923年，罗姆已经成为了巴伐利亚政治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有时因为其采购和藏匿武器的能力而被称为“巴伐利亚机枪之王”¹²¹。作为自封的“爱国主义联盟之父”，他在11月政变之前的几个月里确实是反革命右派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家。¹²²其他相关著作已经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和越来越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是这些发展的最大推动力。¹²³正如之前的分析，冲锋队早在1923年4月就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但是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不足以直接影响接下来几个月的政治变化进程。当希特勒最终决定发动政变时，激励他的是德国对法国占领鲁尔区的抵制瓦解所产生的公愤，以及巴伐利亚准独裁者古斯塔夫·冯·卡尔类似计划的发展——卡尔威胁要绕过他。¹²⁴希特勒此时在两个方面需要仰仗冲锋队。首先，冲锋队应该作为他的“近卫军”实施他的命令，对政敌发动身体攻击。其次，他们将在慕尼黑街头象征性地展示新领袖的威权，就像1919年5月“自由军团”所起的作用那样。冲锋队在第一项任务上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希特勒逮捕巴伐利亚政府领导人时，但

是，他们无法保证在州保安部队中的领导地位。11月9日早上，巴伐利亚警察和慕尼黑的魏玛国防军部队明显都没有参与政变。当纳粹党激进分子孤注一掷地企图挽救他们的“革命”，在慕尼黑街头对抗装备和训练都要强得多的政府军时，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在统帅堂前短暂交火之后，14名“叛乱分子”倒毙，其中包括一名来自附近咖啡屋的侍者，4名警察丧生。¹²⁵希特勒肩上受伤后逃脱，但是几天之后在密友、商人恩斯特·“普奇”·汉夫施滕格尔的乌芬别墅里被捕，以叛国罪起诉，被判从1924年1月起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两年。¹²⁶

纳粹分子后来对1923年11月9日被射杀以及接下来数日因伤死去“殉道者”的崇拜，比冲锋队参与“11月政变”叛乱活动的事实更为重要。¹²⁷纳粹每年都在慕尼黑中央公园举行仪式，缅怀这16名亡者，1930年之后，又补充了偶像化的霍斯特·韦塞尔，他是一名有魅力的柏林冲锋队首领，被一个共产党小组所杀，对他的崇拜成为了一个更加难忘的象征。¹²⁸从1926年5月在魏玛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开始，希特勒都要和追随者一起，面向纳粹党的新纪念物（1923年冲锋队携带经过统帅堂的“血旗”）宣誓。这一失败的象征此时成为了光辉的旗帜。在信徒的眼中，冲锋队于1923年和接下来数年许多其他场合的“神圣牺牲”，证明了他们对民族领导地位和社会参与的要求是合理的。¹²⁹

政变余波

德国当局于1923年11月23日取缔纳粹党和参与11月政变的其他组织，冲锋队因此正式解散。许多队员暂时与处于静止状态的“运动”失去联系，

不过纳粹党的领导人物从未考虑过让前几年建立起来的组织消亡。还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希特勒就于1924年4月“委托”罗姆“重建”冲锋队，后者曾在自传中提及此事。罗姆同样坚称，他与流亡因斯布鲁克的戈林以及前“自由军团”领导人格哈德·罗斯巴赫举行了秘密会谈，后者曾参与11月政变，此时在萨尔兹堡躲避德国当局的追捕。因此，据说戈林“任命”罗姆（和戈林不同，他在德国的土地上可以更自由地行动）为自己的副手，对冲锋队有“无限的权威”。¹³⁰

1924年5月17日和18日，关于被取缔冲锋队命运的首次会议于萨尔兹堡举行，在罗姆的帮助下，与会的有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但明显没有戈林，1923年11月9日所受的枪伤使他无法回到冲锋队的领导岗位上。罗姆后来回忆，这次会议表现出了“许多不团结、不和谐、分歧和不确定性”。¹³¹不过，他可能是有意地描绘这种情况，以便更好地炫耀自己后来所做的组织工作，接下来几个月——直到罗姆和希特勒在1925年4月第一次断绝关系——冲锋队的复兴进展不大，它慢慢地从1923年11月的打击中恢复。阻止冲锋队复兴（至少回复到之前的形式）的一个事实显而易见：巴伐利亚民族主义煽动者和领袖希特勒不在场，最初是因为被囚于兰茨贝格，1924年圣诞节之前获释之后，他又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讲。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21年，希特勒已经成为了最具魅力的巴伐利亚极右翼领导人之一，他的影响力可能还没有波及慕尼黑之外的大众，但是他在巴伐利亚首府定期举行的啤酒馆演说是冲锋队凝聚力的来源之一。

罗姆无法步希特勒的后尘，那也不太可能是他向往的做法。相反，他坚持自己更有经验的一套：建立新的联合组织“前线联盟”，统一爱国主义联盟的参与势力，包括遭到取缔的冲锋队。¹³²与11月政变之前的冲锋队不

同，前线联盟在全国范围内的行动取得了部分成功。事实证明，对于向往新组织的人们来说，该联盟最初的名称“民族主义阵线联盟”有着更为广泛的吸引力，这与巴伐利亚州政府资助的“紧急联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是一个短命的组织，企图团结和控制温和的自卫联盟，成为特殊的警察预备队。¹³³虽然前线联盟最终失败，但它首次联合了德国北部和南部的极右翼政治激进分子，从而成为建立全国范围民族社会主义关系网的重要阶段。这个新组织的正式成员最多时达到3万人，按照罗姆1924年夏季对巴伐利亚当局的解释，其目的是“通过体育锻炼和养成服从的习惯，帮助年轻人为加入军队做好准备”。¹³⁴由于前一年和这些组织打交道的经历，当局疑虑重重，不愿意正式承认这个新组织——尽管罗姆已于1924年5月4日代表“民族社会主义自由党”当选德国国会议员。即使仍在德国享有盛誉的鲁登道夫强力支持，都没办法帮助他。¹³⁵但是，罗姆碰到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巴伐利亚政府的怀疑，而是希特勒并不认可他野心勃勃的新组织。1924年5月—8月，两人在兰茨贝格监狱多次会面，但是无法就联合策略达成一致。

尽管希特勒持续反对，但罗姆认为，一旦前线联盟能够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手中的强大组织，就可以争取到希特勒的支持。因此，他在1925年初之前仍然继续着自己的计划。不过，两人之间的异议一直延续，因为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有着各自不同的主张：罗姆的计划本质上是团结极右翼准军事力量的更完善方法，终极目标是通过暴力手段推翻魏玛共和国；而希特勒的结论是，这类联盟组织都难以保持一致，因为其中每个集团通常都坚持其自主权。1923年11月政变失败后，维京联盟、巴伐利亚与德国联盟以及布吕歇尔联盟等相互竞争的组织都试图引诱冲锋队员加入，因此希特勒对这些组织缺乏信任。¹³⁶而且，他已经从失败的政变中吸取了教训：只要魏玛

国防军和警察仍然忠诚于合法政府，不管他们的成员中有多少人对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目标公开表达同情，准军事政变都不太可能取得成功。¹³⁷

希特勒1924年12月20日因政治犯大赦从兰茨贝格监狱获释之后，他放弃了通过对国家发动暴力夺取权力的短期行为，而宣布将严格地遵循合法途径。观察家们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方法纯粹是策略性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于1925年2月26日公开呼吁重建纳粹党和冲锋队之后。¹³⁸此时，他声称新的冲锋队不再携带武器，而且应该严格遵循法律条文，充当纳粹党的宣传工具，成为年轻党员的训练学校。¹³⁹冲锋队成员应该在公众场合穿着制服，以便让街上的每个人认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支“突击队”决不能沦落为一个自卫组织或者秘密帮会，特别是因为“真正的战士不是靠每周一两个小时的训练造就的”。¹⁴⁰他的决定还有战略上的原因：除非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否则就不可能实施大规模的志愿军事训练计划。¹⁴¹希特勒也许认为，相互竞争的准军事组织领导人使他不可能得到“绝对指挥权”。

最初，希特勒为重建的冲锋队构想的新任务和特性，令民族社会主义者自身也难以理解。对于许多追随者来说，当他们的政治对手以类似的指导方针进行组织时，放弃武力打击是违反常规的。1924年初，与社会民主党紧密相关的“帝国战旗”组织在马格德堡建立，几个月以后，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联盟”建立。¹⁴²希特勒最终放弃了对所有追随者的说服工作，1926年9月28日，他直接禁止“所有民族社会主义报刊”报道冲锋队存在的理由及其任务、基本原则和组织结构。¹⁴³这是相当绝望的做法，是暂时受挫的迹象，而不是保持民族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解释权的巧妙策略。无论如何，希特勒的命令基本无人理会——特别是政治右派的报纸和杂志越来

越忙于为冲锋队辩解，反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手们的调查性报道。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般公众对冲锋队的看法主要是，该组织是德国战后动荡岁月的残余，而不是一个足以挑战公共秩序的强力组织。不过，与这一观点相反的是，1926年10月，被任命为冲锋队最高领袖的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赞颂该组织为民族社会主义的骨干，当时，冲锋队仍然是民族社会主义民兵的不完善网络，在全德国的成员不到4万人。尽管法西斯领导人夸大其词地强调其“运动”的历史使命，直接或者间接地自称是某种“宗教十字军”是常见的现象¹⁴⁴，但普费弗对冲锋队未来角色的预测仍然值得全文引用，因为这些文字为许多冲锋队未来的自我认识定下了基调：

只有具有巨大内部力量的（政治）运动能够创立像我们冲锋队这样的组织。毫无疑问，冲锋队首先使我们不同于国会中的普通政党。冲锋队将在议会体制及其“手段”瓦解的时候保证我们的胜利。我将冲锋队视为我们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头顶的“皇冠”。¹⁴⁵

第2章 冲锋队的街头政治——危机时刻的动员

宣传是打击灵魂的暴力行动。宣传不是暴力的替代品，而是它的一个特征。两者有着完全相同的目的——使人们服从上天的控制。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¹

1925—1926年是“第二冲锋队”的起点，和上一章分析的前任不同，它很快转变为一个高度集中、遍及全国的组织，最终向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发起挑战。1923年未遂政变中幸存下来或者此后1925年和1926年在德国多地组建的冲锋队组织——往往以体育组织为名运作——最初享有相当的区域自主权。²与1921—1923年的慕尼黑冲锋队一样，它们常常是一种由纳粹党地区头目（称为“大区领袖”）指挥的私有民兵，“领袖”们利用冲锋队的实力抵挡纳粹党的潜在对手。这段时期内，不管希特勒身处兰茨贝格监狱还是在获释后的第一年里，对冲锋队的控制都很有限，他的首要任务明显是在整个德国重组纳粹党。不过，在1926年夏季实现了上述目标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冲锋队，设立了“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由一名“冲锋队最高领袖”（OSAF）担任长官，其任命从1926年11月1日起生效。³



初期改革

希特勒选择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执掌冲锋队中心领导机构，这位退役军人通常自称弗朗茨·冯·普费弗，而忽略有犹太意味的“萨洛蒙”。⁴普费弗·冯·萨洛蒙出生于1888年，是下莱茵地区一个贵族家庭中七个孩子里的老小，在选择职业军人道路之前曾学习法律，一战中晋升上尉军衔，停战之后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准军事人员，1919—1921年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上西里西亚指挥自己的“自由军团”。他很快就被誉为一名卓越的组织者、无情而狂暴的领导人以及极度自觉的人。1923年1月起，法国占领鲁尔区，激起了德国人的消极抵抗，在此期间，他投身破坏活动，被法国当局缺席宣判死刑。1925年3月，普费弗·冯·萨洛蒙自封为威斯特法利亚大区纳粹党及冲锋队领袖，成为本书第1章中讨论的20世纪20年代地区党魁之一。⁵希特勒选择他作为首任冲锋队全国领袖，目标是强化他在重要的德国西北地区的地位，同时遏制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卡尔·考夫曼等党内对手的野心；此时，考夫曼是纳粹党北莱茵兰大区领袖，不久以后还将成为汉堡大区领袖和地方行政长官，他在这个位置上盘踞多年。⁶希特勒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冲锋队将在德国的各个角落起到领导作用。

事实证明，普费弗·冯·萨洛蒙是冲锋队成长与成功的决定性人物。通过与希特勒紧密合作——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在1927年2月出版的《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公开了他改组冲锋队的思路⁷——野心勃勃的普费弗·冯·萨洛蒙开始了他的新工作，发布一系列命令，目标是巩固自己的

核心地位，并创建统一、等级森严的冲锋队。他引入了自上而下的指挥链条，目标是削弱之前相对独立的地区党魁们对“自有”冲锋队的直接控制。冲锋队的最终权威转移到慕尼黑的OSAF，1926年7月在魏玛的纳粹集会上创立的党卫队（SS）和希特勒青年团（HJ）也归OSAF管辖。⁸这些安排使普费弗·冯·萨洛蒙成为了纳粹领导层的关键人物，直到1930年8月他辞职。他的改革塑造了冲锋队接下来几年里的形象——尽管恩斯特·罗姆于1931年1月1日代替他执掌冲锋队，获得“参谋长”的新职务后，对他的许多方针和命令进行了修订。必须强调的是，此后党卫队独立并崛起，成为第三帝国最臭名昭著、最典型的恐怖组织，但这并不能掩盖如下历史事实：在1934年之前，党卫队是在冲锋队的管辖之下。在两个兄弟组织的初期，人员分布和影响力上有着悬殊的差别，其原因是罗姆在1931年初下达命令，党卫队成员数量应该仅为冲锋队的10%。事实上，当时全国的党卫队只有4000人，而冲锋队达到88000人。至于他们的活动，“第二冲锋队”和党卫队在魏玛时代的运作形式非常类似，但是关于策略、能力和人力分配的内部冲突从一开始就很明显。⁹

普费弗·冯·萨洛蒙的冲锋队新结构效仿了德国陆军。冲锋队的最小单位为“小队”，由6—12人组成¹⁰。5—6个小队组成“中队”，代替以前的“连”。3—4个中队组成“突击队”，3—5个突击队组成一个“旗队”（原称为“团”）。最后，来自同一地区的多个旗队组成一个“区队”。1927年底已经有了18个“区队”，它们于1931年重新编排为“地区总队”（也称为“集团”）和“次级地区总队”。¹¹按照德国军队的传统，冲锋队“突击队”通常得到一个编号，与之前帝国陆军中标识所述地区团级部队的编号相同。¹² 为了提高冲锋队与魏玛国防军等正规军的相似度，普费弗·冯·萨

洛蒙还制作了标准的领章。每个领章的颜色代表冲锋队员所属地区，上面的编号提供了有关旗队和突击队的信息。队员的衔级由穗带、星标和橡树叶表示，后者为从旗队长（相当于上校）起的最高级官员专用。¹³在书面文件中，领导岗位常常以缩写形式表示：除了OSAF（冲锋队最高领袖）之外，还有Gaustufs、Stafts、Stufs、Trufs和Grufs——分别是“区队长”“旗队长”“突击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的缩写。¹⁴随着普费弗·冯·萨洛蒙的改革，冲锋队还获得了相对的财政自主权。此时，它第一次可以管理自己的会费，不再完全依赖于纳粹党的拨款。不过，接下来几年内经费仍然不足，迫使冲锋队寻找其他途径增加资金，包括集中销售制服与装备、推出自有香烟品牌和接触德国工业界的同情者。¹⁵

然而，1926年底普费弗·冯·萨洛蒙建立最高指挥部时，这些改革与其说是对冲锋队人数增加的反应，不如说是看到冲锋队在未来数年的快速成长，对冲锋队专业性提高的一种宣示。普费弗·冯·萨洛蒙不希望自己的组织仅仅被看作另一个自卫组织，最终仰赖于当局的善意及武器、充满争议的魏玛国防军“继子”。他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牢牢掌握在纳粹党及其超凡领袖手中的“民族武装”，其首要作用是宣传，而不寻求与合法部队的军事对抗。新结构进一步因应冲锋队更大的活动空间。1925—1930年，在整个德国出现的许多纳粹党及冲锋队基层组织补充了该党之前在南部和西部的据点。虽然党内人士强调，重组的冲锋队不再参与准军事暴力活动，但冲锋队保险计划的推出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根据该计划，1928年底，所有冲锋队员每月都必须缴纳20芬尼的保险金。纳粹领导层完全知道，他们积极挑动与对手公开对抗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会升级为身体暴力，给党员们造成伤害，在极端情况下甚至造成死亡。仅在1928年的最后三个月，负责

冲锋队保险合同的办公室就处理了163起纳粹积极分子“执勤中”受伤的案例，赔付金额超过了9000马克¹⁶——接下来的几年这一数字显著增加，1929年报告了881起此类伤害事件；1930年为2506起；1931年，6307起；1932年达到14005起。¹⁷

从小集团到群众运动

下面，我将分析和讨论冲锋队在1925—1932年显著成长的原因。上一小节概述的内部结构变化有利于这些发展，但只是全面历史分析需要考虑的许多因素之一。首先，我将重点放在典型的大中城市，那里的冲锋队与其他准军事组织合作，为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军事化（换言之，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¹⁸我将对德国最大的两个城市——柏林和汉堡——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有可供参考的大量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崛起及冲锋队作用的研究资料，还因为这些城市曾经发生过强大的工人运动。¹⁹冲锋队将这些大城市视为危险和敌对的战区，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它们，将街道和社区转变为壕沟和战场。²⁰因此，纳粹企图在这些城市宣示，他们能够在落入政治左派之手的现代化大都市中有所作为。²¹除了概述空间上的这一扩张之外，我们还将仔细审视冲锋队激进行为和日常实践的形式。是什么让20世纪30年代的冲锋队生活如此具有吸引力，以至于有30万人不仅加入其中，还以不同寻常的形式为其献身？尽管招募人数不断上升，这些年的冲锋队仍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组织，反复受到丑闻和领导层斗争的打击，而这往往有悖于该党关于团结和道德优越性的说辞，对冲锋队的公众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到1930年9月纳粹庆祝全国大



一张结婚照，拍摄地点在施瓦本阿尔卑斯山南麓马林根附近因齐格科芬的王储饭店前，拍摄时间在1933年至1938年间。这对新婚夫妇站在一幅用花装饰的希特勒画像后面。新郎穿着褐衫军制服，许多中年客人也是如此，而老一辈的成员则穿着传统的周日盛装。坐在前面的小男孩穿着儿童冲锋队制服。这张照片展示了褐衫军对自己的制服以及融入当地社区的自豪感。

选胜利之前，受过教育的公众普遍认为，冲锋队是该党支持的流氓及暴力行为的化身，是社会越来越“野蛮化”的标志。²²尽管毁誉参半，但褐衫军不仅在城市中有了超常的发展，还渗透到了德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这种乡村“纳粹化”现象发生得较晚，但是比大城市更快、更彻底，大城市的居民在这方面更具抵抗力——尽管没有达到此前史学著作宣称的那种程度。纳粹在这些地区取得的成功更为重要，因为近四分之三的德国选民居住在人口不到10万人的小城市中，其中大部分住在人口不到1万人的乡村和小镇上。历史学家鲁迪·科萨恰当地总结了魏玛时代这次历史性选举的结果：

“中小型社区是纳粹成功的关键。”²³考虑到这一主题的区域性研究很多，本

章不对这一已经很宽泛的领域做更多详细的介绍，而是综合这一领域中与冲锋队有关的发现，为未来关心的主题提供一些素材。²⁴

那么，首先从国家的角度看，冲锋队在1925年到1930年之间的情况如何呢？由于民族主义阵营在1924年的两次国会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纳粹主义者没有在11月政变之后销声匿迹，但此时身着褐衫的积极分子仍然只是一种边缘现象。除了慕尼黑这个据点之外，即便在柏林和汉堡，冲锋队成员地方分支机构的人数也没有超过500人。²⁵就连巴伐利亚首府，冲锋队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也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当地纳粹党出现危机，1927年秋季甚至出现了暂时性的减少。²⁶在许多较小的城市里，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早期纳粹同情者只不过在当地的酒馆里聚会，组织各种政治阅读俱乐部。²⁷1930年之前，全德国的冲锋队人数不得而知——但考虑到1926年7月参加魏玛纳粹党集会的冲锋队员只有6000人，我们可以估计出1928—1929年的人数肯定不超过3万人。²⁸无论如何，1930年底，当纳粹党在前几个月取得惊人进展，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该党的兴趣以及该党党员数量时，冲锋队人数也没有超过6万人。²⁹

有一些例子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冲锋队在许多地区和城镇的边缘化地位限制了积极分子们与竞争对手公开对抗的潜力：根据一位早期纳粹激进分子的说法，帝国自由市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有大约50万居民，但1925年那里的褐衫军人数只有50人。两年以后，这一数量只增加了3—4倍，当局报告称，法兰克福冲锋队中有一部分人是“最为声名狼藉的暴民”。³⁰尽管所有宣传资料都坚持其他的说法，但在1929年之前，他们根本不敢与对手“公开对抗”。³¹同样，整个萨尔盆地有超过75万人口，1929年那里的冲锋队人数也只有30人。³²与此同时，人口稠密的鲁尔区只有几百名冲

锋队员，符腾堡也只有600人左右。³³最后，在德国的许多小城市和行政区里，当地冲锋队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仅限于几名积极分子，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之前，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定时组织非正式聚会。³⁴即使在冲锋队盘踞的地区，它的游行和其他活动形式也表现出“暴力的有限使用，因为事实证明，大规模使用暴力只会给该组织试图表现的形象及合法存续带来反作用”。³⁵

虽然无法概述冲锋队扩张的一般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1925年到



1926年7月3日至4日，在魏玛中央市场广场举行的纳粹党党集会上，后来成为柏林冲锋队第二区队的“博墩区小组”留下一张集体照片。著名的海王星喷泉前的卐字旗象征着纳粹对市中心的占领。前两排五个女孩值得加以特别关注。她们中至少有两个人穿着褐衫，还佩戴着党徽。这样的照片极其罕见，但却非常重要。尽管年轻的纳粹男性积极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提及与女孩和年轻女性更为密切的接触，但与褐衫同伴一起周游全国是接触异性的方式之一。第三排左四的年轻人是后来的纳粹“烈士”霍斯特·韦塞尔，左二是他的哥哥沃纳。

1929年，冲锋队总体上缓慢而稳定地成长，整合来自竞争关系的准军事组织（如埃尔哈特的“维京联盟”和罗姆的“前线联盟”）的人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³⁶前“自由军团”组织“兴登堡自卫团”的一个小派系于1927年加入之后，汉堡的冲锋队规模扩大了一倍，可直到1929年4月，它的人数仍少于300人。³⁷这几年来，加入柏林冲锋队组织的许多积极分子此前属于准军事组织“奥林匹亚民族主义体育俱乐部”，一战之后，该组织成为了右翼极端分子的人员储备，普鲁士当局于1926年5月12日宣布其非法。³⁸

在德国首都，约瑟夫·戈培尔被任命为新的地区党部领导人，早在1926年11月，涉及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暴力冲突已经成为这个城市街头政治的共同特征。戈培尔倡导的激进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20世纪30年代起被全党所采用。这种方法承认冲锋队初期的弱点，但推测正因如此，冲锋队必须寻求与对手正面对抗，理想的场所是后者的地盘。³⁹冲突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于首都的街头，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民族社会主义者必须在一个超过400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里增加曝光度，而这里的时间有限，作为巴伐利亚平民守护神的希特勒也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形象。在这种背景下，以可能升级为暴力行动的公开游行吸引注意力，是既可靠又经济的手段，也是引起邻近地区“轰动”的一种途径。⁴⁰哈默尔恩县纳粹党魁曾写道：“骚乱是主要的工作，不管它是如何发生的。”这证明了柏林冲锋队策略的成功推广。⁴¹其次，戈培尔在这些场合里巧妙地利用了必然到场的警察。根据法律，警察必须避免街头暴力失控，事与愿违的是，在纳粹的宣传游行中，警察却成了保护他们的力量。⁴²最后，这种看似大胆的挑衅行为（重申这一点很重要）之所以成为现实，正是因为升级的风险得到了控制，令参与者们兴奋不已，从而吸引了新的追随

者。调到柏林仅仅两周，戈培尔在日记中就兴高采烈地描述了冲锋队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团队精神”：“今天，我出席了冲锋队全体大会，一切都很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大干一场了。攻击，还是攻击！我们热血沸腾。这是新团队的黏合剂！我认为这是一场革命。”⁴³柏林冲锋队当时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因为戈培尔专注于暴力而崇敬他。21岁的突击队长霍斯特·韦塞尔在1930年死去后被提升到纳粹偶像的地位，他在1929年夏季起的自传中狂热地写道：“他从不畏缩，总是让我们释放积累起来的全部能量。在这一点上，冲锋队要特别感谢他。”⁴⁴汉堡的纳粹激进分子们以类似的口吻强调“代沟”的存在，声称在对父辈们失去信心之后，他们现在知道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中一个大言不惭地说道：“战斗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和目标。”⁴⁵

尽管有这些尚武的口号，但必须记住一点，冲锋队的激进主义思想在1925—1929年尚未成为群体现象。在所有较大的城市中，与规模大得多的右翼自卫组织和左翼准军事组织相比，冲锋队仍然是弱小的少数派。因此，冲锋队首先考虑的是捍卫自己有限的领地，这往往不过是几间酒吧、当地党部及周围。⁴⁶为了使作为纳粹巢穴的酒吧容易辨认，老板可以从冲锋队的“国家物资管理局”购买带有冲锋队徽标的11×11英寸搪瓷标牌。很明显，直到1930年，纳粹仍强调使用相对中性的标志，声称只有内部人员能够辨认，不希望政治对手摧毁它们——这当然只是一种希望。⁴⁷一旦据点得以确立，冲锋队就可能冒险进行探索，暂时占据城市的其他部分，引起人们对纳粹党及其准军事机构的注意。这种渗透和扩张策略对冲锋队员的心态有重要的影响：当他们认为周围充满敌意时，相互之间的信任成为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积极性，忍耐下去并取得政治上的成

功。与此同时，阶级和财富上的差别在冲锋队的半合法活动中作用有限，因此不是很重要。从1927年起，纳粹积极分子的内部教育显著增加，并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促使纳粹党转变为“真正现代化的激进主义政党”，即便如此，冲锋队“德国式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实际上是紧密团结和共同行动的必要性，而不是希特勒或者其他纳粹领导人关于该党经济政策的纲领性声明。⁴⁸

在这种背景下，普费弗·冯·萨洛蒙的改革保持了冲锋队最初期的核心元素：组织划分为仅包含少数积极分子的“基层机构”。这些冲锋队小组中的成员相互熟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展出了紧密的纽带，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党务活动经历团结在一起。戈培尔坦承，这种由政治积极分子组成的基层机构体系效仿了政治上的对手——共产党人，但是冲锋队的这种组织特征可以追溯到慕尼黑的初期。因此，有理由假定，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最终都从一战的军事部队里得到启发，特别是存在于战后“自由军团”各小组内部的“袍泽之谊”。左翼激进党派还以有组织、偶有暴力的劳工行动作为其组织基础，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悠久传统，可以上溯到19世纪。⁴⁹无论如何，民族社会主义者成功地使这种基层框架适应冲锋队的新现实，以这些小组组成了“地方暴力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往往合伙行动，为自己争夺地盘，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里。⁵⁰

这种方法给冲锋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好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几年里。较大城市中的许多冲锋队“突击队”此时像街头帮派一样活动——在这里，不应该将其理解为青年暴力（往往犯罪）组织，而应该是“社会安排的特殊形式”，这种特殊形式为成员们提供基本需求，包括较为可靠的伙伴关系、食品和住所，以及某种归属感。⁵¹年轻的恩斯特·哈夫纳1932年著

的“现实小说”《柏林公路上的年轻人》在德国轰动一时，正如书中的描述，魏玛共和国后期日益增加的青年帮派暴力现象，是德国城市中工人阶级居住区普遍穷困的生活条件的直接后果。这些年轻人连薪水微薄的工作都无法找到，而且他们往往出身于不正常的家庭，没有支撑生活的手段，因此他们自己组成了团结的“小帮派”。这些组织通常采用层次结构（领头者称为Cliquenbullen，意为“帮派领头羊”），代替成员们的家庭。⁵²冲锋队的理想组织是围绕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当地冲锋队领袖，不仅在组织形式上与这些地方帮派类似，承担（至少是有承诺）的工作也类似。按照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术语，冲锋队越来越成为“自发的群众组织”：采用层次化的基本组织结构，适用严格的领导原则，但建立在较小的单位基础上，这些单位有着惊人的自主性。⁵³

纳粹制服与当局

不管早期冲锋队地方组织的人员有多么不起眼，仅从他们的制服上公众就可以看出，他们属于某个更大的相关实体。褐衫于1926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很快成为了“卐”字之后最臭名昭著的纳粹主义者标志。这件制服对朋友和敌人同样显眼，容易为警察辨识，展现了穿着者的勇气与决心——尤其是它们被正式禁止的时候。尽管威廉·沃伊特（更为人们熟知的是他的绰号“科佩尼克上尉”）大约20年前就宣传过军服的心理效应，这种效应后来又成了海因里希·曼恩的畅销小说《臣仆》（*Der Untertan*，1921年英文版第一次出版，名为*The Patrioteer*，意为“牟取私利的所谓爱国者”）的嘲笑对象，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制服仍然很受欢迎。⁵⁴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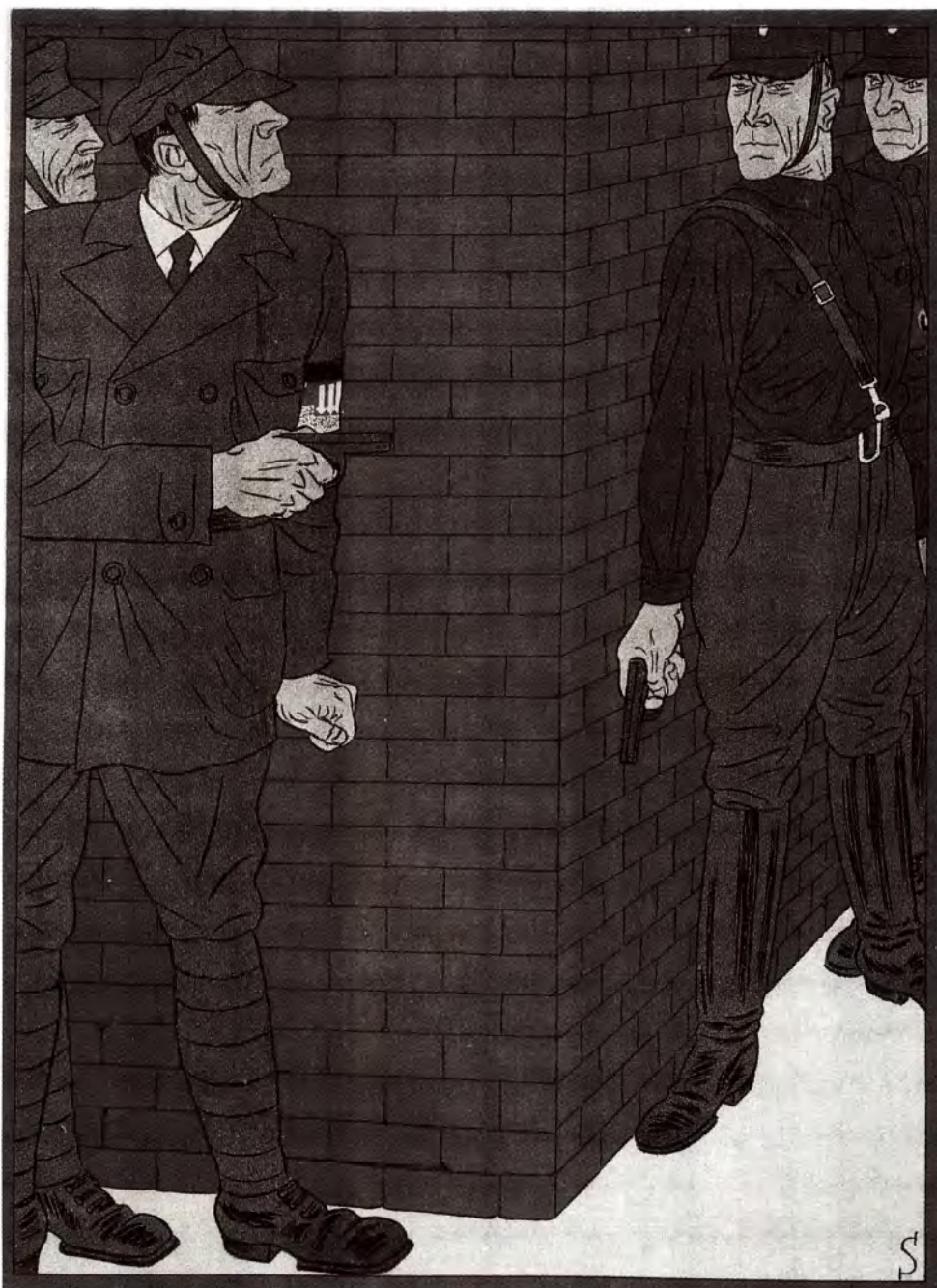
年之前，制服首先代表着国家的权威，20世纪20年代，制服“大众化”，越来越多的组织推出了自己的版本。这种服装此时已经成为了自主愿望的一种宣示，不仅表明归属和信念，还表明个人愿意服从对自由的某些限制。因此，冲锋队的制服也是我之前所定义的“训练整合”的一种工具。而且，它成为了一种蓄意挑衅的手段，尤其是因为，与警察和军队相关的法律与秩序形象常常与冲锋队的公共形象完全相悖。这种制服最终也作为团体编成的一个要素，通过确认穿戴者为更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赋予他们力量，并在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之间设定清晰的边界，终极目标就是为冲锋队队员提供一种力量感。⁵⁵

希特勒在1926年底写给普费弗·冯·萨洛蒙的一封信中声称，一旦穿上制服，冲锋队员就“上岗”了，他还要求，在这些场合里，冲锋队员不允许喝酒或者抽烟。在公众场合，游行中的冲锋队员禁止喝彩和起哄，甚至不允许分发纳粹党的传单。“政治活动只能由党来进行”，希特勒坚持道，要求激进分子们安静地接受他的命令，剥夺他们的所有创造力。⁵⁶1931年1月罗姆被任命为冲锋队参谋长之后，这些规则进一步加强了。从这时起，所有冲锋队队员，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国会议员和执行党的特殊任务的人们除外——禁止参加公开讨论、与记者交谈或者发表关于政治问题的文章。⁵⁷褐衫军应该成为德国街头上持续的视觉印象，但不是纳粹党政治路线的解释者。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有两方面的好处：普通冲锋队队员不需要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连许多纳粹分子也承认，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而且，这也使少数经过挑选的纳粹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显得更有意义。

纳粹绝不是唯一为其忠诚分子置备制服的政党或者联盟，因此，仅仅

如此并不能使其与众不同。老兵组织“钢盔团”、“前线士兵联盟”在1925年有超过25万名成员，远胜于冲锋队，他们身穿与德国陆军颜色相同的灰色制服。⁵⁸支持共和制的“帝国战旗”组织在游行时身穿绿衫、头戴蓝帽，就连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阵线战士联盟”也穿着一一种集合传统工作帽和军队徽标的无产者制服。⁵⁹但是，这四支准军事“部队”并没有引发内战。⁶⁰他们在街头游行，越来越频繁地举行群众集会，但很少与其他组织或者民众直接冲突，主要原因是警察在场。不过，他们的公开示威为暴力攻击提供了机会，这些攻击通常发生在政治事件前后。此类冲突实际上是魏玛共和国准军国主义思想的关键因素，至少，纳粹党和共产党人在其策略中都考虑了这种暴力行为。1930年初，共产党重要人物海因茨·诺伊曼在该党机关报《红旗》上写下了“无论在哪里遇到法西斯分子，痛打他们！”的话语，而纳粹分子则呼吁完全消灭“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劣等人”。⁶¹与这种直截了当、杀气腾腾的行动号召不同，“帝国战旗”和“钢盔团”满足于象征性的公开游行和集会。⁶²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个组织也同样激进化了，只是更多地是在语言上而非行动上，因此，美国记者休伯特·R. 尼克博克将1931—1932年的德国比作“有四支消防队的镇子，每支队伍都做好准备，一听到锣响就跳下铜杆，奔向目标。这是一个有四个帮派的村子，每个都做好准备，看到帽子落下就出发，对其他帮派大肆屠杀”。年轻的法国作家雅克·德库尔1930年秋季在马格德堡的一所高中任代课教师，他也注意到“每个角落都有反叛的思想。这是共和国的英雄主义时代。到处都是信仰和狂热”。⁶³

德国当局理所当然地试图阻止街头暴力升级，各个地区采用的策略各不相同，时机、强度和意图也都有差异。巴伐利亚仍然是纳粹主义者的避



埃里希·席林的漫画《德国的自给自足》于1932年8月首次发表在讽刺周刊《傻大哥》上，讽刺了魏玛共和国末期德国街道上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和血腥冲突。在这幅漫画中，左边是两个全副武装的“帝国战旗”成员，右边是两个全副武装的褐衫军队员，彼此剑拔弩张。副标题写道“1914年以来的进步！谈到战争，德国人终于不需要外国人了”。

难所，但社会民主党把持的普鲁士政府反复推进打击纳粹党的行动，特别是在1922年6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遭到谋杀，以及1923年11月政变之后。与通常的陈述相反，这些行动并不成功，下面举例说明。1928年，柏林警察局长禁止为冲锋队员汉斯-格奥尔格·屈特迈尔举行葬礼游行。官方报告称，人们于1928年11月17日早上在运河里找到了屈特迈尔的尸体，他卷入了前一晚上与建筑工人的争斗之中，在急性中毒的状态下跌落运河溺死。⁶⁴相反，纳粹分子声称政治对手谋杀了他，从而提高了屈特迈尔的地位，将其当成该党柏林和勃兰登堡的运动中最早的“血的见证”之一⁶⁵。纳粹主义者们打算为这位所谓的“殉道者”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游行，此举很快成为了一种惯例。这样的葬礼不仅是政治示威，还证明了纳粹意识形态涵盖一切的野心——它能够提供结婚典礼和葬礼等基础服务，或者至少为其做出重要的贡献。普鲁士警察清楚地了解即将到来的游行所具备的政治特性。他们声称，纳粹党不负责任地强化了其追随者的政治情绪，因此担心这种情绪在游行中释放而影响公共秩序。警察还宣布，他们不会回应戈培尔的正式抗议信，将来也不会理睬，“因为这封信傲慢无礼”。⁶⁶这些细节说明，尽管有与之斗争的强烈政治意愿，对于象征性政治活动如何在大众媒体及意识形态世界观相互对抗的时代发挥起作用也有基本的理解，但当局对早期纳粹决定“游戏规则”的企图几乎无能为力。

当局曾多次取缔“第二冲锋队”。该组织在普鲁士两次被禁止，第一次是在首都柏林，从1927年4月6日到1928年4月5日。⁶⁷这一禁令当然使纳粹更难在这个德国最大的州中招募人员，1925年到1928年之间冲锋队成长缓慢也与此有很大关系。不过，禁令不影响德国的其他地区，当然也没有对慕

尼黑的冲锋队核心区形成打击。⁶⁸几年以后，1932年，冲锋队再次被禁止，这一次是在全国范围内。该禁令于4月13日生效，但新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在6月14日就将其解除。两周以后，巴伐利亚至少在该州辖区内延长禁令有效期的倡议遭到了失败。⁶⁹总体来说，这些临时禁令对冲锋队的影响有限。当纳粹分子被禁止穿着褐色制服时，他们穿着便服参加活动。冲锋队以化名参加游行、高声歌唱，队员们穿着的白色衬衫或者其他替代“制服”仍然有着很高的辨识度。有些时候，即使在中等规模的城市里，此类活动据说也有千人参加。⁷⁰在这段“白衫时期”⁷¹中，纳粹与当局玩的“猫抓老鼠”游戏并没有阻止人们加入冲锋队，反而增加了组织内部的兴奋情绪和乐趣，更不用说，它还进一步破坏了合法政府的权威。1931年柏林高等法院的裁决在这一方面有启发意义，题为“关于禁止公开展示纳粹制服”的判决书也适用于著名的“替代”制服。法官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其中一个原因是公众不可能理解纳粹的着装规范，因此有可能成为警察的攻击目标。⁷²

年复一年，司法机构和警察队伍中越来越多人对纳粹运动持同情态度，德国政府对纳粹党和冲锋队施压的举措受到了阻碍。这两个群体更亲近右翼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人声称为法律、秩序和民族而战，他们的极左翼对手则更支持革命——对社会和公共秩序的彻底改变。⁷³仔细观察极端主义政党的不同政治策略是非常有益的：纳粹宣传强调了警察独有的不平，以积极的态度与其取得联系——按照纳粹的说法，警察遭到了政府的“虐待”，被迫在主张民主制度的党派导致混乱后为其收拾残局，而共产党人指责官员们是“制度”的党羽，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欺骗，背叛了自己的阶级。⁷⁴在萨克森自由州里，纳粹党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得到了越来越多当地组织的支持，在高失业率的工业地区尤为成功，⁷⁵纳粹党声称，按照

他们的统计，对常规警察部队的渗透非常得力，1932年，官员中有40%是纳粹党员。萨克森地区议会中的一名纳粹代表吹嘘，在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开姆尼茨，“纳粹警察”的数量超过了90%。⁷⁶这些数字当然是夸大其词，但仍然代表了一种趋势，即使在那些当局出动警察严厉打击冲锋队暴力活动的州和地区，警官们也不一定持相同的观点。⁷⁷萨克森州的社会民主党人经常抱怨警察过于仁慈：他们没有充分地阻止政治犯罪，对于具体罪行的补救措施也没有表现出热情和献身精神。结果是，开姆尼茨等城市的工人觉得，在“法西斯暴民的恐怖行为面前”，他们不再有安全，“甚至在自己的公寓里也是如此”。⁷⁸

对冲锋队的嘲笑

到1930年，冲锋队已经成为德国街头常见、引人注目但也非常具有争议的元素。当地方社团表现出阻止纳粹获得立足点的决心时——例如奥登森林里的小城米歇尔施塔特——数百名来自该地区的冲锋队员“予以回击”。1930年4月6日，他们驱车进城，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窗户和当地行人投掷石块，打伤多名成年人和至少一名儿童。⁷⁹冲锋队不仅引发了强烈的恐惧、钦佩和抗拒感，还成为了讽刺和嘲笑的目标。1930年12月，很受尊敬的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增刊《恶作剧》以讽刺的口吻告诉其读者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最近，3名冲锋队队员在（柏林市中心的）莱比锡大街上安静地走着，陷入沉思之中，这已经造成了轰动。”⁸⁰描述法西斯暴民在街头上边唱歌边游行，并在路边实施暴力活动时，记者、作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简洁地称那些事件“以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方式进行”——对这

类事件快速增加带来的政治危险轻描淡写。⁸¹埃里希·克斯特纳1931年的小说《法比安：一位道德家的故事》也嘲笑了冲锋队，但同时也讽刺了它的对手共产党人。在其中一个章节里，克斯特纳描写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一名纳粹分子和一名共产党人之间发生枪战，两败俱伤。当两人抵达当地医院时，值班的医生对那一幕做了如下的评论：

“你给我带来了两位政治家？”他笑着说，“我们今天晚上已经遇到了9个类似的病例，其中一个腹部受了严重的枪伤。他们都是工人和职员。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来自郊区的人通常互相认识？这些政治争斗无异于舞厅里的群架，两者都代表着德国社会生活的堕落。看起来，他们是想射杀对方，以减少失业人数，这真是奇怪的自助方式。”⁸²

这些形式的讽刺只是为了掩盖对道德和政治的绝望，这种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尤其是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大选之后，在此次大选中，纳粹党赢得了18.3%的选票。该党的支持率达到了1928年的6倍，已经成为新议会中的第二大党。不可否认的是，纳粹已经成为一支可观的政治力量，以至于一年之后的1931年12月，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德国共产党（KPD）宣传人员秘密会议上，一份报告抱怨，共产党人完全低估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威胁：“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接受了希特勒早晚将会掌权的事实，也接受了我们的时代将出现在纳粹失败之后的想法。”⁸³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引人注目是否因为褐衫军倾向于使用暴力仍有争议。⁸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必须考虑该党的地方特性，以及魏玛

德国公共领域碎片化的总体后果。正如历史学家斯特凡·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越来越严重的意识分裂”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他对这种“分裂”的定义不仅是显著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倾向，还是一种不假思索地构成某人观念的基本操作。⁸⁵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成功地创造了独特的公共领域，对他们的追随者来说，这是有血有肉、引人入胜的，但没有相同基本意识形态假设的人无法进入其中。两个运动都鼓励信徒抵制不受欢迎的事实和世界观，以利于形成该党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理想化理解（所谓“正确”理解）。⁸⁶前冲锋队旅队长弗朗茨·博克1946年在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问时总结了这种态度：“每一种自我保护的渴望都需要一场战斗。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目标是夺取政权）需要政治斗争和战斗。但是，我们的武器是精神上的——宣传、演讲和群众示威。”⁸⁷虽然因为策略的需要，这一陈述的后半部分对冲锋队身体暴力的核心作用轻描淡写，但它证明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基本观念——政治首先是多种世界观相互敌对、排斥的问题。

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卡尔·施米特于1932年为“普鲁士政变”案（非法推翻社会主义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政府）辩护，后来很快就成为第三帝国的首席法学家，他将这种敌友之分上升为一种政治哲学。在冲锋队内部，施米特复杂的学术推论显然不如通过拳头和战斗得到的更具体论据重要。不过，在知识界的两极都有类似的趋势，那就是将政治分歧夸大为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纳粹的宣传不断地提醒冲锋队普通队员，他们是大形势的一部分，将要亲眼见证自己塑造的关键历史时期。这种乐观的判断绝不是德国独有的，而是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所有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特征，正如罗杰·格里芬的有力论断：极端民族主义

者一致认为“西方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有可能在社会崩溃与战争之中走向最终的野蛮和无政府状态，或者超越当前的混沌与堕落时代，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⁸⁸我们对德国首都的两种纳粹报纸——戈培尔的《攻击报》和施特拉塞尔的《柏林工人报》——做了抽样调查，足以确认这种极端的末世观点。在两种报纸上，记者们的目标不是事实的准确性，而是创造另一种公共领域，极端党派的观点可以在其中表达，他们的积极分子可以得到重视和帮助。戈培尔推测，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纳粹的文章至少提供了一种“轰动效应”，可以让除了无聊之外什么都能容忍的柏林人感到兴奋，对于这座“智慧与柏油之城”，他始终觉得难以捉摸。⁸⁹因此，公众对冲锋队存在与行为的反应不能从更高的“客观”角度进行评估，而必须深入根植于对不同情景的认真重现之中，不能忽略历史文件中表达的强烈的党派观点。

对冲锋队的分析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对魏玛共和国晚期政治暴力的总体分析。我们拥有的官方统计数字大体上很可靠，能够说明1928年到1932年政治犯罪行为猛增的现象，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告诉我们同时代人的看法。⁹⁰所有卷入暴力之中的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消防队员”，而其他组织则是犯罪“团伙”——让人一下子想起休伯特·尼克博克生动的比喻。冲锋队员将在街头遭到袭击的风险解释为严重民族危机的又一个标志。这种风险确实很高，特别是冲锋队决心“征服”的工人阶级居住区。正如安东尼·麦克利戈特所述，1933年之前，在阿尔托纳市（1938年成为汉堡的一部分）里，早期纳粹积极分子不仅会在街头上听到“纳粹必亡！”或者“莫斯科万岁！”的喊声，有很多人还不得不在家中被闯入破坏之后迁居。共产党人和“帝国战旗”组织成员经常在纳粹分子单独离开著名的巢穴时对其

发动袭击，因为他们的制服容易辨认，或者与攻击者相互认识。这种攻击有时就像真正的“追捕”，往往是一大群武装袭击者对付单个或者少数受害者，用带有钉子的篱笆桩打击他们的脸部和头部，使用利器刺伤受害人或者对其拳打脚踢，直到他们重伤或者死亡。⁹¹如果对比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暴力行为，纳粹、共产党人、“帝国战旗”组织和“钢盔团”的发动者实际上难以区分，环境因素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后者只是事后为了证明合理性而提出的借口。

暴力活动的升级

根据1931年全国范围的官方统计数字，政治暴力事件造成8248人死伤。民族社会主义者是最大的受害群体（4699人），紧随其后的是“帝国战旗”组织（1696人）、共产党（1228人）和钢盔团（625人）成员。⁹²各地区的数据总体上也确认了这一模式：汉诺威行政区1931年的官方统计数字表明，受伤的有71名纳粹分子、47名“帝国战旗”成员、7名共产党人和6名“钢盔团”成员。此外，该地区有一名“帝国战旗”组织成员被杀。⁹³在萨克森州，同年的政治暴力事件造成683人受伤，14人死亡。死者中有6名民族社会主义者、两名共产党人和4名“其他党派信徒”。⁹⁴莱比锡在1929年到1933年3月之间有6人死于政治原因，其中3人为民族社会主义者，1人为共产党人，1人为“帝国战旗”组织成员。⁹⁵不过，左翼自由主义周刊《世界早报》公布的另一份德国统计报告称，1929年到1931年7月之间，政治活动造成155人死亡、426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死者属于政治左派（108人），只有31名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死亡。⁹⁶根据纳粹党自己的数据，1930年到1932年

之间，全国范围内有143名冲锋队员被杀，仅1932年就有84人死亡。⁹⁷从这些统计数字判断，民族社会主义者似乎是最常遭到攻击和伤害的群体，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虽然面临最明显的死亡风险，但遭到攻击的频率较低。而且，如果考虑1929年到1931年之间冲锋队员和共产党准军事组织成员明显少于“帝国战旗”和“钢盔团”成员这一因素，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前两个组织的积极分子表现出来的暴力倾向比后两个组织更为明显。

为了证明合理性，同时进一步加强敌意，纳粹宣传声称，冲锋队员和整个民族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他们面对的个人风险和伤害可以视为对民族的直接攻击。确立个人经历和民族命运的这种联系——最终是一种自我激励的浮夸姿态——是这一段关键时期里褐衫军影响力扩大的关键因素。虽然该组织的领导人在公开演讲中如同念咒一般反复强调，不允许冲锋队员携带武器，只在合理的自卫范围内诉诸身体暴力，但人们都知道，真相并非如此。即便许多服务于边防部队、曾受过魏玛国防军正式训练的冲锋队队员基本上（还）没有卷入暴力对抗，这一说法对较大城市里的冲锋队“团伙”也不成立，在这些城市里，持有枪支意味着地位的提升。必须承认，慕尼黑冲锋队可以全军进入魏玛国防军营房、用重型火炮和机枪进行准军事训练的时代已结束。但德国境内有大量轻型武器流通，不仅弥补了不能取得军用装备的损失，而且这些武器更加频繁地使用，既用于训练目的，也用于攻击。在这几年里，警察经常没收冲锋队的铜指环和橡胶警棍等武器，而且越来越多地发现手枪、匕首、步枪和炸药。⁹⁸如果人们相信前普鲁士内政部长、警察局长阿尔伯特·格热辛斯基的回忆录，柏林警察在1932年初甚至没收了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和格热辛斯基本人的“真人尺寸雕像”，“雕像头上有整齐的弹孔。”格热辛斯基淡淡地评论道，

他们两人都是“第三帝国年轻战士易于打击的目标”。⁹⁹

1931年和1932年，当局最终揭露了民族社会主义者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建立独裁政权的计划。1931年初，他们公布了“博克斯海姆文件”，其中包含了纳粹为应对共产党人可能发动的起义而制订的夺权计划。计划制订者中最有名的是28岁的黑森州达姆斯塔特实习法官维尔纳·贝斯特，他后来成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帝国中央安全局（RSHA）一处处长、德占法国南部地区政府负责人，最终于1942年成为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这份战略文件描述了如何宣布紧急状态，然后由冲锋队和其他右翼准军事“自卫”组织维持这一状态。任何试图干预法西斯夺权行动的人都将当场处决。¹⁰⁰半年以后的1932年3月，巴拉丁奈特警察发现，从前一年开始在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炸弹袭击不是最初认定的共产党人实施的，而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罪行。这些恐怖袭击背后的领导人物是党卫队地区领袖特奥多尔·艾克（1933年夏季成为达豪集中营指挥官），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负责路德维希堡法尔本工厂的保安工作，利用职务之便，他采购了大约可以制作80枚炸弹的炸药。¹⁰¹

在这两个案例中，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领导人都迅速说服当局，必须将此类事件视为对迫在眉睫的共产党威胁做出的反应，虽有些过度但最终是合理的。他们声称野心过大的纳粹党地方官员已经拟定计划，准备违抗党总部的明确命令，投掷炸弹。与此同时，纳粹党领导层利用了这些威胁给政府造成的日益增加的压力：他们辩称，德国的公共秩序现在只能在纳粹党及冲锋队的帮助下维持，而不能转而打击他们。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亲自要求司法部长谨慎处理博克斯海姆丑闻，避免采取激烈的司法行动——特别是要安抚决心揭露纳粹欺人之谈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报刊。1932年10月，对贝斯特的叛国罪指控未能成立，这一点也不奇怪。¹⁰²从1930年起，政治犯罪、“有组织”犯罪和轻罪之间的界限比以往更加模糊。在那个普遍贫穷甚至饥饿的年代，简单地偷窃食物也可能被直接看成最终政治行为——例如，可以解释成共产主义者反对资本家剥削的自助行为。¹⁰³柏林的共产主义红色阵线战士组织（已被正式取缔）和纳粹冲锋队偶尔会组建政治团伙，与黑社会发展密切的关系。¹⁰⁴许多冲锋队员明显将政治活动与犯罪活动结合起来，以致当地人将在柏林新克尔恩工人阶级聚居区活动的第25突击队称为“皮条客突击队”——多年以后，冲锋队的历史将其吹嘘成某种荣誉称号。¹⁰⁵盘踞于柏林西部夏洛滕堡区的第33突击队臭名远扬，由于它的成员多次卷入致人死亡的枪战而在当地被称为“杀人突击队”。¹⁰⁶这些犯罪行为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冲锋队的看法，有时候还使他们的资产缩水：1931年的警察报告称，一贫如洗的冲锋队队员们反复发动政治袭击，以便索要冲锋队的保险金，这正是反法西斯出版物热心利用的话题。¹⁰⁷

宣传游行越来越多地升级为暴力活动，1929年柏林的“血腥五月”和1932年阿尔托纳的“血腥星期天”是最为严重的遭遇战。这些事件中的大部分遇难者死于警察企图恢复秩序时射出的子弹。共产党引发的柏林“血腥五月”造成31人死亡，而纳粹党引发的阿尔托纳事件则有17人丧生。这两个事件中都有超过100人受伤。¹⁰⁸除了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之外，在更多德国城市里，以涉及竞争党派成员群殴、直接袭击和枪战告终的党派集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前几年这些城镇“暴力团体”的“伪和解”特性一去不复返了。¹⁰⁹格热辛斯基回顾了这种变化：“常规的争吵让位于反复的攻击。刀子、棍棒和左轮手枪代替了政治争论。恐怖活动猖獗。”¹¹⁰戈培尔也以类似的话语描述这种局面，在他的眼中，“动用椅子腿和左轮枪的血腥冲

突是必要的”。¹¹¹

这种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最初基本限于贫困的工人阶级居住区，但很快就突破了非正式的社会界限，正如以下发生在科隆的例子：1931年3月6日（星期五）晚上，科隆-布劳恩斯费尔德的天主教中央党地方分会举办晚会，讨论“苏维埃红星与卐字”的时髦话题。大约有70人出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请自来的当地纳粹分子，他们乘坐自行车和摩托车抵达。这些人没有熄火，以便在必要时快速离开。最初，纳粹分子们在大厅里安静地聆听主讲人赫茨博士的演讲，但很快就开始质问和羞辱他。25岁的科隆大学法律系学生托尼·温克尔恩肯普此时已经成为纳粹党莱茵兰地区党部头子，至少在这一晚上充当到场的冲锋队突击队指挥官。他最后将主讲人斥为“懦夫”，这似乎是预先安排的暗号，纳粹分子开始向组织者就座的方向投掷椅子。后来，公诉人在法庭记录中做了如下生动的描述：

被告温克尔恩肯普向牧师弗林斯博士的方向扔了一个沉重的烟灰缸。与此同时，另一个人（无法确定）袭击了主讲人赫茨博士。属于中央党的参会者只能保护与会的妇女，躲避被用作投掷物的烟灰缸和椅子腿。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5分钟。在此期间，有58张椅子损坏或者完全被砸毁；屋子里的一些其他设施（玻璃门、玻璃吊灯、饰板）也遭受破坏。损失共计400马克。¹¹²

多名中央党成员受伤需要就医。弗林斯牧师（他于1942年当选为科隆大主教，二战后升任枢机主教）的前额受伤，不得不缝合。¹¹³温克尔恩肯普最初被判处6个月监禁，但在上诉后改判缓刑。¹¹⁴可以公开自由活动之后，

他继续袭击政治对手。¹¹⁵纳粹掌权后，温克尔恩肯普飞黄腾达：1933年，戈培尔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公众启蒙与宣传部驻莱茵兰地区负责人，他还成为普鲁士议会和（名存实亡的）国会成员。1937年，此时已获得博士头衔的温克尔恩肯普成为科隆国家广播电台台长，后任德国广播协会会长。1939年，他晋升党卫队旗队长。他的兄弟彼得于1941年成为科隆市长，取代了担任该职多年的康拉德·阿登纳——未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

这一短暂的插曲不仅说明了狂暴的“街头政治”、犯罪行为和冲锋队学生激进活动日益相互联系，还说明这些活动不仅限于那些自诩为“恶棍”的年轻人，或者不在纳粹党控制之下的贫困青年。相反，这些事件



1932年，柏林施潘道街头冲锋队游行的宣传照片。两名普鲁士警察监视着这次政治示威。那时游行和队伍在德国首都司空见惯，因此，街上人群中只有一部分人仔细观看游行的褐衫军。

是20世纪30年代初官方认可的纳粹党街头政治的重要元素。正如纳粹领导人反复重申的，那些“统治街头”的人迟早将得到政治权力。¹¹⁶相应地，这种政治策略意味着，每一种公开暴力行为现在都可以升级为一种政治行为，被颂扬为对废除共和制的最终目标做出的又一贡献。1931年9月12日的所谓“选帝侯大街骚乱”就是一个特殊而极端的例子。这一天是犹太教的新年，数百名冲锋队员走过柏林著名的选帝侯林荫大道，¹¹⁷高喊反犹太口号，野蛮殴打他们认为是犹太人的路人。该事件看上去似乎是自发的暴力行动，但实际上是戈培尔和柏林冲锋队领袖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多夫精心安排和准备的袭击。由于冲锋队有策略地分成多个小组，措手不及的警察难以维持秩序。最终有30名袭击者被确认出来，受到指控并判处监禁及罚金。¹¹⁸纳粹党在审判中否认冲锋队是根据此前的命令采取行动的，致使柏林的许多纳粹积极分子觉得遭到了出卖。因此，到1941年底，400名心怀不满的首都冲锋队员组建了“伙伴关系社会救助组织”，这个自助组织倡议从希特勒领导的运动中分裂出来，据说甚至愿意支持“帝国战旗”组织，防止首都的政治暴力激化。¹¹⁹尽管有这种内部的不满，以及“选帝侯大街”案审判中相对严厉的判决，但从纳粹领导层的角度看，这场暴乱取得了象征性的成功：冲锋队已经表明，它对犹太人和民主制度的仇恨已经不再局限于啤酒馆和其他地位有限的场所，纳粹党已经足够强大，甚至能“统治”首都最有名望的大街——哪怕只有一个小时。这样，在纳粹忠实信徒眼中，冲锋队所起的作用与宣传相符，是一支由意识形态推动、始终做好行动准备的攻击部队。

失业和社会动荡在冲锋队中的影响

但是，仅仅从表面去看待纳粹党领导人的主张容易产生误导。1931年和1932年，当德国失业人数上升到600万以上时，人们加入冲锋队既有现实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¹²⁰在那几年里，每两名冲锋队队员就有一人暂时甚至永久地失去工作，某些“突击队”里失业人数高达80%。1931年，柏林的纳粹激进分子有60%—80%是失业者。¹²¹汉堡的情况也类似，1942年，4500名冲锋队员中，有2600人（略高于56%）没有工作。¹²²每月的队员流动率有时超过了20%，很多加入冲锋队的人留在组织中的时间不超过几周或者几个月。而且，尽管从1927年起党员资格已经正式成为强制性条件，但有数十万新成员只加入冲锋队，并没有加入纳粹党。¹²³在这些加盟决定中，财政考虑确实起了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事实的支持：享有成员资格的人甚至不一定缴纳会费。对于德国男人来说，参加冲锋队的社会生活和准军事训练，比以往更多地“提供了替代工作的全日制活动”，最终，加入冲锋队不依赖于手续，只要上级认为某人对运动的贡献令人满意就行了。¹²⁴

群体互动、职业发展前景，简而言之是在这段时期生存的需求，往往是人们加入冲锋队时比意识形态归属更有说服力的诱因。案例研究也表现出相同的走向，在靠近哈茨山脉、人口为9000人的工业小城奥斯特罗德（现称奥斯特鲁达），1933年前加入冲锋队的71人中，只有48人是纳粹党员。¹²⁵而在东普鲁士一个特别贫困的地区，1931年当地的一个冲锋队突击队有118名队员，没有一位是正规的党员。¹²⁶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三年，德国全境加入冲锋队的人中，许多都是试图避免即将到来的裁员或者已经失业的工人，他们推测该地区不断壮大的纳粹网络有

可能提供重新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¹²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将时间花在所谓的“突击队”酒馆和酒吧里，这些酒吧以亲近纳粹党的受众为目标，希望在德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酒精消费锐减环境中生存下去。¹²⁸经济危机达到高潮时，冲锋队建立了自己的工作机构，试图说服党员雇佣冲锋队的同事。冲锋队甚至创立了“工作突击队”，让没有工作、身无分文的激进分子在私人就业市场上提供劳务。¹²⁹基督教总工会于1932年强调了德国年轻人日益增长的政治种族主义思想与毁灭性经济局势之间的紧密联系：

“社会和经济体系如果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工作和谋生的任何希望，就会促使他们加入冒险家的行列，颠覆政权不会使他们失去任何东西，但可能赢得全部。1931年的政治选举非常清楚地说明，流离失所的人们跟随自认为行动经过深思熟虑的党派，即使这些行动是纯粹消极和毁灭性的。”¹³⁰

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尽管冲锋队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从事大量社会活动，但仍然越来越难以运作。不过，该组织成员在1930年底到1932年夏季之间不断增加——从1931年的77000人增加到同年11月的221000人，1932年8月更达到445000人。¹³¹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关系网和个人忠诚度往往比纸面的命令更为重要，这在多年以后成为第三帝国中更为普遍的特性。内部争吵与个人对立（特别是在党务官员和现在指挥数千甚至数万手下的地区冲锋队领袖之间）司空见惯，甚至令纳粹同情者都感到厌恶。退役中尉，早期纳粹党支持者赫尔穆特·冯·米克早在1929年8月就坦率地说：“这个党完全堕落腐化了，不管从组织还是从战略及意识形态领域来看都是如此。该党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宣传……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猪圈。”¹³²

但是，不仅个人，意识形态的实质性差异也威胁着冲锋队的凝聚力，

以及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团结、强大政治运动的形象。特别是在德国北部的工业中心，许多冲锋队员亲近纳粹左翼的“社会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末，领导这一派系的是奥托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兄弟、戈培尔和柏林冲锋队领袖瓦尔特·施滕内斯。¹³³这些人认为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是硬币的两面，两者的选择只是出于策略原因，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年轻的无产阶级和部分贫困化的中产阶级。纳粹党通常将其社会承诺包装在流行的口号中，如“打破利益的奴役”“工作和面包”，而“纳粹左派”要求更彻底的变革，比如大银行国有化、“打击奸商”、引入资本税，当然还有立即结束根据1930年5月最终被采纳的“杨格计划”缴纳的赔款。^{①134}虽然这些要求只不过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流行、左倾版本，加上纳粹抨击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辞藻，但在这些立场中，有些与共产党人的看法有明显的重叠。和纳粹中的希特勒派系不同，施滕内斯的追随者们倡导与苏联结成密切的联盟（主要是策略原因，专注于反对西方，特别是英国），支持印度和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反对德国的联邦制（认为要有一个集权化的强大德国），反对天主教会（使用19世纪末“文化斗争”中提出的相同论据），反对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¹³⁵

在这种派系斗争中，意识形态倾向与实际考虑纠缠不清：随着冲锋队从1930年起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群众组织，北方的领导人对向纳粹党申请更多财政支持失去耐心，声称推进纳粹目标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冲锋队而非

① 1929—1930年，美国银行家杨格主持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订的新赔款计划，旨在取代1923年制订的道威斯计划。——编者注

党内的官僚完成的。而且，许多冲锋队领导人仍然支持暴力政变，而不是合法夺权的现行策略——他们认为这种缓慢而不确定的策略可以吸引选民和新党员，但除此之外改变不了什么。这一根本冲突不仅导致普费弗·冯·萨洛蒙于1930年8月29日辞去冲锋队最高领袖一职，1931年1月代之以卷土重来的恩斯特·罗姆，¹³⁶而且成为了纳粹运动内部一系列暴力冲突的核心因素，其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1930年8月底和1931年3月底的两次“施滕内斯叛乱”。

失望的柏林冲锋队员在施滕内斯领导下，于1930年8月30日袭击首都的纳粹党部，之后希特勒出手干预，亲自赶往首都，“流着泪”同意了冲锋队的多项要求，承诺给该党左翼更高的工资待遇和更多的影响力。由于两周后的9月14日就要举行重要的国会选举，纳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平息内部争吵。¹³⁷然而，希特勒和慕尼黑的纳粹党领导人从这时开始就下定决心，遏制施滕内斯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不断煽动“革命”行动将使该党偏离“合法”道路。1931年3月28日，打击的机会来了。德国总统通过一项避免政治动乱的紧急法令，要求纳粹党严密控制冲锋队，否则将有被宣布为非法的危险。作为反应，希特勒罢免了施滕内斯和他的得力助手、“参谋长”瓦尔特·雅恩。从技术上说，这一免职决定是新任冲锋队参谋长罗姆1931年3月31日颁布命令完成的。¹³⁸为了报复，施滕内斯和追随者选择发动又一次哗变，次日再度占领柏林党部和戈培尔发行量达8万份的《攻击报》编辑部。¹³⁹但是，这一次他们发现党内对手严阵以待。为消除反对意见，罗姆承诺到1931年5月1日，所有冲锋队“地区总队”都将得到固定的预算。大部分柏林冲锋队员很快保证效忠于“元首”，身在柏林的希特勒依靠库尔特·达鲁格、戈林和戈培尔诱骗或者直接收买了他们。这并不是戈培尔最

后一次倒戈，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及时选边站队，而施滕内斯的命运已成定局。¹⁴⁰

尽管如此，约500名冲锋队队员——大约是当时柏林全部冲锋队队员的三分之一——追随施滕内斯，创立了“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战斗组织”，该组织1931年6月3日与前一年夏季创立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战斗运动”组织合并。¹⁴¹根据批评者们的说法，常规的冲锋队员接受了基本的准军事训练，但是政治上仍然没有得到教育，而这些持异议者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自称代表了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原来面貌”——军事运动，与该党现行领导层的“布尔乔亚”特性形成鲜明对照，而主宰纳粹党的是“追逐官位的人”“市侩”和平庸的公务人员。¹⁴²这群新的“革命战士”仍然互称“冲锋队队员”，施滕内斯甚至自称“冲锋队最高领袖”或者“反希特勒”，他原来的副手瓦尔特·雅恩自称为“参谋长”，复制了罗姆的职务。¹⁴³这些另类的冲锋队员不再身着褐衫，而是穿上黑色衬衫、戴蓝色帽子——往往是重染了原来的冲锋队制服。¹⁴⁴

施滕内斯最初声称，他的“黑色阵线”和另一支冲锋队（也被称为“黑色卫队”）从全德国不满纳粹的积极分子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除了他在德国北部的据点之外，莱比锡、科隆、杜塞尔多夫、汉诺威和多个其他城市也有异议者组织。不过，纳粹运动左翼的声势很快就衰落了。早在1931年9月，这支另类冲锋队的领导人就与赫尔曼·埃尔哈特在柏林会晤，探索结盟的可能性。考虑到埃尔哈特于1926年春季加入“钢盔团”后在冲锋队队员里留下的恶名，这似乎是相当绝望的举动。¹⁴⁵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前的几个月，施滕内斯领导的另类冲锋队（很快改名为“革命战士运动”，1932年又改名为“战斗队”）已经边缘化。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于1933年1月

夺权之后，“民族社会主义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们发现自身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于1934年的“长刀之夜”中被杀；他的兄弟奥托和瓦尔特·施滕内斯逃亡。施滕内斯后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军事顾问、蒋介石的卫队长，直到1949年。¹⁴⁶

1930年到1932年之间，德国北部的许多工业城市也爆发了类似的冲突，但规模没有那么大。例如，在蓝领之城不来梅港，当地冲锋队于1931年8月打断了纳粹威悉-埃姆斯大区领袖召开的一次会议。煽动者被开除出党和冲锋队之后，他们发表了一封致希特勒的公开信，指责他为了个人和策略的目的，利用近年来普通冲锋队队员做出的政治“牺牲”；他们声称，他在“慕尼黑建造了价值百万马克的宫殿”（指的是号称“褐宫”的纳粹党新总部），而此时冲锋队队员中的失业者数量达到了可怕的顶峰。他们还写道，纳粹党领导层只关心自己的政治野心，反复令冲锋队队员失望。这些纳粹持异议者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意指冲锋队）而不是通过“国会党派”拯救德国。¹⁴⁷

这些指责通常以纯粹主义的辞藻表达，要求清除当前的乱象，结束腐败和社会不公平现象。¹⁴⁸在这些冲突中，党派之间的分歧更多的不在于政治目标，而在于实现目标的方法，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煽动与协商、狂热与深思熟虑之间的根本差异。¹⁴⁹这种普遍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困扰着纳粹党与部分半独立冲锋队之间的关系，直到残暴的“长刀之夜”后，后者才趋于顺从。即使在建立竞争派系的企图最终失败后，冲锋队内部的不满情绪仍然高涨。当纳粹党通过与海因里希·布吕宁和其他保守党右派领导人达成妥协，与德国工业界建立紧密关系而成功地合法夺权，许多冲锋队积极分子——特别是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人——缓慢而坚定地对该党及其承诺

失去了信心。正如我们在波滕帕谋杀案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局面在1932年夏季和秋季变得特别严重，戈培尔也意识到，当时大部分冲锋队队员遭遇“（经济）萧条”。¹⁵⁰慕尼黑警察在1932年10月20日的一份详细报告中同样注意到冲锋队“集体意志消沉”，预测如果该党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加入下届政府，冲锋队员将大批离去。¹⁵¹多年以来，冲锋队队员首度减少。¹⁵²不过总体来说，希特勒不仅设法遏制了冲锋队里普遍存在的不安定现象，还成功地通过对政治对手的积极和越来越猛烈的攻击，疏导了追随者的不满。

农村地区的褐衫军

本章到目前为止提供的大部分例子都与冲锋队的成长及其在德国城市的活动有关。虽然这反映了大部分研究的普遍重点，但如果认为冲锋队只是城市现象，那就是严重的误导。该组织在德国农村的出现，至少在解释纳粹党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民意调查中取得惊人成就，以及对冲锋队活动的全面分析上都是很重要的。从多个德国省份留存的成员名单上可以看出，从1930年起，冲锋队在农村招募成员比城市里更为成功。据德特勒夫·米尔贝格尔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的冲锋队员中，有将近70%生活在不超过5000居民的小村落里，只有17.6%来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¹⁵³大城市由官方规定的8小时工作日使年轻人（特别是没有家庭义务的人）可以协调工作和党务的关系，与此相反，冲锋队在农村的招募更为困难。在这些地区，人们通常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传统的权威不像城市地区那么快地受到侵蚀。¹⁵⁴

农业产品跌价是德国农村地区面临的最严重问题，特别是与税率上升

同时出现时。结果是，德国出现了新的“农村人口外流”浪潮，农民的思想也趋于极端化，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在勃兰登堡的农村地区，年轻农民——尤其是那些不可能接管父母农场的人——占据了所在“突击队”的绝大多数。¹⁵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不满情绪高涨，导致1928年发生了严重的抗议活动，即所谓的“农村人民运动”。虽然这次运动没有正式地与特定的计划或者党派关联，但民族社会主义者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高度不满，采用农民的革命口号，推介自身为必要的替代品。农民反抗者的暴力抗议以及他们普遍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情绪，为包括纳粹党在内的鼓动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纳粹党很快利用了整个德国北方多地发生的暴动。相比之下，纳粹过度的民族主义思想对既有的农场主吸引力不大，这些人首先考虑的是相对狭窄的生活圈和实际问题，而非抽象的祖国概念和国际政治。¹⁵⁶不过，随着经济局势恶化，他们同样越来越容易接受纳粹的口号，特别是他们高度象征性的行动。例如，1930年在波美拉尼亚西部，冲锋队员在年轻且极具魅力的律师威廉·卡彭施泰因率领下，介入了该县一块土地的强制拍卖，殴打第一位出价者，从而表现自己是当地传统秩序的捍卫者，反对他们所称的“冷血的物质主义”。¹⁵⁷

冲锋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得以成长的关键人物是农业劳动者、后来成为商店主的海因里希·舍内，他于1925年8月加入纳粹党。舍内最初是洛克施泰特营地纳粹地方小组的党、冲锋队及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1929年6月被任命为冲锋队诺德马克地区总队领导人。¹⁵⁸这一任命下达之前的几周，他已经对自己作为纳粹鼓动者的经验做了如下的总结：“在自由土壤上的德国农民比遭到马克思主义者骚扰的城镇人口更容易接受民族社会主义。”¹⁵⁹早期的纳粹煽动集中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西部地区，那

里的农民运动特别猛烈。例如，1929年5月，舍内命令他的冲锋队员在“圣灵降临节”期间乘坐自行车发动宣传攻势，集中于纳粹党仍处在萌芽状态的地区。¹⁶⁰到农民运动开始衰退的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已经确立了该地区农村主要政党的地位，代替了之前强势的保守党和碎片化的“基督教国家农民与农场主党”（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的分支）。¹⁶¹在这个地区，以及其他新教主导的德国乡村地区，如东普鲁士、西波美拉尼亚，或者符腾堡或北黑森农村地区，纳粹党都成为了社会背景的主要组成部分，地位类似于大部分天主教省份的天主教中央党。¹⁶²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农村人民运动已经使农民激进化，达到了参与非暴力反抗、攻击法院甚至投掷炸弹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冲锋队的暴力手法不需要特别的理由。但在其他地方，情况明显不同。事实证明，不像大城市里采用的手法那么具有对抗性，而是积极强调未来的第三帝国对农民的好处，往往给纳粹党带来益处。¹⁶³在大部分乡村地区，冲锋队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频繁地与竞争的准军事组织发生身体冲突，而是利用关系、忠诚度和习惯，不断渗透农村环境。¹⁶⁴为了站住脚，尽管人力和经济手段有限，纳粹分子仍然试图争取那些传统上决定德国农村议事秩序的权力掮客——小学教师、牧师、大农场主以及易北河以东省份的地方贵族——利用他们作为“环境开辟者”。¹⁶⁵因此，这些地区的冲锋队较少招募低阶层人员，而是更倾向于村庄中广受尊重、融入环境的年轻农场主和工匠。¹⁶⁶该党自诩为“保守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政党”，¹⁶⁷代表着传统的德国价值观，但由于魏玛动乱时期的环境所迫，不得不采取比迄今为止统治农村地区的组织更为强硬的立场。

对于任何党派来说，在本地新闻通过口口相传而不是依靠报纸传播的

地区，强大的视觉和实体存在都是成功赢得追随者的关键。正如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皮塔令人信服的阐述：在德国农村的小型社区里，纳粹实现“民族共同体”的承诺不如实际的支持或者未来的个人所得重要。该党提供此类支持的方法之一是从附近城市雇佣成群的冲锋队员作为季节性工人，通常以实物或者很少的钱支付工资。果不其然，对这种互惠行动感到高兴的农民更有可能对该党提出的食物需求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做出善意的反应。不过，随着冲锋队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将免费得到的食物出售，他们帮助贫穷纳粹激进分子的意愿受到严峻的考验。忙于田间的农民们也对穿着制服的冲锋队在工作日外出感到奇怪，这反映了人们的普遍观念——积极的政治活动应该限于周末，不能打扰社区的日常生活。¹⁶⁸最终，当1932年德国失业人数达到高峰时，整个冲锋队像一群乌鸦席卷乡村，以攻击性的方式乞讨和盗窃，连当地纳粹党领导人都将他们的行径称作“雇佣兵所为”。¹⁶⁹

因为冲锋队在许多地方的成员数量开始时并不多，它在小型社区的活动往往限于特定日期和活动。在这些场合下，冲锋队使用轿车、卡车、摩托车和自行车将队员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造成了该地区冲锋队远强于实际情况的印象。两个新组织对这种宣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冲锋队组建下级单位，储备拥有摩托车和私人轿车的激进分子。从1930年4月1日起，这些单位被称为汽车冲锋队（Motor-SA）。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将冲锋队领导人送到党和选举会议上，也可能应召协助培训冲锋队队员驾驶汽车或者摩托车，帮助这些队员通过官方的驾驶考试，而无须支付昂贵的驾校课程费用。除了汽车冲锋队之外，还存在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军团（Nationalsozialistisches Automobil-Korps, NSAK），这一单位

于1931年4月改名为Nationalsozialistisches Kraftfahr-korps (NSKK, 译名同上), 储备愿意承担“运动”临时工作的“摩托化”纳粹党同情者。参加这些组织不要求正式加入纳粹党及其下属组织。相反, 正如纳粹宣传中所鼓噪的, “人与机动车生死与共, 将机动车辆变成政治斗争的武器”是“冲锋队精神”。¹⁷⁰汽车冲锋队和常规冲锋队一起迅速成长, 从1931年10月的100个“突击队”扩充到1932年8月的680个, 有成员26105人。同样, NSKK的成员也从前一年底的300人剧增到1931年12月的1万人。这两个组织不仅为纳粹党执行重要的后勤任务, 还为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的“现代化”形象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而且, 它们使中产阶级同情者可以服务于冲锋队, 而无须参与长时间的游行或者准军事训练。¹⁷¹

1930年到1932年之间, 支持纳粹党的投票者成倍增加, 特别是新教人口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和农业地区。¹⁷²在这些地方, 人们通常相互知晓政治倾向, 为纳粹党投票的人数增加不应看成个人推动的群体现象, 而是“整个社区改变效忠对象”的过程。¹⁷³这是共同努力的结果, 冲锋队和汽车冲锋队的存在增强了效果, 尽管并不频繁, 但他们往来于乡村, 参加利用传统民族荣誉感的示威游行, 并借助当地领导人的影响。不过必须理解, 纳粹高强度的选举活动不仅是外向的、以赢得选民和吓阻对手为目标, 同时在两个方面也是内向的。首先, 选举前几周的高强度活动为冲锋队队员们提供了一系列机会, 他们可以做出个人贡献, 以此证明自己是一名“政治战士”。其次, 这些活动还是控制和训练迅速增长的冲锋队队员的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看到, 20世纪30年代招募的冲锋队队员不仅来自致力于民族主义的群体, 也有许多遭遇经济困境、缺乏坚定政治立场的德国人。¹⁷⁴

1932年4月, 为了上西里西亚的选举活动, 在臭名昭著的冲锋队地区

总队长埃德蒙·海内斯指挥下草拟的有关所谓“宣传风暴”的规定就是这种两面性策略的典范。这些指导方针要求编成5个单位，每个90人，配备自行车和一支军乐队。选举前的一周（1932年4月3—10日），每个宣传单位奉命每天行进30—40公里，至少访问6个村庄。他们在每个村庄停下，分发传单，举行一次小型音乐会，其中传统的爱国歌曲优先于纳粹战歌。在两首歌之间，当地纳粹官员发表简短的演讲。不过，这次农村宣传活动的规定中，大部分都涉及内部纪律。部署之前，每个宣传“突击队”都必须在冲锋队旗队长汉斯·金特·冯·奥伯尼茨（1933年成为纽伦堡—富尔特警察局长）“最严格的控制下”进行为期四天的学习。¹⁷⁵各单位部署之后，每个突击队每天至少一次接受冯·奥伯尼茨和其他乘坐轿车行进于乡间的冲锋队旗队长的评估。夜间的宿营地专门设在同情纳粹的西里西亚贵族名下房产里，但绝不奢华：农舍和谷仓里略加覆盖的地板上睡着8—10个人。¹⁷⁶明令禁止在当地旅馆过夜，也禁止消费酒精饮料。就寝时间定在晚上9时，以“避免冲锋队队员携带女伴或者自行在外闲逛”。地方冲锋队领导层甚至禁止唱“挑衅性歌曲”。¹⁷⁷

宣传“突击队”的实际表现似乎不太可能遵守如此严格的纪律。不过，普鲁士当局很快取缔了这些自行车巡游宣传，当纳粹不顾一切地启动时，当局立即阻止了他们。接下来的几天里，根据加速推进的法律程序，至少有110名“宣传突击队”的冲锋队队员被处以罚款和短期监禁。¹⁷⁸虽然这些纳粹宣传工作实际上失败了，但计划本身表明，冲锋队领导层以严格的服从和纪律约束普通队员。对美学的考虑优先于实际政治氛围，特别是冲锋队队员行进中发出的声音。正如普费弗·冯·萨洛蒙和后来的罗姆所要求的，这些年轻人应该以纪律性和决心打动公众，代表着辉煌的未来



这张拍摄于1928年的集体照片展示了勃兰登堡普伦茨劳附近一个农场里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该农场位于柏林以北大约100公里处。一些站在左边的人穿着便服，其中有一名年轻女子。冲锋队手里拿着扫帚、手推车和干草叉，暗示他们正在农场帮忙。然而，保持干净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就像放在最显眼位置上的水盆和两条毛巾显示的那样。两个穿制服的褐衫队员在马背上摆姿势。去农村“工作旅行”，时间通常在周末，让冲锋队在德国农村地区受到欢迎，但这种活动也有其他目的，如准军事训练和宣传游行。特别是在德国东部各省，一些大型庄园主主动邀请冲锋队单位临时入住。

“卷土重来”，同时作为民族重生的象征，但要求他们和当地居民保持一定的距离。冲锋队员的妻儿禁止加入丈夫和父亲的游行行列，以限制任何形式的亲密行为，或者可能因男人忠诚度发生的冲突。¹⁷⁹他们应该是“党的战士”，一旦披上褐衫，自己的事迹和看法就变得不值一提。这种世界观在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阿贝尔收藏品中的纳粹自传里反映得淋漓尽致。作为纳粹理想的化身、行走和骑车的纳粹广告牌，冲锋队员必须放弃自己的个性。¹⁸⁰



1929年1月27日，柏林冲锋队第一区队成员站在波茨坦附近小镇凯钦附近的水果种植园前。根据这张照片复制时相册中的原始标题，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宣传——“农村宣传”。车上的横幅意为“道威斯计划见鬼去吧”（指1924年制定的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计划）、“先面包，后赔偿”和“阅读《攻击日报》”（戈培尔担任总编的柏林纳粹报纸）。最右边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份《攻击日报》。穿灰色外套的男人是霍斯特·韦塞尔。年轻纳粹积极分子的姿态显示出对自己宣传“成就”的决心和自豪，与周围田园诗般的白雪覆盖的空旷风景形成鲜明对比。

换言之，行进中的纳粹激进分子首先是一种“大众装饰”，社会学家和记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这是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现代生活的主要特性。这种趋势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确实很常见，因为，正是“大众本身——不稳定、流动、易变”，“是提出所有核心政治问题的合适媒体”。¹⁸¹对于克拉考尔来说，这些“大众装饰”最终是理性崇拜的空洞形式，更全面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手法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人类交流的领域中。不过，他声称人类是可以从这个严密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的，不是

通过塑造一个人的身体去损害个人表达（比如他所举的例子——“蒂勒女孩”，以同时如机器般移动身体而蜚声国际的女子滑稽舞剧团），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努力，悟出这些标准化的尝试与资本主义需求之间的关联。¹⁸²

克拉考尔最初的分析没有包括对政治大众装饰形式的讨论。不过，他对蒂勒女孩的描述明显和行进在德国街头的纳粹冲锋队有相似之处。至少从美学角度看，积极分子们的靴子行进时与“工厂中的手”保持一致的程度并不亚于蒂勒女孩的腿。同样按照克拉考尔的解释，身穿制服的“无性身体”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能够形成大众装饰，可以互换而缺乏个性。¹⁸³五十多年前，克劳斯·特韦雷特对法西斯精神的诠释得出了有些不同的结论。对他来说，行进中的冲锋队队员身体及坚定的表情并不是“无性”的，而是一种特殊男子气概的象征。特韦雷特声称，这是应对男性统治、战斗的暴力幻想以及性侵犯快感的“护甲”。¹⁸⁴尽管有这些差异，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纳粹的“身体政治学”是建立在压制自然本能和中产阶级性观念基础上的。¹⁸⁵

1929年起的冲锋队内部教育材料支持这种看法：这些材料声称，要求冲锋队队员生活在更高的层面上，而不是只会从女性身上寻找性快感。相反，冲锋队队员应该“尊敬”德国妇女和女孩、她们的双亲甚至教会。两性之间的吸引力最终服从于正统标准：“任何冲锋队队员都不允许与不穿德国标准服装的女孩来往”，这条规定最有可能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城市里时髦的“新女性”——她们穿着长裤和紧身衣。¹⁸⁶当然，这种人际关系指导方针描述的是理想而非社会现实。但是，它们证明冲锋队领导层试图控制普通队员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性生活。外国观察家（如1933年前往初建的第三帝国旅行的记者费迪兰德·图伊）的评论确实说明，冲锋队员和

女性的关系至少在公众面前是克制的：“似乎缺少一种元素——女性。我只看到一名穿制服的纳粹分子和女友在一起，从他手臂僵硬的程度判断，他多次注视未婚妻。请注意，纳粹运动是非常男性化的，在这方面纯属苦行。”¹⁸⁷

纪律严明的冲锋队一路上似乎不受女性诱惑的影响，或者说与之有足够的隔离，从上述意义来说，这是理想的“大众装饰”，但将分析仅止于此还为时过早。正如克拉考尔注意到的那样，同时代的许多人对流行的生活改革运动特别是韵律操冷嘲热讽，试图将自己从现代生活的要求中解脱出来，放弃理性以重新实现自然与灵魂的统一。¹⁸⁸冲锋队队员们同样不会将自己仅仅看成法西斯政治的装饰品。他们当然因为行军和游行时一同创立的编队感到喜悦和自豪，但并不认为这会降低能动性。从他们的角度看，这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总动员，使个体可以参与民族的集体意志。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民族，现代人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冲锋队队员将这种现代化与经济剥削和社会边缘化联系在一起。因此，法西斯的美学不仅试图利用新型群体编队，还声称为个人提供了在越来越缺乏个性、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共存的某种方案。在人们普遍感觉个性受到威胁的时代，民族社会主义承诺协调逐渐消失的现代自我和所谓“永恒”民族，并提供从过去到光明未来的联系，而“永恒”民族代表的，是以民间传统和种族起源表达的人类过往成就。这最终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同样认为自己生活在过渡时期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但它既不是反现代化的，也不是科技恐惧症。正是戈培尔在1939年初的宣示，最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混合着浪漫渴望和对科技进步及社会工程信仰的态度：“我们生活在一个既有机又如同钢铁般的时代，它并没有失去情感的深度。相反，它已经在现代

发明和科技成果中发现了新的浪漫主义精神。”¹⁸⁹直到1943年，他仍坚持这一想法，公开向听众保证，就连战争中的岁月也是一个特殊的浪漫主义时期——面临贫困的浪漫主义，比过去更艰难、更残酷，但“仍然浪漫。我们这一时代中钢铁般的浪漫主义体现在为伟大民族目标服务的行动和事迹中，体现在我们当成不可违背原则的责任感中。在德国的新氛围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浪漫主义者”。¹⁹⁰

冲锋队暴力的危险

然而，冲锋队所有这些特征——城市里的宣传游行和村庄里的鼓动——都不能完全解释纳粹党整体的成功。1930年左右，民族社会主义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具有吸引力，但如果不是许多与他们不一定有相同观点的人在共和制濒临崩溃时同样没有伸出援手，纳粹也绝不可能攫取权力。实际上，面对迅速衰退的经济局势，以及国会虽未被废除但从1930年起经常被总理布吕宁及其后任绕开的情况，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对纳粹及其政治风格的反对明显减弱了。在数百万人面临生存危机的时代，流行的德国谚语“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怎么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政治不再是品味和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是“街头信誉”、胆魄与直接效果的问题。因此，连纳粹过度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此时也常常被忽视。¹⁹¹大学教师玛格丽特·亚当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她拥有汉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雷尔的门生。亚当自诩为“闪米特哲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声称“1930年9月14日投票给纳粹党的人中，99%所怀的兴趣和希望”——包括她本人——与“该党过度的反犹太意图”没有关联。她认为

纳粹的反犹太思想是魏玛共和国失败的自然结果，但没有感受到其中任何真正的危险——甚至是对犹太人的危险。亚当推断，每个党的计划都比实际上能够实施的更极端，纳粹也不例外。因此，她认为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即便在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统治下也是安全的。¹⁹²

最初对纳粹党表示怀疑的商界领袖此时也对该党怀有同情，特别是该党与右翼保守党派在所谓“哈尔茨堡阵线”（1931年10月11日在温泉胜地巴特哈尔茨堡举行的极右翼组织联合集会）上重新聚首之后。¹⁹³下面摘录的一封信恩斯特·布兰迪私人信件表明了德国重工业领袖的典型想法。布兰迪是矿业协会主席，该协会是在鲁尔采矿业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这封信是写给他住在纽约的一个儿子的，日期是1932年3月初——哈尔茨堡集会前几个月，德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几天，在这次选举中，兴登堡、希特勒和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竞争总统职位，布兰迪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描述是：

最为重要的一项运动。它首先是对从战争中期、战争结束和革命直到当前的政治发展普遍不满的表达。这是一场决心发挥德国人优良传统品质、技能水平、责任感和道德廉洁的运动，所有这一切都纯粹是在民族基础上进行的，因为他们（纳粹）正确地……将民族、祖国看作是最强大的道德驱动力。¹⁹⁴

到这个时候，布兰迪和多名同事已经以可观的捐款支持纳粹党及其地方党魁，最重要的捐赠对象是纳粹埃森大区领袖约瑟夫·特博文。¹⁹⁵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从冲锋队得到“对抗工人阶级政党的保护”，使他们从对左派的让步中解脱出来，在行动上独立于不稳定的国会多数派。¹⁹⁶褐衫军也

不失时机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决心和力量。巴特哈尔茨堡集会后仅仅一周，来自德国中部的冲锋队在人口将近15万的不伦瑞克城附近举行大会。在这一场合下，6万名冲锋队几乎“占领”了这座城市，除了在希特勒在场的情况下举行长达6个小时的游行之外，还参与对当地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惩罚性袭击”。¹⁹⁷对布兰迪来说，纳粹党的立场也与他自己的德国“精英经济”概念相适应。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培养德国荣誉感，还有民族军事传统”，他向儿子解释道。“它已经做好准备，摧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根源和分支，决心代之以私营企业、纪律和精英领导层为基础的全民高福利体系。”¹⁹⁸

1932年春季对政治与经济局势的这一评估是目光短浅的，但清楚地表明纳粹党与相当一部分德国大企业之间的临时联盟不仅是策略性的。¹⁹⁹纳粹在以野心勃勃的道德与社会复兴计划表明自己是另一股政治势力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即使在一封不太可能受到策略考虑影响的私信中，布兰迪也没有掺杂关于纳粹反犹太主义宣传的关键词。他似乎已经接受了纳粹的街头暴力，将其视为合理或者至少受欢迎的手段，可以弱化（理想情况下可以摧毁）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显而易见，这封信反映了布兰迪的个人观点，但在本书的研究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在政治危机的不断威胁下，布兰迪、亚当和许多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放弃了最初对纳粹及冲锋队的保留意见。冲锋队丑陋的宣传口号和咄咄逼人的暴力行为并没有从街头消失，但德国人已经习以为常。据说，汉堡的小学生发明了一种新游戏：用棍棒和石块重现共产党人和纳粹冲锋队之间的冲突。至少在一个案例中，警察介入是阻止这种游戏失控的唯一手段。²⁰⁰许多德国精英人士认为街头暴力频发是敌对政治气氛的可悲特征，甚至是“政治堕落”的

标志之一，²⁰¹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风潮、经济危机的暂时性症状，不会带来持久的影响，或者只是士气低落的成年人玩的一场“小孩把戏”。

相比之下，纳粹领导人以真正的军事术语描述这一时期冲锋队的积极活动。据冲锋队智囊恩斯特·尤雷克·冯·恩格尔布雷希滕所言，1929年“秋季攻势”是1930年“突破之战”的先声，此后则是1931年的“推进”。²⁰²尽管使用了这些军事术语，但许多学者警告，不要将政治演说与历史事实混为一谈。他们声称，1932年的德国远没有陷入混乱和内战之中。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伦格最近援引理查德·贝塞尔、德克·舒曼和伯纳德·富尔达先前的研究，在他关于现代欧洲大都市的专著中总结了这一观点，论据有三：首先，他声称即使在1932年，德国各州对暴力的垄断并没有遭到严重威胁。其次，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水平低于一战刚结束的时期——这暗示着，由于共和派当时并没有屈服，因此在1933年暴力也不是它最终失败的必要条件。最后，他坚称与其他欧洲城市相比，德国首都的暴力程度并不是特别高。²⁰³

然而，经过仔细的研究，这三点都不能支持伦格的主要论点。对于第一点，关于魏玛时期警察、军队和德国犹太人的自由主义环境的区域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1930—1932年是一个内部侵蚀的时期，国家成功地捍卫了对暴力的垄断这一说法是肤浅的。²⁰⁴20世纪30年代初，离普鲁士及其首都越远，如下的现象就更明显：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来表明对政治极端分子的强硬立场，尤其是动用警察和军队粉碎其示威活动，都越来越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是民主派对1932年非法的“普鲁士政变”和次年第三帝国建立没有系统性抵制的主要原因之一。²⁰⁵至于伦格的第二点论据，必须

强调，1930—1932年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与1919—1923年有根本的不同。没有任何绝对的暴力容限能够决定一个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相反，政治暴力与暴力犯罪的程度只是需要一同分析的多个因素之一。在国家政府依靠紧急法令，似乎无法应对大量失业和空前贫困化趋势的时期，街头暴乱和政治攻击比20世纪20年代初更为重要——特别是在规模庞大、组织得当的纳粹草根运动利用这一因素的时候。²⁰⁶最后谈一谈伦格的第三条论据，对比柏林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深入分析确实有益，但不足以作为国家层面结论的基础。戈培尔的“为柏林而战”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但实际上只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夺权的事件之一。尽管魏玛共和国是在首都走向其坟墓的，但它的瓦解并不是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情。

魏玛德国的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非常了解几年前战争刚结束时出现的危险，即便对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这种高度象征性的威胁，他们对其危险性的理解也远比一些后来的历史学家更深。后者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出发，对发生的所谓“大规模的媒体恐慌——由媒体诱发的、在政治上有灾难性影响的过度反应”大惑不解，指责“过分偏颇的新闻报道”造成了“无法控制的暴力活动”的虚假印象，从而暗示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暴力采用更克制的处理方法，可能避免事件升级。²⁰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观点沿袭了将魏玛共和国的最终失败归咎于社会和政治精英的传统，这是战后几十年里盛行的论调。²⁰⁸然而，应该记住的是，历史进程证明，同时代各界（从右翼革新派到左翼的共产党人）日益强烈的警告并没有错，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将1930—1933年的政治局势视为潜在或者初期内战，这些人很快就遭到监禁、拷打、放逐或者杀害。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新的德国总理，冲锋队自称与

“遭人痛恨”的共和国之间的战斗戛然而止。纳粹党度过了前几个月发生的严重内部危机，但也失去了一些最为忠诚的支持者。该党领导人知道，他们此时面临着兑现承诺的巨大压力，迫不及待地利用了首都壮观的菩提树下林荫大道——德国皇帝及皇室的正式检阅场——宣示其政治野心。1月30日晚上，15000名褐衫军列队通过勃兰登堡门，向希特勒致敬，后者则从靠近帝国总理府的一扇窗户向他们示意。²⁰⁹因为这次游行是在一个灰暗寒冷的冬日里匆匆组织的，这一活动留下的印象没有预期的那么壮观，促使纳粹党在几周后重新举行了游行活动。真正的支持者无疑为新总理的登场欢呼，但一位细心的柏林居民也亲眼看到，冲锋队员以重击背部的方式强迫好奇的城市居民向希特勒致意。²¹⁰不过，正如保存下来的1933年1月30日晚上德国科隆广播电台解说稿所表现的，广播听众没有机会感受到纳粹胜利游行的这种矛盾特性。电台播音员就像第一个小时出场的激进分子一样吟诵道：“10万支火炬在威廉大街上挥舞……他们列队经过勃兰登堡门，那是冲锋队的褐色队列——一场损失巨大的漫长战役的胜利者。他们举着如鲜血一般火红的旗帜，上面有白色背景的卐字——象征着初升的太阳！多么不可思议的辉煌景象！”²¹¹未来几个月的官方基调就这样定下了。

第3章 青少年的“褐色崇拜”和魏玛共和国的暴力活动

法西斯主义要求人们保持积极，以全部的精神投入行动。

——贝尼托·墨索里尼和吉奥瓦尼·泰梯利

《法西斯主义》（1932年）¹

“不应该低估希特勒在年轻人中的支持度，我们不应该低估对手，而应该意识到这么多人的心理力量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在激励着他们。”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既尖锐批判民族社会主义，又认真地观察他所在的时代，早在1924年4月的知识分子周刊《日记》上就发表了上述警告。²近距离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慕尼黑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动乱之后，布洛赫对早期纳粹党、该党的宣传及与日俱增的吸引力都非常熟悉。这一特殊的批判性言论是对1924年4月1日所谓“希特勒审判”结果的直接反应，他警告读者们，不要以为这位巴伐利亚当地极端民族主义领袖的故事已经画上句号。布洛赫认为，仅靠讽刺和厌恶不足以和民族社会主义做斗争，因为“除了可憎的旁观者和共犯，新一代青少年在核心里闪耀着光芒，这是精力充沛的一代人。17岁的孩子们满怀热情地响应希特勒。再也没人能够认出那些苍老、沉闷、沉湎于裤子上的褶皱、时常喝得烂醉的学生，他

们的心怦怦地跳动着”。³

布洛赫的评论道出了一个根本问题的核心，每部关于早期纳粹运动的历史著作都必须讨论这个问题：一种政治形式的基本情感吸引力，这种政治形式以暴力作为团体组成的核心要素，在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及外部人员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正如前文所述，暴力的使用——不管是真实还是象征性的——尽管在其使用上还有各种实际的限制，但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就是富于侵略性的纳粹政治学的核心要素。在本章中我将论证，结合一些从理论上说明暴力活动历史的最新发现，形成更为广泛的观点，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我的观点不仅仅聚焦于纳粹运动，还以两战之间的政治文化为背景，考虑了我称为冲锋队“青春与暴力崇拜”的影响。

战时的经历——个人经历、各种老兵协会的回忆以及文学和电影中的文化升华——形成了两代欧洲男性的看法。⁴除了真正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之外，年轻一些的人也深受兄长和父辈命运及故事的影响。德国在这方面与意大利没有任何不同——在意大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效仿长辈，信奉法西斯主义。他们迫切地“渴望行动”，“伴随着家庭纽带的深刻危机”，也伴随着成人权威特别是男性权威的危机。⁵冲锋队越来越重要，既是德国政治日益军事化的结果，也是其先决条件。这一进程有多个维度，其中许多都超出了纳粹党的范畴，甚至超越了国界。⁶换言之，本章的目标是阐述冲锋队逐步增强的吸引力，这一发展与数百个与之竞争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命运有着显著的不同，后者通常只存活短短几年，政治影响力也十分有限。除了有助于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流行的几个得到确认的因素之外，我还将论证，正是“青春与暴力崇拜”——这并不是冲锋队发明的，

而是他们成功制度化的——对该组织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成功做出了贡献。⁷冲锋队在1928—1932年发展成为享有社会运动特征的组织。除了美学上的吸引力之外，这些特征是它对公众吸引力的要素。⁸这两个要素都有助于整个纳粹运动的“年轻形象”。在这几年里，冲锋队还成长为德国军队的合适伙伴，与其一同努力克服《凡尔赛和约》的限制。褐衫军狂暴的激进主义思想甚至为试图反击时代“邪魔”的年轻基督徒们提供了榜样，与这些“邪魔”关联的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流行词。

每位传记作者都应该意识到不自觉地以主观印象作为基准诠释其他所有社会现象的危险。同样的风险也适用于集团的历史，特别是冲锋队这种世界观极端自我参照的组织。因此，本章为纳粹的内部视角提供空间，但谨慎地以区分如下两点为目标：一方面是思路与情感，另一方面是该党对当时“实际”政治发展常常相对有限的影响。而且，我尽可能地整合对照的观点，比较纳粹激进分子和其他准军事党组织。虽然这种具有法西斯运动特征（但并不仅限于这种运动）的“新激进主义政治风格”是欧洲两次大战之间的常见现象，⁹但从跨国视角出发针对德国冲锋队独特之处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这里选择的多层面方法有助于确定冲锋队“成功”的原因——这种成功不仅促进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格，使个人的努力——“行动”——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要素，而且为1933年建立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

好斗的男子汉气质

虽然从1926年起，纳粹军队中的最高领导职位交给了退役军官——也

就是一战老兵和之前的德国军队职业军人——但事实证明，冲锋队对尚未经历战争的年轻人最有吸引力。¹⁰这一年龄段往往被称为“战争中的青年一代”，由1900—1910年出生的年轻男子组成。这个词因右翼知识分子恩斯特·金特·格林德尔1932年的著作《年轻一代的使命》而流行，后来从一个政治斗争名词变成历史分析的一个类别，但是这种转变的问题本质和包含的性别偏见很少得到承认。¹¹此年龄段的男子曾经在学生时代接触无所不在且往往情绪激烈的德国战争宣传，深受德国英雄主义和战场牺牲故事的影响。¹²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冲锋队积极分子。但是，考虑到魏玛德国准军事和右翼青年组织的数量，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男性青少年认为20世纪20年代各种“自由军团”和民族主义联盟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机会，可以“生活在对浪漫勇士的狂暴幻想之中”或者履行为民族大业而战的职责。¹³这些年轻狂热者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将接受召唤、继续父辈1918年未竟的事业——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父辈是被后方不忠诚的德国人“背后捅刀”，才被盟国军队解除武装的。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决心阻止更多的民族耻辱，或者更糟糕的情况——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他们形成了“极端好斗的男子汉次文化群体”¹⁴，推动着冲锋队1934年之前的发展。

慕尼黑的案例仍然具有启发性：正如第2章所述，1919—1920年巴伐利亚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与严重的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造成民族主义者和巴伐利亚排他主义者将对军事失败和后续民族“耻辱”的愤怒和羞耻感发泄到他们认为的“内部敌人”身上。对“布尔什维克”、普鲁士人、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憎恨形成了一种背景，年轻人狂热的激进思想可以据此解读为“捍卫祖国”。这种观点早在1919年就已确立，当时巴伐利亚的新国防军宣布，慕尼黑学生对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是必不可少

的。人们认为，所谓的“学生连”——慕尼黑、维尔茨堡和埃朗根由学生组成的军事部队——特别忠于逝去的德意志帝国思想及价值观。1919年夏季，全国的此类学生军有大约5万人。¹⁵在军队的眼中，这些年轻人仍然没有受到所谓平民化道德的“腐败影响”，但真正战斗经历的恐怖与苦难已经唤醒了他们的幻梦。因此，他们的理想主义思想很容易转化成对“内部敌人”的反对。1919年2月21日，巴伐利亚州总理库尔特·埃斯纳遭到刺杀，一群慕尼黑学生报之以欢呼，说明连政治谋杀都没有被看成完全不合法的现象，上述策略似乎更有前途了。¹⁶

准军事激进主义是魏玛共和国初期慕尼黑学生生活的关键元素，这和中欧其他大城市类似，最显著的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¹⁷但即使在政治较为稳定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准法西斯党派“法兰西行动”的青年组织“保皇队”在20世纪20年代也招募了巴黎拉丁区的许多学生。¹⁸停战之后很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宣传仍继续在中欧年轻人中形成反响。他们中的许多人感觉，个人和集体生活都是由不断的战斗组成的。这带来了危险，但也包含着个人提升和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德国公共机构支持这种战后的青年理想主义。慕尼黑大学理事会于1919年5月正式宣布，服务于国家是每个学生首要也是最高尚的职责，学习只能排在第二位。1919年夏季开学时间延迟，这是对相当一部分学生服兵役的尊重。与魏玛国防军协商之后，大学理事会同意只在周一到周四上午授课，这样学生们就可以在此后的三天半里参加军事训练和演习。¹⁹即使在战争时期没有接受军事训练的男学生，现在也需要熟悉军队的精神世界，学习基本的作战技能。

事实证明，大学为1920—1923年第一批纳粹冲锋队的组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对一些冲锋队早期成员来说，第一批冲锋队单位的活动只不过是

他们1919年准军事学生经历的延续。随着德国社会活动慢慢“正常化”，巴伐利亚本土防卫组织吸收了上述准军事组织的重要部分，这样的军事化生活方式很快就只存在于最极端的政党，如德国工人党（DAP，即不久之后的纳粹党）。²⁰当然，学生在早期的冲锋队只占少数，但他们是冲锋队成员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影响力超出了在统计学上的比例。警察截获的早期冲锋队登记资料中列出了144个与职业有关系的名字，其中11个登记为“学生”（出生于1897—1905年），另有多人为“未成年学生”。²¹法兰克尼亚第一支当地冲锋队的领导人古斯塔夫·施泰因贝克是一名24岁的学生、前海军士官。²²慕尼黑冲锋队第11“百人队”从1923年起由鲁道夫·赫斯（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副手）指挥，据说当时完全由学生组成。²³

但是，仔细观察会促使我们在从这些例子中得出结论时更加谨慎。至少在截获的名单上，“学生”似乎是自愿接受的头衔，更多地与个人社会与教育背景有关，而不是真正的职业。²⁴1921年9月，刚刚被任命为冲锋队负责人几周的“法律学生”克林奇接受了巴登当局的审问，他解释道，从海军退役之后（表面日期为1921年6月2日），他在博尔库姆的东弗里西亚岛度过了学习开始前的假期。该岛位于德意志帝国的西北端，从19世纪起就以反犹太海滩度假胜地而闻名²⁵——克林奇深知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告诉当局的是，作为一名海军中尉，他曾在1918年企图阻止该岛的军官食堂升起代表革命的红旗，并因此被后来的新国防军海军拒之门外。1919年初，他返回柏林以北滕普林市享有盛名的新教高中——约阿希姆斯塔尔高中，在那里参加了所谓的“战士课程”——为退役军人准备“战时高中毕业证”考试的课程，这种毕业考试相对不那么正规和严格。克林奇在学校里继续他的保守主义鼓动，是1919年1月26日组织非正式“皇帝生日聚会”的

推手之一。²⁶

根据1921年9月的证词，克林奇在几个月前搬到慕尼黑，目标是学习法律和社会科学。但是，新学期在10月前尚未开始。夏季的几个里，克林奇参加了纳粹党的会议，他将这一活动当成另一个学习课程：“那里倡导的思想令我着迷，以至于我把学习都限制在那里涉及的问题上。我全身心地投入对付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问题上。”²⁷克林奇只在1921/1922年的冬季学期和1922年的夏季学期就读于慕尼黑理工大学，此后就退学了。²⁸他在这几年的主要活动是担任纳粹青年组织的全职教员和准军事组织中的参谋。

对于其他曾在不同大学就读的早期冲锋队领导人，学习的严肃性同样值得怀疑。迪特里希·冯·雅戈在1921年秋季顶替克林奇担任冲锋队临时头目，于1922年1月底搬到蒂宾根，不久以后登记成为埃伯哈德·卡尔斯大学的客座讲师。到1922年2月，冯·雅戈还成为了城里历史悠久的奥西安德爾书店的实习生，该书店此时属于两名退役海军军官，他们也同样曾是埃尔哈特旅的成员。²⁹但是，冯·雅戈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与藏书无关。希特勒派他到蒂宾根任符腾堡冲锋队参谋长，以便帮助发展该地区萌芽状态的冲锋队并加以监督。1923年4月，蒂宾根的纳粹分子以“非政治远足俱乐部”的化名行动。³⁰

事实证明，传统的大学城蒂宾根是符腾堡纳粹运动成长的有利场所。退役军人、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许青格升任萨克森州警察局长，后来成为“帝国战旗”领导人之一，他早在1926年就指出，在蒂宾根，“顽固的小镇教授们”正用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德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许青格抱怨道，当地书店的橱窗里，鲁登道夫的回忆录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摆在“各种被大都市唾弃的拙劣的德国反犹太主义书籍旁边”。³¹在1925年，大

学生们与“帝国战旗”组织发生冲突，就已经标志着蒂宾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发生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帝国战旗”组织企图保护与演说家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的会晤，贡贝尔是一位研究魏玛政治暴力的统计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³²当地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基层组织在1926年就已经在埃伯哈德·卡尔斯大学建立；接着是1929年，成立了一支真正的冲锋队学生“突击队”。³³

20世纪20年代，相当一部分属于“战争中的年青一代”的纳粹与冲锋队领导人摇摆于党政工作和课堂之间。³⁴他们不仅促使更多德国大学学生在政治上极端化，还将传统的学生领导权力转移到由更广泛德国男性群体组成的冲锋队。克林奇等年轻中产阶级冲锋队领导人，以及冯·雅戈这样具有贵族背景的人，都自视为即将出现的“民族共同体”的先驱。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精英，不信任准军事规则，而是“民众中最有能力的人”的领导，他们还声称已经得到了（仍然沉默的）大多数民众的支持。³⁵这些信念使他们自诩的德国男性青少年教育者角色变得合理，他们试图使青少年远离“酒馆、纸牌游戏、饮酒和街头的危险，以及不道德的非德国化文学及艺术”。³⁶尽管这种纲领性声明与许多冲锋队“突击队”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冲锋队的意识形态是以1914年前青年运动的主张为基础的。两者都强调“纯粹”是人类与社会进步的前提，但追求的目标有根本的不同：德国青年运动与德国“文化资产阶级”的理想一致，认为进步可以通过让青年男女成长为身心“健康”的个体来实现。³⁷相反，冲锋队员认为这首先是成功地重新武装德国男青年的前提。年轻男子参与拳击和柔道训练；学习军事条令、作战技巧和武器使用；以及纳粹深化其对“故土”和德国特性的“爱意”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目的：在新一代德国人的心中注入

复仇思想。³⁸纳粹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冲锋队领导下的新一代将掌握民族命运，“反击”国内外敌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法国人及英国人。³⁹

自称为“战争中青年一代”的这些人 and 1914年之前的青年运动成员都有共同的信念——一种新的“精神”和“理想”必将战胜现代资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极右翼分子中很常见，甚至和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形成了共鸣。⁴⁰1930年前后，政治青年之中产生了一种跨越党派信念——以政治自由化和国会制度为支柱的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一个时代行将结束，我们必须从心理上对其进行清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卡尔洛·米伦多夫在1932年发出了有力的呼喊。⁴¹真正的民主——代表人民真正意愿而非敌对阶级利益的民主，将依靠不同的手段实现。米伦多夫与志同道合的政治家、政治作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制”，这种制度不是通过正规程序合法化的，而是来自“真正的政治领袖”与其追随者们想象中的有机纽带。⁴²“今天，没有人愿意翻越议会体制设置的障碍，年轻人当然更是如此”，与米伦多夫同党派的奥古斯特·拉特曼如是说，他有些荒谬地强调，民主只能依靠“不同的代表和政府体系”拯救。⁴³

魏玛共和国晚期，流行的战斗口号“让路吧，你们这些老人！”就这样得到了强有力的新鲜内涵。纳粹“加剧了现有（从世纪之交就盛行于德国）的代际紧张关系”，并将其转到有利于自己的一边。他们实际上利用了年轻反叛者最初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渴望，先将其转化为该党的一种宣传手段，接着从1933年开始，将其变成所谓“年轻人支持第三帝国”的信号。⁴⁴从1929年底开始介绍冲锋队组织及价值观的一本综合小册子甚至声称，冲锋队领袖的任务是根据民族社会主义理念，为队员们提供更高的

生活意识。⁴⁵所有在实践中接受这些理念的人都被要求将自己看成新的德国精英阶层成员，他们团结在一起依靠的不是社会同质性，而是信仰与归属感。因此，从慕尼黑的初期开始，冲锋队领袖就要求队员们“视彼此为兄弟和真正的同志，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和贫富”。⁴⁶

女性纳粹激进主义

上述的“兄弟情谊”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女性，是冲锋队员中引起激烈辩论的问题。最近，安德鲁·瓦克尔富斯强调女性“在冲锋队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遭到忽视”，她们帮助男性“穿衣吃饭”，并在他们生病时加以安抚。但是，他也提到女性只能在纳粹运动中得到“有限的地位”，因为她们往往被阻止体验“战斗”，从而无法要求与男性伙伴相同的待遇。⁴⁷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虽然女性没有被正式排除在冲锋队之外，但很明显这是一个由男性创立、也是为男性而创立的机构。纳粹冲锋队条令（1926年9月17日生效，1927年5月31日略作修改）第6条定义了“女冲锋队员”的职责，将女性纳粹积极分子的活动限制在为冲锋队员提供支持，更常见的工作是维护他们的社会福利。帮助贫困的党员、为出差的纳粹同僚提供给养以及在圣诞节分发礼物都是职责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制作旗帜、衬衫、帽子和党员徽章。⁴⁸与民族主义组织“钢盔团”在1931年直截了当地说明“我们的妇女不应该积极投身政治”⁴⁹不同，民族社会主义者只是简单地宣布，传统的女性工作形式都是政治。纳粹党意识到，它必须将触手伸向女性，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支持，但创立纳粹党的“聪明人”在早期对合格的女性纳粹社会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则毫无头绪。⁵⁰

这些“女性”任务对妇女的吸引力有限，不仅与对男性同事更加积极的要求相比是如此，与该党其他过分华丽的辞藻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社会学家特奥多尔·阿贝尔1934年收集的一些女性民族社会主义狂热分子的自述所示，她们实际上和男性同事有着类似的价值观，以完成与其相同的任务而自豪。⁵¹女性纳粹分子不反对该党提出的正式要求，愿意投入福利活动、为男性同志提供后勤支援，为“运动”做出贡献，但她们带着最大的热忱描述的，却是带有“男子气概”的活动。例如，来自柏林的希尔德·伯姆-施托尔茨自称“追求种族真实、纯洁灵魂的战士”，她声称自己不再有任何业余时间了，但觉得加入民族社会主义“战士”的行列是一种褒奖，按照她的说法，这是“完全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运动。⁵²孀居的赫塔·冯·罗伊斯同样强调，当她在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巴伐利亚各省纳粹组织早期成员参加“战斗”时，经历了许多幸福时刻。在几年后写下的文字中，她提到自己因为在其“政治右翼的家庭成员中得不到理解”而孤独地成长。迁居到柏林的冯·罗伊斯深情地忆起在“蚂蚁”“黄蜂”和“熊窝”等著名纳粹巢穴度过的夜晚。她曾在那些地方准备和分发用于面对面传播纳粹思想的传单。⁵³最后，比她年轻得多的马莱娜·赫德以类似的口吻描述自己在纳粹活动中遇到的“危险”时刻，这位来自北黑森克莱嫩格里斯村的姑娘1929年15岁时就接触了纳粹运动。尽管朋友和家人一直不能理解，她仍然声称，自己不仅对纳粹事业保持着忠诚，甚至参加了在卡塞尔城举行的危险的“红色会议”（实际上是“德国和平协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作为著名的纳粹支持者，赫德自称在村里“从未安全过”，每晚都受到骑自行车尾随她的对手们的骚扰。她还声称，曾险些被从邻居窗户扔出来的原木砸中。⁵⁴

尽管这些叙述的真实性成疑，是为了证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献身”而制作的，因而充满了宣传性的陈词滥调，⁵⁵但这些自述都表明，虽然女性纳粹积极分子履行的是该党分配的从属任务，在她们的感情上引起最强烈反应的却是那些与男性同事一起参加的活动和经历，比如暴露在身体伤害、殴打和唾骂的危险之下。这一评估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史学观点——纳粹街头政治首先是男人的事情，女性仅限于辅助角色——并不冲突，不过，它确实改变了关于女性在街头政治中处于被动的长期观念，这一观念在共产党身上已经成功地受到了挑战，但却没有同样地扩展到民族社会主义者。⁵⁶女性纳粹积极分子向往参与政治斗争的各个方面，不过采取的是适合女性的道路。⁵⁷1940年，冲锋队宣传者汉斯·施尼克斯的妻子洛蕾·施尼克斯断言：“我们在伙伴和自己身上体验到了冲锋队的精神。”⁵⁸在某些情况下，“冲锋队母亲”（纳粹的一种爱称，指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些成熟女性，她们照顾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冲锋队男青年）和受到她们照料的人之间的紧密纽带持续到了死亡之后。马格德堡一座纪念该城“老战士”的纪念碑表达了这种期望：1931年庆祝60岁生日的“冲锋队母亲”贝尔塔·魏因霍贝尔将长眠于她的“孩子们”左右。⁵⁹

不管政治偏好如何，魏玛共和国的女性（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持有这样的观点：19世纪“伪善的小资产阶级道德观”将妇女禁闭在家庭环境中，不是她们未来生活的现实选择——至少不能被迫承担这一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回归”家庭守护者和母亲的角色对女性不再具有吸引力。中低阶层者特别同意上述观点，她们受到魏玛时代晚期社会流动性下降的影响最为强烈，在那个时候，阶级归属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明显地决定了男女角色的观念。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初，女性只有

在自主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认为这种“回归”是可以接受的。20世纪30年代末女学生数量的显著上升表明，人们普遍认为第三帝国强迫妇女回归家庭，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既低估了女性的“自我意志”，也低估了纳粹政权对性别的矛盾看法。⁶⁰

情感需求的满足

冲锋队领袖极其大胆的自我认知很自然地招来了政治对手和知识界的蔑视和反感。1925年，弗朗茨·施魏尔冷淡地写道，纳粹对持异议者的恐怖活动造成了普遍的厌恶——尤其是，“新公众情绪指导方针的实施者大部分不属于经验上进行这种工作的年龄段”。⁶¹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只有纳粹思想家才过度信任男青年从根本上改变所处社会的能力。前文所述的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许青格在1925年同样强调，德国青年是“新的种族”，“在世界大战的熔炉中成形，焕发着革命精神，由我们的新国家锻造成男人”。许青格坚持认为，这些年轻人具有理想主义思想和充沛精力，是为新国家而战的“突击队”，不应该将其留给极端民族主义者，而应该引导其参与民主制度的复兴。他想象，这种复兴不是通过改革而是通过革命和战争实现的，他表达这一信念的口号有时与纳粹的辞藻难分轩轾：“让我们为这个国家的战斗做好准备！”⁶²

20世纪20年代的冲锋队最初只是参加这一“战斗”的许多组织之一。他们得益于早期纳粹运动与魏玛共和国的根本对立，因为他们无须像当时的其他青年政治组织一样，为了策略目的而妥协。⁶³普费弗·冯·萨洛蒙和后来的罗姆实施的内部改革造就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很

好地利用了对草根阶层的动员。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关注相对新颖的“情感历史”研究的人⁶⁴——将“情感”“魅力”和“信心”作为分析大众政治学的关键词。这种分析角度确实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相当一部分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年轻人受到第二冲锋队吸引的动机，特别是与20世纪70年代起的一条研究道路结合起来，这条道路首先全面分析法西斯主义，然后将民族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研究。⁶⁵这些研究表明，两次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并非来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来源于参与和刺激。

1932年，24岁的里夏德·F. 贝伦特是第一个倡导此类观点的学者。在前一年获得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贝伦特返回柏林，那是他成长的地方，现在他可以近距离见证魏玛民主制度下的最后几次动乱。⁶⁶贝伦特的成果是关于同时代政治激进主义形式和起源的一本原创书籍，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⁶⁷受到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如罗伯特·米歇尔斯、赫尔曼·施马伦巴赫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贝伦特有力地指出，这个现代国家（德国）发生的危机是各个机构无法满足人民情感需求的结果。因此，他声称这一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已经提高，并将继续提高。贝伦特以弗洛伊德学说的语言说道，政治甚至将成为一个“固着的对象”。只有参与政治，才能使觉得自己无家可归的个人避免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⁶⁸集体（政治）行动能够吸收个人的“自由性冲动”，从而满足他（或她）。只要现代社会不允许个人确立与某个整体（或者想象的整体）的纽带，由集体活动定义和维系的特定组织将参与到相互对抗的斗争中。⁶⁹

贝伦特认为，允许这些组织实施攻击性行为，不管这些活动涉及何种意识形态，都将使它们的成员得到“情感实现”。⁷⁰他认为意识形态不过是策略性的政治理由，或者个人层面上事后的合理化解释。通过集体暴力行为

组织纽带的理想框架是由魅力型领导人指挥的“联盟”。不过，这样的联盟可能只需在有限的时间内存活：它始终是（亲密的）社团组织和（无明显个性的）社会之间的过渡形式。⁷¹因此，联盟的成员不可避免地自视为“新势力”或者“精英阶层”的成员，与现有社会及政治秩序分道扬镳，赞美一种未来秩序的建立。他们必然渴望冲突，因为个人的成功与成就只能通过行动实现。然而，贝伦特称政治“行动”不一定能转化为传统标准上的政治“成功”。按照他的看法，魏玛德国的政治暴力——街头、酒馆和厅堂里的斗殴和暴乱——就是终极目的。这是允许表达最强烈情感的政治领域，类似于当时群众体育活动爆发出的“体育狂热”。据贝伦特说，两次大战之间的军队以类似于街头恶棍的方式处理政治事件，利用大众体育竞技的情感来实现个人目的：测试他们的体力，作为刺激、赋权和最终自我提升的手段。⁷²

只要人们意识到这一观点阐明了冲锋队的某种（而非所有）社交形式，那么以此方式分析纳粹冲锋队的活动就是有益的。例如，贝伦特的书中遗漏了对这些“政治”激进主义形式如何影响和帮助塑造同时代政治组织的反思。他的方法论最为重要的优势在于使学者们没有必要解释，1930年前后粗糙的纳粹意识形态是如何一夜之间吸引数十万德国男性的。即使警惕的犹太自由主义周刊《中央联盟报》也提到，不应该将纳粹在1930年9月选举中取得大胜解读为对该党反犹太主义信条的普遍支持，而是数百万选民陷入“最深的绝望”的一种迹象。⁷³长期的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当然接受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包括狂热的反犹太主义，但对于许多冲锋队普通队员来说，这一运动起到的组成“情感共同体”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些共同体可以表达绝望、仇恨等情感，并鼓励使用暴力。⁷⁴正如上一章中的

分析，随着经济状况恶化，这种共同体建设方式对“普通”德国男性和女性越来越重要。

贝伦特的书于1932年底出版，距离纳粹掌权只有几周的时间。今天，这本书已经被完全遗忘了。采用类似解释模型的较新研究强调，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冲锋队已经转变为一种真正的社会运动；因此，它成为了此类草根激进主义运动的范例。然而这种分类方法是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有影响的社会学家约阿希姆·拉施克将“社会运动”定义为“动员起来的集体行动者，以高度象征性的整合和简单的角色规范为基础，应用灵活的组织及行动方式，追求根本社会变化的目标”。⁷⁵很明显，冲锋队至少在1934年之前满足上述标准中的大部分。首先，作为一个组织，特别是在1929—1934年，它成功地动员了群众支持纳粹运动。其次，尽管不断进行内部重构和领导层更迭，且有短期被宣布为非法，但它是持续运作的。最后，冲锋队明显是一个促进根本社会变化的组织。冲锋队的主要目标不仅是摧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秩序，代之以“能够更好地处理德国内外部问题”的独裁政府，而且还鼓动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真正社会包容的“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模糊现有的阶级差异。

如果按照上面定义的标准衡量冲锋队，有疑问的元素是“低角色特异性”，或者在社会运动中只存在模糊定义的角色。冲锋队的组织与纳粹党类似，根据的是“领袖原则”，不同的职务很灵活。显然，有些冲锋队员在短期内就有了了不起的成就，而其他一些人则在几周后就退出了。不过，冲锋队作为具有等级制度的组织，定义了不同的角色——普通队员无权修改这些规则。冲锋队中层领导本应是队员的楷模，在履行职责时当然拥有权威，但即便他们最终在改变冲锋队等级制度及组织方面权力也非常有限。

他们必须同时领导和服从，而且没有明确地受邀参与塑造冲锋队组织的过程。这就是拉施克难以确定冲锋队是不是典型社会运动的原因。有时候，他将冲锋队描述为“极权主义运动”，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大批狂暴群众的自发活动嵌入一个稳定的组织框架中。⁷⁶

历史学家斯文·赖夏特后来采纳了拉施克的定义。他毫无疑问地将冲锋队定义为一个社会运动，特别强调社会运动和法西斯运动共有的四个要素：首先，形式松散但仍有效的组织结构；其次，内在的活力；再次，政治共同体的某种“紧密性”；最后，对流行政治制度的激进立场。⁷⁷虽然赖夏特也告诉读者，拉施克定义的各个部分并不都适用于冲锋队，但没有明确地讨论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解决方案。相反，他重复了拉施克的主张——“社会运动不拥有常规的成员结构，也不提供解决内部问题的制度方案”，尽管这两个条件也不适合于冲锋队，因为它有常规的成员名单和仲裁权。⁷⁸当然，纳粹党和较高级冲锋队指挥官的优势在控制手下时会遇到困难，特别是在1931年和1932年，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冲锋队最高领袖（OSAF）和慕尼黑党总部施加的决定性影响。

在这个时候，重新阅读贝伦特1932年的著作最为有益，因为他广泛地论述了社会运动中的领导问题。将他的思路与更新社会学文献中的发现融合起来，我建议将魏玛时代末期的冲锋队定义为一个像社会运动那样动员追随者的政治组织，但与此同时，它在地方层面上采用和“联盟”相同的层次结构。⁷⁹大部分此类联盟在全国层面上形成自顶向下紧密配合的准军事指挥体系，确保党的最终控制，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普通冲锋队员的草根激进主义思想。

确保每个“联盟”凝聚力的决定性人物是具有魅力的领导人。很久以

来，魅力是用于描述20世纪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从右翼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到左翼的非德尔·卡斯特罗）影响力及成功的概念。⁸⁰然而，魅力被理解为领导人及追随者之间的“纯情感纽带”，绝不限于这些标志性的政治领导人，还包括贝伦特定义为“超凡魅力集团联盟”的社会运动现象。⁸¹虽然我们习惯于将现代的魅力（以及马克斯·韦伯创造的术语“超凡魅力型统治”）看成宣传的效果以及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但它首先必然是“根植于社交微观层面”的现象。⁸²在日常运作中，冲锋队——正如贝伦特早就认定的——招募其追随者不是过多地通过抽象的政治方案和特定的军事美学，而是通过形成于地方冲锋队领导人以及特定冲锋队单位中普通队员之间的魅力关系。

具有魅力的冲锋队领袖在行动上和理论上都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关键角色之一。这一角色从1922年5月16日起就在题为“冲锋队单位组建方针”的文件中详细描述。地方纳粹党领导人任命特定冲锋队领导人仅以后者的“勇敢及军事技能”作为根据。不过，一旦任命，即使低级别的冲锋队领导人也享有相当的自主权。他们从慕尼黑冲锋队总部接受一般性指令，后来也接受直接命令，但在将这些相当技术性的原则转化为实效时相对自由。而且，根据1922年的指令，每个冲锋队领导人只负责确保队员承认自己的权威。⁸³换言之，较大的冲锋队组织试图确保，只有具备魅力权威的人才被任命为领导人。多年以后的1931年，当冲锋队成长为超过10万人的群众组织时，罗姆的第2号命令将“突击队长”定义为冲锋队里最重要的角色，明确要求他负责冲锋队同仁的命运，根据新的规章，突击队员的数量在70—200人。突击队长应该熟悉手下所有队员的生活，分担他们的痛苦，在必要时提供帮助。⁸⁴毋庸赘言，这种关系的社会现实往往不同。例

如，据报告，1932年在安哈尔特小镇弗洛泽里，一名突击队长为了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下辖的队员，用拳头和刀子袭击了其中一些人。⁸⁵

事实证明，最终确立的大规模职责和互信体系对上级和下级都是有利的。一方面，成功指挥一群志同道合追随者的人往往很普通、也很年轻，他们会以自己的领导素质而自豪，而冲锋队员同时受益于榜样和“关键先生”的存在。有魅力的领导和下属之间紧密个人纽带的发展也是面对冲突时促进相互团结的一种手段。⁸⁶魏玛时代冲锋队员撰写的许多个人文件证明，冲锋队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情感“避难所”，让他们远离自己感觉冷酷、敌对的外部世界。特别是对于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以及没有妻子儿女或近亲的人们，冲锋队的“突击队”代替了家庭的地位。一位前冲锋队员后来回忆道：“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觉得完全被人们接受。”⁸⁷当冲锋队员因为就医或者入狱而暂时离开“家庭”时，他的伙伴们就被号召起来，在能想到的各个方面提供帮助：定期探视他、寄给他“有趣、有益”的阅读材料、从情感和财政上支持他的亲友。为此，柏林纳粹党部于1930年5月组建了“冲锋队入狱者及伤员协助会”。⁸⁸最初，这个援助组织没有得到慕尼黑总部的财政支持，仅依靠党员的捐赠。6个月以后，柏林警察注意到该机构仍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几名被拘押的冲锋队员收到了少量实物捐赠。不过，警察正确地预测，这个援助中心的重要性将会很快提高。⁸⁹

前冲锋队东部地区总队长瓦尔特·施滕内斯于1931年4月被逐出纳粹党之后，照顾伤员或入狱冲锋队员的职责转给民族社会主义自卫队和慕尼黑的纳粹党援助基金会。⁹⁰在它们的领导下，用冲锋队保险计划的强制性收费代替了之前的自愿捐献；1931年，这些费用每月为30芬尼。然而，正如纳粹党莱比锡地方小组的布告所述，地方组织的倡议在个别冲锋队成员的援

助上仍很重要。这项命令敦促党员们在必要时为纳粹伙伴提供一切物资和道义支持，包括法律和医疗援助、在他们遭到监禁时通知近亲和雇主。而且，出狱的冲锋队员将在纳粹党或者冲锋队运营的娱乐场所得到新工作和临时住处。⁹¹冲锋队员还被带到富裕的人家，直到恢复健康为止。⁹²确保所有遭到拘禁的队员们得到所在单位的照顾，是“每个冲锋队领导人的光荣职责”，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庄严宣示：“他们（冲锋队员）没有一分钟会体验到失望的感觉。”他深知，不管从冲锋队员个人需求上还是从造成的宣传效果看，直接的亲身帮助往往都比从慕尼黑的纳粹党保险机构支付费用更有效。⁹³

总而言之，虽然冲锋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准军事组织，依靠的是清晰的等级制度和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但“褐衫军”成功的秘密正在于他们鼓励地方和区域层面上的魅力纽带，这种纽带建立在已经存在的邻居、工作伙伴和校友关系之上。⁹⁴冲锋队没有为普通成员提供财政补偿——实际上，队员们不得不在冲锋队制服和其他装备上花费可观的钱——也不提供工作或者社会福利，至少在短期里没有。相反，它给予成员的是刺激、“赋权”和对社会有意义的感觉，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在大部分冲锋队员认为怀有敌意的政治及社会环境中，实施强有力的行动。不是只有冲锋队领袖才能体验到这种感觉。就连冲锋队“行动共同体”（20世纪20年代冲锋队出版物反复使用的生动词语）中最为谦逊的人，也得益于这种德国男人间的友爱关系，他们不仅自视为忠诚民族“战士”的强力团体，甚至将自己想象为纳粹意识形态终极目标——“民族共同体”——的先驱。

民主社会主义的批评者承认这种自我赋权感的力量，正确地领会到它的政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就是其中之一，他

在1932年预言性地警告，情感刺激决不能代替理智：“认为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将战胜腐败时代的唯物主义精神，是纳粹最为可怕的自欺欺人。事实正相反：一种以‘血液里的浪漫主义’为基础，可怕、原始的自然主义思想已经向我们袭来，并从根本上威胁着知识分子的生活。”⁹⁵

冲锋队的经营

成为冲锋队员不仅是政治信仰的证明，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早在1927年，该组织的领导层就开始致力于通过建设一个真正的产业来产生额外收入，很快，这个产业不仅能为纳粹积极分子提供“原版”的褐衫、长裤和帽子，还为他们供应宣传书籍、各类户外装备和香烟。为了将资金注入右翼势力的金库，民族社会主义者创建了所谓的“帝国军需官办公室”，这是纳粹商品的集中供应商，1928年底完全移交给冲锋队。⁹⁶从此时起，冲锋队员不仅必须购买官方的冲锋队衬衫，还要补充细条纹马裤、褐色防风夹克、绑腿、冲锋队皮带以及对应的腰带、党员徽章，这些都只能从上述供应商的地区分部购买。从1929年起，冲锋队制作了一种可以脱离制服使用的冲锋队成员徽章，徽章上有闪电形状的字母“S”和“A”，表示纳粹运动具有的力量，让佩戴者可以在任何场合展示自己的政治倾向。按照冲锋队领导办公室颁布的命令，之前使用的褐衫（不管是手工制作还是在当地商店买的）从此时起只能用于徒步旅行或者工作。⁹⁷

不过，这种命令落实起来没有那么容易。许多冲锋队员年轻、缺乏资金，特别是在1930年之后，大萧条的效果显现，德国总理布吕宁此后的紧缩政策更是雪上加霜，整个冲锋队的统一性几乎无法实现。在但泽，当地



1933年纳粹接管政权后，许多德国生产商试图推出相关产品吸引国家社会主义消费者，从政治巨变中获益。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12月，一名在柏林市中心舍恩豪泽大街木偶厂工作的年轻女售货员在展示一个身穿冲锋队制服的木偶行希特勒式敬礼。这幅照片表明德国男孩和女孩在圣诞节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穿着冲锋队和德意志少女联盟制服的木偶。

的希特勒青年团副领袖甚至在1929年夏季企图由地方工厂生产自己的褐衫——据他本人说，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重税。⁹⁸与此同时，因为冲锋队官方版衬衫昂贵，有时超出了队员们的承受能力，它成为了渴望的对象——类似于今天在全球成功销售的“官方版”球衣。一旦购得，冲锋队员们往往满怀自豪地穿着“他们”的褐衫——更重要的是，冲锋队多次命令禁止公开展示纳粹党制服，增加了其象征意义。⁹⁹与当时的资本家逻辑相符，像纳粹褐衫这样大规模生产的物品不仅在1933年之前成为该党的“现

金牛”，也是个人归属和献身的象征，这种献身不再需要用个人行动去证明，可以用钱买到。

纳粹党和冲锋队在20世纪20年代末迅速发展，同时增加了制服的需求，拯救了一个地区服装制造商，使其从此转变成国际时装公司，这就是胡戈·博斯公司。1924年，来自施瓦比亚小镇梅青根、时年39岁的胡戈·F. 博斯将多年前从父母手中继承的服装店改成一个小的服装厂。这家小企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雇员都不超过30人，为不同组织生产制服。战后，博斯声称他起初并不知道这些制服（包括冲锋队的褐衫）是“党派的制服”。1929年大萧条开始时，这家公司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两年后（1931年），它申请破产但继续运作。在生死关头，博斯加入纳粹党¹⁰⁰并在大约同一时期开始从该党接收大批订单。从此刻起直到1945年，博斯为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生产多种制服，二战期间还为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生产军服。¹⁰¹其他非犹太人拥有的德国纺织公司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复苏、导致更多制服需求的社会军事化趋势以及犹太纺织厂的“雅利安化”和停业中得益。¹⁰²但是，尽管“纳粹时尚”服装¹⁰³在梅青根生产，设计却不在那里进行。当时，胡戈·博斯只是按照指定款式生产服装和制服。

胡戈·博斯的例子很典型，说明了更为普遍的趋势：在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之后，他们偏向那些在1933年之前支持自己的公司。作为回报，这些公司在广告中利用了与该党的亲密关系。以博斯的公司为例，它骄傲地通知客户，该公司从1924年起就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工作了。¹⁰⁴这一趋势的另一个例子是绍恩多夫的皮革制造商布鲁宁格。与博斯类似，布鲁宁格在1933年从纳粹党和国防军的几个大订单中得益。但是，正如商业历史学家彼得拉·布劳蒂加姆所阐述的，获得这些订单的首要原因并不是布鲁宁格

的产品质量，而是该公司与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前几年的关系。当所有符腾堡皮革厂的工人于1931年11月举行罢工时，布鲁宁格公司请求冲锋队帮助，28名民族社会主义者成功地扮演了罢工破坏者的角色，此后该公司雇用他们代替罢工的工人。¹⁰⁵

这些例子说明，反资本主义态度在某些冲锋队单位中很普遍，但不能视为冲锋队的一般特性。冲锋队的普通队员是否被鼓励参与政治和经常性的反犹太抵制行动，或者奉命为了当地商人的利益以暴力破坏罢工行动，换取后者对纳粹党及所辖组织的财政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当地的环境，以及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当地的社会关系。

吸烟政治

香烟工业提供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逻辑和政治身份成功相互作用的另一个例子。吸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了大众现象。虽然不再与东方的奢侈品和财富相关联，但吸烟仍然保留了表示差异的功能——所处地区、社会阶层的差异，以及20世纪20年代中期政治倾向的差异。¹⁰⁶1929年，盒装香烟成功地进入德国，通常每盒10根。这种创新不仅造成销售额的猛增，还形成了新的营销形式，因为事实证明，长方形的烟盒对印刷图案很理想，从而帮助客户识别特定的香烟品牌。¹⁰⁷随着香烟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而不是由工人（大部分为女性）手工制造，其外观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德国的香烟制造商开始采用特定的形象销售数百种不同品牌的香烟。许多成功的品牌非常依赖表现社会地位的能力，使用传统上与烟草进口关联的东方形象。不过，即使是久负盛名的品牌，如利是美公司

的“Ova”和“Emte23”香烟，其营销也很快就因应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¹⁰⁸1930—1932年，由于失业人数迅速攀升，这两个牌子的香烟广告开始使用了大胆的“紧急情况”形象，如交通事故和海难。这些形象暗示，使用这些特定品牌的吸烟者面对此类局面时反应更加冷静沉着——这让人想起数百万德国人面对个人经济崩溃（往往伴随着家庭破裂）时拼命寻求的冷静。¹⁰⁹

20世纪20年代是“香烟市场的激战年代”——“激战年代”并不是直接使用纳粹的术语，而是当时市场营销人员的用语。科技创新和魏玛德国现代化营销技巧上的突破，迫使香烟公司激烈竞争，创造了多种让吸烟者通过消费大众产品表达“个性”的品牌。¹¹⁰就在这一时期，1929年，阿图尔·德雷斯勒与纳粹党及冲锋队接触，提出了在德累斯顿建立新香烟厂的计划，从19世纪末起，这座城市就已经是德国香烟工业和东部烟草交易的中心之一。¹¹¹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此时进入这一几乎饱和的行业是不同寻常之举，更重要的是，德雷斯勒缺乏这一投资所需的手段。但是身为纳粹党员的德雷斯勒有一个有趣的想法：他建议纳粹党生产一种冲锋队自有品牌的香烟。如果冲锋队愿意要求成员只消费他的新品牌，他承诺每售出1000支香烟向这个民兵组织支付15—20芬尼的报酬。¹¹²慕尼黑冲锋队领导层批准了这个计划。¹¹³在成功的德累斯顿商人雅克·贝滕豪森帮助下（他向该项目提供了50万马克的可观借款），德雷斯勒香烟制造有限合伙公司成立，人们更为熟知的是该公司的主品牌“施图尔姆”（Sturm，有“突击队”之意）。¹¹⁴奥托·瓦格纳曾在1930年的几个月里担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地位显赫的他于1931年成为了该公司有限合伙人之一。¹¹⁵这种联系不仅说明了施图尔姆公

司和冲锋队之间的紧密关系，还揭露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该组织的迅速成长中，至少有一些冲锋队高层领导从中获得了财政上的好处。这与坚称“穷困”的冲锋队仅在绝对最低水平上运作的常见说法正相反。

冲锋队的吸烟习惯确实带来了收益。早在1930年，德雷斯勒就能每个月向罗姆、德累斯顿冲锋队领袖曼弗雷德·冯·基林格和格奥尔格·冯·德滕，以及他们的西里西亚同级别人员埃德蒙·海内斯捐款。¹¹⁶成功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年续写，年轻的德累斯顿历史学家托马斯·格罗舍非常清晰地揭示了这一事实：根据1932年的资产负债表，施图尔姆公司的利润超过了3600万马克。大部分盈利都再投资于新大楼和工厂，相当一部分（128325马克）花在宣传上，手段有报纸和杂志广告、公司自有广告宣传车，甚至租用飞机拖带广告。公司的主人和冲锋队都从1932年的投机中获得可观的利润，而1933年的收益更加丰厚。当年，该公司的净利润达到429970马克的高点，冲锋队享有其中很大一部分。1932年，该组织从施图尔姆公司得到78080马克，冲锋队领导层还另外得到了13951马克的报酬。已经证实，次年冲锋队也得到了相同数目的报酬，其中有较小的一部分支付给冲锋队和民族社会主义者汽车军团（NSKK）。此外还有一笔260069马克的储备金在当年早些时候支付给冲锋队和党卫队，这清楚地说明，1933年的利润远高于前一年。¹¹⁷

这种财务成功的故事之所以实现，不仅是因为巧妙的商业模式，还因为对常规冲锋队队员和商业对手实施的暴力，这在冲锋队中是常事。施图尔姆工厂创立后，纳粹媒体不仅鼓励冲锋队队员只购买新品牌香烟，冲锋队领导人甚至正式禁止队员购买不同的品牌。为了确保队员们遵守命令，冲锋队领导人实施搜查，对不服从者处以罚金。¹¹⁸施图尔姆公司1932年在

《人民观察家》上的广告活动中试图用如下论据说服冲锋队普通队员购买其产品，这些论据引用了纳粹党的官方论调，但明显没有意识到所选措辞的滑稽可笑：“只抽你自己的品牌，别把钱花在其他圈子里。成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意味着战斗和鼓动，直到最后一息。”对于更倾向于实用性的人，该公司在施图尔姆烟盒中放入了冲锋队装备的抵用券。¹¹⁹可是，正如冲锋队地方组织1932年秋季的多份内部报告所述，普通冲锋队队员（也就是消费者）甚至无法决定将这些抵用券用在什么地方。例如，黑森州的冲锋队队员于1932年9月得到命令，在三周内每天至少向冲锋队上交一张抵用券。这些抵用券被用于负担一次冲锋队空中表演的费用，其本意是作为该地区的一次重要宣传活动。

尽管面临这些压力，1932年，施图尔姆香烟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大受欢迎。正如地方冲锋队领导人一致报告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冲锋队员因为“质量可与其对手媲美”而消费这种香烟，并热心地收集烟盒中的抵用券和收藏卡。每个月，冲锋队单位可以收到他们的分红，这些钱用来建设地区冲锋队领导学校、支付医疗费用或者直接惠及冲锋队单位及其成员。¹²⁰当时的多份报告表明，这些佣金成为当地冲锋队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也是有些单位唯一可靠的收入来源。¹²¹施图尔姆公司在民族社会主义者中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它主要雇佣冲锋队领导人作为流动推销员，后者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这一活动为生。¹²²东普鲁士的全部13个冲锋队旗队长在1932年都是这样“流动”的。¹²³这种商业模式非常成功，很快就得以复制：图林根州格拉市的“友谊香烟与运输公司”很快也声称只雇佣纳粹党员，并通知分销商其旗下品牌将以“其他纳粹香烟”的身份销售。¹²⁴党卫队和民族社会主义工厂基层组织（NSBO）据说也支持这家公司。¹²⁵



1932年为“鼓手”香烟做广告的海报，“鼓手”是德累斯顿施图尔姆公司的一个品牌，瞄准快速增长的褐衫军队人员。公司利润的一部分被移交给冲锋队；作为回报，该组织要求他们的人只抽“施图尔姆”香烟。海报宣称，他们这样做是在“对抗托拉斯和大企业”。

不过，冲锋队正式批准的唯一选择是施图尔姆公司提供的不同品牌：富裕的冲锋队员可以购买相对昂贵的“新阵线”香烟（每包6芬尼）、“施图尔姆”或者“圣斯特凡大教堂”（得名于维也纳的著名教堂），后两种品牌每包售价5芬尼。而大部分冲锋队队员更偏爱便宜一些的“消费者价位段”品牌：4芬尼的“警报”和“先锋队”，或者3.5芬尼的“鼓手”。后一个品牌最为成功：1932年，“鼓手”的销售量占该公司总销售量的80%，次年更达到95%。¹²⁶这些数字与德国经济和社会危机产生的趋势相符。

施图尔姆公司使用的另一些手段是对竞争公司及其分销商的身体暴力。德雷斯勒推测，通过骚扰竞争对手，可以降低广告费用——这通常在香烟工业预算中占据很大比重。¹²⁷当纳粹于1933年掌权时，阿方斯·米哈尔卡率领的冲锋队员组织了对另一家香烟制造商——德累斯顿的保加利亚公司——的抵制活动，米哈尔卡是冲锋队员和施图尔姆公司的商务主管，1933年成为了德累斯顿商会主席。¹²⁸这个竞争对手被定位为“犹太公司”，因为据说其老板是犹太人。1933年3月31日，冲锋队封锁了保加利亚公司的入口，对该公司董事哈利·卡尔·施努尔的住宅实施非法搜查。但是，施努尔已经事先得到位于汉堡的德国最大香烟企业负责人菲利普·F. 雷姆茨马的警告，施努尔实际上是雷姆茨马的雇员，因为后者已经在1928年从犹太人萨洛蒙·克伦特纳手中收购了保加利亚公司。¹²⁹不过，这笔交易没有公开。尽管这一特殊抵制行动本意不是为了打击雷姆茨马，但其他冲锋队“行动”却意在于此。冲锋队员再三袭击销售雷姆茨马产品的香烟代理商，砸毁他们的商店橱窗，甚至对在那里工作的人实施身体攻击，使“香烟市场的激战年代”这个词更具字面含义。

不过，这些暴力活动很快就事与愿违。雷姆茨马尽管个人同情自由保

守派，但并不愿意让褐衫军毁掉他的生意。¹³⁰纳粹党以涉嫌腐败为由起诉他，进一步要求其立即采取行动，可是，1932年他获准与希特勒私下会晤，稍微缓解了这种紧张局面。¹³¹1933年8月到1934年1月，雷姆茨马与赫尔曼·戈林多次讨论了他和公司的问题，兼任帝国航空部部长和普鲁士州总理的戈林处于对冲锋队行使权力的理想位置。戈林释放的“善意”是有代价的：雷姆茨马不得不向国家捐赠了300万马克的巨款，正式理由是为了保护德国森林及野生动物以及修建国家大剧院。作为回报，戈林确保停止对雷姆茨马的犯罪调查、纳粹刊物的反雷姆茨马宣传和冲锋队的抵制。¹³²

然而，与冲锋队的最终协议未能在1934年夏季其领袖们遭到处决之前达成。罗姆的继任者维克托·卢策与雷姆茨马达成了协议，内容与戈林的版本类似：雷姆茨马将向冲锋队的账户支付年费，以及15万马克的一次性“临时津贴”，以换取对方的保护。后者的意图是补偿施图尔姆公司的预期损失。¹³³根据其他信息来源，雷姆茨马的一次性补贴（“冲锋队费用”）高达25万马克。即使如此，这笔钱也是很好的投资，冲锋队最高领袖关于冲锋队队员只能购买施图尔姆香烟的命令于1934年夏季解除，此后德雷斯勒的公司很快遭遇财务问题，最终于1935年宣布破产。接下来的几年里，雷姆茨马的公司一直是纳粹德国香烟工业无可争议的王者。不过，德雷斯勒的投机活动结束后，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引用仍然是香烟工业的常见元素，这从“褐衫军”和“劳工服务”（Arbeitsdienst，可能指的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帝国劳动军团”——Reichsarbeitsdienst）等品牌上看得出来。¹³⁴

现代十字军

许多早期冲锋队员认为自己献身于纳粹事业完全符合其宗教信仰，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是违反直觉的。有些冲锋队员甚至认为自己是与“无神论者”和异教徒的“犹太共和国”斗争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信奉新教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特别提倡这种观点，从他们的角度看，魏玛共和国摧毁了过去王权与圣坛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据有影响的亲普鲁士历史学派的说法，这种联盟是德国在19世纪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恢复这种纽带就有希望实现民族复兴。新教教会代表人物和民族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不仅对民主制度有由来已久的憎恨，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认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有前景的——至少在纳粹党宣称有兴趣建立基于互敬的协作关系情况下。这些牧师希望，即将来临的“第三帝国”将是强大的基督教帝国，冲锋队员将成为这些理想的传播者。¹³⁵

马克斯·米哈利克牧师是这种信念的一个典型而又极端的例子，他来自施图姆地区的阿尔特马克，20世纪30年代，那里是德国东普鲁士省的一部分。根据普鲁士内政部的说法，这位牧师不仅是该地区纳粹党的副领袖，还“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参与纳粹党的活动。据称，他定期身着褐衫，参加当地旅馆里举行的“冲锋队之夜”活动，还委任一位失业的冲锋队队员挨家挨户地分发由另一位纳粹牧师编写的宣传书籍。米哈利克为纳粹巡回演说家提供住处，将受伤的激进分子待如上宾，把自己的住宅变成了冲锋队的娱乐场所。1930年，阿尔特马克的褐衫军与他们的牧师在饰有



利奥·冯·马洛特基创作的海报，来自但泽-朗佛尔（今天的波兰格但斯克），由但泽的A. W.考夫曼出版社在1933年左右印刷。一条多头蛇，上面标有两颗大卫之星，以及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红色阵线的缩写SPD、KPD和RF，正在攻击右侧行进的冲锋队队员。背景是港口的船坞和远处的但泽市，在上方一个冲锋队队员的影子十分醒目，那是圣乔治的白色身影，被尊为“基督战士”。同时代的观众，熟悉德国在东欧“民族斗争”的设想，一定会明白：纳粹正在与现存的邪恶对抗，进行一场宗教和意识形态战争，类似13世纪以来日耳曼骑士将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和波罗的海的大部分地区“基督化”。

卐字标志的圣诞树下唱着纳粹战歌，度过了平安夜。¹³⁶米哈利克认为，自己的激进主义行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在他的眼中，他所生活的地方处于德国和波兰天主教徒组成的联盟统治之下，这些人尽一切可能阻止新教的影响。他抱怨道，在德国选民中保守派的DNVP和天主教中央党占据主导地位，而纳粹党到1932年仍是一个小党派。¹³⁷

只有一小部分新教教士参与纳粹党的这种极端政治活动，但重要的是，大部分牧师，特别是来自教会中有影响的“民族新教”派别的那些人，并不认为冲锋队的暴力活动是不爱国或者对上帝不敬的。¹³⁸冲锋队的暴力活动至多被看成是一个实际问题，而非根本问题。新教教会领导人通常摒弃粗暴的个人行为以及带有激烈情绪的政治狂热，但他们倾向于为纳粹有策略地采取的暴力活动辩护，将其视为对抗不断强化的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合理自卫手段。在一个某些信徒将政治局面视为“新宗教战争”的时代里，1932年春季冲锋队暂时遭到取缔，明显可与古典时代晚期基督徒遭到的迫害相提并论。就连新教青年组织此时也号召拿起刀剑，有时候，他们甚至打着“基督教意味着火、神圣的力量和战斗”的标语，集合在国防军训练场上参加军事体育运动。¹³⁹

因此，许多牧师愿意容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出现在周日的礼拜仪式或者葬礼场合，甚至有意邀请他们——这与大部分天主教同行形成了对比。¹⁴⁰梅克伦堡地区主教海因里希·伦托夫说道：“今天，许多新教教会成员将他们的心和灵魂献给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他警告纳粹不要将“民族”和种族抬高为虚假的神灵，但赞颂他们“兄弟会”式的理想，承认他们促进“积极基督教”的共同意志——那正是1920年纳粹党纲领第24条所规定的。虽然主教并没有表示同意民族社会主义的所有方面，但他认为尊重

后者的“巨大努力”至关重要，他希望这能引导人民走上基督教的道路。¹⁴¹同年，符腾堡地区主教特奥菲尔·乌尔姆谈到，德国基督徒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职责，就是至少在道义上支持“德国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他有意地运用了当代人都能理解的纳粹词汇。¹⁴²

与伦托夫和乌尔姆类似，20世纪30年代初相当一部分新教教士将纳粹的崛起视为他们所在教会接近民众的机会，特别是在大城市里。¹⁴³年轻的神学家库尔特·胡滕1932年就任符腾堡福音会执行理事，他将民族社会主义比为“等待福音播种的耕地”。¹⁴⁴同年，来自吕贝克的牧师、从1929年就成为纳粹党及冲锋队成员的格哈德·迈尔将冲锋队队员称为追随耶稣脚步的现代殉道者。¹⁴⁵著名的马格德堡大教堂牧师恩斯特·马丁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国会议员，1932年10月，他在这所宏伟的教堂里为当地冲锋队举办了一场专门的礼拜仪式，那里从1631年“马格德堡洗劫”之后就成为了一个纪念场所。^①根据纳粹的说法，这场礼拜仪式对“运动”的象征价值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在市政厅的演讲。¹⁴⁶整个20世纪20年代，马丁已经为“钢盔团”举办了多次年度礼拜活动，但到了30年代，对他和许多其他信徒来说，冲锋队已经取代前者，成为捍卫民族、对抗罪恶的物质主义文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的主要组织。果不其然，1933年3月，马丁加入纳粹党，成为新教教会中亲纳粹的“德国基督教徒派”的有力支持者。可是，早在1934年，他就公开反对袭击犹太教会堂和犹太商店，并很快对

① 新教城市马格德堡在1630年冬天到1631年遭到天主教军队围攻，城破之后，城市遭到彻底的洗劫和破坏，被认为是三十年战争中最严重的屠杀。——编者注

纳粹党将基督教价值观和对上帝的畏惧作为第三帝国核心元素的意愿失去了信心。¹⁴⁷

马丁的同行、受人欢迎的汉堡路德派牧师弗朗茨·图格尔对纳粹党的支持更热心、更持久，他在1932年称该党为“真正神圣的大众运动”，是由“牺牲精神、严格的纪律和即将取得胜利的信心”铸就的。¹⁴⁸图格尔成为汉堡冲锋队的“首席精神导师”，在纳粹掌权之后甚至身着褐衫。他公开证明冲锋队街头暴力的合理性，称这是对民族和基督教信仰的必要保护。¹⁴⁹

不过，在相邻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福音路德教会的管理层对纳粹运动持怀疑态度。1931年底，该教会发布了关于“牧师政治活动”的详细指南，禁止他们在教堂里为政治党派和组织举行特殊仪式，禁止供奉这些组织的旗帜和标语，禁止积极参与政治集会，也禁止公开佩戴政治党派的徽章。¹⁵⁰德国越来越多的地区觉得有必要发布这种指南，正表明牧师频繁地参与此类活动。¹⁵¹整个德国的政治倾向和宗教活动越来越难分离。

冲锋队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这是因为教士对中央党的传统支持，以及他们在心理上和纲领上对民族社会主义所持的保留态度。但是，到1929—1930年，纳粹党在天主教选民中越来越受欢迎，给天主教高层神职人员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如何在不疏远相当一部分忠实、虔诚教徒的情况下，与这一大众运动保持距离？¹⁵²1931年2月，主教们企图澄清天主教会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发表声明谴责“民族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将种族置于宗教之上，并正式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纳粹运动，但对该运动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和对魏玛共和国的公开敌视保持沉默。¹⁵³最迫切的问题——虔诚的普通天主教徒是否可以参加纳粹党及其下属组织？——留给地方的神父去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部分天主教教士对纳粹党保持着相当冷

淡和疏远的态度。但是，纳粹党声称如果没有冲锋队的保护，“消灭教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就已经席卷德国，这种宣传给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留下深刻印象。¹⁵⁴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个很小但十分活跃的教士群体公开表示对纳粹党的支持。他们倡导“恢复天主教对纳粹党的支持”，这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初双方短暂的友好关系之上。¹⁵⁵

身穿制服的冲锋队员在精心选择的周日礼拜中现身，是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经常出现在德国新教地区的情景，这当然有助于公众对纳粹“基督徒可敬地位”的认知。在天主教地区，这种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初才变得较为常见。在一个很具象征性的场合上，大约400名褐衫军携带旗帜和标语，参加了1930年5月在雷根斯堡大教堂举行的大弥撒，无视天主教会与纳粹之间不可靠的关系。¹⁵⁶三年以后，这种情景已经变得司空见惯。1933年4月28日（星期五），慕尼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身穿制服，在慕尼黑大主教米夏埃尔·冯·福尔哈贝尔主持的“隆重且来宾甚众”的弥撒上组成仪仗队，此事之后，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弥撒中出现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男子虽仍有些古怪，但人们已经非常熟悉。¹⁵⁷1934年，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汉斯·格奥尔格·霍夫曼按照路德《小教理问答》的模式，编辑了一本冲锋队原则小册子《冲锋队原则问答》，明确表示纳粹运动承诺保护两种基督教信仰：新教和天主教。¹⁵⁸同年，德意志福音教徒工作组织编辑了一本类似的小册子，名为《为褐衫军编写的马丁·路德博士小教义问答》，专门针对冲锋队中的新教徒。它声称“我们需要准备为信仰而战的男人”。激励人们参加这场战斗的是“战士和同志的最伟大楷模”：作为非凡男子（而不是救世主）的耶稣。¹⁵⁹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最早、最活跃的冲锋队领导人与教会有着紧密的

联系似乎不仅仅是巧合：例如，慕尼黑的汉斯·乌尔里希·克林奇和柏林的霍斯特·韦塞尔都是新教牧师之子。他们的父亲在儿子积极参与早期纳粹运动时已经死去。¹⁶⁰二战之后，克林奇据说曾向往成为一名牧师。从1949年到1952年，他在斯图加特附近的绍恩多夫传道，向小学生介绍新教教义。¹⁶¹就连钟表匠埃米尔·莫里斯——在希特勒面前总是表现得像一个淳朴、具有暴力倾向的仆从——也和家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牧师保持着联系。在1924年的一封私信中，莫里斯对着这位牧师，为自己和纳粹的过度暴力辩护，明显渴望得到神职人员的认同。¹⁶²要理解克林奇、莫里斯和韦塞尔这样的人，就有必要知道，他们将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斗争看成末世之战，而他们自己则是为国家、德意志民族，最终为上帝而战的现代十字军。¹⁶³希特勒早期支持这种观点。1922年12月17日，在拥挤的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的纳粹圣诞节聚会上，他独独赞颂耶稣基督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楷模。希特勒声称，出身卑微的耶稣有着崇高的理想，蔑视财富与名望，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犹太人后来才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¹⁶⁴他含蓄地按照自创版本的耶稣故事创作传记——自诩为新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追随者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受到了犹太人和外国占领势力（新的“罗马人”）的威胁。身处此次纳粹聚会现场的警察在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公然亵渎神明的案例，但注意到了狂热的气氛，“简而言之，是一场愉快而又不失庄严的庆典”。¹⁶⁵多年之后，当冲锋队即将成为一场群众社会运动时，他的积极分子仍然以宗教色彩的语言描述政治使命。例如，1928年返回冲锋队的首任党卫队领袖约瑟夫·贝希托尔德预言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将来的胜利，声称褐衫军是“报告德国的春天、民族复兴消息的使者”。¹⁶⁶

但是可以想象，这种辞藻只是在表面上与普通队员产生了共鸣。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宗教教育和基督教价值观及思想实际上是如何影响冲锋队成员行为的，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最近的历史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阐明，至少有一些年轻的冲锋队队员的理解是，投身于纳粹运动与其宗教身份一致。当时，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似乎统治了德国许多地区以及最大州（普鲁士）的政治舞台，在这样的时代里，这些人觉得自己有责任高举基督教的旗帜。毕竟，纳粹的卐字就代表着十字架。不过，这种常规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练。事实证明，冲锋队（以及纳粹党）对德国新教地区的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在这些地区里，兴起了一种可称为“基督教民族社会主义”的现象。¹⁶⁷据说，希特勒本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追随者中的教派差异，但是他对这些差异的理解相当简单。1930年与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及其参谋长奥托·瓦格纳的一次会谈中，希特勒解释了冲锋队和党卫队在德国各地区招募人数相差悬殊的原因，援引了由来已久的一条文化边界——“日耳曼长城”，这是过去罗马帝国与条顿部落领地之间的边境线，公元2世纪时深沟高垒，将现代的德国领土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北部较大。希特勒称，在这条过去的边境线以北，大部分人是新教徒，更倾向于加入冲锋队，而在天主教徒占据主导的德国南部，年轻人多数更偏爱党卫队。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种差异不是巧合：“冲锋队吸引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好战天性，这些人有着民主思想，只依靠共同的忠诚团结在一起。聚集到党卫队的是更倾向于独裁国家的人，他们希望服务和服从，响应的是某个人而非某种思想。”¹⁶⁸

历史学家里夏德·施泰格曼-加尔将希特勒的区分诠释为：民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质”吸引了许多冲锋队队员，而党卫队支持“独裁体

制”。¹⁶⁹希特勒古怪的史学解释反映了对“男子气概”、一贯坚强的日耳曼部落不加批评的崇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柔弱”而堕落的罗马人——这是从19世纪开始流行的一种历史神话，雄伟的赫尔曼纪念碑^①（位于条顿堡林山，1875年由德皇威廉一世亲自揭幕）就是它的一种表达。¹⁷⁰尽管如此，希特勒的陈述包含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元素，特别是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被称为“强身派基督教”的福音派新教在基本思路上有多少共同之处的问题。本书的分析只触及这种相互关系的表面，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才能加以全面探索。¹⁷¹

对比冲锋队和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其他法西斯运动，许多冲锋队主要成员想象自己是基督教战士也就不足为奇了。¹⁷²西班牙和法国法西斯分子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已为人熟知。¹⁷³但在欧洲东南部，最明显的是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法西斯激进分子也将自己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想理解为某种“十字军”。罗马尼亚“铁卫团”、斯洛伐克“赫林卡卫队”和克罗地亚“乌斯塔沙”都是“极富神秘主义色彩的运动”，它们诉诸过度暴力，这并非不顾其宗教倾向，反而源于后者。正如罗里·约曼斯评论克罗地亚时所指出的，“许多乌斯塔沙领导人曾受教于神学院，从建立之时开始，这个运动在神学院学生和低层神职人员中就很有影响。”¹⁷⁴对于具有魅力的罗马尼亚法西斯领袖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来说，“教会的精神遗产”组成了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元素，“因为

① 纪念公元9年日耳曼人在赫尔曼的领导下于条顿堡森林战役全歼瓦卢斯率领的三个罗马军团，从此罗马帝国与日耳曼大致以莱茵河为边界。屋大维听到战败的消息后大叫：“瓦卢斯，还我军团！”——编者注

只有它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的法西斯思想是基督教教义在政治领域的变形。科德雷亚努不仅对个人的复活深信不疑，也相信民族的复兴，并声称他的政治活动最终遵从的是上帝的意志，罗马尼亚人的“历史命运”是神授的。¹⁷⁵从跨越国界的角度看，冲锋队激进主义和基督教复兴思想之间有时非常紧密的关系就不像之前那么令人吃惊了。如果没有先验的上层建筑，民族社会主义就无法释放其致命的能量。《冲锋队原则问答》中的规条以简单的语言说明了这种关联：“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宗教的敌人，恰恰相反，我们相信民族和个人必定需要宗教，以控制在生死之战中必需的精神力量……我们也相信，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整个德国文化已经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无法想象没有它的情况。”¹⁷⁶

但是，两年以后（1936年），纳粹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显著恶化，以至于该党禁止在教堂礼拜时穿着制服。¹⁷⁷尽管如此，杜塞尔多夫艺术学会成员、艺术家里夏德·施瓦茨科普夫的一系列木刻画继续用艺术的手法，表达民族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¹⁷⁸施瓦茨科普夫的木刻非常生动地展现了纳粹在街头与“布尔什维克劣等人”战斗的情景，在这些画作中，共产党人似乎决定大开杀戒，并受到了“骑马的骷髅”形象的煽动——那正是死神的化身。相比之下，冲锋队员则被描绘为典型的丈夫和父亲形象，捍卫德意志的土地，并在仿效《圣母怜子》的情境中哀悼一位“阵亡”的同志。¹⁷⁹这一系列画作1937年在慕尼黑的大德意志艺术展上陈列，广泛用于冲锋队的宣传中。从艺术角度看，它是在售“冲锋队艺术品”中的极品之一。

施瓦茨科普夫的6幅木刻画受到了《死之舞》悠久传统的影响，这是关于死神无坚不摧全能力量的隐喻，最早的绘画表现可以追溯到15世纪。





1936年，来自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家里夏德·施瓦茨科普夫创作了六幅系列木刻作品，题为“冲锋队的战斗：德国的激情”。这是其中两幅。这些作品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形式描绘了冲锋队的战斗。《信仰的胜利》表现传统主题前进的褐衫军，《红魔鬼肆虐》的特色在于将冲锋队队员描绘为农民和父亲，暗示了冲锋队1934年之后的目标变化。

他的直接模板是浪漫派画家阿尔弗雷德·雷特尔创作的一套6幅木刻画，雷特尔在1849年初将当时的社会革命者描绘为受到一种只会给人民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政治意识形态诱惑。¹⁸⁰这套画作在1849年5月印刷出版后极其成功，主要是因为保守派同盟购买印刷品在学校和兵营中免费分发。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他的木刻画在中高阶层中仍大受欢迎。¹⁸¹施瓦茨科普夫将雷特尔画中1848年的革命者改换成两战之间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同时表现了可能的“救世主”：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如同身披华丽甲胄的新“骑士”。1937年的媒体欢呼道，在德国艺术史上第一次有位艺术家创作的《死之舞》中，生代替死成为了胜利者——这预示着所谓向“我们时代肯定生命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¹⁸²这样，冲锋队的斗争被拔高为永恒的善恶之争，是一个生机勃勃、决心捍卫自己的民族与沉闷、最终必将死亡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决战。画作的标题为《德意志受难记》，让人一下子想到了基督和他的遭遇。¹⁸³与基督教教义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正如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信徒而献出生命一样，纳粹冲锋队员为了民族而牺牲生命。正如最后一幅木刻画的标题所示，他们最终将获得“信仰的胜利”。

与魏玛国防军的关系

这些年轻“十字军战士”的自我意象与其行动的阴郁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导致爱挑剔的观察家们鄙弃纳粹的自我意象，认为那只是一小群误入歧途者的幻想，他们根本不适合现代生活。德国学者约阿希姆·C. 费斯特是最早将民族社会主义者称为“真正迷失的

一代”的人之一。在他看来，纳粹党成员是由他们在“自由军团”及其他民族主义准军事部队中的长久经历塑造的，在这些部队里，他们通过实施“极度狂暴的冒险主义”和隐藏在爱国主义外表下的犯罪行为，“表达了缺乏以文明方式生活的能力的事实”。¹⁸⁴因此，费斯特将这种“普通成员中的无政府主义”当作纳粹冲锋队的核心特征之一。他认为，欧洲大陆上第一次现代战争带来的个人和文化体验令人深感不安，正是它们培养了这种无政府主义。费斯特承认，应该将冲锋队理解为战争中年青一代的活力与某种“有目的的革命意志”结合的产物，上述两点使其“几乎无法抗拒”。他对冲锋队没有任何同情。¹⁸⁵

但是，这种说法很容易掩盖一个事实：到20世纪20年代末，冲锋队的“冒险家们”越来越引起正规军的兴趣。特别是，较为年轻的魏玛国防军军官更多地将纳粹准军事组织看成潜在盟友，而非危险的对手。在德国局势越发紧张、民主制度表现出更多弱点的背景下，魏玛国防军从1929年起开始研究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众所周知，军队与战后最大的民主政党——社会民主党（SPD）——之间的联盟从一开始就不是永恒的“婚约”，而是一种临时的“私通”。虽然社会民主党人不止一次依靠国防军镇压共产党人的起义，但事实证明，军队愿意支持民主政治，只是因为这被看作是“最糟糕的结果中唯一可行的”——否则就要面对外敌的入侵或者共产党成功当权。1918年11月革命之后，德国军队总在抱怨自己的权威“随着战败和君主制的倒台”而受到侵蚀。¹⁸⁶20世纪20年代全德国最多产的军事作家之一霍斯特·冯·梅奇的如下陈述十分典型。他写道，与被其蔑称为“大众煽动者”的当代民主政治家相比，德国过往一代又一代的军事英雄“为德国人民提供了更好的预言、更无私的朋友和更有创见的

教师”。¹⁸⁷

正因为这种“有创见教育法”的感觉，导致一些年轻的魏玛国防军军官在20世纪20年代末与崛起的纳粹党接触。¹⁸⁸虽然魏玛国防军领导层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但不顾盟国既有限制、强化德国青年军事教育的共同目标将两个群体联系在一起。1929年3月15日，希特勒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议，将现有的魏玛国防军转化为一支合格的“人民军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类似的陈述一再出现。¹⁸⁹大约同一时期，来自驻扎在乌尔姆的第5炮兵团的三名年轻少尉（里夏德·舍林格尔、汉斯·弗里德里希和汉斯·埃拉德·卢丁）开始讨论他们所认为的“国防军最急迫问题”和主要道德冲突的解决方案：保持对一个“和平主义”政府的忠诚是个难题，该政府使国防军无法恢复过去的荣耀，从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虽然许多年轻的职业军官已经对纳粹产生了同情，但这三名少尉是最早与冲锋队会谈的人之一，这一举动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叛国。1930年3月，三人都被拘押并起诉，10月4日，莱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判处他们一年半的监禁。¹⁹⁰

今天，所谓的“乌尔姆国防军审判”被人们所铭记，是因为正是在这个场合，希特勒在证人席上公开宣布，他的党将力图通过法律手段获得权力，不再通过暴力颠覆政府。但是，这次审判也是一个增进怀有革新思想的军官与纳粹运动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事件，因为同情民族社会主义的军官觉得审判的结果是个耻辱，他们甚至都完全不应该受审。冲锋队的暴力行为并没有阻止这种联系的发展，因为当时的“军队思潮”同样“相信政治上的失败或者背叛可以通过暴力修正”。¹⁹¹

这次审判使其中的关键人物走向极端，但是道路不同。里夏德·舍林格尔在这段时间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信徒，而汉斯·卢丁在获释后加入了纳

粹党。卢丁是弗赖堡一位中学校长的儿子，他从1932年7月起成为纳粹党在国会的代表，1933年4月1日被任命为冲锋队西南地区总队领导人。¹⁹²尽管政治倾向不同，上述两人在余生中都保持着友谊，他们认为自己是“彻底的激进一代”的成员。他们希望被看成是理想主义者，面对将职业军人的誓言与德国爱国主义者的责任协调一致的艰难任务，不得不选择后者。¹⁹³恩斯特·尼基施回忆，按照他在1932年的一次私人会晤和后来的流言判断，当时举止端庄得体、有美学倾向的卢丁直到后来才适应了冲锋队的粗野行为。¹⁹⁴相反，激进的年轻历史学家埃卡特·凯尔在1930年尖锐而又具有预见性地提出批评，称较年轻的国防军军官缺乏勇气：“国防军军官总是在寻找一位伟大的‘元首’；他们渴望得到成为‘禁卫军’的命令，但不愿意探究这一命令的理由。”¹⁹⁵

卢丁等年轻军官在公众中留下的恶名，更提升了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在德国中高阶层中的地位，公众认为他们成功地结合了德国军事传统、教育、爱国主义自豪感以及战斗精神。就连对消除社会差异毫无兴趣的贵族都对30年代初的冲锋队有复杂的看法，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¹⁹⁶克劳斯·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是德国军队后期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运动领袖，他生于1907年，因此——和卢丁及舍林格尔一样——属于“战争中的年青一代”，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几年里，他是一名国防军少尉，自由活动于年轻精英的秘密圈子里，这些人聚集在著名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周围，每天晚上参加施陶芬贝格为冲锋队组织的非法训练课程。¹⁹⁷正如对他怀有同情的传记作者彼得·霍夫曼所言，以民兵为基础建立军队的想法包含在1920年纳粹党纲的第22条中，30年代初由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大力倡导，得到了施陶芬贝格这样有抱负的年轻军官的普遍同情。¹⁹⁸一名前教

官后来回忆道，20世纪30年代初的魏玛国防军“几乎在所有防区”为冲锋队提供训练课程。¹⁹⁹军队希望争取冲锋队，将其转变为某种“辅助警察”，可以在国内剧变或者外敌进攻时召集。²⁰⁰反过来，罗姆在1931年2月也根据军队的需要改组冲锋队。²⁰¹

从许多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出发，能够争取像施陶芬贝格这样的人、动员各社会阶层德国人的政治运动，一定值得认真考虑。尽管冲锋队的做法至少和竞争对手一样狂暴和激进，许多来自同时代中高阶层的观察家对其看法却不相同。这些群体将左派的政治暴力视为对法律和秩序的严重威胁，却将纳粹的暴力活动看作“令人遗憾但必要的”，因而最终是民族自卫的合理手段。1932年初，纳粹估计在国防军中有90%的人同情或者忠诚于该党。²⁰²虽然这个数字似乎过于乐观，但说明了民族社会主义领导层中的强烈信心。而且，不管这些估计的准确性是否有问题，接下来的几年无疑证明，该党“德国军队不会对纳粹政策实施造成太大阻力”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
二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4章 恐怖、刺激和失望

“平静与秩序”是退休者的战斗口号，但人们最终不可能让一个国家仅仅满足退休者的需求。

——恩斯特·罗姆，1928年¹

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两天，有影响的柏林自由主义报纸《福斯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人”的社论，作者是自由主义政党德国民主党（DDP）前领导人、1928—1929年任德国司法部长的埃里希·科赫-韦泽。报社的编辑对一万多名冲锋队队员穿越勃兰登堡门的胜利游行十分着迷，认为科赫-韦泽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实际上摘自他即将出版的*Und dennoch aufwärts*一书，书名的字面意思是“不顾一切地向上！”）是对新政府的中肯评论。文章的第一部分，科赫-韦泽以相当传统的风格哀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但在第二部分中以很有启发性的方式剖析了纳粹运动取得的最新成功。作为德国前司法部长，他对冲锋队前几年犯下的罪行有第一手的认识。科赫-韦泽表示，纳粹的吸引力应该首先理解为普遍失望的标志：

德国人意识到无法推进自己的事业，突然间屈从于外来的野蛮意志。他们感觉到内部的不和与周围民众的分裂，呼唤着自己愿意盲目服从的强人与强大的国家。他们拒绝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忠诚……，如果被看成一钱不值，至少在所属的群体中应该有自己的价值。他们摆脱无法应付的辩论，转而采取行动。思想政治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物质与人的政治。民族社会主义及其表面上的喧闹、群众集会以及军事力量的展示，应该理解为一种对各种思想和个性的抗议。当然，身着引以为豪的制服在街上游行，你仍然能感觉到自己的个性。将帝国时代的陈词滥调和社会主义者的流行语结合起来，你也仍可以相信自己是为了某些思想挺身而出。跟在“元首”后面奔跑，你当然也可以认为自己是积极地追求一种个人崇拜。但在现实中，吸引人们的是力量和大众，诱惑力来自原始性。²

诚然，从古斯塔夫·勒庞于1895年发表极具影响力的《乌合之众》之后，对大众的批判立场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³然而，科赫-韦泽的评论超越了流行的文化悲观主义。它们抓住了1933年纳粹精神的核心，为许多冲锋队队员在所谓“凯旋时刻”中突如其来、近乎荒谬的憎恨感和侵略性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⁴

冲锋队普遍实施的恐怖行动——最重要的是打击政治左派和犹太人⁵——是希特勒独裁制度建立的核心因素之一，本章从三个方面加以探索：首先，是威胁、伤害和杀死成千上万德国民众的直接身体暴力；其次，是向所有人（朋友和敌人都不例外）传达新的纳粹行为准则的一种信息；最

后，冲锋队队员在过去数年里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号召力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这是他们长期压抑情感的一种表达。不过，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这种合力。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名作《群体与权力》中将群体的“释放”定义为所有成员“摆脱差异，感觉到平等”的决定性时刻⁶，与他相反，我的目标是阐明，纳粹在1933年的恐怖与暴力活动除了实现战略目的之外，充其量只能给越来越扩大、但内部充满裂痕的民族社会主义阵营带来暂时的缓和，而不可能带来和谐。

复杂的情绪与新机遇

随着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1932年秋季冲锋队队员中普遍的悲观情绪让位给一段时期的兴奋和希望。从许多积极分子的角度看，第三帝国（被想象成一个德国人的种族社会共同体，冲锋队队员的政治奉献将在其中得到象征性和物质上的奖赏）的愿景此时似乎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只差最后的努力。1933年2月3日，德国政府和联邦各州政府不仅开始取缔左派组织，也清理了许多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帝国战旗”和“钢铁阵线”于1933年3月10日被禁止，两周后，右翼的“德国青年骑士团”“奥伯兰联盟”“巴伐利亚卫队”和施滕内斯的“黑色卫队”也遭到相同的命运。⁷大约同一个时期，冲锋队得到远离德波边境的命令，这是因为他们中一些野心过大的成员渴望挑衅波兰军队，目标是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曾爆发的冲突。⁸令许多冲锋队队员失望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之前，第三帝国的建立和巩固优先于领土问题。

推翻魏玛共和国、将其转变为一个现代独裁国家，不仅伴随着打击纳

粹所认定对手的恐怖浪潮，往往还伴随着矛盾情绪的爆发：报复、仇恨、愤怒和兴奋。45岁的格哈德·里特尔是弗赖堡大学教授，后来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初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在1933年2月中旬声称，德国的新气氛让他想起了“民族社会主义者酒后的狂欢”。⁹无独有偶，精神病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在1980年的自传《精神分析学家的生活》中回忆，统治那一段时期的是“举国上下的普遍共识，那确实是一种令人痴迷的大团结景象”。米切利希还说道，他在1933年春季就知道早期的集中营，但只觉得它们是“潜在的威胁”。¹⁰一丝不苟地记录生活轨迹的普通柏林人弗朗茨·戈尔永远也无法忘记“群众的欣喜心情”，将1933年的感觉描述为“陷入谵妄之中”——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¹¹

不管是出于兴奋还是谨慎，大部分德国人都顺应新的形势。冲锋队的成员资格比以往更吸引人。各个射击协会和健身俱乐部都请求全体加入冲锋队，最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一个特殊单位。¹²纳粹党员渴望抓住这些机会，以至于老牌纳粹分子表达了党内“淘金热”情绪导致追逐私利的忧虑。莱昂纳多·孔蒂是一名冲锋队队员，从1928年起成为纳粹党柏林-勃兰登堡大区的首席医生，后来被提升为帝国卫生部门领导人和内政部国务秘书，他的妻子埃尔弗丽德·孔蒂早在1933年3月3日就说过：“无私的人在德国似乎已经濒临灭绝！无论是在黑暗中或者光天化日之下，依靠强者还是弱者，追求权位的经历首先给我上了一课，那就是对人类的蔑视。”¹³1933年春季，“Marzgefallene”（字面意思是“三月的死者”，实际意义是“三月的横财”）一词意外地卷土重来。这个词最初用于指代1848年革命初期遭到杀害的人，现在则被讽刺性地用于指称170万在1933年1月到4月底之间加入纳粹党的德国人。

冲锋队队员也从新机遇中获益。按照冲锋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总队领导人卡尔·恩斯特的话说：“冲锋队战士当然不应该被排除在新国家所能提供、也有义务提供的多方面好处之外。”¹⁴为纳粹党徒提供工作机会，是该党议事日程上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在纳粹政权的官方语汇中，将这项任务美化为“为工作而战”。早在1933年6月，德国资方联合会、帝国就业机构和冲锋队及钢盔团的代表就协商同意了关于一项“特殊行动”的整套原则，这一行动将为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成员提供优先就业机会——条件是所涉人员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加入了这几个组织，有资格被称为“老战士”。¹⁵为了确保向真正的冲锋队队员（而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朋友”和“亲戚”）优先提供市政工作和公共合同，各级市政当局和州政府建立了所谓的“冲锋队联络办公室”。一些地方的联络办公室只起到收集失业冲锋队队员的资料，并将其传递给常规就业机构的作用。而在其他地方（如利珀的代特莫尔德），冲锋队成功地控制了就业市场。在这个城镇里，冲锋队在当地就业机构里组建了强大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为新雇佣的冲锋队队员，他们无所顾忌地追逐自己的利益。¹⁶

到1933年秋季，冲锋队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半私营和私营部门。在首都，冲锋队柏林中心区旅队任命了一名“就业顾问”，负责以排除到公共合同之外或者以破坏罪指控作为威胁，迫使本地公司雇佣大量失业的激进分子。¹⁷此前失业的冲锋队队员还在地方医疗保险协会（AOK）和私营保险公司及银行找到了“避难所”，他们填补了那里的一些低薪酬职位，有时候这种职位是为该组织新设的。¹⁸对于雇主来说，这种招聘似乎是时代的趋势，是展示民族责任感和政治服从的合适方式。对于普通人（特别是犹太人）来说，这种表现促进了德国公共环境的快速纳粹化，从而尽可能地培养了

家庭式的亲密感。¹⁹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作之战”中获益的德国人数量无从得知，但考虑到1933—1935年失业冲锋队队员人数显著下降，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大部分都以某种方式得益于冲锋队的援助，不管这种援助是超越法律框架之外，还是通过官方的就业计划实施。²⁰

尽管有这些优先待遇，并不是所有冲锋队队员都能成功地得到工作——原因不仅如纽伦堡就业中心1934年7月的讽刺性评论那样，剩下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有过前科、生理上有缺陷或者是超过60岁的人。²¹当然，在“长刀之夜”之后，民众对冲锋队专横举动的不满以这种蔑视性的描述表达出来。但是，许多“老战士”的自我意象与他们的专业资格之间无疑存在差异，这往往使他们无法胜任最基本的职位。而且，许多冲锋队队员不喜欢现有的工作（通常是建筑或者农场工作），而更喜欢“干净”的办公室工作。然而，在后一个领域，“老战士”被迫与新近才加入纳粹党及所属组织、受过更好教育的人竞争。

因此，层次较低、教育背景有限的早期纳粹积极分子很快就开始表达对之前未参与纳粹运动的德国人的蔑视。从冲锋队的角度，有经验的“街头战士”曾经冒着失去健康和生命的危险，为纳粹事业而战斗，现在却无法享受此前奋斗得到的胜利果实，而不得不与迅速增长的机会主义者做斗争，简直是一种耻辱。²²全国有超过60所冲锋队“福利营”，这些营地在1933年容纳了多达2万人，1934年发展成当地动乱和不满情绪的中心，但是与大部分德国人当时遭受的经济困境相比，营地里的冲锋队领导人得到的薪酬已经堪称慷慨了。²³不过，与上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住在营地里的普通冲锋队队员每周只能得到很少的津贴。市政当局给予冲锋队的小规模福利，如降低公共游泳池门票费用、将市政建筑分配给冲锋队使用、豁免冲锋队

通信犬的税费，不足以安抚纳粹党激进分子。²⁴在酒吧和小酒馆中与当地居民发生的暴力冲突使冲锋队福利营在公众当中很不受欢迎。这些事件往往是来自这些营地的纳粹分子酒后挑衅引起的，他们实施破坏行为，威胁逮捕当地显耀人物，或者使用枪支“捕鳟鱼”。²⁵

评估第三帝国早期的冲锋队暴力行为时，必须将经济和社会背景考虑在内。毋庸赘言，这些暴力活动首先指向纳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真正对手（以及他们认为的对手）：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和犹太人。除此之外，这种暴力还越来越多地成为纳粹阵营中某些需要传递的信息，他们要求尊重冲锋队野心，履行对他们的社会承诺。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很快爬上权位，得到可观收入，他们并没有努力平息党内的动荡。这些变化为领导人们提供了支持下属的财政资本（有时还有社会资本），但也很快扩大了纳粹党机构与追随者之间的鸿沟。

科布伦茨发生的事件说明了冲锋队领导层日益增长的期望，以及公众对其更加专横的习惯的不满。1934年4月17日，一名“较高层的冲锋队领导人”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求租一套“有5—6个房间的现代化公寓，带全套现代化便利设施”，并要求最好是靠近莱茵河的好地段。²⁶虽然利用职业身份使房东相信某人的社会地位过去是、当时也仍是德国常见的现象，但这则广告引起了批评。一位自称“老党员”的人写匿名信给鲁道夫·赫斯投诉，后者在1933年被任命为阿道夫·希特勒之下的“副元首”。写信人认为，这则广告的措辞已经在该城民众中造成了负面情绪。他补充道，每个人都认为，一名高级冲锋队官员提出这样的要求，明显“缺乏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精神与信念”。²⁷冲锋队高级领导层与普通战士之间的社会落差从普费弗·冯·萨洛蒙时起就已经成为该组织的特征，与纳粹党的所有宣传相

反，这一问题从未得到解决。²⁸

追捕并羞辱敌人

随着希特勒就任德国民族主义新政府的总理，共产党（KPD）预计将被正式取缔，成为非法政党。但是，纳粹选择用几乎不加伪装的恐怖主义行为来代替对司法程序的尊重。1933年2月27日深夜到28日凌晨的“国会纵火案”被纳粹当成高度象征性的事件，以及迫害政敌的借口。国会大厦还在大火之中，警察部队就在冲锋队和党卫队支援下开始袭击共产党办事机构及该党积极分子和支持者的住宅，按照事先编制的黑名单逮捕他们。由于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许多同时代人认为纳粹直接卷入了这一纵火事件。相比之下，1945年后的史学界普遍接受了所谓的“单一罪犯论点”，确定荷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纳斯·范·德·吕伯为唯一罪犯，属于“独狼行动”。²⁹不过，历史学家本杰明·赫特和其他人最近的研究已经成功挑战了长期以来的这一观点。赫特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论据，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确实是根据卡尔·恩斯特和戈林的命令，由一个深谙爆破原理的冲锋队特殊小组对大楼实施纵火。³⁰

这一事件的起因仍有争论，但对结果没有分歧。1933年2月28日下午，兴登堡紧急签署了“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令”，暂停了魏玛宪法保证的重要公民权利。随后的几周，纳粹利用这一法令，作为无情追捕所有“挡道者”的理由。仅在柏林就有1500名共产党人因为“国会纵火案”被拘押，这些人中既有普通党员，也有高级领导人甚至国会议员，很明显打破了后者的豁免权。最终，纳粹的突袭实际上摧毁了该党的大部分地方组

织。在莱比锡，纳粹于1933年3月对476人实施“保护性拘留”。到4月，鲁尔和莱茵兰地区的冲锋队和正规警察部队已经逮捕了多达8000名共产党官员。巴伐利亚的被捕人数达到3000人，而哈雷地区达1400人，西南部的巴登有900人。³¹第二大的受害群体当然是犹太人，这一波迫害浪潮中，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纳粹于1933年3月和4月发动的联合抵制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几个月里，冲锋队队员不仅在犹太商店前面站岗，在它们的墙上涂抹反犹太标语，还侮辱犹太商人及其家属，这往往令受害者的商业竞争对手感到高兴。³²

这一时期纳粹的受害者人数无法确定。1933年4月8日的纽约《星期日



1933年4月1日，冲锋队队员封锁了科隆巴赫霍夫大街的Ehape商店的入口。Ehape商贸有限公司是百货财团莱昂哈德·蒂茨股份公司的一部分，从1933年7月起（蒂茨家族被迫出售其股份后），该财团被称为西德意志考夫霍夫股份公司。这张照片显示了对抵制的至少三种不同反应。女人们迅速经过冲锋队队员，表面上没有产生关注，而两个男人正在和褐衫军成员交谈。骑自行车的人和在场的冲锋队领导人的聊天似乎很轻松，而戴帽子的人的肢体语言表明他的态度更倾向于批评。

晚报》报道，希特勒本人曾估计“德国的重生”付出了330条生命的代价，此外有4万人受伤，10万人被赶出商业生活。³³但是，希特勒提出这些数字时，想到的是在过去“数年的战斗中”纳粹党本身的“受害者”，而不是他的追随者们在他就任总理后数周内追捕、拘禁和杀害的人。在今天看来，即便保守估计，纳粹在1933年间也拘押了超过8万人。超过500人（甚至有可能超出这一数字的两倍）被纳粹分子直接杀害，或者在此后因为殴打和折磨而死去。³⁴

纳粹掌权的前几周里，大部分被捕者都被带到德国大城市里迅速增长的冲锋队非法监狱中。冲锋队酒馆地下室、体育设施、青年旅社、兵营和废弃的工厂都用作临时监狱。这些场所往往只存在几天或者几周，就被一系列由国家或者党卫队及冲锋队管理的大型集中营代替。³⁵仅在柏林，最新的历史研究就已经确定，纳粹分子在多达240个场所实施了拷问，还有11处早期的集中营。1933年，这些中心分布在城市各处，由邻近的冲锋队单位相对自主地管理。³⁶这些临时监狱和拷问室位置集中，使这种早期冲锋队的恐怖活动成为纳粹统治非常显眼（有时也很刺耳）的元素。住在这些监狱附近的柏林市民听到囚犯们被看守毒打时发出的惨叫声，无不心生惊骇。城中医院的医生面对很多遭到折磨而几乎无法辨认的人，其中多人无法救助或者已经死亡。³⁷

这一时期，冲锋队暴力活动本质上首先是身体暴力，但往往结合了很强的象征意义。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羞辱并打垮其对手，有时造成受害人在被拘押或者获释后自杀。³⁸在许多情况下，被拘留者遭到了多种无耻的对待。毒打往往持续几个小时，处决的威胁也很常见。柏林的一位“帝国战旗”成员被迫为冲锋队看守擦皮鞋、喝他们的尿，甚至舔一名冲锋队队员

的屁股。³⁹埃尔富特一所早期集中营的囚犯被迫高喊反犹太口号，同时被用铁棍、肩带和橡皮警棍殴打。⁴⁰早期集中营囚犯不断被要求进行单调、羞辱性的体力劳动，例如用牙刷刷洗地面，或者徒手清洁营地的洗手间。身体虚弱、遍体鳞伤的囚犯被迫在面带讥讽的冲锋队看守面前，进行所谓的“体育锻炼”，其目的也类似。⁴¹科隆-波尔茨的一所冲锋队监狱中，看守给囚犯上“游泳课”：用绳子套住受害者的颈部，然后将其拖到几乎无法站立的高度，囚犯只能拼命地挥舞手臂。⁴²萨克森州前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利布曼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遭到了严酷的折磨。作为冲锋队霍恩施泰因集中营的囚犯，利布曼被迫重复几年前在萨克森州议会上发表的政治演讲，然后被看守用刀子猛刺。利布曼失去了一只眼睛，1935年因为伤处引发的并发症死去。⁴³

冲锋队在1933年的这些暴力行动明显带有性别特征。这种暴力行动由男人实施，以压倒性的力量打击其他男人，不仅加强了那些经历多年经济困难和社会边缘化之后终于能够向其他人发挥力量的冲锋队队员的“超男性”身份，还可以使冲锋队暴力的男性受害者“女性化”或者“失去男子气”。⁴⁴莱比锡的冲锋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抓捕共产党人，逼迫他们进入“清洁队”，洗掉反纳粹标语。⁴⁵而且，许多冲锋队拷问过程中的性别特征也很能说明问题。这种恐怖元素不应归因于所谓的冲锋队“虐待狂”的个人缺陷，而需要根据其政治与社会功能加以分析。1933年的纳粹恐怖活动目标是摧毁左派政治组织，而且还企图确保这些组织的政治积极分子不敢返回政界。因此，虐待的形式直接针对受害者作为男人的尊严。⁴⁶即使政治犯从“保护性拘留”中获释后，他们实际上也无法寻求正义，不仅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愿意卷入其中，还因为他们必须克服心理障碍才能提出上

诉。这些障碍难以跨越、非常有效，这从前囚犯的报告在德国流亡者中广为传播，而在德国国内影响有限就可以看出。道德上的正确并没能帮助许多德国人，他们将无力保护自己对抗虐待视为男性气概上的可耻污点。⁴⁷

1933年冲锋队恐怖活动中臭名昭著的场所有柏林—舍嫩贝格的冲锋队宪兵营房，以及坐落在首都以北不远处的一座废弃酿酒厂的奥拉宁堡集中营。从1933年3月21日起，当地的冲锋队第208旗队在那里拘禁两千多名囚犯长达12个月。在奥拉宁堡的囚犯中，最出名的是普鲁士州议会社会民主党领袖恩斯特·海尔曼、著名作家库尔特·希勒和埃里希·米萨姆、国会议员小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格哈特·塞格尔，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台记者阿尔弗雷德·布劳恩。除了许多备受瞩目的左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个集中营还囚禁着40名来自勃兰登堡沃尔齐希一个犹太福利机构的青少年。囚犯的这种构成，以及犹太囚犯受到的特别恶劣的待遇，证明了历史研究的坚定结论：自始至终，纳粹恐怖行动都不仅有政治动机，还有种族主义的动机。⁴⁸

塞格尔于1933年12月设法从奥拉宁堡逃脱，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并于1934年发表了有关德国集中营情况的第一份详细报告。⁴⁹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他的报告中题为“营地里的冲锋队”的章节。塞格尔为读者提供了冲锋队组织心态的简短分析，考虑到他的背景和个人遭遇，这一分析的公正客观令人吃惊。塞格尔称，任何时候营地里都有80—100名冲锋队队员看守，其中大多数只接受过非常有限的教育，与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总体受教育水平更是无法相比。与1934年的读者想法大相径庭的是，塞格尔强调“认为普通冲锋队队员对政治有哪怕最简单的了解，都是完全错误的”。看守们讨论即将来到的11月12日国会选举时，就像谈到一场马克斯·施梅林的拳

击赛，或者一场重要的足球赛——塞格尔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对政治的无知：

“在与我们这些政治犯接触之前，许多冲锋队队员几乎完全不知道，世界上除了98式步枪、08式军用左轮枪、警棍、纸牌、啤酒和性，还有什么东西！”⁵⁰

但是，塞格尔解释道，尽管无知，但并不是所有冲锋队看守都积极参与虐待活动。有些人不仅在这些情况下袖手旁观，甚至尽可能地对囚犯表现出宽容。塞格尔意识到，囚犯和冲锋队看守都经受着持续的压力。⁵¹与之类似，年轻的犹太人彼得·布拉赫施泰因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成员，于1934年初到当年8月被囚禁于霍恩施泰因城堡的萨克森冲锋队集中营，他记得捉拿自己的人既表现出极端的野蛮，也有着暂时的克制，后一种情况特别出现在冲锋队看守意识到可以利用囚犯的专业技能时。⁵²不过，两位见证人都坦率地说明了这种行为的比例：“在冲锋队队员中，野蛮远比友爱普遍。”⁵³奥拉宁堡的3000名囚犯中至少有16人死亡；霍恩施泰因的5600名囚犯中，正式宣布的死亡人数为40人，但估计未登记的死亡人数高达140人。⁵⁴与这些营地存在的时间和囚犯人数相比，有些短命的早期集中营死亡率甚至高于奥拉宁堡和霍恩施泰因。冲锋队在柏林附近伯尼克管理的集中营仅从1933年5月存续到7月，据报告，有10名囚犯被杀害。这个营地的囚犯被迫在没有足够休息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搬运铁路轨道。他们不得不睡在裸露的地板上，只能得到质量低劣、数量极少的食物。⁵⁵

新政权的恐怖战役不仅是摧毁反对组织、网络和个人的手段，还是威胁态度不明的旁观者的方法。极端的身体暴力只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之一。在海德堡大学，三名学生身穿冲锋队制服，打断了医学教授格奥尔格·布莱辛的课，带着他前往警察局。这些冲锋队队员声称，天主教中央

党党员布莱辛挪用大学诊所的款项，并以不正当的方式接近女学生。⁵⁶罗斯托克同样有一群加入冲锋队的学生在1933年5月将原大学校长鲁道夫·黑尔姆“押送”到警察局，后者被指控挪用公共基金，并娶了一位犹太妻子。根据黑尔姆的回忆，他认为拘留时的情形比保护性拘留本身更耻辱。该大学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恢复前校长的名誉，而且没有对参与的学生做任何形式的处罚。⁵⁷更极端的是“种族亵渎”的案例，其中一个发生在1933年7月的库克斯港。当地海上冲锋队成员强迫一对德国犹太人夫妇在城里游街。男性受害者被迫携带一条诽谤性的横幅，上书“作为一名犹太男孩，我只将德国女孩带到房间里！”女性受害者则被迫带上一个标志，上面有“我是城里最卑贱的猪，只跟着犹太人走！”的标语。一名号手伴随游行队伍，引起人们对此情此景的格外关注。当地报纸《汉堡日报》将这一事件诠释为“恢复健康的民族敏感性”。⁵⁸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冲锋队反复上演这种把戏。⁵⁹

然而，1933年的暴力事件并不都发生在集中营或者光天化日下的德国街头。如下面的例子所述，许多暴力事件发生在私密或者半私密的环境下，从未进入正式记录中。50岁的朱莉·布劳恩-沃格尔施泰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犹太妇女，孀居于柏林附近克莱因马赫诺的别墅里。20世纪20年代，她因为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莉莉和海因里希·布劳恩及其儿子奥托的著作担任编辑而小有名气。布劳恩-沃格尔施泰因的住宅和花园由多名仆人打理，她埋头于对古希腊历史及其艺术的研究之中。一名仆人于1933年加入冲锋队，开始勒索其雇主。沃格尔施泰因拒绝付给这名仆人保护费，此后来自当地冲锋队的一群人多次在晚间闯入其住宅花园，毁坏花卉并威胁她。布劳恩-沃格尔施泰因于1935年离开德国，两年后移民美国。⁶⁰讽刺



奥拉宁堡冲锋队集中营的囚犯被强制进行体育锻炼，即所谓的冲锋队体育运动。中间的一名冲锋队男子发出命令并做示范，而站在囚犯后面的其他褐衫队员监督练习得到正确执行。这张照片可能是集中营地管理人员在1933年春天或夏天拍摄的，当时在德国国内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此类照片，同时分发给外国新闻机构，用来反击对早期集中营中酷刑的报道。这种纳粹宣传通常侧重于囚徒的身体通过体育和艰苦劳动得到“教育”和“训练”，于是，在理想情况下，囚犯有一天可以作为有价值的成员重返纳粹“民族共同体”。这种宣传照片出色地展示了健康的囚徒。带红十字臂章的冲锋队男子十分醒目，表明囚犯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照片还显示，集中营位于家庭住宅附近。



萨克森霍恩施坦城堡早期集中营的冲锋队看守和他们的囚犯。这一场景大概是为冲锋队制作的，作为某种战利品。精心书写的公告板显示“霍恩施坦城堡预防性拘留营劳工队，1933年4月28日”。两名囚犯在照片上被标上数字“1”和“2”，但他们的身份无法识别。

的是，纳粹骚扰布劳恩-沃格尔施泰因，正是在攻击一位德国民族主义英雄事迹的支持者，她投入了可观的时间和精力赞美奥托·布劳恩，将这位1918年死于西线、年仅20岁的年轻人奉为过早逝去的民族领袖。⁶¹不过，这个例子说明了纳粹掌权时的社会动态。尽管冲锋队队员确立新精英阶层成员地位的野心未能实现，但所参与的政治变革鼓励他们推翻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他们常常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利用新的政治形势。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阶级和种族都是攻击者证明自己行为有理的因素。

在此类案子中，德国司法机关起不了多大作用。勇敢的德国犹太律师（如柏林的汉斯·利滕，“帝国战旗”组织法律顾问、鲁尔区万讷-埃克尔会堂社团主席瓦尔特·克龙海姆）很快成为了民族社会主义者威胁、身体攻击和拘禁的目标，检察官和法官也是如此，但程度较轻。⁶²1933年3月初，纳粹启动追捕政敌的《国会纵火案法令》生效之后仅仅几天，冲锋队就开始侵入德国法院，“清除”犹太律师和法官。德国犹太人律师路德维希·弗德就是受害者之一，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是德国犹太信仰公民中央联盟（CV-Verein）的坚定成员，曾坦率地批判德国司法界的反犹太主义思想。⁶³弗德后来回忆，冲锋队在布雷斯劳的袭击始于“像野兽一般的吼叫”。片刻之后，二十多名冲锋队队员出现，高喊“犹太人，滚出去！”，弗德没有服从，此时其中一名冲锋队队员用金属武器击打他的头部。⁶⁴类似的事件在许多其他德国城市里发生。虽然有时非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抗议冲锋队袭击其犹太同事，但总的来说这种抗议很温和，没有任何影响。除了纳粹于1933年3月底到4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对犹太商店和犹太商人发动联合抵制这一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事件之外，排除犹太司法人员有助于纳粹所谓的德国司法体系“德国化”或者种族净化。⁶⁵

冲锋队对德国司法机关施加的压力不仅干扰了司法进程，还直接惠及冲锋队队员，这些人在1933年和1934年因为政治、财政或者个人原因而犯下了数千宗罪行。更糟糕的是，德国警察最高层改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或者愿意按照新强人意志行事的保守分子。“老战士”、冲锋队旗队长阿尔弗雷德·里希特于1933年3月初被任命为汉堡内务参议院和警察局长。⁶⁶接下来的几周，里希特有系统地“清理”了地方管理机构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犹太人、工会主义者，以及纳粹根据“种族原因”认定为不受欢迎的人。⁶⁷在德国其他许多城市和州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1933年3月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慕尼黑警察局长，而在图林根州首府埃尔富特，冲锋队地区总队长维尔纳·冯·菲希特在几周后就任警察局副局长。⁶⁸1933年2月，内政部长戈林在普鲁士解除了14位主要城镇警察局长的职务，代替他们的多数是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候选人。⁶⁹

这种策略性的举措仅仅是为了掩盖民族社会主义者在1933年春季的真实目标，在某些领域，他们根本没有试图掩盖自己的野心。例如，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巴伐利亚、黑森和符腾堡，纳粹党将忠诚的老党员、特别是已经证明“为行动做好准备”的冲锋队领导人提升到地方管理机构的关键职务上。这些纳粹“领袖人物”往往缺乏正式资格认定，此前这是就任关键职务必需的条件。在汉堡和基尔之间的中型城镇新明斯特，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布林克曼于1933年4月1日控制了当地的警察部队，他曾任该地区冲锋队旗队长，原来是一名销售代理人和失业的化学工作者。⁷⁰坐在伍珀塔尔同一位置上的，是冲锋队区队长威利·费勒，他是臭名昭著的恶棍，至少曾14次被判有罪。⁷¹没落贵族沃尔夫-海因里希·冯·黑尔多夫曾在声名狼藉的1931年“选帝侯大街骚乱”中起到主要作用，他于1933年3

月被任命为警察局长，主要是戈林施加影响的结果。1935年7月18日，黑尔多夫被选到柏林附近地区担任同一职务，成为1938年反犹太袭击的主要推手之一。⁷²

这段时间里，不仅警察部队的领导职务重新分配，还设置了一类新的官员。戈林在普鲁士州从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招募和武装了5万人，作为“辅助警察”。⁷³实施这一举措时，他跟随纳粹州长卡尔·勒韦尔的脚步，后者于1932年夏季在奥尔登堡自由州征召了230—250名冲锋队队员，以有利于纳粹的方式应对政治暴力事件的兴起。⁷⁴这在1932年曾是令人不安的区域性信号，但在一年之后就变成纳粹的官方政策，引发了意义深远的后果。现在，德国警察部队中既有长期任职的军官，也有当地的匪徒，两者在街上并肩巡逻。戈林明确表示，普鲁士州将以最为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警官过度使用暴力的行为。为了镇压政治左派，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如果有必要，可以无条件使用武器。”⁷⁵

许多其他州也从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中招募辅警，这些人很快占据了常规警察部队的40%—100%，实际上使其力量加倍。在鲁尔区较大的城市（如多特蒙德和波鸿），这意味着配备常规警用武器的当地辅警部队很快达到1000人以上。⁷⁶只要有可能，冲锋队内建立的同袍之谊保持不变。整个冲锋队“突击队”改建为警察部队。⁷⁷1933年春季和夏季，这些新警察部队参与了对纳粹政敌的拘押行动；特别是1933年5月，常规冲锋队和辅警帮助占领独立工会的大楼、没收其资产、关闭出版社并抓捕其官员，使这些组织瓦解。⁷⁸作为回报，当地商界领袖出资赞助辅警。⁷⁹根据巴伐利亚财政部长的估算，巴伐利亚州1933年至少在辅警和“保护性拘留”上花费100万马克，后者大部分与达豪集中营有关。⁸⁰不过，到1933年秋末，辅警的必要

性没有那么大了。左翼组织和党派已经解散，并从法律上禁止了它们的重建。潜在的新对手实际上已经受到震慑。因此，从1933年8月起，德国各州开始解散辅警部队，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个月。⁸¹最后一个废除冲锋队辅警的州是巴伐利亚，该州于1933年12月21日通过了这项措施。然而，在整个德国，直到1934年秋季，仍能在新招募的警察部队中看到身着冲锋队制服者。⁸²

尽管常规警察部队和纳粹党准军事组织紧紧纠缠在一起，但两者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实际上，整个1933年，冲锋队主要在警察控制范围之外行动，并且常常相互竞争。对于许多冲锋队“老战士”，为魏玛政府服务的警官们在“皈依”民族社会主义之前仍是敌人。⁸³而且，冲锋队领导人（如驻纽伦堡特派员、冲锋队次级地区总队长汉斯·金特·冯·奥伯尼茨）认为常规警察尽管总体上服从纳粹党，但首先仍是个障碍。奥伯尼茨更愿意在他的冲锋队队员帮助下清算纳粹的敌人，这些人对法律规范和约束毫不在意。在1933年7月20日写给巴伐利亚内政部长的一封信中，冯·奥伯尼茨写道，他“完全知道”命令法兰克尼亚冲锋队和党卫队单位搜查犹太人的房产，找寻所谓的反纳粹宣传品、护照、出境签证和现金，是超越了法律的界限。⁸⁴在这样的情况下，冲锋队队员拘留了大约100名犹太人，将其带到当地体育场，从那里移交给纽伦堡的常规警察。作为反应，纽伦堡警察局长本诺·马丁博士（后来成为武装党卫军将军）⁸⁵在写给巴伐利亚州总理的信中投诉了冲锋队的霸道行径。他认为，冲锋队的任意妄为使法兰克尼亚警察涉及犹太人的长期行动无法实施。马丁还说，一些冲锋队队员甚至威胁要抓捕加以干预的常规警察。⁸⁶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冲锋队三番五次地对警官动用暴力，特别是那些以忠诚于共和制著称的警察。⁸⁷例如，戈斯拉尔当地冲锋队突击队在

1933年6月向一名警察发出威胁信，通知他如果继续出勤，将不再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几周后，同一座城市的冲锋队队员突然传讯前治安警察负责人、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奥斯特伦。尽管奥斯特伦从1933年4月8日起就被停职，但激怒的纳粹激进分子将他推下市政厅的台阶，猛击他的脸部，并用脚猛踢他。奥斯特伦于几个月后死去。1934年8月31日，公诉人结束了对涉案冲锋队队员的诉讼，称这项罪行是因为行凶者“过分热心于为民族社会主义理想而战”而犯下的，因而可以归入8月7日大赦（“有罪不罚法案”）之列。⁸⁸这几年中，戈斯拉尔市民私下里将当地冲锋队核心集团称为“海盗团伙”——这既表达了对这种违法暴力行动的痴迷，也表达了道义上的愤慨。⁸⁹

1933年几乎不受约束的冲锋队暴力活动走向极端，以至于从中获利的新政权最终也觉得必须加以干预。为了控制四处破坏、毫无纪律性的冲锋队队员，同时保护他们免遭常规警察部队和司法部门的起诉，罗姆于1933年8月下令，在普鲁士建立冲锋队“宪兵”。⁹⁰两个月以后，1933年10月7日，这支冲锋队旗队长瓦尔特·弗里奇率领的特殊警察部队命名为“战地猎兵军团”。⁹¹这支新部队只招募最可靠、最威风的人员，其任务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麻烦。大约有200人在“战地猎兵军团”中服役，接受冲锋队最高领袖的直接指挥。罗姆的目标是进一步集中权力，同时压制地方冲锋队领导人的野心。⁹²巴伐利亚也于1934年2月27日建立了类似的冲锋队警察部队，称作“巴伐利亚战地猎兵军团”，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约翰·巴普蒂斯特·福克斯指挥。⁹³但是，到当年夏季，对政治对手实施残酷迫害的风潮明显减弱，冲锋队宪兵失去了之前的重要地位。例如，在1935年3月，汉堡的冲锋队宪兵负责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务，例如抓捕官方宵禁时间（午夜）之后醉

醺醺走回家的冲锋队队员。⁹⁴

仅仅几周之后，1935年4月1日，普鲁士内政部正式解散冲锋队宪兵。合格的冲锋队官员此时整合到常规的普鲁士治安警察中，这支部队越来越受到了希姆莱和党卫队的影响。但是，按照1935年5月新任参谋长维克托·卢策的命令，普通冲锋队队员仍将参与常规的冲锋队巡逻任务。有趣的是，卢策对这些任务必要性的解释不是基于政治不稳定（1933年和1934年的理由），而是认为这样的巡逻对“保持冲锋队内部勤务”至关重要。⁹⁵这说明，尽管纳粹已经掌权，但冲锋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建立的社交机制在第三帝国中并没有根本变化。冲锋队需要可以猛烈对抗的敌人，即便这些敌人只是虚构的。1934年夏季之后，冲锋队的暴力行动——该组织公众吸引力和内部凝聚力的根本要素——缺乏政治意义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发行动。1935年到1938年之间，纳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野心使冲锋队在局部卷土重来，冲锋队队员的反犹太袭击为他们提供了体验力量、建立真正归属感的罕见机会。

反应

冲锋队恐怖活动的强度威胁和震慑了许多德国人，但并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抵抗。1933年初，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号召总罢工，这种政治武器在1930年“卡普政变”中成功地打击了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此时人们认为它不太可能起作用。共产党人呼吁大规模抵抗，但基本上无人呼应。造成这种消极态度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在许多德国人看来，魏玛共和国的老牌政党已经因为无法解决失业率高企的问题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其次，

事实证明，这些党派和他们的准军事组织过于弱小，无法阻止民族主义者掌权。左派政党没有能力保护追随者免遭冲锋队的暴力袭击，甚至在自己的工人阶级“据点”中都无所作为，是最具象征性的耻辱，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丧失威望的原因。⁹⁶现在，它们怎么有可能开发出成功的自卫策略？再次，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相互憎恨，实际上使工人阶级政党无法完全调动其仍很可观的力量。正如约阿希姆·黑伯伦对莱比锡所阐述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起，政治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并没有使不同的工人阶级运动团结起来，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1933年，党派积极分子和支持者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及仇恨同样常见。这种情绪无法为协作和联合行动提供基础。⁹⁷最后，政治左派将大部分保守党派与纳粹确立协作关系视为他们在不久的将来重返政坛的跳板。相信希特勒政府不可能履行承诺，左派迟早会取得胜利吗？⁹⁸类似的想法也激励着冯·帕彭和他的新保守派追随者努力支持纳粹掌权。和德国中等阶层的许多非纳粹成员一样，这些组织不同意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极端暴力行动，但他们同情一劳永逸地在德国消灭“布尔什维克危险”的目标。冯·帕彭和他的顾问们甚至认定，一旦“粗俗的”纳粹分子燃烧完了自己，旧精英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们将响应号召，建立一个牢牢掌握在传统体制手中的独裁政权。⁹⁹

其他党派没有同样的政治“白日梦”，但企图从内部缓和纳粹暴力行动。阿尔布雷希特·伯梅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在1933年是开姆尼茨刑事调查办公室主任，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加，这座有35万居民的萨克森州工人阶级城市政治热情高涨。¹⁰⁰伯梅是一位政治保守的法学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着相当成功的职业经历。尽管如此，他同情民族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他们的犯罪预防计划——从科学角度看，伯梅也对这

个应用政治学领域感兴趣。¹⁰¹不过，1933年上半年，冲锋队在这座城市实施的恐怖行动越来越使伯梅惊骇和厌恶。2月18日，冲锋队队员用利器刺死了一位共产党官员。次日，一名“帝国战旗”组织成员被杀害。3月31日，一名犹太商人据说在开姆尼茨冲锋队威胁拘留他时自杀。最终，不到两周之后，著名犹太律师阿图尔·魏纳的尸体在该城外围的一个沙坑中被找到。¹⁰²根据伯梅在战后的证词，魏纳是根据冲锋队区队长库尔特·拉施的命令被处决的，后者的儿子埃伯哈德据说是行凶者之一。¹⁰³1933年9月，伦敦出版的《希特勒恐怖褐皮书》记录了纳粹在开姆尼茨及周边地区的不少于10宗杀人案，这些罪行是在1933年3月3日到8月1日之间犯下的。¹⁰⁴

伯梅调查了上述罪行以及一些其他案件，详细描述了冲锋队队员的残忍程度和虐待行径。在1933年7月16日提交给萨克森州内政部的报告中，他倡议对自己所称的纳粹党组织非法“单独行动”实施“果断制裁”。伯梅报告，最初因为民族社会主义掌权而引起的兴奋情绪很快就让位给开姆尼茨的“极端紧张局势”。他确认，这些恐怖行动的主犯是当地的冲锋队第2/104突击队，并指称指挥官、电工马克斯·舒尔特在该城建立了“真正的恐怖政权”。某些情况下，冲锋队的受害者被“捆绑、脱去衣服并殴打到神志不清”。冲锋队拷问者用烧红的铁棍刺囚犯，强迫一些人整晚上“像蛇一样”蜷缩在箱子里。有时候，虐待到了极致地步，“受害者已经体无完肤”。¹⁰⁵伯梅认为，这些罪行令人无法接受，责任人应该受到拘禁，并强调“民族崛起”不能因此受损：“新时代决不能容忍对没有抵抗能力的囚犯施以系统性的虐待暴行……不能通过掩盖罪行去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也不能允许元首的意志有什么例外。”¹⁰⁶很难确定伯梅的这种推理是不是出于策略目的，是否反映他的真实信念。1938年，他被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长，

1940年12月1日提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尽管如此，直到生命的尽头，他的观点仍然强硬、顽固。¹⁰⁷

伯梅决心“从官僚机构内部”阻止冲锋队1933年和1934年的过度行为，这一努力在当时是个例外。德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大部分私下谴责纳粹滥用暴力，但都没有公开致力于阻止这一现象。更常见的是有意地视而不见，努力地避开“火线”。然而，普遍的恐惧只是纳粹恐怖行动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之一。公众当中也有对这些暴力行动持赞成态度的人——他们的观点是，纳粹的暴力活动很过分，但这是解决前几年各种问题的必要过渡时期。这种论证的典型是小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格牧师的陈述，他从1910年起就担任比勒菲尔德新教伯特利慈善基金会主席，该组织在帮助残疾人方面享有国际声誉。在写给一名询问基金会工作的犹太医生的私信中，冯·博德尔施文格为纳粹1933年春季的暴力活动辩护，指责受害者，特别是犹太人：“堕落的犹太精神在前20年里已经污染了公众生活，特别是大城市，从由此引发的下流事、耻辱和谎言判断，人们肯定会理解，对其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是历史的必然。在变革的时代里，从来无法完全压制暴乱。”¹⁰⁸

博德尔施文格的评论符合德国新教徒对纳粹“革命”的常见反应。¹⁰⁹在官方出版物中，教会赞颂新政权的“钢铁力量”和“坚定意志”是政治重构所必需的元素，并将这种重构美化为“伟大英雄时代”的产物。1933年春季的复活节贺卡将希特勒就任总理比作耶稣重生，是这种情绪的极端表达。¹¹⁰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新教发言人轻描淡写地称过度暴力为“新时代的阵痛”，将纳粹野蛮的反犹太行径当成“治愈犹太人的猛药”。¹¹¹1933年的德国人大部分被新政府的决心和巧妙的象征性决策打动，尽管他们也担心1933年3月23日国会通过的《授权法案》，该法案以极端暴力解决问题、强

制政治一致性并废止公民权。¹¹²

外国观察家同样经常以肯定的口吻评论他们感受到的“纳粹运动的活力与意志力”。¹¹³但是，其中一些人也因1933年冲锋队和党卫队力量的迅猛增长而惊恐。9月，英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安德鲁·索恩报告，这些“准军事联盟”明显企图成为“德国防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真正的军事训练落后于他们的野心，索恩坚称“在热情和纪律方面”，这些部队已经胜过英国地方自卫队。¹¹⁴多名英国军官于1933年夏季访问德国，研究冲锋队和钢盔团的发展，注意到这些部队参加军事演习。¹¹⁵此时，配备步枪和机枪的冲锋队部队在巴伐利亚南部很常见。¹¹⁶

纳粹官员从1933年夏季起明显对冲锋队的能力和军事技能不那么热心了。在评论可能整合到冲锋队的前共产党人时，冲锋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总队的一名官员于1933年10月宣称，前德国共产党积极分子是“模范政治战士”，在政治技能和意识形态坚定性上远强于普通冲锋队队员。尽管如此，他宣称，即便前共产党人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前来，“冲锋队中的堕落分子”也不会让这种整合取得成功，“很不幸，这样的人很常见”。¹¹⁷从组织的角度看，冲锋队的大规模扩张和成员们引发的恐惧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负担。罗姆不惜一切代价扩张冲锋队，以便进一步巩固其在初生的第三帝国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野心威胁到该组织已经显得脆弱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也削弱了上层对其施加控制的能力。

凌驾于法律之上

1933年的冲锋队自视为不再受德国刑法典束缚的法外机构，恩斯

特·罗姆于1933年7月31日秘密发布的“纪律法令”最能说明这一点。对于每个被政敌杀死的冲锋队队员，罗姆授权地区冲锋队领导人，负责处决实施攻击的敌方组织的最多12名成员。¹¹⁸这一命令说明，内战的逻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冲锋队领导层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袋鼠法庭”传统仍然存在。纳粹政权于1933年1月到1934年6月间发动了多次政治谋杀，目标是据称泄露了内部机密的民族社会主义“叛徒”，或者在纳粹阵营中有强大、无情敌手的人。根据罗姆的7月31日法令，只要还没有确立对应的冲锋队管辖权，这些处决行动就是一种合理的“补偿”。¹¹⁹

毫无疑问，对纳粹组织成员所犯罪行的法律处理一直搁置到1934年年中，这进一步鼓励冲锋队队员犯下此类罪行。除了长于10年的刑期之外，纳粹掌权之前犯下的大部分罪行的诉讼已经因为1932年12月20日的大赦而搁置。¹²⁰罗姆和慕尼黑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坚持，涉及冲锋队队员的事件应该在专设的冲锋队纪律法庭处理，而不是由常规的法庭判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冲锋队推行“惩戒法”，为完全豁免常规刑事法庭对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的惩罚提供法律基础。¹²¹罗姆将建立冲锋队“军事司法体系”作为其野心——将冲锋队打造成“民族武装”——的一部分。尽管纳粹党及其成员组织、司法部门和民政当局从未对这种“惩戒法”达成共识，冲锋队地方领导人在1934年6月之前多次威胁敢于对个别冲锋队队员提起诉讼的公诉人。其中一位地方领导人是“诺德马克”的冲锋队领袖海因里希·舍内。¹²²1933年夏季，在组织所谓“游街示众”的该地区冲锋队队员是否应该为破坏秩序、袭击和非法拘禁而受审的问题上，他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民政和司法当局发生了激烈的争吵。¹²³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长官的会晤以意见不合而告终之后，舍内于7月10日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基尔

的州高等法院院长，另一封写给普鲁士司法部长汉斯·科尔。舍内声称，只要不通过新的“惩戒法”，他将禁止手下的冲锋队队员出庭。他不接受对其手下的任何惩罚，因为“即便法庭在形式上是正确的，最终是冲锋队成功地完成了民族革命，就算在此期间和之后做了坏事，这些行为也应该得到原谅。”¹²⁴他甚至在写给科尔的信中说道：“如果我们按照法律条文办事，就会走向一种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那可能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在舍内看来，对冲锋队的任何法律约束最终都是脆弱的，因此可有可无：“对待猪猡或者流氓，最好用鞭子来伺候和教育。”¹²⁵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冲锋队企图以有力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德国司法机关，即便如此，这一努力只是某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标是完全控制国家官僚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姆任命了所谓的特别代表，在纳粹夺取政权期间“对发生的摩擦采取及时、紧急的改正措施”。¹²⁶冲锋队领导人受到鼓励，监督公共管理机构政治与社会转变的所有方面，这是罗姆企图巩固冲锋队在“夺权”过程中重要作用的一个显著事例。罗姆的主张清晰而专横，全然蔑视法律：“特别代表必须无情地推动他们的利益。我要求他们保持充沛的精力、以目标为导向。”¹²⁷

德国各州中，大部分都任命了这种特别代表，包括普鲁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德国的某些地区，他们的权力只持续了几个月，因为常规的州政府机构很快就被这些精力充沛且没有官僚作风的新主人搞得狼狈不堪。例如，符腾堡的特别代表任期早在1933年5月就结束了。¹²⁸不过，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冲锋队特别代表在1934年7月1日罗姆死去之前一直在位。¹²⁹特别代表甚至驻扎在大学里，但是民政部门很快意识到，他们的“做事风格”有损于教育机构的学术声誉，因而不久便阻止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这

种令人不快的“联姻”。¹³⁰然而，直到1934年3月9日，罗姆仍然宣称民政部门和冲锋队特别代表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那就是“为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革命的利益建设国家”。他还特别敦促所有部门，在做出有关于冲锋队的决策之前与特别代表联络。这种请求不像前一年那么野心勃勃，表明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重新夺回了权力，它们通常鄙视粗野、几乎缺乏资格的冲锋队队员。不过，如果罗姆的要求得到满足，就会导致冲锋队继续对国家管理机关行使某种政治控制，将罗姆提升到仅次于“帝国专员”弗朗茨·冯·埃普的巴伐利亚“第二统治者”地位。¹³¹

实际上，罗姆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然而，仔细观察巴伐利亚的特别代表，就可以发现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帮助罗姆确保权力及影响。1933年3月12日到9月之间，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在巴伐利亚任命了133名特别代表和特使，每人每月的薪资为125—300马克（从10月1日起，他们的工资分别升到200—400马克）。¹³²根据巴伐利亚财政部的说法，加上相关的费用，他们在1933年里给国家造成了至少371520马克的支出。可是，实际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因为冲锋队领导层还向巴伐利亚州要求至少10万马克的额外费用，用于其自由裁量权。各地当局在1933年秋季指出，冲锋队特别代表的所有款项都是非法支付的，因为这些款项的法律依据不存在。¹³³不过，在罗姆与巴伐利亚州总理路德维希·西伯特于1933年10月20日举行的一次会晤中，后者同意每月支付给罗姆25000马克（包括追溯到9月1日的款项），主要用于特别代表。¹³⁴这为罗姆提供了接下来几个月维持对巴伐利亚冲锋队独裁统治的财政手段。1934年7月1日罗姆被处决之后，他的银行通知当局，除了一个将近4万马克存款的私人银行账户之外，他还有一个以“慕尼黑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经费”为名的支票账户，价值56000马克。¹³⁵

“钢盔团”的整合

希特勒出任总理的前十二个月中，冲锋队显著成长。1932年底全德国冲锋队队员不到43万人，到1934年4月已经攀升到400万人。¹³⁶这一惊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罗姆成功地将此前与之竞争的组织中的大部分成员整合到冲锋队里。这些组织中最著名的是“钢盔团”——在德国中产阶级和贵族中很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1932年仍号称有50万成员，比冲锋队多出数万人。¹³⁷

1933年之前，冲锋队与钢盔团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拒绝自由民主制度上的普遍共识，但两者的阶级归属和战斗策略有明显差异。1923年到1933年之间，钢盔团从一个真正的老兵组织转变为“魏玛国防军替代者”。¹³⁸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两个组织继续合作举办“爱国”集会，向政敌表示抗议，但崛起的冲锋队无疑成了钢盔团的眼中钉。¹³⁹然而，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冲锋队青年激进主义思想加深了与钢盔团的裂缝，后者的成员继续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前线经历”作为领导的核心标准。因此，不管平日做出多大贡献，太年轻、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年轻钢盔团成员都必须接受组织里的从属角色。不出所料，越来越多的“青年钢盔团”成员开始以纳粹冲锋队作为追随的榜样，这个年轻组织不仅允许成员在与意识形态敌人的战斗中证明自己，而且对此大加鼓励。他们将敌人描绘得至少与一战中的协约国军队一样危险，尽管这些战斗暂时只发生在德国的街头。¹⁴⁰

作为对这一倾向的反应，钢盔团领导人越来越疏远“粗俗”而“自命

不凡”的冲锋队。后来成为武装党卫军上将的戈特洛布·贝格尔的一番陈述，表现出了两个组织领导人之间对抗的典型风格。1932年，贝格尔仍是冲锋队符腾堡次级地区总队成员，他这样描述所在地区的局势：“我们相互争斗。被宠坏的贵族子弟和僵化的现役军官定下了钢盔团的基调。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乡间组织骑兵突击队，因而极大地伤害了钢盔团。”¹⁴¹另一方面，钢盔团两位全国领导人之一特奥多尔·迪斯特贝格（另一位是弗朗茨·塞尔特）从不掩盖对冲锋队的轻蔑。1933年2月初，在对首都钢盔团成员的一次讲话中，他表达了自己的难堪：“羽翼丰满的逃兵、一战期间仍在襁褓之中或者上小学的少年”现在竟敢公开指责钢盔团缺乏爱国主义精神。¹⁴²

迪斯特贝格曾在1932年4月竞选总统，赢得了超过250万张选票，他在1933年春季坚持钢盔团独立于纳粹运动。而塞尔特更灵活地顺应政治变化，很快地在谋略上胜过了另一位领导人。从1933年1月30日起，他出任德国劳工部长，在内阁中得到一席之地。1933年4月27日，塞尔特加入纳粹党，此后数周和几个月里都参加了将钢盔团逐步并入冲锋队的谈判。¹⁴³心怀疑虑的钢盔团成员担心，他们的组织将变成“二级冲锋队”，但这种情绪被打消了。¹⁴⁴早在1933年6月，“青年钢盔团”转入冲锋队，而钢盔团青年组织“沙恩霍斯特联盟”并入希特勒青年团。¹⁴⁵次月，所有35岁以下的钢盔团成员组成“武装钢盔团”与钢盔团分裂。武装钢盔团领导人埃尔哈德·冯·莫洛佐维茨成为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成员，任务是“将武装钢盔团带入冲锋队”。¹⁴⁶1933年11月6日，罗姆最终为显著扩张的冲锋队采用了新的结构。现在，冲锋队里存在3个不同的团体。首先是“现役”冲锋队队员，包括全部18—35岁的常规冲锋队及党卫队成员，30万名在7月前融入该组织的前武装钢盔团成员。其次是“冲锋队第1预备队”（SA-R I），包括所有36—45岁的

前钢盔团成员。¹⁴⁷此外，还建立了第三个团体“冲锋队第2预备队”（SA-R II）并置于罗姆及其冲锋队的控制之下，包括45岁以上的成员（即“屈夫霍伊泽联盟”、其他老兵组织和殖民地游说组织成员）。¹⁴⁸到1934年3月28日，其余钢盔团成员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前线战士联盟”（NSDFB）。这个新名称标志着，独立钢盔团的时代过去了。¹⁴⁹

德国学术界的纳粹化

到1933年底，纳粹已经在政治和象征意义上完全控制了德国。“时间旅人”帕特里克·利·弗莫尔对小城戈赫（位于靠近荷兰边境的下莱茵州）的第一印象相当有代表性。当时18岁的弗莫尔说：“这座城市悬挂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隔壁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纳粹党的装备：卐字臂章、希特勒青年团的匕首、希特勒少女队的衬衫以及成年冲锋队队员的褐衫；卐字形的钮孔排列成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的字样，一个不男不女的蜡像身着全套冲锋队队员制服，露出灿烂的微笑。”¹⁵⁰弗莫尔1933年和1934年徒步游历康斯坦丁诺波尔的回忆录在几十年后令其名满天下，他在书中回忆了走过寒冷的德国西部和北部时与冲锋队队员的多次邂逅。他以带有后见之明的笔调，评论了真实记忆与历史知识之间的差异。也是在戈赫镇里，年轻的利·弗莫尔在一家当地客栈里遇到了一群冲锋队队员，他们“没有戴那种可怕的帽子，看上去没有那么凶猛。其中一两个戴着眼镜，可能曾是职员或者学生”。¹⁵¹这些冲锋队队员开始哼唱流行的民歌。利·弗莫尔记得，那场景“很迷人”，并称“此时此刻，那种迷人的魅力让人无法将歌者与有组织欺凌、砸毁犹太店铺及夜间焚烧书籍的人联系起来”。¹⁵²

这一评论让我们想起了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前一年半中的复杂表现。当时的冲锋队队员并非人人参加身体暴力、焚烧书籍或者早期集中营的守卫及拷问。短命的冲锋队“大学办公室”及其地方分支说明了这种多样性。¹⁵³1933年9月9日，希特勒下令建立冲锋队大学办公室，该机构位于柏林威廉大街，由冲锋队旅队长海因里希·贝内克领导，他是一名早期纳粹积极分子，曾获得莱比锡大学历史博士学位。¹⁵⁴冲锋队大学办公室的任务是从身心上教育每一名德国大学学生，“遵从德国革命先驱的精神”，这意味着频繁的意识形态教化和不断的体育锻炼。¹⁵⁵这一新动向是德国大学强制一体化工作的重要方面。在这一时期，智力训练和思考远远不如体力和坚定的思想重要，因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理解的领导者首先要具备推行某种意志的韧劲，不管这种意志采用的是何种性质的论据。新一代学术领袖考虑的是个性和魅力，而非其推理能力。阿道夫·希特勒早在1922年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在敦促慕尼黑男青年加入初创的冲锋队时说：“那些还没有发现民族命运走向的小伙子，现在应该为一条好的道路而战斗，在这个紧要关头宁可学习哲学、埋头书本或者留在家里的人，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德国小伙子！”¹⁵⁶

虽然希特勒在1922年的反知识声明表达的是极少数德国人的意见，但在1933年和1934年的一小段时间里，这些观点很受欢迎。例如，1933年入学的罗斯托克大学学生中，有71%加入了冲锋队。¹⁵⁷不过，即便考虑从20世纪20年代起，男性青年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接受民族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事实，新建立的冲锋队大学办公室也是极具野心的，这从慕尼黑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该地区冲锋队大学办公室分部副长官是23岁的法学学生卡尔·根恩巴赫，他在1934年1月24日写给部长赫尔曼·埃塞尔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一组计划，这些举措将完全改变德国学生的生活面貌。¹⁵⁸他敦促男学

生在前三个学期接受教育与训练，最终目标是说服每名学生支持冲锋队。新生在第一学期中只需要进行政治教化，而接下来的两个学期里，男生的大部分时间将奉献给冲锋队。除了每周三个小时的“理论课程”之外，学生必须参加四个小时的实习训练，包括射击训练、行军和定义模糊的“按照冲锋队标准进行的政治教育”。另外，在附近冲锋队营地举行的为期数周的军事训练和野外演习，将占用学生的大部分假期。不过，慕尼黑的冲锋队大学办公室缺乏必要的设施，无法应付每年在该市大学里就学的2000名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因此，根恩巴赫制订计划，在阿尔高阿尔卑斯山脉旅游胜地奥伯斯多夫建设一个可容纳800名学生的大型冲锋队训练及体育营地。由于“罗姆叛乱”之后不久冲锋队大学办公室被关闭，这些计划不可能实现，但从保存下来的根恩巴赫与巴伐利亚当局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建设这所学校所需的25万马克资金大部分已经到位，此后巴伐利亚文化部和奥伯斯多夫市政当局也对此做出了承诺，后者将该计划看成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大好机会。¹⁵⁹

1934年，另一所德国名校海德堡大学已经全面开展冲锋队准军事训练课程。和慕尼黑一样，从1934年夏季学期开始，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男生必须参与冲锋队野外演习。费利克斯·哈特劳布是1934年春季课程的参与者之一，他当时正在学习浪漫主义哲学与历史，后来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最具天赋的年轻作家。¹⁶⁰在写给父亲——博物馆馆长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哈特劳布的一封信中，年轻的费利克斯详细描述了冲锋队训练的气氛。参加了几周的训练之后，他形成了不同的印象。一方面，他对大部分同学感到不满，这些人没有表现出同志般的友谊，而是过于野心和自私，没有任何“正派军人气质”。他们的社交方法主要是军校学生的“酒肉



1934年春天，德国学生兼作家费利克斯·哈特劳布在海德堡参加冲锋队准军事学生营时画的一幅画。背景中的横幅写着“提供新鲜屠宰肉类的乡村盛宴”。拉丁文意为“朋友放在心里，敌人摆在面前”，暗指德国学生兄弟会的传统，此处混合了冲锋队的新气质：有军人气概，同时也是“醉醺醺”的。

兄弟情谊”。在他们之中，完全看不到“具有男子气概的团队精神”。另一方面，哈特劳布对组织训练课程的冲锋队领导集团印象深刻，觉得其中的许多人都是“了不起的伙伴”。哈特劳布写道，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那种“令人不快的军士”，这暗指一战以来声誉不佳的低层军事指挥官。相反，这位年轻学生赞扬纳粹党最为敬业的积极分子和支持者，认为他们“非常得体”地结合了军事与意识形态信念和技能。¹⁶¹

哈特劳布的描述与后来对这些冲锋队课程的大部分评判相左，后者通常强调课程的乏味无趣。¹⁶²他的观点当然没有代表性，但说明意识形态训练和体育锻炼的特定组合对受过良好教育、接受冲锋队“现代化”态度的中等阶层青年很有吸引力。不过，其他学生和教师明显被1933—1934年大学生活中的政治元素吓坏了，特别是遇到最极端的形式之时。在这方面，加入冲锋队的学生1934年春季演唱的一首《血之歌》及其引发的争议，最能给人以启发：

在路牙上磨快长刀！
将它们插进犹太人的骨头里！
鲜血必定成河，
我们蔑视犹太共和国的自由。
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
我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杀戮。
在霍芬索伦城堡高高的灯柱上！
让那些狗吊在上面摇摆！
直到晃掉它们的脑袋！

鲜血必定成河，
我们蔑视犹太共和国的自由。
在犹太教会堂里吊上一头黑猪！
将手榴弹扔进国会！
鲜血必定成河，
我们蔑视犹太共和国的自由。
将情妇拖下王子的卧榻，
用犹太人身上的肥膘涂抹断头台。
鲜血必定成河，
我们蔑视犹太共和国的自由……¹⁶³

这首歌是对《被迫害者之歌》或者《阿布萨隆之歌》的拙劣模仿，后者在1848年革命期间以“黑克尔之歌”为名风靡一时，直到19世纪下半叶仍在整个德国传唱，加上更具军国主义色彩的歌词之后，成了世纪之交的一首大学歌曲。原词赞颂对德国民主的不竭渴望，巧妙地利用动词“吊起来”，对比了“吊死某人”和“坚持德国共和梦想”的不同含义。与之相反，纳粹版本的歌词极端粗野，沿用了原词的零星片段和反保皇主义元素，但表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冲锋队加进了从20世纪20年代起极右翼党派为人熟知的反议会制论调、反天主教的侮辱性语言（“黑猪”）、更重要的是对犹太人的威胁，炮制了一首德国街头有史以来最具仇视态度的歌曲。¹⁶⁴

1934年5月，慕尼黑和附近魏恩斯特凡的冲锋队学生组织多次在梅明根、弗赖辛等城镇演唱这首歌曲之后，慕尼黑及弗赖辛教区主教和路德维

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校董会联合向巴伐利亚教育与文化部正式投诉。主教不仅敦促当局阻止传唱这首“粗俗、残忍且下流的歌曲”，还指出许多梅明根居民甚至该镇冲锋队组织成员都已经被它惹怒。这一投诉表明，教官们实际上可能违背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强迫许多学生唱这首歌。¹⁶⁵上述事件并不是偶然、孤立的。早在1929年，汉堡附近万德斯贝克的一名冲锋队领导人向其上级投诉，他所在城市的冲锋队队员唱“无礼、粗俗的歌曲”。这位冲锋队领导人声称，此类歌曲从衣冠不整、行为失当的冲锋队队员口中传出，不仅吓跑了广大民众，还令正直的纳粹积极分子不愿参与活动，他还说，已经禁止手下的队员唱这些歌曲。¹⁶⁶慕尼黑冲锋队大学办公室在1934年同样禁止唱《血之歌》，但为此前的行为辩护，理由是这首歌在德国领导学校中很流行，“在向年轻学生传授老冲锋队队员精神时并非不适合”。1934年1月19日写给巴伐利亚教育与文化部的另一封信中，冲锋队解释道，正式禁唱这首歌的理由并不是其内容，而是因为“所教育学生的内在斗志还无法与老冲锋队队员的革命精神相提并论”。¹⁶⁷

不到两周之后，罗姆和许多冲锋队高级领导人被枪杀或者监禁，冲锋队大学办公室野心勃勃的计划因此无法实现。为此，在1934年8月底写的一封信关于《血之歌》的信件中，大学办公室此前的自信态度几乎荡然无存。慕尼黑的冲锋队官员此时承认，这首歌在班贝格和施派尔等城市也曾传唱，但这些城市并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他们声称，在慕尼黑冲锋队大学办公室登记的2200名学生中，只有40人从未唱过《血之歌》，无论如何，整个事件都应该看成天主教会败坏民族社会主义声誉的蓄意行为，这种攻击令人想起了“过去最为邪恶的报刊论战”。¹⁶⁸

尽管冲锋队大学办公室关闭，身着褐衫的学生和老师仍是德国大学里

常见的景象。¹⁶⁹纳粹的“科学政策”明显有利于与纳粹运动有意识形态纽带的年青一代学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往往也愿意取代那些被迫辞职的人。¹⁷⁰相反，资深教授们很快就开始抱怨学术界不得不接受强加的政治观点。1934年4月，弗赖堡的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哀叹，大学当局只接受“冲锋队性质”的新生——也就是“对科学最不感兴趣”的人。¹⁷¹其他人较为乐观，深受尊敬的哥廷根大学新教神学教授曼努埃尔·希尔施也承认，1934年的“冲锋队学生”不如前一代成熟、深刻，后者的人格是在一战的堑壕中塑造的。不过，希尔施热情地赞扬新一代，认为他们给协调新教神学与民族主义政治学带来了最受欢迎的机遇。他愿意屈就于德国大学的新环境：“我们的学生正确地意识到，只有他们所属的战士团体曾经保护、也仍然在保护我们教师的脑力劳动，避免我们的影响力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德国的民族性也是如此，当今的德国思想只能存在于由‘元首’及其冲锋队建立和维持的新集体意志之中。”¹⁷²

希尔施绝不是一个特例，在许多大学里，冲锋队最初都得到了德国教师与学生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新教神学院系里。罗斯托克的神学学生加入冲锋队的比例高于法学和医学学生，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两位新教神学教授积极协助组建“波美拉尼亚教会战斗队”，这是一个以冲锋队方式参与“政教斗争”的学生积极分子组织。¹⁷³明斯特不仅有许多学生在1932—1934年加入褐衫军，多名新教神学讲师与教授也参与其中（但不一定加入纳粹党）。1946年，其中一个人解释了自己的行为：“自信、积极的基督徒加入冲锋队，是为了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这一陈述表达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年轻新教神学学者的希望，他们通过与纳粹运动的紧密结盟，试图复兴基督教信仰，并将该运动视为一项新“民族使命”的启动信号。¹⁷⁴

几年以后，事实证明这种希望只是幻想。但即便到了1937年初，冲锋队影响力已经锐减，明斯特的许多学校利用这一机会将其学生从冲锋队撤出，新教神学院系仍然没有这么做。¹⁷⁵几个月前，纳粹政权颁布正式禁令，宣布冲锋队及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适合从事神学研究，对于意识形态上坚定的神学学生来说，这无异于一次令人痛苦的打击，特别是这一禁令不区分新教教会的不同派系，也就是亲纳粹的“德国基督教徒派”和更持怀疑态度的“认信教会”教徒。¹⁷⁶由于1937年9月教士和神学学生被明确禁止加入纳粹党，当该党再次开始接收新成员时，这些规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屏障。¹⁷⁷

到1938年，冲锋队在德国大学的重要性已经远不及几年之前，部分原因是具有军事野心的年轻人此时无法直接进入国防军。仍为冲锋队队员的德国大学生必须执行其冲锋队任务。¹⁷⁸例如，科隆大学中在冲锋队登记的学生，大多数都不再加入大学的冲锋队组织，宁愿留在原来的单位中——而且往往不在任何一处执勤。从科隆大学档案中留下的信件可以清楚地看出，驻大学的冲锋队代表对登记人数下降采取了两方面的应对措施：首先，他们定期给准备期末考试的学生放假；其次，他们强令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参加冲锋队会议。¹⁷⁹不过，这些会议很少进行，也绝不像1933年和1934年那样要求大批学生到场。¹⁸⁰以政治和仕途为导向的学生此时得到建议加入党卫队的行列，理由是冲锋队能提供的不过是政治上忠于纳粹政权的官方证明。

洗劫国家

1933年和1934年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冲锋队与国家及警察部队的关系，还显著改善了其财政状况。1933年之前，冲锋队通常囊中羞涩，以至

于普通冲锋队队员的政治激进活动往往伴随着痛苦的财务牺牲。纳粹成功接管国家，使冲锋队有权动用德国的财政资源，此外还使队员们能够从非法勒索阴谋中得益，有些时候，这些行动发展成专门敲诈“保护费”的组织。例如，1933年6月21日起，柏林-勃兰登堡的“冲锋队自助工作组”以“年费”形式向“雅利安”企业出售标有“德国公司”的标志牌。¹⁸¹伍珀塔尔的冲锋队勒索分子为收到的“保护费”出具收据，对于最受影响的小食杂店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¹⁸²

但是，与褐衫军从德意志帝国得到的钱相比，上述行为所得微不足道。从1933年5月19日起，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定期从内政部得到经费，有时每个月支付两次。头期款10万马克相对适度，但金额很快成倍增加，1934年1月和3月都达到800万马克。1933年5月到1934年4月之间，德国纳税人用于支持褐衫军的款项达到将近4500万马克，其中4200万马克立即就挥霍一空。内政部将所有款项转到巴伐利亚抵押与承兑银行英戈尔施塔特分行，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在该行有至少7个不同的账户。只有两个账户用于来自国家的存款，一个用于上述的内政部拨款，另一个用于财政部，该部向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提供了2800万马克。¹⁸³德国在1933—1934财政年度用于冲锋队的总预算超过了7200万马克，这还不包括队员缴纳的费用，也不包括相对少的富裕冲锋队队员及大企业的自愿捐款。¹⁸⁴

冲锋队用这些钱实现装备的现代化，支持此时在全德国建立的冲锋队训练营，以及组织和分支机构的常规预算。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超过3300万马克的人员费用。训练营支出排名第二，用掉了将近500万马克，接着是一次性投资，如15万名“穷困冲锋队队员”的制服、皮靴和内裤购置费用。德国审计法院1934年6月8日的一份详细报告称，冲锋队表达了以“经济”

方式使用这些资金的意图，但仔细跟踪大部分支出是不可能的。只有严格、详尽地审查不同省份冲锋队组织的财务状况，才可能实现这种透明度。¹⁸⁵

1934年夏季的纳粹党对国家控制其财务活动毫无兴趣，特别是在审计法院对其活动的地区性调查已经揭露非法行为的情况下。例如，冲锋队柏林—布兰登堡地区总队在1933年将所有常规薪资标记为“费用津贴”，结果是，冲锋队组织与队员个人全年都未缴所得税或者社会保险。这个地区总队还向某些成员预支工资，没有要求偿还。最后，首都的冲锋队仅在1933年4月就为“政治目的”花费了超过1万马克，这笔钱的真实用途无人知晓。¹⁸⁶冲锋队奥地利地区总队随着1933年6月19日该国政府取缔当地纳粹党而成为非法组织，德国在1933—1934年为该组织提供了1326000马克的个人费用补贴，以及300万马克的冬装购置费。¹⁸⁷

“长刀之夜”对于纳粹党来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审计法院问题的好机会。在1934年7月23日的一封信中，刚被任命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的纳粹党财政局长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通知审计法院院长，冲锋队的所有财政事务从此由纳粹党全权负责。作为希特勒的特使，施瓦茨将亲自监督此后国家给冲锋队的进一步拨款。¹⁸⁸两周以后，施瓦茨通知德国财政部，国家拨给冲锋队的所有资金立即转入纳粹党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银行设立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账户。更重要的是，此后的所有财务监督不由德国审计法院进行，而由纳粹党自行处理。¹⁸⁹这一新制度实际上阻止国家在此后数年内控制和监督冲锋队预算。此后，德国审计法院写给纳粹党的信件（最后一封写于1935年6月21日）都没有下文。与此同时，纳粹党宣布自身为“公共机构”，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不受限制地动用德国国库。

因为1934年之后缺乏对冲锋队的独立财务审核，想要提供之后数年的准确预算数值是徒劳之举。冲锋队队员使用的大部分资金继续来自国家，由确立财务事务监督权的纳粹党经手，后者实际上控制了之前半自主的冲锋队。在这个框架下，冲锋队参谋长继续享有相对的自主权，他对此的利用方式似乎类似于清洗之前的冲锋队。例如，1938年11月4日，冲锋队参谋长卢策命令，所有冲锋队地区总队及总部领导人只要有另外的来源产生额外收入，就可以在专职冲锋队领袖的固定收入之外，每月得到200马克的费用津贴。¹⁹⁰卢策本人和许多其他纳粹官员一样，在担任冲锋队参谋长的9年里成为了非常富有的人。¹⁹¹根据他于1932年向柏林中区税务局提供的信息，1931年他没有任何资产，1932年也只赚到12194马克的中等收入。¹⁹²可是，卢策于1943年5月2日去世之后，遗嘱执行人发现他积累了超过20万马克的财富，此外还有可观数量的应收款，来自一家以汉诺威为基地的公司、两所乡间住宅和一个种马场。¹⁹³他的房产总价值达到396000马克。卢策的收入来源多种多样：除了冲锋队参谋长的月薪和与职务有关的多项费用津贴之外，还从家乡贝弗根提供的10英亩空地得益，他于1936—1937年在这块地上建造了富丽堂皇的“扎尔滕霍夫庄园”。卢策还至少接受了希特勒的一次馈赠，后者在他50岁生日（1940年12月28日）亲自写了一张10万马克的支票给他。¹⁹⁴尽管资产可观，卢策在1939—1943年完全没有纳税，他谎称希特勒的赠款是一笔债务，德国总理可以随时收回。不过，由于希特勒不希望开展对漏税的正式调查，卢策的妻子和儿子们持有大部分资金和资产，直到二战之后。1957年，卢策在世的最后一个儿子阿道夫去世，28岁的他和父亲一样死于保时捷跑车事故，此后继承人于1958年以28万马克的价格售出扎尔滕霍夫庄园。尽管这份遗产由12个受益方分

割，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初年仍是可观的收入。¹⁹⁵冲锋队宣传的“民族共同体”内部社会平等从未实现，但至少该组织的一些宣传者及其家人得到了真正的红利。

团结与不满

1933年间，希特勒的领导地位得以稳固，纳粹党也成为了唯一合法政党，冲锋队中的不满情绪随之增长。虽然罗姆1933年6月18日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讲话中继续赞扬冲锋队是“新帝国的开拓者”，要求他的队员“像以前一样精神抖擞”，但希特勒、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和当时的其他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都宣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结束。¹⁹⁶前几个月主要由冲锋队犯下的过度暴力行为，再也不能用面临“坚定而强大的政治敌人”带来的危险作为“正当理由”了。因此，虽然冲锋队继续通过吸收过去的对手而壮大，财务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至少可以保持与纳粹党的相对独立，但它的地位还是弱化了。许多冲锋队队员越来越感觉自己被党冷落甚至背叛，他们渴望提升社会地位，包括对政治激进行动的物质“补偿”，可这些只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实现了——而且基本是较为高层的冲锋队领导人。普通队员中对进行“第二次革命”，或者至少推进建立“民族共同体”下一步措施的呼吁得到了响应。这些冲锋队队员希望，新“革命”的支持者不会向制度妥协，履行全新社会秩序的承诺，使冲锋队爬上社会阶层的顶端。对希特勒来说，这种党内反对是很危险的，尤其因为这是一种草根现象，是由那些只想通过一份永久的“文职”工作（重新）获得中产阶级地位和稳定性的人推动的。由于激进的

辞藻和对稳定社会地位的渴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些历史学家曾讽刺冲锋队队员是“寻求养老金的亡命之徒”。¹⁹⁷这种批评充满理性、切中要害，但忽略了大部分冲锋队队员在持续困苦、工资零增长和创纪录失业率的时代中面临的现实压力，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纳粹党机关与准军事部队底层人员之间疏远的某些动因。

第5章 “罗姆清洗”与纳粹同性恋者的神话

小资产阶级群体有可能（看上去似乎很有可能）重拾为其量身定做、以肮脏心理为基础的某种道德；他们又一次将希特勒视为救世主。

——托马斯·曼日记，1934年7月4日¹

1933年底，纳粹对其独裁政权的真正和臆想对手发动的第一波暴力活动减弱了，但1934年初的几个里，德国的紧张局势有增无减。这场愈演愈烈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发生在纳粹党内部，一部分人坚持按照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进德国社会根本转变、完成“革命”，而与之对立的派系则更愿意与传统精英集团达成妥协，以便进一步巩固纳粹党刚刚获得的权位。人们常常将这两种立场和罗姆及与之对立的希特勒、戈林及希姆莱联系在一起，不仅是意识形态之争，还代表着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的根本差异。本章将首先跟踪这一重点冲突，重新审视冲锋队在1934年上半年的政治野心。然后，我们将详细分析6月30日到7月2日发生的事件，讨论它们的直接政治后果。最后，我们将“长刀之夜”放到第三帝国法律及政治发展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同时还将介绍冲锋队“同性恋”这一陈词滥调的起源。²

摊牌

正如上一章所述，虽然纳粹取得了政权，冲锋队队员们也提升了社会地位，在就业市场上有了更多机会，但从1933年夏季起，他们中的不满情绪却在增长。相当一部分具有更好教育背景、但资历较浅的纳粹党员已经由于政治归属而开始崭新的职业生涯。按照坊间的说法，这些人是所谓的“3月幸运儿”或者“3月受害者”——暗指1848年3月在柏林和维也纳死去的二百多名革命者。相比之下，许多长期积极分子仍然经济困顿、持续失业，就业前景黯淡。这些人很快将罪责归咎于通常的嫌疑人——犹太人和工业界、经济界的“权贵”，但是，他们也越来越怀疑纳粹党领导层是否有雄心和能力，履行前几年做出的、影响深远的承诺。

而且，数千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此时穿上了褐衫，这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特别是给长期服役的普通冲锋队队员造成了困扰。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这些前竞争对手在多大程度上潜入冲锋队中，就成了争论的焦点。³即使在纳粹掌权之前，德国共产党也曾声称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冲锋队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到1932年底，柏林有不少于164名“亲信”，萨克森州的茨维考有18名、开姆尼茨有42名。⁴此后两年里，明显有更多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冲锋队，其中一些是自愿的，另一些则是成批整合的。以不可信赖著称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任负责人鲁道夫·迪尔斯后来声称，1933年首都冲锋队的所有新成员中，70%都是前共产党员。⁵这一数字当然有些夸张，还应该注意，这些“牛排”（这么称呼

他们，是因为他们外穿褐衫，里面却有一颗“红心”）中，有些人加入纳粹准军事组织是出于策略原因，而不是热情或者政治“觉醒”。在冲锋队恐怖活动几乎不受限制的时期，许多人合理地认为，加入冲锋队行列是明智之举，特别是有敌对组织背景的人。1933年春夏出于策略原因加入“钢盔团”（唯一合法的非纳粹准军事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很快发现，自己被整合进扩张中的冲锋队。因此，这些人的忠诚度极其难以判断，如果让他们回忆1933年之前归属的准军事组织，许多情况下都没有可靠的答案，各个党派经常煞费苦心确定改换门庭的行为到底是“真诚”的，还是“形式上”的。但是，同时代的观察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出于策略原因加入冲锋队的人数众多，对于第三帝国早期冲锋队队员中愈演愈烈的反资本主义和反保守潮流，他们应该负有一部分责任。⁶

1933年12月，希特勒任命罗姆和赫斯为德国不管部部长。野心勃勃的罗姆将此看成对其远大目标——保证冲锋队在第三帝国特别是军事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背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冲锋队应该提升为德国最重要的“武士扈从”，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吸收相对较小的国防军及其“保守的”将军们。据说，罗姆曾说过，国防军的“灰岩”将被淹没在“褐色洪流”之中。⁷不过，罗姆是否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推行这些计划，是很值得怀疑的。按照他的传记作者埃莉诺·汉考克的想法，如果他的计划不能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就很有可能像1925年那样退缩。⁸

1934年初，冲锋队的人数超过了300万，而魏玛国防军仍然正式限制在10万名职业军人。接下来的几个月，冲锋队与国防军之间的对抗升级，成为争取“元首”支持的“选美”。希特勒最初的态度是不偏不倚，尽管他早期因为军事原因更倾向于支持国防军，但试图从冲锋队对正规军的压力

中得益，认为这将使军队领导人更愿意接受纳粹政权的政治特权。可是，在1934年2月28日对军队领导人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希特勒首次公开拒绝了罗姆将冲锋队转为“民族武装”的计划，而是确认国防军仍将是德意志帝国的正规武装力量。出于现实的原因，他敦促国防军与冲锋队暂时在边防和德国青少年从军前训练领域紧密合作，但从更长的时期看，他无疑不会让冲锋队作为一支军事力量。⁹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重申了1925—1926年重组冲锋队时期的立场。然而，罗姆也忠诚于自己从20世纪20年代起的想法。就这样，此前罗姆的“前线联盟”政治理念与希特勒“党控制冲锋队”思想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不过，1934年的冲突不再仅仅限于一个边缘党派与其准军事分支之间，而是占据了国家政治的中心舞台。因此，卷入者比以往更多，而且所有人都在玩一场高风险的游戏。¹⁰

从1930年底自玻利维亚回归时起，罗姆就是纳粹党中饱受争议的人物，1932年3月，前纳粹分子赫尔穆特·克洛茨公开了罗姆写给卡尔-京特·海姆塞特医生的私信，这对罗姆的地位毫无益处，因为海姆赛特是一位心理学家，和冲锋队最高领袖同样满怀对军事的热情，而且对男同性恋有强烈的兴趣。¹¹这些私密信件让人们认为罗姆是同性恋者的事实不再有任何怀疑。由于这个原因，罗姆在纳粹党内的敌人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了一次未遂刺杀阴谋的目标。¹²1934年春季，他不仅面对多名纳粹领导人（包括戈林和希姆莱）的敌视，还受到了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及其忠诚助手瓦尔特·冯·赖歇瑙的压力。布隆贝格因为效忠希特勒而被军人们称为“橡皮狮子”，他在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几个月里有意地大肆宣传冲锋队带来的风险，将国防军称作政权唯一可靠的保卫者。有些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是约翰·惠勒-本内特）声称，布隆贝格成功地迫使希特勒发动了对冲锋队的暴

力镇压。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这些指控。¹³不过，布隆贝格及其密友们无疑打算挫败与之竞争的冲锋队，也愿意为这一成功付出很高的代价。¹⁴

1934年春季，德国政坛的另一个群体试图打击冲锋队，并以此发动以纳粹政权为目标的全面攻势。这些人就是政府内部的反对派，其核心是为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效力的人。在巴伐利亚律师、政治作家埃德加·J. 容和冯·帕彭的首席新闻发言人赫伯特·冯·博斯领导下，他们归属于所谓的“新保守派”，该派系最初倡导以一个独裁国家解决魏玛共和国的问题，但很快对纳粹政权蔑视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做法产生了反感。他们厌恶冲锋队的极端主义言论，将纳粹的“社会”革命视为“卑贱者统治”的最终胜利，因此是恐怖、野蛮和无法无天的。¹⁵冯·帕彭总是口称“更高价值与道德”，却能接受最亲密的合作者遭到政治谋杀，而新保守派成员则不同，他们表现出了真正的勇气和决心，准备推翻纳粹政权，最理想的情况是代之以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及国防军支持的右翼保守派新政府。¹⁶

作为活动的启动信号，这个组织的成员认真草拟了一份谴责性的演讲稿，由冯·帕彭于1934年6月17日在中黑森州马尔堡发表，希望对纳粹政权的严厉批判能够激起政治上的巨变。这一批判既有实质，又十分尖锐，代表了对纳粹统治性质及其意识形态的正面攻击，冯·帕彭在演讲中说道：

“任何民族想要经受历史的考验，就无法承受自下而上的长期动乱。这场运动总有一天要停止；在某个时候，必然出现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由公正的司法和无可争议的国家权威来维护。”果不其然，这一演讲并没有驳斥1933年的“民族革命”以及最后一年半的“成果”，但明显谴责已经发生的“过度行为”。这些“反叛者”的结论无异于口头宣战：“解放社会最底层、

打击更高阶层的时代过去了。”¹⁷当冯·帕彭讲出这些话时，令大部分听众感到高兴的是，两名身着制服的当地冲锋队领导人据报已经离开了会堂。¹⁸

演讲所在地是德国最受推崇的一所大学的旧礼堂，是为了攻击第三帝国野心家而精心挑选的。高雅端庄的学术氛围与街头的血腥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也说明了反叛者们的孤立。纳粹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集市广场和体育馆里聚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而他们只能选择一个虽受尊敬、但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的场所来发表谴责。演讲过后仅几个小时，戈培尔的宣传部就禁止报纸报道此事，并阻止电台广播，使讲话的影响更为有限。尽管如此，帕彭的讲话仍然在德国和海外广为人知，因为反叛者们预见到纳粹的审查，已经向朋友和外国记者分发了数百份演讲稿副本，使其出现在国际媒体上。但是，他们计划中的政治觉醒呼吁没有取得成果，因为国防军和年老的兴登堡总统没有任何反应。这次演讲并没有造成政府的变更；相反，它加速了纳粹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的爆发。

1934年6月19日，就在冯·帕彭的马尔堡讲话之后两天，德国各省长官于柏林内政部开会。在这次秘密会议的开幕致辞中，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不仅宣布权力进一步集中，还哀叹愈演愈烈的内部摩擦正在削弱国家的权威。此外，他还报告道，近几天破坏活动有所增加，也许是将矛头直指冯·帕彭的讲话。弗里克说道，1933年春季的快乐不可能持续太久，很有必要对各种“失败主义者”采取强硬立场。他的讲话过后，多名地方行政长官报告了对纳粹党及所在地区代表的广泛批评。他们指出，地方纳粹领导人的许多“性格缺陷”已经成为该党公共形象中的严重问题。来自科布伦茨的威斯特伐利亚州总理费迪南德·冯·吕林克声称，德国民众无法理解纳粹党及下辖组织高官相对较高的工资，特别是因为现在有多

位此类领导人公开炫耀自己的新头衔和财富。他的同僚、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卡尔·克里斯蒂安·施密特直接将冲锋队引为所在省份不满情绪的源头，要求冲锋队宪兵提供更多支持，处理四处劫掠却几乎总是免于起诉的冲锋队队员。¹⁹

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不得而知，但会上讨论的话题，以及发生的相对坦率的辩论，都说明冯·帕彭的讲话激励了保守派，他们对纳粹党及其政策的批判已经公开化。与这一转变的同时，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E. 多德在1934年6月20日报告了德国政府内部存在的紧张局面。他说，有流言称，“国防军已经用新招募的士兵补充了力量，他们将与冲锋队所嫉恨的、由保守分子组成的党卫队协作，也可能会同普鲁士警察，迫使总理解雇其激进派顾问、解散冲锋队，谨慎执政。有些人似乎确信，这一圆满结局将很快达成。”然而，大使继续说道，一场“向右转的变革”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希特勒不会“支持任何此类运动”，主要的理由是他“不愿意破坏与老牌追随者之间的联系”。²⁰

多德的报告证明，观察家们在1934年夏初预计，“革命”的冲锋队与相对“保守”的国防军及日益强大的党卫队之间会发生一场激烈的冲突。虽然大使显然过分强调了希特勒对罗姆和其他“老战士”的忠诚，但他对这种对抗的时机判断是正确的，仅过了几天，这些政治紧张局势就爆发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纳粹党内政变。从1934年7月初的致命事件以来，政治观察家们就在猜测这场杀戮的背景，以及幕后的指挥者。²¹据许多当时直接涉及政治的人士报告，希特勒不是这些事件的核心人物，因为直到1934年6月底，他似乎都很不愿意做出艰难的决定。不过，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将要看到的，正是希特勒做出了发动打击的最终决策，一旦心意已定，他就会毫不

留情、绝不后悔地推行下去。

与此同时，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几个月间对罗姆及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发动致命攻击的推手已经证实，这些人是戈林、希姆莱、希姆莱的副手、党卫队情报机关“帝国保安部”负责人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以及国防军将军、1934年任国防部部长的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和他控制的国防部办公室主任瓦尔特·冯·赖歇瑙。按照历史学家库尔特·戈斯魏勒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倡导的唯物主义史观，清算罗姆冲锋队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大财团”，因为罗姆的目标据说是“废除重工业和大农场的优越地位”。²²戈培尔及时倒戈以保住官位，但当时的大部分评论家都注意到，他在清洗之后的地位似乎明显削弱。相比之下，战后有些报告断言，冲锋队精心策划了推翻政府以便强力推进纳粹“革命”的计划，并制定了“由最高指挥部下发的”杀戮名单，对这些说法应该极端谨慎对待。²³我们不应该将许多冲锋队领导人的异议和不满与可持续的政治策略混同。针对希特勒、日益强大的党卫队和国防军发动暴力行动的计划并不存在。²⁴

“帝国杀人周”

对于1934年6月30日到7月2日展开的行动，并不缺乏生动的描述。²⁵本节的目标不是提供又一篇详细的叙述，而是从中挑选出一些特征，说明冲锋队在这一致命打击期间以及之后做出的反应。要探究这一方面的情况，最好的档案是维克托·卢策的详细记录，他于1934年7月1日被希特勒任命为罗姆的继任者。就任之后几周，卢策开始定期以书面形式记录自己的政治思想，并将这一习惯延续到1943年5月2日因车祸身亡为止。他长达312页的

“政治日记”至今没有出版，只有他对“罗姆清洗”的说明以三篇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1957年5月14—16日的自由主义报纸《法兰克福论坛报》上。与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类似，卢策的说明既是为自己写的，也是为后代写的。“罗姆清洗”之后，这位新任冲锋队参谋长觉得特别有必要为自己辩护，对抗有关他出卖冲锋队同志的指责，因为他是从这次杀戮事件中受益的少数几位冲锋队领导人之一。这种自证的渴望是开始写日记的重要初衷之一。后来的几年，尤其是1941—1943年，卢策的日记采取了一种心理治疗式的风格，因为他发现越来越难找到政治受众，更遑论对政治进程的影响了，这令他沮丧，最终陷入消沉。²⁶

尽管卢策在纳粹运动的漫长生涯中取得了成功，包括1933—1941年间任普鲁士汉诺威省省长，但从未引起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²⁷在大部分情况下，卢策被当成一名毫无个性、唯唯诺诺的人，²⁸一名“苍白无力的希特勒臣属”，²⁹希特勒“平凡的宠物”之一。³⁰这种刻薄的描绘部分反映了对1934年后冲锋队的成见，但也说明人们觉得卢策不太重要，至少比不上前任。不过，冲锋队正是在卢策管理下完成了复杂的转变，在接下来的9年（直到1943年5月）里仍然是最大的民族社会主义群众组织之一。

1890年12月28日，卢策出生于泰克伦堡贝弗根，他是一战中的职业军人，从1922年起成为纳粹党和冲锋队早期成员，1926年任冲锋队“鲁尔区队”指挥官，两年以后晋升为冲锋队鲁尔区队长。1930年9月选举之后，他成为纳粹党国会议员，尽管1934年7月1日之前在纳粹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他被任命为冲锋队负责人仍然出人意料。这说明他在公众面前十分低调，1932年1月到1934年6月，他的名字甚至一次都没有出现在全国发行

的《冲锋队队员》周刊上。³¹从罗姆对手的角度出发，将卢策提升为冲锋队参谋长意在永久性地削弱褐衫军的影响力。由于卢策在冲锋队内仍无可以借重的权力基础，只能完全依赖希特勒的善意。他在日记中坦承，自己无条件地尊敬“元首”，从不批评希特勒。与其他冲锋队指挥官相比，卢策更愿意执行主子的意志，小心翼翼地保证不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

卢策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6月22日，他从希特勒那里第一次得知解除罗姆冲锋队领导权的计划。当天，总理要求卢策来到柏林，与其面对面交谈，并向他介绍应该是罗姆制订的所谓“叛乱”计划。³²当卢策回答，他从未听说这些想法时，希特勒引用了盖世太保提供的证据，命令卢策不要再接受来自慕尼黑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命令。³³如果我们相信卢策的版本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本人相信自己写的东西——那么他在7月1日之前还没有得到罗姆的地位。但是，从1934年6月22日起，他意识到冲锋队高层即将出现变动。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假设，卢策希望自己在场冲突中成为赢家。³⁴

卢策假装并未卷入这一事件，直到1934年6月28日，他在埃森参加了纳粹党大区领袖约瑟夫·特博文的婚礼，希特勒和戈林都是后者的傧相。席间，希特勒迅速离开婚庆台，接了几个盖世太保和戈林的得力助手、普鲁士国务部长保罗·科尔纳打来的电话。卢策后来评论道：“我有一种印象，某些人对元首不在柏林时局势恶化很感兴趣，这样，元首就不能得到书面通知，只能从电话里得知每一件事。”他坚持这样的观点：罗姆从来没有计划要于1934年6月30日发动反对希特勒的叛乱。卢策相信，如果罗姆曾经策划过什么，那就是限制或者废除“保守的非社会主义军队（原文如此）”。³⁵

希特勒提早离开特博文的婚礼派对，在凯撒霍夫酒店附近与戈林及卢

策一起度过了当夜余下的时间。晚上，科尔纳从柏林抵达此地，带来了消息，根据卢策的报告，这令希特勒喊叫道：“我无法忍受了，我要杀一儆百！”此后，希特勒致电罗姆，召集他和其他冲锋队领导人到慕尼黑南面不远处的上巴伐利亚温泉小镇巴特维塞，在当地的汉泽尔鲍尔旅馆开会。会议于冲锋队全国性假日的第一天（6月30日）早上10时举行。6月29日凌晨1时许，戈林离开埃森前往柏林，负责首都行动计划的实施。³⁶柏林成为了巴伐利亚之后的第二个杀戮行动中心。

6月29日（星期四），希特勒和卢策待在波恩附近的巴特哥德斯堡，戈培尔于当天晚间抵达。根据卢策的描述，气氛非常放松，直到午夜过后不久，希特勒接到了柏林打来的另一个电话，命令戈培尔和卢策和他一起乘车前往附近的汉格拉尔机场。飞机大约在凌晨1时45分起飞，卢策还记得“晴朗、美丽的天空”以及法兰克福闪烁的灯光。机上的人们没有讲多少话。卢策声称，他走近希特勒，要求后者“改变即将实施的逮捕行动的方法”，但恐怕没有得到回应。他们的飞机最终在日出时降落在上维森费尔德机场。党卫队队员立刻簇拥着希特勒，向他传递最新消息，令其又爆发出狂怒和兴奋的情绪。此后，希特勒叫醒了两名当地冲锋队领导人——冲锋队副总指挥奥古斯特·施耐德胡贝尔和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威廉·施密德，并将其召到机场。当他们抵达时，希特勒称其为“叛徒”，扯掉他们的肩章并宣布：“你们被逮捕了，将被枪决！”然后，党卫队携带拟拘押者的“黑名单”蜂拥入城。接着，在希特勒副官尤利乌斯·绍布、威廉·布鲁克纳及多名党卫队队员和警察陪同下，希特勒、戈培尔和卢策驱车向南。³⁷他们在巴特维塞逮捕了罗姆和多名在场的冲锋队领导人，将其带往慕尼黑的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这些人要么在当天晚间，要么和罗姆一样在次日遭到

枪决。³⁸

6月30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慕尼黑处决第一批犯人之前，纳粹主要领导人希特勒、戈培尔、赫斯和其他纳粹党官员在该市的“褐宫”举行会议。多名冲锋队副总指挥也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卢策、他后来的继任者马克斯·于特纳以及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卡尔·施赖尔。施赖尔在1949年回忆道，希特勒“像疯子一样”冲进会堂，“口沫横飞”。他指控罗姆叛国，并称这场所谓的“叛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背叛。³⁹然后，希特勒任命卢策为罗姆的继任者。卢策写道：“在那一刻，我宁愿拒绝”，此后他做了冗长的解释，说明接下来的几天自己是如何尽力团结和帮助其他冲锋队领导人，但无法阻止预先计划好的处决行动。⁴⁰局面非常紧张，以至于新任冲锋队参谋长都不敢前往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而是在慕尼黑豪华的四季旅馆里开了个房间，据称他在那里设立了一间临时办公室。⁴¹

柏林的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同样无情。他们为任务做了很好的准备，预先要求盖世太保和帝国保安部编制逮捕名单。⁴²1934年6月30日早上10时左右，戈培尔致电柏林的戈林。交换了预先安排的代号“蜂鸟”之后，戈林知道要做什么了。他与希姆莱及海德里希紧密协作，下令逮捕并处决了多名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以及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和其他有影响的纳粹批评者及内部竞争对手。6月30日到7月2日，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在柏林-里希特费尔德至少执行了16次立即处决行动。其他9人被射杀于家中或办公室、盖世太保总部地下室，或者被“诱杀”。⁴³

为了向公众证明处决和逮捕是合理的，纳粹政权声称罗姆和冲锋队里的合谋者计划以暴力颠覆政府，因此希特勒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6月30日傍晚，戈林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将这次行动称作“一次净化处理”，并承



1934年7月24日，新任冲锋队参谋长维克托·卢策离开位于柏林威廉大街6号的冲锋队办事处，受到希特勒式敬礼。当时，在所谓的罗姆清洗中遭到逮捕的一千多名男子仍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卢策在1934年后多次试图恢复该组织的声誉，他领导冲锋队直至在1943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诺其最终目标将是“更干净、更团结的国家”。⁴⁴希特勒同日向卢策颁布了一项详细的法令，其中使用了相同的辞藻。这项法令包括12点，命令冲锋队领导人“帮助维持和强化冲锋队，使之成为干净的组织”。希特勒要求所有冲锋队队员“盲从”和“绝对遵守纪律”——换言之，就是无限制地服从。按照希特勒的敕令，花天酒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对冲锋队来说最为耻辱的是，法令中的一个段落描述该组织充斥着道德败坏的同性恋者。希特勒宣布，从此时起，“冲锋队队员应该是领导者，而不是令人憎恨的猿猴！”⁴⁵希特勒的语气很粗鲁，而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在7月1日对军队发布

的命令则完全是一种嘲讽式的举动。他不仅向纳粹当局保证，军队感谢该党的“自我牺牲和忠诚”，还假惺惺地向已经“净化”的冲锋队示好：“军队了解与新冲锋队的共同理想，将愉快地与之培养元首所要求的良好关系。”⁴⁶两天以后（7月3日），杀人者们用《国家自卫措施法》赦免了自己，该法案对纳粹政权在6月30日到7月2日犯下的所有罪行免于起诉。⁴⁷

尽管这里日子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暴力，但德国公众对消息的反应显得平静、镇定。各地的冲锋队在确认这些逮捕行动和罗姆被清除的消息之后也没有任何反击。卢策在日记中苦涩地抱怨党卫队采取傲慢和羞辱的方法，但解除个人和整个冲锋队武装的工作并没有遇到反抗。⁴⁸美国驻德武官雅各布·维斯特于1934年7月2日从柏林报告：“麻烦在几个小时里就过去了，到周六晚间，一切都再次归于平静，街上的民众几乎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值得注意的是，袭击期间和事后，街头都没有出现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他还观察到，当袭击开始时，“所有褐色制服实际上都从街上消失了”，但他承认，这可能不是对暴力行动的直接反应，而是计划已久的冲锋队7月假期开始的原因。⁴⁹巴伐利亚当局同样报告，该州所有城市都保持平静，慕尼黑是个例外，有些人在7月1日夜间到次日凌晨被逮捕，因为他们散播有关最近事件的“不当”流言。⁵⁰

这些流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继续传播，尤其是因为有数百人消失，他们的亲友对其行踪毫无头绪。有时，某人被处决的消息在几周或者几个月后才传到了受害者家中，例如托尔高的冲锋队旗队长库尔特·莫泽特。他的父母直到1934年10月才知道儿子已经被枪决，而在3个月之前曾“试图逃离”利希滕堡集中营。⁵¹与此同时，一些直接卷入杀戮的人夸耀自己的作为。根据战后的证词，慕尼黑体育俱乐部球场管理员马克斯·米勒和同名

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人。1934年夏季，这父子二人都是党卫队队员，据说，他们向熟人公开展示被处决冲锋队领导人的徽章。⁵²

纳粹政权试图在幕后与这些受害者的亲属们达成妥协，特别是那些具有影响力或者显赫地位的人。在罗姆被杀后的第四天（7月5日），巴伐利亚州总理路德维希·西伯特声称，希特勒已经下令，罗姆的母亲索菲亚·埃米莉应该继承儿子的私产，他的公寓从此不再受到进一步的搜查。据西伯特说，这位76岁的老妪听说儿子被处决之后曾自杀未遂。⁵³多名6月30日到7月2日遇害者的家人后来得到了每月支付的赔偿金。按照维克托·卢策的说法，至少有一名遗孀厌恶地拒绝了这一提议，称一个号称以“理想主义”立国的国家，却诉诸表现“金钱统治”的财政补偿。她质问道：“正派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哪里去了？”⁵⁴纳粹政权禁止发表讣告，从未澄清被处决者的名字。

6月30日到7月2日的受害者总数将近100人。赖纳·奥尔特既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丝不苟的侦探，迄今为止，他已经确定了90位被杀者的姓名。⁵⁵尽管区域研究显示，其他一些杀戮成功地躲过了后来的审查，事后已经不可能再确认这些受害者，但“未决”案例的数量可能不多于5个。⁵⁶最新数字（100人）与1934年夏季的官方统计数字惊人地相似。警察提供了一份以字母顺序排列的“死亡名单”，并经希特勒批准，其中包含了83个人的名字以及处决地点和日期。从名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慕尼黑、柏林和布雷斯劳是处决中心，分别有24人、22人和9人遇害。杀戮还在德累斯顿、什切青和利希滕堡集中营附近，以及斯图加特、普劳恩、格洛高^①、

① 现波兰格洛古夫。——译者注

蒂尔西特^①、兰茨胡特等城市和其他几个地点进行。⁵⁷

除了柏林和慕尼黑，谋杀的地理分布说明，行动集中在上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州，这些地区的冲锋队在前几年里特别“不守规矩”。⁵⁸但是，被处决的冲锋队领导人——包括柏林冲锋队领导人卡尔·恩斯特、西里西亚与他地位相似的埃德蒙·海内斯以及冲锋队驻普鲁士特别代表格奥尔格·冯·德滕——只是许多受害者中的一个群体。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如作家托马斯·曼）推测，许多杀戮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事实，针对的是直接卷入“国会纵火案”或者知情太多的人。⁵⁹其他一些受害者直言反对纳粹政权，被杀纯粹出于这个原因，库尔特·冯·施莱歇、埃德加·容和赫伯特·冯·博斯就属于这种情况。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群体是运气不佳、被错杀的人，包括音乐评论家威廉·施密德，杀手将他与同名的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混淆了。⁶⁰

在清洗之后几个月和几年里，反纳粹作家常常推断，屠杀的数量远远高于公布的数字。过高的数字有时是蓄意夸大的结果，如库尔特·吕德克所称的“超过500名冲锋队队员被杀害”。⁶¹但是，这也源自“帝国杀人周”之后的不确定性和普遍恐惧。⁶²1934年7月初，有超过1000人遭逮捕，更多的人暂时躲藏起来。来自被监禁柏林冲锋队领导人的两份匿名报告证实，这些囚犯在拘押期间遭到了虐待，最先是臭名昭著的柏林-滕珀尔霍夫哥伦比亚豪斯监狱，然后是利希滕堡集中营。对他们的逮捕最初并没有任何解释，监禁在利希滕堡的六十多名冲锋队领导人中，也没有人被起诉。⁶³德

① 现俄罗斯苏维埃茨克。——译者注

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没有被枪决的冲锋队领导人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度过了数天甚至数周，当局甚至没有佯装调查罗姆及其追随者计划的暴力政变的准备工作。据1934年8月德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纳粹政权在“罗姆叛乱”期间对不少于1124人实施“保护性拘留”。政府声称到8月中旬已经释放了1079人，其他45人留在狱中“接受进一步调查”。尽管这些被捕者悬而未决，政府仍于8月发表声明宣布“1934年6月30日的行动”已经结束。⁶⁴对于许多冲锋队高级人员来说，这一声明发布得太早了。除了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拘留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被暂时停职，甚至永久驱离冲锋队。1934年8月2日，卢策与纳粹党最高法院院长瓦尔特·布赫联手，组成一个由2—3名冲锋队领导人与布赫本人组成的冲锋队纪律法庭，着手冲锋队领导层的内部清理，这是根据希特勒7月1日的要求进行的。⁶⁵

西里西亚冲锋队编制了一份1934年7月底被暂时清除出队伍的该地区冲锋队领导人名单，其中包含了后来在这个法庭上受到指控的详细信息。有些罪名具备司法性质，包括参与过度暴力、挪用公款或者男同性恋。其他罪名则很主观，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过是基于个人观察或者流言的道德评判。例如，一名冲锋队领导人被指控于1932年加入冲锋队之前“曾加入过几乎所有政党”，而另一名领导人的罪名则是与此时被视为间谍的捷克斯洛伐克女子结婚。其他冲锋队领导人因为“完全不正当的私生活”“犯错”或者“过于年轻、傲慢，在罗姆叛乱期间有不明确的态度”而受到批评。⁶⁶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控罪部分反映了希特勒之前提出的批评，但也说明了“清理行动”的人际关系特性。就连那些“激战年代”被视为冲锋队领导人积极品质的性格特征——例如大胆和准备以暴力推动个人利益——现在也成了打击目标的武器。⁶⁷

对冲锋队的直接镇压结束之后很久，这种“价值重估”仍给许多被定罪冲锋队队员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就连留在组织、甚至爬上冲锋队高位的人也无法忘记1934年夏季的耻辱。即使在希特勒于1934年7月13日发表了为杀戮正名的无耻讲话、预言“几周之内，褐衫将再度统治德国街头”之后，这些伤疤仍然留在冲锋队队员心头。⁶⁸卢策在余生中一直是希姆莱的死敌，私下咒骂这位党卫队帝国领袖是杀人犯和伪君子。⁶⁹就算冲锋队领导人能在日常工作中放下这些痛苦的记忆，也仍存有一丝不安。齐格弗里德·卡舍的例子就反映了这种挥之不去的影响。卡舍曾执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冲锋队奥斯特马克地区总队，在1934年7月惊险地躲过一死。7年以后的1942年11月，他作为德国驻克罗地亚公使，在柏林的希特勒新总理府出席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丹麦和芬兰加入《反共产国际条约》的仪式，其间与希姆莱相遇。两人对党卫队在东欧的影响争执不下，此时希姆莱满怀敌意地对卡舍说：“他显然还没有忘记6月30日。”卡舍在笔记本上写下：“我理解他的言语中隐含的警告。”他明显因为与党卫队帝国领袖的这次冲突而惴惴不安，以至于在笔记本上两次记录了此事——在他言简意赅的笔记上，这是唯一的重复。⁷⁰

纳粹积极分子的同性恋神话

“爸爸，同性恋是什么意思？”希特勒青年团员克纳克斯问他的父亲。

“那就是你成了叛徒之后的样子。”他的父亲怒吼道。⁷¹

这则笑话发表于1934年7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报纸《新前进报》上，以简洁、讽刺的形式总结了杀人者在“罗姆清洗”之后利用同性恋污点为其政治谋杀寻找合理借口的行径。帝国新闻办公室在1934年6月30日提供了一份关于同日事件的摘要，上面就出现了为证明这些行动合理而营造的典型形象：“（在巴特维塞对罗姆和其他冲锋队领导人）实施的拘留表明，道德形象如此败坏，以至于连一丝同情都消失了。在场的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带着男宠，其中一人甚至是在最可耻的状况下被叫醒逮捕的。元首命令毫不留情地根绝这种引发瘟疫的‘炎症’。”⁷²

对“长刀之夜”的许多叙述中，都有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冲进汉泽尔鲍尔旅馆，发现冲锋队与其他男子在床上共眠的生动描绘。⁷³从历史学家的谨慎观点出发，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能够为这些逮捕行动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少数目击者的偏袒态度，这些证词的真伪无法确定。即使有人认定这种描述基于事实，他们自命正直的道德说教也是虚伪的，因为某些冲锋队高级领导人（最著名的是罗姆和海内斯）是同性恋的事实在1934年6月之前就已经是全德国公开的秘密了。⁷⁴希特勒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长刀之夜”之前一直为罗姆辩护，声称冲锋队“不是教育大家闺秀的学校，而是粗豪战士的组织”⁷⁵。道德说教长期以来都从属于动员。作为党的领袖，希特勒也容忍冲锋队上层存在的其他同性恋现象，这令党内许多人感到厌恶。

《慕尼黑邮报》早在1931年6月就曾攻击罗姆和冲锋队的同性恋活动。但是，1932年3月发表的罗姆私信对引发“道德”辩论起到的影响最大。这些信件于1931年被柏林警察没收，此后泄露给了倒戈的前纳粹激进分子赫尔穆特·克洛茨。从1929年起，克洛茨与社会民主党紧密协作，为其编辑了多份反纳粹宣传册。⁷⁶罗姆信件的副本发行了30万份，几周之后就在国会

引发了一场暴力事件。⁷⁷1932年5月12日，海内斯在国会咖啡馆认出了克洛茨，并伙同其他几名纳粹代表当场痛殴他。这次袭击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新闻，确证了民族社会主义和男同性恋的联系。带有嘲笑意味的绰号“男妓”和“第175条（指德国刑法典中关于同性恋非法的条款）卫队”变得很常见。纳粹的反对者公开向冲锋队队员高喊“色情狂罗姆！”或者“同性恋万岁！”。⁷⁸

然而，如果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反对纳粹的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普遍利用这些指控，那就错了。除了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的呼声之外，对此事的评论总体都较为克制。⁷⁹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于1932年4月在左派自由主义刊物《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为不误用私密信息影响国家政治所做出的努力。这位著名的作家、记者不费吹灰之力就揭露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虚伪，指出他们公开攻击“罪恶”的共和国，与此同时却容忍领导层内部的同性恋行为。但是，图霍尔斯基解释道，对罗姆本人讳莫如深的同性恋行为进行攻击，是不合理的——这不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我们不应该去看床上的对手。”⁸⁰“罗姆丑闻”发生后的两年，冲锋队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是同性恋这个事实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最终却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自己促成了它的持续影响。此前的流言和披露为纳粹政权能在1934年指控冲锋队是一群同性恋“堕落者”奠定了基础，这一概念风行一时，以至于“纳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仍然深深铭刻在纳粹运动的文化想象中。

但是，正如劳里·马霍费尔、亚历山大·齐恩、约恩·梅韦和安德烈亚斯·普雷策尔所强调的那样，“纳粹同性恋军团的神话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相反，它是“德国左派创造的宣传工具”，并持续到战后的数十年。⁸¹这不是说冲锋队里不存在同性恋者，而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去断

定冲锋队中同性恋的比例高于一般男性群体。⁸²即便如安德鲁·瓦克胡斯最近在关于“激战年代”汉堡冲锋队的论述中所言，地方部队中存在友谊和相互的感情⁸³，这一论断也仍是正确的。实际上，如果男同性恋者故意选择冲锋队作为其性生活的环境，那才是令人吃惊的。纳粹党官方宣称，为了保证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所有企图合法化和宣传男同性恋的举动都必须禁止。早在1933年2月，希特勒领导的新政府就开始关闭同性恋者的约会场所，如同性恋酒吧和浴室。这只是次年暴力镇压男同性恋者的开始，镇压行动导致数万人被定罪和监禁，包括数百例强制去势。⁸⁴

在民族社会主义者中，将同性恋“战士”当成一种特殊男性身份的想法——按照汉斯·布吕厄的“男性同盟”理想——仍然是少数。⁸⁵与罗姆不同，大部分激进分子不相信“同性恋战士—积极分子”的形象，而是照例将男同性恋与“女性特征”和软弱联系起来，小心地对照自身的形象。⁸⁶因此，冲锋队自由选择“出柜”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冲锋队领导层中的同性恋者有时会建立保护或者主动提拔同性恋同僚的关系网，如海内斯在西里西亚冲锋队、卡尔·恩斯特在冲锋队领导层内部建立的网络，但这最终是纳粹党仇视同性恋的结果，而不是起因。⁸⁷不过，1945年之后，就连研究冲锋队历史的严肃学者中也流行着冲锋队同性恋的神话。谈到性政治，从来不存在什么“决战时刻”；相反，对同性恋的憎恨一直持续着，从党卫队自命的“道德十字军”延续到后来的主流史学。此时，恐同性恋态度与反法西斯信念合而为一，这是一种不幸的联姻，在几十年里造成了对第三帝国迫害男同性恋者行为的贬抑。⁸⁸

后果

细心的观察家了解1934年夏季所发生事件造成的根本后果，一位美国外交官称1934年6月30日发生的事“在欧洲文明史上没有先例”。⁸⁹十年以后，当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的消息传出，“长刀之夜”在德国仍是一个参照物。一位持批评态度的观察家评论道，比起他预计将对叛乱者发动的镇压，“1934年的屠杀”不值一提。⁹⁰即便在二战结束之后很久，1957年，自由主义日报《法兰克福论坛报》仍将1934年夏季引为“我们民族史上最残暴的篇章之一”。⁹¹

与后来这些评判不同，“长刀之夜”后的几天和几周里，德国舆论存在分歧。逮捕行动尽人皆知后，社会民主党人观察到，1934年6月30日下午，首都街道上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微笑和得意扬扬的表情。其他人则注意到了怀疑和冷漠，特别是从普通冲锋队队员的脸上。⁹²因为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已经留下了堕落和下流的坏名声，许多德国人将此事归功于希特勒，认为是他果断地干预了此事。有些人甚至看到了“道德复兴”的前景。⁹³

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在国会临时办公场所克罗尔歌剧院发表长篇演讲，试图证明自己在前几周的行动方针是合理的。这次演讲进行了现场直播，许多人翘首以盼，但反应却各种各样。一位持批评态度的听众描述希特勒“处于极度兴奋和近乎病态的抑郁中”。希特勒甚至大叫，如果国家和党组织不能保持团结，他将用一颗子弹射穿自己的头颅。⁹⁴托马斯·曼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发表了“狗吠一般的演讲”，将谋杀提升到拯救行动的高

度，演说频繁被掌声打断。这位作家的评论很简短：“犹如噩梦。”⁹⁵但总的来说，希特勒不同寻常的情感表达确实打动了公众。例如，下萨克森州策勒市市长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保守派人士，他在一年一度的“神枪手节”上发表公开演讲时称，自己为希特勒的表白所感动，甚至高喊道：“仅从一个人的角度看，他值得我们报以深深的同情和最真诚的崇拜。”⁹⁶他将这名冷血杀手说成了一位敏感而负责任的政治领袖，虽然是一种怪诞的反应，但并不反常。希特勒（表演）的苦难带来了直接的政治红利——这似乎使他与据说头脑简单、野蛮“鲁莽”的冲锋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德国国防军内部，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确认了军队作为国家唯一“武士扈从”的地位，被当成一场“对冲锋队及纳粹党的决定性胜利”来庆祝——尽管这一政治成功沾满了鲜血，但它使正规军指挥官们成为了共犯。⁹⁷

策勒市长的赞美之词来自对希特勒情感戏剧表面价值的理解，而第三帝国初期的首席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则将政治谋杀视为更高级的司法形式。1934年8月1日，施密特发表一篇题为“领袖守护法律”的文章，文中不仅证明这些杀戮是合理的，甚至将“元首的行动”提升到“真正司法行动”的高度。他引用希特勒对所谓一战期间社会主义者“背叛行为”的评论，坚称真正的政治领袖也应该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官，因而“在危急时刻，他捍卫法律免遭最致命的滥用，创造了直接的正义。”⁹⁸在这场争论中，施米特不仅放弃了既有的分权原则，还将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比作所谓的“自由、积极的强制法律规范网络”。⁹⁹即使对于施米特来说，这也是引人注目的立场，在不到五个月前，他还坚持认为德国法学家有能力区分政治驱使下的“空洞意见”和“法律意见”。¹⁰⁰施米特曾辩称，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适用于手头有笼统条款的案件，而在其他所有案件里，必须尊

重法律规范。但是，即便在这些早期的文章中，施密特接受正式法律显要地位也是有条件的。他认为，政治领袖最终拥有在任何时候改变法律框架的裁量权，因为只有超越人类判断的更高正义才能限制他。因此，施米特将国家全面贬低为“（纳粹）运动领导人任意处置的实体”。¹⁰¹

施米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法律著作，促使恩斯特·弗伦克尔在1940年描述了共存的“特权国家”和“规范国家”。虽然德国法学界在整个第三帝国正式适用法律规范，但政府得到准许，可以“行使不受限制的专断和暴力”（弗伦克尔语）。¹⁰²在这个方面，“长刀之夜”是一个关键的事件，不仅结束了纳粹运动社会革命派长久的野心，而且标志着从此时起，只要纳粹领导人确认对避免危及国家发展和扩张有必要，就可以合法地实施哪怕最为严重的罪行。基于这样的推理，从技术上说，希特勒1941年6月下达的要求在东线立即处决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政委命令”，或者纳粹在东欧的种族清洗及大屠杀，都可以证明是合法的。因此，“长刀之夜”决定性地推动了纳粹道德标准的发展，这种道德不接受任何不可逾越的限制。

这些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所说的“权力决定性上移”。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政治局势不同，不仅独立的工人运动遭到破坏，“右派的自主准军事潜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¹⁰³冲锋队特别代表于1934年7月10日被正式召回，标志着野心勃勃且有一定“自主性”的冲锋队政治活动在短暂的辉煌后结束了。¹⁰⁴大约同一时期，柏林附近由冲锋队管理、臭名昭著的奥拉宁堡集中营关闭。1934年7月19日，纳粹慕尼黑大区领袖、巴伐利亚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颁布法令，从此时起，由民政部门全面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¹⁰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党严格管理冲锋队，只允许短暂爆发的暴力活动。大部分时候，冲锋队队员得到的任务性



这张1935年的宣传照片是在“波茨坦日”（1933年3月21日）两周年之际拍摄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与保守精英支持者举行象征性聚会。“汽车冲锋队”M28的成员在蒂沃利为孩子们提供热巧克力和蛋糕，那是柏林-莫比特工人阶级社区的俱乐部和电影院。

质更为“文明”，证明该组织已经转变为德国社会的一个常规特征。例如，在冲锋队北部学校接受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在当地社区服务，为儿童集会上的军乐团提供装备，成立冲锋队艺术组织，上演业余戏剧，与环境问题做斗争，并组织仲夏节庆。¹⁰⁶

虽然在杀戮刚结束时，1934年6月30日事件的政治后果尚不明确，但所有观察家都明显看出，冲锋队“毫无疑问将缩小规模”，可能沦为“非武装政治组织”。¹⁰⁷不过，这些政治谋杀不仅标志着纳粹夺取和巩固权力的结束¹⁰⁸，还标志着相对稳定的五个年头的开始，这几年见证了德国人越来越认可希

特勒的国内国际政策。1935年1月13日公投之后萨尔区回归德国，1936年莱茵兰地区重整军备以及1938年兼并奥地利，都为德国恢复中欧霸权做出了贡献，并使希特勒在第三帝国中越来越受欢迎。

然而，对于冲锋队来说，这并不是稳定的五年。该组织不管内部还是政治目标，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相对独立于纳粹党的时期一去不复返，在德意志帝国的街头与意识形态对手展开较量也已成过去。冲锋队的新角色相对不那么具有冒险性：他们的责任是向德国男青年传授纳粹意识形态，为他们在国防军服役做准备。这个使命初看之下与该组织前几年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但是，仔细的研究将会证明，这一新角色对德国的政治形势和民众心理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第6章 冲锋队在1934—1939年的改革

我们有一种印象，在冲锋队内，仍然可以找到最正统的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激进。

——一名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告，1935年¹

1934年夏季对冲锋队领导层的血腥镇压，使许多该组织普通成员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冲锋队一直吹嘘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核心地位，他们对此深信不疑。突然之间，冲锋队在前几年的“成就”以及成员们对未来的远大目标面临严峻的挑战。1934年11月，冲锋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41岁的威廉·布莱辛写信给他的上级，表达了这一多事之秋中，冲锋队队员内部普遍存在的恐惧和不安。虽然在信的开头，布莱辛表示自己避免思考冲锋队的一般特性，因为这些想法令他十分烦恼，以至于无法在信中表达，但在草草几行之后，他就将自己在物质和情感上遇到的问题与对冲锋队及其成就缺乏尊重联系起来。布莱辛的字里行间充满着讽刺和无助的愤怒：

请不要仅因为我对未来的看法，就认为我已经加入了物质主义的阵营。近来，人们被迫根据那种观点行动，而且，每个人

都有无法忽视的家庭义务。我的第一次婚姻因为自己不够关心而破裂——我不希望让这一切再发生在第二次婚姻上。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善于出人头地、拍上级马屁的人取得了进步，很快摆脱了财务上的忧虑。不适应这种状况的人只能发牢骚。

布莱辛说，大部分德国人都应该能够在第三帝国得到稳定的地位，而冲锋队领导人却“悬而未决，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记得，是我们参与了夺取政权的斗争”。²

这一陈述揭示了一种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布莱辛的不平证明冲锋队内部中产阶级情绪日益增长。与冲锋队队员以不需要物质或者社会安慰为荣的“激战年代”相反，1934年秋季的布莱辛强调自己的私人生活确实很重要，不管是他的新婚姻，还是（仍然有限的）摆脱自身财务困扰的能力。另一方面，他用“纳粹道德”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前提就是，决定个人在“民族共同体”成功与否的应该是努力和对政治事业的贡献，而不是资格证书或者职业上的关系网。³

1934年夏季对数十名冲锋队领导人的清算，使人们对如此之高的期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许多激进分子对“长刀之夜”的反应先是怀疑，此后几个月里则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据盖世太保在1934年下半年和1935年的报告，队员内部弥漫着绝望的情绪。1934年秋季，许多冲锋队队员离开了岗位。那些到岗的队员宣称，他们不是“体育生”，而是需要手持真正的武器、参加军事训练的士兵。⁴1935年5月的一份报告坦承，“普通队员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参加冲锋队的活动”。⁵盖世太保还发现，队员们一直忙于专门设计的“冲锋队职业治疗”项目，其中包含的是频繁进行的乏味任务，

以及冲锋队全国体育比赛等活动，目的只是为了掩盖褐衫军缺乏远见和“坚定目标”的事实。⁶相应地，逃亡中的社会民主党得出结论，冲锋队越来越像“同志关系原始形式的容器”。冲锋队的意识形态就像容器表面的尘土——无法渗透到冲锋队队员的头脑和内心。⁷

这种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但即便如此，所有证据都表明，冲锋队的动员能力在“长刀之夜”后急剧下降，其成员深受不安及脆弱感的困扰。直到1936年4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对数千名褐衫军发表讲话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听众们极其感谢他的鼓励，这种鼓励“不幸仍然很有必要”。⁸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在1934年底草拟了一份关于冲锋队未来的报告，恰如其分地分析了形势，概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希特勒提出的教育工作能否令人满意地代替过去的兴奋与希望尚待观察。如果该组织的士气和威望无法维持，它的重要性将会下降，或者成为日益增长的党内不满情绪的焦点。”⁹

追寻新任务

“长刀之夜”后的三年，冲锋队经历了一个衰退、不确定和重新定位的时期。它失去了财政自主权，需要依靠纳粹党及该党财政局长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¹⁰冲锋队地区总队（集团）可以自主决定开除所有由于意识形态或个人原因不适合该组织的普通队员，冲锋队领导层（指突击队长及以上级别的人员）需要由新建立的冲锋队法院经过全面调查决定任免。¹¹不无讽刺的是，罗姆建立冲锋队特别法院的宏愿实现了，但并没有保护他的手下免遭当局的指控，反而用来控告他们、支持对他们的纪律处



1938年7月17日，在拥挤的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冲锋队全国体育比赛”。来自冲锋队北海小队的几对冲锋队队员手牵着手，在他们的同志的背上保持平衡。这项运动象征着冲锋队体育运动的总体目标。与个人创纪录的表现无关，它注重的是能加强参与者之间联系的集体努力。

分。1934—1939年，所有高级冲锋队领导人中，有15%（1900人）接受了纪律处罚，主要是因为酗酒、挪用公款或者非法暴力行为。¹²

对冲锋队实施的大量处罚，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开羞辱，使他们看起来不像是纳粹的精英部队，而更像一群自负的傻瓜。这种发展在该组织中激起了各不相同的反应。从1934年夏季到1938年4月不断下降的总人数可以看出，这一期间有半数冲锋队队员永久性地离开了，其中大部分出于自愿。¹³然而，考虑到冲锋队传统的高流动率、从1935年起德国的失业率下降，以

及黯淡的现状与“将冲锋队在激战年代的‘使命’延伸到巩固后的第三帝国”这一官方新论述之间的反差，其成员人数的下降只能算适度，令人十分惊讶。尽管维克托·卢策和OSAF宣传机构将冲锋队美化为“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摇篮”，称冲锋队队员们从纳粹主义的先驱转变成新国家的卫士，但20世纪30年代中期冲锋队的日常活动不仅缺乏目的性，有时候甚至无法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只不过是在当地的树林里伐木，或者在车祸后提供援助。¹⁴在这个时期，德国大城市里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不再有匕首出鞘的共产党人，大自然中的恶魔、贫穷和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成为了新的敌人。早早起床参加冲锋队活动，仅凭这个理由就足以提升到为“民族共同体”而牺牲的模范地位。因此，西里西亚冲锋队队员在新安置房建设中的贡献被赞颂为“我们时代同志友谊的象征”。至少在宣传中，激进分子确保“雅利安”德国人凝聚力和团结的职责此时已经代替了过去与政治对手巷战的任务。不过，这种宣传仍然保持了相同的军事化语言。冲锋队为“冬季援助”筹款的工作被称为“和平远征”，每年圣诞节庆祝活动上的冲锋队则身处“最前线”。¹⁵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种公式化的宣传偶尔会令人捧腹，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时候，它们的吸引力也十分有限。但是，即便有这些不足，1938年的冲锋队规模仍然是1932年经济萧条最严重时的3倍。

许多资深冲锋队队员留在了遭受羞辱和“清理”的冲锋队中，因为他们缺乏其他选择，担忧离开可能给职业生涯造成不利影响。尽管1934年夏季之后，对冲锋队在第三帝国新社会秩序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过高期望已经不现实，但事实证明，在该组织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地位，是许多人与更有资格、更年轻、出身更好或者更有野心的对手竞争工作和影响力时唯一的优势。¹⁶而且，20世纪20年代加入冲锋队行列的人采取了激进的做法，他

们往往与老朋友和曾有的社会关系产生裂痕。作为回报，新的“冲锋队家庭”为他们提供了纽带和情感的避风港，使他们更加依赖组织。这些人写下的文字常常揭示出脆弱的自尊心；按照历史学家彼得·默克尔的说法，他们甚至展示出一种“心理边缘化”的特性。¹⁷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只能依靠粗野的举止勉强掩盖，且因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和许多积极分子一直面对的财务问题而加重。这一切因素使冲锋队队员没有勇气走向独立，更不用说做出勇敢的决定。

仍有一些人献身于纳粹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原因而忠诚于冲锋队。奥地利冲锋队队员赫尔曼·施图林格就是这样的人，他是1930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医生联盟的共同创始人，直到1938年7月仍声称：“只有一支队伍能够代表民族共同体，只有一支队伍能传递理想和牺牲的意愿，那就是冲锋队！”¹⁸不管这样的表达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都不应该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表现了冲锋队自我理解的惊人持续性，该组织始终自视为纳粹核心价值观的卫士，是保证第三帝国社会凝聚力的组织。冲锋队高级将领在1940年仍然相互安慰：“冲锋队不仅有自己的教育使命，它本身还负有民族社会主义政治教育的责任。”¹⁹正如欧根·科贡在1946年的著名论述，直到二战开始之后很久，德国仍然不是一个“党卫队的国家”，而是一个冲锋队的国家。²⁰在战争岁月中，党卫队统治着被占领土和海外，而在旧帝国内部，仍是冲锋队队员的天下。

在“老战士”中，对纳粹夺权期间不温不火的“社会革命”的失望之情特别普遍，“罗姆清洗”造成的耻辱和创伤也最为严重，导致他们的激进态度加剧。1935年德国北部流行的歌曲《向冲锋队致敬！》的第一段是这种情绪的特殊表达：

打败了赤色分子，
征服了所有的权贵，
可是，无耻、肥胖的布尔乔亚站了起来，
他们从未流血，也没有战斗过。
所有的权贵和布尔乔亚听着，我们还在岗位上！
尽管时光流转，我们还是过去的我们。
我们流血、战斗，我们辛苦劳作，
这是为了德意志，而绝不是为了你们。
前进，前进，清扫街道！
打倒布尔乔亚！
打倒布尔乔亚！
我们将打断你们的每一根骨头，
一边看着你们的神殿冒起浓烟！²¹

听到如此咄咄逼人的歌曲，1934年之前和此后的很久，在德国人眼中，冲锋队意味着危险，也就不足为奇了。布雷斯劳的德国犹太人、后来的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回忆了1931年夏季在北海边的一个度假胜地首次看到冲锋队队员的情景。当时他只有5岁，不可能完全意识到冲锋队所能实施的暴力行为，但在这位历史学家的记忆中，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被描绘成与日后死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²²深藏在政治活动家赖因哈德·施特雷克尔心中最久远的记忆之一，就是1938年11月9日晚上冲锋队闯入柏林-夏洛滕堡区公寓时发出的声音，当时11岁的他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施特雷克尔回忆道：“带钉靴子的踩踏声、冲上楼梯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第三

帝国的声音。”²³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们都知道冲锋队的宣传游行很容易演变成猛烈的争斗。对于科隆的年轻母亲海伦妮·富斯赫勒来说，一群冲锋队队员踏过街头的特有声音甚至比二战中航空炸弹发出的巨响更可怕。²⁴

这些例子强调，“百万褐衫军”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外表特征。这种印象不再是通过魏玛时代末期挑衅性游行及争斗产生的，而是利用了数十万冲锋队队员的阵势，这些人不断受到鼓励，即便在社会最为偏僻的角落，也要建立和捍卫“民族共同体”。靠近阿尔卑斯山麓商业城市泰森多夫的小村魏尔多夫就是这样一个偏僻角落，并不是为人熟知的反纳



一名记者弯腰用麦克风捕捉行进中的冲锋队的噪声。这张照片是1937年8月15日在柏林举行的冲锋队节日游行上拍摄的。那时，冲锋队靴子的践踏是该政权众所周知和标志性的符号——故意记录下来供大众媒体使用，虽然作为纳粹暴力的象征令许多普通德国人感到恐惧。

粹活动据点。但在1936—1937年的冬季，那里发生了一件暴力事件，在许多方面，这个事件都是冲锋队在传统乡村环境所造成问题和骚乱的一个典型。虽然事件的起因尚不明确，但在名誉村长、当地农民约翰·黑尔明格由于政治原因被迫辞职之后，魏尔多夫成了一场局部革命的发生地。经过几个月的过渡期，黑尔明格最终在同年11月被邻村赫尔芬农民、25岁的约翰·特拉克斯尔取代。作为上任后的首批举措之一，这名年轻的纳粹村长发动了一场“惩罚远征”，目的是增强其权威，训诫当地农民。为此，他命令30—40名冲锋队队员在1936年12月6日（星期日）来到魏尔多夫。抵达之后，冲锋队队员在教堂周围游行、歌唱，打乱定期的天主教午后弥撒。不久以后，他们进入当地的旅馆，混杂在农民当中并宣布将在当地学校教室旁边展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臭名昭著的《冲锋队队员》周刊。对虔诚天主教徒的挑衅立刻产生了效果，多名农民反对公开展示《冲锋队队员》的宣传文章。有趣的是，其中一名农民说，他曾经定期阅读这一刊物，但现在认为让小学生面对“不道德对待犹太人”的生动细节是不负责任的。这种说法并不表示对纳粹政权的根本反对，但在场的冲锋队队员利用如此温和的批评，将这名农民关押了数天。另一名魏尔多夫农民解释道，虽然他原则上不反对参加要求的准军事训练，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家管理农场，照顾大家庭。仅仅因为这句话，他就遭到羞辱和痛殴，最终被“保护性拘留”。更有甚者，褐衫军将旅馆的多名宾客斥为“杂种”“混蛋”和“叛国者”。一份官方报告得出结论，平和、谦逊、辛勤工作的魏尔多夫农民不应得到冲锋队的这种对待。“这不是争取支持的方法，只能使善意的人变得固执。”²⁵尽管如此，应为这次暴力事件负责的年轻纳粹村长仍然在位，直到第三帝国终结，这一事实说明了局部抵抗的限

度——我们的理解是，那更多的是不满，而不是彻底的政治对抗。²⁶

正如魏尔多夫事件说明的那样，1934年之后，冲锋队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回收箱子的人”、片区领导人或者防空督察员。²⁷他们还作为某种半官方的纳粹党警察，威胁、骚扰并常常逮捕那些政权认为有必要惩处的人，理由可能是种族、政治或者像魏尔多夫那样是宗教，有些时候甚至是非常个人化的理由。尽管表现多种多样，冲锋队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暴力组织，特别是在地方上。从国家和国际的层面上看，冲锋队奉命更直接地实施政治任务，这些任务与冲锋队的准军事出身紧密相关。接下来我将分析1934—1939年冲锋队仍然极大地影响着数百万德国人生活的三个领域。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反复的反犹太抵制行动、街头暴乱和无缘无故的身体暴力行动施加的；第二种方式是成功地接管德国射击联合会和马术俱乐部；第三种方式则是在1938—1939年吞并奥地利、重夺梅梅尔、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稳定并使之解体的行动中，以准军事打击力量的形式复兴。

定义“民族共同体”的范围：反犹太暴力活动

褐衫军最为人熟知的行动领域是反犹太煽动和对犹太人的身体攻击，这随着纳粹党得势而加强，在1938年12月10日的“水晶之夜”达到高潮。正如历史学家艾伦·E. 施泰因魏斯所言，虽然这是“二战之前德国国内针对犹太人的唯一大规模、公开和有组织身体暴力事件”，但它是建立在此前对犹太人一系列袭击的基础上的，这些袭击中有许多例都是冲锋队所为。²⁸正是冲锋队长期反犹太活动的记录，以及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使11月9日的大爆发成为可能。而且，普通德国人在这段时期往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

暴力活动，或者对犹太人财物的掠夺，甚至在很多时候参与其中，要理解这种表现，关键是分析1933—1938年冲锋队反犹太暴力的号召力和范围。²⁹对犹太人的身体攻击是1933—1934年确立纳粹恐怖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第4章中已经做了解释。因此，下文的焦点是从1934年下半年起到1939年春季这一时期。

“罗姆清洗”并没有停止冲锋队的反犹太袭击。相反，正因为激进分子们从1934年起常常缺乏机会参加身体暴力，而那是“激战年代”成功维系冲锋队的因素，他们欢迎袭击犹太人的机会。参与人际暴力使冲锋队队员动摇的信心得以稳定，特别是因为冲锋队队员的自我意象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向别人强加身体暴力的能力。就这样，1934年夏季的处决事件在冲锋队普通成员中造成的普遍失望情绪不止一次地转换成对犹太人的攻击，后者成了纳粹政权的替罪羊；这种暴力活动既打开了褐衫军受压抑侵略性的阀门，也是他们意识形态信念的结果。

在当局于1935年命令冲锋队放弃布雷斯劳市的反犹太“羞辱行动”时，冲锋队正式请求穿着便衣继续这些行动。接下来的几周，由年轻男女组成的纳粹暴徒（其中有许多褐衫军）在下西里西亚首府街头袭击犹太人和有着“犹太长相”的路人。他们殴打犹太人、对其吐唾沫及辱骂，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家犹太咖啡屋遭到攻击，目的是“拖出”并殴打里面的客人。当接警的警官抵达现场时，遭到了“犹太人的走狗”之类的辱骂，并受到保护政权敌人的指责。³⁰

除了这些几乎不加掩饰的攻击之外，冲锋队的袭击事件确实是自发的，是意识形态、个人失望情绪和酒精这一危险组合的结果。例如，1935年10月10日夜里，一名醉醺醺的冲锋队队员穿着制服按响了柏林犹太人阿

莉塞·迈尔的门铃，威胁要侵入她的公寓，“碾碎她的腰背”。³¹全德国发生了多次类似事件，使德国民众清楚地知道，虽然纳粹政权反复呼吁克制，褐衫军仍然持续地给误入其“火线”的人带来巨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柏林袭击事件的罪犯当晚就从警局的拘留中获释，受害人没有正式起诉。和布雷斯劳一样，首都警方抱怨冲锋队反复对警官进行言语和身体攻击，特别是在后者试图阻止选帝侯大街一带的“反犹太示威”时。³²

此类反犹太攻击还有另一个更具政治性的特征。纳粹政权从1933年起就通过法律手段，系统地边缘化犹太人，但冲锋队使这种种族排斥变得十分显眼。他们在1933—1938年实施的暴力行动常常在当地民众眼前公然进行。辱骂、吐唾沫和殴打犹太人不仅使受害人感到耻辱和惊恐，还表现了德国社会中严重的力量失衡。许多德国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很快接受了这个“教训”。他们可能加入这种行动，或者至少在有不同意见时知道最好不与之对抗。褐衫军“冲锋队是德国大众的教师”这一信念由此得到了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冲锋队反犹太暴力活动是政权建立政治忠诚的“民族共同体”图谋中的一个关键策略。它不仅可以威胁认定的“外来者”，还可以澄清整合与排斥过程的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种族作为依据的。³³到1936年初，这一过程已经大大推进，冲锋队参谋长卢策在帝国首都对外交使节们发表正式讲话时称德国犹太人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已经“对德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他们现在面临的是冲锋队的合理惩罚。³⁴

这些官方声明清楚地告诉德国犹太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无法期望冲锋队的任何善行。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领土的扩张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这对奥地利和旧帝国犹太人来说都是

决定性的分水岭。³⁵在成为第三帝国“奥斯特马克”^①省的奥地利，社会关系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即便在七十五年之后，最后一批幸存的见证者仍然铭记着表明这种转换的事件。据退休的维也纳犹太人维尔玛·诺伊维尔特说，当地冲锋队在這一事件后变得特别粗野。1938年，这位当地理发师的女儿年仅10岁，她记得，父亲的一位常客在兼并次日来访。这个男人定期前来剪发，但此时他穿着定制的冲锋队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鞋。他大胆地宣称，从现在起，他将统治这一带。理发完毕，他没有付钱就走了一走了之——而且还在理发师面前的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这是为了羞辱后者，也是为了说明城市里的新力量对比。³⁶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许多奥地利犹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结果是，到1939年春季，生活在奥地利的19万犹太人中有半数离开了祖国——包括数千名被党卫队和冲锋队非法驱逐的人。³⁷

在旧帝国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德奥合并之后的几个月，德国各地的反犹太暴力活动明显增多。这种暴力活动的目标是从事实和象征意义上将犹太人排除出当地社区，迫使他们移民。从1938年6月13日起，警察部队根据海德里希签发的帝国刑事警察总局命令，逮捕了数千名男性犹太人。各地区的警察总局都至少将200名“适合工作”的男性犹太人投入“保护性拘留”。同时，所有此前曾被判至少一个月刑期的男性犹太人也遭到逮捕。³⁸此后的几周，纳粹当局抓捕大约12000名犹太男性，将其中的大部分人送到集中营里。³⁹

这些突袭和监禁行动不仅仅是由正规警察部队实施的。据当局称，仅

① 原意为“东部边境地区”。——译者注

在1938年6月17日到21日之间，当地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就逮捕了柏林市区的大约1000名犹太人。⁴⁰法国报纸报道，在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柏林舍嫩贝格区，几乎所有犹太店铺的窗户都被“粉饰”以反犹太涂鸦。柏林东部居民以工人阶级居多，那里的冲锋队逐个店铺向“雅利安”顾客行礼，辱骂犹太商人。⁴¹冲锋队队员甚至封锁电影院，逮捕犹太观众，命令电影院经营者以后不准让任何犹太人观影。⁴²犹太自由主义组织“中央联盟”资深理事、律师汉斯·赖希曼在回忆录中写道，逮捕行动之后，德国犹太人不断听到流言，称有10万名激进分子奉命占据德国的所有犹太人住宅，他们为此惊恐万状。⁴³即便后来证明这些流言是虚假的，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犹太人对冲锋队的恐惧不亚于对政治警察或者党卫队。

在纳粹所称的“犹太政治”与日俱增之际，巴伐利亚代理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于1938年10月31日通知该州的5名纳粹大区领袖——弗里茨·瓦赫特勒、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奥托·赫尔穆特、卡尔·瓦尔和约瑟夫·比克尔——这些攻击有损纳粹党和国家的声誉。然而，他的理由清楚地说明，他的批评不是来自对行动目标的非议：

我们不再有必要为了达到目标而诉诸暴力行为，特别是对于犹太人，因为我们的国家及其机构不仅足够强大，而且绝对有决心实施达成目标所必需的一切行动，保证公众的平静与秩序。如果某个犹太人犯下严重罪行、令人厌烦或者必须清除，警察随时可以采取合适、合法的措施，将这个人投入保护性拘留，或者以其他方法将其迁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容忍采取暴力措施。⁴⁴

这一声明表示，1938年的德国犹太人已经毫无防备能力——即便在法律意义上不是如此，从政治意义上说已经确定无疑。这份报告不值得见诸纸面。

仅仅十天之后，1938年11月9日—10日，全德国的数千名犹太公民遭到猛烈袭击、被监禁、受伤或者遭到杀害，他们的商店被摧毁，犹太教会堂付之一炬。根据最新的估计，这天晚上被逮捕的犹太人总数为3万—6万人。1938年11月12日，纳粹领导人声明被毁的犹太教会堂略多于100座，但流亡中的社会民主党提供的数字较为合理——520座。至少有91名犹太人被杀。⁴⁵

同时代的人立即理解了“水晶之夜”的象征意义。纳粹政权不需要用语言表达这一信息：很明显，它希望犹太人在德国几个世纪的生活能够在暴力中永久结束。参与“水晶之夜”的暴徒社会构成在每个城镇、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大部分作恶者是成年男性，但女性甚至儿童也参与其中，而且参与程度往往相当可观。⁴⁶虽然对这一事件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叙述都同意冲锋队是实施罪行最积极的群体，不过，并非所有目击者都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官方禁止冲锋队队员当晚穿着制服。

“水晶之夜”四周之后，1938年11月初，冲锋队诺德马克地区总队提供了一份报告，比绝大多数报道更好地解释了冲锋队在这次种族迫害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事件的总体特性。这份长度为4页的报告由冲锋队地区总队长约阿希姆·迈尔-夸德起草，罕见地澄清了指挥系统和在基尔市采取的行动。11月9日晚上，迈尔-夸德身在慕尼黑的朔滕汉默尔酒店，参加纳粹党一年一度纪念15年前未遂政变的活动。晚上10时左右，戈培尔通知在场的纳粹党领导人，为了报复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在巴黎刺杀德国外

交官恩斯特·冯·拉特，有必要对德国犹太人发动一次协调行动。迈尔-夸德立刻向诺德马克大区领袖海因里希·洛泽提供人手。11时20分左右，迈尔-夸德打电话给他在基尔的参谋长，命令他在这个大区的较大城市里摧毁犹太商户和会堂。根据他的报告，他明确禁止任何虐待犹太人的行为。但是，在夜里他下达的其他命令——“不许碰外国犹太人”和“遇到抵抗就动用武器”——说明身体暴力（至少针对德国犹太人）不仅可以容忍，而且很受鼓励。午夜，地区警察局长和州警察局已经得到了与即将开始的种族迫害相关的通知。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基尔的冲锋队领导人与党卫队和纳粹党其他代表人物在该市“褐宫”会面，讨论即将开始的行动。基尔警察向他们递交了城内犹太人住宅和企业的清单，为冲锋队暴徒实施的破坏提供了依据。根据迈尔-夸德的报告，所有在场的纳粹领导人都同意，必须将基尔的犹太人拘押起来，送往市警察总局。他们还一致同意“以血还血”，从“政治上最危险的犹太人”黑名单上选择“至少两名犹太人”处决。纳粹分子甚至安排了两支名副其实的行刑队，队中包括冲锋队队员、党卫队队员和一名州警察局的警官。

袭击定于凌晨3时45分开始。此前不久，冲锋队队员在市中心的阿道夫·希特勒广场集合。许多人整晚都在酒吧和小酒馆里，纪念希特勒的叛乱。仍穿着褐衫的队员此时收到了来自附近市政厅的便服。他们从那里开始破坏和逮捕活动，警员与他们相伴，并在破坏场所外站岗。就在警察们的注视之下，有组织的暴徒肆意毁坏当地犹太教会堂和至少11间犹太店铺，以及数目不详的私人住宅。基尔的58名犹太人遭到监禁。不过，“行刑队”只取得部分成功，因为两名作为目标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店主保罗·莱文和古斯塔夫·拉斯克——中枪受重伤，但是在袭击中幸存下来，

后移民美国。⁴⁷

德国的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场景。⁴⁸一名目击者这样描述下莱茵州博霍尔特市发生的事件：“冲锋队手持火把，高唱民族主义歌曲，吼声震天。他们摧毁了犹太店铺和公寓。犹太人遭到殴打和嘲笑。犹太教会堂、教堂司事及其妻子都遭到攻击。”⁴⁹在威斯特伐利亚南部小城下马斯贝格，种族迫害中最为积极的冲锋队突击队由受雇于城中精神病院的医生及护理人员组成。护理人员帮助捣毁当地犹太教会堂，袭击犹太公民并劫掠其住宅。⁵⁰温泉小镇巴特哈尔茨堡的纳粹暴徒逮捕了至少11名男人和多名妇女。他们被带到当地市政厅，男人们后来被运送到沃尔芬比特尔附近的州监狱。该市的两名犹太人遭受毒打，不久后死去。可是，当其中一人的遗孀请求当地新教教会将亡夫埋葬在墓地时，教区拒绝这么做——市长的话令教会惊恐，他声称无法保证冲锋队和党卫队不会掘墓移走尸骨。⁵¹个人记录非常详尽的维克托·卢策对当夜事件的描述非常简洁，没有任何悔意，也没有同情受害人的迹象：“对拉特在巴黎遭到谋杀的报复——关闭犹太商户，推倒犹太教会堂。”⁵²

以上例子取自一个较大的城市和多个地方城镇，不仅证明了全德国的冲锋队在这些事件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而且清楚地说明了冲锋队队员的反犹太暴力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正式的国策。冲锋队为纳粹国家提供了一支“奇袭队”，可以迅速动员，在实施暴力活动上经验老到。但是，与1933—1935年的冲锋队不同，1938年的它是一个由纳粹党控制、遵守纪律的组织，尊重纳粹政权设定的行动范围。反过来，纳粹领导层也确保激进分子对个人利益的渴望得到满足。大区领袖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声称，维也纳种族迫害没收的犹太人房产向党员们提供了2200套住房。奥地利首



为了准备未来的军事对抗，1939年4月2日星期日，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具的冲锋队队员，由一名骑单车的冲锋队男子陪同，穿过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街区。几个衣冠楚楚的路人正在现场观看。男人裤子上固定的数字，显示他们各自的冲锋队单位，表明这是首都不同冲锋队单位之间的一种竞争。

都的纳粹党下多瑙河大街分部利用这一机会，为党部提供了新家具和打字机，这些东西据说是从一位犹太股票经纪人那里偷来的。大迫害之后的日子里，上西里西亚的小学生们吹嘘着父亲参加袭击后带回家的新宝贝。在魏森堡附近的法兰克尼亚小镇马克特贝洛尔茨海姆，一名冲锋队队员甚至在1938年11月10日下午组织了一场拍卖会，兜售犹太家庭和犹太社区的财物。⁵³

然而，如果认为集体参与这些反犹太袭击就表示一致赞成——换言之，冲锋队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已经渗透到大部分德国人的思想意识里，以

至于“水晶之夜”这样的残酷迫害得到广泛接受——那就错了。“我们是正直的德国人，还是暴徒？”一名被激怒的德国妇女在日记中质问道。⁵⁴事件发生后两周，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写信给母亲，表达了许多人心中所想、却鲜少公开说出的意见：“前两周我们整个德国经历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最为可耻、可怖的事件。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引发的许多后果中，有一个就是……第一次出现了普遍的羞耻和愤慨。”⁵⁵但是，看到这里表达的义愤——即便是真诚的——人们不禁感到好奇，里特尔对几个月和几年前发生的反犹太暴力活动作何解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水晶之夜”明显是此类事件中最为过分的，可在许多方面上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它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与众不同，但作恶者的理由和暴力活动的方式并不奇特。不过，在为里特尔及其德国同胞辩护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一点，就连许多冲锋队队员也不一定将自己的组织与对犹太人的袭击联系在一起。尽管冲锋队传播纳粹政权痴迷的反犹太意识形态和宣传，但从这一时期冲锋队队员的个人言论和日记上看，并不是所有队员都将这种意识形态转化为实际行动。

对德国社会的渗透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有一些冲锋队队员对该组织的评论留存至今，其中之一是威廉·霍森费尔德，这位乡村教师后来成为陆军军官，近年来，他因为帮助了波兰犹太音乐家、作曲家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而广为人知，这一事迹出现在罗曼·波兰斯基2002年执导的电影《钢琴家》中，成为不朽的传奇。霍森费尔德在国防军服役期间帮助华沙占领区的犹太人

和波兰平民，被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奖，而在本书中，他早期作为冲锋队中队长（相当于技术军士长）的评论特别有趣。

霍森费尔德是严守教规的天主教徒，1933年4月15日加入冲锋队。整个30年代，他都生活在黑森州富尔达市附近的小村塔劳。这一地区多为乡村，居民非常虔诚，也很贫穷，与大城市相去甚远，后者拥有主要由无产阶级组成的冲锋队突击队，常被历史学家作为整个组织的代表。霍森费尔德为冲锋队的同志情谊和准军事体育文化所吸引，这使他想起了青少年时代参加的“候鸟运动”，他也很快被提升为规模较小的塔劳冲锋队组织的领导人。⁵⁶1936年1月19日，霍森费尔德热情地写道：“穿上冲锋队的制服，一个男人就不再是自由人了，他代表着更大的集体。”⁵⁷从当时的日记和随笔可以看出，他最初也有着纳粹“革命”后传遍德国的兴奋情绪，享受着自己作为冲锋队中队长参加的活动，这种状态至少延续到1936年，从那之后，他的日记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怀疑的评论。他的文字中没有出现恩斯特·罗姆被杀以及对冲锋队的冲击，也没有出现冲锋队的反犹太活动，即便在1938年也是如此。⁵⁸相反，霍森费尔德反复提到的是冲锋队的体育竞赛⁵⁹、当地的宣传游行和纽伦堡的“党代会”（霍森费尔德于1936年和1938年参会），以及和同僚共度的社交晚会。⁶⁰

对事件的这种选择特别引人注目，因为霍森费尔德在其他方面都是第三帝国初期社会转变的敏锐观察者。他的评论说明，人们应该认真对待冲锋队在这段时期的体育和社会活动，不要将其贬损为次要的外围行动。对于霍森费尔德这样婚姻幸福、有5个孩子的男子，乡间的“冲锋队社团”不是建立在与政治对手的血腥冲突，或者对犹太人的袭击基础上的。他对将冲锋队作为职业提升手段的行为也不感兴趣，而是像布莱辛一样，把组织

当成一个“老男孩社交网”。而冲锋队为霍森费尔德提供了新颖、受欢迎的男性社交方式，这种社交建立在“武装国家”的旧观念，以及“人必须锻炼身体”的现代理念之上。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正是用相同的手段，吸引大量基督教执事加入。⁶¹事实证明，冲锋队对乡村教师霍森费尔德的吸引力有三个方面：给予他行使权力和发展领导技巧的机会，为他提供了社会认同，并使他积极、安全地参与纳粹的“德国觉醒”计划。

分析冲锋队对德国各协会组织（尤其是小城市和乡村）的影响，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吸引力并不仅限于霍森费尔德。20世纪30年代，德国小城镇和乡村很受欢迎的两种活动越来越受到冲锋队控制，就说明了这种影响：射击协会和马术俱乐部。迪兰·赖利最近阐明，法西斯统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对传统协会组织的渗透，但与对其他欧洲法西斯或半法西斯政权（如西班牙）的研究不同，对第三帝国初期的研究却没有得出这样的看法。⁶²不过，这一视角对冲锋队的历史研究很有启发。如上所述，冲锋队对德国乡村地区的“征服”早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经取得成功。在这一策略的基础上，第三帝国早年的冲锋队将政治野心与小城镇的社交活动熔于一炉，持续甚至强化了确立不可或缺地位的努力。

冲锋队的策略取得最大成功的活动领域是吸收德国射击协会。射击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域，魏玛共和国初期，射击俱乐部开始迅速增加，成员范围拓展到中产阶级和中低阶层。1920年引入的小口径射击很快大受欢迎，仅仅5年以后，它就成为了德国最流行体育运动的第三位，大约有50万人参加各种俱乐部和联盟。⁶³即使在纳粹党崛起及掌权之前，参加这种射击俱乐部也不是与政治毫无瓜葛的爱好。射击协会的成员身份基于某种特定的男子气概，将保护自己、家人和祖国作为核心价值

观，因此它们和更受欢迎的“老兵协会”一样，都倾向于支持国家甚至民族主义情绪。⁶⁴德国各省“神枪手节”的组织者们公开表示，支持将俱乐部中获得的射击技能与更大的民族使命联系在一起，使德国人民能够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锁链”，一雪他们遭受的民族耻辱。许多人将射击协会的会员资格当成服兵役的替代形式。⁶⁵

20世纪30年代起，尽管20年代以来在各种中产阶级射击协会中占有很大比重的“钢盔团”对将其拖入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企图一笑置之，上述意识形态倾向仍然有助于德国射击协会与冲锋队之间的合作。不过，总体来说，纳粹掌权之后形成的德国政治新局面，强化了纳粹党与数百万积极参与中产阶级社交组织的德国人之间的“相互友好关系”。⁶⁶从1933年起，德国俱乐部的600万会员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转入冲锋队、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民族社会主义组织，而射击协会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和实力，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⁶⁷然而，各射击协会的联合组织“德国射击联合会”于1937年开始正式将来自“帝国战争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和德国劳工阵线（DAF）的代表整合到其成员中。随着德国（男性）公民生活的广泛军事化，射击协会发行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它们对德国全面“重整军备”终极目标的贡献，这一目标指的是将公民社会转化成能够参与（防御性）战役和军事冲突的社会。⁶⁸这种辞藻本质上与冲锋队无异。

因此，冲锋队的组织能力和声誉如果得到充分巩固，企图迫使德国射击协会的密集网络接受其基本意识形态观念、参与类似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到1938年，冲锋队已经垄断了“体育训练和提升自卫能力”。与专门关心一流体育运动的德意志帝国体育运动联盟不同，冲锋队管理群众体育，组织民族社会主义者搏击大会。这些场合不是用来促进极少数精英运动员

创造优异成绩的，但参与体育和准军事训练（如投掷手榴弹）的队伍表现出众。德国男性公民整体健康、熟练使用各种武器是活动的第一要务。⁶⁹因此，从1938年开始，德国射击联合会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于特纳正式接掌，原主席降为副职。作为见面礼，也预见到来自各地射击协会的批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强调，它将投入可观的精力和资金，拓展射击运动。⁷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并没有多少不满的俱乐部成员提出抗议；将冲锋队控制俱乐部斥为“海盗行为”的批评出现于1945年之后，因此并不可靠。⁷¹到1938年底，德国各地射击协会以“我们为阿道夫·希特勒及更伟大的德国战斗和射击！”的口号庆祝新年。⁷²

德国马术俱乐部内部也能看到类似的发展。马术在德国社会的精英地位更胜于射击。但是，即便在纳粹夺权之前，冲锋队也已经建立了地方冲锋队“骑兵突击队”（SA-Reitersturme），最初是为了争取地方高官和德国乡村具有影响力的农民，以及部分城市机构。⁷³然而，随着纳粹大权在握，冲锋队开始推广骑术，将其作为一项帮助德国男性训练作战技能的社会活动。这里引用冲锋队的一种典型说辞：“骑马就是不断地战斗，不断肯定个人对成功的渴望。”⁷⁴正如历史学家内莱·法嫩布鲁克最近在一项开创性研究中所阐述的，冲锋队在20世纪30年代极力扩充其“骑兵突击队”，以至于到1938年全德国有不少于101个冲锋队“骑兵旗队”。冲锋队队员称赞马术为“完美的军事体育”，是训练男性体能及品质的理想机会。⁷⁵

冲锋队争取相当一部分德国骑手的企图，与冲锋队和国防军的类似策略形成了竞争。但是，冲锋队最终拥有最广泛的号召力和组织影响力。⁷⁶1936年3月，与德意志射击联盟有同等地位的民族社会主义骑兵军团（NSRK）建立之后，该组织正式管理所有立志成为骑手者的训练，以及“全德国80%



20世纪30年代，冲锋队提倡骑马，认为那是一项特别具有“男子气概”的运动，它可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训练德国人。这张照片描绘了三名褐衫军成员在梅克伦堡的老莫德勒茨从马上跳下来，这是强制性“骑马测试”的一部分。

的骑手”（据该组织的声明）。⁷⁷与其他运动类似，冲锋队里的马术运动并不强调少数精英骑手的杰出表现，而是在工作中展示真正的“冲锋队精神”。因此，团体竞赛比单独骑手更受重视。冲锋队将其马术竞赛视为利用乡村青少年对骑术的兴趣宣传自己的手段，同时将其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象征——通过共同努力、坚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打破阶级界限。⁷⁸

1938年底，冲锋队和各射击协会、马术俱乐部和常规体育俱乐部的合作正式确立。高级冲锋队将领控制了这三个领域：体育联盟组织德国体育运动联盟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汉斯·冯·恰莫尔·温德·奥斯滕负责

（他在冲锋队全国领袖办公室管理搏击运动）；民族社会主义骑兵军团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卡尔·里茨曼负责（他是冲锋队全国领袖办公室的马术与驾驶训练负责人）；德国射击联合会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于特纳管理（他在OSAF是管理总部负责人）。⁷⁹管理上的重叠表明，冲锋队已经成功地融入德国公民生活中与其新任务（监督德国男性的准军事训练）相关的分支。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强迫性合作，更恰当地说，是纳粹党与现有中产阶级圈子及各个协会之间友好关系的巩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自发参与，政治隶属过程不可能如此顺利。⁸⁰

尽管德国各省的地方性活动表面上仍继续以传统方式进行，但冲锋队对中产阶级社会生活重要分支的政治监管和渗透产生了持续的效果。最明显的变化是，一些地方显要人物此时穿上了纳粹制服，但是他们除了发表一些无人在意的欢迎词之外，对整个进程并没有直接干预。不过，这一评估低估了已发生政治变动的重要性，以及冲锋队等纳粹组织的持续影响，转瞬之间，它们的成员就可以从快乐的俱乐部伙伴变成拥有警察职权的政府监察人员。⁸¹而且，冲锋队对领主地位的追求，很快就促使他们利用已经渗透、十分密集的协会及俱乐部网络，推动战备。⁸²

然而，并不是所有冲锋队队员都赞成这种新的行动方案。对于许多人来说，冲锋队新角色的长期依据无法替代过去的活动，而正是那些活动，有力地将对意识形态对手的政治暴力与流行的男性社交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些人仍然希望作为政治激进分子，而不是自我满足的市井之徒。⁸³与此对应，威廉·霍森费尔德在1937年和1938年对冲锋队的评论也不那么充满热情了，他在1937年4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冲锋队的任务：又只有少数人参加。大部分人都找了借口，但还有一些人应该出现。他们对冲锋队的重

要性缺乏理解，只有在需要解决真正的问题时，你才能明白这一点。”⁸⁴可是，令人满意的任务仍然少之又少。作为替代，1938年9月，当地冲锋队领导人开会讨论令人兴奋的“收集废金属”⁸⁵活动。霍森费尔德本人对冲锋队的使命越来越没有把握。1938年6月，他失望地写道，他刚刚在附近的富尔达市参加了“冲锋队体育节”，却发现这项活动仍然令人气恼：“我越来越意识到（冲锋队）毫无意义。”⁸⁶不过，霍森费尔德仍然积极执行冲锋队的任务，直到1939年应征入伍。随着战争开始，对于其他有冲锋队背景的士兵来说，在组织中执勤也同样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940年6月6日，法学家弗里茨·奥托·博米格写信告诉妻子，他如何想象两人的周末：“当然，那里没有周日上午的冲锋队任务……，如果在我回家的第一个星期天，就6点起床去冲锋队，我可不愿意体会你的反应！”⁸⁷从博米格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战前他经常在周末到冲锋队执勤。信中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妻子认为他一有机会就可能重拾旧习惯。一年多以后，1941年8月24日，博米格确实写了一封信给妻子，说他正在准备一封寄给原冲锋队突击队的信。⁸⁸随着战争的持续，霍森费尔德和博米格都疏离了冲锋队及其理念。霍森费尔德对战争期间冲锋队在华沙占领区行为的少数评论基本都是负面的。对他来说，这个组织现在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他还反复评论冲锋队队员的暴力行动。⁸⁹霍森费尔德兴味索然地告诉妻子，在1943年9月华沙举行的“冲锋队体育竞赛”上：“一大堆废话，没有什么成就。主要的事情就是宣传。一天都在下雨。”⁹⁰

霍森费尔德的态度很典型，反映了许多最初欢迎冲锋队宣传、却对1934年后的发展感到失望的人的心情。但是，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冲锋队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并没有衰退，而是更加重要了。后一类冲锋队队员往

往出生于德意志帝国境外。对他们来说，参加冲锋队提供了财务和政治上的好处，一旦德国扩张政策实施，这些好处就能够兑现。下文我将详细介绍所谓的“奥地利军团”，然后转向苏台德和梅梅尔地区新建的冲锋队组织。

奥地利军团

从20世纪20年代初纳粹党及冲锋队成立以来，德国和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已经确立并得以维持。⁹¹虽然在20年代，德国冲锋队队员通常得益于奥地利兄弟在意识形态和武器上的帮助——特别是在1923年未遂的“希特勒叛乱”后，许多高层纳粹分子在奥地利寻求庇护——但十年之后，这种关系已经逆转。现在，德意志帝国里的冲锋队可以帮助奥地利同志，特别是在维也纳当局于1933年6月19日取缔包括冲锋队在内的所有民族社会主义组织之后。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及其继任者库尔特·舒施尼格的奥地利法西斯政权积极迫害寻求结束奥地利独立国家地位、与第三帝国联盟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在1934年7月奥地利希特勒主义者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之后。⁹²尽管奥地利冲锋队在组织上相当薄弱，但从1926年起，担任奥地利冲锋队（“Hitlerbewegung”，意为“希特勒运动”）领袖的教师赫尔曼·雷施尼计划率领来自施蒂利亚州和德国的冲锋队队员向维也纳进军。1934年6月，奥地利冲锋队领导层甚至决定派两名杀手刺杀陶尔斐斯，但最终实施谋杀的是党卫队员奥托·普洛奈陶。⁹³

从民族社会主义者控制德国时起，奥地利当局就害怕第三帝国在冲锋队引导下发动军事入侵。⁹⁴他们主要担心在德国的一万四千多名奥地利政治流亡者，这些人自称“军团士兵”或者“奥地利军团”成员，正式编入冲

锋队第8（奥地利）高级地区总队。⁹⁵根据奥地利政府的说法，该军团拥有1500辆汽车，因此可以在24小时内抵达德奥边境。⁹⁶流亡德国的这些奥地利冲锋队队员最初集中在巴伐利亚多地的几个兵营里（莱希费尔德、巴特艾布林、赖谢斯博伊恩、埃格马廷、沃勒绍夫等）。后来，他们以“西北救济机构”的化名活动，迁移到更北面的几个地方（其中包括博霍尔特、多尔斯滕和利普施塔特），远离德奥边境。这些人参加建筑工作，接受德国冲锋队、巴伐利亚警察和德国国防军的准军事训练。他们还向奥地利偷运武器、爆炸物和宣传材料，造成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只要罗姆治下的德国冲锋队继续为其“民族武装”地位而战，奥地利军团就是对奥地利主权的一个严重威胁。⁹⁷

从第三帝国的角度，它对“奥地利军团”的财政（1935年共约2400万马克）及政治支持成败参半。⁹⁸军团成员们缺乏纪律性和教养，因而不止一次地发生引起德国民众注意的负面事件。尤其是他们在德国民众传统上虔诚诚信教的地区开展野蛮的反天主教煽动，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感。例如，1935年8月，奥地利军团成员在巴特艾布林乘坐卡车驶过街道，展示画有耶稣会教士形象及《圣经》文字“让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标语牌。标语牌上还用黄色文字写着“§ 175”，暗指身穿神职人员长袍的同性恋虐童犯这一刻板印象。⁹⁹在外交层面，德国的财政支持人所共知，国际上将其视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引发了与奥地利和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之间的紧张局势。不过，虽然组织上和军事上均有不足，奥地利军团在1938年之前仍然是纳粹政权的一项政治武器。¹⁰⁰

“长刀之夜”后冲锋队失去了影响力，奥地利军团成员奉命将其武器——至少10300支步枪、340挺机枪——交给国防军。¹⁰¹奥地利方面的忧虑

大大减轻，以至于当局更愿意将数千名奥地利冲锋队队员逃往德国解释成“年轻人可以原谅的过失”，而不是有意的恐怖活动。从截获的信件和其他抄没文件中，舒施尼格政府不仅深知奥地利军团不像最初想的那么危险，而且还知道他们的战斗力非常有限。相当数量的纳粹激进分子返回奥地利（1936年7月至1937年11月，人数超过2500人）时，奥地利当局进一步将其诠释为，许多人离开祖国不仅是因为政治“煽动”，还出于“年少无知和渴望冒险”。¹⁰²尽管奥地利纳粹在该国官僚机关内部同情者那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处，但要组织非法政治活动，仍然需要煞费苦心地谋划。冲锋队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在处理党务的电话上采用暗号。这种暗号通常依靠一种简单的语言，根据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命名冲锋队各单位：“儿子”是冲锋队小队的代号，“叔叔”代表冲锋队突击队，“父亲”代表冲锋队旗队。冲锋队单位的编号被对应城区的名称所代替。例如，如果纳粹分子提到“来自席津的父亲”，实际上指的就是冲锋队维也纳地区总队第4旗队。有趣的是，冲锋队作为一个整体时，则被冠以女性称呼“姐姐”。¹⁰³

然而，当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的行动于1938年3月真正实施时，奥地利军团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决定性的步骤已经在谈判和幕后的外交斡旋中进行。德国于1938年3月12日出动超过5万名士兵和警察实施军事入侵，确认此前在谈判桌上取得的成果。当奥地利军团最终于1938年3月30日—4月2日返乡时，他们并不是凯旋的解放战士，而是不请自来的征服者。最起码，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在奥地利的受欢迎程度相当有限。许多奥地利国家机构甚至纳粹机构在接受前“军团士兵”入列时都非常不愿意，因为后者很快就得到了懒惰、傲慢的坏名声。¹⁰⁴就连奥地利纳粹党最初也担心，多达9000名军团成员的出现将会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可能随意

发泄前几年的积怨。¹⁰⁵许多军团成员确实参加了反犹太袭击，而且自1933年起，对未来职业发展（特别是在奥地利官僚机构中）的承诺促使军团成员保持了对纳粹党事业的忠诚。¹⁰⁶此时（1938年），他们要求并接受了相当程度的“补偿”，从许多发生在“奥斯特马克”的“雅利安化”行动中得益，成功地向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就业。有形的经济补偿包括一辆中等轿车（斯泰尔XII）、一套家具甚至一所完整的牙医诊所。¹⁰⁷1938年和1939年，对奥地利冲锋队中前军团成员的援助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资深队员都对普遍的“任人唯亲”现象十分反感。德奥合并后几周，这些成员开始利用所谓“真正的同志情谊”，为过去几年的非法行动披上浪漫的外衣，这种做法与1933年的德国很类似。¹⁰⁸

1938年10月31日，德奥合并半年之后，奥地利军团正式消亡。此时，大部分前军团成员已经从这场政治突变中广泛受益。其他一些人的“补偿”和职业提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于第二年再次试图利用犹太公司和财产的“雅利安化”，或者潜行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¹⁰⁹可是，这些“老战士”最终至少在一个方面承认了失败。1941年，纳粹当局断然拒绝接受以1933—1938年在“奥地利军团”中服务作为兵役的替代形式。¹¹⁰奥地利军团在德奥合并之前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冲锋队在德国向中东欧扩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才刚刚开始。

在苏台德和梅梅尔地区的活动

对奥地利的成功兼并敲响了警钟：德国将进一步吞并与其接壤、居住着较多德意志族人的地区。在当政的头几年完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巩固之

后，纳粹党企图实现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扩张帝国，直到所有定居于邻国的德意志族人都能享有德国公民身份的好处。但是，在1848—1849年的革命中，民主的德国极具吸引力，许多中东欧民众自愿成为德国人。与当时民族主义者的愿景不同，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种企图将会在邻国中激起强烈反对，特别是许多邻国都是一战之后建立的，是政治舞台的新来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德国民族主义者越来越认同一种观点：这些地区的“民族斗争”必须依靠武力实施，而不是凭借承诺和说服。¹¹¹

苏台德地区历史上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一部分，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为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中心地带。这里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最初与各德国青年运动联盟和组织紧密相连。¹¹²在言辞和行动上，纳粹党都特别注意这个人口稠密的德国边境地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该党官员就企图从邻近的萨克森州入手，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建立冲锋队基层组织。苏台德地区的德国纳粹积极分子最初将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理解为民族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将他们在该地区的政治活动与“青年联盟”的“边疆之旅”相提并论，后者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组织的活动，旨在提升德国青少年对所谓“德国在中东欧文明使命”的认识。这些积极分子认为，由于德国在一战之后囿于“狭窄的边境”，应该抓住这个合适的时机，向民族精英们灌输对东欧少数德意志族人根深蒂固的责任感，让他们为在将来的“民族斗争”中起主导作用做好准备。¹¹³希特勒青年团“边疆办公室”领导人鲁道夫·施密特是这些活动的关键人物之一，其频频为苏台德德意志族青少年组织“政治教育旅行”。此类旅行延伸到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匈牙利、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参与者常常身着纳

粹褐衫，或者至少在背包里携带纳粹装备。¹¹⁴

随着纳粹夺取德国政权，该地区捷克人和德意志族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尽管官方加以约束，纳粹的宣传，以及第三帝国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组织（如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前身、康拉德·亨莱因领导的苏台德德意志族家园阵线）的秘密财政支持，都促使双方表达爱国情绪。¹¹⁵1933年和1934年，来自邻近萨克森州的德国冲锋队不止一次接到请求，安排非法的边境巡逻部队定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声称当地政府试图镇压德意志族人的“解放运动”。反过来，身着冲锋队或者党卫队制服的德国人也越来越可能遭到边境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警察的逮捕。¹¹⁶虽然双方热情高涨，但在第三帝国初期，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官方政策仍然是审慎克制的——有时与该地区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思想得到日益迈向沙文主义的德意志人体育协会的大力宣传，从1938年5月起，苏台德德意志人志愿护卫队（Freiwilliger Schutzdienst, FS）也积极推行，该组织是非官方的冲锋队，有15000人之众。¹¹⁷

德国成功兼并奥地利之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期望着类似的发展，并为此积极准备。德国公开呼吁节制的做法与其真实政策相悖——后者的目标是激化该地区的民族矛盾，为德国最终的军事干预寻找合理借口。1938年9月初，该地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和炸弹袭击。¹¹⁸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反应是动用警察和司法机关。成功镇压9月上旬的苏台德德意志族人暴乱之后，数万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越境逃往德国。¹¹⁹仅在萨克森自由州，就至少有19个苏台德德意志族政治难民的营地。

9月18日，作为对这些发展的直接反应，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发表公告，

要求组成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¹²⁰大约同一时候，萨克森州冲锋队立刻在难民中发起招募计划，为他们提供意识形态和准军事训练，希望此后将其整合到常规冲锋队里。9月19日，萨克森州冲锋队的一份内部报告声称，该组织已经登记了大约5000名苏台德德意志族难民，为其提供卐字臂章和徽章，营地的许多人以“令人动容的自豪感”佩戴这些纳粹标志。几天以后，冲锋队争取到的苏台德德意志族人总数翻了一番。这些人组成了未来苏台德冲锋队的核心，按照其来源地分组。不过，这份报告警告道，由于武器装备“全然不足”，他们不能用于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¹²¹1938年9月29—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至少暂时达成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目标，德国得到了垂涎已久的苏台德地区。随后，此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非法准军事活动变成了国家支持的政治行动。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存续了4周，总兵力达到4万人，他们至少杀死了110人，将约2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驱赶到德国领土上，并导致约20万捷克人、德意志族人和犹太人离开该地区。¹²²

德国于1938年10月初占领苏台德之后，在前几个月准备工作基础上，该地区很快成立了冲锋队正规部队。许多“志愿护卫队”和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10月9日正式解散）成员渴望着加入冲锋队和党卫队等纳粹组织，以至于新成立的冲锋队奥西希旗队于1938年12月“因为组织原因”暂时禁止招收新成员。¹²³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从旧帝国派出不少于600名冲锋队领导人前往该地区。这些人主要担任核心管理职务，而冲锋队各个突击队和旗队则交由苏台德冲锋队队员们管理。¹²⁴在许多情况下，后者就是前德意志人体育协会领导人。¹²⁵11月9日的“大迫害”期间，新成立的苏台德冲锋队起到了和德国其他地方同级单位一样的作用，唯一不同的是，不仅当地犹太人遭到袭击，非犹太裔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批评纳

粹的德意志族人也未能幸免。该地区冲锋队的战斗口号是“首先打击犹太人，然后是捷克人！”。¹²⁶

苏台德冲锋队领导人弗朗茨·迈是一位很有魅力、信奉天主教的农民，他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萨克森边境附近的瓦恩斯多夫乡村地区。迈于1938年10月15日被任命为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此时他在支持德意志族人“解放”的政治活动中已经有多年经验。他还曾在正式就任冲锋队职务之前的几周担任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第4大队指挥官。¹²⁷“迈对边境地区的斗争驾轻就熟，知道如何运用人所共知的充沛精力和明确目标，恰如其分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亨莱因这样评论道，1941年11月，他在写给冲锋队参谋长卢策的一封信里还说，迈将成为他所在大区“最可靠、真正受欢迎的德意志族领导人之一”，试图为他的前得力干将争取缓服兵役。¹²⁸

在德国领土扩张的背景下，冲锋队竭力保持确定传统结构的做法行之有效。冲锋队在前几年对苏台德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持续支持得到了回报，当该组织在旧帝国中苦苦挣扎、力图定义其未来角色时，在原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族人中却受到了真诚的欢迎。1940年1月，冲锋队苏台德地区总队人数将近129000人，占整个“苏台德大区”总人口的4.4%，相比之下，同时期在冲锋队服役的德国人口仅占约1%，苏台德冲锋队成为了当时最为强大的地区总队。¹²⁹

梅梅尔地区（立陶宛称“克莱佩达地区”，德国东普鲁士省北部的一小块领土）也有类似的发展，但规模远小于苏台德。这一地区居民多数为德意志族人，作为战后中东欧重整的一部分，1919年从德国分离。¹³⁰战争刚结束的几年，该地区暂时由法国管理，1923年成为了立陶宛的一个自治区。



苏台德地区的埃格尔市，今天的海布市，一群冲锋队队员在游行，当地居民向他们致敬。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0月初的“解放庆典”，当时德国军队，包括冲锋队组织，占领了该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量当地德意志族的年轻人加入新成立的冲锋队苏台德地区分队。

此后数年，倡导与德国紧密合作的当地政治运动和媒体经常遭到压制。¹³¹ 1935年到1938年间，随着德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这一边境地区德意志族人的命运又一次成为急迫的政治议题。立陶宛政府警惕地观察着第三帝国日益增强的野心，以及对梅梅尔地区“回归”要求的强化。他们担心，该地区可能步萨尔区的后尘，后者在1935年1月13日举行的一次公投之后重新加入德国。¹³² 立陶宛夹在更大、更强的国家之间，尤其是要面对德国与波兰的领土声索，该国政府最终同意与柏林进行秘密谈判。《慕尼黑协定》签署、德国吞并苏台德之后，立陶宛政府采取了一项又一项的措

施，推出自己的绥靖政策，以避免类似命运。1938年11月1日，立陶宛解除了梅梅尔的紧急状态，从而允许德意志民族主义组织在该地区合法活动。¹³³仅仅一个多月之后，12月11日，德意志族联合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以87%得票率的绝对优势获胜。¹³⁴六天以后，希特勒秘密通知梅梅尔德意志民族主义领袖恩斯特·诺伊曼，他打算在1939年春季吞并这一地区。¹³⁵

诺伊曼生于1888年，他在这一地区所起的作用正如苏台德的康拉德·亨莱因。他原是1919年波罗的海地区“自由军团”战士，也是一名专业兽医，于1933年创立了梅梅尔社会主义人民党（*Sozialistische Volksgemeinschaft des Memelgebietes e.V.*, SOVOG）。这是该地区的第二个民族社会主义政党，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那里就有一个纳粹党的秘密基层组织。¹³⁶最早的这些民族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组成了梅梅尔基督教社会主义党（*Christliche Sozial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 des Memelgebiets e.V.*, CSA）的核心。该党于1933年5月正式成立，由新教牧师特奥多尔·冯·萨斯男爵领导。不过，德国纳粹党很快就得出结论，由于CSA成员的“伪革命”行事方式和“明显的浅薄”，有必要为其寻找一个民族社会主义替代品。¹³⁷因此，柏林政府支持诺伊曼和他的竞争组织SOVOG。此后几年，诺伊曼变成了“所有渴望结束外国统治的人们希望的火焰”，这一怀着爱国热忱做出的评价来自1955年联邦德国出版的一本德意志族流亡者杂志，与梅梅尔“激战年代”的说辞相互呼应。¹³⁸此类颂扬之词是以诺伊曼在20世纪30年代梅梅尔德意志族人中得到的广泛支持为基础的，但却模糊了战后不太受欢迎的其他特征：CSA和SOVOG这两个党派都公开宣示反犹太立场，并与德国纳粹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¹³⁹双方都很快建立了由18—36岁的青年男子组成的准军事组织，CSA称之为“突击纵

队”(SK),而SOVOG则称为“冲锋队”(Sturmabteilungen)。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将这些组织描述为“介于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之间的某种组织”。¹⁴⁰据立陶宛当局称,两个准军事组织与德国冲锋队都有紧密联系,尤其是来自近邻东普鲁士省的冲锋队各单位。1934年,该省的冲锋队第1高级地区总队(或称奥斯拉高级地区总队)估计有不少于8个旅队,总人数达到17万人。这些旅队由德国政府提供资金,配备重机枪等武器,据说是为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占领梅梅尔做准备。¹⁴¹这些指控得到大量警察档案的支持,科夫诺^①的立陶宛高级军事法庭于1935年据此裁定诺伊曼、冯·萨斯和一百多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犯有叛国罪,判处他们很长的刑期。¹⁴²作为上面提到的缓和政策的一部分,诺伊曼于1938年得到赦免,立即回到了原来的政治活动中。

虽然希特勒建议诺伊曼不要引发任何外交危机,但后者于1938年底再次开始建立冲锋队单位。这些单位此时正式定名为“保安部队”。1939年1月底,它们据称由12个单位组成,总人数为2500人。¹⁴³不过,其他信息来源称,这些单位只有500人。¹⁴⁴诺伊曼希望所有18岁以上的梅梅尔德意志族人都加入这些新部队,他将其定义为“充满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军团”,由积极服务于民族与祖国的战士组成。¹⁴⁵他宣称,梅梅尔冲锋队最终应该由大约2万名18—50岁的男子组成,鉴于该地区居民不足2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期望。¹⁴⁶

新的冲锋队补充了原有的梅梅尔德意志族安全部队,后者是诺伊曼几周前为“保护”12月大选公信力而重组的。安全部队由诺伊曼亲自指挥,其本意是作为精锐部队,成员年龄均在30岁以下,根据同时代的信息来源,

① 今立陶宛考纳斯。——译者注

该部队“严格按照纳粹的方式组织”，而梅梅尔冲锋队明显不是那样的专门组织。¹⁴⁷最初，该组织成员负责在这一地区传播纳粹意识形态。¹⁴⁸与1933—1934年采取的策略相似，一旦德国国防军与立陶宛军队发生军事对抗，这两个组织应该随时提供支持。纳粹东普鲁士大区领袖埃里希·科赫是诺伊曼在当地的竞争对手，他甚至准备在这些冲锋队部队的帮助下“解放”梅梅尔。¹⁴⁹不过，这类战斗并没有发生。1939年3月22日，希特勒与立陶宛达成正式协议，将梅梅尔地区并入德意志帝国。在协议的第4条中，两国宣布互不侵犯，也不支持第三方对其中一国的进攻。¹⁵⁰诺伊曼和科赫在短暂的过渡期内实施监管，直到1939年5月1日德国法律在梅梅尔生效，此时，原“保安部队”立即加入对应的冲锋队奥斯兰地区总队，党卫队则接管了原“安全部队”。¹⁵¹

外围组织的崛起

本章已经阐述过，1934年到二战开始之间，冲锋队经历了艰苦的内部改革和追寻新意义的过程。正如前文所强调的，1934年初的冲锋队成员中，一半以上在此后的岁月里离开了队伍。退出的决定反映了政治对手胜利后冲锋队地位和重要性的下降，但也是失业率下降、年轻人结婚建立家庭的机会增加的结果。然而，这种发展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即便在旧帝国冲锋队苦苦挽留其成员的时期，仍有超过100万德国男性忠诚于冲锋队及其政治计划。整个20世纪30年代，反犹太袭击是冲锋队常规的活动领域。这些袭击可以通过共同实施暴力形成集体，本身就是“激战年代”确立的联合行动模式的延续。与此同时，德国（以及后来的“大帝国”）犹太人受到的法律保护日益减少，冲锋队得以用盗窃而来的赃物充实自己的腰包。

在这个方面，冲锋队队员确实是先行者，他们“开创”的做法，在后来欧洲犹太人被驱逐和杀害的时期成为了德国及其他地区的常见现象。¹⁵²

1937—1938年，内部整肃过程结束，冲锋队大体上完成了重组。¹⁵³此时，它成功地开始渗透到德国公民生活的许多领域，正如本章介绍的德国射击协会和马术俱乐部。每周只有一两天身穿褐衫、追求常规职业和居家生活的纳粹官员逐步取代“冷酷无情”的积极分子，他们缺乏1934年之前冲锋队普通成员特有的竞争关系。但是，即便这些冲锋队队员比之前更受尊敬，他们仍是具有行动力的人，自诩为纳粹价值观卫士，临时充当辅警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末，观察家已经感受到，冲锋队内部的纪律和献身精神达到了新的水平。¹⁵⁴提升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士气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国边境地区（以及后来并入的领土）复兴的准军事活动。不管在苏台德还是梅梅尔——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管理德意志族人口可观的地区——当地德意志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都在政治局势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整合到冲锋队中。与1934年后在威望和打击能力上都饱受重创的德国心脏地带冲锋队截然相反，这些冲锋队新单位吸引了许多人，主要原因是它们提供了一种相对不复杂的手段，让人们可以证明自己对新国家的忠诚，而又无须放弃现有的社交网。正如一战之后中欧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这些德国边境地区成为了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招募收效甚丰的场所。而且，这些地区的政权珍视冲锋队仍能执行的准军事任务。

此后数年，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越来越多地利用1938—1939年的经验，继续在中东欧建立新的冲锋队单位，这些单位从德意志族人中大量招募人员，行使更多的军事和警察职能。此外，它还为德国确立并以军事力量主宰欧洲的时期制订了远景计划。冲锋队领导层意识到，不仅帝国的未来由东部地区决定，褐衫军的未来也是如此。

第7章 街头战士变身农民？冲锋队与东欧“德国化”

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领域比殖民更适合成为浪漫幻想的落脚点。

——社会民主党在流亡中的报告，1935年¹

关于“东部总体规划”的重要研究在前几十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同样，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在中东欧的扩张政策，以及它们的学术和知识先驱，也已经做了详细的分析。²可是，尽管冲锋队在“罗姆清洗”之后数年不仅成为德国境内纳粹政权的稳定助力，还为1935年起德国扩张政策的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却鲜少被放到这一背景中研究。这一时期，纳粹党的总体目标是争取在海外生活的德意志族人，在吸收兼并他们居住的边境领土之后，使其真正成为民族的一分子。这方面可以从词义的转变明显地看出。直到20世纪初，海外德意志族人被称为“Auslandsdeutsche”，字面意思是“在外国生活的德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纳粹开始将其称为“Volksdeutsche”（德意志族人）。³冲锋队觉得有义务积极参与这种“德国化”进程，主要是因为该进程提供了从相互竞争的各种民族社会主义组织中重新夺取失去权力的机会。因此，冲锋队提出了自己的“欧洲东部德国

化”思路，包括鼓励冲锋队队员从旧帝国移居新占领和吞并的领土，特别是瓦尔特大区和波兰总督府辖区，并在那里建立主要由“德意志族人”组成的冲锋队新单位。

本章分为4个部分。在第1部分中，我将详细介绍冲锋队对30年代殖民运动的贡献，这项运动最初主要是为对党忠诚者建设新的村庄和城区，然后将德国原有边境内的居民迁往那里，以刺激落后地区的农业与经济，特别是北部和东部省份。⁴在第2部分中，我将集中介绍1938—1943年所谓“（冲锋队）总参谋部新农民安置及种族事务专员”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结果和冲锋队的最终失败将在第3部分做认真的评估。在最后一部分，我将引用当前对二战前不久和战争期间德国殖民政策的最新研究，讨论自己的发现。虽然冲锋队最初对“德国化”政策的野心落空（主要是因为希姆莱所辖党卫队的权力，以及缺乏合格的冲锋队队员），但这些工作仍然为战争期间“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及实际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殖民活动

20世纪30年代中期“长刀之夜”之后不久，冲锋队对德国殖民运动的兴趣加强，这绝非巧合。该组织试图开拓新的行动领域，使队员们保持忙碌状态，帮助其领导层在巩固后的第三帝国谋取重要地位，因此开始参与殖民运动。早在1933年6月，纳粹政府就在其《德国农民新构成法案》中宣布，重新安置是国家的当务之急。⁵纳粹党及其辅助组织——最重要的就是冲锋队——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系统地接触德国农村人口，试图利用他们对移居城市者日增引发的“耕地危机”的高度不满。德国多地的纳粹

党成功地利用这种高度不满，自称是决心保护德国各省习惯及价值观的政党，他们将这种观念美化为“德意志民族的血源”。⁶

起初，冲锋队涉及的殖民运动仅限于德国国内的人口迁移。例如，该组织鼓励下萨克森州的普通队员作为“由西向东的移居者”，迁移到人口较为稀少的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⁷但是，没过多久，冲锋队就拓展了工作范围，为即将占领和并入的实际边境外地区制订殖民计划。⁸从1937年起，在冲锋队所在的每个地区，都至少启动了一个大规模殖民计划。这些殖民计划的资金部分来自所谓的“国家感恩奉献”——冲锋队在希特勒生日组织的年度全民募捐活动，旨在帮助有功的冲锋队队员、残疾退伍军人和生活在“自有土地”上的大家族。⁹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为这些计划提供的支持相对有限，只有225000马克。

这些殖民行动的规模参差不齐，目标是靠近不来梅的奥斯特霍尔茨、普法尔茨多夫沼泽以及紧邻东弗里西兰城市奥里希的佩特库姆附近。其他冲锋队定居点建于不伦瑞克以北、维托斯托克/诺伊马克、巴伐利亚城市罗森海姆、图林根州耶拿，以及靠近上西里西亚格莱维茨（今波兰格利维采）的艾兴坎普。¹⁰后来，上述最后一个定居点改名为“格劳本施塔特”（意为“信仰之地”），成为了冲锋队的模范定居点，其部分目的是建立一个“民族防波堤”，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抑制“波兰人的扩张欲望”。虽然二战的爆发使原定计划不能完全实现，但这个定居点的大部分建筑物可能已经完成，可以为2000人提供住处。

格劳本施塔特有两个中心：带塔楼（作为青年旅社）的体育场，以及包围在一个礼堂、一所学校和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驻地之中的市集广场。此外，还有一个射击场和一个防空洞。规划中有一个用于准军事体育

训练的田径场，但从未完成。¹¹格劳本施塔特建筑群的设想说明，冲锋队的“德国化政策”必须放在对德国男性实施入伍前训练的背景下看待，训练活动在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紧密配合下进行。这种准军事教育包括体育锻炼和射击课等实用训练科目，但也有“政治教育”。¹²它不仅针对旧帝国的男性，后来还面向被占领土冲锋队内的德意志族人，对于前者来说，纳粹宣传不断告诉他们，同种族人组成的定居点应该被看成“实现政权经济、国内及种族目标的先决条件”¹³。1937年起的区域性计划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不少于2500个定居点，大部分用于容纳小型单一家庭住房。¹⁴每所房子预计有3个或4个房间，占地至少60平方米，此外还有1000—1500平方米的园地，主要用于种植蔬菜，养殖小型家禽家畜。与建于原林地之上的格劳本施塔特不同，这些中小型定居点中大部分是所谓的“城郊定居点”，靠近现有的建设项目。它们占地较小，不适合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¹⁵

根据1934年的一项规定，只有已婚或订婚且拥有“必要的良好遗传因子”的男性候选人才能在这些殖民地定居。当有关当局意识到相对小的房屋无法应对纳粹政权强调的人口繁衍时，稍微增大了居住空间，以容纳有许多孩子的家庭。¹⁶总体上，当局对这些定居点社会形态的想象是具备竞争特性、种族纯净且致力于纳粹计划。但是，与“建设民族共同体”的高调相反，他们却有意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授予定居者不同数量的土地。这种不公平待遇的理由是激化新定居者之中的竞争，帮助发展政治与经济领导人。¹⁷纳粹党将殖民计划指为该党兑现社会承诺的证据。然而，与1933—1939年建立的共计22000个定居点相比，冲锋队建设的区区2500个定居点只是一小部分，更不用说与魏玛时代建立的57457个（其中7500个在易北河以东）相比了。¹⁸

尽管纳粹“内部殖民”工作的范围有限，但它们很快被看成更具野心的海外殖民计划的预备阶段。¹⁹与第三帝国的社会生活现实（特别是农民与产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因而使农作的受欢迎程度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²⁰，官方对定居点的论述是“血与土”。根据纳粹的宣传，冲锋队和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是第三帝国农民的合法组织。由于冲锋队队员的意愿、意识形态训练和战斗力，他们被视为理想的“德国农业创新者”。第三帝国初期，纳粹政权就已经将该党忠诚积极分子的迁居作为实现政治一致民族共同体的工具之一。即便这种人口迁移最初仅限于旧帝国中的德国人，实行的规模也很有限，但它在二战开始之前很久就展现了创立和重组现有“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说明了纳粹的政治路线。20世纪30年代末，纳粹宣传者通常不会公开论述德国农业严重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因此，往往不合格的冲锋队队员也被说服参加农业劳动，这纯粹是出于现实的原因。²¹相反，帝国食品与农业部长里夏德·瓦尔特·达雷等纳粹高官在1938年的《冲锋队领袖》杂志上发表特约文章，称农民和（政治）战士应该携手参加“德意志—条顿民族的生存之战”。²²

这些陈述显著地偏离了冲锋队队员常见的“街头战士”形象，这种形象在那段时期仍然普遍存在于纳粹宣传之中。“激战年代”冲锋队的本质是好斗、坚定的年轻人和“同志”，²³是党指挥下纪律严明的部队，在受到一切挑衅时都更愿意用拳头做出反应，而“冲锋队农民”则被描述为正处盛年的精壮男子，但首先是负责任的一家之主，是德意志种族的捍卫者。以前都市丛林的鲁莽青年已经成长为辛勤工作、自力更生的人，是珍爱并耕作德意志土地的榜样，他们坚守纳粹政权的价值观和思想，与此同时积极地与纳粹视为“白领娘娘腔”的现象做斗争。

这种新说辞的另一个基础，是从1936年起至少一部分冲锋队最高领导层痴迷的想法：通过促进冲锋队队员定居东欧（久经战斗考验的纳粹分子们的“生存空间”）成为农场主和农业工作者，使冲锋队回到政治舞台。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研究强调，随着1935年国防军的建立，纳粹德国的内部殖民化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国防军想要的不是农夫，而是保卫德国疆域的士兵。²⁴不过，下文我将论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重新开发很快夺取的“生存空间”的准备阶段，这些早期民族社会主义殖民计划在政治上仍很重要。仔细审视1938—1943年冲锋队参谋部新农民安置专员及其继任者的计划，就能明白这一点。

齐格弗里德·卡舍与冲锋队强化的殖民计划

这一时期冲锋队“德国化”计划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人是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齐格弗里德·卡舍。²⁵卡舍生于1903年6月18日，与许多坚定的纳粹积极分子同属所谓的“战争中的年青一代”。一战期间，他在久负盛名的柏林—里希特费尔德军校受训，很年轻就参加了柏林和波罗的海地区“自由军团”的战斗。20世纪20年代初，卡舍加入了波美拉尼亚的“联合工作服务队”，后来还参加过银行业、玻璃工业及纺织品贸易工作。1926年，卡舍加入纳粹党，在冲锋队开始了辉煌的职业生涯。1928年，年仅25岁的他被任命为奥斯特马克大区副领袖（基地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两年以后，他成为国会议员。1934年，卡舍侥幸地躲过了“长刀之夜”，并于1936年11月9日被提升为冲锋队下萨克森州地区总队长。一年以后，冲锋队参谋长维克托·卢策任命他为总部在汉堡的冲锋队汉莎地区总队长。最后，卡舍以冲

锋队全国副总指挥的身份，在1941年4月17日成为首任德国驻萨格勒布（德称阿格拉姆）公使。²⁶

根据卡舍本人的叙述，他和达雷于1936年初就开始谈论可能的农业定居点。两年以后的1938年9月，冲锋队、帝国食品部和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达成协议²⁷，卢策正式任命卡舍为“冲锋队参谋部新农民安置与种族事务专员”。上任之后，卡舍取代了曾负责该组织殖民事务的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冲锋队全国财政局长格奥尔格·马佩斯。²⁸从他亲笔起草的详细指导方针和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位新专员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新任务。在这



冲锋队定居点计划规模有限，但有利于纳粹的宣传。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或1938年的罗森海姆-喀斯特瑙，描绘了工人在一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的指导下，将一车挖出来的土卸到翻斗车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一旁观看。横幅意为“该公司免费为冲锋队运输”。



这张明信片大约在1940年由汉诺威的格拉夫舍·昆斯法拉科·H.卢科夫公司发行，包括九张在哈茨山附近的巴德萨尔茨吉特市庆祝纳粹定居举措的照片。随着1937年帝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赫尔曼·戈林炼铁厂的建立，这里成为德意志帝国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地区之一。“冲锋队定居点”的街道是以纳粹运动的“烈士”（霍斯特·韦塞尔，迪特里希·埃卡特）命名，而附近定居点的街道则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机飞行员的名字，如恩斯特·乌德特和奥斯瓦尔德·伯尔克。

些重要文件中，首要的是1938年9月8日的“冲锋队参与新德国农民队伍指南”，规定第三帝国新定居点（位于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东部）的农民应该根据资历和“遗传价值”选择。但是有必要强调，这些指导方针的本意仍然是专门用于德国境内定居点的。冲锋队应该提供全部新农业移民的30%，以便保证新农村社区的“政治-意识形态坚定性”。卡舍要求德国现有的16个冲锋队地区总队与所在地区“殖民机构”紧密联系，确定队伍中的潜在定居者。这些地区总队被要求在专门的“红皮书”上列出所有对殖民计划感兴趣的队员。²⁹然而，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颁发的“新农民

许可证”证明潜在定居者（及其家人）的种族、心理和生理素质，拥有这一证件才可能参与殖民。申请许可证者必须年满25岁、已婚且属于“雅利安人后裔”。³⁰一旦满足了这些条件，冲锋队旗队负责根据申请人在冲锋队的服务情况、个人和职业状况、健康状况、性格及知识能力和成绩，对其做出评判。最后，每名候选人将得到一个总体得分，从1级（“非常适合安置”）到4级（“不合格”）不等。³¹从1941年起保留下来的申请人名单中可以看出，只有少数人得到高分。大部分申请人得到的是2级（“较适合”）或者3级（“适合”）。卡舍估计，为了得到新农场，冲锋队定居者需要大约9000马克，超出“国家感恩奉献”筹款额的一半。³²

按照从19世纪下半叶起普鲁士边境地区殖民的传统，这些定居点是按照德意志族人抵御邻近斯拉夫族人的堡垒来规划的，许多德国“边疆地区”思想家将后者视为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³³德国于1939年进攻波兰之前不久，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代表卡舍处理殖民问题的冲锋队区队长乌多·冯·阿尔文斯莱本声称，从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军事征服以来，“国防农民”负责确保德国在东欧的影响。他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我们用刀剑赢得的，需要用犁去守卫。”³⁴这种论调绝不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创造。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迪克曼所论述的，一战期间的德国扩张计划已经要求从立陶宛驱逐波兰、俄罗斯和犹太人，并要求在波罗的海国家建立德意志族“农民自卫队”，作为防御壁垒。³⁵对于德国空间规划专家来说，一战期间的东欧成为了一个试验场，他们可以测试越来越极端的定居计划和殖民幻想。二十年以后，民族社会主义政治家和专家很高兴地利用了这些试验性工作。³⁶

不过，1938年起的冲锋队定居计划还包含了纪律成分，这应该对新定

居点的当地居民产生内部影响。新定居者中包含很高比例的冲锋队队员，本意是确保新定居点内部政治统一，纳粹及其意识形态占有主导地位。积极招募冲锋队队员定居德国边境地区的工作始于1939年3月卡舍及其手下对冲锋队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这些努力的高潮是在柏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为期四天的工作会议，以及5月初在上西里西亚村庄施洛豪的实地考察。除了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代表之外，参与者包括各冲锋队地区总队“农业定居点”代表。³⁷

尽管许多前冲锋队招募人员被抽调到军队而使工作大受影响，但1939年秋季德国国防军对波兰的军事胜利仍使冲锋队殖民倡议重获新生。卡舍不顾这些实际困难，将战争看成冲锋队殖民计划东扩的机会。早在1938年11月8日，他就在一封密信中知会卢策和冲锋队领导人，由于德国新取得的领土，冲锋队新农民的安置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卡舍无视海因里希·希姆莱1939年10月7日被任命为“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帝国专员”这一事实，³⁸坚持认为冲锋队“大规模参与德国化”项目仍然是很可取的。因此，他敦促其他冲锋队领导人从队伍中找出更多潜在的农民，目标是将其安置到这些新领土中，罔顾“所有可能产生的压抑和与其故土的纽带”。³⁹

1939年12月8日的通知说明了殖民行动的下一步计划，冲锋队的新定居点最初应该集中于并入德国西里西亚大区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在西里西亚州长和布雷斯劳“西里西亚地产公司”的合作下，上西里西亚被兼并地区的农田拨出供“立即移民”。⁴⁰此前波兰人拥有的农场（大小通常为约20英亩）将遭到征用。然后，这些小块的波兰地产合并成3000—4000个较大的农场，面积至少为60英亩。如果以上数字正确，就说明德国获得军事胜利之后，占据的上西里西亚原属波兰部分的农场数量大约有15000个。冲锋队

领导层采取了与1938年截然不同的路线，通知潜在定居者不再需要为东移动用个人资产：“农场将随库存物资一起移交。”但是，在所有权最终转让之前，德国新农民必须在两年的准备期中表现出运营这种农场的能力。⁴¹由于大部分冲锋队队员此时已经被抽调到国防军，领导层反复强调，拿起武器的人绝不能因为无法立即得到安置而在殖民进程中处于劣势。他们提醒队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波兰殖民区足以容纳所有有志者。⁴²

虽然有这些保证，自战端开启时起，被隔离在冲锋队之外的农民就开始直接接洽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他们将该机构看成是原波兰土地的管理者。这些人绕过冲锋队令卡舍感到沮丧，他向同僚们发出警告，必须将此作为冲锋队组织弱点的证据。⁴³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继续存在。两年以后（1941年），卡舍声称已经和“德意志族人福利总局”接触，确保为该组织工作的约700名冲锋队队员得到照顾。在过去的两年里，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对这些冲锋队队员没有任何直接影响。⁴⁴保存下来的档案表明，虽有这些不足，冲锋队仍然不懈努力，保持对殖民事务的决定性影响，主要是为了创造该组织未来发展的可靠权力根基。⁴⁵1939年秋季，由于新占领地区的常规冲锋队单位建设受到限制，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新的冲锋队单位最初没有加入帝国冲锋队；而且，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没有向与新地区相邻的冲锋队地区总队（即冲锋队奥斯特马克、奥斯拉、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地区总队）提供额外的财政手段，扩展其行动区域。⁴⁶

在实践中，冲锋队计划在战争结束时至少有5000名该组织定居者做好准备，迁移到定居点。候选人将根据冲锋队与达雷的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联合制定的政治与种族条件挑选，并在3所专门设计的冲锋队殖民学校接受教育，这几所学校位于“并入的东部领土”内的冲锋队地产上。⁴⁷1941

年，卡舍声称，他已多次会见希姆莱及其代表，讨论合适地产的所有权转让事宜。他还宣称，已经和利茨曼施塔特（原罗兹）的“并入东部领土公共用地管理总局”举行了会谈。⁴⁸卡舍说，这些会谈的成果是一项共识：冲锋队将在战争结束时得到“克罗希涅维采地产”的50年租约。大区领袖阿图尔·格赖泽尔在1940年夏季甚至更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但他通知冲锋队，这块地产将在战后最终交到纳粹党手里，据说是出于法律的原因。⁴⁹克罗希涅维采位于瓦尔特兰帝国大区库特诺市附近、华沙以西100公里左右，原属一个波兰贵族家庭所有。随着这一地产的转移，冲锋队还将成为建于其上的布沃涅城堡的业主。⁵⁰此时，卡舍对“古特·弗赖胡芬”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是拉维奇乡村地区一块相当大的县属地产。⁵¹

新建冲锋队训练学校的计划表明，冲锋队将为新定居者和冲锋队领导人提供两周的课程，旨在“帮助他们准备特殊的种族任务”：“与外国和劣等种族的影响做斗争，我们必须教育每个德意志族同胞，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遗传价值……即便是个人也必须知道，这不是私事，而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大事。”这样，新定居点的冲锋队农民不仅被看成耕种者的模范，还是政权的某种警察部队。⁵²

尽管卡舍反复命令新的冲锋队农民为“使收复的领土永远属于德国”这一历史使命做出贡献，⁵³但愿意离开德国心脏地带前往东欧新占领土的人数令人十分失望。到1940年6月20日的最后期限，只有1045名冲锋队队员在殖民计划上登记，与估计的数字（5万名具有耕种所需实践经验的队员）形成鲜明的对照。⁵⁴应该承认，到1941年4月30日，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2150人，但仍然远低于冲锋队领导层的期望。⁵⁵然而，卡舍将这个数字归咎于与战争相关的实际问题。1941年，他仍然声称冲锋队将轻松地提供殖民

所需的45000人——不需要从遣返回国的德意志族人中抽调人手，这些人从战争开始就大量迁居德国领土。⁵⁶这一评论是对希姆莱的痛击，从“长刀之夜”起，卡舍对他就保持厌恶的态度。希姆莱同样不喜欢自己的竞争对手。即使到了卡舍被任命为德国驻克罗地亚公使，离开“适用”冲锋队殖民政策的领域之后，两人的关系仍然恶劣。⁵⁷

根据卡舍的报告和1941年下半年的多份月度注册表格，对潜在冲锋队定居者的地理分布进行仔细研究，就可以看出大部分对移民感兴趣的人居住在德意志帝国的北部和东部，这些边疆地区的“国防农民”思想建立在19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传统之上。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冲锋队组织的招募工作最为成功，各提供了超过300名迁居候选人，此后是冲锋队诺德马克地区总队（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提供了240名候选人。相比之下，来自黑森、巴伐利亚州奥斯特马克和阿尔卑斯山区的冲锋队组织分别只提供了12、7和3名候选人。⁵⁸面对这些数字时，很难不将卡舍武断的评论看作一种有意的乐观说法，脱离了战时德国社会的实际。

尽管招募中存在实际问题、卡舍过分强调自己的成就，但他的报告说明，冲锋队继续追求自己的“德国化”策略。随着二战的爆发，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不顾希特勒于1939年10月任命希姆莱为“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帝国专员”这一事实，强化了殖民计划。元首的命令明确指出，新的帝国专员将负责“通过迁居配置新的德国定居区，特别是安置从海外回国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⁵⁹因此，实施“德国化”政策的职责已经分裂了。党卫队负责安置“回家”的德国人，⁶⁰而冲锋队声称有权负责出身旧帝国的德国农民的再安置。直到1941年1月，卡舍仍坚持冲锋队与党卫队之间的这种职责划分。他不仅表示冲锋队不会受雇于“由党卫队提供民族社会主义核心”的

定居点，而且指出“必须强调的是，德国东部的安全保障仰赖用自己的双手工作、扎根于土地的德国农民。监视大群外国农民的德国统治阶级（卡舍在此用批评的口吻，暗指有影响力的普鲁士大地主传统）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⁶¹这种区别说明，冲锋队“自豪地工作”的旧思想与新的“种族与文化优势”地缘概念结合得多么紧密。卡舍假定，新的德国统治阶级将是有民族意识的“男性”工人，其特性正如恩斯特·荣格早在1932年就已写下的那样：自愿遵守纪律、蔑视享乐且具有战争精神。⁶²

然而，希姆莱在1936年研究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计划时，就已经对民族和种族问题有着浓厚兴趣，随着1939年的任命，他成为了卡舍和达雷的直接竞争对手。⁶³这些人所行使的职权分布极不平均。到1939年，身为党卫队帝国领袖以及德国警察总监的希姆莱已经是第三帝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的党卫队在德国进攻波兰之后犯下累累罪行，进一步加强了他在纳粹领导人中的地位。⁶⁴相反，卡舍只能依靠明显弱小得多的冲锋队、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和几位支持他的有影响的纳粹人物（如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外交部的马丁·路德）。⁶⁵在实施竞争性的政治理念上，卡舍确实缺乏挑战希姆莱的能力。例如，当希姆莱倡导，为特别有种族价值的德国家庭，在东部被占领土上建立更大的农场和国有地产——与卡舍更具平等主义愿景的计划直接相悖——这位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所能做的，只是坚持从冲锋队行列中招募一些这种“大地主”。⁶⁶这只是希姆莱1939年底到1941年初成功地在“德国化”政策领域边缘化冲锋队的一个例子。除了冲锋队内部的招募问题之外，这种削弱也是1938年及战争初期草拟的殖民计划未能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冲锋队的规划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对实际权力分配的问题不置可否。⁶⁷

卡舍于1941年4月接任德国驻克罗地亚独立国公使一职，卢策在将近一年里没有任命正式的继任者，间接承认了与希姆莱角力的失败。最后，1942年2月，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卢伊肯被任命为“冲锋队及冲锋队防卫队中分管新农民安置及种族事务的参谋长”。与年轻、有活力的卡舍不同，卢伊肯时年56岁，这位冲锋队官僚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与希姆莱对抗。⁶⁸此时，除了记录队伍中的潜在定居者之外，冲锋队放弃了任何直接涉及殖民计划的工作。1942年春季，就在卢伊肯就任之后几周，《军绿色冲锋队》月刊发表了一篇宣传文章，向对殖民计划感兴趣的读者介绍“新农民许可证”的申领条件和程序。卡舍于1938年实施的资格管理规定仍然有效，但与申请过程直接相关的唯一机构是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的地方分支——“农民联合会”，该机构处理文书工作，组织申请人及妻子的体检，检查他们的血统证明文件，并从当地党部和警察局获得他们的相关信息。农民联合会甚至被要求对申请人进行未事先通知的家访。在对这些过程的概述中，一次都没有提到冲锋队组织；很明显，已经不再需要它对申请人的政治适当性和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做出评判了。⁶⁹

虽然如此，冲锋队仍然继续殖民宣传、登记潜在的冲锋队农民，直到1943年初，此时的候选人数量已经从1942年4月1日的1196人上升到1943年1月1日的2555人。现存的档案中没有解释为何卢伊肯的任期开始时只有略超过1000名候选人，而卡舍在1941年4月30日却指出申请人总数是2150人。很有可能，某些原来的申请人在此期间已经成功安置，而其他则于1939—1942年死在战场上。卢伊肯的新数量包括一切可能的定居者，不管是对旧帝国内移民感兴趣，还是渴望被安置在新的“德国东部”的人。后者有1304人，占1941年1月1日总登记人数的51%。⁷⁰

至少从卢伊肯的角度出发，这些数字反映出：1942年间，冲锋队与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紧密协作，组织了强化宣传活动，试图激起德国人对耕种和农村生活的欲望。围绕“冲锋队定居者讲述他们的生活”“定居点中的冲锋队同志情谊：来自邻居的帮助”组织了各种报告会，采用了生活改革运动的说辞：“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自由呼吸、成长。”⁷¹此时，有一小部分定居者已经从冲锋队行列进入东欧农舍。不过，同年8月，卢策禁止所有从旧帝国向“德国东部”迁移新农民的行动。在剩下的战争岁月中，只有战争老兵和海外的德意志族人才被安置到那里。⁷²

根据1943年1月的内部统计，冲锋队一共只向定居点迁移了422名申请人。这一数字指的是1939—1942年底送出的全部冲锋队队员，还是从卢伊肯上任之后迁居的，目前尚不明确，其中包括内部移民还是只包含德国新领土的殖民人数，也不得而知。但即便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在东部地区定居的冲锋队农民总数似乎也可能不超过三位数。1943年2月16日，也就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后两周，卢策解除了卢伊肯的职务，没有指定继任者。⁷³

农民与意识形态支持者

尽管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冲锋队对纳粹殖民政策并非可有可无，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即便在卡舍就任克罗地亚公使之后，他仍然是希特勒“莫斯科帝国专员”新职务的首选，这一职务预计将在德国战胜苏联（据称“迫在眉睫”）之后设立。⁷⁴身为帝国东部占领区部长

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请求为这项工作选派一名绝对“无情的人”，并推荐了卡舍。⁷⁵在这个职务上，卡舍最初的主要任务将是猛烈压制共产党人一切可能的抵抗形式。如果国防军成功地击败并占领苏联，卡舍作为冲锋队在殖民和种族问题上的专家，将在东欧（甚至更广大地区）“德国化”政策的实施中起到积极、有影响力的作用。⁷⁶

无论如何，卡舍的野心都只是幻想。1941年6月，汉堡的教育学教授古斯塔夫·多伊希勒（他本人就是狂热的冲锋队队员）应卡舍的要求，草拟了一份有关“冲锋队殖民突击队（或称K-突击队）必要性及任务”的报告。⁷⁷按照多伊希勒的说法，冲锋队“K-突击队”将集合具有非洲殖民经历的老一代德国人，以及抱有“走进殖民地”志向的新一代褐衫军。K-突击队中较老的成员将为年轻人提供“德国殖民政策的精神”，多伊希勒称，这是一种“正确判断殖民事务”和拓展“对付原住民的基本技能”所必需的政治态度。⁷⁸这份草案从未产生任何政治意义，尤其因为卡舍就任德国驻克罗地亚公使。但是，直到1944年，卡舍仍然坚称，冲锋队已经做好准备，为德国战后殖民提供必要的“人才”。他确信，第三帝国的社会及政治秩序，以及置身其中、能够调动数百万人的冲锋队组织，将成为战后整个欧洲的榜样。

其次，卡舍领导下的冲锋队殖民计划和活动也值得承认，因为与后来的党卫队殖民政策对比，可以揭示出一些重要的延续性。虽然随着1939—1942年纳粹夺取大片领土，需要的德国移民数量大增，但党卫队坚持迁移旧帝国的德国人，与此前冲锋队的意见非常相似。而且，党卫队也苦于相同的问题。在1941年春季的《东部总体规划》准备工作期间，柏林的党卫队帝国领袖规划总部称，新占领和兼并的东欧领土上，需要约20万个家庭组成

的农民大军。⁷⁹为了实现这些地区中有35%人口参加农业工作的目标，规划人员计算出，共需要146万名德国出生的农业工作者。⁸⁰这些新农民应该提供“整个德意志民族建设的基础”。与许多被党卫队描述为“政治保守、心胸狭窄”的旧帝国农民不同，新农民应该代表着一种新类型，完全了解自身的民族与种族任务。党卫队声称，新征服东部领土上的德国农民必须自视为“攻击中”的真正政治战士。⁸¹

上述设想反映的不是德国占领区的现实，最初的特征是，来自加利西亚、沃里尼亚、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族人未经协调地迁居这些领地。⁸²不过，生活在1937年的德意志帝国边境以内的德国人对向东永久性移民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希姆莱承认，到1942年6月止，党卫队只收到4500份来自德国心脏地带的殖民申请。其中的三分之二是上年夏季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提交的。⁸³自1941年起，德国与荷兰宣传机构以荷兰农民为目标，试图由此增加“日耳曼国防农民”的数量，希姆莱赞扬这些人“从种族上说非常宝贵”，但这一举措最多只能算是短暂的成功。1941—1944年间，有5000名荷兰定居者迁往“德国东部”，其中许多人只在那里停留了很短的时间。荷兰“向东欧征调农民委员会”于1942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哀叹，东部的荷兰农民往往教育水平低下，并蔑称其为职业知识奇缺、领导技能不足的“一群冒险者”。⁸⁴

上述数字和评论，使人们能够正确地看待冲锋队在自身队伍中招募时遭到的失败。很明显，申请人数量相对低的原因并不仅是冲锋队的组织不力，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因素。无论二战之前和之中纳粹如何大肆宣传，只有少数生活在旧帝国的德国人对永久离开家乡、在东欧成为新型的“国防农民”有兴趣。每个有点历史政治知识的人都知道，曾有许多民族为控制

这些地区展开过激烈的竞争，20世纪40年代，那里充斥着过度的暴力。可以这么说，早先相对失败的“内部殖民”在这些地区以更大的规模重复。理论和实践并不一致。

毫无疑问，数百万德国人以士兵、警察、官员、教师、护士和辅助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具有种族主义动机的行动，试图征服东欧的大部分领土，并在那里烧杀抢掠。⁸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投身于实现民族社会主义战后“德国东部”的愿景，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对个人有深远的影响。农民更是如此，他们通常与家族的土地紧密相连。许多真正移居东部的人是年轻的未婚男性，因此对改变和刺激持相对开放的态度，而纳粹宣传所针对的冲锋队队员是已为人夫、人父的中年男子，在许多情况下，这一群体成员已经决定了在哪里、和谁一起生活，也决定了谋生的方法。对这些人来说，可能的失败经济风险巨大，尤其是许多人缺乏必要的金融和社会资本，一旦失去收入和住宅，很难迅速恢复。

上述观察证实了一个假设：纳粹政权试图通过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和那里的新定居点，满足德国农民的期望和要求。⁸⁶党卫队制订了范围广大的殖民计划，打算在1942年为多达22万个旧帝国农民家庭提供移民机会，实际执行将需要国家投入巨大的力量。⁸⁷然而，对于希特勒这样的一战老兵来说，“大后方”的社会与政治抗议是挥之不去的忧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因此，当时的流行词“东部狂热”描述的现象仅限于少数人，特别是规划专家和年轻未婚的“冒险家”，这些人希望为东部的“德意志使命”做贡献。相反，来自旧帝国的农民厌倦了“农业生产战役”，在可用劳力不足的情况下苦苦挣扎，对此事的反应远没有那么热心。冲锋队和党卫队领导人常常保证“在前线作战的德国士兵绝不会”因为回来太

晚而无法从新殖民项目中得益，但在这种背景下，此类说辞没有多少现实意义。⁸⁸

为东欧“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出贡献

事实证明，在东部占领区务农只对少数德国人有吸引力。因此，党卫队旅队长赫伯特·巴克等再安置专家早在1942年7月就承认，应该将“欧洲占领区的新德国农民大军”看成长期项目，不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完成。⁸⁹这种看法与冲锋队的宣传一致，后者持续做出断言，冲锋队作为“大德意志帝国”的“模范战士”，他们在战后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持久的殖民行动”中的和平使者。⁹⁰

冲锋队的“德国化”政策远不只是民族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模糊印记，原因有三。首先，冲锋队的计划——从时间和内容上——形成了德国营养等级管理局早期的“内部殖民”项目和此后党卫队更激进的“德国化”项目之间的纽带。因此，实施这些项目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为第三帝国的“种族动员”⁹¹做出了贡献：增强了冲锋队队员的“种族意识”，强化了（想象中的）“与土地之间的纽带”。⁹²这样，他们将德国传统的“国防殖民地”论调和民族社会主义新种族分类融合在一起。

其次，冲锋队的“德国化”计划在该组织于战争最后几年开展的活动仍然很重要。尽管原定计划从未投入广泛试验，但它们的原则仍然影响着冲锋队自己的设想。因此，殖民计划成为了冲锋队后期倡议及活动的范例，这些活动围绕纪律与整合两极，目标是为按照种族主义路线建立“民族共同体”做出贡献。所以，卡舍将引导和“管理”德国同胞作为冲锋队殖

民倡议中最为重要的方面。⁹³将冲锋队队员重新安置于东欧占领区的具体计划早在1938年就已经制订，它是一个更大规模进程的重要元素：在不久的将来，把为种族与政治一致的“民族共同体”打造的“期望空间”转变为“经验空间”。⁹⁴卡舍在1941年坦承，冲锋队在民族定居点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⁹⁵荒谬的是，尽管该组织实际上已经被希姆莱和党卫队取代，但上述弱点却增强了该组织维持未来预期的能力。

最后，冲锋队“德国化”政策必须放在德国人民“战前训练”的背景下观察，此类训练是在与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紧密协作下进行的。冲锋队的准军事教育包括实际演练（如体育锻炼和射击课程），也包含“政治教育”。⁹⁶这种多层次训练不仅针对生活在旧帝国的冲锋队队员，坚称以种族为基础的定居点是“实现政权经济、国内及种族目标的先决条件”，⁹⁷而且也为在东欧的德国殖民企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⁹⁸在这一方面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确定“德意志族人”在冲锋队内的重要性，特别是波兰总督府辖区的情况。下一章将更全面地分析总督府辖区冲锋队的形成，这些单位始建于1942年4月，部分吸收了之前建立的“边境卫队”。⁹⁹这样，我们才能将冲锋队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历史连接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早期，初生的冲锋队（和其他准军事组织一样）是为了保护生活在帝国境内德国人民的合法利益这一理念就已经十分盛行。¹⁰⁰十年之后，随着德国殖民运动的兴起，这一理念变得更为极端，殖民运动试图沿着种族和政治路线，强化现有的德国“内部殖民”。到20世纪40年代，重点已经从内部殖民转向外部殖民，目标是征服东欧的德国“新领土”。“民族共同体”被理解成“防卫共同体”，殖民活动的实施被推迟到和平时期。¹⁰¹尽管如此，种族优越性观念

以及冲锋队所谓的“殖民使命”继续激励着该组织开展“防御活动”，对抗日益增加的“游击队袭击”，直到二战的最后阶段。虽然冲锋队在东欧的实际殖民行动遭到失败，但这场运动的种族、纪律及自卫概念促进了德国占领区“民族共同体”的极端化。

第8章 二战中的冲锋队

作为元首最忠诚的追随者，我们冲锋队队员一生中只知道两件事：忠于元首直到最后一息；在日常生活中（必要时在战斗中）保持狂热。

——威廉·舍普曼，1944年¹

冲锋队在二战中的作用尚未经过详细研究。²不过，有些历史学家长期认为，冲锋队队员在前二十年实施的暴力活动，必然影响国防军、帝国保安处别动队、辅警部队以及党卫队的作战方式，原因并不仅仅是许多冲锋队队员此时已经被调入国防军。显然，褐衫军作为群众组织和准军事部队，在战争中并没有起到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意识形态可靠、惯于身体暴力的冲锋队队员却发挥了这种作用。这一论点与米夏埃尔·曼不谋而合，他评论道，虽然冲锋队作为一个组织，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后第二次“靠边站”，但“许多核心成员转调到其他杀人机构”。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参战似乎是积累了许多暴力活动经验的“老战士”合乎逻辑的下一步。³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宣传人员很早就认识到这种联系。冲锋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威廉·雷姆原是新教牧师、中学教师，20世纪30年代是“德意志基督徒

派”（DC）领袖，他于1941年声称，“德国国防军独一无二的胜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冲锋队的行动准备、牺牲意愿、同志情谊和团队精神。⁴

本章试图研究冲锋队个人训练水平、纳粹意识形态、个人承诺以及策略性战争努力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我们还将评估战争时期冲锋队在民族社会主义群众组织框架下的重要性。冲锋队的绝大部分年轻成员被抽调到国防军，因此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但是，与人们常常认识的不同，冲锋队并没有沉沦到被人遗忘的地步，而是企图抓住一切机会和二战开始时占领的领土，拓展其活动范围，不管是在交战期间还是在想象的战后时期都是如此。直到1944年3月，冲锋队高级领导人还在瓦尔特大区的波森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研讨会。正如官方议程所表明的，他们不仅讨论了眼前的问题，还参加了关于常规历史与政治问题的讲座，包括“罗马帝国统治形式”“蒙古人的统治”“大英帝国的基础”以及“金元帝国主义”。授课者中有两位显赫的党卫队官员：主讲英国问题的党卫队区队长弗朗茨·西克斯，以及主讲德国在东欧使命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戈特洛布·贝格尔。1943年8月接替维克托·卢策及过渡领导人马克斯·于特纳任冲锋队总参谋长的威廉·舍普曼发表了关于“帝国是一种政治使命”的演讲。⁵会议的高潮是冲锋队领导人们在城里的一次聚会，以及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发表的关于“德意志帝国”的演讲。⁶虽然这些主题都显得欢欣鼓舞，但参会者得到的建议是带上食物券，并被警告除了少数精心选择、有专门保卫措施的场所之外，不要频繁前往餐厅和酒吧。⁷关于帝国统治问题、题材广泛的讲座与该地区内的日常安全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说明纳粹领导人一直保持着浮夸的野心，却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他们的梦想了。也许在今天看来有些荒诞，这种日益扩大的鸿沟却又一次强有力地说明，冲锋队再次成为

了第三帝国最后阶段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下文将说明原因。

冲锋队与国防军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防军与冲锋队之间的关系大大改善。1934年摊牌之后双方的互不信任和敌视当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及1935—1939年间第三帝国的领土扩张，至少可以建立一种工作关系。与国防军竞争日益激烈的是希姆莱的党卫队，而不是“驯服”的冲锋队。冲锋队指挥官们不再具有强烈的自信和远大的政治野心；相反，服从于希特勒的意志和国防军成为了普遍的态度。冲锋队作为准军事组织低调回归，以及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先秘密进行、后正式展开的行动增强了他们的士气，但这一刺激是通过完全符合希特勒和军队目标的行动实现的，不再反映1934年前的“社会革命”倾向。

由于德意志帝国的扩张和战争准备，冲锋队的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末得到了提升。政治复兴的顶点是希特勒于1939年1月颁布的法令，将德国男性的从军前训练和意识形态训练交给冲锋队负责。所有18—21岁、满足常规兵役条件的德国男性此时都有赢得“冲锋队军事徽章”的“道德义务”，这种徽章原称“冲锋队体育徽章”，从1933年起颁发，但从1935年起才开始授予未加入冲锋队的人士。⁸获得这一徽章的准备性训练由冲锋队掌握，他们奉命建立所谓的“冲锋队防卫队”。冲锋队防卫队成员从全职的冲锋队教官那里接受常规意识形态及身体训练，这项任务为教官提供了工作保证。⁹根据1939年夏季的计划，冲锋队完成这项任务需要2万个固定职位，这将使当时冲锋队全职领导人的数量（6000人）增加不止一倍。¹⁰新工作的资金来自

军队，每月向冲锋队拨款1170万马克。¹¹

因为战端开启，人员的大规模扩充未能实现。不过，1940年夏季，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吹嘘，将近13000个冲锋队突击队参与了防卫队的训练，该部队此时有约200万人。¹²这个数字对于1940年来说可能太高，但如果说1939—1942年有超过200万人成功地参与为期三个月的冲锋队训练课程，似乎是可信的。¹³纳粹党的目标是通过这一项目，增强德国男性的战斗力，同时监视和训诫他们。马克斯·卢伊肯在1939年上半年的一次演讲中告诉冲锋队将领们，“血与土、民族与领土、民族性与民族空间”是民族社会主义军事教育的要点。¹⁴这样，纳粹就能牢牢掌握超出希特勒青年团年龄范围而未到服役年龄的德国男性。除了这一群体之外，冲锋队防卫队还打算将所有预备役人员和已经成功服完兵役的士兵包含在内。¹⁵这一组织框架结合了全面控制和持续的教化，成为纳粹“极权主义”野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希特勒1938年12月2日在赖兴贝格所说的，绝不让德国人重新获得自由。¹⁶

维克托·卢策的个人笔记提供了希特勒1939年1月19日所颁布法令成因的相关背景信息，这一法令十分重要，但往往为人们低估。卢策记录道，希特勒曾在1938年11月9日之后将其召到上萨尔茨堡山，参加“关于统帅堂的辩论”，在一次个人谈话中，他要求卢策与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讨论未来从军前后教育规定。希特勒要求卢策和冯·布劳希奇草拟一份报告，为新的制度框架提供基础。双方都深知，这一法令将部分地重新定义他们的相互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卢策声称与冯·布劳希奇、弗朗茨·哈尔德、戈林和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¹⁷他还表示，自己的副手、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奥托·赫尔佐格对这些协商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¹⁸达成一致并得到希特勒确认之后，卢策满腔热情地评

论道：“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终于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党政工作向一项伟大的任务迈出了第一步，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这是德国未来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通过此举，政治战士将和军中的士兵形成紧密的纽带、战备工作将与军事实力密不可分，我党也将与国防军建立联系。”¹⁹不过，卢策在欢呼之后承认，1939年1月19日法令颁布后，竞争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立即企图阻止对冲锋队的重新评价，尤其是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和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军团（NSKK）。²⁰

这一法令以及卢策在接下来几个月发布的后续规章表明，该项工作的目标就是使国防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完全服从于“元首”。因此，冲锋队试图有组织地加强刚获得的权力，其结果就是1939年6月1日成立的冲锋队军队事务部，该部门由后来的第195步兵团团长格奥尔格·冯·诺伊富维尔领导。²¹这样，1939年的冲锋队有了新的目标，一旦实施，就能使其成为很大一部分德国男性的重要组织。军事历史学家曼弗雷德·梅赛施密特正确地将这一发展称为对冲锋队1934年耻辱的“某种补偿”。²²

但是，冲锋队的满足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冲锋队军队事务部成立后仅仅几周，二战就爆发了，形势因此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并再一次给冲锋队造成了不利的局面。仅在1939年8月和9月，就有467000名队员（占总数的32%）被抽调到国防军。到1940年底，这一数字上升到741208（占有能力冲锋队队员总数的53%）。²³结果是，德意志帝国内的冲锋队不总是能履行其常规勤务。而且，冲锋队队员一旦被征调，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就丧失了控制权，因为服役期间，他们与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正式联系将中断。²⁴诺伊富维尔本人也被抽调到前线，1941年11月3日在莫斯科战役中多处受伤后身亡。²⁵尽管如此，卢策和其他冲锋队高级将领仍然将1939年1月关于冲锋队

防卫队的法令看作进一步成长的出发点。

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在这几个月里情绪高涨，这可以从马克斯·于特纳1941年4月写的一封长信中明显看出。于特纳此时负责冲锋队内的“领导力教育”，他在这封信中声称，近年来已经确立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与情感防御共同体”，这首先要归功于冲锋队的教育工作。于特纳断言，在战场上和大后方都可以找到这个群体，并总结道，冲锋队未来的任务就是保证这个“德国男性防御共同体”的安全，确保将其延续到后代。他反复强调，这个团体只包含男性，并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纳粹德国目前男性与女性角色的分配可能仍是德国人生活的永久特征。²⁶

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终极目标是在战后由德国统治的中欧确立主要政治及社会力量的地位，这一更具“乌托邦”性质的目标基于所谓的男性美德，如行动准备、准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坚定性。配合这些野心，冲锋队计划在战争爆发后于法西斯欧洲发动一场宣传攻势。它的情报与宣传部门“侦察勤务”于1939年11月印制了有关“冲锋队历史”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宣传册。根据与出版社的合同，制作并分发的数量达到惊人的85万册。不过，这些小册子从未送达受众群体，因为德国外交部语言服务司认为小册子翻译质量极低，纳粹政权最终阻止了分发工作。²⁷

这些变故当然令卢策和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感到不安，但与该组织战争时期面临的主要障碍——不断丧失人力——相比，它们只能算是小问题。到1941年初，70%的冲锋队普通队员和超过80%的高级官员已被送往前线作战。²⁸人员枯竭决定性地削弱了帝国内的冲锋队，但同时充实了国防军。军队不仅吞没了原冲锋队队员，而且令他们变得不显眼了。²⁹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斯以第253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步兵师为例所做的研究表明，这

个师的士兵中，曾参加过一个或多个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人略多于三分之一。仔细观察发现，其中绝大多数（85.6%）曾是“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冲锋队（或两者皆是）成员，而归属党卫队及纳粹党的士兵比例分别不超过4.9%和3.7%。该师的士兵中，13.7%是冲锋队成员，18.9%是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³⁰拉斯还分析了归属与年龄段的相关性，区分出三个群体：1910年前出生者、1910—1915年出生者和1916年后出生者。在第一个群体中，只有11.6%曾是某个纳粹组织成员。不出所料，这些“老战士”大部分是冲锋队、党卫队和纳粹党成员。在第二个群体中，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开始占据主导地位，38.6%的人是一个或多个纳粹组织成员。第三个群体由最年轻的士兵组成，希特勒青年团占主导地位，62%的人归属一个或者多个纳粹组织。³¹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国防军士兵中，占多数的并不是经过意识形态训练的“老战士”，而是生于20世纪10年代的年青一代，他们通常在1933年或之后、18岁左右时加入冲锋队。这些“战后年青一代”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因此接受的是纳粹政权的“教育”，他们绝大多数没有亲身经历过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政治斗争，而此类事件在纳粹宣传中往往被美化。在归属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国防军士兵中，这些“第二代”冲锋队队员占据数量上的主导地位，因而较少受到冲锋队“辉煌”岁月的影响，他们经历的是冲锋队向从军前训练组织和政治受控的社会福利机构“混血儿”转变的时代。³²

从技术上讲，上述发现并不代表所有国防军部队。但是，第253步兵师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国防军部队，在西线和东线都曾经战斗过。³³根据拉斯的证据，谈论二战中原冲锋队转调来的士兵时，区分两个群体是很有意思

义的：一小部分“老战士”，以及远多于此的年轻士兵，后者的青少年时代恰逢第三帝国建立，这些人在卐字旗下接受教育，强调的是准军事训练和个性的淬炼，减少知识方面的学习，以及服从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接受纳粹的特权。由于1935年恢复征兵制度，相当一部分年轻士兵在战前就已经在国防军中服役。

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强烈地表明不能在冲锋队1933年之前的暴力活动和二战之中的暴力活动之间划上一条直线。在由年纪较长的冲锋队积极分子组成的“雇佣军”中，当然有许多延续性，但在他们的冲锋队年轻“同志”中并不存在这种延续性。要理解后者的动机和行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在冲锋队里所受的教育如何转化成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将会得到很多成果。在对这一主题的讨论中，我将分析个人加入冲锋队的动机、冲锋队“统帅堂”旗队的行动，以及冲锋队宣传在战争最后几年内的效果。

战争的开始

二战初期，冲锋队渴望加强与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治下军队之间的合作。这是自然的行为，因为1939年1月19日的法令要求德国男性交替参加冲锋队防卫队和常规兵役，自然而然地使国防军和冲锋队相互接近。不管相互之间有何保留，这种新联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双方都有利。³⁴陆军从冲锋队的装备、后勤辅助及训练有素的人员中获益，而冲锋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军队新伙伴的尊敬。1937年和1938年，冲锋队在梅梅尔、奥地利和苏台德招募了大量人员，已经提升了该组织的威望。1939年，许

多冲锋队队员将战争爆发视为证明自身价值的新机遇。因此，在军事行动前几个月，许多激进分子渴望在正规军部队中服役。1939年9月15日（德国进攻波兰之后两周），冲锋队汉堡地区总队的一份报告称，其成员中已有35%被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急切盼望着尽早加入国防军：“所有队员都骄傲地听到东部闪电战的消息，但他们也害怕自己来得太迟。冲锋队各级领导人特别痛苦，因为他们确知，以后站在他们面前的队伍是由一群拥有前线经历的队员组成的。”³⁵

想要理解这种可感知问题的普遍性，代际方法是很实用的。前面已经提到，与已经拿起武器的冲锋队队员不同，许多高级冲锋队领导人属于“战争中的年青一代”——他们在一战中太过年轻而未能参战，在20世纪20年代的危机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这些人此时担心自己又处于“错误”的年龄——这一次是年纪太大而无法加入正规军，从而只能在一场被视为决定全球意识形态的战争中沦为不情愿的旁观者。³⁶积极参与战争能够成就这些人的政治野心，是一个时期的准军事训练和持续多年忍受不确定职业前景之后“自然而然”的下一步。³⁷因此，随着战争爆发，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开始对国防军施加压力，要求为突击队长以上级别的全职冲锋队领导人提供更多的从军机会。他们提醒军队，在1939年1月19日法令之后的协商中，双方已经同意为冲锋队骨干开设特殊的军官课程。尽管由于战争开始，继续这些课程已经不可行，但对德国境内的冲锋队领导人给予优待也是令人期待的。³⁸

1940年1月29日，布劳希奇积极回应了这些要求。他下令，立即召集尚未被征调的冲锋队高级领导人，已在军种服役的将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他们证明自己胜任以后将被提升为军官。而且，他明确表示，冲锋队

领导人不应该被用在辅助职位（如打字员、驾驶员或者电话接线员）——这是战争前几个月的常见做法。³⁹这些任务可能与冲锋队领导人的技能相符，但被安排在那里对他们来说往往是种耻辱。士兵康拉德·贾劳施在日记中描述了一名年已四旬、来自马格德堡的冲锋队旗队长对这些新命令的反应。贾劳施写道，这名候补军官“是一个踏踏实实地管理党组织的人，他不缺乏知识，至少在某些领域。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但是与这里的文化和知识传统格格不入”。⁴⁰国防军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里遵守优待冲锋队领导人的命令不得而知。事实是，许多前冲锋队队员的兵役记录没有关于准军事背景的任何信息，说明尽管有着相反的说辞，但国防军并不太看重冲锋队提供的训练。⁴¹

战争刚刚开始，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就开始强调冲锋队在1939年和1940年初对德国战备工作的贡献。但泽自由市的“解放”是常被提起的例子。从1939年6月起，但泽冲锋队第6旅队的第5、14和128旗队为该地区“加强边境控制部队”提供人力，这支部队正式承担预防波兰人攻击的任务。上述单位配备机枪和手榴弹，这些武器在接下来几周该地区的零星交火中派上了用场，冲突中至少有一名波兰士兵和一名冲锋队队员丧生。1939年9月1日前夕，熟悉边境情况的边控部队成员整合到国防军中，冲锋队但泽突击大队转为几个完整的国防军联队，此后参与了对但泽以南小镇德绍（今波兰特切夫）的进攻。但泽的海上冲锋队为夺取维斯特布拉德和哥丁根（格丁尼亚）做出了贡献。⁴²10月15日，职业军人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埃伯哈特率领的埃伯哈特地区总队（或称埃伯哈特旅）改编为第60步兵师，这支部队由但泽警察、冲锋队队员、“保安团”以及志愿者组成。⁴³纳粹宣传当然夸大了这些组织的参与度，但促使他们融入正规军的，很有可能是因为

参与进攻波兰的3000名该城及邻近地区激进分子接受的准军事训练。⁴⁴

1939年8月25日，在更南面的地区，“老战士”们和新加入的波兰附近地区德意志族人组成了一支1600人的冲锋队部队。从9月1日起，这些人身着便服渗透到波兰领土，根据报道，他们阻止了对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内重要企业的破坏。按照一份未公开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文件的说法，来自格莱维茨（今波兰格利维采）的第22旗队和来自拉蒂博尔（今波兰拉齐布日）的第62旗队在这些任务中遭受严重伤亡。⁴⁵战争的前几周里，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开始在多个新占领的波兰城市里建立德意志族人“本土保安部队”，试图复制1938年在苏台德首创的成功范例。按照预期，这些部队未来将成为组建当地纳粹党分支机构的基础。⁴⁶不久之后，冲锋队设立了一个名为“德意志族部队组织专员”的正式职位，冲锋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施罗德走马上任。⁴⁷很快，这些德意志族人部队被称作“德意志族自卫队”，党卫队控制了 this 准军事组织，但其成员似乎成为了该地区后来的冲锋队单位的核心。他们与安全警察的“别动队”紧密合作，仅在1939年就于原波兰领土内杀害了4万多人。⁴⁸

冲锋队还参与了德军对波兰南部边境的攻击。1939年秋季和冬季，来自苏台德地区的一支冲锋队部队在前苏台德德意志族体育运动领导人利奥·本达克领导下，负责为国防军运送武器、保护军需品运输，以及“行动区域的清理和保安”——这一任务包括修建和管理战俘营。⁴⁹熟悉外语的冲锋队队员——特别是来自多语言边境地区的人——审问俘虏，将重要信息传达给军队指挥官。这些任务并不限于战争初期。1941年，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吹嘘，至少有18个冲锋队地区总队参与了所在区域的战俘运送及看守任务。⁵⁰

1940年2月出版的《苏台德冲锋队在波兰》一书图文并茂，是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恢复对该组织正确评价的举措之一，它提供了与波兰南部冲锋队行动有关的更多信息——既有事实，又介绍了所涉冲锋队队员们的心态。⁵¹ 苏台德冲锋队领导人弗朗茨·迈在序言中生动地写道，1939年秋季越过波兰-斯洛伐克边境的冲锋队队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尚未被国防军接纳的志愿者。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据说对被用于组织和后勤工作“心存感激”。⁵² “齐普斯边防团”在德军最高统帅部（OKW）的请求下以一个“营”的身份参加了为时8周的行动，而另一支部队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接受训练。这本书以奉承的口气叙述了冲锋队在波兰的成就，从与斯洛伐克军队联合行动保卫边境开始，止于1939年10月卢策对斯皮什的访问——这是斯洛伐克北部的小片地区，从19世纪起成为相对小的德意志族群居住区，那里的居民通常被称为“喀尔巴阡德意志人”。⁵³

《苏台德冲锋队在波兰》描述的大部分活动表明，该组织跟随国防军部队，但并没有在前线参加真正的战斗。不过，有些内容清楚地展现了冲锋队对村庄和小城镇“清理”行动的暴力特性——冲锋队反复卷入与“波兰及犹太人狙击手”的夜战中，据说，后者在夜幕掩护下劫掠营地、杀害德军士兵。不出意外，冲锋队迅速定位并“消灭”了这些敌人。在该书的同一页里有房屋燃烧的照片，生动地加强了冲锋队是一支危险而坚定的部队的印象。即便从第三帝国的标准看，这本书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也十分浓烈。典型的冲锋队队员形象是勤劳、整洁，“总是做好准备帮助他人”，与“肮脏的犹太人”形成鲜明对照。两幅据称为犹太男性形象的照片使用了如下的题注：“然而，冲锋队的帮助并不能愈合几代犹太剥削者造成的创伤。”对于该地区后方的冲锋队在1939年秋季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对犹太人

的虐待和杀戮，截至目前的历史研究并没有进行分析。但是，这本宣传书籍突出所谓的“犹太威胁”，以及1939年初起喀尔巴阡德意志族“自卫队”（FS）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都是反映真实行动的生动例子。⁵⁴

冲锋队对非犹太裔波兰人的态度也表现出了简单二元论世界观的特点。在1940年的政治日记中，冲锋队参谋长卢策甚至为对波兰平民的过度报复行为辩护，认为对这种暴力行为的批准只要不被诠释为“杀人许可”，就是合理的。他写道：“最终决定为一名德国人报仇时需要（处决）10名、100名、1000名还是1万名波兰人的，是国家、政治局势和未来的必要性。但是，绝不允许将敌人或者战败者当成随意捕杀的猎物，交给个人、小群体或者组织。一个手里有枪的人，在任何自己喜欢的时候成为‘生死的主宰’，是不能接受的。”⁵⁵鉴于德军残忍的战争罪行在这一阶段已经造成超过1万名平民死亡，⁵⁶卢策在自己笔下倡导更谨慎的行动方针。然而，他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提醒，而非直接批评。卢策更偏向于将波兰人赶出德国占领区，而不是非法杀害他们，因为“一家人被灭门不可能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同一家庭、村庄、邻居和家族中总会有人留下来……，这些人将成为更为可怕的指控者、更恶毒的煽动者和更不愿意宽恕的嗜血复仇者”。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卢策还天真地补充道：“我确信，元首绝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因为那不是德国人的行事方式！”⁵⁷

冲锋队“统帅堂”旗队

冲锋队还直接参加了二战中的作战部队，但在国防军的指挥下行动。早在1935年10月，冲锋队成立了以“参谋长护卫旗队”为名的精锐部队，

本意是成为与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同等的部队。⁵⁸最先进入“参谋长护卫旗队”的是未被吸收进常规警察部队的原冲锋队“战地猎兵军团”成员，以及之前驻扎在冲锋队“福利营”的冲锋队队员。⁵⁹根据1936年4月的招募方针，只有未婚、失业（或者工资微薄）、年纪在18—25岁且“种族纯粹”的男性才能加入。戴眼镜者被排除在外，不具备“一般拼写能力”的人也不能入列。⁶⁰“护卫旗队”成员用于正式典礼及检阅，并担任重要标志性场所（如希特勒在柏林的新帝国总理府）的警卫。1936年9月11日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集会上，希特勒为这支部队授名“冲锋队统帅堂旗队”，暗指慕尼黑市中心早期纳粹“殉道者”的核心场所。到1936年底，“统帅堂”旗队包含6个突击大队，分别驻扎在柏林附近的古特费尔德、埃尔丁、哈廷根、菲希滕海恩、什切青和斯图加特。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第7个突击大队在维也纳—卡尔滕洛伊盖本成立，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在布拉格又组建了第8个突击大队。⁶¹

1937年1月12日，赫尔曼·戈林接受了统帅堂旗队“荣誉指挥官”的头衔，作为他44岁生日的礼物。⁶²这对卢策是又一次的羞辱，他深知戈林在“长刀之夜”的核心作用。⁶³虽然这支新部队只有不到2000人，分散于德国各地，因而对冲锋队失败的“民族武装”计划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但“统帅堂”旗队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时日里成为了冲锋队的旗舰团体。只有这支精英部队的成员得到允许，佩戴象征着“冲锋队精神”与军事技能融为一体的冲锋队徽标。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眼中，“统帅堂”代表着魏玛时代的纳粹准军事组织成功转变为与正规部队携手工作、为德国人民的心灵和脑海注入“军事意志”的军事组织。在“统帅堂”服役是自愿的，但从1938年10月27日起被承认为等同于常规兵役。现在，选择加入冲锋队而非

国防军的人必须在该组织服役至少三年。统帅堂也吸引了许多人，因为旗队成员很有希望在退役后得到冲锋队的全职工作。⁶⁴因此，这是一支具有威望的精锐部队，加入它意味着拥有终生服务的权利。

1938年6月20日，戈林以帝国航空部长的身份，正式将“统帅堂”旗队调入德国空军，这一调动持续到1939年3月31日。在此期间，“统帅堂”成为隶属于第7航空师的一个独立团，尽管它接受的是步兵团的训练。⁶⁵因此，该团于1938年10月参与占领苏台德的行动，1939年3月参与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残留部分，是一种虚假的“火之洗礼”。根据维克托·卢策的个人笔记，他本人曾在1938年10月驾驶一架容克52型飞机，加入160架同型飞机组成的机队，从布雷斯劳起飞向南越过捷克斯洛伐克领空。然而，9月29—30日的《慕尼黑协定》已经划定了两国边界，与敌方的激烈遭遇战并未发生，“统帅堂”参与苏台德地区“解放”的行动比预期的更平静。卢策几近失望地写道：“没有伤亡，只有7架飞机的起落架受损。”⁶⁶

1939年间，“统帅堂”旗队分裂成多个部分，这一发展使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拥有一支可完全支配武装部队的希望成为泡影，也使其指挥官、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埃里希·赖曼“彻底陷入痛苦和沮丧之中”。⁶⁷1939年第一季度，他的大部分手下（约1200名冲锋队队员）已经正式整合到第7航空师的常规空军和伞兵部队中，不受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控制。⁶⁸但是，这些冲锋队队员继续在冲锋队宣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对新部队的贡献确实很大。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于1941年声称，1940年部署在比利时和荷兰的伞兵中，90%来自冲锋队。⁶⁹后来，具有“统帅堂”背景的伞兵们参加了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作战。⁷⁰由此可以推断，德国伞兵部队的“团队精神”至少有一部分基于“冲锋队心态”及其特殊的价值观。⁷¹

在整个战争期间，“统帅堂”旗队中只有较小一部分起到原来的作用——作为德国和德占区的警卫部队。波兰总督府辖区内的“统帅堂”成员还和党卫队及警察部队一起用于“特殊目的”。⁷²从1940年底起，华沙城内大约有50名来自“统帅堂”的人员负责在总督府华沙地区长官总部布吕尔宫以及其他公共建筑设岗。⁷³作为自封的“优等民族”代表，他们充当警察部队的角色，向平民索要钱财，并至少一次以袭击宫殿为借口，杀死了一名波兰男子、强奸两名妇女。他们的行为甚至超越了德国占领军的极端种族主义标准，以至于在1943年5月，华沙德国特别法庭判处13名“统帅堂”成员有期徒刑，另一名成员甚至被处以极刑。⁷⁴法官加重判罚，因为案件中的罪行是这些士兵身着精锐部队制服、在波兰民众眼前犯下的。但是，法官们也找到了减轻罪责的情节，他们的理由是，这13名被告全是据称道德标准低于（帝国）德国人规范的“德意志裔”，本身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到更高的德国道德水平。⁷⁵

1939年秋季，“统帅堂”的第三部分人员组成了第271步兵团3营，该团最初是第93步兵师仅有的两个团之一。⁷⁶这个摩托化掷弹兵团由职业军人奥古斯特·拉本指挥。⁷⁷与伞兵们类似，该团士兵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宣传中也被美化成冲锋队价值观的象征，代表着冲锋队战争精神与德国陆军光荣传统的成功结合。⁷⁸第271团在1940年作为第1集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西线的战斗，为德军在洛林南部巴斯特-马林塔尔突破马其诺防线做出了贡献。在法国取得胜利之后，该团从1940年8月起放假，直到1941年2月。重新集合后，赫伯特·伯梅接任该团团长，他是当时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少数德国军人之一。伯梅是早期纳粹积极分子，1930年加入冲锋队和纳粹党，后任冲锋队西里西亚地区总队属下的区队长，1937年加入国防军。⁷⁹



1941年5月3日，宣誓就职的冲锋队“统帅堂”旗队新兵，地点未知。

随着1941年夏季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第271步兵团被部署在东北前线，参加了列宁格勒包围战。⁸⁰纳粹宣传赞扬该团的战绩是“东线冲锋队精神”的范例。意识形态是该团自我意象的关键部分，这可以从沃尔科夫河之战中阵亡士兵被授予“霍斯特-韦塞尔连少尉”荣誉称号看出。⁸¹1942年8月9日，整个团都得到了此前仅用于3营的“统帅堂”称号。⁸²1943年5月4日，该团最终加入第60（摩托化）步兵师，该师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后损失惨重、急需新鲜血液，从那时起，该师被称为“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⁸³

除了形成互联网讨论核心的几位幸存士兵及军事爱好者的记忆，对统帅堂步兵的情况知之甚少，战争期间，冲锋队宣传将这些士兵美化为国防军中冲锋队队员的典范。遗留下来的原德国军队人事档案和部队名单保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冲锋队宣传部门试图吸引年轻人加入“统帅堂”。这场战争把行进中的冲锋队变成了强大的坦克部队，把男孩变成了男人——就像维尔纳·冯·阿克斯特-霍伊特拉斯1944年10月创作的征兵海报表现的那样。

在柏林的“德意志办事处”（原称“国防军问讯处”），但是这个国营机构授权调阅原第271团3营人事档案的条件是隐去士兵们的名字。不幸的是，保存下来的个人文件数量很少。不过，根据这些材料，至少足以对“统帅堂”的社会构成和加入动机做出假设性的结论。我的研究集中在该营营部和第9、10两个连。1939年11月，这两个连兵力各在165人到180人之间，营部有91人。

根据保存下来的人员名单，第271团3营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出生于1914年之后。关于他们加入冲锋队日期的信息很少提供，但很明显，自称为“老战士”（1933年之前有过冲锋队经历者）的人在该营仅占很小一部分。相反，该团普通官兵在1939年底的年龄在19岁到23岁之间，与其他国防军部队类似。来自下莱茵州瓦尔苏姆市的卡尔·A的个人档案在许多方面都是第271团士兵的典型。这名生于1920年的已婚店主于1938年初加入冲锋队，就在他18岁生日前后。⁸⁴1938年6月到1939年3月31日作为德国空军常规人员服役之后，卡尔·A在“统帅堂”旗队服役直到1939年9月9日调入第271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参与了该团在法国及苏联（1941年夏季起）的战斗，得到了许多荣誉，曾获颁步兵突击徽章、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东线冬季战役奖章。1942年11月1日，他加入“统帅堂”掷弹兵团，1943年9月1日被提升为士官。1943年新年前夜，卡尔·A受了重伤，但似乎很快就返回前线。于“1944年6月24日到7月7日之间”在明斯克附近的莫吉廖夫地区失踪，当时，国防军已经停止提供东线官兵的确切死亡地点和日期了。⁸⁵

来自多特蒙德的赫伯特·M是经过正规训练的砖瓦工，他生于1920年12月，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加入冲锋队，距离他18岁生日还有数周。他最初

是统帅堂第1突击大队队员，后来调到驻布拉格的第5突击大队，1939年秋季调入第271团3营9连。赫伯特·M参与了对法和对苏战役，1942年4月19日在东线斯帕斯卡亚-波利斯特附近为炮火所伤。可能是因为永久性的创伤，他于1943年3月被豁免在前线服务，送回“统帅堂”旗队维也纳突击大队。他此后一年生活的有关信息无从得知。1944年4月26日，赫伯特·M死于布拉格-罗伊特（布拉格克尔奇区）预备役部队医院里。在妻子的请求下，他的遗骸被送到杜塞尔多夫下葬。⁸⁶

最后一个例子是库尔特·M，他于1938年加入时，是“统帅堂”最年轻的成员之一。1921年5月他出生在慕尼黑的一个中下层家庭，在一所中学里就学四年之后转入一家商业学校，在那里学习了三年。1935年，库尔特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38年进入冲锋队序列。他自愿加入“统帅堂”是因为戈林之下德国空军的威望，1938年，他被编入慕尼黑附近埃尔丁的第4突击大队。不过，他“因病”未能成为伞兵，而是在1939年9月9日加入了第271团。尽管上级对其褒贬不一，库尔特·M进步神速，1941年8月9日被推荐参加一个军官培训课程。⁸⁷他的一位上级在1941年的推荐信中将这位年轻人描绘成冲锋队战士的模范：“知识水平一般，思考不多但清晰，身材修长，非常健康且坚韧……在战斗中，M表现得冷血且无畏，凭借个人的榜样，他率领的队伍即便在敌军的极端行动下也从未失去控制。”尽管有这样的特质，后晋升为军士长的库尔特·M在1944年4月仍然活着。⁸⁸

从技术意义上说，这三个案例当然不能代表第271团的全体成员，但现有数据强烈表明，他们的个人情况是该团普通士兵的典型。在“统帅堂”的士兵中，工人阶级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年轻人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这支精锐部队，吸引他们的是戈林治下德国空军的威望，以及避开常规兵役、

在冲锋队军事部门经历稳定职业生涯的前景。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将统帅堂看成与其意识形态偏向相符的升迁之路。⁸⁹

不过，至少在加入“统帅堂”之前，这些年轻人的冲锋队经历很有限。对他们来说，冲锋队对“激战年代”的典型叙述是另一代人的故事。与先驱者相比，新一代冲锋队队员成长于民族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规范的政治气候里；因此，他们不代表对立面，而是新的主流。许多人似乎将在“统帅堂”服役视为纳粹政权内的常规职业道路——这一结论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统帅堂”里的很多冲锋队队员已经结婚，但他们年纪尚轻且往往没有受过完整的职业训练。最后，“统帅堂”成员不是从某个特定地区抽调的，而是来自大德意志帝国各地，包括吞并的领土。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德国男性居民的代表。

共产党的宣传

作为对1941年夏季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一反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宣传人员决定启动面向特定听众的德语广播节目。“暴风雄鹰”节目意在吸引德国青少年，而“冲锋队队员汉斯·韦伯”节目则用于影响普通民族社会主义者。1942年，两个节目都属于苏联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是流亡中的德国共产党的非官方电台。⁹⁰记者弗里茨·埃彭贝克扮演变节的冲锋队队员汉斯·韦伯，他在战争后期成为“自由德国”节目的副主编。这个每天20分钟的广播节目造成的影响无法评估，因为在德国的许多地方根本无法听到它。但是，节目创立者对其功效深信不疑，他们很快为韦伯增加了一名伙伴——名叫马克斯·施罗德的冲锋队同僚，由记者马克斯·凯尔

松配音。这部反纳粹戏剧的基础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共产党的策略：通过倒戈的“冲锋队刊物”对该组织实施渗透。这些作品用简单的流行语写就，有时候以虚构对话的形式，试图强调冲锋队社会革命口号与纳粹党机构的“出卖行为”之间的反差，诱使心怀不满的“老战士”站到对立面。⁹¹新电台节目还受到了英国秘密电台“古斯塔夫·齐格弗里德·艾因斯”（GS1）的影响，这个电台由一位匿名的“大佬”发声，抨击纳粹党和共产党人。按照埃彭贝克战后的回忆，与英国人的广播节目不同，德国共产党的节目本意是“少一点粗俗和淫秽”，尤其是因为苏联的严格审查。⁹²从今天我们所知的纳粹幽默感看来，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当时的德国人更喜欢天真、温和的调侃，而不是直截了当、咄咄逼人地指出觉得荒唐或可耻的事实。⁹³

“冲锋队队员汉斯·韦伯”的关键使命是，以人口稠密的鲁尔工业区方言，联系普通纳粹分子，后来又补充了流行的柏林方言。节目中的两个冲锋队角色都以人们熟知的“坚定但有限度”的纳粹分子为模板，通过对纳粹官员风流韵事和普遍腐败的评论，揭露了第三帝国的缺陷。他们一再强调纳粹党宣传与德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⁹⁴特别令人难忘的情节据说基于截获的德军信件，这些信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来自威斯特伐利亚某城镇的纳粹党官员与一名少女发生性关系，以及一位德国母亲请求在武装党卫军服役的父亲“寄来孩子们的衣服”，并附注道：“我不在乎衣服是不是沾上了血，我会把它洗掉的。”⁹⁵这些例子表明，对性变态的指控仍然是反法西斯宣传的常见特征。共产党人将民族社会主义者描述为性虐待者，与纳粹政权道貌岸然的宣传形成强烈的反差。

从本书的角度出发，引人注目的是，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余部——他们的队伍在前几年的斯大林肃反中已遭到严重破坏——仍然相信，有可

能将1928—1934年间共产主义运动失去的大量工人阶级拉回己方阵营。⁹⁶正如德国共产党在第三帝国初年所做的，引发纳粹队伍中的混乱和不满似乎仍是合理的策略。尽管大部分冲锋队队员已经被抽调到军队里，但他们仍很重要。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将其视为维护纳粹国家秩序的关键群体，还认为他们是可重新教育的。几年以后，共产党在德国苏占区（1949年起的东德）的策略与此保持一致。司法机关至少在战后的头几年对冲锋队采取严厉的立场，但它也致力于将底层纳粹分子教化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⁹⁷

总督府辖区、保护国和斯洛文尼亚的辅警

德国在1939年的军事胜利是后续分裂原波兰领土的先决条件。该国的西部被吞并、加入“大德意志帝国”，东部则成为苏联领土。不过，波兰心脏地带（包括首都华沙和克拉科夫）变成了称作“波兰总督府”的德国占领区。虽然法学家、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汉斯·弗兰克统治这块波兰被占领土，但冲锋队队员最初并没有在此发挥作用。与之前奥地利、苏台德和梅梅尔的成功事例不同，波兰总督府辖区内的纳粹政权无法动员大量德意志族人加入新建的冲锋队。冲锋队在此前为德国占领上述地区铺平了道路，而在波兰总督府中，情况正相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冲锋队努力保持军事占领确立的现状。

1939年10月30日，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于特纳发布了关于“在原属波兰的德国领土内建立冲锋队”的命令，要求冲锋队奥斯拉、奥特马克和西里西亚地区总队联合负责在邻区建立冲锋队“基层组织”。然而，除了最基本的小队、中队和突击队之外，没有创建任何常规的冲锋队

组织结构。制服和资金也暂时未能提供。⁹⁸几周后，随着波兰德占区边界的重新划定，在该地区组建冲锋队的职责分配给了冲锋队奥斯拉和西里西亚地区总队，双方各负责同名的“大区”。此外，还建立了总部设于但泽（负责但泽-西普鲁士）的“魏克塞尔”地区总队和波森的“瓦尔特”（负责瓦尔特大区）地区总队。⁹⁹早在1939年11月，冲锋队就开始在罗兹和比利茨^①招募人员，“成果斐然”。¹⁰⁰1940年1月22日，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海因里希·哈克尔升任瓦尔特地区总队领导人，根据冲锋队的统计，这支部队在1940年3月人数超过1万人，1941年夏季达到25000人以上。¹⁰¹大部分队员都是战争爆发前已经居住于此，或者从东面的沃里尼亚、加利西亚和比萨拉比亚迁居而来的所谓“德意志裔”。¹⁰²这些冲锋队新单位的领导人最初往往来自旧帝国，但也有许多是波罗的海德意志族人，他们很快就发现，手下相当一部分“长着德国面孔的粗人”不会讲德语。¹⁰³因此，他们为瓦尔特大区的冲锋队队员组织了德语和历史课程——这一事实说明，冲锋队在相当程度上“制造”了德国人。¹⁰⁴

哈克尔是一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分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纳粹大区领袖阿图尔·格赖泽尔紧密合作。¹⁰⁵不过，哈克尔野心极大，1941年9月请求调往更东面的地区，最好是高加索。他请调的动机是“冲锋队的战斗自然要以统治俄国而告终。冲锋队精神要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就要求冲锋队队员率先抵达东部”。¹⁰⁶这种推理说明，“为狂热而逃避现实”的支持者们很大程度上将其野心建立在某种语言基础上，此种语言不仅包含着纳粹早

① 今波兰别尔斯科。——译者注

期对敌人的刻板印象，也包含着殖民主义幻想。¹⁰⁷

1940年2月，在德累斯顿的冲锋队帝国学校里，为生活在这些新冲锋队组织辖区的德意志族人开办了首次冲锋队领导力培训课程。维克托·卢策在日记中写道：“比我预想的要好……在种族和身体上也是如此。”¹⁰⁸一年以后，1941年2月初，冲锋队瓦尔特地区总队下辖两个旅队，分别驻扎在波森和里茨曼斯塔特（罗兹），而冲锋队魏克塞尔地区总队有4个旅队，其总部分别在但泽、埃尔宾、布隆贝格和托伦。¹⁰⁹与此同时，保护国（前捷克斯洛伐克未被兼并的德国占领区）也建立了分散的冲锋队组织。

根据纳粹刊物的记载，科尼格因霍夫（拉贝河畔皇宫镇）、科尼格格拉茨（赫拉德茨-克拉洛夫）、皮尔森（比尔森）、布伦（布尔诺）和布拉格都有冲锋队突击队甚至旗队。关于这些单位的可靠信息很少，但其中绝大多数成员似乎都是来自各自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它们至少部分由来自德国的冲锋队职业领导人指挥，此外还接受国防军的训练。和其他中东欧德占区一样，冲锋队在那里的成员中培养“德国民族性”，这些人往往执行辅警的任务。¹¹⁰

波兰总督府辖区的情况与此不同。该地区在1941年春季之前没有建立正规的冲锋队单位，但是冲锋队领导人受邀参加了1940年10月26日总督府成立一周年的庆典。¹¹¹然而，此时在总督府辖区的所有冲锋队领导人都是派往东部执行行政与军事任务的德国公民。他们在正式场合里穿着冲锋队制服，佩戴各自家乡的标志，却没有组织成当地的新单位。改变这种状态的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941年秋季，当时纳粹党允许在克拉科夫组建一个冲锋队荣誉突击队，用于检阅和典礼。¹¹²可是，此后的几个月里，由于该地区的“安全问题”加剧，形势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主要是越来越多的镇压行

动和毫无人性的德国殖民统治所致。仅在1942年中，德国当局就在总督府辖区内处决了至少17386名所谓的“匪徒”。¹¹³由于波兰人和犹太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绝望驱使下的武装抵抗倍增。¹¹⁴为了稳固统治，汉斯·弗兰克和不断与之竞争总督府辖区权力的希姆莱试图达成协议，建立所谓的“机动护卫队”，该组织结合了德意志族民兵、社区监视组织和辅助警察部队的角色，由党卫队官员训练，某种程度上是1939年建立的冲锋队防卫队的新版本。¹¹⁵这些谈判没有达成一致，此时弗兰克深知卢策和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渴望一个增强其重要性和影响的机会，于是请求冲锋队代替党卫队在该地区的作用。1941年10月底，此前曾受雇于慕尼黑冲锋队帝国领导力学校的冲锋队旗队长库尔特·佩尔茨抵达克拉科夫，组织“机动护卫队”。¹¹⁶从12月17日起，总督府辖区所有17岁以上的德意志族人都要登记加入这些单位。¹¹⁷

果不其然，希姆莱和党卫队非常愤怒。他们担心冲锋队利用在新的“机动护卫队”里的影响力，建立供专制的弗兰克支配的冲锋队部队。1942年2月3日，希姆莱下令组建与之竞争的新单位——党卫队东部特别突击大队。¹¹⁸几周以后，3月20日，卢策做出反应，批准在总督府辖区建立相应的冲锋队地区总队，以领导机动护卫队。佩尔茨估计“经历初期的困难之后”，总督府辖区的冲锋队人员将多达5万，后来他又将这个数字缩减到22000。¹¹⁹弗兰克于4月16日最终颁布法令，为总督府辖区组建一个新的冲锋队单位——冲锋队驻总督府部队。¹²⁰冲锋队将负责原冲锋队“机动护卫队”的“登记、训练和指挥”，后者从此时起改称“冲锋队机动部队”。弗兰克此前曾是冲锋队名誉全国副总指挥，由他本人正式指挥总督府辖区的冲锋队。¹²¹

正如内部文档所说明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确信，这一步骤“目前为止”将取得比一支准军事防卫部队更大的成果。由于该地区的每一个德国人（从国籍和血统上都是这样定义的）必须在这些新单位中服务，而这些人之前并不是另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积极成员，因此他们希望为“对东部殖民有极大好处的政治教育”制订全面的计划。¹²²早在1942年6月19日，冲锋队机动部队在华沙就有8000人，在拉多姆有12000人。¹²³三个月以后，总督府辖区已经有11个冲锋队旗队，超过200个突击队。¹²⁴详细的成员名单似乎没有保留下来，但即使是很保守的估计，1942年底在这些冲锋队机动部队里至少有3万—4万名“德意志族人”。

令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失望的是，冲锋队只能组织和训练这些人员，而将其投入行动的决定由党卫队和常规警察做出。¹²⁵不过，随着总督府辖区的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党卫队明显减少了将冲锋队在该地区军事影响力限制在最低水平的努力。¹²⁶1943年春季，新的冲锋队地区总队已经参加了对总督府辖区德意志族定居者的“检查”。¹²⁷与此同时，汉斯·弗兰克抱怨道，总督府辖区居民达到1650万人，仅有11000名警察加以监督，他只能确保克拉科夫、华沙和一些较小城市的公共秩序。¹²⁸在这种背景下，从德意志族人中招募的冲锋队队员变得不可或缺，1943年12月，一位冲锋队领导人吹嘘，该组织“很大程度上主宰了总督府辖区的政治生活”。¹²⁹此时，“全副武装”的整个冲锋队建制执行着常规警察的任务。¹³⁰

该地区冲锋队领袖佩尔茨此时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德国占领军的习惯。1938年，他在冲锋队的上级认为他是“很有能力的冲锋队领导人”，但注意到他的性格中有某种“软弱性”且沉默寡言。相反，1944年他的一名下属向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投诉佩尔茨在克拉科夫奢华的生活方式。他宣

称，佩尔茨要求为妻子和自己提供额外的食物定量券，将手下派往城里的黑市购买稀罕的物品。对于这些指控，佩尔茨敷衍地为自己辩护，坚称自己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以拥有社会义务的德国官僚的标准生活。¹³¹对冲锋队领导人掠夺占领区的指控实际上从战争开始时就已经出现。例如，埃里希·莱曼于1939年12月准备从波兰回国，车里装满了为妻子和冲锋队及国防军同僚家属带的包裹。¹³²就连慕尼黑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也从这些赃物中得益，接受了2万米的波兰制服用布。¹³³

随着冲锋队越来越多地参与德军在总督府辖区内的“治安行动”，该组织成员也日益成为波兰抵抗战士的目标。冲锋队区队长佩尔茨在1943年成为了一次未遂炸弹攻击的目标。同年7月15日，波兰抵抗组织“人民近卫军”的一个小组向在华沙行进的冲锋队队列投掷了一枚手榴弹，造成数人重伤。作为报复，德国当局处决了约130人。¹³⁴一年以后，1944年8月华沙起义爆发时，该城冲锋队积极参与镇压行动，遭受惨重损失。¹³⁵此时，汉斯·弗兰克将总督府的冲锋队称作“德意志战斗民族的突击手”，超越了通常的纳粹用词。从1943年起，总督府辖区的冲锋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控制当地居民、稳固德国统治的疯狂行动，具体的举措包括强征劳工参加防务工作、惩罚性远征，以及现存文件中难觅踪迹、数目不详的局部暴力事件。¹³⁶这些最初的后来者（与瓦尔特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建立的冲锋队正规部队相比）转变成了更残酷的德国占领区政权的先锋。

这种发展并不是总督府辖区所独有的。1941年4月17日—5月15日，由奥地利居民和布科维纳地区难民组成的冲锋队武装部队在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展开行动，这两个地区是德国军队在1941年4月初占领的。¹³⁷与战争前几周在波兰西部发生的情况一样，紧随参加巴尔干战役的国防军之后的，

是来自冲锋队苏德马克地区总队的冲锋队秘密部队（兵力为3500—4500人）。一份代表冲锋队撰写的报告委婉地说道，冲锋队队员在“解放的南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地区”维持秩序。他们保护重要的公共设施，并“清理游牧区”。冲锋队随行记者写道，这些任务都迅速、残酷地完成了。¹³⁸不过，这篇文章从未发表——可能是因为言辞太直接，表明帝国边境地区的冲锋队已经转化成武装政治警察，以及与战争有很深牵连的作战部队。与官方媒体的约束截然相反，冲锋队苏德马克地区总队1941年5月的一份出版物公开吹嘘冲锋队在比施蒂利亚更远的“解放后的低地实施特别行动”。虽然大部分部署在那里的队员用于保护工厂和“常规治安任务”，但有600人被派往波霍列山脉，清理“法国游击队”和零散“塞尔维亚部队”活动的区域。这一行动由冲锋队苏德马克地区总队长瓦尔特·尼贝指挥，由“未经公布的冲锋队单位”实施。¹³⁹

从1941年夏初起，这些任务由新组建的冲锋队“防卫队”接管，接受“施蒂利亚祖国联盟”和“克恩滕民族联盟”指挥，建立后两个组织的目的是作为纳粹地方分支机构。一年以后，1942年夏季，纳粹周刊《观察家画报》以“边境巡逻队打击匪帮”为题刊登了一张照片，表现了上卡尼奥拉新边境地区武装“防卫队”在冲锋队领导下，成功地与“布尔什维克暴民—煽动者”及原南斯拉夫军队士兵组成的零散群体作战。¹⁴⁰与总督府辖区的发展类似，冲锋队苏德马克地区总队也在确保南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治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行动包括打击声称的和真正的游击队。不过，冲锋队防卫队的正式任务不是通过与游击队战斗平定南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而是为其成员提供“民族社会主义教育”，包括准军事训练，这与1939年起冲锋队的常规使命相符。在冲锋队防卫队里服役被视为“向其成员介

绍回归德意志民族的道路”的主要手段。¹⁴¹与“大德意志帝国”的其他兼并或者占领区一样，和地方治安同时进行的，是“德国化”被认为种族上足够纯净的当地居民。¹⁴²

但是，“施蒂利亚祖国联盟”“克恩滕民族联盟”与冲锋队防卫队协同进行的活动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相反，纳粹统治仅仅一年就完全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设立的德国组织残暴、腐败。¹⁴³由于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克恩滕民族联盟下辖的冲锋队防卫队于1942年10月解散，替代它的是新组建的冲锋队上克莱因旗队，到1943年1月只有1000人加入。¹⁴⁴从秋季起，持续的反“游击队”行动越来越多地由党卫队旗队长汉斯·布兰德率领的所谓党卫军“喀斯特猎手”部队实施，手段极端残暴。¹⁴⁵党卫队又一次最终超越了冲锋队。

大后方

并不是所有冲锋队队员都在国防军服役，或者进入占领区的单位中。特别是那些年纪太大而无法进入现役的人，他们转而承担当局宣传人员所称的“大后方”的辅助任务。这些任务很分散，从战争开始就立即启动了。例如，大汉堡地区的冲锋队从1939年9月起负责空袭警报任务，将近500名冲锋队队员忙于此事。冲锋队队员还被大批征召用于支持大汉堡地区“粮食配给辅助组织”的工作（600人），修建该地区的防空壕（400人）。¹⁴⁶这些工作当然不如前线的任务有声望，但随着战争进行，它们对于维护第三帝国的公共秩序越来越重要了。

几年以后，1943年7月和8月，盟军在“蛾摩拉行动”^①中对汉堡发动大规模空袭，上述准备工作取得了成果。此次空袭摧毁了该城的大部分地区，造成约37000人死亡。¹⁴⁷至少在德国学术界中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之一古斯塔夫·多伊希勒看来，冲锋队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多伊希勒从1934年起就是坚定的冲锋队队员，情绪高昂地赞扬了褐衫军在轰炸期间的紧急救援工作。他声称，当地各冲锋队单位在无法得到集中指挥的情况下，展示了引人注目的自我组织能力。他和同事们不得不为数十万因轰炸无家可归的人提供补给、救助伤者并找到死者，这是极端困难的任务。冲锋队还确保危房的安全，组织疏散无家可归者，扑灭全城燃烧的大火。多伊希勒说，由于许多冲锋队队员本身也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完成这些任务就显得更了不起了。他甚至坚称，在这种危机时刻，冲锋队是提供帮助和安慰的主力：“冲锋队队员所到之处，都立即引起民族同胞的注意和尊敬……人们对他们无限信任。冲锋队队员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就是民族同胞面对冲锋队时的信念。”¹⁴⁸

冲锋队成员对该组织不加鉴别的美化当然是夸大其词，但也有几分真实之处。从战争开始起，冲锋队参加的一系列活动虽不能总是满足其自尊心，但确实对纳粹宣传的“保卫大后方”做出了贡献。除了被抽调到冲锋队“关怀服务”帮助从军同事的人员之外，其他人一再响应号召献血、帮助运送伤兵。到1941年，一些冲锋队组织甚至出资为在军队医院里治疗的

^① 蛾摩拉是《圣经》中记载的罪恶之城，城中居民不遵守上帝戒律，导致城市被上帝毁灭。——编者注

士兵购买香烟、书籍、报纸，或者作为他们的零用钱。¹⁴⁹冲锋队各单位还帮助修建高射炮掩体和德国西部边境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协助德国农民收割，帮助安置“回乡”的德意志族人，防止森林火灾，担任“辅助警员”以支持常规边防警察（就像他们在1933—1934年所做的那样）。¹⁵⁰特别重要的一项任务是看管越来越多在德国工厂和田野上工作的外国强制劳工。1944年8月，德国国内的外国人数量已经攀升到近8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强制劳工。为了保持对这么多外国人的控制，纳粹政权依赖100多万德国人，这些人以辅警或者农村—城市卫队成员的身份，负责阻止逃跑和不符合种族主义原则的亲密关系，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保持公众的斗志。¹⁵¹

农村卫队和城市卫队在希姆莱的控制之下，鉴于党卫队自1934年起对冲锋队施加的压力，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自然担心这些新机构将大量招募冲锋队人员。因此，1942年4月，冲锋队领导层请求至少将其领导人排除在招募工作之外。否则，冲锋队的“群众工作”有完全停滞的危险。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不愿意将“大后方”残存的最后一部分骨干交给希姆莱。这次，他们赢得了与德国警察总监的拉锯战，后者于1942年6月答应了上述请求。¹⁵²

战争后期，由于德国城市日益遭到破坏，冲锋队队员奉命收集被炸毁房屋中仍然可用的残余物品，例如炉灶和浴缸，供需要者使用。¹⁵³他们还经常执行灯火管制，并与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NSV）组织协同，在寒冷季节为需要的平民提供煤炭。¹⁵⁴这些活动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冲锋队还在这方面严格约束外国人和德国居民。多伊希勒在上面提到的汉堡报告中也没有忘记提起，冲锋队的任务中还包括“暗中观察可疑人物”¹⁵⁵——这一描述适用于各国强制劳工以及普通德国平民。

尽管任务多种多样，许多冲锋队的长期成员仍抱怨自己的贡献没有得

到承认。例如，冲锋队突击队长弗里茨·汉克是“霍斯特·韦塞尔之家”冲锋队档案馆的雇员，并兼任“防空队员”，他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作为一名坚定的纳粹分子，自己没有用在合适的地方：“至少，德国同胞现在看到我们这些‘老粗人’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不幸的是，我们在前线不再受欢迎了，可是，我们应该拥有参加与布尔什维克最后一战的权利，我们是最早的战士，却不得不待在这里收拾屋子！！！”¹⁵⁶与之类似，冲锋队队员、慕尼黑H. 特劳特摄影公司老板维克托·霍尔舍于1942年6月给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写了一封长达6页、措辞激烈的信，抱怨自己的处境。他声称，许多普通队员认为，战争时期在冲锋队服役令人极端不满。霍尔舍的手下大部分年龄在28—40岁，意识形态坚定且经验丰富，渴望着为德国的“最后胜利”做出积极贡献——但是，他们只能困在一个聚会团体里，所做的不过是定时在一家旅馆里举行敷衍了事的社交聚会。霍尔舍大声疾呼：“任何积极分子都受不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过着这种生活！”在他看来，冲锋队就像是一个老兵协会，而不是战略上十分重要的现代化党组织。因此，刚加入冲锋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候补公务员，他们必须加入至少一个党组织。这些人最多是成为正式的“成员”，但不保证会成为坚定、积极的“真正冲锋队队员”。霍尔舍总结道：不可否认的是，冲锋队是唯一没有履行其战略任务的重要党组织。¹⁵⁷

来自冲锋队积极分子的这些批评触动了组织内部的神经。尽管如此，区分冲锋队在旧帝国中的活动和在新占领区的任务仍是很重要的。战争的前几年，德国心脏地带的冲锋队组织人数大大减少，确实经常缺乏目标和积极性，但在遥远的东面和南面却不是如此，冲锋队在那些地区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早早地成为了德国战争努力的一部分。这段时期希姆莱继续严密监视该

组织的活动，并十分注意有关卢策及继任者舍普曼加强冲锋队重要性的消息，这正说明了冲锋队继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随着战争进入白热化，德国城市和工厂遭到的轰炸成倍增加，旧帝国的冲锋队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任务。由于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前线作战，冲锋队能够聚集、训练和使用老少德国男性，并控制平民日益焦虑的情绪，这种能力成为了国家战备的关键要素。

从慕尼黑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新职责也有着性别特征。汉斯·施蓬霍尔茨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小小说家，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担任宣传人员，他于1942年9月撰写的一份秘密报告称，妇女对该城最近遭受盟军轰炸的言论引起了当局的担心。具体的情况是，她们公开推测，德意志帝国先向盟国发动进攻，因此官方宣传中对空袭的义愤缺乏根据。更有甚者，其中一些人甚至将大量平民因爆炸死亡或者无家可归归咎于“上帝的审判”，原因是德国“强迫犹太人出境，使其陷入悲惨境地”。为了阻止此类讨论，施蓬霍尔茨建议派遣冲锋队领导人着便衣进入商店，“确定（钉住）一些个案”。¹⁵⁸文中使用的动词在德语中是一种性暗示，这可能是个巧合，但即便如此，他确定这些问题与女性有关并明确地建议由男性加以干预，仍是值得注意的。他所要表达的信息很清晰：当女性面对恐怖的空袭变得软弱时，意志坚强的男性有权力惩罚她们，以儆效尤。¹⁵⁹在战时的社会中，冲锋队作为道德警察和“民族共同体卫士”，不仅以外国人及已经宣布的“社会外来者”为目标，也针对纳粹德国的普通“民族同胞”。

战斗到最后一人

从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危机时起，冲锋队就致力于为普通队员寻找工

作。1933年之前，纳粹也试图渗透到当时牢牢掌握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手中的工会组织，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民族社会主义工厂基层组织”（NSBO）。实际上，冲锋队和NSBO之间的关系不无紧张，特别是NSBO比前者更成功地为其成员提供工作时。¹⁶⁰如前所述，冲锋队当时开始组织所谓的“福利营”，这是容纳失业冲锋队队员的临时工作营地。营地的人们组成了供纳粹党及国家支配的廉价劳工储备，主要用于基础建设工作，例如修建新道路。与此同时，这些福利营也是控制居民，将普通激进分子中持续高涨的不满情绪和暴力活动向生产性劳动方向疏导的举措。¹⁶¹

20世纪30年代后期，经济形势得以恢复，大部分“福利营”关闭。不过，其中一些（如洛克施泰特营地——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霍亨洛克施泰特）改造为所谓的冲锋队“职业训练营”，后来又改称“冲锋队职业学校”。¹⁶²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冲锋队队员在这里进行一两年的常规工作培训。这些营地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人培养成“熟练工人”，拥有这种官方承认的专业能力，就可以得到比非熟练工人更高的薪资。职业训练营培养锁匠、机械工程师、造船工人、精密机械技师、铜匠、镀锌钢加工人员和电焊工。¹⁶³作为回报，当地的公司应要求向其捐助训练设备，帮助学校改进设施。¹⁶⁴

洛克施泰特营地的冲锋队职业学校最初很受欢迎，1938年迎来了一千多名受训者。¹⁶⁵当时，1/4的学徒工年纪在30岁以上。换言之，与“福利营”的传统一样，“职业学校”初期关注的是有资格的“老战士”，但接下来几年里，学校越来越成功地吸引了年轻德国男性，他们对“激战年代”只是道听途说。¹⁶⁶越来越多的候选人来自德国边境贫穷地区。1938年，洛克施泰特迎来了第一批苏台德失业冲锋队队员，1939年接收了数百名上西里西

亚冲锋队队员。¹⁶⁷战争期间，学校接收来自上西里西亚原属波兰的部分、梅梅尔以及立陶宛德占区的学徒，这些学生有的只有15岁。¹⁶⁸

类似的冲锋队职业学校都以这个成功的模板为基础。到1941年，有四所所以所在地区命名的冲锋队职业学校：前面提到的洛克施泰特营地“诺德马克”学校；奥尔登堡附近韦斯特施泰德的“北海”学校；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附近康蒂嫩尔的“奥斯拉”学校（后改名“坦嫩贝格”）；以及舒立茨（今波兰库亚维地区索莱茨，比得哥什附近的一个小镇）的“魏克塞尔学校”。¹⁶⁹战争期间，德国海军最高统帅部为这四所学校的修建和发展提供了财政支持。¹⁷⁰1941年7月起，这些学校由慕尼黑的冲锋队领导机关管理，并得到了冲锋队职业学校财团的紧密协作，后者由德国北部和东部的多家公司组成，领导人是原潜艇指挥官、德意志造船厂（基尔）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海因里希·米登多夫。¹⁷¹米登多夫代表的公司活跃于造船业中，它们得益于巡洋舰与潜艇需求的增加，但因征兵而缺乏合格的工人。¹⁷²而且，体能要求较高的造船工业无法吸引很多受教育程度高的工人，因此他们将目标定在年纪很轻的工人，以及“年纪较大、因为某种不幸而无法学到手艺的德国男子”。面对人手短缺问题，造船业与冲锋队合作，认定后者能够说服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不过，米登多夫在正式场合坚称，他代表的公司目标不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雇用一切可用的人”，而是培训最好的人——“政治和个人素质都合格的冲锋队队员”。¹⁷³

大部分情况下，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人从德国就业中心被直接送来。冲锋队成员身份不是入学的正式要求，但每个有上进心的人都必须表示在此后加入冲锋队的意愿。¹⁷⁴由于实际和意识形态原因，学校明确禁止农业

工作者入学。¹⁷⁵首先，农业部门需要这些人，尤其是战争期间；其次，纳粹不希望造成农村人口的进一步流失，尤其是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土地”上的实际工作对身体健康和道德都很重要。冲锋队实际上很难将“政治教育”作为学校课程的关键部分。¹⁷⁶而且，即便他们提供免费教育、住宿、工作服和少部分薪水，也难以填满这些学校的5500个位置。¹⁷⁷许多入学者没有待多久就被学校当局送回家乡，更加剧了这个问题。冲锋队为这些决定辩护，称没有一家公司有兴趣雇用罹患结核病、有心脏问题或者意志薄弱的工人——这凸显了战争年代这些职业学校学员的社会构成。据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称，就业中心应为这个问题负责，因为它们送来的是德国本已不多的男子中可疑的人选。¹⁷⁸

1942年夏季，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开始意识到，米登多夫只有在德国工业界急需工人时才与冲锋队合作。由于苏联战役前景乐观，可以得到新的苏联和波兰强制劳工，米登多夫对在非熟练工人职业训练中加入冲锋队意识形态教育的热情大打折扣。1942年7月，他力促慕尼黑的冲锋队领导层接受苏联“民工”进入洛克施泰特学校，最大限度地增加造船工人。¹⁷⁹而冲锋队强烈反对这些计划，辩称该组织的活动首先是为了惠及德国工人和民族共同体，而不是富裕的实业家。如果接受苏联人，他们的营房必须用3.5米高的栅栏与其他区域分开。¹⁸⁰负责该学校的冲锋队旅队长赫伯特·默克尔抱怨道，此时米登多夫露出了“极端无情的经理”的面目。谈到社会问题时，米登多夫“像新生儿一样无动于衷”。这不仅证明，资深的冲锋队积极分子又一次痛苦地面对工业需求重于意识形态的现实，¹⁸¹也揭露了1933年之前纳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残余。这方面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施蒂里亚总督兼大区领袖齐格弗里德·乌伊贝尔赖特尔的一份声明。他在1941年对

辖区冲锋队队员的讲话中宣称，一旦战争结束，冲锋队队员们应该“再次接过革命旗帜”，将“大德意志”变成“地球上最伟大的福利国家”。¹⁸²

由于需要职业和意识形态训练的德国冲锋队队员日益稀少，默克尔得出结论，冲锋队职业学校（从1942年11月起称冲锋队“工作营”）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一个参战国的战略需要。¹⁸³虽然诺德马克工作营运作到战争结束，但这些学校／营地存在的条件已经变成不远的将来——德国军事胜利之后的和平环境下。默克尔承认，德国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组建“尽可能好的国防军”。然而战争过后，军队士兵将被新的榜样所代替：“劳动战士”。在默克尔看来，冲锋队将得到征召，塑造这种新型德国熟练工人——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技能水平，从意识形态和身体上训练他们。一旦培训合格，这些德国工人最终可以成为“新夺取空间的守卫者”。¹⁸⁴

这种设想与冲锋队的“国防农民”（来自德国“新东部”，上一章已做过分析）思想惊人的一致。1940—1944年，旧帝国许多地区的冲锋队活动因为缺乏人手和“崇高使命感”而减少，但冲锋队领导层通过勾画战后的“宏伟蓝图”，弥补暂时的失落。在他们想象的新德国社会里，即便传统的“民间”职业活动（如耕种和工厂工作）也将以军人般的信念进行。字面意义上的和平（没有战争和暴力对抗）不再可能存在。正如纳粹“运动”初期的冲锋队队员需要暴力冲突证明其决心和社会价值，二战后的德国“民族共同体”被想象为一个始终受到外界敌人威胁的群体。因此，德国男性在整个成人生涯里有两个紧密联系的职业身份——公民身份和军人身份。简而言之，未来的所有德国男性在其整个成人生涯中都应该意识形态坚定的冲锋队队员，或者冲锋队军事人员，随时做好战争动员的准备。

面对失败

与上述雄心大志截然相反的是，1943年到1945年之间，冲锋队的情况显得毫无希望。密集的活动并不能弥补缺乏声望、资源和前途的问题。到1943年秋季，就连以乐观著称的冲锋队参谋长威廉·舍普曼也不得不承认，该组织的情况很危险。1943年10月6日于波森召开的纳粹全国领袖与大区领袖会议上，他发表了长篇讲话，说明不应该以直接成果（或者缺乏成果）评判他的组织，而应该考虑长期影响。这次讲话的基调是辩护。¹⁸⁵舍普曼反复强调，冲锋队是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工具。¹⁸⁶因此，他渴望改善与其他党组织的关系，尤其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与希姆莱直接对话时，舍普曼似乎无条件地接受了党卫队和武装党卫军的显要地位，至少在战争时期是如此。他明确表示，不会追求“武装冲锋队”的计划，尽管他声称希姆莱曾同意建立这样一个仅由冲锋队队员组成的武装组织。按照这一计划，冲锋队作战单位以“统帅堂”旗队为模板，但由国防军指挥、作为武装党卫军的补充，不过该单位从未建立。希姆莱不太可能打算组建这样的部队，做出这样的承诺仅仅是为了向新任冲锋队参谋长示好，确保后者的服从。冲锋队和党卫队于1944年达成协议，允许冲锋队队员自愿加入党卫队第18“霍斯特·韦塞尔”志愿装甲掷弹兵师，目的与此相同。¹⁸⁷

但是，从1943年起军事形势显著恶化，面对各种困难，冲锋队的相对重要性加强了。第三帝国终结之前，准军事行动主义再次成为冲锋队实践的常规特征。由于战线迅速靠近并渗透到德意志帝国领土，残余的褐衫军——1944年时人数大约为50万¹⁸⁸——被动员起来，“从内部”组织和协调国防工作。现在，“民族共同体”的敌人面对的将是冲锋队的“革命干劲”，

该组织的宣传显得欢欣鼓舞：“我们又生活在激战年代了。”¹⁸⁹因此，冲锋队——以及希特勒青年团等纳粹组织——于1944年再度诉诸街头游行，目的是公开展示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的大无畏精神”。持批评态度的一位观察家在日记中写道，这种游行“在这个特定时刻很受欢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可以“在前线传来可怕的消息时提供某种安全感”。¹⁹⁰

1944年和1945年初，纳粹领导层命令冲锋队对抗军事上的敌人，同时挽救国民迅速恶化的士气，不仅使用言辞和游行，还要使用力量。1944年9月26日，冲锋队参谋长舍普曼被任命为德国“人民冲锋队”射击训练总监。¹⁹¹希姆莱和舍普曼之间力量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仍在延续。身为预备役部队指挥官的希姆莱决定“人民冲锋队”的作战任务，而舍普曼的职责只是训练那些年纪太大或太小而无法参加国防军的人，并为其提供装备。¹⁹²除了出任人民冲锋队教官或者指挥官的冲锋队领导人之外，普通冲锋队队员还为许多人民冲锋队单位提供核心。¹⁹³例如，奥地利冲锋队上多瑙河第94旅队领导人指挥了作战部队的组建，其中的人员从奥地利民防组织“地方自卫队”中招募。纳粹激进分子奉命组织和管理这些“最后的征召人员”，他们应该为这些人提供“清晰的政治态度”“军事专业知识”，帮助他们掌握军需品的使用。¹⁹⁴

在这些情况下，冲锋队提供的训练无法达到高标准，不过纳粹政权的宣传自然做出相反的论断。¹⁹⁵舍普曼承诺，人民冲锋队将得到有效的训练，有能力阻止对帝国领土的任何“急迫威胁”。他指出，此时被征召的人当中，许多都曾在前几年接受过冲锋队防卫队的训练。而且，新的训练组织方式不像前几年那么正规，相对简短的课程目的是“唤醒”人们“对射击的兴趣”，以便“最大限度地提升火力”。¹⁹⁶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权力和武器



1935年8月18日星期日，在鲁尔区雷克林豪森街道上，冲锋队成员站在卡车上准备进行宣传旅行。横幅写着：“了解犹太人就了解了魔鬼！”和“资产阶级说：……‘经济就是一切’。”中间的海报描绘了一名冲锋队队员用卐字记号击打两个漫画手法描绘的犹太人的脑袋，他们身上生出看上去很有攻击性的蛇。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蛇旁边的锤子和镰刀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混合了反共产主义的暴力宣传口号是20世纪30年代冲锋队的典型作品。

从逐渐瓦解的冲锋队转移到人民冲锋队地方部队手中。¹⁹⁷尽管组织不力，冲锋队仍然持续提供了许多企图保护第三帝国及其社会制度的狂热“信徒”，直到纳粹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天。

1944年12月初，舍普曼向冲锋队领导层分发了最高指挥部对“全面战争”努力的指令，从中可以洞察后期冲锋队积极分子的心态和自我认知。舍普曼解释道，这项工作的终极目标是“狂热化”冲锋队队员，达到“无条件献身”于民族共同体、全面抵抗敌人的程度。因此，冲锋队队员受到鼓励，在工作场合和公众面前穿着制服。¹⁹⁸舍普曼做了一个大胆的历史对

比，将1944年底德国所处的形势与19世纪初全欧洲爆发的自由战争相提并论。正如前人在一百多年前所做的那样，他认为种族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德国解放的先决条件之一。¹⁹⁹舍普曼宣称，“寻求统治世界的国际犹太人集团”应为战争负责。他重复了纳粹早年在慕尼黑的论调，并加入了末世威胁：战败的德国未来将毫无希望，如果还有未来的话。家庭将被拆散，引入奴工制度，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犹太“亚人类”将摧毁德国文化和语言。²⁰⁰简而言之，帝国的遭遇将如同前几年它的东部邻国——舍普曼当然没有明确这一逻辑联系，但他和其他许多人肯定都知道。²⁰¹

这种危言耸听的宣传不仅是当前军事形势的结果。从1941年7月德国发动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时起，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太极端思想——结合在“犹太布尔什维克”一词中——再次成为冲锋队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²⁰²冲锋队杂志开始反复发表摘抄的士兵来信，将苏联是“工人的天堂”一说斥为最大的谎言。写信者宣称，他们亲眼看到的情况比预想的要糟糕得多。德国“民族共同体”只接受以对族群贡献为基础的社会差异，而根据这些陈述，苏联社会存在着极端的社会差异，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阴谋”造成的，他们的目标是无情地统治俄国人民。普通苏联平民让士兵们联想起动物——没有前途或者希望，受到犹太人的盘剥：“现在，犹太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国家和人民昂起了头。”²⁰³

随着战争进程的转变，这种说辞与其说是改造东欧的号召，不如说是动员帝国疆域内残存的德国人的一种手段。为了避免苏联红军取得战争胜利这一最坏情况，冲锋队队员接到命令，以极端的警惕性保护国家安全。隐藏的敌人可能无处不在，褐衫军尤其要睁大眼睛，注意所有“外族”。舍普曼认为，最终战役将带来极端的权力。他宣称，无须受限于法律或者道

德，“冲锋队队员始终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一切有损于心理战线的东西（流言—失败主义思想）。如果必要，他们会像激战年代中那样自助。正如那个时候，我们将用自己的拳头摧垮抵抗”。²⁰⁴

这些号召的效力难以估量。不过，即便到了1944年底，大部分德国居民厌倦了战争，只有部分人受到宣传的影响，但许多冲锋队队员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所作所为表明，至少他们将这些号召牢记在心。²⁰⁵正如之前在总督府辖区所做的那样，地方冲锋队领导人此时越来越多地在德国全境执行治安任务。有些时候，他们甚至带头实施自发的报复性犯罪，例如，盟军猛烈轰炸工业城市吕瑟尔斯海姆之后，一群愤怒的德国暴徒于1944年8月26日折磨并杀害了多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对战俘们一顿毒打之后，当地纳粹党官员、冲锋队领导人约瑟夫·哈特根拔出他的左轮手枪，射杀了至少四名飞行员。次日，哈特根身着褐衫军制服参加了这些美军士兵的葬礼，试图将暴行和自己的谋杀行为伪装成合理的自卫。²⁰⁶根据类似的逻辑，德国农村的冲锋队队员继续维持着纳粹政权确立的种族边界。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以所谓的“种族亵渎”为由公开羞辱一方为犹太人的异族通婚者，而在此时，他们同样对德国人与强制劳工之间的性关系施以严惩，尤其在后者为斯拉夫人后裔的情况下。当时的冲锋队宣传称波兰人和其他东欧民族成员“野蛮且阴险”，必须加以监督，尤其是在乡村地带，据说那里的“混血”危险性很高。²⁰⁷当地冲锋队搜索这类情侣，往往以殴打告终。最极端的情况下，此类事件上升为真正的私刑，时至今日，20世纪40年代成长于乡村的德国老人都铭记在心。例如，在威斯特伐利亚州小城黑尔福德郊区，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协同党卫队，将至少一名男性波兰劳工吊死在一片小果园的树上。他们还强迫该地区的其他强制劳工观看处决的情

景，并威胁道，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就会有相同的命运。²⁰⁸

随着地方权力机构的瓦解，纳粹政权最后几周里美化的“德意志战斗精神”消失得无影无踪。仍然身穿纳粹制服的人此时注意到，一般公众的敌意日益加深。²⁰⁹由于盟军空袭的危险增大，慕尼黑的冲锋队总部迁移到由冲锋队高原地区总队管理的训练学校，也就是在巴伐利亚首府以南约50公里的阿尔卑斯山脉施利尔湖畔。²¹⁰从1938年起，这一设施用于教育冲锋队地方领导层，1944年春季成为冲锋队临时总部。²¹¹但是，舍普曼及其家人直到1945年才迁移到这里。²¹²此时，他在那里已经无事可做。他抵达之前的几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因为缺乏有效运转的机构，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仍生活在德国的数十万冲锋队队员了。

相反，由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组成、自称地方领导的临时小组不断涌现。一些冲锋队队员仍然觉得有义务以暴力手段捍卫“民族共同体”。他们的激进行动直接指向盟军部队、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和德国“失败主义者”，但主要的受害者是后两个群体的成员。根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瓦格纳的最新研究，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杀害了数百名德国平民。²¹³同一时期，遭到杀害的犹太人及东欧强制劳工数量高达25万人。²¹⁴对于1945年3月和4月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遭到屠杀的匈牙利犹太劳工，历史学家做了特别深入的研究。施蒂里亚当地的“人民冲锋队”奉召监督这些“死亡行军”，从艾森埃尔茨调来的、由150名“可靠的”冲锋队队员组成的一个“政治连”得到命令，“杀死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这些冲锋队队员仅在1945年4月7日就射杀了150—200人。²¹⁵事实证明，战争最后几个月匆忙拼凑的一些纳粹“自由军团”对德国平民造成的威胁比对盟军士兵还大。绍尔兰自由军团的一个特别“杀人小组”由冲锋队弗里德里希·耶



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时刻，冲锋队领导人不仅发出鼓舞士气的口号，而且还参加了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实际训练。这张照片描绘了冲锋队最后一任参谋长威廉·舍普曼（最右）和国家劳役团的劳工总负责人威廉·德克尔（左二），他们正在视察国家劳役团为在“统帅堂”登记的年轻志愿者设立的训练部门。

格尔指挥，搜捕逃兵和持异议者并杀死至少5人：两名所谓的逃兵、一名男性平民、一名女性平民和一名矿长，最后一位受害者的罪名是：在锡根附近的维德瑙，他管理的矿坑顶上插着白旗。²¹⁶1945年4月，德国西南部称为“阿道夫·希特勒冲锋队自由军团”的一个小组被派到慕尼黑，镇压一次反纳粹运动。还有一支冲锋队特遣队在巴伐利亚行动，由冲锋队旅队长汉斯·措贝尔莱恩指挥，这位作家和狂热的纳粹主义者率领手下，于1945年4月28日和29日在工人阶级小镇彭茨贝格（慕尼黑以南50公里）杀害了10名平民，为了和平地向美军投降，当地行政长官已经被迫辞职。²¹⁷

不过，在大部分地方，“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标语一夜之间就换成了“尽可能保护自己！”。当地方媒体传播盟军部队抵达该地区的消息，纳粹地方当局通常隐藏起来，普通民族社会主义者清理标记、旗帜和纳粹党的徽章。施利尔湖区民众于1945年5月5日袭击了最后留存下来的冲锋队总部，根据该镇牧师的证词，他们“野蛮而疯狂”地销毁或者偷走了2000件冲锋队外套、多部收音机、衣服和家具，这些东西都是“最高质量的”。劫掠者甚至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起自杀的一名“纳粹分子”和一名妇女，但没有人试图安葬他们。²¹⁸这段时间，《我的奋斗》从德国的书架上消失了，和其他纳粹纪念物一起被藏了起来，直到儿孙们清理父辈和祖父辈的房间时（有些情况相隔了几十年）才发现。显眼的纳粹意识形态标志（如冲锋队的褐衫）通常不在这些迟来的“发现”之列。一位来自赫克斯特市的证人回忆，1945年4月，人们发现数十件冲锋队制服漂浮在附近的威悉河上。²¹⁹在很多情况下，丢弃的不仅仅是衣服，连原主人的纳粹身份似乎也被洗掉了。正如本书最后几章将要分析的，原冲锋队队员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从许多方面上看，也是最为模糊不清并长期延续的过程。

日常的狂热

1939—1945年，纳粹主义“民族共同体”计划的特性出现了变化。1941年之前，由于最初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纳粹政权在确保战争机器需求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关注“大后方”德国人的物资充足和士气。但是，随着德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霸权的日益削弱，该政权的专制特性明显增强。此时，民族共同体被想象为一个注定要英勇地参加规模为史无前例的“生

存之战”的群体。²²⁰与此种总体发展相符的是，在这些战役进行的地区，冲锋队“贪婪机构”的重要性增强了。1939—1942年，战役的重点主要是兼并地区和占领区，新冲锋队单位的组建为德国人和德意志族提供了门槛很低的机会，以证明其对政权的忠诚。从1942年起，这些地区越来越不稳定，冲锋队单位也成为了德国人维持公共秩序举措的一部分。

当战线不断逼近并最终越过旧帝国边境时，纳粹政权企图在德国心脏地区重复占领区的经验。可是，那一代德国人此时已经30岁左右了，曾经为纳粹崛起和巩固政权做出决定性贡献的人都已经是在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服役。纳粹政权被迫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组织民防、维持统治。尚未被征调的冲锋队领导人（许多是“老战士”）自然成了组织最后防线的人选，但是194—1945年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动员和训练队员的能力已严重受损。即便如此，地方冲锋队领导人拥有意识形态狂热和战斗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战争最后阶段该组织能力上的不足。避免纳粹政权从内部崩溃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个别冲锋队队员在农村和城镇里的纪律处分权，而不是整个组织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地方上的积极分子仍然有能力动员和威胁厌战的民众。背水一战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再次诉诸极端暴力。“地方清算团体”杀害有意将权力移交给盟军的文官，以及“死亡营”里的原集中营囚犯。²²¹事实证明，冲锋队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训练都有着致命的影响力。

第9章 冲锋队外交官与东南欧的大屠杀

控制是对我们统治下的人们的服务：在我们的领导可以想象的范围中，有什么权力大过对民族间根本生活问题以及德国千年历史考验的成就的这种态度？

——一位冲锋队分队长对德国东欧“使命”的总结，1941年7月¹

1941年7月20日晚上，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坐在柏林市中心著名的凯撒霍夫酒店房间里，思索着当天发生的事件。²他刚刚从家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贝克勒曾任该市的警察局长）抵达柏林，短暂停留后将前往索菲亚。三天之前，贝克勒被任命为新任德国驻保加利亚公使，任期三年。贝克勒乘坐的火车当天停在马格德堡中心车站时，他听到了前往东线的国防军士兵们的谈话，与这些人不同，39岁的他对战争充满乐观情绪。他在酒店信纸上写道：“真正令人烦恼的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多么重要，这是一个人们以令人吃惊的愉快方式确保民族未来的时代。”然而，他的心情很复杂。他觉得疲劳，需要改变：“没有一位战士能应付这么高的强度！”³

贝克勒是五位从1940年起成为德意志帝国驻西南欧大使的冲锋队将领

之一。按照较早的德国地缘政治规划，纳粹政权认为这一地区是“补充空间”，将为大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努力提供自然资源、食品和人力。从军事角度看，与该地区国家紧密结盟、避免在另一条战线上开战是明智之举。⁴除了贝克勒之外，还有其他几个人被选中，代表德国在这个经济与政治接近的“非正式帝国”中的利益：曼弗雷德·冯·基林格、汉斯·埃拉德·卢丁、齐格弗里德·卡舍和迪特里希·冯·雅戈。卢丁原是冲锋队西南地区总队的领导人，于1940年12月被派到斯洛伐克的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与此同时，冯·基林格被派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他此前曾负责外交部的招募部门，并作为卢丁的前任在布拉迪斯拉发服务了几个月。两人均于1941年1月报到。几个月之后，经过8周的“试用期”，原冲锋队殖民专家卡舍被任命为公使，入主克罗地亚阿格拉姆/萨格勒布新建的德国大使馆。最后，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总队领袖迪特里希·冯·雅戈于1941年接任德国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大使，大约同一时候，贝克勒赴保加利亚履新。⁵

本章旨在解释，这五名冲锋队将领为何在这个特定历史时刻就任德国驻东南欧公使，以及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展现了冲锋队特有的外交风格。我们将特别严格地审视他们在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历史学家对这五个国家的大屠杀研究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那些具有冲锋队背景的德国外交官所起的作用却几乎未被触及。下文的分析将阐明，每个冲锋队外交官都积极参与德国对其东南欧盟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我还将讨论，幸存下来的家人恢复公众对这些外交官记忆的尝试为何遭到失败，并解释冲锋队外交官为何能在1945年后外交部的“记忆政治”中保有特殊的地位。⁶

外交部里的冲锋队队员

从冲锋队进入外交生涯的五名将领都是功勋卓著的“老战士”。1934年夏季的“长刀之夜”在这些冲锋队将领心上留下了伤痕——冯·基林格、卡舍、贝克勒和卢丁都是侥幸逃过一死——但是向纳粹党和希特勒保证了他们的忠诚，希特勒希望他们在三条战线上维护自己的利益：排除外交部中经过职业训练的外交官们可能带来的阻力，“元首”对这些人怀有疑虑（总体上毫无必要）；压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对国防军来说，军事需要最终要比意识形态立场更重要；控制党卫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⁷然而，任命冲锋队外交官并非没有风险。尽管他们都坚持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缺乏相应的外交训练。他们在外交部中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群体，支持他们的只有少数冲锋队同僚和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如1943年失宠之前的“外交部全能之神”、副部长马丁·路德。⁸至少有一些职业外交官对来自冲锋队的同事持怀疑态度，这在贝克勒的一则日记中显露无遗。他抵达索菲亚之后几天，一名助手告诉他，柏林外交部的许多官员对冲锋队新任外交官大肆批评，认为他们是“野蛮的集中营官员”，手里掌握着“个人集中营”。⁹

与这种看法正相反，贝克勒曾在20世纪20年代学习经济学、哲学和法律，自认为是一名具有文化兴趣和品位的政治领袖。¹⁰他将在索菲亚的业余时间用于铜版雕刻以及短篇小说和诗歌创作。¹¹他唯一出版的作品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南美的冒险经历，所用笔名很有启发：Edelmann——意为

“高贵的人”。这个笔名肯定也会令贝克勒于1935年迎娶的女人感到高兴，她就是女演员西尔克·埃德尔曼。¹²与只想取得崇高社会地位的贝克勒不同，冯·雅戈出身普鲁士贵族家庭，并怀着敬意将家族价值观与纳粹意识形态融为一体。二战开始时，他在一封信中提醒5岁的儿子牢记这个家族“光荣、忠诚、骑士精神和英勇的传统”，同时要求儿子不能成为“道德上的懦夫”，至死坚信“民族社会主义思想”。¹³

东南欧的这一组冲锋队外交官以比其他人年长许多的曼弗雷德·冯·基林格为首，他是原海军中尉、“自由军团”领导人，以及极右翼准军事组织“维京联盟”领导成员，该组织曾于1921年参与了谋杀曾任德国财政部部长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的行动。冯·基林格于1928年加入冲锋队，1933年5月任萨克森州总理，1937—1939年任德国驻旧金山领事。1939年和1940年，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两次派他游历巴尔干半岛，收集德国机构及组织（如大使馆、帝国保安部——党卫队安全部门等）活动的有关信息。¹⁴因此，1940年7月被任命为德国驻斯洛伐克大使时，冯·基林格已经是东南欧的“专家”了。¹⁵

这五位在该地区活动的冲锋队外交官从参加20世纪20年代的准军事活动起就相互熟识，后来又多次在纳粹党集会、冲锋队会议及培训课程中相遇。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老男孩联谊网”，冲锋队“激战年代”的共同过去以及对二战后德国统治欧洲“光明未来”的想象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¹⁶他们的信件和个人文件表明，他们对“冲锋队同志”的信任胜过了在外交领域受过专业训练的同事。这些纽带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的家人一起度假，这种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1945年之后。¹⁷至少在任期的开始阶段，贝克勒和卡舍——他们的个人文件得以保存——急于了解同事们的看法和

抱负。¹⁸他们似乎都理解，自己的新职务虽然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进步，但只是暂时的。

然而，这些人对新任务的满意度大相径庭。1941年10月4日，贝克勒写道，卡舍最近告诉他，关于自己（卡舍）将被派往莫斯科的流言是真的。¹⁹根据贝克勒的说法，这一安排是党内摩擦的结果：最近就任东部占领区部长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迫切要求这么做，令冯·里宾特洛甫十分反感。²⁰虽然卡舍——我们已经知道，他对东欧殖民化和“德国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似乎很喜欢在克罗地亚的新职务，但他的大部分同事都不太适应充满代表性任务和社交聚会的生活。迪特里希·冯·雅戈对被召到外交部门“深感不快”，很显然，当“同志”们正在前线作战，自己却在出席会议和典礼，这令他抱怨不已。²¹有流言称，身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汉斯·卢丁在休假时加入东线的德国军队，但这一说法无法验证，似乎不太可能是真实的。²²

幕后的斗争

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来自“决不妥协的一代”、赞美坚强德意志战士理想并坚信身体暴力与言辞力量的人就被任命为外交官，对个中原因有多种推测。²³现存的文件表明，这些任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但对这一决策的关键人物和总体策略没有详述。将冲锋队高级将领提升到大使职位的原因之一当然是抵消日益强大的党卫队及帝国保安部的影响。党卫队总部负责人戈特洛布·贝格尔于1941年4月17日写给希姆莱的信中抱怨，外交部内部进行着一场名副其实的“反党卫队之战”，并确定副部长路德是主要对

手。贝格尔声称，路德单单任命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到东南欧任职，试图“证明他对党的忠诚”并“确保自己得到冲锋队的强力保护，从而拉拢国防军”。²⁴贝格尔还称，根据“可靠来源”的消息，冯·雅戈准备到布达佩斯赴任，卡舍前往阿格拉姆/萨格勒布，贝克勒前往索菲亚。事实证明这些预测都是正确的。唯一的例外是从1939年起任外交部文化司司长的弗里茨·冯·特瓦多夫斯基，他原定前往贝尔格莱德，但最后却于1943年成为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²⁵

9天以后（1941年4月26日），贝格尔给希姆莱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包含了关于冲锋队将领任命的更多情况。贝格尔报告，希特勒最近和冲锋队参谋长卢策商讨了一个多小时，此后卢策和冯·里宾特洛甫发表了90分钟的讲话。²⁶会谈期间，卢策据说向冯·里宾特洛甫提供了最好的人手，向他保证一旦任命下达，冲锋队领导层将放弃对外交部的一切直接干预。²⁷从卢策的角度，这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引领冲锋队重回战时政治前列的举措，这是走了“后门”。卢策的动机是重申冲锋队领导人在东欧殖民化和“德国化”上的重要作用，与希姆莱的党卫队抗衡。²⁸冲锋队插手“他的”事务惹恼了党卫队帝国领袖。1943年初，他在提到卡舍的名字时大发脾气，将其斥为自己意欲“粉碎”的“帝国敌人”。²⁹

这些文件还表明，任命冲锋队将领为外交官必须放在二战期间德国外交政策激进化，以及实施所谓“东部总体规划”的背景之下观察。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陆军元帅威廉·特尔于1941年7月16日在“元首”总部开会，这次会议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洞察这些任命的政治动机以及所包含的问题。³⁰希特勒解释道，对东欧的处理方法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切割这块巨大的蛋糕，以便首先控制它；其次，管理它；最后，开发它”。³¹对于

哪些领土应该并入德国、谁管理国防军暂时占领的地区，都制订了详细的计划。罗森贝格支持卢策任命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为“帝国专员”或行政长官的思路。除了上面提到的名字之外，与会者讨论了以下安排的可能性：威廉·舍普曼前往基辅；阿尔诺·曼泰、海因里希·本内克和卡尔·西格蒙德·里茨曼前往爱沙尼亚；奥托-海因里希·德雷克斯勒赴拉脱维亚。³²而且，罗森贝格告诉希特勒，他已经接到冯·里宾特洛甫的来信，要求外交部积极参与讨论中的领土上的工作。不过，罗森贝格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新占领区的内部组织与外交部无关”。根据会议记录，希特勒“绝对”同意这一观点，也没有对任用冲锋队领导人担任外交官发表任何反对意见。³³

1941年，布达佩斯的奥托博士撰写了一篇短文并寄到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发表，其中包含了有关冲锋队将领被任命为外交官的进一步信息。这篇文章题为“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和外交官”，首先将最近冲锋队将领任职外交部门的举措称作19世纪下半叶奥托·冯·俾斯麦开始采用的一项政策的最后一步。奥托博士认为，基于“各民族的真正民族社会主义者”相互尊重对方“民族社会主义者身份”这一假设，冲锋队将领出任外交官是典型变革的明确迹象。从现在开始，外交官不再按照国家利益行事，而是努力增进各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有许多德国盟友的东南欧，已经开始了一项进程，西方的模板将被“对生活的现实理解”所代替，根据这一思想，人民的合法权益将比领土和国家主权的法律声索更为重要：“内阁所采用的反动、狡猾外交手段将被消灭。人民和他们委派的政治战士将实行清晰、诚实和宽容的外交政策，作为俾斯麦遗产的忠实代理人，服务于各国人民与欧洲命运的关键需求。”³⁴东南欧各国政府将这一推论视为承诺还是威胁很难确定。柏林外交部对后者十分担忧，阻止了这篇文章的发表，他们认

为尽管它的思想本质上是正确的，但公开讨论其中提出的论点“暂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尤其是意大利盟友可能会遭遇一些不受欢迎的后果。³⁵

驻东南欧冲锋队外交官的角色就在这种环境下开始形成。不能将他们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公使，而是指定的德国行政长官或者未来的“帝国专员”，只是因为外交考虑暂时利用大使的正式身份。³⁶希特勒明确表示，虽然目前最好是营造一种仅仅临时行使托管权的印象，但德国“绝不会撤出”东欧占领区。³⁷在这个背景下，贝克勒、卢丁、冯·基林格和冯·雅戈的简历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密切注意：他们都曾在第三帝国警察部队中担任要职。贝克勒曾在1933年9月到1939年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警察局长，1939年秋季德国占领波兰罗兹之后任该市临时警察负责人；卢丁是1933年2月和3月卡尔斯鲁厄的代理警察局长；冯·基林格和冯·雅戈分别是萨克森州和符腾堡州的“帝国专员”。³⁸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们都曾通过威胁和监禁纳粹党的政治对手，为第三帝国的建立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他们还共谋监禁和杀害所谓的第三帝国“敌人”，并掩盖这些罪行。³⁹

换言之，这些冲锋队将领可能不是现有最好的外交官，但他们是经验丰富、意识形态忠诚的激进分子，惯于将暴力作为政治与个人手段。他们的高光时刻尚未到来，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一旦战争结束，这些人预计将统治东南欧的大片土地，帮助确立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和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的霸权。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现存政府密切协作，推进希特勒的计划，确保国防军的需求不会优先于纳粹政权的长期政治目标。

虽然这些冲锋队外交官在日常政治活动中影响力有限，但一些例外值得注意。关于他们的影响力，最突出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例子是为屠杀欧洲

犹太人助力。尽管党卫队、帝国保安部、警察和国防军部队组织了对犹太人的放逐和屠杀（往往与地方力量合作），但冲锋队外交官通过胁迫当地政府与柏林合作，积极支持大屠杀。按照希特勒的说法，这些公使是“经验丰富的专家”，他希望他们支持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其辖区有效处理“犹太人问题”的努力。⁴⁰不过，这些人的“成就”因所在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差别巨大。下一小节旨在阐述这些冲锋队外交官在东南欧犹太人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关于该地区欧洲犹太人屠杀问题有许多优秀、详细的文献，但常常忽略这一主题。⁴¹

组织斯洛伐克大屠杀

斯洛伐克的任务相对简单，冯·基林格在1940年下半年出任驻该国公使，1941年1月起由卢丁接任。虽然最近的研究认为，1939年3月14日宣布脱离捷克独立之后，斯洛伐克追求一种比之前所称更加独立于第三帝国的政策，⁴²必须强调的是，新成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与德国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从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依赖于后者。然而，另一点也非常重要：冯·基林格的任命下达之前，斯洛伐克就已经实施了从政治、经济和法律上边缘化其犹太人口的法律。⁴³因此，两位公使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这些“本国制造的反犹太政策”，为纳粹政权的终极目标牟利。⁴⁴对于1941年和1942年参与两国高层会谈的人来说，这一目标显然是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方案”——杀害所有欧洲犹太人。⁴⁵

要理解卢丁在布拉迪斯拉发扮演的角色，就需要了解斯洛伐克关于“犹太人问题”政策的一些背景信息，尤其是因为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与斯

斯洛伐克政府紧密合作。直到相对晚的时候（1942年夏季起），斯洛伐克政府才远离纳粹屠杀该国全体犹太人的企图，但到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遭到放逐和杀害，他们的财产被国家没收或被洗劫。原斯洛伐克国家元首、天主教教士转变而来的政治家约瑟夫·季索在战后为自己辩护道，斯洛伐克政府1938年秋季“试图解决犹太人问题”，以避免德国的占领。⁴⁶与该国外交部长沃伊捷赫·图卡、内政部长兼赫林卡卫队领袖亚历山大·马赫监禁和流放数千名（男性）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极端法西斯行径截然不同，季索声称支持更为“保守”的解决方案，减小犹太人对斯洛伐克经济的影响（缩小到整体经济的4%，与其人口比例相符），而不是将其完全逐出公共生活。⁴⁷1939年2月，斯洛伐克政府颁布以非斯洛伐克籍犹太人为目标的反犹太法规之后，季索向一名犹太电信机构记者保证，斯洛伐克政府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⁴⁸

然而，随着战争开始，移民不再是个可行的选择，法律上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排斥和驱逐以及对其财产的掠夺愈演愈烈，季索政府在许多情况下纵容甚至鼓励这种做法，与德奥合并之后发生的情况类似：犹太人的私有财产、银行账户和企业受到严格监管或者被课以重税。1940年8月中央经济办公室（CEO）成立之后，犹太企业日益“斯洛伐克化”，到1941年底，84%的犹太企业遭到清算。犹太人被迫从1941年9月22日起佩戴“大卫星”，迅速陷入贫困。⁴⁹这一政治边缘化和社会排斥进程导致对犹太人的各种攻击，从勒索、洗劫到殴打甚至直接杀害。1940年的一次此类事件中，多名犹太老人被迫离开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养老院，被运送到原帕特罗布卡弹药工厂的营房中活埋，施暴者后来还纵火焚毁了那里。⁵⁰

1941年，卢丁与斯洛伐克政府高级代表（尤其是季索与图卡）之间的

外交会谈变得密集。12月4日，卢丁最终向柏林报告，斯洛伐克政府“原则上同意将斯洛伐克籍犹太人从帝国内部驱逐到东部隔都”。⁵¹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万塞会议”^①在柏林召开，此后不久，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袭击和驱逐行动开始了。1942年2月底，斯洛伐克政府同意——但协议的细节仍不完全明确——开始将其犹太人口驱逐到波兰德占区，据称他们将在那里成为强制劳工。这些驱逐行动部分由赫林卡卫队与喀尔巴阡德意志族人志愿自卫队（FS，后称党卫队志愿兵团）协作监督。⁵²斯洛伐克政府同意为每个犹太人向德意志帝国支付5000克朗（500马克）的“职业再培训”费用，作为回报，德国让斯洛伐克自由掠夺犹太人的财产。⁵³德国与斯洛伐克的联手正如卢丁1942年4月所言：“德国并没有施加任何压力，斯洛伐克政府就同意从该国驱逐所有犹太人。尽管斯洛伐克主教加以干预，总统仍然私下同意了驱逐行动。”⁵⁴

1942年4月—10月，至少有5800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被驱逐，其中大部分在波兰德占区因为虐待、饥饿、劳累过度或者直接处决而身亡，多数葬身于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死亡营。⁵⁵与战后的证词正相反，卢丁既没有批评这些驱逐行动，对其最终目的也并非一无所知。1942年6月26日，他向柏林报告，虽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行动”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他建议“百分之百地解决犹太人问题”。⁵⁶面对梵蒂冈的抗议以及斯洛伐克民众日益升高的不安情绪，季索于1942年底最终停止流放行动。

^① 又称万湖会议，纳粹德国官员在柏林万湖区一座别墅开会，讨论落实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计划。

此时，流放者将被“煮成肥皂”的流言已经传遍斯洛伐克全境。⁵⁷第二波驱逐行动直到1944年9月德国占领斯洛伐克之后才开始，这一次组织和实施者是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阿洛伊斯·布伦纳，他在人称“犹太顾问”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调到匈牙利德占区后接手。⁵⁸卢丁参与了1944年的驱逐行动，这从他在外交部的人事档案中可以明显看出。外交部发出的一封电报提到，卢丁与党卫队旅队长埃德蒙·维森迈尔（从3月起任驻匈牙利全权代表）安排于7月底或8月初在布达佩斯会晤，正式“讨论犹太人问题的处理”。⁵⁹按照目前的估计，从斯洛伐克驱逐的犹太人总数至少为7万人，被杀害者估计为65000人（如果包括斯洛伐克占据的匈牙利领土，则为11万人）。⁶⁰

德国官员和斯洛伐克政府之间的重要“连接环节”之一是绰号“斯洛伐克亨莱因”的工程师、记者和政治家弗朗茨·卡尔马森，他是喀尔巴阡德意志人党⁶¹的创立者及领袖，从1935年起还兼任斯洛伐克地区政府的德国事务部长。⁶²20世纪40年代初，卡尔马森自称“斯洛伐克德意志族人领袖”。他还是志愿自卫队（FS）的指挥官，该组织是苏台德德意志族人自由军团斯洛伐克分支的继承者，后者为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参见第6章）做出了很大贡献。FS效仿德国冲锋队及党卫队，只因为斯洛伐克的独立国家地位才没有正式加入冲锋队，这一点与“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及梅梅尔地区的同类组织相同。不过，在宣传书籍《苏台德冲锋队在波兰》中，这两个词语几乎是互换使用的，他们的行动纲领也相同。⁶³卡尔马森于1939年5月17日晋升名誉冲锋队区队长，1941年1月30日晋升冲锋队旅队长，1944年11月9日又升任地区总队长。⁶⁴简言之，在一个冲锋队由于政治原因只能以FS形式存在的轴心国中，他成了一名名誉冲锋队将官。

在德国方面，维斯利策尼、布伦纳和卡尔马森是敦促季索对犹太人采取更极端措施的核心人物。⁶⁵不过，正如卡尔马森1942年7月29日写给希姆莱的信所阐明的，他们鼓励的恐怖行动也针对某些德意志族人。在这封信中，卡尔马森感谢希姆莱“再一次慷慨地提供帮助，允许我们迁移反社会分子”。这种“帮助”指的是驱逐将近700名德意志族人——卡尔马森称其为“酒鬼”和“蠢货”——到邻近的奥地利（此时被称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奥斯特马克地区）。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这些流放者大部分被施以“安乐死”。据卡尔马森说，喀尔巴阡德意志人将这一举措赞为宝贵的“社会救济，德国大使馆也强烈支持”。⁶⁶身为公使的卢丁与卡尔马森关系亲密，根据后者战后的证词，“两人讨论了所有相关政治问题”。他们似乎确定了某种职责划分：卡尔马森与党卫队保持一致，对斯洛伐克政府内部的领导人物施加压力，而卢丁的任务是从外交层面上敦促季索服从希特勒的要求。⁶⁷卢丁1942年5月1日给斯洛伐克内政部的一份照会明确地向斯洛伐克政府保证，德意志帝国原则上将不会遣返目前为止驱逐到德占区的斯洛伐克犹太人。⁶⁸此时，双方都已经确知上述声明的实际意义。卡尔马森的司机曾于1942年7月随同老板访问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战后坦言：“大家都知道，奥斯维辛的人们都会被杀。”⁶⁹

同一模式的各种花样

冲锋队外交官与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协商在许多方面上都类似于斯洛伐克，但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别。对这些谈判产生最长久影响的是德国驻克罗地亚独立国（NDH）公使齐格弗里德·卡舍。

在同样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怀有同情的希特勒支持下，这位德国驻萨格勒布大使在1941—1945年的克罗地亚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影响乌斯塔沙政权使其与德国战争目标达成一致，而且加速了克罗地亚犹太人的监禁、流放和处决。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布称卡舍是一个“在困难局势中有效捍卫德国利益的人”。⁷⁰卡舍与乌斯塔沙政权领导人物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关系，并始终坚定支持克罗地亚自治，事实证明，1942—1944年间这一立场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最终帮助他赢得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萨格勒布德国外交官中的堂吉诃德”。⁷¹

乌斯塔沙政权确立之后，立即推出反犹太法律，开始了一项拘禁犹太人的计划。由于这些拘留营的条件十分恶劣，超过半数的克罗地亚犹太人在NDH成立后的12个月里死去，避免了德国大使或者党卫队“犹太专家”的干预。⁷²对克罗地亚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是一项更大规模的再安置与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主要针对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但也延伸到人数少得多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⁷³在1941年6月4日与德国驻萨格勒布大使馆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德国与克罗地亚当局讨论了这一政策框架，此时卡舍刚到这里不到三个月。⁷⁴将犹太人驱逐到克罗地亚集中营的行动多数在当年秋季进行，克罗地亚当局此时已经正式提出请求，后续将该国犹太人流放到德意志帝国。⁷⁵但是，帝国中央安全局（RSHA）反对这一解决方案，原因是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实际细节尚未完全确定，或者说，由于克罗地亚集中营死亡率如此之高，他们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实施代价高昂的驱逐行动。⁷⁶

1942年，意大利公开为逃往莫斯塔和杜布罗夫尼克的4000—5000名犹太人提供保护，局面出现了变化。⁷⁷作为反应，卡舍与党卫队和柏林外交部



1941年4月，齐格弗里德·卡舍（右，身着制服）以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德国驻克罗地亚公使，在今天的萨格勒布（德称阿格拉姆）机场与克罗地亚将军伊万·佩尔切维奇（左，身着便服）打招呼。

密切合作，不顾可能与意大利发生的冲突，推进克罗地亚全境犹太人的驱逐行动。1942年8月—1943年5月，德国人和克罗地亚人联合将数千名克罗地亚犹太人流放到奥斯维辛。⁷⁸1942年10月，克罗地亚同意为每位被驱逐的犹太人向德国支付30马克，这比斯洛伐克的价格便宜得多。当地政府至少将部分资金转给了犹太社区，但同时从对其财物的洗劫中获益。⁷⁹随着意大利在1943年9月宣布投降，之前受到保护的克罗地亚犹太人也被包含在驱逐行动中。1944年4月，卡舍通知外交部，克罗地亚已经完全“清除”了犹太人，只有少数例外。⁸⁰据目前的估计，有3万名克罗地亚犹太人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其中半数在亚塞诺瓦茨、其他营地或者当场被杀，另一半死于奥斯维辛。⁸¹

与卢丁及卡舍对所在国家的影响不同，贝克勒和冯·基林格对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政治的影响较为有限。冯·基林格于1941年1月24日抵达布加勒斯特，希特勒向他下达了清晰的指令，避免第三帝国与扬·安东内斯库元帅的政权之间关系进一步紧张。⁸²几天之前，安东内斯库强力镇压了试图颠覆政府的反犹太军团运动（称为“铁卫团”）。因为“铁卫团”成员得到了党卫队和帝国保安部的支持，新大使从一开始就遭到怀疑和提防。⁸³冯·基林格在后续几年里都未能充分了解罗马尼亚的复杂政治框架，他的罗马尼亚对手和德国外交部都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从个人角度，冯·基林格也从不喜欢新的周边环境，他公开称罗马尼亚是个“破烂国家”，1941年10月，他抱怨道，罗马尼亚首都在自己眼中是“绝对的屠宰场”，最好放火将其烧毁。⁸⁴他宁愿逃到首都以北150公里的喀尔巴阡山，花上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穿行山林，带上步枪和一瓶白兰地捕猎棕熊。⁸⁵不过，至少就大屠杀而言，更为合格的外交官能否满足德国人的更多需求也是值得怀疑的。

与相邻的德国东欧盟友一样，在罗马尼亚处理“犹太人问题”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涉及外交、内政、经济、道德政策以及最重要的因素——战争进程。

冯·基林格在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年还比较顺利——至少从他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他不熟悉外交惯例，也不愿意全盘接受，表面上也接受安东内斯库的意见，直到1944年8月，米哈伊国王解除元帅的职务，罗马尼亚新政府倒戈支持盟国。⁸⁶冯·基林格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犹太人问题”。1940年6月——正式被任命为公使的前几个月——冯·基林格第一次访问罗马尼亚，会见了当时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头子米哈伊尔·莫卢佐夫。两人讨论了“犹太人问题”，冯·基林格建议莫卢佐夫邀请合格的德国专家到罗马尼亚，与该国领袖商讨具体事宜。⁸⁷半年以后，1941年4月，希姆莱所辖帝国中央安全局的法律专家、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古斯塔夫·里希特抵达布加勒斯特。此后几年，里希特正式以“布加勒斯特公使馆犹太事务顾问”的身份活动。与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一样，里希特与一位“犹太事务政府全权代表”谈判，罗马尼亚方面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拉杜·莱卡。⁸⁸从冯·基林格递交柏林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定期告知这些谈判的进展。1941年11月13日，他写信给德国外交部称，罗马尼亚已经同意驱逐生活在德国或者德占区、拥有罗马尼亚公民身份的犹太人。⁸⁹

最初，罗马尼亚政府也愿意牺牲“非罗马尼亚籍”犹太人，这些人生活在刚成为该国一部分的地区。1940年6月，罗马尼亚吞并了北布科维纳地区，一年以后的1941年7月，又在德国军队支持下从苏联手手中重夺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当局将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犹太人视为向苏联出卖罗马尼亚利益的叛国者。⁹⁰以创建种族一致的“大罗马尼亚”为目标，罗马尼亚和

德国正规部队及当地民兵杀害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或者将其驱逐到乌克兰南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小块地带（称为特兰斯尼斯特利亚）。1941年夏季到1944年3月间，有13万—15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到该地区，他们大部分死于集体枪杀、疾病（如斑疹伤寒）或者饥饿。⁹¹到1943年12月，这些犹太人中只有5万人仍然存活。二战期间，在罗马尼亚和特兰斯尼斯特利亚遭到杀害的犹太人总数估计为25万—41万人。⁹²

1942年，德国当局敦促罗马尼亚政府同意扩大驱逐该国犹太人的计划，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1942年8月28日，冯·基林格通知德国外交部，尚未达成任何确切协议，⁹³此后几个月情况也没有改变。安东内斯库明显在拖延时间，他继续会谈，并向德国人保证赞同其立场，但没有为全面实施大屠杀采取多少具体的步骤。⁹⁴当1942—1943年安东内斯库政权企图将特兰斯尼斯特利亚剩余的8万犹太人“出卖”给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德国外交部要求冯·基林格干预，因为这些计划“代表着某种局部解决方案，这在德国政府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根本路线框架内是不可接受的”⁹⁵——简言之，这不符合“最终解决方案”⁹⁶。然而，安东内斯库在1942年秋季已经决定“不按照罗森贝格博士的信条为德国人实施反犹太改革……我们必须实施创造性而非煽动性的反犹太改革”。⁹⁷由于罗马尼亚对德国战争努力的战略重要性，对安东内斯库政权施加更大压力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冯·基林格要求进一步驱逐行动的努力最终于1943年中停止。⁹⁸

与罗马尼亚的冯·基林格一样，驻保加利亚公使贝克勒尽管在外交使命开始时将自己描绘成一名强人，但试图全面消灭犹太人时仍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他在日记里坦承，得到任命时的任务是“终结保加利亚的独立国家地位”。⁹⁹在1941年7月26日的一次私下会晤中，这位“强硬的德国

新大使”敦促保加利亚国王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保加利亚的塞尔维亚游击队。贝克勒声称，应该“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些“流寇”。¹⁰⁰几周以后，德国公使要求对游击队攻击保加利亚的一支德国守备部队实施严厉报复——具体地说，就是枪杀100名保加利亚犹太人。这种过分的要求在保加利亚当局中引发普遍愤慨，遭到了拒绝。¹⁰¹

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全面实施，贝克勒的任务更加复杂，这是因为二战开始之前，反犹太主义并不是保加利亚政治的重要元素。不过，在1940—1942年，以首相博格丹·菲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向德国做出让步，换取领土以及与轴心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密切盟友关系。¹⁰²1941年，保加利亚推出了反犹太法律，包括强征男性犹太劳工，同时开始没收犹太人的财产。¹⁰³和半年前的斯洛伐克政府一样，保加利亚政府于1942年7月最终同意驱逐德国和德占区的该国犹太人。¹⁰⁴1942年秋季，德国外交部加强了驱逐保加利亚国土上5万名犹太人的努力，这些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1%。1942年10月9日在柏林与副部长路德进行的为时三个小时的会谈中，贝克勒得到了相关的指令。回到索菲亚之后，贝克勒与菲洛夫讨论了这个问题，后者原则上同意德国人的倡议，但辩称保加利亚的建筑工程需要1万名犹太强制劳工。他还通知贝克勒，他的政府认为德国人对驱逐行动的要价——每名犹太人250马克——“太高了”。¹⁰⁵

尽管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但在1942年底，德国人认为大规模驱逐行动的基础已经具备。¹⁰⁶因此，1943年1月，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特奥多尔·丹内克尔抵达索菲亚，他带来了自己的上级、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的指令——驱逐尽可能多的保加利亚犹太人。¹⁰⁷丹内克尔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保加利亚允许在1942年3月2—29日

从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两个地区从1941年起成为保加利亚的一部分）驱逐11343名犹太人，¹⁰⁸但阻止了对保加利亚心脏地带犹太人的驱逐。¹⁰⁹这一妥协的原因有三。首先，与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一样，从1942年起，犹太人大屠杀的细节在保加利亚广为人知，震惊了该国政府并引发保加利亚民众的抗议。其次，保加利亚政府正确地将1943年2月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视为战争的转折点。因此，他们认为考虑其他选择、不在战争罪行记录上采取妥协立场是明智的。第三个原因纯粹是经济上的：驱逐行动将使保加利亚失去进一步盘剥和掠夺“他们的”犹太人的机会。

1943年4月到夏季之前，贝克勒和丹内克尔反复讨论进一步驱逐的最佳时机。¹¹⁰但是在7月份，贝克勒意识到“目前坚持驱逐（保加利亚心脏地带的犹太人）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如此，他希望在德国“明显”取得军事成功时能够恢复驱逐行动，1944年初他仍认为这是现实的想法。¹¹¹同年9月被苏军俘虏并接受审问时，贝克勒以实现了对马其顿和色雷斯犹太人的驱逐为傲。¹¹²他在利茨曼施塔特（原罗兹）时撰写的一份简短报告最能表现其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报告中他以最为明显的偏向，对比了德国占领波兰之后的重建工作和该市犹太人居住区的传统生活，对他来说，后者是“最令人厌恶的东欧犹太人圈子中最肮脏的地方”。报告中充斥着各种反犹太主义的陈词滥调。他厌恶“身披肮脏长袍”、留着长胡须的正统犹太教徒，以及“无礼的”犹太女人，他沉迷于“犹太污垢”的想法中。¹¹³

贝克勒的日记现保存于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中，其中也透露了他的自我意象和对外交使命的诠释。虽然他仍然觉得自己与冲锋队黑森地区总队的部下紧密相连（1942年时非常不愿意交出指挥权），但作为指挥官，他自视为“代表全部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人。¹¹⁴贝克勒在保加利亚不太受欢

迎，即便在德意志族人中也是如此。他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孤独感，有些时候揭示了中年危机的迹象。¹¹⁵想起德国冲锋队时，他变得多愁善感、思乡心切，但他安慰自己：比起德国士兵和后方饱受盟军对德国城市轰炸之苦的平民，他的日子好过多了。¹¹⁶不过，索菲亚城里盛传，当保加利亚首都第一次遭到盟军轰炸时，贝克勒的妻子这样说道：“感谢上帝，我们终于也有一些工作要做了。”¹¹⁷

我们最后要提到的，是德国驻匈牙利公使迪特里希·冯·雅戈扮演的角色，但这并不说明他最不重要。冯·雅戈仅比冯·基林格小四岁，在1941年6月底加入德国外交部之前，两人有着类似的职业经历。他以海军中尉（后升任上尉）的职衔参加了一战，1919年加入海上埃尔哈特旅，参加了1920年的卡普政变。大约同一时期，他加入纳粹党，1921—1923年担任初创的符腾堡冲锋队督察。20年代末纳粹党复兴时，冯·雅戈重新加入，在冲锋队里开始了一段春风得意的职业生涯，1934—1939年领导冲锋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总队。随着二战开始，他回到军队，在国防军中作战两年后被任命为外交官。¹¹⁸

可是，与冯·基林格一样，冯·雅戈也难以达到新职务的要求。在接受任命之前，匈牙利和该国政治对他来说是“未知领域”，对平民生活根深蒂固的蔑视也无助于他的工作热情。¹¹⁹作为公使，冯·雅戈的主要任务是为武装党卫军招募匈牙利德意志族人，监视巴尔干军事局势，尤其是可能的盟国入侵，以及处理“犹太问题”。¹²⁰然而，匈牙利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早在1938年就推行反犹太立法，坚称上述最后一项任务纯属匈牙利内政。与前面讨论过的其他国家不同，在“犹太人问题”上，冯·雅戈和德国外交部最初对匈牙利施加的压力相对较小。但这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决定，

目的是让匈牙利方面有更多的时间“准备”暂时搁置的“最终解决方案”。

¹²¹1942年8月，匈牙利驻柏林大使就注意到，德国人已经向他言明，“犹太人问题”必须立即解决。1943年秋季，随着党卫队旅队长埃德蒙·维森迈尔首次正式访问匈牙利，德国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强，维森迈尔后来成为了驻该国的全权代表。¹²²与此同时，匈牙利犹太人被迫成为强制劳工，但尚未遭到驱逐。¹²³因此，1944年3月，匈牙利仍有762000名犹太人，仅在布达佩斯就有15万人。¹²⁴

从遗留的档案中，很难评估冯·雅戈在匈牙利实施德国“犹太政策”中的作用。卢丁和卡舍的最明显特征是“有个人议事日程的外交官-政治家”，与他们相比，冯·雅戈躲在幕后，更多的是观察家而不是外交家。1942年10月17日，他通过匈牙利外交部长吉齐·耶诺向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传达了德国对“犹太人问题根本解决方案”的要求。¹²⁵因此，他肯定知道纳粹当局的终极目标，但他的政治报告中没有任何个人意见，无法确定是否有为此“事业”献身的强烈意愿。无论如何，冯·雅戈于10月底和11月中旬向外交部报告，他不认为匈牙利人会接受德国的要求。¹²⁶第二年，外交部和帝国中央安全局慢慢对冯·雅戈失去信心，确知他没有能力将德国的意志强加于匈牙利，他们认为，德军与斯大林格勒遭受失败后，红军步步进逼，匈牙利成为了越来越大的问题。

1944年3月19日，相对平静的局势彻底改变了，德军占领了匈牙利。由于不再需要一位正式大使，冯·雅戈被解除了职务，维森迈尔接管他的工作，成为大德意志帝国驻匈牙利全权代表。¹²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新成立的萨拉希政权在箭十字民兵支持和艾希曼及维森迈尔授意下，高效地强制集中并驱逐了大部分余下的匈牙利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¹²⁸仅在5

月16日到7月8日这段时间里，就有437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大部分刚抵达就遭到杀害。原有的762000名匈牙利犹太人中，只有255500人活到匈牙利法西斯政权倒台。¹²⁹

1944年5月8日，冯·雅戈被正式召回柏林，6月1日，他前往外交部报到但没有得到新职务。9月，他返回了适合自己的领域——军界，指挥上西里西亚“人民冲锋队”的一个营。他的家人搬到瓦尔特大区格罗斯蒙兴（今波兰克维尔茨附近的姆尼奇）的一所豪宅。¹³⁰1945年1月，冯·雅戈和他的部下用“铁拳”反坦克武器击毁了4辆苏联坦克，这一战绩为他赢得了荣耀，1945年1月21日国防军报告中提及了此事。¹³¹然而，在这次行动中，冯·雅戈的头部被爆炸坦克飞溅的碎片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在德累斯顿及莱比锡的医院中养伤数周之后，他于1945年3月最后一次与家人团聚。此后不久，德国外交部派他作为信使前往意大利加尔达湖畔的法萨诺村，那里是二战最后阶段意大利德国占领军的行政中心。¹³²他这次旅行肩负的使命不得而知。途中，冯·雅戈在梅拉诺投宿于德国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全权代表鲁道夫·拉恩家中，1945年4月26日，他在抵达那里不久后自杀。¹³³

冲锋队外交官产生的影响

总体上，几位冲锋队外交官1941年到1944年之间在东南欧的活动轨迹惊人地相似。这些人的使命开始时，恰逢出使国“犹太人问题处理”激进化，其高潮是1941年夏季做出的向“最终解决方案”迈进的决策。¹³⁴冲锋队外交官不是这一政策的幕后推手，但他们往往秘密、独立地实施它。除了犹太人大屠杀之外，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尤其是1943年以后。诚

然，他们是外交领域的新手，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也不熟知所在地区的特殊性。对他们是否适合复杂的使命存在普遍的怀疑，甚至在德国领导层中也是如此。战后，鲁道夫·拉恩评论道，他一直认为，“让政治上十分天真的冲锋队领导人穿上外交官的制服，相信外交政策可以用纳粹党那一套实施”不是个好主意。¹³⁵第一次听到卡舍奉命出使萨格勒布时，奥地利将军埃德蒙·格莱泽·冯·霍斯特瑙辛辣地评论道：“他至少应该能在地图上找到克罗地亚。”¹³⁶但即便是身为这位德国公使死敌的冯·霍斯特瑙后来也承认，卡舍“远强于”他最初的想象。¹³⁷

经过对五名驻东南欧冲锋队外交官作用的比较分析，确实说明需要做出客观的评价。¹³⁸尽管他们都各有缺点，但最终的失败既源于其个人性格特征，也同样源于他们不同寻常的地位。他们既不是具有广泛权力的帝国专员，也不是习惯于与自治政府打交道的普通外交官。鉴于1941—1944年东南欧政治局势的多变性，人们可能会对冲锋队外交官们（至少贝克勒和卡舍）对所在地区特殊性进行的大量研究感到吃惊。身为资深的冲锋队队员，这五名冲锋队外交官都支持所在国家的法西斯右翼准军事组织。¹³⁹1939年秋季，冲锋队参谋长卢策首度以纳粹党官员身份访问了季索治下的斯洛伐克，与卡尔马森一同前往安德烈·赫林卡（斯洛伐克法西斯民兵组织“赫林卡卫队”的名称即来源于此人）的陵墓敬献花圈。¹⁴⁰“赫林卡卫队”和冲锋队都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信念，后来，卢丁在与斯洛伐克同行谈判时，都会强调新斯洛伐克与褐衫军的第三帝国之间存在的“自然纽带”。但是，正因为这种支持，他没有注意到斯洛伐克人民党内部日益增长的怀疑及反德情绪，1943年，这一错误遭到了德国帝国保安部的严厉批评。对于帝国保安部来说，此时的季索及其追随者正在玩弄两面手法。¹⁴¹冯·雅戈

在匈牙利也倡导与法西斯箭十字运动密切合作，但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约束。因此，即便在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人当中，他也得不到承认。¹⁴²在巴尔干地区，卡舍于1943年底更多地表达了对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量的信心，而不是暴力镇压。他认为，极端措施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是合理的，但只有通过尊重民族习惯及人民福利的合作政策，才能实现与乌斯塔沙及其他该地区民主主义者的持久结盟。¹⁴³最后，保加利亚首相博格丹·菲洛夫批评贝特勒对该国“右翼极端分子过于友好”，是一个“极具局限性的人”。¹⁴⁴

冲锋队外交官留任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容易得出结论，德国的东南欧政策适得其反；至少，即便是最初支持德国进攻的民族主义圈子和组织都因此而与之疏远。外交官们倡导一种替代政策：至少给予这些组织部分自主权，希望这样的权力划分最终能加强德国与该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随着战争的进展，这种立场越来越显得天真，因为从1943年起，德国外交政策日益受到对东南欧盟友经济及人力盘剥的驱使，并最终担忧自己的生存。¹⁴⁵由于卷入旨在将冯·里宾特洛甫赶下台的失败政变，马丁·路德于1943年2月10日被捕¹⁴⁶，冲锋队失去了柏林的进一步支持。到1944年，他们已经陷入了一场必败之战，完全无视该地区政治局面的根本变化。1944年10月27日，一名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奥地利公务员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抱怨卢丁在外交上的错误，信中以极端讽刺的口吻直击要害：“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事件之后——你们还有更多这样的‘专家’吗？”¹⁴⁷

为名誉而战

到1944年秋季，德国外交实际上已经终止，冲锋队公使们“德国领导

东南欧”的梦想也化为了泡影。1944年8月23日，冯·基林格和手下的使馆人员实际上成了罗马尼亚人的俘虏，被囚禁在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大使馆内。一周以后，1944年8月31日，苏联红军抵达罗马尼亚首都。9月2日，德国外交官被转移到以罗马尼亚民族英雄“勇敢的米哈伊”名字命名的学校。同日，冯·基林格先射杀了曾与其私通的女秘书黑尔佳·彼得森，然后自杀。¹⁴⁸如前所述，冯·雅戈于1945年4月26日在梅拉诺自杀，距离二战结束仅有几天。三周以后，美军拘捕了卢丁，在巴伐利亚纳滕堡集中营关押之后，于1946年10月5日将其移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卢丁在布拉迪斯拉发面临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47年12月3日被处决。¹⁴⁹六个月之前，1947年6月17日，卡舍被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法院宣判死刑，次日被绞死。¹⁵⁰只有贝克勒在战争刚结束时得以幸存，1944年9月底，他于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被苏联红军抓获，带到了莫斯科。¹⁵¹1955年，他被苏联释放，回到西德，据说还接受了6000马克的损害赔偿。但是，1951年他的妻子自杀的消息传来，与此同时，他所居住的原“雅利安化”别墅被成功索回，给他回归的喜悦蒙上了阴影。有人试图追究他作为原警察局长参与20世纪30年代迫害德国反对派人士的责任，不过没有取得成果，法兰克福检察院于1957年结束了这一案件。此后，总检察官弗里茨·鲍尔试图以屠杀保加利亚犹太人相关的罪名指控贝克勒。1959年9月，贝克勒遭到逮捕，但主审直到1967年11月才开始。¹⁵²由于他“健康状况不佳”，诉讼于1968年夏季结束。1976年4月3日，贝克勒以自由之身死去。¹⁵³

在战后的德国，这些冲锋队外交官的家人因其丈夫、兄弟或父亲卷入犹太人大屠杀而备受折磨。¹⁵⁴玛尔特·卢丁大受好评的纪录片《我所知的两三件事》以情感的共鸣和典范式的明晰手法，讲述了父亲的生与死给幸

存家庭成员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¹⁵⁵汉斯·卢丁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在德国西南部冲锋队成员中很受欢迎，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但也卷入了对数万名犹太人的驱逐行动，而且他深知这些人注定将会被杀害。他的孩子们竭力在历史证据和私人的回忆中寻找平衡，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¹⁵⁶恩斯特·冯·萨洛蒙在1951年的畅销小说《问卷调查》中对卢丁的美化，深深地影响着家人的回忆。冯·萨洛蒙于1945年在美军设于纳滕堡的战俘营中首度遇见卢丁，后来赞颂他是“战俘营中最好的人”，是正派人的典范。有一次，萨洛蒙甚至称他为“战俘营中的基督”——这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认真的。¹⁵⁷卢丁的遗孀和几位儿女很愿意采用萨洛蒙笔下的文学形象，来描述丈夫和父亲的个性。玛尔特·卢丁称，萨洛蒙的小说是一本“道德指南”和“安慰书”，使他们回忆起汉斯·卢丁时，将其当成一位道德上胜人一筹的人，尽管以战犯身份接受审判并被处决，但他仍是民族的楷模和殉道者。¹⁵⁸当有人日后问及父亲的个性时，迪特里希·冯·雅戈的儿子亨宁援引了一些私信，以非常类似的语言描述他的父亲为“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对政治发展天真而相对有些顽固，但同时是一个基督教-伦理原则指导下的正派人，在战争末期，他当然也对纳粹政权的罪恶有所怀疑”。¹⁵⁹按照这种说法，冯·雅戈在1945年自杀似乎不是逃避政治责任，而是与其道德及贵族荣誉感相符的勇敢之举。

卢丁一家以有争议的态度接受了他们的过去，这在德国公众中广为人知，但卡舍一家的类似进程却仍属私密。德国外交部的文件表明，幸存的家庭成员难以接受卡舍的罪行，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前外交官都得以留任，即便是被盟国判处徒刑，也很快获释并重新得到公众的尊重。¹⁶⁰从1954年起，卡舍的家人请求西德当局帮助，证明南斯拉夫当局判处原外交

官死刑有违国际法。卡舍的一位兄弟写信给德国司法部，声称这位前公使是清白的，被处决只是“因为塞尔维亚人渴望报复”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组织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这些罪行得到了德国的纵容和支持。¹⁶¹提出上述请求的动机之一是，战犯家庭无法为其遗孀或儿女申请津贴。¹⁶²尽管巴伐利亚去纳粹化法院最初裁决卡舍属于“重罪犯”——后果是他的一半财产可能被国家没收，幸存的家人不能要求国家津贴——但后续的上诉取得了成功，从1954年起，这个家庭每月得到津贴。¹⁶³可是，1968年，当新任外交部长威利·布兰特准备正式访问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时，卡舍一家再次企图获得他们所称的“道德正义”。在写给布兰特的私信中，卡舍的一位兄弟敦促外交部长代表他们交涉，威胁将南斯拉夫告上海牙国际法庭，要求为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供赔偿。而且，他提醒布兰特，外交部有责任照顾原职员及其家人，并尖锐地指出，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本人曾为第三帝国的外交部工作，因此“应该认识我的兄弟”。¹⁶⁴卡舍的兄弟还直指布兰特，因为“在这一代人中，首次由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外交部长”，正义应该最终取得胜利。¹⁶⁵不过，当此“缓和”时期，显然没有必要为了这件小事冒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铁托，特别是，原公使卡舍属于职业外交官希望远离的纳粹大使群体——现在，这不仅出于私人原因，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原因。

第
四
部
分

第 四 部 分

第10章 “无罪”：二战后冲锋队在德国的遗产

许多人不喜欢忆起纳粹的过去。另一些人则不喜欢有人为此提醒他们：他们就是津津有味地回忆的那些人！

——广播电视记者汉斯·罗森塔尔，1983年¹

1945年5月8日停战之后，市民们慢慢地返回柏林，此时这座城市成了一片废墟，人们苦于饥饿和疾病。“柏林人”已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四百多万减少到不足三百万，许多人身心受创。作家鲁道夫·迪岑（人们更熟悉他的笔名“汉斯·法拉达”）是较早返回首都的人之一。战争年代，他搬出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在德国北部乡村以一种“内在放逐”的方式幸存了下来。然而，法拉达却在1945年返回柏林，带着某种狂热，于1946年秋季的几周内写下最后一部小说，不久便去世了，终年53岁。²

近年来，这部名为《柏林孤影》的小说得以重印，深受全球读者好评，它以文学的形式，描述了从1941年到第三帝国终结之间德国社会的全貌。它以动人的笔触，证明了作者面对普遍的破坏和绝望时深深的伤感与愤怒，他讲述的是一个忠于事实、扣人心弦的故事，同时也描绘了战争刚结束时人们的心态。这部作品总体上没有失实的描写，而在接下来的数十

年里，对纳粹统治下生活的大部分描述很快就充斥着这种对事实的扭曲。³书中揭示了那段时期，冲锋队、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纳粹组织的制服在何种程度上主宰着德国首都街头。冲锋队领导人远不是纳粹国家的装饰品，他们被描绘成强大、危险的纳粹极端分子，能够在工厂会议上威胁“普通”德国工人，将人们送往集中营，并使警察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法拉达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纳粹制服的“信号效应”，同时借用了当时流行的借口，将“雅利安”和“非雅利安”德国人引为第三帝国的第一批受害者。在他对20世纪40年代初柏林的描写中，大部分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都生活在某种形式的监狱中，被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纳粹党官员看管和折磨。法拉达在这方面的诠释是战后德国人的典型倾向，首先集中于他们自己的苦难，强调纳粹国家的“恐怖政权”特性，德国人在战争中丧失的生命以及1944—1948年德国人遭到的放逐。反过来，吉卜赛人、非德国籍犹太人、多达800万强制劳工的命运以及德国在欧洲屠杀的数百万平民就大体上都被忽视，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⁴

法拉达去世之后，许多德国人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冲锋队代表着民族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它象征着暴力、狂热的反犹太主义，对作为纳粹主义特征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外来者”毫无热情。但是，许多人很快根据历史事件做出了重要的区分。他们声称，冲锋队在1934年夏季之前曾是强大的准军事组织，但在此后数年已经成为人数虽多、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却很薄弱的组织：一个“全面依附于纳粹党的组织”或者“无足轻重的喝啤酒者联盟”。⁵这种理解在此后数十年里主导着有关冲锋队的学术研究。⁶例如，1967年，为1964年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而写的四份专家意见以“党卫队国家剖析”的书名出版⁷，它们的本意是为法官提供纳粹崛起

和第三帝国政治历史发展的可靠概述。在这部作品中，冲锋队只被顺带提及，仅引用了它在1933—1934年纳粹掌权和第三帝国建立之前恐怖活动中所承担的角色。⁸

下文中，我将分析1945年后的德国，冲锋队“是处于政治外围的暴力组织”这一形象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将论证，1945—1946年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IMT）不仅是分析法律实践与编史学之间关联的典型案列，而且它对冲锋队的指控为后续评估定下了基调。然后，我将在第二和第三节讨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个案列，阐述对冲锋队及其罪行的低估，是如何使法学家、原冲锋队旗队长汉斯·格梅林（1954—1975年的图宾根市市长）以及历史学家、原冲锋队大学办公室负责人海因里希·本内克的职业生涯得以延续。在第四节（也是最后一节），我将解释从20世纪70年代起，对德国纳粹的学术与非学术研究重点是如何从政治转向社会，对冲锋队的历史造成不同的影响。虽然许多地方与区域研究强调中低层冲锋队队员实施的极端暴力活动（尤其在1933年），但冲锋队作为一个具有政治野心和影响力的群众组织却缓慢而稳定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21世纪的德国，“冲锋队方法”仍然被当作一个政治斗争的术语，但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历史背景。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冲锋队

即便人们不同意罗伯特·肯普纳的早期评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IMT）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研讨会”，但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确认，这次审判“带有训诫目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与被告量刑无关

的道德教训。⁹因此，接受纽伦堡审判的纳粹组织特别重要，审判结果有可能对原组织成员的生活造成深远影响，其中冲锋队有着数百万成员。由于IMT是第一个接受冲锋队1934年前后身份鲜明差异的法律权威组织，它不仅为后续的刑事诉讼、也为此后历史学家的分析指明了方向。从这方面来说，纽伦堡审判确实书写了历史——其影响是持久的。

除了第三帝国的主要政治家、军事指挥官和商业领袖（如24名被告之中的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卡尔·邓尼茨和亚尔马·沙赫特^①）之外，纳粹国家最重要的一些镇压和恐怖组织（如党卫队、盖世太保和冲锋队）也在纽伦堡面临审判。如果满足如下条件，这些组织就将被宣布为“犯罪组织”：（1）为其成员提供犯下“反和平罪行”的框架，（2）对“战争罪行”负有责任，（3）参与“反人类罪行”。IMT章程第6条将“反和平罪行”定义为“计划、准备、开始和发动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条约、协议或保证的战争，或者参与计划或共谋前述任何一种行为”。同一条款规定，战争罪行包括“为了强制劳工或者在占领区内以任何其他目的杀害、虐待或驱逐平民，杀害或虐待战俘及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共或私人财物，肆意破坏城市、城镇或村庄，或者无法用军事必要性解释的破坏行为”。这一列表并不具备排他性，但在相当程度上为后续的诉讼定下了基调。最后，“反人类罪行”是IMT首次采用的法律分类，其技术可行性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它加入了对任何平民的屠杀、灭绝、奴役或驱逐及其

^① 亚尔马·沙赫特博士（1877—1970），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自由主义政治家，德国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

他残忍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是否违反“罪行所发生国家的国内法”。¹⁰

宣布冲锋队为“犯罪组织”将对此后数年纳粹罪犯的司法诉讼造成直接后果。在战后的德国，IMT关于冲锋队成员身份的裁定就足以成为法律惩罚的理由，法庭无须证明特定被告的单独罪状。可以理解，这样的裁决对于数百万原激进分子是最糟糕的情况。¹¹有一万多人为纽伦堡冲锋队辩护团队提供了书面供词，他们充其量只承认了一些冲锋队队员的行为并不总是恰当，但否认冲锋队作为组织的一切罪责。¹²有如此多的人做证，说明纳粹在第三帝国时期建立的网络在战后仍然有效运作，也说明对冲锋队宽泛定罪已经激起了成千上万原冲锋队队员及其家人的强烈批评。

在这些通常带有道歉口吻的文件中，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于特纳1946年1月撰写的一份详细备忘录是典型的例子，当时他被美军关押在斯图加特附近科恩韦斯特海姆的75号拘留营。¹³1943年5月2日—8月8日之间的冲锋队临时领导人中有两人幸存，于特纳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这份备忘录，1945年10月，他在拘留营中的报纸上看到了纽伦堡审判的相关报道，“作为唯一力所能及的冲锋队代表”，立即与IMT取得了联系。由于法庭不太关注他最初的信件，在辩护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鼓励下，他于1946年1月开始撰写冲锋队和本人的辩护词。¹⁴于特纳将近100页的辩护词有些几乎称得上滑稽，特别是提到冲锋队对犹太人和政治对手的态度时。根据他的说法，他和卢策都从未下令迫害犹太人，集中营里这些群体成员遭到折磨和屠杀的新闻，他也是从盟军那里得知的。于特纳写道，任何相信正义的理智之人都会赞颂冲锋队的高尚动机。¹⁵

对冲锋队的预审于1945年12月18日下午开始，这一天是审讯的第22天。案件的主公诉人是美国法学家罗伯特·G. 斯托里，他和9名同事一起协

调证据，决定诉讼的顺序。¹⁶斯托里在指控中首先定义了冲锋队的目标和范围，但并非没有遇到困难。按照他的说法，冲锋队

是一个适用于多种图谋和目的的机构，它在这场阴谋中的作用不断变化——在不同阶段始终因应着阴谋的进展，走向其最终目标：废除《凡尔赛和约》，夺取其他民族与国家的领土。如果我们将这场阴谋看成由各个部分形成的拼图，就会发现代表冲锋队的那一块拼图是整个图形呈现和发展所必需的重要链条。

这里的“阴谋”一词指的是纳粹推翻魏玛民主国家，代之以法西斯独裁制度的企图，其目标是通过进攻和占领其他国家，将德国转变成为一个欧洲帝国。斯托里说，冲锋队最明显的特征是其成员“狂热坚持纳粹阴谋家构思的哲学与意识形态”。¹⁷这种共同信念很容易证明，但要将对冲锋队总体特性的这种模糊评价与可由法律惩处的特定罪行联系起来，就难得多了。

斯托里声称，1934—1939年，“冲锋队从零散的街头流氓团伙，发展成组织严密、具有凝聚力的单位，按照军事标准组织并进行军事训练，行使军队职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激进、军事化和好战的精神及哲学”。¹⁸他补充道，从1934年起，每年都有多达25000名军官和军士在25所冲锋队学校及三所冲锋队帝国领袖学校受训。¹⁹但有些矛盾的是，斯托里还声称，冲锋队在1934年恩斯特·罗姆被杀之后“重要性开始迅速下降”。²⁰尽管有这些不一致之处，斯托里对后期冲锋队的指控似乎理由充分。作为冲锋队“曾在侵略战争的最初步骤中充当打击力量”的证据，斯托里指出了该组织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占领苏台德行动中的作用。²¹他认为，在这两次行动中，冲

锋队不仅提供后勤援助，还有数千名战士组成了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和奥地利军团的“骨干”。²²斯托里引用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舍伦贝格的证词称²³，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44年起），冲锋队接管了多项“之前仅委托给党卫队、安全警察和军队的职能”，包括守卫集中营和战俘营，管理德国和占领区的强制劳工。²⁴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证据证明，作为个体的冲锋队成员和这个组织“实际上都是一场阴谋的同谋和参与者，这场阴谋设想并涉及反和平、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行。”²⁵

在另一边，纽伦堡的冲锋队辩护团队由三方组成：格奥尔格·伯姆律师和他的团队，以及两名挑选出来的大律师：马丁·勒夫勒博士和特奥多尔·克勒菲施博士。²⁶克勒菲施从魏玛时代末期就很受尊敬，但这位来自科隆的刑事辩护律师只在该地区知名，历史研究人员直到最近才得到了他的个人文件。²⁷这些文件中有与他在IMT之前律师生涯相关的档案，可以凭借它们对辩护团队采取的策略进行详细分析。克勒菲施在法庭上没有发言，只在1946年8月15日提交了“书面讲话”，部分原因是冲锋队辩护律师之间的紧张关系。²⁸

克勒菲施的工作集中在原属“钢盔团”和“前线士兵同盟”的冲锋队队员。如前所述，钢盔团与冲锋队的关系最初很紧张，尤其是因为双方存在“代沟”，在那之后，双方的关系也一直很复杂。简言之，冲锋队吸引年轻人，钢盔团吸引的则是他们的父辈。²⁹在1946年8月28日冲锋队辩护律师们的最终陈词中，格奥尔格·伯姆强调了这种划分，以及纳粹党与钢盔团意识形态上的（所谓）明显差异：“冲锋队内有大量钢盔团成员，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而团结在一起，对当时发生的事件持有最大的怀疑。”³⁰正如这一陈述所表明的，辩护团队的整体策略是利用冲锋队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以

及该组织形式在1921—1945年至少两度发生很大变化的事实，辩称宣布一个原成员数量达450万人的群众组织为“犯罪”集团是很不公平的，在法律上也不合理。³¹勒夫勒指出，这样的宣示也不符合美国占领区的非纳粹化法，根据这一法律，所有突击队长以下级别的冲锋队队员都不被视为必须惩罚的对象。勒夫勒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犯罪组织”的一些前成员最近刚刚被选为社区议员。³²

这种辩护策略取得了成功。1946年2月28日，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 杰克逊要求豁免所有不是常规冲锋队成员的冲锋队体育徽章佩戴者，以及冲锋队控制的本土防卫部队人员及冲锋队预备队成员。³³此时，他只要求将冲锋队的主体作为惩罚对象。然而，勒夫勒在3月1日的庭审中声称，对冲锋队的刑事诉讼仍然影响每一个“从1921年建立到1945年解散的24年间（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曾属于冲锋队的人，即便他们所在的时间很短”。³⁴不出所料，勒夫勒尽其所能地贬低冲锋队在战争年代的重要性：

不能以违反战争法律与惯例的罪名指控冲锋队。公诉人确实提交了一份供词，称冲锋队也参与了集中营及战俘营的守卫和强制劳工的监督工作；但根据公诉人的描述，这种情况直到1944年才在当时肆虐的全面战争框架内发生，而且也没有人指控冲锋队的这一活动涉及任何过度行为或者虐待……公诉人指控冲锋队的少数反人类罪行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由个别成员犯下的，绝对不能与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反人类罪行相提并论。³⁵

为了打动法庭，勒夫勒甚至提供了无人能够证实的数字，声称所有冲

锋队队员中，曾参与应该受到惩罚的个人行动者最多只占2%，而其他98%的人“手很干净”。他还辩称，绝大多数原冲锋队队员都矢口否认他们的领袖曾下令实施犯罪行为。³⁶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萦绕在这些论断背后的，是对德国人“集体罪行”激烈而往往包含怨恨的公开辩论。³⁷

纽伦堡的法官于1946年9月30日通过了他们的裁决，将1934年夏季之前与之后的冲锋队区分开来。对于前一时期的冲锋队，他们确定，尽管冲锋队队员犯下了罪行，但这些罪行仅限于德国国内，不符合该法庭所制定罪行类别的条件。至于后一时期的冲锋队，法官们试图协调公诉人与辩护人观点上的冲突。他们裁定，“孤立的冲锋队单位参与了导致侵略战争的行动，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从而确认了公诉人的论据。作为证据，法官明确引用了奥地利的占领、冲锋队对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组建的贡献，以及冲锋队苏台德地区总队和但泽、波兹南、西里西亚及波罗的海国家的冲锋队单位运送及看管战俘的事实。³⁸法官们还提到了冲锋队在1938年11月9日参与反犹太大迫害，以及对维尔纽斯及考纳斯犹太人聚居区中犹太人的“虐待”。³⁹

不过，法庭也同样和辩方达成一致，接受了1934年大清洗后“冲锋队沦落为不重要的纳粹追随者组织”这一主张。正是这个结论使法官们最终做出了无罪裁决：“尽管在具体事例中，一些冲锋队单位被用于实施战争和反人类罪行，但不能说它的成员普遍参与其中，甚至不能说都了解这些犯罪行为。因此，法庭不会将冲锋队宣布为章程第9款意义上的犯罪组织。”⁴⁰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德国内阁和“总参谋部及最高统帅部”，而党卫队、帝国保安部、盖世太保和纳粹党领导层内部的某些组织被裁定为有罪。大部分德国人保持沉默，即便他们质疑法庭的合法性，但也赞成这一裁决，主

要是因为它符合一小部分纳粹领导人淡化其参与第三帝国罪行（通常是自愿的）事实的流行趋势。⁴¹

克勒菲施将纽伦堡法官对冲锋队的相对仁慈归功于自己的辩护策略，这种策略将冲锋队描述为高度复杂、但最终没有权势的官僚机构，许多德国人只是偶然地短期加入其中。⁴²IMT裁决后不久，在1945年11月5日的一封信中，克勒菲施声称原“钢盔团”成员加入冲锋队，某种程度上使整个组织免于惩罚：“整个冲锋队没有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它吸收大量钢盔团成员的结果。后者的行为已经证明是没有瑕疵的。如果一个组织包含了许多无可指责的成员，就不可能给整个组织打上有罪的标签。”⁴³

这一陈述可能是自我吹嘘，但很难忽视的是，纽伦堡的无罪判决为此后数十年原冲锋队队员的审判（至少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开创了一个先例。西德法院对单独冲锋队队员的定罪仍然限于该组织1933年、1934年和“水晶之夜”中的行为。褐衫军袭击“公开”、高度可见的特性此时适得其反，因为即便事情过去了15—20年，但往往能够细致地重现。⁴⁴而在苏联占领区，苏联及后来的东德当局对起诉冲锋队针对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政党的罪行特别感兴趣，这一点也毫不令人吃惊。⁴⁵不过，即便在苏联占领区，20世纪50年代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基确立之后，惩罚纳粹罪行的司法行动（其本意是为了帮助新政治秩序合法化）也显著减少，这与西德的“超越历史”进程惊人地同步。⁴⁶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如果原冲锋队队员同意为新建的国家安全部充当间谍，甚至连原霍恩施泰因集中营冲锋队看守的刑期都可以暂缓执行。⁴⁷1950年，汉娜·阿伦特在访问祖国之后评论道，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已成为这个国家“服从文化”的受害者，因此乐于寻求庇护。⁴⁸数百万原冲锋队队员不再承认，他们过去曾以“民族共同体小

卫士”的身份，（通常是自愿地）投身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⁴⁹而且，1949年12月31日颁布的西德《免予处罚法》赦免了刑期低于6个月的罪犯，实际上使大部分冲锋队罪犯免于监禁。⁵⁰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起，原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也可以不受骚扰地生活，只有少数引人注目、但极不令人满意的例外，如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⁵¹总体来说，战后初期的判决往往暂缓执行，刑期也大大缩短。在这方面，末任冲锋队参谋长威廉·舍普曼的案子很有启发性。1950年，多特蒙德的一个陪审法庭从轻判处舍普曼入狱9个月——不是因为他在冲锋队的领导角色，而是因为1933年以多特蒙德警察局长的身份卷入纳粹暴力夺取权力。⁵²然而，舍普曼于1952年被德国吕内堡法院成功地“非纳粹化”，他对此裁决提出上诉，最终于1954年获释。⁵³两年后，他被选为下萨克森州吉夫霍恩副市长，1970年去世。

原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纳粹外交官迪特里希·冯·雅戈死后被称作“次要罪犯”而“非纳粹化”，进一步说明了战后诉讼的总体倾向。弗赖堡地方非纳粹化法庭于1950年2月13日裁决，冯·雅戈没有卷入纳粹的宣传工作，并且“以理想主义和正派的精神”任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普鲁士州议员、大使和国会议员。因此，法庭认为他的多数行为情有可原。⁵⁴由于雅戈的妻子与7个子女生活拮据，法官的裁决似乎更多是为了创造法律条件，允许他的遗孀接受养老金，而不是描述死者的现实形象。

1945年之后很长时间，纳粹政权词汇表中的关键词仍持续使用，证明了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对道德与社会行为的持续影响。按照历史学家伯恩哈德·戈托的说法，在纳粹政权最终失败之后的岁月里，其地方与国家级别原领导人积极且常常成功地致力于“发明一种‘正派的民族社会主

义’”——去除对犹太人的迫害及第三帝国种族与灭绝特性的“纯净”版本。作为替代，这种思想的支持者强调该政权的社会目标和成就。⁵⁵奥托·施特拉塞尔于1949年企图以“德国复兴联盟”的化名重建其“黑色阵线”，就符合这种模式。⁵⁶其他原纳粹分子坚持其好斗的言辞。例如，原汉堡大学教育学教授、冲锋队队员古斯塔夫·多伊希勒就是如此，他喜欢身着褐衫授课，并美化冲锋队在后方的服务。1952年，他成为“非纳粹化受害者联合会”汉堡分会领导人之一。多伊希勒将汉堡的非纳粹化进程描述为“残酷无情”和“无边仇恨”之举，为其火上浇油的是永远无法根绝的“报复执念”。⁵⁷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此前对积极参与迫害及驱逐犹太人（这些行动在官方文件中往往被委婉地称为“再安置”）的定罪不再能够阻止个人完全融入战后德国社会。这种设想与十年前纳粹政权的语言保持着引人注目的连续性，往往暴露了使用者的本意——他们敦促公众摆脱过去的负担，结束德国历史的上一篇章。巴伐利亚州特洛伊希林根市议会1956年以罕见的明晰语言解释道，曾参与“反犹太种族迫害”并因此在战后几年失去原有地位的前纳粹分子很大程度上已经恢复原有的权利，所以对原民族社会主义者持严厉态度不再具有正当的理由了。⁵⁸

冲锋队队员是“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

法学家汉斯·格梅林于1953年当选家乡符腾堡州图宾根市市长，战后他的职业生涯引人注目，也成为了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重新融入社会这一总体趋势的生动事例。格梅林出生于城内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家

庭，曾在埃伯哈特·卡尔大学学习法律，野心勃勃的他于1931年12月12日加入钢盔团，1933年初进入冲锋队。此后数年，他在该组织符腾堡分支机构担任多个不同的领导职务，同时追逐其职业目标。据格梅林在1939年的叙述，他曾担任冲锋队4个不同突击队（13/216、56/125、2/180和1/119）的领导人，1938年11月9日晋升为冲锋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格梅林于1937年5月1日准入禁令解除后加入纳粹党，次年担任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活跃于1938年9月19日到10月15日）的“汉斯·卢丁”连连长。通过这一军事考验之后，时任冲锋队西南地区总队领导人的汉斯·卢丁为格梅林提供了冲锋队旗队长的全职工作。最初，这位有天赋的年轻法学家更愿意进入帝国司法部，但由于国家司法机关与冲锋队之间的妥协，他于1939年5月获得了国家法官的终身职级，帝国司法部准许他请假两年，继续在冲锋队的生涯。⁵⁹在国防军服役至1940年底之后，格梅林追随他的导师和朋友卢丁，于1941年1月进入外交部。两人于同年4月抵达布拉迪斯拉发。⁶⁰

格梅林在斯洛伐克首都的办公室紧邻他的上司，他也和臭名昭著的“民族组织领袖”弗朗茨·卡尔马森成为了朋友。格梅林的名字缩写出现在多份德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官方文件上，可以确认他熟知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行动。⁶¹1944年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纳粹党领导会议上，格梅林发表演讲，直率地承认“雅利安化”政策很好地服务了帝国的利益。他补充道，尽管有上述事实，但在斯洛伐克留下一些犹太人对德国是有帮助的，因为只要斯洛伐克人仍然能够掠夺犹太人，那么即便苏联红军步步进逼，他们也不太可能背弃自己的保护国。⁶²不过，同年早些时候（1944年11月），希姆莱要求对德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免去格梅林的职务。他认为，在位四年之后，格梅林正在变成“半个斯洛



1954年，原冲锋队旗队长、外交官汉斯·格梅林在家乡图宾根竞选市长的选举海报。虽然官方口号写道“汉斯·格梅林适合图宾根”，但抗议者补充道：“当他最终成为市长/他正好可以炫耀/头上戴着‘钢盔’/面对所有的风暴！啾啾啾啾！”经过一场有争议但最终成功的竞选，格梅林成为当地政治中无可争议的强人，在位20年。

伐克人”。⁶³党卫队帝国领袖担心，随着苏联红军的进攻变得越来越不可阻挡，卢丁和格梅林与当地法西斯分子的良好关系，已使他们对后者倒戈的风险视而不见。

1945—1948年，格梅林在美军和法军的拘留营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1948年7月，他在图宾根被归入“次要罪犯”（第3类）。⁶⁴法院判处他这一类型的最低刑罚：两年缓刑，在此期间禁止他参与政治活动。尽管做出如此裁决，非纳粹化委员会称格梅林具有“毫无瑕疵、清白的特质”。法官承认，他曾是一名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但“并不狂热”，在第三帝国时期，他认为通过“积极的工作”，纳粹党将回到“温和、理性的立场”。⁶⁵六年以后，格梅林企图阐述的正是这一点。

在图宾根市长竞选演讲（全文刊登于1954年10月2日的当地报纸《施瓦比亚日报》）中，格梅林承诺，他将坦然面对纳粹的过去。鉴于该市选民无论如何都会知晓，格梅林选择了某种先发制人的辩护，公开谈论自己担任冲锋队领导人和纳粹外交官时的情况，但声称不能将第三帝国时的这些职务看作某人当时立场和实际行为的明确标志。格梅林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任何政党能够代替纳粹。后来，“当这艘船行将沉没”（即德国将要输掉战争），他和绝大多数德国同胞没有选择离开祖国——这一说法露骨地指责那些1933年到1945年之间由于政治原因离开德国的人。⁶⁶格梅林宣称，战争时期他饱受内部冲突之苦，但坚称每当既能服从命令、又能凭良心行事时，他总是帮助那些自己所珍视的人和向自己请求帮助的人。他向听众们保证，宽容始终是他私人及职业行为的准则。⁶⁷

更具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代精神特点的，是格梅林当选之后的论战。这场争执始于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教授格哈德·埃贝林在《施瓦比亚日

报》上发表的公开抗议信。埃贝林哀叹，格梅林的当选表明大部分选民不关心新市长的纳粹背景——也许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为格梅林投票恰恰是因为这个因素。埃贝林将这次选举称为“重新纳粹化”的警示，认为战争的结束并不代表真正战胜了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⁶⁸作为反应，接下来几天的报纸专栏上被抗议的风暴淹没了。发表的信件中大部分支持新市长。其中许多人呼吁基督徒保持宽容的态度，这些作者宣称，格梅林这样的人已经成功地非纳粹化，作为合格人选的他们不应该因为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思想而终生背上罪责。埃贝林的同事E. 亨尼希教授甚至赞颂格梅林具有真正领袖的人格，曾受到大部分普通冲锋队队员的钦敬。他将批评格梅林纳粹经历的人描述为“战后精神失常者”，要求尽快结束这种“非纳粹化法庭的集体裁决”。⁶⁹其他许多来信者则抱怨埃贝林教授的“傲慢态度”，这证明了即便在一座古老的大学城里，纳粹年代的反智主义也能够延续。

冲锋队在这一辩论中被反复作为一个参考点。一名作者说，一位演说家在党的集会上向听众说出“我亲爱的原冲锋队队员同志们”后，演讲就被阻止了；而另一位作者则向埃贝林保证，德国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一件浸透鲜血的褐衫”了。据后一位作者说，他曾在16岁时穿上了一件这样的衬衫，但此后用它换来了义肢——暗指在战争中负伤。⁷⁰大部分为格梅林辩护的作者落款使用真名，而站在埃贝林一边的人则更多是匿名的。一位女性作者觉得图宾根的狂热气氛带来了莫大的威胁，明确要求仅使用她的姓名首字母，她宣称：“我已经看到和听到易怒而粗野的格梅林先生支持者们！”⁷¹

1962年，格梅林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再度参选，以94%的压倒性得票率（只有51.7%的人参加投票）获胜，此后，极受欢迎的他在位二十年。他成

为当地政坛的卓越人物，尤其在法国与德国的和解进程中出力甚多。⁷²对他的支持者而言，他的战后生涯标志着西德成功地从纳粹独裁国家转变为西方式民主国家。⁷³据格梅林的女儿、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赫塔·道布勒-格梅林（1998—2002年的德国司法部长）说，汉斯·格梅林在战后全身心地投入重建民主制德国的工作中，为过去的纳粹生涯赎罪，但他仍继续与“老同志们”见面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这是经常在我们家庭引起激烈争论的一点”，道布勒-格梅林回忆道，但她也强调，父亲最初不愿意接受家庭内部的这种批评，不过最终选择了面对。⁷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汉斯·格梅林的战后生涯成为可能，是如下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他将20世纪30年代在冲锋队的活动洗白为“参加了某种体育俱乐部”；其次，他粉饰了自己在斯洛伐克担任德国外交官时的行为；最后，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符腾堡的政治环境仍然对纳粹“民族共同体”愿景怀有很高的敬意——人们认为，这一愿景因为纳粹机关受到权力诱惑而被歪曲。

残缺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也开始助力“冲锋队在政治上相对无能”的叙述。1933—1934年冲锋队大学办公室领导人海因里希·本内克博士在这方面尤为重要。⁷⁵这位原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声名显赫的慕尼黑当代研究所（IfZ）任助理研究员，这个机构于1949年建立，原名“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时代历史研究所”。⁷⁶现存的IfZ与本内克之间的通信从1958年开始，止于20世纪60年代末。双方都从合作、交换文件、专业意见和金钱上得益。本内克准备有关冲锋队历史的笔记和简短的披露材料，

为手稿和书籍提供意见，并采访原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最常使用的是一组IfZ提供的问题。⁷⁷有时，研究所会向他提供一定数额的酬金：最初，他接受50—200马克的报酬⁷⁸，但最终双方签署一份合同，保证本内克在1963年7月1日—12月31日对原纳粹分子的采访将得到3600马克。⁷⁹

本内克成为IfZ常规雇员的企图没有成功。⁸⁰不过，他与该机构的合作不仅为其提供了采访纳粹高层人士的经济手段，还帮助他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冲锋队相关领域受人尊敬的学者。根据他担任冲锋队领导人二十年所取得的内幕，结合调阅IfZ提供的未公开文件的权利，本内克完成了两本专著：1962年出版的《希特勒与冲锋队》和1964年出版的《国防军与“罗姆叛乱”》。⁸¹这两本书集中讲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罗姆清洗”之间的冲锋队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该领域德语书籍中的标杆。1963年初，他还撰写了一份关于1918—1923年冲锋队历史的手稿，后被IfZ购得，但从未出版。⁸²他受德国联邦档案馆委托撰写的另一份手稿直到2012年才发表。⁸³本内克深知，这些书籍仅涉及冲锋队存在的中期，完全忽略了1934年之后的时期。⁸⁴尽管如此，凭借研究员的声望，1967—1972年，本内克应邀在慕尼黑政治学院教授有关魏玛共和国政治史的各种课程。⁸⁵

在著作中，本内克采用传统的政治史手法，专注于纳粹领导人的小圈子，淡化1933年1月30日前后暴力活动的程度。尽管出版社声称，关于冲锋队的首部著作“本意不是辩护”，而是出于作者“对真理的热爱”，但对它进行批判性阅读可以看出，本内克竭尽全力将希特勒与冲锋队区分开来。关于该组织早年在慕尼黑的活动，他将冲锋队描述为拜埃尔哈特和罗姆所赐而建立的“自卫联盟”，弱化了纳粹党和希特勒对其组建所起的作用。⁸⁶从这方面看，书名应该翻译成“希特勒与冲锋队”，而不是“希特勒的冲锋队”。

本内克始终对冲锋队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思想和1932年夏季展开的纳粹恐怖活动轻描淡写，对他而言，那只是对“左派在选举前的恐怖活动”的一种反应。⁸⁷讨论纳粹领导层对波滕帕谋杀案的强烈支持时（其高潮是希特勒承诺对罪犯“无保留忠诚”的电报），本内克强调这些行为的意图首先是向冯·帕彭宣战。他甚至宣称，不仅希特勒，“可能还有许多当时的报纸读者”认为，与同时在另一座西里西亚城市布里格因卷入1932年7月10日奥劳政治冲突而受审的“帝国战旗”组织成员相比，涉及波滕帕谋杀案的民族社会主义者遭到更严厉判决的事实令人难堪。本内克并没有说明，奥劳案件得到轻判，部分原因是这一罪行发生在对政治恐怖行为的紧急法令生效之前数周。⁸⁸魏玛时代末期对比两种罪行的逻辑，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本内克在战后德国的政治思维。⁸⁹

尽管如此，本内克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视为对该领域的重要贡献，不仅因为其深入的见解，还因为图书市场上缺乏替代品。⁹⁰事后看来，本内克关于冲锋队的历史著作说明了一个普遍问题，它困扰着IfZ为刚刚过去的年代书写“可观”和纯“事实”历史的努力。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斯·贝尔格等批评者所言，过分强调“第一手资料”必然依赖代表纳粹观点的官方文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按照该政权指明的路径叙述历史——本内克的著作更是如此，作者诠释的正是自己代表的历史。⁹¹

记忆的政治

正如二战后德国公众对冲锋队的认知和记忆所表现的，最新的历史学研究在解决同时代人公开辩论方面能力有限。⁹²从经过学术训练的本内克到

畅销书《罗姆谋杀案》（1984年出版，曾在很有影响力的《明镜周刊》上连载）的作者、记者海因里希·赫内，⁹³历史学家们仍对冲锋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治作用感兴趣。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德国人更倾向于回忆褐衫军的公众形象、行军、争斗和恐怖行为，以及在社区中的地位。大部分普通人与党卫队、帝国保安部或者盖世太保没有紧密的联系，这些组织应为纳粹政权的罪行负主要责任，而冲锋队队员是熟悉的人物——邻居、同事、野心勃勃的教师，或者在较为不幸的情况下，是名声不佳的乡村后进者，仅仅因为他的制服，在人生当中得到唯一的机会，可以蔑视和主宰其他人。

绝大多数原纳粹积极分子得以在战后享受德国“经济奇迹”的成果。1945年之前的社会和人关系网往往留存到战后，特别是在乡村和小城市里。德国射击协会、马术俱乐部和体育俱乐部——许多情况下在20世纪30年代就并入冲锋队或者归其管理——继续运作，在意味深长的沉默中无视或者略过第三帝国的十二年。当德国男人讲述过去的纳粹故事时，通常讲的是二战中的岁月，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当时都应征入伍，为祖国而战，并作为所谓“干净的国防军”一员承受苦难，给人留下的印象比坚称作为一名褐衫军成员、自愿为纳粹计划出力要好得多。⁹⁴由于许多普通冲锋队队员所受教育程度一般，回忆年轻时政治积极行为的详细自传极其罕见。战后西德的武装党卫军老兵定期举行吸引数千人参加的“同袍聚会”，而冲锋队没有建立任何老兵组织。⁹⁵作为一个不仅为纳粹恐怖统治做出贡献，还影响着数百万德国男性及其家庭的组织，冲锋队缓慢而稳步地从公众记忆里消失了。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原冲锋队队员甚至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地方高官，

或者成功地开启记者、政治家、环境保护活动家等第二职业生涯，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冲锋队资深宣传者、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汉斯·施蓬霍尔茨，前几章中我们曾引用了他关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冲锋队的著作。⁹⁶他曾在巴伐利亚保守报纸《水星》担任记者多年，还在巴伐利亚党中度过了一段政治生涯。施蓬霍尔茨以重要的保守主义者身份而在该地区享有盛名，创立了埃伯斯巴赫森林保护协会，这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组织，在阻止巴伐利亚州政府批准于慕尼黑以东大片林地中建设欧洲原子能研究组织（CERN）场所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施蓬霍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中的措辞说明，有些时候“民族共同体”与“权益保护组织”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这位原冲锋队宣传者此时敦促：“自然保护组织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⁹⁷因为所做的贡献，他于1973年获得了巴伐利亚环境保护奖，同时获奖的还有著名的行为主义者、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茨。⁹⁸施蓬霍尔茨还于1980年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该地区的两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然而，直到2015年底，他的维基百科词条仍没有提供1945年之后的详细职业经历，将其去世日期列为“不详”。⁹⁹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在英国“历史作坊”运动和瑞典作家斯文·林德奎斯特的激励下，“日常历史”在西德占据了主导地位，林德奎斯特曾令人难忘地宣告：“在你站立的地方挖掘！”行动小组此时开始了关于第三帝国时期当地历史的工作，寻找原纳粹关系网的根源，确定它们的主要参与者。¹⁰⁰这些小组成员找到原冲锋队监狱和早期集中营，记录成为纳粹恐怖行动受害人的普通男女的经历。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一些暴力行动历史遗迹被改造成博物馆，如冲锋队宪兵在柏林佩普将军大街设立的监狱于2013年向公众开放。该地区居民早就知道自家地下室过去的用途，三十多年过

去，它才以博物馆的形式成为了冲锋队暴力行动的纪念物。¹⁰¹相形之下，该城的东部早在1945年就为1933年6月“科佩尼克血腥一周”举行了纪念活动。此后数十年，原东德花费了可观的精力反思纳粹恐怖统治，但也因此塑造了符合其反法西斯建国神话的记忆。和佩普将军大街的原冲锋队监狱一样，柏林科佩尼克区今天也建立了一所小型博物馆，纪念纳粹早期的恐怖行动。¹⁰²

与本内克将冲锋队队员描绘为“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相反，主流观点越来越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无赖、蠢笨的恶棍，或者身穿制服、在酒



民主德国漫画家利奥·哈斯在1957年的漫画中描绘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部长格哈德·施罗德身着冲锋队制服，为康拉德·阿登纳总理保守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选举之路保驾护航”。1933年，施罗德——当时是波恩的初级律师——申请加入冲锋队。在漫画中，他在深渊旁边放置路标，划出一条狭窄的道路，这些路标上写着“禁止民主组织”“禁止DFD（东德民主妇女联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7年禁止）”和“禁止KPD（德国共产党，1956年在西德被取缔）”。这幅漫画说明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普遍指责，即西方的民主政府本质上是伪装的前纳粹。

精影响下变成“兼职流氓”的市井之徒。鉴于这种发展，在两个德国中，出于政治目的谴责组织和个人时总是将其与冲锋队相比，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比较的调子和特性。第一个例子是，在冷战白热化的气氛下，西德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1957年1月于国会发表演讲，为自己不向波鸿市大剧院在巴黎上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著名剧作《三便士歌剧》提供财政支持辩护，他的论据是，这位剧作家“晚期的歌词”只能与冲锋队“吟游诗人”霍斯特·韦塞尔相提并论。当然，至少从艺术的角度看，这种对比是很荒谬的。布伦塔诺故意将矛头指向身为政治家的布莱希特，后者战后接受了东柏林的号召，至少在西德方面看来，此人支持共产党统治者以换取个人特权。¹⁰³布伦塔诺的对比还有可能是反驳东德方面言论的一次笨拙尝试，后者自称“更好的德国”，披露了多名西德高官的纳粹背景。¹⁰⁴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1968年西柏林街头、演讲厅和报社的情绪越来越高涨，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发行的畅销反共小报《图片报》将抗议学生斥为“新褐衫军”：“他们肯定看到了血。他们挥舞红旗，相信红旗。这就是有趣的结局……和民主的宽容。我们反对冲锋队的方法。”¹⁰⁵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奥多尔·W. 阿多诺加入了这种批评，但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知识与个人层面。这位具有德国-犹太人血统的前移民对20世纪60年代末西德大学喧嚣的“座谈会”感到震惊。他认为大部分激进学生不是新政治先锋队的成员，而是“穿着牛仔裤的冲锋队队员”。¹⁰⁶政治科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曾在《双重国家》（1941年）中对民族社会主义做了开创性的分析，他也同样警告左翼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必须放弃“与冲锋队袭击小组完全相同的手法”。¹⁰⁷

后来的学术界有时候也呼应这种看法，指责1968年时较激进抗议者的“纳粹流氓行为”，这一罪名特指这些学生经常向不喜欢的教授大喊大叫，阻止其讲话。¹⁰⁸反过来，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们也用类似的隐喻谴责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新闻迫害”。¹⁰⁹在他们眼中，这些记者的工作就是有意激起身体暴力。学生们将施普林格视为意在西德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镇压行动的基石。对立双方的共同之处就是用纳粹的过去诋毁政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斗争仍然带有两次大战之间的痕迹。

过去十年左右，记起冲锋队的人自然而然地减少了。但是，褐衫军仍是德国公众辩论的一个参考点，特别是有关政治行为和暴力犯罪的讨论。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刚刚统一时最为明显，当时整个国家都爆发了排外骚乱。恶名最著的事件是1992年8月原东德最大城市之一罗斯托克公寓区利希滕哈根发生的袭击，以及1992年11月和1993年5月在西德城市莫尔恩及索林根发生的纵火案（分别造成3人和5人死亡）。自由民主党政治家、联邦外交事务专员科尔内利娅·施马尔茨-雅各布森当时对这些暴力活动的评论，说明至少在较老的德国人心中，纳粹时代的记忆仍然清晰：“人们遭到猎杀，就像身处冲锋队为害最烈的时期。”¹¹⁰这种对比明显不恰当，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排外暴乱与第三帝国时期不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相反，作恶者将自己的暴行理解成对政治体制失望的信号，他们之所以高呼过分的民族主义口号，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面对迅速变化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时的绝望。

2015年秋季起，德国再度爆发了政治与种族暴力。尽管有此发展，作为20世纪德国最具争议的政治流行语，“冲锋队”正在失去其效力。右翼极端分子重新建立冲锋队，作为爱国情操及政治激进主义典范的企图已经失

败，似乎也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成功。¹¹¹同时，冲锋队史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话题，但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活动。民族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德国此后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当然应该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成功的故事，但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许多年轻人追寻某种精神领域、民族或者社会的愿景，期望这种愿景能够为其提供生命的意义和世界上的一席之地，他们继续受到身体暴力的吸引。通过许多年轻公民不具备的手段满足消费及肉体欲望，如果一个社会对此大加赞颂，只会招致批评与暴力——它们将成为表达失望与无助的途径。纳粹冲锋队在1921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例子，它告诉人们，年轻人的渴望、政治利用、军国主义倾向和社会堕落结合在一起，会爆发出多么可怕的力量。虽然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但并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地区所独有的。基于暴力动员和训练整合的政治制度仍然普遍存在；倡导更和平、更人性的社群共存方式以战胜此类制度，仍然和以往一样重要。

结语：冲锋队与民族社会主义

早在1932年，冲锋队就已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对象，一位德国博士向莱比锡大学种族与人类学学院提交了有关的专题论文，并为后者所接受，就说明了这一点。论文作者是25岁的学生及冲锋队队员彼得·萨克塞，他是厄尔士山区迪特斯巴赫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为了这篇论文，1932年11月到1933年2月，萨克塞拍摄了莱比锡冲锋队第106、107旗队中300名队员的照片，并对他们进行了人体测量。他的发现——莱比锡冲锋队队员平均身高为171厘米，平均体重64公斤，头骨大多呈“短圆形”——只不过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奇怪状态的例证，因为它只能说明，莱比锡冲锋队队员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¹

但是，人们不应该轻易地排斥这些研究。它们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实施，并从1933年起得到了公共基金的支持，这凸显了20世纪30年代意识形态偏好、政治活动和种族优越论“科学”主张之间的密切联系。至少，那些论文中裸身拍照的典型技工、簿记员和建筑工人乐于承担德国男性种族优势的代表。但更重要的是，几年以后，文中表达的心态最终对纳粹官僚机构在东欧安置冲锋队队员的行动造成了显著影响。在第三帝国内部，人种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尽管在意识形态中非常重要，但并不是种族划分

中最为重要的标准。历史学家格哈德·沃尔夫最近在二战期间波兰西部德占区“德意志族人名单”的相关论证中阐述了这一点。²纳粹分子当然是种族主义者，也都深信斯拉夫人和“闪米特人”的“遗传劣势”，但纳粹运动对大部分德国人口的吸引力在于其明显的唯意志论特征。在以种族定义的“民族共同体”内部，个人奉献和意识形态信念是所谓的“种族优越性”的标志。这种理解不仅有利于希特勒和戈培尔这种可以代表理想“雅利安人”的纳粹领袖，还将褐衫军普通成员提升到“种族精英”的地位，他们被号召起来，根据纳粹理想改造德国社会，领导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³

本书前几章已经分析了1921年到1945年之间冲锋队的起源、成长和衰落。期间发生的故事充满了矛盾：很高的期望和持续的死亡，个人赋权与集体动员，顺应与服从的压力，自私与同志情谊，极端暴力与令人厌烦的事情。此前的冲锋队历史没有全面地理解这些矛盾。因为它们通常仅集中于冲锋队存在的一个时期，主要对该组织为纳粹掌权（而不是政权的巩固）所做的贡献感兴趣，主流的第三帝国历史则倾向于贬低冲锋队的重要性。因此，最近关于纳粹社会唯意志论与胁迫性元素或者纳粹政权殖民野心的著作往往完全不提及冲锋队。为了指出这一空白并提出填补的方法，我将总结自己分析的主要成果，讨论它们对新颖、全面的民族社会主义史的更广泛作用。

1. 正如本书最初几章所详细阐述的，第一支民族社会主义冲锋队于1920—1921年在慕尼黑成立，1923年“希特勒叛乱”时成长为规模可观的地方势力。早期的冲锋队是20世纪20年代初典型的党派保卫部队，同时具有“自卫联盟”和政治恐怖组织的元素。这支无足轻重的新生力量的社会构成中，工人阶级并不像通常声称的那么多。相反，学生和中产阶级在普

通队员中占有相当比重，他们与一小部分退役职业军人一起，在领导阶层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第一支冲锋队牢牢扎根于巴伐利亚，但随着邻近各州（如符腾堡和图林根）基层组织网络缓慢发展，主要积极分子（例如莫里斯、海内斯、克林奇和戈林）来源于德国北部和东部。从一开始，反犹太主义就成了早期冲锋队意识形态信念及暴力活动的关键元素。尽管参与反犹太暴力活动的可能性对追求刺激和目标的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但许多保守派政治家与巴伐利亚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都不重视这些年轻人的“过度行为”，而是强调冲锋队作为抵御共产党人威胁和德国社会内部和平主义倾向堡垒的重要性。因此，冲锋队从一战之后德国社会内部的裂缝中得益，同时又助长了裂缝的加深，不过，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无法挑战既有秩序，更不用说动摇国家了。

2. 1923年的未遂政变之后，国家当局禁止冲锋队活动。虽然许多地方基层组织以化名存活下来，保持着与恩斯特·罗姆的新组织“前线联盟”的松散联系，但缺乏协调，在很多情况下发展成由地方纳粹官员支配的私人武装。在这种背景下，冲锋队参谋长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于1926年发起的内部改革可以看成是集中权力的一种尝试。它们为冲锋队1928—1930年的成长和全国性突破提供了组织基础。普费弗·冯·萨洛蒙按照德国军队的模板打造褐衫军，使该组织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并建立了照顾受伤战士的体系。正是这个组织框架，使冲锋队能够应付20世纪20年代末起的大规模扩编。复兴的冲锋队宣扬一种新型的大众政治学，要求以绝对忠诚和高度的个人及财务投入，换取政治倾向、工作机会和男性社交的各种途径。事实证明，这些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更具诱惑力，此时许多男性自觉无法保持某种生活方式，支撑传统的男性地位。冲锋队提倡

的生活习惯及其形象和仪式，是这段时期该组织吸引力的关键。这种吸引力不是来自复杂的理论，而是群体及自我赋权的感觉。这种动态并没有被人们忽视，基督教会的一个重要流派试图将此能量“输送”到新的“民族使命”或基督教复兴中，同时又对冲锋队的过度暴力行为深感遗憾。德国国防军同样开始与冲锋队接触，希望将其作为缺乏义务兵役制时的新兵储备。两个组织在边境地区的合作特别密切。

3. 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从零散的小群体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像社会运动一样动员追随者，却又以紧密的等级结构运行，吸引了数十万人，这既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与奥地利充满生气和暴力的文化”的结果，也是其中的关键元素之一。⁴虽然冲锋队最初只是一种城市现象，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它已经扩张到德国乡村，促进了农村的“纳粹化”，这也是纳粹党夺取政权的一个关键步骤。30年代初，德国全境的政治冲突越来越呈现出暴力特性，使冲锋队变得更加受欢迎，不仅是因为这种环境使冲锋队队员可以“在战斗中”证明自己，还削弱了一般公众对国家垄断暴力行动的信心，在迅速增长的纳粹同情者眼中，这也证明了接受纳粹“自助”是合理的。尽管实际情况正相反，但冲锋队坚称自己的行动是纯防御性的，接受这一观点的法官和警察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成为政治冲突受害者的纳粹分子确实为数众多，但这也是该党蓄谋已久的一项策略的结果，这一策略就是在夺权的道路上牺牲其普通成员的生命。

最终，冲锋队吸引力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唤起的希望和情感。冲锋队的组织原则鼓励建立牢固的纽带，为领导人提供自尊和影响力，为普通队员提供想象中的社会力量。无论对这一时期的焦虑与恐惧，以及冲锋队的社会错位及领导问题有何评论，我们都必须强调，在队员眼中，冲锋队为

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普遍存在的（民主）代表权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而又似乎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在个人期望与民族团结似乎越来越相互排斥的一个时代，冲锋队“行动共同体”给人们一种印象，他们为现代社会的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正如以前的历史学家有时声称的那样，纳粹积极分子希望，可以在不放弃传统自由思想（通过教育与经济独立获得自决的权利）的情况下，支持一种“专注于集体、消灭小我”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相反，有些荒谬的是，大规模参与冲锋队等准军事政治运动，被视为重申男性地位的一种手段，即便这些人缺乏金融资产、家庭地位或者特殊专业及知识技能。参加准军事组织并没有被人们看作以个人身份换取新集体身份的途径。冲锋队等群众组织内的法西斯积极分子没有将自己当成个人，而是某种人格的代表。第三帝国初期，冲锋队在男学生中大受欢迎，说明“冲锋队队员是失败者”的常见印象只涵盖该组织追随者中的一部分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是如此。在物质条件困苦、民怨沸腾的时代中成长，加上年轻人理想主义与自尊，促成了灵与肉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联系。冲锋队队员确实自愿服从于救世主式的“元首”及其地方代理人，但他们期待着可观的回报。他们献身于冲锋队，不仅为自己提供了生活的方向和灵魂救赎的感觉，还赋予了领导人的权力，使他们自视为民族共同体的卫士，神圣民族的化身。⁵正是这种可憎的自命不凡，导致同时代的许多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满怀厌恶，不愿将目光投向冲锋队及其狂暴的意识形态。

4. 有些违反常识的是，冲锋队的影响力在1933年达到高潮，却也成了衰退的开端。从20世纪30年代起，社会动乱和该组织“社会主义”派系中（盘踞于德国北部与东部的工业城市）的失望情绪逐渐成为迫切的问题，

但纳粹党对此却没有全心全意地解决。相反，人们一直断言，希特勒担任总理将解决所有问题，这使许多普通队员怀有极高的期望。加上经历过多年不确定与危险局面之后的复仇渴望，这些期望转变为1933年春季的极端暴力行为。除了管理1933年关押约8万人的临时集中营之外，冲锋队还参与了标志性的公开羞辱活动，受害人（绝大部分为男性）被“女性化”，以强调褐衫军自身的（超）男性身份。犹太人特别容易成为羞辱活动的目标，即便没有遭到囚禁和拷问的人，也在当年3月与4月的全国性抵制活动中遭受苦难。尽管德国司法机关中的一些无名英雄试图（大部分都是徒劳）至少惩罚最为令人发指的罪行，但由于冲锋队领导人被任命为许多德国城市和地区的警察局长，使该组织实际上免于诉讼。

为纳粹掌权干了“脏活”的冲锋队队员们期待着接受物质与象征意义的奖赏，也确实有数十万人从旨在为失业队员提供工作的特别行动中获益，或者至少在六十多座冲锋队“辅助营”中得到庇护和少量薪金。任命冲锋队队员为辅警是特别有效的举措，这一方案将政治和就业策略融合在一起。但是，罗姆任命冲锋队“特别代表”以控制和影响德国官僚机构，对纳粹“革命”期间政治进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企图很快失败了，原因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实际因素。不过，他成功地向组织输送了数百万马克，至少在巴伐利亚成为了有影响的人物，通过密集的盟友关系网左右着地区政局。1933—1934年，全国冲锋队至少从政府得到7200万马克，其中大部分下放到地方分支机构。

5. 纳粹掌权后的数年，该党的吸引力超越了意识形态信仰。纳粹德国的社会融合必须当成“舞台化”（由该党协调的）群体经历及日常实践之间互动的产物来分析，这种融合为个人提供了情感归属感，以及追求其个人

目标的可能性。⁶我对冲锋队历史的叙述试图结合这些不同的分析角度，并研究其相互关系，更好地解释民族社会主义的暴力动员与个人吸引力。特别是1933—1934年，冲锋队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一，他们为数百万德国人提供了加入纳粹阵营、从新的政治及工作机遇中获益的机会。其二，他们激进地实施纳粹政权的分离主义政策，促进实现“反犹太虚构共识”，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赞成纳粹反犹太政策，第三帝国的人际沟通越来越假定大部分德国人理所当然地支持这种思想。⁷

虽然冲锋队在20世纪40年代继续发挥上述作用，但随着1934年夏季“长刀之夜”事件的发生，通过在该组织服务取得个人进步的希望，以及根据“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原则改革该国经济及社会的更高期望，突然之间烟消云散。这一事件之后，整个冲锋队内部的训练整合变得比大规模政治动员更为重要，特别是在纳粹政权采取其他高压政策的时候。加入许多纳粹组织中的一个，不再能保证属于“民族共同体”，而是陷入了一种永远不确定的状态。“民族同志”不得不从事表现对纳粹事业持续献身的社会活动，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对于许多冲锋队队员来说，当政治对手失败之后，这一点变得很困难，因为他们过去表现自己的手段——街头争斗、暴力活动或者滥饮及象征性占领公共空间等“男性”社交形式——越来越显得不足。

1934年罗姆及其追随者被杀，以及对反纳粹“新保守派”人士的清算，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三帝国的历史。由此开始，纳粹政权利用之前反法西斯左派为打击民族社会主义声誉而培养的“同性恋偏见”，污蔑冲锋队领导层在道德上存在问题。与此同时，它积极迎合普通冲锋队队员对秩序、“清洁”及“民族主义”道德的渴望。无论对敌对友，纳粹独裁政权都清

楚地表示，它既不尊重法律界定，也不尊重过去的政治规范。

6. 1934年之后继续参与冲锋队活动的人是非常多元化的群体，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组成。其中的“老战士”多数属于工人阶级，由于意识形态信念的原因，加上缺乏职业与社会替代物，他们仍然忠诚于冲锋队。此外，还有一些中产阶级成员，将冲锋队视为向政权表示忠诚的手段，这样他们就无须放弃射击与马术等爱好——那正是二战之间德国中产阶级男性社交的重要领域。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末加入精锐部队“统帅堂”的中下阶层及工人阶级青年则是有意选择军人生涯，接受该组织的意识形态倾向。最后，许多1938年后德国吞并及占领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加入了新建的冲锋队单位，他们将成员身份视为参与新政权并从中受益的机会。不过，随着战争的继续，冲锋队越来越多地承担警察的任务，帮助维持公共秩序，在冲锋队及其下属“防卫队”中服务从自愿奉献变成了一项义务。

7. 尽管从1934年起，冲锋队无法参与上层决策，但在纳粹政权余下的岁月中，它仍然是日常生活中强加纳粹意志的主要力量。他们是“暴力压制的工具”，自始至终“保护”德意志族群免遭“敌人”的侵害，⁸还参与维护纳粹占领及吞并地区和旧帝国后方地区的公共秩序。虽然从1939年秋季起，一百多万名冲锋队成员中的大部分都被抽调到国防军，使该组织元气大伤，但它仍继续向政权提供多种服务，直到1945年。这些服务不限于准军事教育和意识形态训练，还包括运送与看守监狱和集中营的犯人、看管强制劳工、提供在战线后秘密行动的准军事战斗部队，以及更“民用”风格的任务——德国城市遭空袭后组织清理作业，为伤兵及家人提供帮助。为了保护心目中的“精神与情感防御共同体”，⁹许多冲锋队队员继续参与可怕的暴力活动，直到第三帝国的最后几星期。

8. 20世纪30年代，纳粹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为冲锋队提供了夺回过去势力及影响力的新机遇。冲锋队扩大并协调与德国射击和马术俱乐部一起进行的准军事活动，促进德国男性平民生活的军事化，于占领苏台德及梅梅尔之前为国防军实施辅助任务，并为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提供了许多领导人。成功占领之后，它又帮助许多被占地区德意志族人与纳粹党取得联系。从1936年起，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甚至制订计划，意欲将其成员训练成有遗传价值的“武装农民”，定居德国边境地区、吞并或占领地区，通过耕地生子“捍卫”德意志民族。可是，1939年10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就任“强化德国民族性帝国专员”，严重阻碍了冲锋队的计划。虽然野心勃勃的招募行动目标从未实现，整个计划于1943年初最终搁置，但他们建设了典范性的“农业定居点”，设立德意志族冲锋队定居者训练学校，至少有数百名冲锋队队员成功地在东部德占区落脚。

9. 在南面的德国仆从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五名冲锋队高级将领于1940年底到1941年出任德国公使。战争余下的几年中，这些外交官试图在任职的国家推动第三帝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利益。虽然这些“老战士”没有表现出独特的冲锋队外交风格，但他们使整个冲锋队相信，在巴尔干建立“身穿各种颜色衬衫的国际法西斯部队”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¹⁰随着战争的推进，这种想法越来越显得天真，尤其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后，该地区的各国政府开始为第三帝国失去军事控制权后的时期做准备。最晚到1944年，冲锋队外交官已面临必败之局。

10. 以前的冲锋队历史叙述了1934年后的衰落与失败，但却遗漏了该组织历史的这些重要方面。正如本书所述，造成这种疏忽的原因之一是，上

述说法遵循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辩护策略提出的论据，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正是这些论据帮助前冲锋队队员淡化自己过去的经历。尽管对民族社会主义方方面面的研究都已经大大拓展和改善了，仍然没有人就战后对冲锋队的印象提出质疑。本书试图挑战这种既有的论述，遵循对第三帝国大众号召力的最新研究，这些研究强调，纳粹的“民族共同体”被广泛看作一个“道德共同体”或者“共同道德承诺及共同利益的准宗教团体”。¹¹本书努力地在现代德国史的更大框架内，重新校准纳粹运动政治积极分子所处的位置，笔者认为，虽然人们对冲锋队队员是无赖和政治恶棍的普遍印象没有错误，但它只涵盖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因而系统性地忽略了影响冲锋队号召力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不管是从纳粹党积极分子，还是从未必接受纳粹政权暴力策略却珍视其社会目标的德国大众角度，在想象的种族边界里坚持反资本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冲锋队都将权力赋予了数百万普通德国人，让他们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动”。它使这些人从物质上丰富自己，同时与阶级优越感做斗争，最为重要的是，使他们自视为民族共同体的宝贵一员。1934年夏季之后，这种赋权感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并从1945年后直到今日，一直影响着许多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记忆。

注 释

从<https://www.homes.uni-bielefeld.de/dsiemens/bibliography.pdf>可以下载完整的参考书目。

1. 鲍里斯·帕斯特纳克给瓦拉姆·萨拉莫夫的信（1952年7月9日），见：Boris Pasternak,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s prilozheniiami*, vol. 9, ed. E. B. Pasternak and E. V. Pasternak (Moscow: Slovo, 2005), pp. 684–690, here p. 686.

2. Wolfgang Sofsky, *Traktat über die Gewal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5 [1996]), p. 10.

前 言

1. August Scholtis, *Ostwind: Ein schlesischer Schelmenroman* (Munich: dtv, 1986 [1931]), p. 275.

2. 与这个案例有关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Pietczuch”或者“Pietzuch”的拼写法。

3. 除非另做说明，如下叙述的事实来自：APK (Archiwum Państwowe w Katowicach), akt nr 15/28 Starostwo Powiatowe w Gliwicach (Politische Angelegenheiten, 1928–1933), vol. 5, pp. 334–345: Bill of Indictment of the Senior Prosecutor in Beuthen, 14 August 1932; Richard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0:3 (1977), pp. 241–254; Paul Kluge, ‘Der Fall Potempa (Dokumentation)’,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 (1957), pp. 279–297; Gunther Schmerbach, *Der Kampf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gegen Faschismus und Kriegsgefahr im Bezirk Oberschlesien 1932/33*, diss.,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1957, pp. 104–127; 以及自由主义报纸《福斯日报》（柏林）的报道。

4. 谋杀当晚的更多细节也可参见：“Raus aus dem Bett, Ihr verfluchten Kommunisten!”, *Sozialistische Arbeiter-Zeitung* (hereafter *SAZ*) (Breslau), 12 August 1932; ‘Nine Nazis on Trial’, *The Times* (London), 22 August 1932, p. 9.

5. 引用于：‘So wurde Pietzuch ermordet’, *SAZ* (Breslau), 26 August 1932, <http://library.fes.de/breslau/sozialistische-arbeiterzeitung/pdf/1932/1932-192.pdf>. 另见：Kluge, ‘Der Fall Potempa’, p. 291.

6. APK, akt nr 15/28, vol. 5, pp. 333–334: ‘Letter from the Landjägerhauptmann Seeliger to the Landrat in Gleiwitz’, 15 August 1932;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p. 248; Schmerbach, *Der Kampf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p. 109.

7. 当然，所有涉及的党派都将自己描述为受害者，只是对其他党派的暴力行动做出反应。在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这一方面，对比阅读纳粹与共产党对波滕帕事件的宣传是很有启发性的：Gerhard Pantel, *Potempa-Beuthen: Ein Signal für alle deutschen Deutschen* (Munich: Eher, 1932); Robert Venzlaff, *Der Schuldige . . . Die Mordnacht von Potempa*, ed. Rote Hilfe (Berlin: Tribunal Verlag, 1932).

8. 'Rückblick auf eine Woche "Burgfrieden"', *CV-Zeitung*, 15 August 1932, pp. 1–2.

9.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p. 243; Marjorie Lamberti,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chool Reform in Weimar Germany*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2002), p. 228.

10. 参见：Reichsgesetzblatt 1932, vol. 1, no. 54 (9 August 1932), pp. 403–404.

11. 魏玛共和国最后阶段的情况，可参见：Dirk Blasius, *Weimars Ende: Bürgerkrieg und Politik 1930–1933*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5); 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p. 231–308; Detlev J. K. Peukert, *Die Weimarer Republik: 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7), pp. 243–265. 关于冲锋队在上西里西亚的暴力行为，参见：Richard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25–193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75–96.

12. Joseph Goebbels,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vol. 2/2 (Munich: K. G. Saur, 2004), p. 336.

13. APK, akt nr 15/28, vol. 5, pp. 334–345, here pp. 334–345: Bill of Indictment of the Senior Prosecutor in Beuthen, 14 August 1932.

14.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p. 248.

15. 同上，p. 249。

16. Henning Grunwald, *Courtroom to Revolutionary Stage: Performance and Ideology in Weimar Political Tri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68.

17. 同上，p. 169。

18.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p. 246.

19. Kluge, 'Der Fall Potempa', p. 288.

20. 纳粹的宣传及冲锋队律师吕特格布鲁内在法庭上的陈词强调，彼得楚赫在一战之后的几年里多次“出卖”上西里西亚德国人，将非法武器藏匿点透露给法国当局，并威胁那些决心在1921年3月公投中为德国投票的人。而为“工人、共产党人”彼得楚赫辩护的左派激进分子则称，同样是这个关键的年头，他曾在家乡波滕帕勇敢地支持居于少数派地位的德国人，对抗波兰人的暴动。参见：Pantel, *Potempa-Beuthen*, pp. 9–13; Venzlaff, *Der Schuldige*, p. 4.

21. 1936年，拉赫曼因诈骗和伪证罪被判处7年刑期，1940年，纳粹大区法庭对他的两项偷猎罪名做出判决；Sopad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 in exil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3 (1936), p. 239;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pp. 245–246.

22. Venzlaff, *Der Schuldige*, p. 4.

23. Kluge, 'Der Fall Potempa', p. 287.

24. 'Fünf Todesurteile in Beuthen', *Vossische Zeitung*, 23 August 1932, p. 1.

25. 'Nine Nazis on Trial', p. 9. See also Goebbels' s diary entry from 23 August 1932: 'In Beuthen 5 Todesurteile gegen unsere Leute. Das Ungeheuerlichste, das auszudenken ist. Die Regierung wird nicht

wagen, sie zu vollstrecken'; Goebbels,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vol. 2/2, p. 346.

26. 'Nazi Death Sentences', *The Times* (London), 23 August 1932, p. 10; 'Five Nazis to Die: Sentences at Trial',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23 August 1932, p. 9; 'Krawalle nach dem Urteilsspruch', *Vossische Zeitung*, 23 August 1932, p. 3.

27. 引用于: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vol. 1: *The Years 1932–1934* (London: I. B. Tauris, 1990), p. 160.

28. 'Five Nazis to Die', p. 9.

29. BArch Berlin (Bundesarchiv Berlin), NS 26/2515: Letter from Landeskriminalpolizeiamt Berlin to the Police President Bielefeld, May 1931; BArch Berlin, NS 26/1348: 'Fememörder Heines als MdR', *Vorwärts*, 5 October 1930.

30. Adolf Hitler, telegram to August Gräupner, Reinhold Kottisch, Paul Lachmann, Helmuth–Josef Müller, and Rufin Wolnitza, in Adolf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vol. 5: *Von der Reichspräsidentenwahl bis zur Machtergreifung. April 1932–Januar 1933. Part 1: April 1932–September 1932*, ed. Klaus A. Lankheit (Munich: Saur, 1996), p. 317.

31. Kluge, 'Der Fall Potempa', p. 284;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p. 251.

32. Adolf Hitler, 'Nationalisten! Deutsche!',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4 August 1932, as quoted in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vol. 1, pp. 159–160. 希特勒早在1922年就曾以类似的措辞, 为以国家为名的不道德政治行为辩护; 参见: BayHStA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München), MInn (Ministerium des Innern), no. 81594: 'Die Maischlacht Hitlers', *Bayerischer Kurier*, 3 May 1923.

33. 值得注意的是, 戈培尔在之后几年多次使用这一措辞; 例如他臭名昭著的文章《模仿》, 发表于1941年7月20日的纳粹报纸《帝国》。参见: Saul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vol. 2: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London: Phoenix, 2008), p. 204.

34. Joseph Goebbels, 'Die Juden sind schuld!', *Der Angriff*, 24 August 1932, pp. 1–2.

35. 有趣的是, 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指责纳粹对手是原波兰叛乱分子; 参见: 'Der 'Märytrer'', *Vossische Zeitung*, 4 November 1932, p. 6.

36. 根据官方统计, 1932年普鲁士各省份的政治暴力事件导致155人死亡。其中55人是纳粹党员, 54人属于共产党, 12人是“帝国战旗”组织或者社会民主党成员; 参见: Dirk Schumann, 'Political Violence, Contested Public Space, and Reasserted Masculinity', in *Weimar Publics / Weimar Subjects*, ed. Kathleen Canning and Kerstin Barndt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0), pp. 236–253, here p. 244.

37. 最无耻的此类歪曲参见: Pantel, *Potempa-Beuthen*.

38. IfZ Archive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Archiv, Munich), ED 414 (Herbert Frank), vol. 181: Joachim Leo, 'Beuthen!', *Schlesischer NS-Beobachter* (Breslau), 3 September 1932.我对柏林的马塞尔·克吕格尔心存感激, 他帮助我翻译了这首诗, 以及本书的其他诗歌。

39. 'Five Nazis to Die', p. 9.

40. 这是纳粹报纸《汉堡晚报》的逻辑，引用于：‘Why Nazi Newspaper was Suppressed’,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26 August 1932, p. 9.

41. Alfred Rosenberg in *Der Völkische Beobachter*, as quoted in ‘Killing Not Murder’,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27 August 1932, p. 15.

42. Goebbels,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I: Aufzeichnungen 1923–1941*, vol. 2/2 (Munich: K. G. Saur, 2004), pp. 346–347.

43. ‘Defence of the Nazi Murderers’,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24 August 1932.

44.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p. 252.

45. 概要情况可以参见：Robert Gerwarth and John Horne, ‘Vectors of Violence: Paramilitarism in Europe after the Great War, 1917–192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3:3 (2011), pp. 489–512.

46. Kluke, ‘Der Fall Potempa’, p. 292.

47. 同上，P.287；GSt PK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I. HA, Rep. 77 titl. 4043, vol. 311, p. 325; Racliffe (Polizeimajor), ‘Denkschrift über Kampfvorbereitung und Kampfgrundsätze radikaler Organisationen’ [1931].

48. 关于这一政治背景，可参见：Enno Eimers, ‘Oberschlesien während der Unruhen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Geschichte, Öffentlichkeit, Kommunikation: Festschrift für Bernd Sösemann zum 65. Geburtstag*, ed. Patrick Merziger (Stuttgart: Steiner, 2010), pp. 383–404; Dawid Smolorz, ‘Die deutsch–polnische Grenze in Oberschlesien 1922–1939’, in *Granica: Die deutsch–polnische Grenze vom 19. bis zum 21. Jahrhundert*, ed. Karoline Gil and Christian Pletzing (Munich: Meidenbauer, 2010), pp. 75–86; Bernard Sauer, ‘“Auf nach Oberschlesien”. Die Kämpfe der deutschen Freikorps 1921 in Oberschlesien und den anderen ehemaligen deutschen Ostprovinze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8 (2010), pp. 297–320; Kai Struve (ed.), *Oberschlesien nach den Ersten Weltkrieg: Studien zu einem nationalen Konflikt und seiner Erinnerung* (Marburg: Herder–Institut, 2003); Karsten Eichner, *Briten, Franzosen und Italiener in Oberschlesien, 1920–1922: Die Interalliierte Regierungs- und Plebiszitkommission im Spiegel der britischen Akten* (St Katharinen: Winkel Stiftung, 2002); Ralph Schattkowsky, *Deutschland und Polen von 1918/19 bis 1925*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4); Günther Doose, *Die separatistische Bewegung in Oberschlesi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1918–192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7).

49. C. A. Macartney and A. W.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62), pp. 105–106.

50. 第一次起义发生于1919年8月16–24日；第二次发生在1920年8月19–28日；第三次则发生在1921年5月3日和7月初。波兰人的“再波兰化”努力参见：Richard Blake, ‘Interwar Poland and the Problem of Polish–Speaking Germans’, in *The Germans and the East*, ed. Charles W. Ingrao and Franz A. J. Szabo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62–263.

51. Sauer, ‘“Auf nach Oberschlesien”’, pp. 302–303; Daniel Schmidt, ‘Der SA–Führer Hans Ramshorn. Ein Leben zwischen Gewalt und Gemeinschaft (1892–193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0:2 (2012), pp. 201–235, here p. 228. 许多自由军团领导人后来加入了冲锋队，特

别是来自这些边境地区的上层人士；参见：Stephan Malinowski and Sven Reichardt,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 Adelige im Führungskorps der SA bis 1934', in *Adel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ed. Eckart Conze and Monika Wienfort (Cologne: Böhlau, 2004), pp. 119–150, here pp. 126–128, 138–142. 启发性的案例研究参见：Kai Langer, 'Der "Fall Flotow" – vom Aufstieg und Fall eines mecklenburgischen SA-Führers', *Zeitgeschichte regional: Mitteilungen aus Mecklenburg-Vorpommern* 7:2 (2003), pp. 5–13.

52. 更多的参考信息参见：Irmela Nagel, *Fememord und Fememordprozes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Böhlau, 1991).

53. Sauer, ' "Auf nach Oberschlesien" ', pp. 308–309, 316.

54. Idem, ' "Verräter waren bei uns in Mengen erschossen worden" : Die Fememorde in Oberschlesien 1921',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4:7/8 (2006), pp. 644–662, here p. 645.

55. Archive of *Der Spiegel*, Hamburg (hereafter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124: Bill of indictment of the Reich Prosecutor against Alfred Hoffmann, Manfred von Killinger, and others, 16 May 1922.

56. 细节参见：Hagen Schulze, *Freikorps und Republik 1918–1920*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Verlag, 1969), pp. 214–235. 最新的研究强调，这种普遍的推测与“现实”不符，参见：Rüdiger Bergien, *Die bellizistische Republik: Wehrkonsens und 'Wehrhaftmach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Munich: Oldenbourg, 2012), esp. pp. 355–406.

57. 这一点可以参见马蒂亚斯·施普伦格的杰出研究著作：Matthias Sprenger, *Landsknechte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Zur Genese und Wandel des Freikorpsmythos*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8).

58. 根据基林格的说法，出于“巩固并加强”德国民族性的渴望，与波兰人在上西里西亚的争斗直接预示着，到1934年，“阿道夫·希特勒的使命”已经成为“我们泛德意志人命运”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参见：Manfred von Killinger, *Kampf um Oberschlesien 1921: Bisher unveröffentlichte Aufzeichnungen des Führers der 'Abteilung v. Killinger' genannt 'Sturmkompanie Koppe'* (Leipzig: K. F. Koehler, 1934), p. 124. 另见：Klaus Gundelach, 'Der Opferweg zum Sieg', in *Vom Kampf und Sieg der schlesischen SA: Ein Ehrenbuch*, ed. SA–Gruppe Schlesien (Breslau: Korn, 1933), pp. 11–15.

59.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242: Report of the Oberster SA–Führer to the SA–Gruppenführer, Munich, 28 August 1931.

60. Lisa Pine,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10), p. 15.

61. Lamberti, *Politics of Education*, pp. 221–226.

62. 下面是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Stefan Dölling,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walttätigkeit – die SA und die "Sudetenkrise"', in *Bürgerkriegsarmee: Forschung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urmabteilung (SA)*, ed. Yves Müller and Reiner Zilkenat (Frankfurt am Main: Lang, 2013), pp. 241–263; Bergien, *Die bellizistische Republik*; Schmidt, 'Der SA–Führer Hans Ramshorn', pp. 227–229.

63. 详见本书第6章。关于德国边境作为纳粹罪行“温床”的重要性，参见：Michael Mann, *Die dunkle Seite der Demokratie: Eine Theorie der ethnischen Säuberung*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7), pp. 329–336, 351.

64. 他们的获释发生在“民族革命先驱”大赦的背景下。参见：Kluke, 'Der Fall Potempa', p. 286; Blasius, *Weimars Ende*, p. 95.

65. 'Making Murderers into Heroes',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3 October 1933, p. 9.

66. August Scholtis, *Ein Herr aus Bolatitz: Lebenserinnerungen* (Munich: List, 1959), p. 10.

67. Timothy D.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68. Ian Kershaw, *The End: Hitler's Germany, 1944–1945* (London: Penguin, 2011), p. 208.

69. Peter Fritzsche, 'Review: Did Weimar Fail?',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8:3 (1996), pp. 629–56; Moritz Föllmer and Rüdiger Graf (eds), *Die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5).

70. 魏玛共和国末期政治暴力的详细讨论参见第3章。

71. Reinhard Sturm, 'Zerstörung der Demokratie 1930–1932',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no. 261, <http://www.bpb.de/geschichte/nationalsozialismus/dossier-nationalsozialismus/39537/zerstoerung-der-demokratie?p=all>.

72. RGVA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yi arkhiv),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140–142, here p. 141: Badisches Landespolizeiamt, 'Die SA und die SS der NSDAP', Karlsruhe, 15 May 1931.

73. 冲锋队的这些特性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在后续的章节中详细讨论，相关的专业文献将在那里注明。因此，前言的注释仅限于主要介绍冲锋队历史或者涉及方法论问题的著作。

74. 例如，可参见：Peter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Munich: Beck, 2003), pp. 284–285; Conan Fischer, *Stormtroopers: A Social,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1929–1935*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 p. 225; Rudy Koshar, *German Travel Cultures*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0), p. 137; Dorothee Hochstetter, *Motorisierung und 'Volksgemeinschaf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Kraftfahrkorps (NSKK), 1931–1945* (Munich: Oldenbourg, 2006), p. 73.

75. Lewis A. Coser, *Greedy Institutions: Patterns of Undivided Commit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4), pp. 4–6.

76. 参见：Alfons Bora, '“Partizipation” als politische Inklusionsformel', in *Inklusion und Partizipation: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im historischen Wandel*, ed. Christoph Gusy and Heinz-Gerhard Haupt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5), pp. 15–34, esp. pp. 24–27, 33.

77.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 and Progressive Self-Destruction as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ed.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5–87.

78. Sven Keller, *Volksgemeinschaft am Ende: Gesellschaft und Gewalt 1944/45* (Munich: Oldenbourg, 2013); Ian Buruma,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Cord Arendes, Edgar Wolfrum, and Jörg Zedler (eds), *Terror nach Innen: Verbrechen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6); Patrick Wagner, 'Die letzte Schlacht der "alten Kämpfer".'

Isolation, Vergemeinschaftung und Gewalt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ktivisten in den letzten Kriegsmonaten 1945', *Mittelweg* 36:4 (2015), pp. 25–50.

79. 米夏埃尔·鲁克的民族社会主义史参考书目第二版于2000年出版，包含了大约37000种图书；Michael Ruck, *Bibliographi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2 vol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0)。因此，较新的书目通常只涵盖这一主题的某些方面，以便至少实现局部的完整性。参见：Janosch Steuwer, 'Was meint und nützt das Sprechen von der "Volksgemeinschaft"? Neuere Literatur zur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53 (2013), pp. 487–534; Christoph Nonn,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Geschichte: Neuere Literatur zum Umgang mit der NS-Vergangenheit in Deutschland',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49:3 (2003), pp. 407–426; Birthe Kundrus, 'Widerstrebende Geschichte: Ein Literaturbericht zur Geschlechter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45:1 (2000), pp. 67–92.

80. 参见：Conan Fischer and Detlef Mühlberger, 'The Pattern of the SA's Social Appeal', in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Weimar Germany*, ed. Conan Fischer (New York: Berghahn, 1996), pp. 99–113; Detlef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Nazi Mov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59–180, 202–209; Peter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unich: Beck, 1989), pp. 81–88; Michael H. Kater,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81. 这方面的典范是：Claus-Christian W. Szejnmann, *Nazism in Central Germany: The Brownshirts in 'Red' Saxony* (New York: Berghahn, 1999); Otis C. Mitchell, *Hitler's Stormtroopers and the Attack on the German Republic, 1919–1933* (Jefferson, NC,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2008); Thomas D. Grant, *Stormtroopers and Crisis in the Nazi Movement: Activism, Ideology and Diss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Fischer, *Stormtroopers*. 原民族社会主义者威尔弗雷德·冯·奥芬提供的冲锋队史同样止于1934年，但与上述图书不同，这本书令人失望。它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表达了一名无可救药的纳粹分子的观点：Eleanor Hancock (ed.), *Hitler's Storm Troopers: A History of the SA. The Memoirs of Wilfred von Oven* (London: Frontline, 2010).

82. Ernst Niekisch, *Das Reich der niederen Dämonen* (Hamburg: Rowohlt, 1953), p. 115.

83. Joachim C. Fest, 'Ernst Röhm und die verlorene Generation', in his *Das Gesicht des Dritten Reiches: Profile einer totalitären Herrschaft* (Munich and Zurich: Piper, 1993 [1963]), pp. 190–206, here p. 195.

84. Hans Buchheim, 'Befehl und Gehorsam', in *Anatomie des SS-Staates*, ed. Hans Buchheim, Martin Broszat, Hans-Adolf Jacobsen, and Helmut Krausnick (Munich: dtv, 1999 [1967]), pp. 213–320, here p. 220.

85.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on Rosenbaum* (New York and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1), p. 120.

86. GSt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vol. 311, p. 319: Racliffe (Polizeimajor), 'Denkschrift über Kampfvorbereitung und Kampfgrundsätze radikaler Organisationen' [1931].

87. Karl Otto Paete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urmabteilunge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6:1 (1965), pp. 103–105, here p. 104; Karl Otto Paetel (ed.), *Beat: Eine Anthologi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62).

88. 参见埃德加·沃尔夫鲁姆的纲要：Edgar Wolfrum, *Die geglückte Demokrat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Pantheon, 2007), pp. 169–186; Axel Schildt and Detlef Siegfried (eds),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Die Bundesrepublik – 1945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Hanser, 2009), pp. 46–57, 130–152.

89. Peter Merkl, *The Making of a Stormtroop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idem,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Mathilde Jamin, *Zwischen den Klassen: Zur Sozialstruktur der SA-Führerschaft* (Wuppertal: Peter Hammer, 1984); idem, 'Zur Rolle der SA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in *Der Führerstaat: Mythos und Realität. Studien zur Struktur und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ed. Gerhard Hirschfeld and Lothar Kettenacker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1), pp. 329–360;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90. 关于城市的“暴力共同体”参见：Sharon Bäcker-Wilke, Florian Grafl, and Friedrich Lenger, 'Gewaltgemeinschaften im städtischen Raum. Barcelona, Berlin und Wien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in *Gewaltgemeinschaften: Von der Spätantike bis ins 20. Jahrhundert*, ed. Winfried Speitkamp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3), pp. 317–341.

91. Sven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Gewalt und Gemeinschaft im italienischen Squadrismus und in der deutschen SA* (Cologne: Böhlau, 2009). See also Sven Reichardt, 'Praxeologie und Faschismus. Gewalt und Gemeinschaft als Elemente eines praxeologischen Faschismusbegriffs', in *Doing Culture: Neue Positionen zum Verhältnis von Kultur und Praxis*, ed. Karl H. Hörning and Julia Reuter (Bielefeld: transcript, 2004), pp. 129–153; idem, 'Zeithistorisches zur praxeolog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Arndt Brendecke (ed.), *Praktiken der Frühen Neuzeit: Akteure – Handlungen – Artefakte* (Cologne: Böhlau, 2015), pp. 46–61; and the contributions in Stefan Hördler (ed.), *SA-Terror als Herrschaftssicherung: 'Köpenicker Blutwoche' und öffentliche Gewal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Metropol, 2013). 关于被作为编史方法的行为学，参见托马斯·维尔斯科普的开创性文章：Thomas Welskopp, 'Der Mensch und die Verhältnisse: "Handeln" und "Struktur" bei Max Weber und Anthony Giddens', in *Geschichte zwische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Theoriedebatte*, ed. Thomas Welskopp and Thomas Mergel (Munich: Beck, 1997), pp. 39–70, 以及西尔玛·沙费尔的最新著作：Hilmar Schäfer, 'Einleitung: Grundlagen, Rezeption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 der Praxistheorie', in *Praxistheorie: Ein soziologisches Forschungsprogramm*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6), pp. 9–25; Dagmar Freist, 'Historische Praxeologie als Mikro-Historie', in Brendecke (ed.), *Praktiken der Frühen Neuzeit*, pp. 62–77.

92. Irene Mayer-von Götz, *Terror im Zentrum der Macht: 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 (Berlin: Metropol, 2008); Kim 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 Jewish Prisoners in the Prewar Concentration Cam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Benjamin C. Hett, *Crossing Hitler: The Man Who Put Hitler in the Witness St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Daniel

Siemens, *The Making of a Nazi Hero: The Murder and Myth of Horst Wessel* (London: I. B. Tauris, 2013). 第4章详细讨论了涉及或者至少包含1933–1934年冲锋队相关信息的区域研究。

93. 参见: Astrid Gehrig, *Im Diens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tumspolitik in Lothringen: Auf den Spuren meines Großvaters* (Essen: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4); Dörte von Westernhagen, *Von der Herrschaft zur Gefolgschaft: Die von Westernhagens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V&R, 2012); Malte Ludin, 'Hanns Elard Ludin', in *Stuttgarter NS-Täter: Vom Mitläufer bis zum Massenmörder*, ed. Hermann G. Abmayr (Stuttgart: Abmayr, 2009), pp. 30–39.

94. 除了克劳斯·特韦雷特分为两卷的开创性著作*Male Fantasies* (Cambridge: Polity, 1987/8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77/8]) 之外, 还可以参见: Paula Diehl, *Macht – Mythos – Utopie: Die Körperbilder der SS-Männer* (Berlin: Akademie, 2005); Sabine Behrenbeck, *Der Kult um die toten Hel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ythen, Riten und Symbole* (Vierow bei Greifswald: SH-Verlag, 1996); 以及《中欧历史》第46期(2013年)特刊的最新投稿: Timothy S. Brown, 'The SA in the Radical Imagination of the Long Weimar Republic', pp. 238–274; Bruce Campbell,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Nazi Storm Troopers. Autobiographies of Violence: The SA in its Own Words', pp. 217–237; and Andrew Wackerfuss, 'The Myth of the Unknown Storm Trooper: Selling SA Stories in the Third Reich', pp. 298–324.

95. 参见米勒与齐尔克纳特的著作*Bürgerkriegsarmee*, 以及我在《德国历史》32:1期第153–154页对该书的评论; 以及Szejnmann, *Nazism in Central Germany*. 关于冲锋队与教会的关系, 参见: Ernst Klee, 'Die SA Jesu Christi': *Die Kirche im Banne Hitler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9); Manfred Gailus, *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urchdringung des protestantischen Sozialmilieus in Berlin* (Cologne: Böhlau, 2001); Richard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oris L. Bergen, *Twisted Cross: The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Derek Hastings, *Catholicism and the Roots of Nazism: Religiou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Manfred Gailus and Daniel Siemens (eds), 'Hass und Begeisterung bilden Spalier': *Horst Wessels politische Autobiographie* (Berlin: be.bra, 2011). 关于冲锋队与同性恋, 参见: Andrew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Homosexual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Early Nazi Movement*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2015); Alexander Zinn, 'SA, Homosexualität und Faschismus. Zur Genese des Stereotyps vom schwulen Nazi', in *Bürgerkriegsarmee*, ed. Müller and Zilkenat, pp. 393–413; Hans Rudolf Wahl, '“National-Päderasten?” Zur Geschichte der (Berliner) SA-Führung 1925–1934',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6:5 (2008), pp. 442–459; Hans Rudolf Wahl, 'Männerbünde, Homosexualitäten und politische Kultur im ersten Drittel des 20. Jahrhunderts. Überlegungen zur Historiographie der SA',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2:3 (2004), pp. 218–237; Sven Reichardt, 'Homosexualität und SA-Führer: Plädoyer für eine Diskursanalys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2:8 (2004), pp. 737–740.

96. 我们咨询的档案馆主要在德国, 但一些档案材料得自远至莫斯科、萨格勒布及加州斯坦福大学的机构, 部分原因是历史进程(例如, 波兰社会学家特奥多尔·阿贝尔收集的1933–1934年纳

粹分子自传引人注目，他已经移民美国；萨克森冲锋队档案材料的很大一部分于1945年被苏军缴获，目前保存在莫斯科）；但这也是1934年后的冲锋队史逐渐变成国际事务的结果，这一转变不仅因为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的扩张，还因为纳粹在二战期间统治着中东欧大部分地区。

97. Bruce Campbell, 'The SA after the Röhm Purg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8:4 (1993), pp. 659–674. Among the exceptions: Ives Müller, 'Wilhelm Schepmann – der letzte SA–Stabschef und die Rolle der SA im Zweiten Weltkrieg',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63:6 (2015), pp. 513–532; Daniel Siemens, 'Dem SA–Mann auf der Sp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rinnerungspolitik im Berlin der 1930er Jahre', in *SA–Terror als Herrschaftssicherung*, ed. Hördler, pp. 147–163.

98. Armin Nolzen, 'Die NSDAP, der Krieg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vol. 9/1, ed. Jörg Echternkamp (Munich: DVA, 2004), pp. 99–193, here p. 103. 诺尔岑给出的准确数字是1329448人。但是，由于冲锋队组织及行动区域不断变化，后期冲锋队成员人数的所有估算只能是约数。

99. 关于德国“民族共同体”概念分析价值的广泛史学争论，参见：Martina Steber and Bernhard Gotto (eds), *Visions of Community in Nazi Germany: Social Engineering and Private L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Steuwer, 'Was meint und nützt das Sprechen von der 'Volksgemeinschaft'?'; Dietmar von Reeken and Malte Thießen (eds), 'Volksgemeinschaft' als soziale Praxis: Neue Forschungen zur NS-Gesellschaft vor Ort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3); Detlef Schmichen–Ackermann (ed.), 'Volksgemeinschaft': Mythos, wirkungsmächtige soziale Verheißung oder soziale Realität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2); Frank Bajohr and Michael Wildt (eds), *Volksgemeinschaft: Neue Forschungen zur Gesell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9).

100. 随着盛行的“强迫性后民族史学”日益挑战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提出关于这些主题重要性的新问题，我们更有必要采取这种宽阔的视野。第三帝国比以往更加“历史化”，意味着史学家们不仅试图确定它在狭义的德国国家历史中的地位，而且要将其放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广阔背景下研究：Ulrich Herbert, 'Nach dem Postnationalism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ransformation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Hans–Ulrich Wehler und der Wandel der akademischen Felder seit den 1960er Jahren', Bielefeld, 10–12 September 2015.

101. 参见汉斯·沙弗劳奈克的开创性著作：Hans 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Die Österreichische Legion 1933–1938* (Vienna: Czerzin, 2011); and his *Sommerfest mit Preisschießen: Die unbekannte Geschichte des NS-Putsches im Juli 1934* (Vienna: Czernin, 2006).

102. Dietrich Beyrau, 'Eastern Europe as a "Sub–Germanic Space": Scholarship on Eastern Europ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3:3 (2012), pp. 685–723; Rolf–Dieter Müller, *Hitlers Ostkrieg und die deutsche Siedlungspolitik: Die Zusammenarbeit von Wehrmacht, Wirtschaft und S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1); Valdis O. Lumans, *Himmler's Auxiliaries: The Volksdeutsche Mittelstelle and the German National Minorities of Europe, 1933–1945*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2); Michael A. Hartenstein, *Neue Dorflandschaft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iedlungsplanung in den 'eingegliederten Ostgebieten' 1939 bis 1944* (Berlin: Dr. Koster, 1998); Isabel Heinemann, 'Rasse, Siedlung, deutsches Blut': *Das Rasse- und Siedlungshauptamt der SS und die rassenpolitische Neuordnung Europas*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3); Isabel Heinemann and Patrick Wagner (eds), *Wissenschaft – Planung – Vertreibung: Neuordnungskonzepte und Umsiedlungs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Stuttgart: Steiner, 2006); Markus Lenig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tumsarbeit' und Umsiedlungspolitik 1933–1945: Von der Minderheitenbetreuung zur Siedlerauslese* (Berlin: Frank & Timme, 2006); Gerhard Wolf, *Ideologie und Herrschaftsrationalitä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Germanisierungspolitik in Polen*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12).

103. Christian Gerlach,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örg Baberowski, *Verbrannte Erde: Stalins Herrschaft der Gewalt* (Munich: Beck, 2012); Donald Bloxham and Dirk A. Mos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enocide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Arjun Appadurai, *Fear of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4. 参见: Georg Elwert, 'Gewaltmärkte: Beobachtungen zur Zweckrationalität der Gewalt', in *Soziologie der Gewalt*, ed. Trutz von Trotha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7), pp. 86–101, esp. pp. 87–91.

105. Jan Philipp Reemtsma, 'Gewalt als attraktive Lebensform betrachtet', *Mittelweg* 36 24:4 (2015), pp. 4–16, here pp. 12–14.

106. 关于“以暴力为乐”，参见兰德尔·柯林斯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著作: Randall Collins, *Violence: A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 (Princeton, NJ,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42–281.

107.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l. 1 (Berlin: Dietz, 1983), p. 779; Friedrich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in *Marx-Engels- Werke*, vol. 20 (Berlin: Dietz, 1962), pp. 1–303, here p. 171; both as quoted in Felix Schnell, '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 version 1.0, *Docupedia-Zeitgeschichte*, 8 November 2014, http://docupedia.de/zg/Gewalt_und_Gewaltforschung, p. 7.

108. Reemtsma, 'Gewalt als attraktive Lebensform betrachtet', pp. 12–14. 另见如下创新研究: Collins, *Violence*; Peter Imbusch, *Moderne und Gewalt: Zivilisationstheoretische Perspektiven auf das 20. Jahrhundert* (Wiesbaden: VS Verlag, 2005); Hans Joas, *War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2003); Sofsky, *Traktat über die Gewalt*; Heinrich Popitz, *Phänomene der Macht*, 2nd edn (Tübingen: Siebeck, 1992), esp. pp. 43–78.

109. 关于“动员”成为第三帝国社会动态研究关键概念的说明，参见: Oliver Werner, 'Mobil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 eine Einführung', in *Mobil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stitutionen und Regionen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und der Verwaltung des 'Dritten Reiches' 1936 bis 1945*, ed. Oliver Werner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3), pp. 9–26; Jürgen John, 'Mobilisierung als Charakteristikum des NS-Systems?', in Werner, *Mobil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p. 29–57. 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纪律”的重要性，可参见：Ulrich Bröckling, *Disziplin: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militärischer Gehorsamsproduktion* (Munich: Fink, 1997), pp. 241–271.

110. 关于暴力史这一蓬勃发展领域的最新调查文章，参见：Schnell, '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 Jan C. Behrends, 'Gewalt und Staatlichkeit im 20. Jahrhundert: Einige Tendenzen zeithistorischer Forschung',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58 (2013), pp. 39–58; Elissa Mailän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Gewalt: Ein interdisziplinäres Handbuch*, ed. Christian Gudehus and Michaela Christ (Stuttgart and Weimar: Metzler, 2013), pp. 323–231; Maike Christadler, 'Gewal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 Positionen der Forschung', *Gesnerus* 64 (2007), pp. 231–245.

111. Ernst Nolte, *Der Europä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Frankfurt am Main: Propyläen, 1987); Enzo Traverso, *Im Bann der Gewalt: Der Europäische Bürgerkrieg* (Munich: Siedler, 2007).

112. Michael Mann, *Fasc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quotation on p. 353. From the recent literature, see António Costa Pinto and Aristotle Kallis (eds), *Rethinking 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António Costa Pinto (ed.), *Rethinking the Nature of Fasc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Roger Griffin, *Modernism and Fascism: The Sense of a Beginning under Mussolini and Hitler*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同时参见Ernst Nolte的前沿研究： *Three Faces of Fascism: Action Francaise, Italian Fascism,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113. Chris Millington and Kevin Passmore (ed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Democracy in Western Europe, 1918–194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Donald Bloxham and Robert Gerwarth (eds), *Political Viol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Enzo Traverso, *L'histoire comme champ de bataille: Interpréter les violences du XXe siècle*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12); Alf Lüdtke and Bernd Weisbrod (eds), *No Man's Land of Violence: Extreme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6); Bernd Weisbrod, 'Gewalt in der Politik.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3 (1992), pp. 391–404.

114. 对这场辩论的批判性与对照性总结，参见：Geoff Eley, *Nazism as Fascism: Violence, Ideology, and the Ground of Consent in Germany 1930–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98–225; Jürgen Kocka, 'Nach dem Ende des Sonderweges. Zur Tragfähigkeit eines Konzepts', in *Die Bielefelder Sozialgeschichte: Klassische Texte zu einem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Programm und seinen Kontroversen*, ed. Bettina Hitzer and Thomas Welskopp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0), pp. 263–275.

115. 参见弗里德兰德的分析：Saul Friedländer, *pars pro toto,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 vol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2007).

116. 安德烈亚斯·维尔纳最先提出类似的分类：Andreas Werner, SA und NSDAP: 'Wehrverband', 'Parteitruppe' oder 'Revolutionsarme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SA und der NSDAP 1920–1933*, diss., Friedrich Alexander Universität zu Erlangen–Nürnberg, 1964. 这本书仍然是冲锋队早期组织史的主要参考书。

117. 赖夏特在他的著作中说明了自己的方法论: 'Praxeologie und Faschismus', pp. 129–135.

118. 同上, P.136,141;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22–26。挑战赖夏特的观点时, 我依靠的是沙茨基等人提出的基于实践的理论方法: Theodore R. Schatzki, *Social Practices: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to Human Activity and the Soci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idem, 'Practice Mind—ed Orders', in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ed. Theodore R. Schatzki, Karin Knorr Cetina, and Eike von Savign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42–55.

119. Gertrud Nunner-Winkler, 'Überlegungen zum Gewaltbegriff', in *Gewalt: Entwicklungen, Strukturen, Analyseprobleme*, ed. Wilhelm Heitmeyer and Hans-Georg Soeffn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4), pp. 21–61, here pp. 21–24; Schnell, '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 pp. 1–3, with further references. 20世纪20年代街头暴力活动中所涉及形式的详细讨论, 参见: Dirk Schumann,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Kampf um die Straße und Furcht vor dem Bürgerkrieg* (Essen: Klartext, 2001), pp. 15–22.

120. 这些暴力形式的其他概念及问题, 参见: Trutz von Trotha, 'Zur Soziologie der Gewalt', in idem (ed.), *Soziologie der Gewal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7), pp. 9–56; Schnell, '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 pp. 1–4; Raphael van Riel, 'Gedanken zum Gewaltbegriff: Drei Perspektiven', IPW—Working Paper no. 5, Hamburg University, 2005, https://www.wiso.uni-hamburg.de/fileadmin/sowi/akuf/Text_2010/Gewalt-Riel-2005.pdf; Imbusch, *Moderne und Gewalt*, pp. 20–35; Pierre Bourdieu, *Grundlagen einer Theorie der symbolischen Gewal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121. “旁观者”的概念最近受到了批评。我们在这里用这个词代表置身某个特殊场合, 但自认为没有积极参与的人, 他们既不是作恶者, 也不是受害人。这种定义并不意味着对“旁观主义”的影响做出任何陈述。关于“旁观者”概念的批判性观点, 参见2015年9月24–26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探索分类学的局限: 大屠杀历史中的“旁观者”会议的投稿。

122. 正如汉斯-格尔德·雅施克和马丁·洛伊佩丁格所述, 纳粹的“审美占有”和“身体暴力”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参见: Hans-Gerd Jaschke and Martin Loiperdinger, 'Gewalt und NSDAP vor 1933: Ästhetische Okkupation und physischer Terror', in *Faszination der Gewalt: Politische Strategie und Alltagserfahrung*, ed. Reiner Steinwe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3), pp. 123–155, here pp. 132–133, 146–147. See also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milieu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ngriff auf die proletarischen Wohnquartiere und die Reaktionen in den sozialistischen Vereinen* (Bonn: Dietz, 1997), pp. 312–335; Gerhard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Dietz, 1990), pp. 133–142;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101–119. 据此, 我不同意迪尔克·舒曼的观点, 他的研究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 但没有注意暴力行动的这种“结构”特征, 是基本方法论选择的结果。参见: Schumann,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p. 15–16.

123. 关于包含身体暴力及心理暴力形式的这一概念, 参见: Popitz, *Phänomene der Macht*, pp. 43–47.

124. Thomas Kühne, *Belonging and Genocide: Hitler's Community, 1918–1945*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屈内的论点引起了反对。特别是, 他强调纳粹团体形成中的种族灭绝特征, 被指为夸大其词; 参见于尔根·马托伊在《美国历史评论》117: 2 (2012) 期上

的评论。但是，屈内并不是唯一看到这种联系的人。例如，军事社会学家安东尼·金同样强调基于归属感和同志情谊的纽带是作战中良好表现的关键条件：Anthony King, *The Combat Soldier: Infantry Tactics and Cohesion i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23.

125. Jörg Baberowski, 'Einleitung: Ermöglichungsräume exzessiver Gewalt', in *Gewalträume: Soziale Ordnungen im Ausnahmezustand*, ed. Jörg Baberowski and Gabriele Metzler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2), pp. 7–27, esp. pp. 25–27.

126. Jan Philipp Reemtsma, 'Tötungslegitimationen: Die mörderische Allianz von Zivilisation und Barbarei', in *Bruchlinien: Tendenzen der Holocaustforschung*, ed. Gertrud Koch (Cologne: Böhlau, 1999), pp. 85–103, here p. 99.

127. 然而，最近几个月发表的两部重要研究著作总结了早期冲锋队集中营的暴力活动：Nikolaus Wachsmann, *KL: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ondon: Little, Brown, 2015), here pp. 23–78; 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

128.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d Schoenbaum在这一领域的前沿研究同样富于启发：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Class and Status in Nazi Germany 1933–1939*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1980 [1966]).

129. 参见最近的分析：Thomas Rohkrämer, *Die fatale Attrakt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Zur Popularität eines Unrechtsregimes*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3), pp. 27–56, 178–217; Thomas Mergel, 'Führer, Volksgemeinschaft und Maschine: Politische Erwartungsstruktur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1918–1936', in *Politische Kulturgeschichte der Zwischenkriegszeit 1918–1939*, ed. Wolfgang Hardtwi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5), pp. 91–127; Michael Wildt, 'Volksgemeinschaft und Führererwar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Politische Kultur und Medienwirklichkeiten in den 1920er Jahren*, ed. Ute Daniel, Inge Marszolek, Wolfram Pyta, and Thomas Welskopp (Munich: Oldenbourg, 2010), pp. 181–204; Wolfgang Hardtwig, 'Volksgemeinschaft im Übergang: Von der Demokratie zum rassistischen Führerstaat', in *Gemeinschaftsdenken in Europa: Das Gesellschaftskonzept 'Volksheim' im Vergleich 1900–1938*, ed. Detlef Lehnert (Cologne: Böhlau, 2013), pp. 227–253.

130. 并不是只有纳粹党和其他法西斯及民族主义极端政党如此行事。在一篇极富教益的文章中，历史学家莫里茨·弗尔默认为，不应该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强人领袖”思潮视为“民主制危机”的征兆，因为许多温和派和左翼政治家也赞成高度个性化的领导艺术。参见：Moritz Föllmer, 'Führung und Demokratie in Europa', in *Normalität und Fragilität: Demokratie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ed. Tim B. Müller and Adam Tooze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15), pp. 177–197.

131. 关于1918年后德国领导阶层理想的“民主”特征，参见：Wildt, 'Volksgemeinschaft und Führererwar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p. 196–198. 正如克里斯蒂娜·本宁豪斯等人所强调的那样，这些在自称“年轻一代”的知识领袖中大受欢迎的概念几乎专指男性。这也就是我在上面的句子中只使用男性形式的原因。参见：Christina Benninghaus, 'Das Geschlecht der Generation: Zum Zusammenhang von Generationalität und Männlichkeit um 1930', in *Generationen: Zur Relevanz eines*

wissenschaftlichen Grundbegriffs, ed. Ulrike Jureit and Michael Wildt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5), pp. 127–158. 事实上, 中上阶层占据了冲锋队大部分的领导职务, 伤害了来自较低阶层的队员; 参见: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p. 165; 与汉堡有关的情况参见: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48–49.

132. 这个例子取自: Felix Römer,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von innen* (Munich: Piper, 2012), pp. 85–6. 亚历山大·W·霍尔肯斯关于二战德国战俘政治态度的最新研究确认了“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感召力——这与对该党及其下属人员(包括冲锋队)常见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参见: Alexander W. Hoerrens, *Unter Nazis? Die NS-Ideologie in den abgehörten Gesprächen deutscher Kriegsgefangener von 1939 bis 1945* (Berlin: Be.bra, 2014), pp. 308–312, 336.

133. 这方面也可参见: Malte Thießen, 'Schöne Zeiten? Erinnerungen an die 'Volksgemeinschaft' nach 1945', in *Volksgemeinschaft: Neue Forschungen zur Gesell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d. Bajohr and Wildt, pp. 165–187.

第1章

1. 在如下书籍中引用: Othmar Plöckinger, *Unter Soldaten und Agitatoren: Hitlers prägende Jahre im deutschen Militär 1918–1920*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3), p. 5.

2. 参见如下最新作品: Robert Gerwarth, 'The Central European Counter-Revolution: 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Germany, Austria and Hungary after the Great War', *Past and Present* 200 (2008), pp. 175–209, here p. 177; idem, 'Rechte Gewaltgemeinschaften und die Stad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Berlin, Wien und Budapest im Schatten von Kriegsniederlage und Revolution', in *Kollektive Gewalt in der Stadt: Europa 1890–1939*, ed. Friedrich Lenger (Munich: Oldenbourg, 2013), pp. 103–121; Béla Bodó, 'Heroes or Thieves? Nepotism, Clientage and 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Hungary, 1919–1921', *Centre. Journal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Central Euro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1 (2015), pp. 66–114.

3. 关于德国, 参见格哈德·克鲁梅希编辑的稿件: Gerhard Krumeich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rster Weltkrieg* (Essen: Klartext, 2010). 从欧洲的角度, 可以参见: Angelo Ventrone, 'Fascism and the Legacy of the Great War', in *The Legacies of Two World Wars: European Socie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Lothar Kettenacker and Torsten Riotte (New York: Berghahn, 2011), pp. 90–119; Michael Mann, *Fasc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1–91.

4. 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 可以参见: Kathleen Canning, 'Claiming Citizenship: Suffrage and Subjectivity in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in *Weimar Publics / Weimar Subjects: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Germany in the 1920s*, ed. Kathleen Canning, Kerstin Barndt, and Kristin McGuire (New York and London: Berghahn, 2010), pp. 116–137; Julia Sneeringer, *Winning Women's Votes: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Matthew Stibbe, 'Anti-Femi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Right, 1914–1920: A Reappraisal', *German History* 20:2 (2002), pp. 185–210.

5. Jörn Leonhard, 'Means of Propaganda, Tools of Loyalty? Experience and Languag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istory of Concepts: Communicating

Concepts – Conceptualizing Communication', Bielefeld University, 28–30 August 2014.

6. 关于两战之间德国政治的语言与形式，参见：Thomas Mergel, *Parlamentar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symbolische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im Reichstag* (Düsseldorf: Droste, 2002); Kirsten Heinsohn, *Konservative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1912–1933: Demokratisierung und Partizipation in geschlechter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Düsseldorf: Droste, 2010).

7. 关于早期国防军与秘密准军事部队（所谓“黑色国防军”），参见：Bergien, *Die bellizistische Republik*, pp. 107–30; Francis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Cologne: Kiepenheuer and Witsch, 1964), pp. 168–173; Franz von Gaertner, *Die Reichsweh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rlebte Geschichte* (Darmstadt: Fundus, 1969), pp. 129–135. 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黑色国防军”这一极具争议话题的偏袒看法，参见：Bruno Ernst Buchrucker, *Im Schatten Seeckt's: Die Geschichte der 'Schwarzen Reichswehr'* (Berlin: Kampf-Verlag, 1928); Friedrich Wilhelm von Oerzen, *Die Deutschen Freikorps 1918–1923* (Munich: Bruckmann, 1938), pp. 462–473; 对20世纪20年代的批判性意见，参见：Emil Julis Gumbel, *Verschwörer* (Vienna: Malick, 1924), pp. 100–117.

8. 历史学家彼得·凯勒最近提出，以“自由军团”作为在德国政府许可下行动、但不是国防军正式部队的准军事单位的统称，大体上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一个传统。与“自由军团”相比，凯勒更偏向于“政府部队”。参见：Peter Keller, *'Die Wehrmacht der Deutschen Republik ist die Reichswehr': Die deutsche Armee 1918–1921*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4), pp. 81–101. See also Sprenger, *Landsknechte*; Perry Biddiscombe, 'The End of the Freebooter Tradition: The Forgotten Freikorps Movement of 1944/45',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2:1 (1999), pp. 53–90, here p. 58; Kai Uwe Tapken, *Die Reichswehr in Bayern von 1919 bis 1924* (Hamburg: Kovač, 2002), p. 115; Schulze, *Freikorps und Republik*, pp. 35–47.

9. Richard Bessel, 'Militarismus im innen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on den Freikorps zur SA', in *Militär und Milita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iträge ein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an der Hochschule der Bundeswehr Hamburg am 5. und 6. Mai 1977*, ed. Klaus-Jürgen Müller and Eckardt Opitz (Düsseldorf: Droste, 1978), pp. 193–222, here pp. 200–203.

10. Jan-Philipp Pomplun, 'Freikorps als personelle und organisatorische Keimzell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ozial- und politik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am Beispiel süddeutscher Einheiten',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Wegbereit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Personen, Organisationen, Netzwerke des völkisch-antisemitischen Aktivismus 1919–1933', Gelsenkirchen, 30 September–2 October 2013. 根据蓬普隆的说法，原“自由军团”成员中，1%后来加入党卫队，17%成为纳粹党员。过去强调自由军团部队与纳粹党成员延续性的主流看法参见：Robert G. L. 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Bernhard Sauer, 'Freikorps and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6:1 (2008), pp. 5–29, here p. 29; Bessel, 'Militarismus im innen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 202.

11. 1920年3月末遂的“卡普政变”之后，赫尔曼·埃尔哈特将其部队从柏林转移到慕尼黑，巴伐利亚当局欢迎他和手下的到来。此后，他以“巴伐利亚森林与木材公司”为伪装，建立了秘密

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C）。详见：Gabriele Krüger, *Die Brigade Ehrhardt* (Hamburg: Leibnitz, 1971), pp. 68–99.

12. “埃普自由军团”的名称取自其领袖弗朗茨·利特尔·冯·埃普（1868–1947），于1919年春季创立于图林根，原名“保护东部边境的巴伐利亚自由军团”。它参与了1919年5月推翻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月底加入临时建立的国防军，成为“第1巴伐利亚射手团”。后来的纳粹主要政治家鲁道夫·赫斯、恩斯特·罗姆和格雷戈尔·奥托·施特拉瑟尔都是埃普自由军团成员。参见：Bruno Thoß, ‘Freikorps Epp’, in *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 http://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artikel/artikel_44494; Katja-Maria Wächter, *Die Macht der Ohnmacht: Leben und Politik des Franz Xaver Ritter von Epp* (1868–1946)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9), pp. 53–113.

13. 关于“奥伯兰自由军团”（1921年改名为“奥伯兰联盟”），参见：Hans Fenske, *Konservatismus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Bayern nach 1918* (Berlin and Zurich: Gehlen, 1969), pp. 53–56, 159–64; Reinhold Friedrich, *Spur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bayerischen Oberland: Schliersee und Hausham zwischen 1933 und 1945*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2011), pp. 76–90; Rüdiger Ahrens, *Bündische Jugend: Eine neue Geschichte 1918–1933*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5), p. 56.

14. 提供一战及战后慕尼黑社会全貌的最佳书籍是：Martin Geyer, *Verkehrte Welt: Revolution, Inflation und Moderne. München 1914–192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8), here esp. pp. 94–129.

15. David Clay Large, *The Politics of Law and Order: A History of the Bavarian Einwohnerwehr, 1918–1921* (Philadelphia, P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0), pp. 3–4, 20–26; ‘Ein “Bund der erwachenden Bayern”’, *Das Jüdische Echo* 9:11, 17 March 1922, p. 146. 关于巴伐利亚“民团”，也可参见芬斯克时代久远但仍恰当的叙述：Fenske, *Konservatismus und Rechtsradikalismus*, pp. 76–112; Werner Gabriel Zimmermann, *Bayern und das Reich 1918–1923* (Munich: R. Pflaum Verlag, 1953), pp. 98–104.

16. Large, *The Politics of Law and Order*, pp. 25–31, 39, 43. 与拉奇不同，迪尔克·舒曼曾经提出，“民团”运动对中产阶级的激进化影响有限，至少在萨克森州是如此：Schumann,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 361. 不过，在巴伐利亚这种联系是无可辩驳的。

17. 关于埃舍里希组织，参见：Christoph Hübner, ‘Organisation Escherich (Orgesch), 1920/21’, in *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 http://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artikel/artikel_44558.

18. Dietrich Orlow, *Weimar Prussia 1918–1925: The Unlikely Rock of Democrac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6). 也可参见该书的第二卷：*Weimar Prussia 1925–1933: The Illusion of Strength*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1); 以及：Hans-Peter Ehn, *Preußen-Regierung, Reich-Länder-Problem und Sozialdemokratie 1928–1932* (Bonn: Neue Gesellschaft, 1975). 第一手资料可以参见原普鲁士内政部长阿尔伯特·C·格热辛斯基的回忆录：Albert C. Grzesinski, *Inside Germany* (New York: E. P. Dutton, 1939).

19. 发人深省的是，在这一背景下，巴伐利亚政府没有接受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1922年6月24日遭到谋杀之后用于保护民主秩序的法律，拉特瑙事件是1919–1922年间一系列政治谋杀中最为著名的，刺杀他的意图是惩罚被右翼民族主义者打上绥靖主义者、叛国者和犹太人标签的人。参

见：Martin Sabrow, *Die verdrängte Verschwörung: Der Rathenau-Mord und die deutsche Gegen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9); Ulrike Claudia Hofmann, *'Verräter verfallen der Feme!' Fememorde in Bayern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Cologne: Böhlau, 2000); Gumbel, Verschwörer.

20. 莫里斯于1897年10月出生在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州伊策霍附近的韦斯特尔莫尔。他在那里短暂地从事钟表匠本行，后被征召入伍，负伤之后明显没有再参加战斗。1919年1月25日，他从军队中退役，回到原来的雇主那里。八小时工作制的推出给莫里斯带来了更多的空余时间，他在1919年参与政治活动，加入准军事圈子。1919年底，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工人党（DAP），在冲锋队中担任领导人，后又进入党卫队，1923年参加了“啤酒馆政变”。20世纪20年代初，莫里斯与希特勒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后者的保护下，他于1933年成为了慕尼黑市议员，1936年出任慕尼黑手工业商会会长。关于他的早期生活，参见巴伐利亚警察1921年11月3日的说明：StA München, Pol. Dir. 6804, pp. 1–2；后来的生活参见：Anna Maria Sigmund, *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Adolf Hitler, seine Nichte Geli Raubal und der 'Ehrenarier' Emil Maurice – eine Dreiecksbeziehung* (Munich: Heyne, 2003).

21.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7, here p. 2: Memorandum of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elf-Defence Leagues, undated.

22.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 23; Fenske, *Konservatismus und Rechtsradikalismus*, pp. 77–78; Werner, *SA und NSDAP*, pp. 19–27; Jeremy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1921–193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4–25.

23. Paul Hos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e.V. (NSDAV), 1920–1923/1925–1935', *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 http://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artikel/artikel_44775.

24. 奥尔于1918–1919年任革命政府的内政部长，1919–1933年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参见：Markus Schmalzl, *Erhard Auer – Wegbereiter de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in Bayern* (Laßleben: Kallmünz, 2013), pp. 468–479. 虽然1934年流亡中的社会民主党仍然知道，纳粹从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那里“剽窃”了“冲锋队”一词，但这一情况后来被人遗忘了。参见：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1 (1934), p. 262.

25. 关于瓦利，参见：Friedrich Hitzer, *Anton Graf Arco: Das Attentat auf Kurt Eisner und die Schüsse im Landtag* (Munich: Kneesebeck and Schuler, 1988).

26. 威廉·布伊松（1892–1940）曾于1913–1920年在慕尼黑学习药剂学，期间因服兵役而中断学习。在奥尔的帮助下，他于1924年开设了自己的药房。两年以后，他开始义务为拜仁慕尼黑体育俱乐部担任“业余管理员”。20世纪30年代，他因反法西斯活动而被判死刑，纳粹于1940年9月6日在柏林-普洛岑湖监狱将其处决。他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的角色实际上无人知晓。布伊松的详细经历参见：Dietrich Schulze-Marmeling, *Der FC Bayern und seine Juden: Aufstieg und Zerschlagung einer liberalen Fußballkultur* (Göttingen: Die Werkstatt, 2011), pp. 190–191, 239; 'Erinnerungstag 2015 – Wilhelm Buisson – FC Bayern–Funktionär und Widerstandskämpfer', *Südkurvenbladdl Onlinemagazin*, <http://suedkurvenbladdl.org/erinnerungstag-2015-wilhelm-buisson-fc-bayern-funktionaer-und-widerstandskaempfer>.

27.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3–15: Memorandum of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A of the NSDAP, undated (but after 3 February 1923); Robert Hofmann, 'Auergarde, 1919–1924', *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 http://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artikel/artikel_44656; Günther Gerstenberg, *Freiheit! Sozialdemokratischer Selbstschutz im München der zwanziger und frühen dreißiger Jahre* (Munich: Eulenspiegeldruck, 1997), vol. 1, p. 75.

28. 关于“帝国战旗”组织的起源和初期情况，参见：Benjamin Ziemann, *Contested Commemorations: Republican War Veterans and Weimar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0–94; idem, *Die Zukunft der Republik? Das 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 1924–1933* (Bon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1), pp. 13–20; Carsten Voigt, *Kampfbünde der Arbeiterbewegung: Das 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 und der Rote Frontkämpferbund in Sachsen 1924–1933* (Cologne: Böhlau, 2009).

29. 参见：StA München, Pol. Dir. 6804, p. 52: Memorandum from Bauerreiter of the Munich police, 3 November 1921.

30. 鉴于这一点有大量相关证据，珀纳管辖下的巴伐利亚警察1923年的一份备忘录中仍然声称纳粹冲锋队从未发动攻势，令人吃惊。参见：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3–15, here p. 13: Memorandum from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A of the NSDAP, undated (but after 3 February 1923).

31. Johannes Schwarze, *Die bayrische Polizei und ihre historische Funktion bei der Aufrechterhaltung der öffentlichen Sicherheit in Bayern von 1919–1933* (Munich: Wölfle, 1977), p. 151.

32. BayHStA, MInn, no. 71712, pp. 32–34, here p. 33: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o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in Munich, 11 February 1921.

33.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 8: Note by the Bavarian police, 24 September 1921.

34. BayHStA, MInn, no. 71712, pp. 32–34: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o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in Munich, 11 February 1921.

35.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3–15: Memorandum of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A of the NSDAP, undated (but after 3 February 1923).

36. 关于巴伐利亚早期冲锋队的情况，首先可参阅：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9–44; Eric G. Reich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g, 1922–1934*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9; Werner Maser, *Der Sturm auf die Republik: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 (Munich: DVA, 1973), pp. 284–464; Werner, *SA und NSDAP*; Heinrich Bennecke, *Hitler und die SA* (Munich and Vienna: Günter Olzog Verlag, 1962), pp. 25–103.

37.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7, here p. 2: Memorandum from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elf-Defence Leagues, undated; ‘An unsere deutsche Jugend!’,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1 August 1921 (trans. Heiden,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pp. 82–83); Werner, *SA und NSDAP*, pp. 38–40.

38. Krüger, *Brigade Ehrhardt*, pp. 105–107; Hans-Günter Richardi, *Hitler und seine Hintermänner: Neue Fakten zur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 (Munich: Süddeutscher Verlag, 1991), p. 368; Werner, *NSDAP und SA*, 23;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ohne, no. 242: Letter from the SA-Gruppe Hansa, 9 July 1936. 约翰内斯·保罗·克林奇（1861–1920）的情况参见：Evangelisches Pfarrerbuch für die Mark Brandenburg seit der Reformation, ed. Brandenburgischer Provinzialsynodalverband, vol. 2 (Berlin: Mittler, 1941), p. 417.

39. Krüger, *Brigade Ehrhardt*, pp. 105–106. 克林奇的简略生平参见：Friedrich Walsdorff, 'Hans-Ulrich Klintzsch', in *Alma Mater Joachimica: Zeitschrift der Vereinigung Alter Joachimsthaler e.V.* 53 (1981), pp. 1,253–1,257.

40.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一本流行且经过授权的埃尔哈特生平介绍，[*Kapitän Ehrhardt: Abenteuer und Schicksale* (Berlin: Scherl, 1924)] 中，所有冲锋队与纳粹党非法行动都被省略了。

41. 'Kritische Zeit', *Das Jüdische Echo* 9:32, 11 August 1922, pp. 403–404。关于鲁登道夫以及他在20世纪20年代领导的“运动”，参见：Bettina Amm, *Die Ludendorff-Bewegung: Vom nationalistischen Kampfbund zur völkischen Weltanschauungssekte* (Hamburg: Ad Fontes, 2006); Bruno Thoß, *Der Ludendorff-Kreis 1919–1923: München als Zentrum der mitteleuropäischen Gegenrevolution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Hitler-Putsch* (Munich: Woelfle, 1978)。

42. 参见这篇有启发性的文章：'Kapitän Ehrhardt', *Das Jüdische Echo* 9:49, 8 December 1922, p. 607.

43. Bessel, 'Militarismus im innen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 208.

44. 关于希特勒在1918–1921年的生活及政治发展，参见：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Stuttgart: DVA, 1998), pp. 149–276; Evans,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pp. 161–175; Plöckinger, *Unter Soldaten und Agitatoren*; 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27–287.

45. Richardi, *Hitler und seine Hintermänner*, p. 369. 二战后，克林奇同样声称他只向埃尔哈特负责，而不是希特勒。他甚至否认埃尔哈特的手下与希特勒指挥的组织曾有正式的归属关系：Landeskirchliches Archiv Stuttgart (LKA Stuttgart), A 127, no. 1293: Letter from Klintzsch to a Protestant Oberkirchenrat in Württemberg, 25 March 1948.

46.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74–183: an early list of SA members (from Maurice), presumably intercepted by the police in September 1921. 1922年10月报纸的报道同样称公开露面的冲锋队员年龄为“18–25岁”；参见：'Bayerischer Skandal', *Oberfränkische Volkszeitung*, no. 295, 20 October 1922, in BayHStA, Minn, no. 81589. 由于冲锋队员（至少在1921年–1922年上半年）分为两类——A类由17–23岁的青年组成，B类则包含“年龄更大的男子”——成员实际数量可能略高于估计，因此隆格里希所提出的300人似乎是可信的：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 26. 根据这些信息来源，罗斯称冲锋队在1921年11月有1500人似乎是夸大其词：Mathias Rösch, *Die Münchner NSDAP 1925–1933: Eine Untersuchung zur inneren Struktur der NSDAP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Oldenbourg, 2002), p. 80. 也可参见：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20–21: Letter from the Munich police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5 June 1923.

47. 20世纪30年代之前，冲锋队普通成员与“领袖”往往都非常年轻，这一直是该组织的特征。参见：Bessel, 'Militarismus im innen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p. 216–217.

48. 参见克林奇的调查文件：LArch Freiburg, F 179/4 no. 110.

49. 赫尔曼·戈林（1893–1946）在一战中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1919–1921年的大部分时间在丹麦和瑞典，1922年迁居巴伐利亚，就学于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艺术系（至少是1922–1923年冬季学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苦于吗啡成瘾，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有时表现得非常暴躁，以至于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度过了数周。第三帝国时期，戈林作为

希特勒的副手，担任过多个有影响的职务，最著名的是1933年任普鲁士内政部长，后任帝国“四年计划”部长。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戈林在行刑之前吞服氰化钾药片自杀。关于戈林与毒品有关的暴力行为，参见：Hermann Weber et al. (eds), *Deutschland, Russland, Komintern. II. Dokumente (1918–1943). Nach der Archivrevolution: Neuerschlossene Quellen zu der Geschichte der KPD und den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Berlin: de Gruyter, 2015), pp. 958–959.

50. 关于早期冲锋队领导人的详细经历，参见布鲁斯·坎贝尔的精妙分析：Bruce Campbell, *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04), esp. pp. 7, 29–48, 62–79.

51. 参见：Malinowski and Reichardt,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

52. 前文引用的成员名单共有241个名字，其中144人列出了职业，包含在：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74–183.也可参见：'Die bayrischen Nationalsozialisten', *Frankfurter Zeitung*, 8 November 1922, in BayHStA, MInn, no. 81589; 'Beim Überfall auf das Deutsche Theater', *Münchener Post*, 18 October 1922. 据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鲁道夫·赫斯（后成为希特勒的代理人）共同创立和发起的“冲锋队苏台德突击队”就已经存在。参见：Michael S.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The German Students'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 I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73–74; Hans Peter Bleuel and Ernst Klink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Ideologien – Programme – Aktionen, 1918–1935* (Gütersloh: Mohn, 1967), p. 196. 我无法验证这一说法。

53. 参见：Benjamin Ziemann,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 Violent Society?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of Recent Research on Weimar Germany',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 (2003), pp. 80–95; Klaus Schönhoven, 'Die Entsteh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aus dem Krieg: Vorbelastungen und Neuanfang', in *Weimar im Widerstreit: Deutungen der ersten deutschen Republik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ed.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Munich: Oldenbourg, 2002), pp. 13–32; Andrew Donson, *Youth in the Fatherless Land: War Pedagogy, Nationalism, and Authority in Germany, 1914–191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经典的研究著作是：George Mosse, *Fallen Soldiers: 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这场争论的简短总结参见：Gerwarth, 'Rechte Gewaltgemeinschaften und die Stad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p. 106–107.

54.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4, pp. 4, 6: Transcripts of SA announcements from 26 August and 19 October 1921.

55.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olice report about the SA meeting on 5 October 1921 in the Högerbräu.

56. 同上：Police report about the SA meeting in Corneliusstraße on 25 January 1922.

57. 同上：Police report about the SA meeting in the Hofbräuhaus on 6 April 1922.

58. 同上：Police report about the SA meeting in the restaurant Liebherr on 30 November 1921.

59. 'An alle Schaffenden! Die wahren Verräter und Würger der Deutschen!', in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Sammlung von Flugblättern betreffend die Münchener Räterepublik 1919*, <http://www.bayerische-landesbibliothek-online.de/flugblaetter-1919>.

60. 关于一战期间和魏玛共和国初期反犹太主义的兴起，参见：Christoph Jahr, *Antisemitismus vor Gericht: Debatten über die juristische Ahndung judenfeindlicher Agitation in Deutschland (1879–1960)*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1), pp. 245–276; Daniel Siemens, 'Konzepte des nationaljüdischen Körpers in der frühen Weimarer Republik',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6:1 (2008), pp. 30–54, here pp. 30–32; Cornelia Hecht, *Deutsche Juden und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Dietz, 2003); Avraham Barkai, 'Wehr Dich!' *Der 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 (C.V.) 1893–1938* (Munich: Beck, 2002), pp. 55–66; Dirk Walter, *Antisemitische Kriminalität und Gewalt: Judenfeind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Dietz, 1999).

61. Hofmann, 'Verräter verfallen der Feme!', pp. 108, 112–113.

62. 关于一战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参见：Sarah Bornhorst, 'Bad Boys? Juvenile Delinquenc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Wilhelmine Germany',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the Limits of Western Influence, 1850–2000*, ed. Heather Ellis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121–144; Daniel Siemens, *Metropole und Verbrechen: Die Gerichtsreportage in Berlin, Paris und Chicago* (Stuttgart: Steiner, 2007), pp. 129–135.

63. BayHStA, MInn, no. 81589: 'Mussolini – Beherrscher Italiens', *Bayerische Staatszeitung*, 28–29 October 1922.

64. 希特勒在皇家啤酒馆冲锋队第一个周年纪念上的讲话参见：'Unsere Sturmabteilung', *Völkischer Beobachter*, 5 August 1922, in BayHStA, MInn, no. 81589; 'Aufruf! Deutsche Volksgenossen, Hand- und Kopfarbeiter!', *Völkischer Beobachter*, 9 November 1921;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242: Letter from the SA–Gruppe Hansa, 9 July 1936.

65. 这种美化的范例参见：Karl W. H. Koch, *Männer im Braunhemd: Vom Kampf und Sieg der SA* (Berlin: Stubenrauch, 1936), pp. 11–17. 后来，纳粹分子利用1921年11月4日的事件进一步展开宣传。3天之后（11月7日），他们在《人民观察家》报上以“加入冲锋队！”为题第二次发出号召。参见：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7, here p. 2: Memorandum from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elf-Defence Leagues, undated.

66. BayHStA, MInn, no. 81589: 'Aus der politischen Kinderstube', *Münchener Post*, 29 June 1922.

67. 同上：'Hakenkreuz und Ettistraße', *Münchener Post*, 14 July 1922.

68.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 8: Note of the Bavarian Police from 24 September 1921;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3–15, here p. 14: Memorandum from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A of the NSDAP, undated (but after 3 February 1923); Westernhagen, *Von der Herrschaft zur Gefolgschaft*, p. 49.

69.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4, pp. 175–192: Interrogation of Adolf Modes, 8 February 1923.

70. 详见：Torsten Homberger, *Fashioning German Fascism: 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Hitler's Storm Troopers, 1924–1933*, PhD dis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014, pp. 56–73.

71. Richardi, *Hitler und seine Hintermänner*, p. 372.

72. BayHStA, MInn, no. 81589: 'Aus der Bewegung',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 August 1922.

73. 1933年冲锋队组织结构的概述参见：Julius M. Ruhl and Carl B. Starke (eds), *Adolf Hitlers Braunhemden: Organisation, Einteilung, Bekleidung und Ausrüst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urm-*

Abteilungen, Schutz-Staffeln, der Hitler-Jugend, des Deutschen Jungvolkes sowie der Politischen Organisation usw. (Leipzig: Moritz Ruhl, 1933). 1938年冲锋队的详细组织参见: Ernst Bayer, *Die SA: Geschichte, Arbeit, Zweck und Organisation der Sturmabteilungen des Führers und der Obersten SA-Führung* (Berlin: Junker and Dünhaupt, 1938).

74.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4, pp. 15–16: ‘Flame letter’ from the O[ber]k[ommando] Transportleitung, a certain Herr Streck, to the leader of the SA (Göring), 14 July 1923.

75.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230–231: Constable Pfeilschiffler, Report to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Bad Tölz, 16 August 1922.

76.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 232: Memo by the Munich police on the interrogation of Hans Ulrich Klitzsch, 20 September 1922. 犹太复国主义周刊《犹太回声》1922年5月评论道, “上巴伐利亚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犹太的”, 主要是由于当地报纸《米斯巴赫人报》的煽动。出于自尊, 《犹太回声》文章的作者敦促其犹太兄弟不要再搬离这一地区: Hans Guggenheimer, ‘Bayerische Sommerfrischen’, *Das Jüdische Echo* 9:21, 26 May 1922, pp. 268–269. See also Karl Glaser, ‘Antisemitismus und kleine Gemeinden’, *Das Jüdische Echo* 9:13, 31 March 1922, pp. 167–168.

77. Nunner–Winkler, ‘Überlegungen zum Gewaltbegriff’, p. 53.

78. ‘Kritische Zeit’, *Das Jüdische Echo* 9:32, 11 August 1922, pp. 403–404, here p. 403.

79.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7, here p. 2: Memorandum from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elf–Defence Leagues, undated.

80.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2012), p. 126.

81. 记者赫尔曼·埃塞尔(1900–1981)于1919年加入DAP(后来的纳粹党)。同年,他成为《人民观察家》主编。20世纪20年代初,埃塞尔以狂热的反犹太煽动在巴伐利亚扬名。1923年,他声称应该将所有德国犹太人拘禁在集中营里,如果协约国对鲁尔区的占领不停止,5万名犹太人将“被送到阴间享乐”——也就是被杀害。1932年成为巴伐利亚州议员之后,埃塞尔于1933年被提升为巴伐利亚州总理府负责人。参见: ‘Die Sturmarmee’, *Das Jüdische Echo* 10:14, 6 April 1923, in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 319; Kurt G. 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Lost Testimony by a Survivor from the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ed. Bob Carruthers (Barnsley: Pen & Sword, 2013), p. 81; Thomas Fürst, *Karl Stützel. Ein Lebensweg in Umbrüchen: Vom Königlichen Beamten zum Bayerischen Innenminister der Weimarer Zeit (1924–1933)* (Frankfurt am Main: Lang, 2007), p. 454, n. 1,735.

82. BayHStA, MInn, no. 81589: ‘Zur Psychologie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Münchener Post*, 17 August 1922.

83. 这一事件激励了全欧洲的法西斯运动,关于该事件的欧洲维度,参见: Arnd Bauerkämper, ‘Transnational Fascism: Cross–Border Relations between Regimes and Movements in Europe, 1922–1939’, *East Central Europe* 37 (2010), pp. 214–246, here pp. 217–222.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者对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赞赏,参见: Patrick Bernhard, ‘Konzertierte Gegnerbekämpfung im Achsenbündnis. Die Polizei im Dritten Reich und im faschistischen Italien 1933 bis 1943’,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9:2 (2011), pp. 229–262, esp. pp. 230–237.

84. BayHStA, MInn, no. 81589: Clipping from *Bayerischer Kurier*, 19 June 1922.

85. 同上：‘Eine Justizkomödie’, *Münchener Post*, 29 November 1922.

86. ‘Antisemitisches aus Bayern: “Nieder mit den Juden!”’, *Das Jüdische Echo* 9:37, 15 September 1922, p. 466.

87. BayHStA, MInn, no. 81589: ‘Deutscher Tag in Koburg’, *Bayerische Zeitung* (Munich), 22 October 1922.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者对这一特别会议的记忆，参见：BArch Berlin, NS 26/371: *Auf nach Coburg! Einladung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undgebung in Coburg am 8. und 9. Mai 1929*.

88. BayHStA, MInn, no. 81589: ‘Die bayerischen Faschisten treten auf den Plan!’, *Fränkische Tagespost*, 17 October 1922.

89. ‘Deutschvölkische Radauhelden’, *Das Jüdische Echo* 9:40, 6 October 1922, p. 501; BayHStA, MInn, no. 81589: ‘Beim Überfall auf das Deutsche Theater’, *Münchener Post*, 18 October 1922.

90. ‘Vom bayerischen Kriegsschauplatz: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ausfriedensbruch und anderes’, *Das Jüdische Echo* 10:1, 5 January 1923, p. 5.

91. BayHStA, MInn, no. 81589: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kandalmethoden’, *Münchener Post*, 2 October 1922.

92. Maser, *Der Sturm auf die Republik*, pp. 380–2. 克林奇从未返回冲锋队，他于1923年9月8日结婚，接下来的两年里都在努力供养迅速成长的家庭。1925年，他成为霍尔施泰因诺伊施塔特汉萨帆船学校的一名教官。1929年起，克林奇在瓦尔内明德和西尔特岛的德国航空学校任教官。他于1936年加入德国空军。1938年，他是波美拉尼亚安克拉姆市空军导航学校的指挥官，1942年起任德国湾空军海上救援部队参谋长；Walsdorff, ‘Hans–Ulrich Klitzsch’, p. 1257; LKA Stuttgart, A 127, no. 1293: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 Hans–Ulrich Klitzsch (1949/50).

93. StA München, Polizeidirektion München, Personalakten, no. 10020 (Wilhelm Brückner), p. 25: Testimony of Wilhelm Brückner to the Bavarian Police, 9 May 1923. 1923年初，多个冲锋队“百人队”组成了“区队”。1923年1月28日起，每个区队都撤销了自己的“旗队”。第一批区队据说是慕尼黑第1区队、第2区队、兰茨胡特区队和纽伦堡区队。

94. 同上，p.40: Testimony of Wilhelm Brückner to the Bavarian Police, 19 May 1923. 关于党卫队的起源，参见：Bastian Hein, *Elite für Volk und Führer? Die Allgemeine SS und ihre Mitglieder 1925–1945* (Munich: Oldenbourg, 2012), pp. 39–75; idem, *Die SS. Geschichte und Verbrechen* (Munich: Beck, 2015), pp. 7–14.

95.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 6: Memorandum from the Bavarian Police on the Self–Defence Leagues, undated;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9–20: Report by Hans Lechner from the Austrian SA to SA headquarters in Munich, 1 September 1923;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4: Report about a meeting of the Munich SA on 11 April 1923;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pp. 24–25;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 81; Daniel Schmidt, *Schützen und Dienen: Polizisten im Ruhrgebiet i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1919–1939* (Essen: Klartext, 2008), p. 283.

96. 关于纳粹党早期杂役、后成为达豪集中营护士的鲍尔，参见：Daniela Andre, ‘Eleonore Baur – “Blutschwester Pia” oder “Engel von Dachau”’, in *Rechte Karrieren in München: Von der Weimarer Zeit bis in die Nachkriegsjahre*, ed. Marita Krauss (Munich: Volk, 2010), pp. 166–185. 恩斯

特·冯·威斯滕哈根的传记参见: von Westernhagen, *Von der Herrschaft zur Gefolgschaft*, pp. 45–66.

97. 除非另做说明, 这次事件的所有信息取自: Karl-Heinz Rueß, 'Die "Schlacht am Walfischkeller": Aus der politischen Niederlage entsteht die Göppinger SA', in *Göppingen unterm Hakenkreuz*, ed. Konrad Plieninger and Karl-Heinz Rueß (Göppingen: Stadtarchiv Göppingen, 1994), pp. 12–21, here pp. 13–15.

98. 警察提供的数字说明, 参与者有1300名冲锋队员、200名“帝国军旗”成员、400名“布吕歇尔同盟”成员, 800名‘奥伯兰联盟’成员以及其他一些更小组织的成员。参见: BayHStA, MInn, no. 81594: Letter from the Munich Police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3 May 1923.

99. 同上: Letter from the Munich Police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8 May 1923; 'Dokumente gegen "bedenkenlose Geschichtsfälschung"', *Münchener Post*, 7 January 1932.

100. 同上: Letter from the Munich Police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3 May 1923.

101. 同上: Letter from Wehrkreiskommando VIII to Reichswehrministerium, 6 May 1923.

102. 同上: Letter from the Munich Police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3 May 1923.

103. 同上: 'Das Feldlager auf Oberwiesenfeld', *Münchener Post*, 3 May 1923.

104. 冯·洛索1923年对冲锋队表示善意的原因之一是德国可能与法国发生战争, 后者联合比利军队, 于1923年1月占领非军事化的鲁尔区。在这种情况下, 罗姆向冯·洛索建议, 国防军只有和准军事联盟紧密合作, 才能建立适当的国防。参见: Eleanor Hancock, *Ernst Röhm: 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51–52.

105. BayHStA, MInn, no. 81594: Letter from Wehrkreiskommando VIII to Reichswehrministerium, 6 May 1923.

106. 同上: 'Kurze Anfrage Nr. 664 an das Bayerische Kultusministerium', 2 May 1923. 另见第3章。

107. Ventrone, 'Fascism and the Legacy of the Great War', p. 111.

108. Kurt Jackmush, in *Boxwoche 1* (1923), as quoted in Erik N. Jensen, *Body by Weimar: Athletes, Gender, and German Moder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3.

109. BayHStA, MInn, no. 81594: Speech of Schweyer in the Bayerischer Landtag, 8 June 1923,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Bayerischen Landtags*, no. 195, vol. 8, pp. 378–379. 施魏尔对早期纳粹运动的认识参见他的 *Politische Geheimverbände* (Freiburg/Breisgau: Herder, 1925) 一书。

110. Collins, *Violence*, pp. 2–4 and *passim*.

111.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olice report about the meeting of the NSDAP in the Hotel Adelmann on 19 October 1921.

112. 纽伦堡的情况特别混乱; 参见: Reic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g*, pp. 36–40; Herbert Linder, *Von der NSDAP zur SPD: Der politische Lebensweg des Dr. Hemuth Klotz (1894–1943)* (Konstanz: UKV, 1998), pp. 48–81.

113. Konrad Heiden, *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Abingdon: Routledge, 2010 [1934]), p. 103.

114. BayHStA, MInn, no. 81594: Confidential report, 'Aus der Rechtsbewegung', 2 June 1923; Westernhagen, *Von der Herrschaft zur Gefolgschaft*, p. 57; Andreas Hofer, *Kapitänleutnant Hellmuth von Mücke: Marineoffizier – Politiker – Widerstandskämpfer. Ein Leben zwischen den Fronten* (Marburg:

Tectum, 2003), p. 51. 米克于1929年与纳粹分道扬镳，投身阻止希特勒掌权的活动。二战后，他参加了反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整武备的运动。他是被人遗忘却又非常有趣的人物，其复杂经历可参见：Hofer, *Kapitänleutnant Hellmuth von Mücke*; StA München, Polizeidirektion München, Personalakten, no. 10119 (Hellmuth von Mücke).

115. Hancock, Ernst Röhm, pp. 32–33. 关于罗姆与冯·埃普的关系，参见：Wächter, *Die Macht der Ohnmacht*, pp. 79–82.

116. Heiden, *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pp. 8–9.

117. Nigel Jones, *Mosley* (London: Haus Publishing, 2004), p. 12.

118. 对罗姆“军事暴徒”的描述，参见：Otis, *Hitler's Stormtroopers*, pp. 25–26；强调他保皇主义根源的细致描写，参见：Hancock, *Ernst Röhm*, pp. 7–35。罗姆的传记也可以参见诺贝特·马罗恩编辑的文献：Norbert Marohn, *Röhm: Ein deutsches Leben. Romanbiografie* (Leipzig: Lychatz, 2011)；Marcus Mühle, *Ernst Röhm: Eine biografische Skizze* (Berlin: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2016)。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极右翼重要领导人传记的研究参见：Martyn Rady and Rebecca Haynes (eds),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Personalities of the Righ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I. B. Tauris, 2011)。

119. Hancock, *Ernst Röhm*, p. 1. 他的看法部分受到德国历史学家、原冲锋队领袖海因里希·本内克著作的影响；参见：Bennecke, *Hitler und die SA*, p. 23。奥特马尔·普洛克因格尔同样强调罗姆对早期冲锋队“极为重要”；参见：Plöckinger, *Unter Soldaten und Agitatoren*, p. 175。这一很早就确立的观点参见：Heiden, *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p. 39。

120. Ernst Röhm,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ters* (Munich: Eher, 1928, with several editions to follow)。第一个英语缩写版本直到2012年才出版：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London: Frontline, 2012)。虽然罗姆的书真实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哲学，但对于他在纳粹运动初期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可信了。

121. Hanns H.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 bis 1924* (Munich: Nymphenburger, 1961), p. 75; Hancock, *Ernst Röhm*, pp. 37–45.

122.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p. 87.

123. 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pp. 176–94;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253–267; Hoffmann, *Der Hitlerputsch*, pp. 142–217; Otis, *Hitler's Stormtroopers*, pp. 72–82.

124. 科南·菲舍尔令人信服地提出，德国消极抵抗运动的失败对1923年之后民众接受共和国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他声称，即使魏玛共和国再延续十年，“对新共和国秩序的感情几乎已经消亡”。参见：Conan Fischer, *The Ruhr Crisi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0.

125.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p. 194.

126. 关于希特勒被逮捕的情况，参见：Ludecke, *I Knew Hitler*, p. 135.

127. 不无讽刺的是，11月9日死亡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奥伯兰联盟”和罗姆的“帝国军旗”组织成员，而不是真正的冲锋队员。参见：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p. 271.

128. 关于对1923年11月9日“殉道者”的崇拜，参见贝伦贝克的出色分析：Behrenbeck, *Der Kult um die toten Helden*, pp. 299–313；关于韦塞尔的生平及死后受到的崇拜，参见：Siemens, *Making of a Nazi Hero*。关于冲锋队“殉难”，还可参见：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548–560。

129. 这方面的范例是: Koch, *Männer im Braunhemd*, p. 41; (民族社会主义者的) 牺牲与暴力行动之间联系的最新分析讨论, 参见: David Pan, *Sacrifice in the Modern World: On the Particularity and Generality of Nazi Myth*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0.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p. 209. 戈林当时苦于1923年11月所受腿伤恢复情况不佳, 很快前往直意大利, 试图在那里加强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及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联系。参见: Michael Palumbo, 'Goering's Italian Exile 1924–1925',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0:1 (1978), pp. D1035–D1051。

131.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pp. 209–210。

132. 关于“前线联盟”, 参见: Hancock, *Ernst Röhm*, pp. 71–81; Werner, *SA und NSDAP*, pp. 175–293; Röhm, *Memoirs of Ernst Röhm*, pp. 210–235。

133. 这方面的概述参见: Bruno Thoß, 'Deutscher Notbann, 1924–1926', *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 [http://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Lexikon/Deutscher Notbann](http://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Lexikon/Deutscher%20Notbann)。对该州图谋的深入了解参见: BayHStA IV, Bestand Bayern und Reich, no. 65: highly 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the Stat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Franz Schwyer, to Dr Essel in Ebersberg, 10 April 1924。

134. Hancock, *Ernst Röhm*, pp. 75–76。

135. “民族社会主义自由党”仅存在于1924–1925年。它是较为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自由党”与纳粹党被取缔后的继承者“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合并而成的。

136. Werner, *SA und NSDAP*, pp. 187–189。

137. 关于希特勒与罗姆的失和, 参见: Hancock, *Ernst Röhm*, pp. 72–75, 79–81。

138. 阿道夫·希特勒重建纳粹党的公告, 《人民观察家》, 1925年2月26日, 引用于: Hein, *Elite für Volk und Führer?*, pp. 40–41。对这种“转变”的早期批判参见: Schwyer, *Politische Geheimverbände*, pp. 118–119。

139. Werner, *SA und NSDAP*, pp. 299–304。

140.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851st edn (Munich: Eher, 1943), pp. 604–605, 611, 620。

141. 同上, P.603–604。

142 关于“红色阵线战士联盟”的历史, 参见: Kurt G. P. Schuster, *Der Rote Frontkämpferbund: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 eines politischen Kampfbundes* (Düsseldorf: Droste, 1975); Sara Ann Sewell, 'Bolshevizing Communist Women: The Red Women and Girls' League in Weimar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5 (2012), pp. 268–305。

143. BAArch Berlin, NS 23/510: Decree 'An die gesamt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esse', 28 September 1926。

144. Noël O'sullivan, *Fascism* (London and Melbourne: J. M. Dent, 1983), p. 43。

145.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242: Letter from 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 to the regional party leaders of the NSDAP, 1 October 1926。

第2章

1.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with an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introduction by Peter Hayes (Chicago, IL: Ivan R. Dee, 2009), p. 436.

2. 参见: Rösch, *Die Münchner NSDAP*, pp. 122–123.

3.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52–53.

4. 关于这个不同寻常名字的起源, 参见: Mark A. Fraschka, *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 Hitlers vergessener Oberster SA-Führ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6), pp. 229–232.

5. 冯·普费弗的详细传记同上, 还可参见: Hermann Weiß, 'Pfeffer von Salomon, Franz',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20 (2001), pp. 310ff, <http://www.deutsche-biographie.de/pnd124769810.html>.

6. Heiden, *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p. 123. 关于考夫曼, 参见: Frank Bajohr, 'Gauleiter in Hamburg: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Karl Kaufmann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3:2 (1995), pp. 267–295.

7. 也可参见: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 54.

8. 关于早期的希特勒青年团及其成员, 参见: Peter D. Stachura, *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anta Barbara, CA: Clio, 1975); Michael H. Kater, *Hitler Youth*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28.

9. Hein, *Elite für Volk und Führer?*, pp. 47–50, 65;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 200; Adolf Hitler, Order from 7 November 1930.

10. 从1931年起, 冲锋队小队使用“Scharen”的名称, 这个词的最贴切翻译是“群”或者“队”。

11. 冲锋队的这一新结构是根据1926年12月21日《前进报》上的抄本, 以及1931年2月20日的冲锋队最高领袖第2号令描述的, 两者都保存于: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1923–1935年冲锋队内部组织变化的概述参见: Campbell,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pp. 161–162。

12. Bessel, 'Militarismus im innen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 210; Helge Matthiesen, *Greifswald in Vorpommern: Konservatives Milieu in Kaiserreich, i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1900–1990* (Düsseldorf: Droste, 2000), p. 270.

13. 这些徽标及对应职衔及部队的图解, 参见: Ruhl and Starke (eds), *Adolf Hitlers Braunhemden*。

14.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Transcript of the *Lagebericht* from the Berlin Police, no. 128, 20 February 1929; 'SA-Versicherung der NSDAP',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2 December 1928.

15. 这些商业活动的细节参见第3章; 普费弗·冯·萨洛蒙改革的全面总结参见: Fraschka, *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 pp. 342–364.

16.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Transcript of the *Lagebericht* from the Berlin Police, no. 128, 20 February 1929.

17. Werner, *SA und NSDAP*, p. 412. 1931年5月一家纳粹报纸的报道提供了1931年1月1日–5月6日之间报告案例的数量——2055件; 参见: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4, p. 19: 'Achtung, Parteigenossen!'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2 May 1931.

18. Joachim C. Häberlen, *Vertrauen und Politik im Alltag: Die Arbeiterbewegung in Leipzig und Lyon im Moment der Krise 1929–1933/38*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3), p. 31.

19. 首选的参考书是: Schmiechen–Acker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milieus*, pp.

108–435。关于汉堡冲锋队，参见：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Anthony McElligott, *Contested City: Municip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in Altona, 1917–1937*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idem, ‘“. . . und so kam es zu einer schweren Schlägerei”: Straßenschlachten in Altona und Hamburg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Hier war doch alles nicht so schlimm*’: *Wie die Nazis in Hamburg den Alltag eroberten*, ed. Maike Bruhns, Thomas Krause, and Anthony McElligott (Hamburg: VSA, 1984), pp. 58–87; Thomas Krause, *Hamburg wird braun: Der Aufstieg der NSDAP 1921–1933* (Hamburg: Ergebnisse Verlag, 1987); idem, ‘Von der Sekte zur Massenbewegung: Die Hamburger NSDAP von 1922 bis 1933’, in ‘*Hier war doch alles nicht so schlimm*’, pp. 18–51; 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20.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 34; Daniel Siemens, ‘Prügelpropaganda: Die SA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ythos vom “Kampf um Berlin”’, in *Berlin 1933–1945*, ed. Michael Wildt and Christoph Kreutzmüller (Munich: Siedler, 2013), pp. 33–48, here p. 40.

21. 关于纳粹运动在柏林的发展，特别是发生在那里的暴力“街头政治”，参见：Eve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929–19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mela E. Swett, *Neighbors and Enemies: The Culture of Radicalism in Berli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ers G. Kjøstved, ‘The Dynamics of Mobilisation: The Nazi Movement in Weimar Berlin’, *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 14:3 (2013), pp. 338–54; Benjamin C. Hett, *Burning the Reichstag: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hird Reich’s Enduring Myste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8–59; Andreas Wirsching, *Vom Weltkrieg zum Bürgerkrieg? Politischer Extremismus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1918–1933/39: Berlin und Paris im Vergleich* (Munich: Oldenbourg, 1999), pp. 437–467; Wildt and Kreutzmüller (eds), *Berlin 1933–1945*; Rüdiger Hachtmann, Thomas Schaarschmidt, and Winfried Süß (eds), *Berli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1945*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1). 关于特定社区的详细研究，参见：Oliver Reschke, *Kampf um den Kiez: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m Zentrum Berlins 1925–1933* (Berlin: Trafo, 2014); idem, *Der Kampf um die Macht in einem Berliner Arbeiterbezirk: Nationalsozialisten am Prenzlauer Berg 1925–1933* (Berlin: Trafo, 2008); idem, *Der Kampf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um den roten Friedrichshain (1925–1933)* (Berlin: Trafo, 2004).

22. 参见：Ziemann,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Dirk Schumann, ‘Einheitssehnsucht und Gewaltakzeptanz: Politische Grundpositionen des deutschen Bürgertums nach 1918 (mit vergleichenden Überlegungen zu den britischen middle classes)’, in *Der Erste Weltkrieg und die europäische Nachkriegsordnung: Sozialer Wandel und Formveränderung der Politik*, ed. Hans Mommsen (Cologne: Böhlau, 2000), pp. 83–105.

23. Rudy Koshar, ‘From Stammtisch to Party: Nazi Joiner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Grass-Roots Fascism in Weimar Germany’,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9:1 (1987), pp. 1–24, here p. 2.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在农村地区的兴起，参见：Wolfram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Die Verschränkung von Milieu und Parteien in den protestantischen Landgebieten Deutschland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Droste, 1996), pp. 324–432; Frank Bösch, *Das konservative Milieu: Vereinskultur und lokale Sammlungspolitik in ost-und westdeutschen Regionen (1900–1960)*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Zdenek Zofka, *Die Ausbreit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em Lande: Eine regionale Fallstudie zur politischen Einstellung der Landbevölkerung in der Zeit des Aufstiegs und der Machtergreifung der NSDAP 1928–1936* (Munich: Wölfle, 1979), pp. 93–132. 关于魏玛选举的著作参见: Jürgen W. Falter, *Hitlers Wähler* (Munich: Beck, 1991); idem, *Zur Soziograph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 den Wählern und Mitgliedern der NSDAP* (Cologne: Gesis, 2013). 关于女性在选举中的表现, 参见: Helen Boak, 'Mobilising Women for Hitler: The Female Nazi Voter', in *Working Towards the Führer: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Ian Kershaw*, ed. Anthony McElligott and Tim Kirk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8–92.

24. 区域研究的典范包括: Andrew Stewart Bergerson, *Ordinary Germans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Nazi Revolution in Hildeshei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Michael Schepua,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pfälzischen Provinz: Herrschaftspraxis und Alltagsleben in den Gemeinden des heutigen Landkreises Ludwigshafen 1933–1945* (Mannheim: Palatium, 2000), pp. 71–165; Szejnmann, *Nazism in Central Germany*; Johnpeter Horst Grill, *The Nazi Movement in Baden 1920–194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Volker Franke,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Düsseldorf: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asis in einer katholischen Großstadt* (Essen: Die Blaue Eule, 1987); Klaus Tenfelde, *Proletarische Provinz: Radikalisierung und Widerstand in Penzberg/Oberbayern 1900–1945* (Munich and Vienna: Oldenbourg, 1982); Rainer Hambrecht,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Mittel-und Oberfranken (1925–1933)* (Nuremberg: Stadtarchiv, 1976); Thomas Schnabel (ed.), *Die Machtergreifung in Südwestdeutschland: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Baden und Württemberg, 1928–1933* (Stuttgart: Kohlhammer, 1982); Eberhart Schön, *Die Entsteh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ssen*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1972); Frank Bajohr (ed.),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Ergebnisse–Verlag, 1993).

25. 1926年, 柏林冲锋队有400–450人, 参见: Bernd Kessinger,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in Berlin-Neukölln 1925–1933* (Berlin: Vergangenheitsverlag, 2013), p. 92; Bennecke, *Hitler und die SA*, p. 126; Martin Schuster, *Die SA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ergreifung' in Berlin und Brandenburg 1926–1934*, university diss.,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2005, pp. 39–41. 1923年11月纳粹党遭取缔后, 汉堡当地的冲锋队最初以布吕歇尔健身、体育与远足俱乐部的名义运作, 1923年仅吸收30–40人, 1926年初60人, 1927年夏季约350人, 参见: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90, 96, 101, 105; Krause, *Hamburg wird braun*, pp. 96–97. 其他多个德国大城市的冲锋队成员人数参见: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 271.

26. Rösch, *Die Münchner NSDAP*, pp. 122–125.

27. BArch Berlin, R 9361/II, no. 16746: Memorandum from Otto Herzog on the history of the SA in Frosen.

28. 类似的估计参见: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p. 159. 出席1927年魏玛纳粹党集会的冲锋队员人数, 参见: Werner von Fichte, Typescript of a booklet on the SA: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372–437, here p. 380. 米夏埃尔·卡特尔给出的1929年初冲锋队成员数量为15000人: Kater, 'Ansätze zu einer Soziologie der SA bis zur Röhm-Krise', in *Soziale Bewegung und politische Verfassun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Welt*, ed. Ulrich Engelhardt et al. (Stuttgart: Klett, 1976), pp. 798–831, here p. 799.

29.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 93;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 258. 略有不同的是, 冲锋队将领库尔特·冯·乌尔里希在1929年1月做了过高的估计, 称冲锋队总人数达5万–6万人。参见: GStA PK, I. HA, Rep. 77, Titel 4043, no. 309, pp. 313–317, here p. 316: SA-Führer Ober-West Curt von Ulrich, 'Wehrhaftmachung', 21 January 1929.

30. GStA PK, VI. HA, NL Daluge, no. 9, pp. 20–24, here p. 23: Regierungsrat Bach (Darmstadt), 'Die Entwick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 in Hessen, besonders im Odenwald'.

31. V. S. Khristoforov, Institut rossiĭskoĭ istorii (Rossiĭskaya akademiya nauk), Glavnoe arkhivnoe upravlenie goroda Moskvy, and Tsentralnyĭ arkhiv FSB Rossii (eds), 'Oberführer SA Willi Redel'. *Dokumenty iz arkhivov FSB Rossii* (Moscow: Izdatel'stvo Glavnogo arkhivnogo upravleniya goroda Moskvy, 2012), pp. 46–7; Schön, *Die Entsteh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ssen*, p. 120. 多特蒙德的类似数字与问题参见丹尼尔·施密特的案例研究: Daniel Schmidt, 'Terror und Terrinkämpfe: Sozialprofil und soziale Praxis der SA in Dortmund 1925–1933',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ortmunds und der Grafschaft Mark* 96/97 (2007), pp. 251–292; 但泽的情况参见: Hans Sponholz, *Danzig – deine SA! Einsatz und Bewährung im Polenfeldzug* (Munich: Eher, 1940), pp. 26–27.

32. Gerhard Paul, *Die NSDAP des Saargebietes 1920–1935: Der verspätete Aufstieg der NSDAP in der katholisch-proletarischen Provinz* (Saarbrücken: Saarbrücker Druckerei und Verlag, 1987), p. 121.

33. Schmidt, *Schützen und Dienen*, p. 283; Thomas Schnabel, 'Die NSDAP in Württemberg 1928–1933: Die Schwäche einer regionalen Parteiorganisation', in *Die Machtergreifung in Südwestdeutschland*, ed. Thomas Schnabel, pp. 49–81, here pp. 53–54.

34. Christian Peter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durchsetzung in Kleinstädten: Eine vergleichende Studie zu Quakenbrück und Heide/Holstein*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5), pp. 376, 447–449;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p. 176; Oded Heilbronner, *Catholicism,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untrysid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n South Germany* (Ann Arbor, MI: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3–114.

35. Schumann,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Weimar Republic*, pp. 186–204, here p. 187.

36.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65–72; Campbell, *SA Generals*, pp. 71–76, 142–148. 柏林的情况参见: Schuster, *Die SA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ergreifung'*, pp. 27–36.

37.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104–105; BArch Berlin, NS 23/1239: Letter from the Hamburg SA to the Gausturm Nordmark, 5 April 1929.

38. Schuster, *Die SA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ergreifung'*, pp. 31–36; GStA PK, I. HA, Rep. 84a (Justizministerium), no. 55212.

39. 详见: Wirsching, *Vom Weltkrieg zum Bürgerkrieg?*, pp. 442–447, 589–594.

40. 例如, 可参见: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1, Band 1/II, p. 149 (entry from 15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November 1926).

41. 引用于: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p. 186.

42. 这方面很有启发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某旗队的命令, 直截了当地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说服警察支持我们的目标, ……每个冲锋队员必须牢记所在地警察局的电话。我们必须让执勤警官相信, 我们为自己的信念而战, 不是出于粗暴或者误导性的激进主义思想, 只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基本生活权利。” (GStA PK, I. HA, Rep. 219, no. 20, pp. 31–32: Typescript of an SA–Standartenbefehl, undated)

43.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1, Band 1/II, p. 153 (entry from 28 November 1926).

44. Gailus and Siemens, 'Hass und Begeisterung bilden Spalier', p. 110; Siemens, *The Making of a Nazi Hero*, p. 60.

45. 引用于: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78–79.

46. 这一点可以特别关注: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416–418, 435–468;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173–199; Swett, *Neighbors and Enemies*, pp. 237–260。详细的案例研究参见: Reschke, *Der Kampf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um den roten Friedrichshain*。

47.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143–153, here p. 145; Memorandum of the Baden police, *Die SA und SS der NSDAP*, Karlsruhe, 15 May 1931.

48. Kjøstved, 'Dynamics of Mobilisation', pp. 350–352; Krause, *Hamburg wird braun*, pp. 146–148;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136–144.

49. Thomas Welskopp, *Das Banner der Brüderlichkei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vom Vormärz bis zum Sozialistengesetz* (Bonn: Dietz, 2000); Klaus Tenfelde (ed.), *Streik: Zur Geschichte des Arbeitskampfes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der Industrialisierung* (Munich: Beck, 1981).

50. Kjøstved, 'Dynamics of Mobilisation', pp. 343–346; Rudy Koshar, 'Political Gangsters and Nazism: Some Comments on Richard Hamilton's Theory of Fascism.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8:4 (1986), pp. 785–793; Felix Schnell, '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 p. 19.

51. Clayton A. Hartjen, 'Review of Hazen, Jennifer M; Rodgers, Dennis (eds): *Global Gangs: Street Violence across the World*', *H-Socialisms, H-Net Reviews*, August 2014, <https://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42245>。一战后匈牙利准军事组织暴力活动的流氓特性, 参见: Bodó, 'Heroes or Thieves?', pp. 72, 83–89.

52. Ernst Haffner, *Jugend auf der Landstraße Berlin* (Berlin: Cassirer, 1932)。同时代人的评论参见: Siegfried Kracauer, 'Großstadtjugend ohne Arbeit: Zu den Büchern von Lamm und Haffner', in *Essays, Feuilletons, Rezensionen*, vol. 5: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1), pp. 240–243。哈夫纳小说的一个新版本于2013年出版: Ernst Haffner, *Blutsbrüder: Ein Berliner Cliquenroman* (Berlin: Walde + Graf, 2013)。

53. Eberhard Knödler-Bunte, 'Exkurs: Die Binnenstruktur der NSDAP und SA', *Ästhetik & Kommunikation* 26 (1976), pp. 35–37, here p. 35.

54. 关于“科佩尼克上尉”事件及其影响, 参见: Philipp Müller, *Auf der Suche nach dem Täter: Die öffentliche Dramatisierung von Verbrechen im Berlin des Kaiserreich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5), pp. 173–354; 与海因里希·曼所著小说的关联, 参见: Georg Bollenbeck, 'Ein beweglicher Er–Erzähler, komplexe Erzählhaltungen und epochale Repräsentanz: Heinrich Mann, Der Untertan', in *Psyche und Epochenorm: Festschrift für Heinz Thomas zum 60. Geburtstag*, ed. Henning Krauss et al. (Heidelberg: Winter, 2005), pp. 499–519.

55. 关于冲锋队制服及其影响, 参见: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579–589; Noakes,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pp. 185–186; Homberger, *Fashioning German Fascism*; Balister, *Gewalt und Ordnung: Kalkül und Faszination der SA*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1989), pp. 96–102; Rohkrämer, *Die fatale Attrakt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p. 152.

56. 文中引用了希特勒下达给普费弗·冯·萨洛蒙的命令, 根据是1927年2月4日《前进报》第54版的一篇文章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57.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143–153, here p. 146: Memorandum of the Baden police, *Die SA und SS der NSDAP*, Karlsruhe, 15 May 1931.

58. “钢盔团”成员人数参见: Volker R. Berghah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1935* (Düsseldorf: Droste, 1966), pp. 85, 286–287.

59. 关于“红色阵线战士联盟”, 参见: Sewell, 'Bolshevizing Communist Women'; Voigt, *Kampfbünde der Arbeiterbewegung*; Kurt Finker, *Geschichte des roten Frontkämpferbundes* (Berlin: Dietz, 1981); Schuster, *Der Rote Frontkämpferbund*.

60.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原柏林警察局长阿尔伯特·C·格热辛斯基等熟知内情的人将1930年德国首都的局势描述为“内战初期”。参见: Grzesinski, *Inside Germany*, p. 130. 大约同一时期, 纳粹驻首都分支机构认为那里已经“处于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参见: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02, pp. 221–226, here p. 224: Transcript of a speech by Martin Löpeltmann, 12 August 1931.

61. LArch Berlin, A–Rep. 358–01, no. 2165, p. 37: 'Schlagt die Faschisten, wo ihr sie trefft!', *Die Rote Fahne*, 23 January 1930; LArch Berlin, A–Rep. 358–01, no. 2165, pp. 4–6: 'Nieder mit den faschistischen Mördern!', *Die Rote Fahne*, 29 August 1929.

62. 共产党人与纳粹分子都坚决反对“魏玛制度”, 而“帝国国旗”领导层捍卫国家对暴力行动的垄断。虽然该组织普通成员多次参与对政敌的暴力袭击, 但地区领导人——包括汉堡警察局长阿多夫·舍恩费尔德和年轻的斯图加特巡回法官弗里茨·鲍尔——敦促手下发动强有力的示威活动, 不过要放弃身体暴力。参见: McElligott, '... und so kam es zu einer schweren Schlägerei', pp. 66–7; Ronen Steinke, *Fritz Bauer 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Munich and Zurich: Piper, 2013), pp. 89–91; Michael Trauthig, *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 Eine Studie über Gewaltakzeptanz und Krisenmentalität der württembergischen Protestanten zwischen 1918 und 1933* (Leinfelden–Echterdingen: DRW–Verlag, 1999), pp. 53–54.

63. Hubert R. Knickerbocker, *The German Crisis*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2), p. 130; Jacques Decour, *Philisterburg* (Berlin: Die Andere Bibliothek, 2014), p. 70.

64. 'Kütemeyer – “geräuschlose Gegenarbeit des CV”', in *Anti-Anti: Tatsachen zur Judenfrage*, ed. CV–Verein (Berlin: Philo, 1932), p. 35 a–b.

65. Schuster, *Die SA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ergreifung'*, pp. 113–114.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66. 'Der Begräbnis-Umzug der Hakenkreuzler verboten', *Tempo*, 23 November 1928, p. 1.
67. 参见正式指令：GStA PK, I. HA, Rep. 77, Titel 4043, no. 309, p. 145.
68. 1930年，黑森、巴伐利亚、普鲁士、巴登和汉堡当局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警察穿着冲锋队制服，但同样效果有限；参见：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231–232.
69. Paul Hoser, 'Sturmabteilung (SA), 1921–1923/1925–1945', *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 http://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artikel/artikel_44621.
70. Maik Hattenhorst, *Magdeburg 1933: Eine rote Stadt wird braun* (Halle an der Saale: Mitteldeutscher Verlag, 2009), p. 100.
71. GStA PK, XX. HA, Rep. 240 B 31 c, pp. 179–190, here p. 183: 'Erste Anfänge der SA in Ostpreußen'.
72. GStA PK, I. HA, NL Daluge, no. 9, pp. 32–42: Verdict of the Kammergericht, 13 March 1931.
73. 关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司法机关的政治倾向以及对共和国悲惨结局的影响，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在此无法提及。更多参考资料见：Ralph Anger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1945: Krisenerfahrung, Illusion, politische Rechtsprechun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0); Daniel Siemens, 'Die "Vertrauenskrise der Justiz"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ie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Kritik eines Deutungsmusters*, ed. Moritz Föllmer and Rüdiger Graf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5), pp. 139–163.
74. Siemens, 'SA-Gewal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und Staatsräson: Der Fall des Chemnitzer Kriminalamtschefs Albrecht Böhme 1933/34', in *Die Linke im Visier: Zur Errichtung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ed. Nikolaus Wachsmann and Sybille Steinbach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4), pp. 191–213, here p. 191. 萨克森州的情况另见：Andreas Peschel (ed.), *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übernahme': Nachgelassenes von Heinrich Bennecke (1902–1972)* (Markleeberg: Sax, 2012), pp. 41–44, 66, 75. 总体分析参见：Schmidt, *Schützen und Dienen*, pp. 250–310. 德国警察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关系，参见：Joachim Schröder, *Die Münchner Polizei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Essen: Klartext, 2013); 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ed.), *Polizei, Verfolgung und 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remen: Edition Temmen, 2013); Thomas Roth, 'Verbrechensbekämpfung' und soziale Ausgrenzung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öln: Kriminalpolizei, Strafjustiz und abweichendes Verhalten zwischen Machtübernahme und Kriegsende (Cologne: Emons, 2010); Patrick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ohne Verbrecher: Konzeptionen und Praxis der Kriminalpolizei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Christians, 1996).
75. Andreas Wagner, 'Machtergreifung' in Sachsen: NSDAP und staatliche Verwaltung, 1930–1935 (Cologne: Böhlau, 2004), pp. 31–69.
76. 阿尔诺·施赖伯1932年4月26日在萨克森州议会的演讲： *Verhandlungen des Sächsischen Landtags*, 5. Wahlperiode, vol. 3, Dresden 1932, p. 2,991. 鲁尔区的纳粹党于1932年初声称，警察中有35%同情纳粹运动；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11, pp. 25–26: Report from the Berlin Police President to the Regierungspräsident in Düsseldorf, 4 February 1932.
77.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ohne Verbrecher*, pp. 180–187. 另见：'Wegen Hochverrats verhafte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pionage in der Polizei', *Vossische Zeitung*, 10 March 1932, p. 1; 'Grzesinski erklärt', *Vossische Zeitung*, 12 March 1932, p. 3.

78. Karl Gerlach, speech in the Saxon *Landtag*, 26 April 1932, *Verhandlungen des Sächsischen Landtags*, 5. Wahlperiode, vol. 3, Dresden 1932, pp. 2,946–947.

79. GStA PK, VI. HA, NL Daluege, no. 9, pp. 20–24, here p. 23: Regierungsrat Bach (Darmstadt), 'Die Entwick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 in Hessen, besonders im Odenwald.'

80. 'Hat man Ihnen schon zugeflüstert, dass . . .', *Ulk*, 18 December 1930.

81. Siegfried Kracauer, 'Zertrümmerte Fensterscheiben', *Frankfurter Zeitung*, 16 October 1930, as quoted in idem, *Essays, Feuilletons, Rezensionen*, 5:3 (1928–1931), ed. Inka Müller–Bac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1), pp. 348–350, here p. 348.

82. Erich Kästner, *Fabian: The Story of a Moralizer*, trans. Cyrus Brooks (London: Libris 1990), p. 48.

83. Jürgen W. Falter, Thomas Lindenberger, and Siegfried Schumann, *Wahlen und Abstimm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aterialien zum Wahlverhalten 1919–1933* (Munich: Beck, 1986), p. 41; GStA PK, I. HA, Rep. 219, no. 20, pp. 196–199: Circular from the leadership of the KPD at the Ruhr, 12 December 1931.

84. 认真的讨论参见: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pp. 133–142; Balister, *Gewalt und Ordnung*, in particular pp. 55–62, 198–204; Thomas Childers and Eugene Weiss, 'Voters and Violence: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Socialist Mass Mobilisation', *German Studies Review* 13:3 (1990), pp. 481–498.

85. Malinowski,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3rd edn (Berlin: Akademie, 2003), p. 476.

86. 这是蒂莫西·S·布朗的主要调查结果: Timothy S. Brown, *Weimar Radicals: Nazis and Communists between Authenticity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2009).

87. 原冲锋队旅队长弗朗茨·博克在纽伦堡审判中的讲话, 1946年8月12日(星期一), <http://www.nizkor.org/hweb/imt/tgmwc/tgmwc-21/tgmwc-21-201-08.shtml>.

88. Roger Griffin, 'Political Modernism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Personalities of the Right" in Inter-War Europe', in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ed. Rady and Haynes, pp. 20–37, here p. 23; idem, 'Fixing Solutions: Fascist Temporalities as Remedies for Liquid Modernity',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3:1 (2015) pp. 5–22.

89.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1, Band 1/II, p. 147 (entry from 11 November 1926).

90. 官方犯罪统计(如德国司法部发表的)用处有限,因为它们只包含受到惩罚的罪行,而且没有说明被定罪者的政治归属。总体上,1931年和1932年的犯罪活动没有增加,甚至比一战刚结束时更低。然而,叛国罪和违反总统有关政治恐怖活动法令的案例大大增加。参见: Reichsjustizministerium und Statistisches Reichsamt (ed.), *Kriminalstatistik für das Jahr 1932: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448 (Berlin: Verlag für Sozialpolitik, 1935), p. 20.

91. McElligott, '. . . und so kam es zu einer schweren Schlägerei', pp. 60–64, 69. 莱比锡的类似暴力方式,参见: Häberlen, *Vertrauen und Politik im Alltag*, pp. 53–61; 多特蒙德的情况参见:

Schmidt, 'Terror und Terrainkämpfe', pp. 275–280.

92. BArch Berlin, R1501, no. 20234, p. 16: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 Mis I A 2000/13.5, 13 May 1932, as quoted in Camiel Oomen, 'Wir sind die Soldaten der Republik!' *Das Berliner Reichsbanner und die Politische Gewalt 1930–1933*, doctoral diss., Universiteit Utrecht, 2007, p. 21.

93.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p. 186.

94. IfZ Archive, ED 414, vol. 181: 'Statistik der Gewalt', *Vossische Zeitung*, 19 December 1931.

95. Häberlen, *Vertrauen und Politik im Alltag*, p. 44.

96. 引自: Schumann,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p. 306–307.

97.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p. 6.

98. 参见: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1, no. 302, pp. 69–70: Letter from the Berlin Police President to the Pruss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on the search of weapons at an NSDAP meeting, 9 May 1930.

99. Grzesinski, *Inside Germany*, p. 132.

100. 详见: Ulrich Herbert,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Dietz, 1996), pp. 112–119.

101. Schepua,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pfälzischen Provinz, pp. 87–91; 'Bomben für Boxheim', *Vossische Zeitung*, 10 March 1932, p. 1. 关于艾克, 参见尼尔斯·魏泽的详细传记: Niels Weise, *Eicke: Eine SS-Karriere zwischen Nervenlinik, KZ-System und Waffen-SS*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3), P.95–176特别提到了巴拉丁奈特的炸弹袭击。

102. Herbert, *Best*, pp. 116, 118.

103. 例如, 参见: Häberlen, *Vertrauen und Politik im Alltag*, pp. 69–72.

104. Christian Goeschel,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75:1 (2013), pp. 58–80; Siemens, *Horst Wessel*, pp. 25–26, with further references.

105. Kessinger,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in Berlin-Neukölln 1925–1933*, p. 98.

106. Sven Reichardt, 'Violence and Community: A Micro-Study on Nazi Storm Trooper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6:2 (2013), pp. 275–297; reprinted in slightly modified form as Sven Reichardt, 'Vergemeinschaftung durch Gewalt: Der SA– "Mördersturm 33" in Berlin–Charlottenburg', in *SA-Terror als Herrschaftssicherung*, ed. Hordler, pp. 110–129.

107.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Extract from Munich Police's *Lagebericht*, no. 101, Munich, 9 June 1931; Helmut von Klotz, *Wir gestalten durch unser Führerkorps die Zukunft!* (Berlin: Arbeiter-Parteikorrespondenz, 1932), p. 4.

108. Chris Bowlby, 'Blutmai 1929: Police, Parties and Proletarians in a Berlin Confrontation', *Historical Journal* 29:1 (1986), pp. 137–158; Thomas Kurz, 'Blutmai': *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im Brennpunkt der Berliner Ereignisse von 1929* (Bonn: Dietz, 1988); Léon Schirmann, *Altonaer Blutsonntag, 17. Juli 1932: Dichtungen und Wahrheit* (Hamburg: Ergebnisse, 1994); McElligott, *Contested City*, pp. 192–194; Trauthig, *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 p. 54.

109. 罗伯特·格瓦尔特强调, 整个20世纪20年代, 年轻的政治激进分子中存在一种跨党派的

共识：动用暴力即便不是必要的政治工具，也是合理的。这种认识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参见：Gerwarth, 'Rechte Gewaltgemeinschaften und die Stad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 115.

110. Grzesinski, *Inside Germany*, p. 130.

111. 引自：Reschke, *Kampf um den Kiez*, p. 100.

112. University and City Library of Cologne, Archives (UAK), Zugang 386, no. 294: Public Prosecution Office of Cologne, Bill of indictment against Toni Winkelkemper et al., 24 April 1931.

113. 约瑟夫·弗林斯（后来的科隆大主教和红衣主教）1928年—1937年在科隆—布伦斯费尔特圣约瑟夫教堂任教区牧师。他为1946—1947年异常寒冷的冬季里频繁发生的食物及煤炭盗窃行为辩护，因而在战后的德国大受欢迎。这些盗窃行为被称为“Fringsen”，意为在弗林斯的许可下“小偷小摸”。参见：Norbert Trippen, *Joseph Kardinal Frings (1887–1978). Band 1: Sein Wirken für das Erzbistum Köln und für die Kirche in Deutschland*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3).

114. 参见科隆检察院1931年7月21日致科隆大学校长的信。二审裁决参见：'Keine Sühne für den Nazi-Überfall in Braunsfeld!', *Lokalanzeiger*, 10 October 1931 (morning edition). 两份文件都在：UAK, Zugang 386, no. 294.

115. Gerhard Nebel, 'Alles Gefühl ist leiblich': *Ein Stück Autobiographie*, ed. Nicolai Riedel (Marbach am Neckar: 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2003), pp. 130–131.

116.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pp. 133–134.

117. 纳粹分子有时称这条购物街为“选帝侯大街”，暗指那里犹太人的高调作风。参见：Kjøstved, 'Dynamics of Mobilisation', p. 341.

118. Walter, *Antisemitische Kriminalität und Gewalt*, pp. 211–221; Hecht, *Deutsche Juden und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p. 236–268.

119. Herbert Linder, *Von der NSDAP zur SPD*, pp. 152–153.

120. 德国当时的失业统计详情，参见：Statistiken zu Detlev Humann: 'Arbeitsschlacht': *Arbeitsbeschaffung und Propaganda in der NS-Zeit 1933–1939*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1), pp. 10–20, www.wallstein-verlag.de/Statistiken_Humann_AS.pdf. 冲锋队员中的高失业率参见：Theodor 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oziographischer Versuch auf statistischer Grundlage* (Stuttgart: Enke, 1932), pp. 110–111.

121. Kessinger,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in Berlin-Neukölln*, p. 99; Reschke, *Kampf um den Kiez*, p. 128;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p. 85.

122. Grant, *Stormtroopers and Crisis in the Nazi Movement*, p. 31. 1933年2月1日，该城的冲锋队报告称失业率达到75%（Fischer, *Stormtroopers*, p. 48）。

123. 纳粹党员每月捐款10芬尼（1930年9月起为20芬尼）充实冲锋队预算。因此，冲锋队在同时加入纳粹党的成员身上有明显的财务利益。参见：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 134;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p. 160. 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的高流失率，参见：Jamin, 'Zur Rolle der SA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pp. 331–333.

124. Mann, *Fascists*, p. 168. 对这一主题的更详细讨论参见：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pp. 45–49; Hattenhorst, *Magdeburg 1933*, pp. 106–110.

125. Walter Struve, 'Arbeiter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Osterode am Harz bis 1933', in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 Frank Bajohr (Hamburg: Forschungsstelle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mburg, 1993), pp. 67–82, here p. 75.

126.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p. 46.

127. 关于冲锋队社会构成，过去有过大量的调查研究，部分原因是研究者渴望证明，冲锋队尽管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并没有站稳脚跟。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冲锋队确实在1929年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时对工人产生了吸引力。参见：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81–85;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310–323; Schmiechen–Acker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milieus', pp. 268–9, 322–35; Mann, *Fascists*, pp. 167–168.

128. 关于1929–1933年之间酒精消费的减少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及财政后果，参见：Thomas Welskopp, 'Halbleer oder halbvoll? Alkoholwirtschaft, Alkoholkonsum und Konsumkultur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im Deutschen Reich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Biergeschichte(n)', in *Die vielen Gesichter des Konsums: Westfalen, Deutschland und die USA 1850–2000*, ed. Michael Prinz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6), pp. 183–207, here pp. 201–205. 对冲锋队突击队酒馆的全面分析，参见：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449–468.

129.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130–131;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11, p. 4: Der Oberste SA–Führer on 'Arbeitsdienstpflicht', 31 December 1931.

130. Gesamtverband der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 (ed.), *Jahrbuch der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1932: Bericht über das Jahr 1931* (Berlin: Christlicher Gewerkschaftsverlag, 1932), pp. 76–77.

131. 这些数字取自赖夏特的概述：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258–259.

132. BArch Berlin, NS 26/2521: Letter from Hellmuth v. Mücke to Herr Friedrich, 29 August 1929 (emphasis in original). 米克的怒气部分来自他与萨克森州纳粹领导人穆奇曼及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冯·基林格的个人恩怨，但他的信也证明了对该党宣传的更普遍批评，这种宣传利用了短暂的情绪，没有提供持续的思想指导。这一主题参见：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pp. 51–52. 来自一名因失望而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原纳粹党员的批评，参见：Helmut von Klotz, *Wir gestalten durch unser Führerkorps die Zukunft!*; Linder, *Von der NSDAP zur SPD*, pp. 140–189.

133. 1927年10月，施滕内斯晋升为“冲锋队德国东部地区最高领袖”（OSAF–Ost）。参见：Patrick Moreau, *Nationalsozialismus von links. Die '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 und die 'Schwarze Front' Otto Straßers 1930–1935* (Munich: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4), pp. 12–101; Reinhard Kühn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nke 1925–1930*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1966).

134.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 6: 'Wo stehen wir?', *Das Sprachrohr. Organ der Berliner NSDAP*, November 1930. 对1930年纳粹经济及社会地位不相符的深刻分析参见：Decour, *Philisterburg*, pp. 88–89.

135.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p. 61: 'Politische Schulung der SA: Was trennt uns von der NSDAP?', typescript, 6 October 1931; Siemens, 'Prügelpropaganda', p. 36.

136. 详见: Hancock, *Ernst Röhm*, pp. 105–110.

137. 这些人不满的原因之一是, 他们曾要求成为下届国会选举的候选人, 但在最初的让步之后, 希特勒和戈培尔无视这一要求。详见: Sauer, 'Goebbels "Rabauken". Zur Geschichte der SA in Berlin-Brandenburg', in *Berli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ed. Uwe Schaper (Berlin: Jahrbuch des Landesarchivs, 2006), pp. 107–164, here pp. 121–122; Moreau, *Nationalsozialismus von links*, pp. 71–81; Bernhard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59–162.

138. BArch Berlin, NS 23/510: Ernst Röhm, Decree of 31 March 1931.

139.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2, pp. 147–149: Police President Berlin, Abt. IA, on the NSDAP in the capital, 27 November 1930.

140. 关于这些事件, 参见如下备忘录(最有可能是柏林警察提供的): 'Gründe und Auswirkungen des Zwists Hitler-Stennes', in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97–110.

141. 这个联合组织的新名称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战斗团体”。参见: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p. 13–14: NSK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Kampfgesellschaft Deutschland*), Die Oberste SA-Führung, SABE 6 [= SA-Befehl 6] from 6 June 1931. 关于对这一组织“工人阶级激进分子”自我意象的独特印象, 可以参见他们的歌曲《工人、农民和士兵》, 这首歌使用了《来自矿山与矿坑的兄弟》的曲调, 后者本身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对著名社会主义歌曲《兄弟, 走向太阳, 走向自由》的改编; 同上, p.40.

142.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p. 20–22, here p. 20: Nationalsozialistische Kampfbewegung, SA-Befehl No. 4, undated. 在这种背景下, 雅明的“社会主义”或者“革命”思想在两次施滕内斯叛乱中只是次要因素的结论应该修正; 参见: Jamin, 'Zur Rolle der SA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p. 334.

143.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 14: NSKD, Die Oberste SA-Führung, SABE 6 from 6 June 1931.

144.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p. 7–8: G. Kübler, *Die 'R.K.' (Revolutionäre Kämpfer)*, transcript of the second letter 'Schulungsbriefe der Kampfgesell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 March 1931.

145.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 55: Mitteilung Nr. 18 des Landeskriminalamts IA Berlin der Preußischen Polizei, 15 September 1931; Gailus and Siemens, 'Hass und Begeisterung bilden Spalier', pp. 107, 142; Krüger, 'Die Brigade Ehrhardt', p. 122.

146.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p. 20–22, here p. 20: Nationalsozialistische Kampfbewegung, SA-Befehl Nr. 4, undated; Moreau, *Nationalsozialismus von links*, pp. 41–71, 102–199. 关于施滕内斯冲锋队的地方组织, 又见: 'Anlage 1 zu Sabe 7', in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p. 30–31. On Stennes' s post-1934 biography, see Charles Drage, *The Amiable Prussian* (London: Blond, 1958), pp. 105–192; Mechthild Leutner (ed.),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1949: Politik – Militär – Wirtschaft – 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1998), pp. 67, 108.

147. 致希特勒的公开信，发表于1931年9月10日的《城乡新闻》，引用于：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pp. 184–185.

148. 对这一魏玛共和国最著名“腐败丑闻”的最新调查，参见：Annika Klein, *Korruption und Korruptionsskandal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4).

149.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97–110, here p. 101: ‘Gründe und Auswirkungen des Zwists Hitler–Stennes’.

150.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Teil 1, Band 2/II, p. 361 (entry from 11 September 1932).

151. BArch Berlin, NS 23/510: Transcript of the Munich police’s *Lagebericht* from 20 October 1932.

152. BArch Berlin, NS 23/337, p. 228: Development of SA membership between July 1932 and January 1933.

153.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pp. 166–80;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267–269.

154. Mechthild Hempe,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in der Krise: Mecklenbur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Böhlau, 2002), pp. 57–128, 181–199.

155. Schuster, *Die SA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ergreifung’*, pp. 94–95.

156. 参见：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p. 114；以及下面引用的历史研究著作。

157. Matthiesen, *Greifswald in Vorpommern*, p. 221.

158. 海因里希·舍内1889年11月25日生于柏林，在第三帝国中有着非凡的职业经历。1934年2月，他被任命为柯尼斯堡警察局长和冲锋队奥斯特马克地区总队长。1941年9月1日起，他担任乌克兰帝国专员辖区中沃里尼亚与波多利亚大区专员。舍内死于1945年4月。他的详细传记参见：BArch Berlin, SA 400003464 (Schoene, Heinrich). 关于他参与虐待乌克兰平民的情况，参见：Karel C.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2004), pp. 267–268.

159.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09, pp. 337–338: Report on speeches of the leader of the SA–Gruppe Ober–Nord, Major a.d. Dinglage [Karl Dincklage] and his adjutant Schöhne [Heinrich Schoene], 8 March 1929.

160. BArch Berlin, NS 23/1239: Heinrich Schoene, *Gaubefehl*, 10 May 1929.

161. 参见：Alexander Otto–Morris, *Rebellion in the Province: The Landvolkbewegung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Schleswig-Holstei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13); idem, ‘“Bauer, wahre dein Recht!” Landvolkbeweg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1928/30’, in ‘Siegesszug in der Nordmark’: *Schleswig-Holstei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1925–1950. Schlaglichter – Studien – Rekonstruktionen*, ed. Kay Dohnke et al. (Kiel: Arbeitskreis zur Erforsch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chleswig–Holstein, 2009), pp. 55–74; Gerhard Stoltenberg, *Politische Strömungen im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Landvolk 1918–1933: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Meinungsbild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Droste, 1962), pp. 128–181; Rudolf Heberle, *Landbevö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in Schleswig-Holstein 1918–1932*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波美拉尼亚西部的类似发展参见：Matthiesen, *Greifswald in Vorpommern*, pp. 220–238.

162.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pp. 472–478; Gerhard Reifferscheid, 'Die NSDAP in Ostpreußen: Besonderheiten ihrer Ausbreitung und Tätigkeit',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und Altertumskunde Ermlands* 39 (1978), pp. 61–85, here pp. 64, 67; Schnabel, 'Die NSDAP in Württemberg 1928–1933'; GStA PK, VI. HA, NL Daluge, no. 9, pp. 20–24; Regierungsrat Bach (Darmstadt), 'Die Entwick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 in Hessen, besonders im Odenwald';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vol. 311, p. 318; Racliffe (Polizeimajor), 'Denkschrift über Kampfvorbereitung und Kampfgrundsätze radikaler Organisationen', 1931. 关于纳粹党在巴伐利亚农村的宣传活动, 参见: Geoffrey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 1923–1933* (London: Hart–Davis, 1973), pp. 224–236.

163.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p. 229.

164. Bösch, *Das konservative Milieu*, pp. 116–132. 小城镇中的类似进程参见: Koshar, 'From Stammtisch to Party'; Bergerson, *Ordinary Germans in Extraordinary Times*.

165.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pp. 324–432; Adelheid von Saldern, 'Sozialmilieus und der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Norddeutschland (1930–1933)', in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 Frank Bajohr (Hamburg: Ergebnisse, 1993), pp. 20–52, here p. 36.

166.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p. 164. 在巴伐利亚农村地区, 情况显著不同于德国北部。南方地区较低阶层(熟练和不熟练劳动者)占多数。同上, P.165–166。

167. Bösch, *Das konservative Milieu*, p. 119.

168.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p. 131.

169.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pp. 324–329.

170. Hans–Helmuth Krenzlin, *Das NSKK: Wesen, Aufgaben und Aufbau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raftfahrkorps, dargestellt an einem Abriß sein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Berlin: Junker und Dünhaupt, 1939), p. 7.

171.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143–153, here pp. 148–149: Memorandum of the Baden police, *Die SA und SS der NSDAP*, Karlsruhe, 15 May 1931; Hochstetter, *Motorisierung und 'Volksgemeinschaft'*, pp. 21–39; Krenzlin, *Das NSKK*, pp. 9–11. On working-class youth's excitement about the NSKK, see Michael Zimmermann, 'Ausbruchshoffnung: Junge Bergleute in den Dreißiger Jahren', in *Die Jahre weiß man nicht, wo man die heute hinsetzen soll: Faschismuserfahrungen im Ruhrgebiet*, ed. Lutz Niethammer (Bonn: Dietz, 1983), pp. 97–132, here pp. 101–102.

172. 在天主教人口占多数的乡村, 冲锋队组织出现较晚, 招募工作也比较不成功, 但地方差异也很明显。可参见: Heilbronner, *Catholicism,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untryside*, pp. 112–115.

173. Benjamin Schröder, 'Stately Ceremony and Carnival: Voting and Social Pressure in Germany and Britain between the World Wars', *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 23:1 (2013), pp. 41–63, here pp. 61, 63.

174. 对这一主题的更详细分析, 参见: Daniel Siemens, 'Gegen den "gesinnungsschwachen Stimmzettelträger": Emotion und Praxis im Wahlkampf der späten Weimarer Republik', in *Kultur und Praxis der Wahlen: Eine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ed. Hedwig Richter and Hubertus

Buchstein (Wiesbaden: Springer, 2017), pp. 215–236.

175. 关于冯·奥伯尼茨，参见：Utho Grieser, *Himmlers Mann in Nürnberg. Der Fall Benno Martin: Eine Studie zur Struktur des Dritten Reiches in der 'Stadt der Reichsparteitage'* (Nuremberg: Stadtarchiv, 1974), pp. 44–61.

176. 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相当一部分德国东部贵族对纳粹党的同情，参见：Bergien, *Die bellizistische Republik*, pp. 308–323; Malinowski and Reichardt,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

177.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13, no. 311, pp. 210–214: SA–Untergruppe Oberschlesien, 'Besondere Anordnung: Propagandastürme für die Wahlarbeit', 22 March 1932.

178.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13, no. 311, p. 65: Report of Regierungsrat Dr Müller.

179.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11, p. 5: Der Oberste SA–Führer on propaganda marches, 7 January 1932. 正如“红色阵线战士”组织中关于妇女参与街头游行的讨论所示，这种禁令并非纳粹党独有，而是魏玛街头政治“男子化”特性的表现。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Daniel Siemens, 'Erobern statt Verführen: Die Kategorie Geschlecht in der Politik der Straß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Geschlechter(un)ordnung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d. Gabriele Metzler and Dirk Schumann (Bonn: Dietz, 2016), pp. 255–277.

180. 莫里茨·弗尔默最近提出，纳粹主义允许的个人发展空间比此前认为的更大。但是，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出身（宽泛定义的）中产阶级的德国男性及女性。我同意弗尔默的总体结论——纳粹政权鼓励个人的自我转变，但此类研究应该强调阶级特征。本书提供的冲锋队历史清楚地表明了阶级间动态与个人赋权的局限性。参见：Moritz Föllmer,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Nazism', *Historical Journal* 56:4 (2013), pp. 1,107–1,132.

181. Stefan Jonsson, *Crowds and Democracy: The Idea and Image of the Masses from Revolution to Fas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50.

182. Siegfried Kracauer, 'The Mass Ornament', in *The Mass Ornament: Weimar Essays*, trans. and ed. Thomas Y. Levin (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75–86, here esp. pp. 75–76, 84–86.

183. 同上, pp. 76, 79.

183. 同上, pp. 76, 79.

184.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

185. 这一评论与刘易斯·A·柯泽的社会学发现相符，柯泽观察到，“贪婪”的组织“倾向于将稳定的性关系视为一种威胁，不利于他们对所有或某些成员彻底效忠及献身的要求。”参见：Coser, *Greedy Institutions*, p. 136.

186.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372–437, here p. 386: Werner von Fichte, typescript of a booklet on the SA, untitled and undated, sixty–five pages.

187. Ferdinand Tuohy, *Craziways, Europ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4), p. 18, as quoted in Angela Schwarz, 'British Visitors to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8:3 (1993), pp. 487–509, here pp. 490–491. 1931年4月20日起，冲锋队医生指南要求，他们定期为普通队

员举办有关个人保健、营养及性病的讲座。为了避免最后一个问题，医生们被要求宣传关于节欲的信念。参见：BArch Berlin, NS 23/510: [Reichsarzt] Paul Hocheisen, 'Anweisung betr. Aufgaben und Tätigkeit der SA-Ärzte', 20 April 1931.

188. Kracauer, 'Mass Ornament', pp. 85–86.

189. 约瑟夫·戈培尔在1939年2月17日柏林汽车展开幕式上的讲话，引自：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96.

190. 戈培尔1943年7月7日在海德堡市政厅的讲话，同上，P.196。

191. 这种倾向甚至统治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兴起”的编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参见：Oded Heilbrunner, 'The Role of Nazi Antisemitism in the Nazi Party's Activity and Propaganda: A Regional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35 (1990), pp. 397–439.

192. 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 (ed.), *Eine Aussprache über die Judenfrage zwischen Dr. Margarete Adam (mit einem Nachwort: Warum habe 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 gewählt) und Dr. Eva Reichmann-Jungmann* (Berlin: Centralverein, 1930/1931), pp. 19, 23.

193. 这次会议的详情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and Bonn: Dietz, 1987), pp. 432–434.

194. 恩斯特·布兰迪1932年7月给儿子F.·H.·布兰迪的信，引自：Werner Abelshauser, *Ruhrkohle und Politik: Ernst Brandt 1875–1933. Eine Biographie* (Essen: Klartext, 2009), p. 71.

195. 同上，P.90。

196. Siegfried Kracauer, 'Die deutschen Bevölkerungsschicht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n Kracauer, *Essays, Feuilletons, Rezensionen* 5:4, pp. 433–445, here p. 439.

197.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110–111.

198. 恩斯特·布兰迪1932年7月给儿子F.·H.·布兰迪的信，引自：Abelshauser, *Ruhrkohle und Politik*, p. 71.

199. 关于工业界对纳粹的支持及其范围，参见：Henry Ashby Turner, Jr., '“Alliance of Elites” as a Cause of Weimar's Collapse and Hitler's Triumph?', in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ed.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Munich: Oldenbourg, 1992), pp. 205–214; Jürgen John, 'Zur politischen Rolle der Groß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Staatskrise. Gesicherte Erkenntnisse und strittige Meinungen', in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pp. 215–237.

200. *Hamburger Echo*, no. 250 from 18 October 1932, as quoted in McElligott, '“... und so kam es zu einer schweren Schlägerei”', p. 72.

201. 这个术语用于：Grzesinski, *Inside Germany*, p. 130.

202. Deutsche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ed.), *Seminar für SA-Führer: Winter-Lehrgang 1937/38* (Berlin: Deutsche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1937), p. 16.

203. Friedrich Lenger, *Metropolen der Moderne: Eine europäische Stadtgeschichte seit 1850* (Munich: Beck, 2013), p. 393. 这里提到的研究著作是：Schumann,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lasius, *Weimars Ende*; 以及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204. 观察这一发展的不同角度，参见：Michael Wildt, *Volksgemeinschaft als Selbstermächtigung: Gewalt gegen Juden in der deutschen Provinz 1919 bis 1939*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7); Szejnmann, *Nazism in Central Germany*; Bergien, *Die bellizistische Republik*; Schmidt, *Schützen und Dienen*.

205.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pp. 646–680.

206. 多名冲锋队领导人（包括纽伦堡的威廉·施特格曼）在1932年底之前倡导，如果兴登堡继续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则回到“自卫队”策略。发生内部分歧之后，施特格曼于1933年初离开纳粹党，组织了弗兰肯自由军团，该军团成长到2000–3000人。1933年1月30日的事件为该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进一步煽动提供了理由。参见：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163–164.

207.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p. 201; Lenger, *Metropolen der Moderne*, p. 393.

208. Sebastian Ulrich, *Der Weimar-Komplex: Das Scheitern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und die politische Kultur der frühen Bundesrepublik*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9), esp. pp. 79–143, 376–535.

209. 根据海因里希·本内克的说法，冲锋队参谋长罗姆没有在这个场合出现，而是参加了慕尼黑冲锋队帝国领导力学校的一次社交晚会，从收音机跟踪事件进展；Peschel (ed.), *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übernahme'*, p. 76.

210. Peter Fritzsche, *The Turbulent World of Franz Göll: An Ordinary Berliner Writ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49.

211. 引自：Bernt Engelmann, *Im Gleichschritt marsch: Wie wir die Nazizeit erlebten 1933–1939* (Cologne: Kiepenheuer & Witsch, 1982), p. 51. 根据后来的回忆录和纳粹报纸报道，对这次游行“规模”做出的详细而略有夸大的描述，参见：Peter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9–141.

第3章

1. 首次出现在： *Encyclopedia Italiana*, vol. 14 (1932), 引自：Benito Mussolini, 'The Doctrine of Fascism', in his *Fascism: Doctrine and Institutions* (Rome: Ardita, 1935), pp. 5–42, here p. 8.

2. Ernst Bloch, 'Reminder: Hitler's Force', in *Heritage of Our Tim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45–148, here p. 147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Erinnerung: Hitlers Gewalt', *Das Tage-Buch* 5:15 [1924], 12 April, pp. 474–477).

3. 同上，P.146。

4. Martin Blinkhorn, *Fascism and the Right in Europe, 1919–1945* (Harlow: Pearson, 2000), pp. 19–24.

5. Patrizia Dogliani, 'Propaganda and Youth',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ascism*, ed. R. J. B. Bosworth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85–202, here p. 186.

6. 参见：Michael Geyer, 'The Militarization of Europe 1914–1945', in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ed. John R. Gilli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5–102. 吕迪格尔·博吉恩后来批评许多研究中宽泛地使用“军事化”一词，建议用“好战倾向”代替；Bergien, *Die bellizistische Republik*, pp. 33–37. 不过，只要能够避免将“军事化”狭隘地等同于准备

常规战争的黩武行为，我仍然偏向于使用这个词。

7. 参见：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pp. 231–310.

8. 最新的总结参见：Rohkrämer, *Die fatale Attrakt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pp. 151–160.

9. 参见：O' sullivan, *Fasism*, pp. 33–84.

10. 参见：Kater, 'Ansätze zu einer Soziologie der SA', pp. 815–817; Campbell, *SA Generals*, pp. 29–79. 不过，其他研究人员强调，冲锋队不总是纳粹党宣传中描述的“年轻”组织。例如，“黑森林”的早期冲锋队积极分子大部分在35–39岁，参见：Heilbronner, *Catholicism,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untryside*, pp. 62–63.

11. 对此事的批评立场参见：Benninghaus, 'Das Geschlecht der Generation'.

12. Ernst Günther Gründel, *Die Sendung der jungen Generation* (Munich: Beck, 1932)对于自称“战争中年轻一代”的现象已经有了大量分析，参见：Andrew Donson, *Youth in the Fatherless Land: War Pedagogy, Nationalism, and Authority in Germany, 1914–191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59–107; Herbert, *Best*; Helmut Lethen, *Cool Conduct: The Culture of Distance in Weimar Germany* (Berkeley,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Daniel Siemens, 'Kühle Romantiker: Zum Geschichtsverständnis der "jungen Generat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ie Kunst der Geschichte: Historiographie, Ästhetik, Erzählung*, ed. Martin Baumeister, Moritz Föllmer, and Philipp Müll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9), pp. 189–214; Christian Ingrao, *Believe and Destroy: Intellectuals and the SS War Machine* (Cambridge: Polity, 2013), pp. 3–16.

13. Gerwarth, 'Central European Counter–Revolution', p. 181.

14. 同上。

15. Weisbrod, 'Gewalt in der Politik', p. 393. 但是，至少在埃朗根，学生对这些单位的欢迎程度有限。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在战争年代接受军事训练，或者积极参与这些“学生连”的战斗。参见：Manfred Franze, *Die Erlanger Studentenschaft 1918–1945* (Würzburg: Schöningh, 1972), pp. 29–31.

16. Othmar Plöckinger, 'Adolf Hitler als Hörer an der Universität München im Jahr 1919: Zum Verhältnis zwischen Reichswehr und Universität', in *Die Universität München im Dritten Reich: Aufsätze. Teil II*, ed. Elisabeth Kraus (Munich: Utz, 2008), pp. 13–47, here pp. 14–17; von Oerzen, *Die deutschen Freikorps 1918–1923*, pp. 422–431（特别是关于莱比锡和维尔茨堡的章节）。

17. 具有强烈暴力倾向的布达佩斯学生营成员自视为辅警部队，他们的人数从1919年的3000人增加到次年夏季的10000人。参见：Bodó, 'Heroes or Thieves?', pp. 94–95; Gerwarth, 'Rechte Gewaltgemeinschaften und die Stad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p. 118–119.

18. Chris Millington, 'Political Violence in Interwar France', *History Compass* 10:3 (2013), pp. 246–259, here p. 249; Dominique Borne and Henri Dubief,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28*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9), p. 93; Xavier Cheneseau, *Camelots du Roi: Les troupes de choc royalistes (1908–1936)* (Boulogne: Éditions Defi, 1997), pp. 46–47.

19. Plöckinger, 'Adolf Hitler als Hörer an der Universität München', pp. 15–16.

20. 巴伐利亚“民团”还在国防军临时支援部队按照《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4月1日解散后整合了它们的成员。参见：BayHStA IV, Bestand Reichswehr, Brigade 23: Letter from the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Reichswehrgruppenkommando no. 4 on 'Auflösung der Reichswehr-Zeitfreiwilligen', 9 March 1920.

21.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pp. 174–183: An early list of SA members (from Maurice), presumably intercepted by the police in September 1921.

22. Hambrecht,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Mittel-und Oberfranken*, pp. 45–46.

23. Geoffrey Giles,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6; Steinke, *Fritz Bauer 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p. 54. 20世纪30年代初，仅由学生组成的冲锋队单位在德国各个大学城迅速成长。例如，科隆的法学学生海因茨·西彭被任命为当地第一个冲锋队大学突击队领导人，参见：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vol. 311, p. 52.

24. 关于“急性子”克林奇，参见作家费迪兰德·林德纳1921年9月的描述：LArch Freiburg, F 179/4 Nr. 110, p. 9.

25. Frank Bajohr, *'Unser Hotel ist judenfrei': Bäder-Antisemit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3), pp. 73–88.

26. Heinz Wegener, *Das Joachimsthalsche Gymnasium – Die Landesschule Templin: Ein berlin-brandenburgisches Gymnasium im Mahlstrom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607–2007* (Berlin: Berlin Story, 2007), pp. 113–115; Walsdorff, 'Hans-Ulrich Klintzsch'.

27. LArch Freiburg, F 179/4 no. 110, pp. 15–22, here p. 17: Offenburg regional court, Record of interrogation of Hans Ulrich Klintzsch, 16 September 1921.

28. 慕尼黑理工大学（TU）档案馆2016年6月7日给作者的电子邮件；LKA Stuttgart, A 127, no. 1293: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 Hans-Ulrich Klintzsch (1949/50). 我还查询了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LMU）1921–1926年的学生登记名册，但是没有结果。LMU图书馆网站epub.ub.uni-muenchen.de/view/lmu/pverz.html上有数字化的教授与学生名册。

29. LArch Freiburg, F 179/4 no. 153, pp. 81–83, here p. 83: Tübingen local court, Record of interrogation of Dietrich von Jagow, 2 February 1922; Brigitte RiethMüller and Hermann-Arndt RiethMüller, *Osiander. Die Geschichte einer Buchhandlung*, http://www.osiander.de/download/Osiander_Geschichte_Stand_2013.pdf.

30. Barbara Hachmann, 'Der "Degen". Dietrich von Jagow, SA-Obergruppenführer', in *Die Führer der Provinz: NS-Biographien aus Baden und Württemberg*, ed. Michael Kißener and Joachim Scholtyseck (Konstanz: UKV, 1997), pp. 267–287, here pp. 271–272; Ernst Piper, *Alfred Rosenberg: Hitlers Chefideologe* (Munich: Blessing, 2005), p. 52; Rafael Binkowski, *Die Entwicklung der Parteien in Herrenberg 1918–1933: Ausprägungen der Parteienentwicklung auf lokaler Eben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m Beispiel der Stadt Herrenberg und anderer südwestdeutscher Vergleichsstädte*, university diss., Universität Stuttgart, 2007, <http://elib.uni-stuttgart.de/opus/volltexte/2007/3273/>, pp. 296–297, 313–314.

31. Hermann Schützinger, 'Tübingen', *Die Weltbühne* 22:2 (1926), no. 32, 10 August, pp. 207–210, here 209–10. 真正的历史研究得出了非常类似的结论，不仅是图宾根：“德国大学的文化政治环境倾向于右派，和他们的教授一样，德国学生也倾向于民族主义者、反共分子和反犹太主义者，与新兴的纳粹党完全一致”；参见：Hilary Earl, '“Bad Nazis and Other Germans”: The fate of SS-Einsatzgruppen Commander Martin Sandberger in Postwar Germany', in *A Nazi Past: Recasting German*

Identity in Postwar Europe, ed. David A. Messenger and Katrin Paehle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15), pp. 57–82, here pp. 60–61. 强调图宾根大学对纳粹运动普遍同情, 同时指出很长时间内纳粹组织在那里招募并不比其他地方容易的客观评价, 参见: Hans-Joachim Lang, 'Di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orschung – Lehre – Unrecht: Di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 Ernst Seidl (Tübingen: MUT, 2015), pp. 33–49.

32. 领导这些学生的, 是年轻的特奥多尔·埃申堡旗下的“德国艺术高校联盟”。参见: Benigna Schönhagen, 'Stadt und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n der NS-Zeit', in *Di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 Urban Wiesing et al. (Stuttgart: Steiner, 2010), pp. 731–758, here p. 743; Uwe Dietrich Adam,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m Dritten Reich* (Tübingen: Mohr, 1977), p. 22; Trauthig, *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 p. 64. 关于贡贝尔, 参见: Christian Jansen, *Emil Julius Gumbel: Porträt eines Zivilisten* (Heidelberg: Wunderhorn, 1991).

33. Adam,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pp. 22–23. 但是, 冲锋队最初不允许组建真正的学生“突击队”, 因为这被视为与该党打破阶级界限的“人民共同体”理想相悖的新型精英主义思想。1932年, 随着新的“学生联盟组织”的建立, 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 该组织试图强化德国大学的准军事训练。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510: Transcript of the Munich police's *Lagebericht* from 20 October 1932.

34. 根据纳粹自己的统计, 1929年初就有48名冲锋队领导人和600–700名普通队员是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 参见: *Schirach, Wille und We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bundes* (Munich: NSDAP, 1929), p. 11. 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明显分歧。米夏埃尔·卡特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 尽管纳粹宣传中“头脑与手”(即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占据重要地位, 但冲锋队的学生激进活动仍很有限。卡特尔宣称, 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中, 成为冲锋队员的不足40%。然而, 考虑到1928年起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许多德国大学中的重要性, 这算不算一个小数目似乎颇具争议; Michael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amburg: Hoffmann & Campe, 1975), pp. 186–197. 与卡特尔相反, 特奥多尔·盖格尔确定, 中产阶级男青年(特别是学生)是“民族主义激进活动的支柱”; 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p. 115.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兴起以及与冲锋队的关系, 也可参见: Giles,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p. 44–100; 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5), pp. 19–61; Schön, *Die Entsteh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ssen*, pp. 104–116.

35. 这种推理的一个例子, 参见: LArch Freiburg, F 179/4 Nr. 110, pp. 15–22, here p. 19: Offenburg regional court, Record of interrogation of Hans Ulrich Klintzsch, 16 September 1921. 具有较自由倾向的学生同样强调, 他们感受到组成“民族共同体”的号召; 参见: Fritz Söhlmann, 'Akademiker und Volksgemeinschaft. Die Aufgabe einer studentischen Selbstverwaltung', *Der Jungdeutsche*, 27 June 1929, in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160, p. 90.

36.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372–437, here p. 374: Werner von Fichte, Typescript of a booklet on the SA, untitled and undated, sixty-five pages.

37. 关于这种发展以及在德国青年运动内的地位, 参见最新出版的如下著作: Ahrens,

Bündische Jugend, and Barbara Stambolis (ed.), *Die Jugendbewegung und ihre Wirkungen: Prägungen, Vernetzungen, gesellschaftliche Einflussnahmen*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5). 青年运动与纳粹党轨迹重合的例子，参见：BArch Berlin, NS 26/370: Letter from Rudolf Schmidt, 'Anschriften Egerland', undated.

38. 这方面有启发意义的是冲锋队突击队长霍斯特·韦塞尔的旅行报告，他于1927年骑自行车从柏林前往纽伦堡参见纳粹党集会。报告中对德国风景与人民政治意愿的描写交织在一起。参见：Gailus and Siemens (eds), 'Hass und Begeisterung bilden Spalier', pp. 157–183.

39.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372–437, here pp. 374–375: Werner von Fichte, Typescript of a booklet on the SA.

40. Stefan Vogt, 'Strange Encounters: Social Democracy and Radical Nationalism in Weimar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5:2 (2010), pp. 253–281; idem, *Nationaler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Demokratie: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Junge Rechte 1918–1945* (Bonn: Dietz, 2006).

41. Carl Mierendorff, 'Republik', in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38:2, 1932, p. 793, as quoted in Vogt, *Nationaler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Demokratie*, p. 222.

42. 阿尔弗雷德·韦伯在*Das Ende der Demokratie? Ein Vortrag* (Berlin: Junker & Dünnhaupt, 1931)，P.23中满怀赞许地使用了“集权主义民主制”一词。还可参见：Carl Mierendorff, 'Wahlreform, die Lösung der jungen Generation', *Neue Blätter für den Sozialismus* 1 (1930), pp. 342–349. 最详尽且最具影响力的宣言是：Edgar J. Jung, *Die Herrschaft der Minderwertigen: Ihr Zerfall und ihre Ablösung durch ein Neues Reich* (Berlin: Verlag Deutsche Rundschau, 1930); 以及理想主义色彩没那么浓的：Ernst Jünger, *Der Arbeiter: Herrschaft und Gestalt*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2)。

43. August Rathmann, 'Neuer Anfang sozialdemokratischer Politik?', *Neue Blätter für den Sozialismus* 1 (1930), pp. 388–395, here p. 390. 几年之后，流亡的德国法学家卡尔·勒文施泰因采用了类似的措辞，称“过去令人激动的早期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已经无法复活。现在，人们不想为自由而死。” Karl Loewenstein, '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1:3 (1937), pp. 417–432, here p. 428.

44. 更多详细讨论参见：Elizabeth Harvey, 'The Cult of Youth', in *A Companion to Europe 1900–1945*, ed. Gordon Martel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2006), pp. 66–81, esp. pp. 75–78; Kater, *Hitler Youth*, p. 10.

45. Kater, *Hitler Youth*, p. 382.

46.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Transcript of a blank form of an SA declaration of engagement (*Verpflichtungsschein*).

47.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190–191. See also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673–679. 纳粹宣传同样强调女性对于冲锋队的重要性。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法兰克福警察局长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在1940年赞颂了女性对冲锋队的贡献，特别是她们在“激战时代”广泛传播纳粹思想的积极作用，以及危机时刻对丈夫及伙伴们的安慰。参见：Adolf-Heinz Beckerle, 'Unsere Frauen', *Die SA* 1:34 (1940), pp. 5–6.

48.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Paragraph 6 of the *Satzung der Sturmabtei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17 September 1926, modified on 31 May 1927.

49. BayHStA IV, Bestand Stahlhelm, no. 97: Stahlhelm-Führerspiegel (draft from September 1931), paragraph XIV.

50. 类似的结论参见: Eley, *Nazism as Fascism*, pp. 92–93. 到1930年,“妇女部”不再受冲锋队控制。参见: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143–153, here p. 143: Memorandum of the Baden police, *Die SA und SS der NSDAP*, Karlsruhe, 15 May 1931。

51. 也可参见: Axel Fehlhaber, Detlef Garz, and Sandra Kirsch, ‘“Wie ich Nationalsozialistin wurde” – Erste Annäherungen an eine Typologie weiblichen Engagements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 auf Basis der Abel-Collection’, *sozialersinn* 8:2 (2007), pp. 357–383.

52.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 Stanford, CA (HILA), Theodore Fred Abel Papers, Box 1, no. F44: Hilde Boehm-Stoltz, *Warum und wie ich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kam* (1933). 到1932年,伯姆-施托尔茨已经在纳粹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参见: Stoltz, ‘Die Nationalsozialistin und die Familie’,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0 January 1932, 引自: Leila J. Rupp, *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 1939–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2.

53. HILA, Theodore Fred Abel Papers, Box 1, no. F36: Hertha von Reuß, ‘Wie ich zur NSDAP kam’ (1933).

54. 同上: Box 1, no. F41: Marlene Heder, ‘Wie es kam, daß wir zwei Schwestern mit 19 und 20 Jahren schon zu den alten oder wenigstens älteren Kämpfern der Bewegung gehören’ (1933).

55. 也可参见: Lara Hensch: ‘“Wir aber sind mitten im Kampf aufgewachsen” – Erster Weltkrieg und “Kampfzeit” in Selbstdarstellungen früher SA-Männer’, in *Bürgerkriegsarmee*, ed. Müller and Zilkenat, pp. 331–353.

56. 在这个方面,约阿希姆·C·哈伯伦近来试图确认女性是魏玛街头政治暴力中的主要角色,但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他为女性共产党人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并不能证明女性民族社会主义者同样积极。参见: Joachim C. Häberlen, ‘“Weiter haben sich zwei Frauenpersonen besonders hervorgetan”: Zur Rolle von Frauen in der Straßenpolitik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L’Homme: Europäische Zeitschrift für feministi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23:1 (2012), pp. 91–105. 关于共产党内部性别比例不平衡的情况,参见: Sewell, ‘Bolshevizing Communist Women’.

57. 关于1933年之前女性加入纳粹党的动机,也可参见: Marit A. Berntson and Brian Ault, ‘Gender and Nazism: Women Joiners of the Pre-1933 Nazi Par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9:9 (1998), pp. 1,193–1,218; Boak, ‘Mobilising Women for Hitler’.

58. Lore Snyckers, ‘Wie SA-Frauen’, *Die SA* 1:34 (1940), p. 7. 关于她丈夫的传略,参见: ‘SA-Sturmbannführer Dr. Hans Snyckers’, *Die SA* 2:9 (1941), p. 12. 汉斯·施尼克斯此后成为布拉迪斯拉发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Frank-Rutger Hausmann, ‘Auch im Krieg schweigen die Musen nicht’: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e im Zweiten Weltkrie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1), p. 322.

59. Hattenhorst, *Magdeburg 1933*, p. 110.

60. Riccardo Bavaj, *Die Ambivalenz der Moder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Bilanz der Forschung* (Munich: Oldenbourg, 2003). 关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女性学生数量的增加, 参见: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p. 119–126; 关于女性在第三帝国的(职业)发展空间, 参见: Kirsten Heinsohn, Barbara Vogel, and Ulrike Weckel (eds), *Zwischen Karriere und Verfolgung: Handlungsspielräume von Frau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7); 对性别与民族社会主义的最新概述, 参见: Matthew Stibbe, 'In and Beyond the Racial State: Gend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55', *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 13:2 (2012), pp. 159–178; Johanna Gehmacher and Gabriella Hauch (eds), *Frauen- und Geschlechter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gestellungen, Perspektiven, neue Forschungen* (Innsbruck: Studien Verlag, 2007).

61. Schweyer, *Politische Geheimverbände*, p. 108.

62. Hermann Schützinger, *Bürgerkrieg* (Leipzig: Oldenburg, 1924), pp. 56, 59. See also BArch Berlin, R1501/20234: 'Auch ein Reichsbannerführer: Aus der Vergangenheit des Herrn Schützinger',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1 May 1932.

63. 关于这一时期的各种青年政治组织, 参见: Wolfgang Krabbe, *Die gescheiterte Zukunft der Ersten Republik: Jugendorganisationen bürgerlicher Parteien im Weimarer Staat (1918–1933)*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5); Irmtraud Götz von Olenhusen, 'Die Krise der jungen Generation und der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Analyse der Jugendorganisationen der Weimarer Zeit', *Jahrbuch des Archivs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12 (1980), pp. 53–86.

64. 进一步的介绍参见: Jan Plamper, *Geschichte und Gefühl: Grundlagen der Emotionsgeschichte* (Munich: Siedler, 2012).

65. 这方面的先驱是: Wolfgang Schieder (ed.), *Faschismus als soziale Bewegung: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im Vergleich*, 2nd ed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

66. 贝伦特的传记参见: Katja Windisch, *Gestalten sozialen Wandels: Die Entwicklungssoziologie Richard F. Behrendts* (Bern: Lang, 2005), pp. 19–31.

67. Richard F. Behrendt, *Politischer Aktivismus: Ein Versuch zur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der Politik* (Leipzig: Hirschfeld, 1932). 对这本书的更详细分析, 参见: Daniel Siemens, 'Politische Gewalt als emotionale Befriedigung',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en/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13:1 (2016), pp. 172–178.

68. 格奥尔格·卢卡茨在他的*Die Theorie des Romans* (Berlin: Cassirer, 1920)中首次使用了“精神无家可归”一词。

69. Behrendt, *Politischer Aktivismus*, pp. 57–61.

70. 与这些意见相符的, 是教师、知识分子格哈德·尼贝尔的回忆录, 他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1932年底“心满意足”地参与了多次与意识形态敌人的冲突: (Nebel, 'Alles Gefühl ist leiblich', p. 130)。

71. 这是赫尔曼·施马伦巴赫 'Die soziologische Kategorie des Bundes' (*Die Dioskuren: Jahrbuch für Geisteswissenschaften* 1 (1922), pp. 35–105) 中提出的主要思路。这篇论文对贝伦特的作品影响很大。关于施马伦巴赫的概念, 还可参见: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390–393.

72. Behrendt, *Politischer Aktivismus*, pp. 62, 80–81, 96–103, 106。与贝伦特无关，托马斯·洛克雷默最近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Rohkrämer, *Die fatale Attrakt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pp. 148–149。

73. Ludwig Holländer, 'Klarheit, Arbeit, Mut!', *CV-Zeitung*, 19 September 1930, p. 1.

74. “情感共同体”的概念参见：Barbara H.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1; and, recently, idem, *Generations of Feelings: A History of Emotions, 600–1700*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4–6。关于情感与情绪之间区别及两者社会相关性的最新辩论，参见：Edward J. Lawler, 'An Affect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2 (2001), pp. 321–352; Anna M. Parkinson, *An Emotional State: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Postwar West German Cultur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 pp. 10–24。

75. Joachim Raschke, *Soziale Bewegungen: Ein historisch-systematischer Grundriß*, 2nd ed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8), p. 77。

76. 同上，pp. 54, 305–307。

77.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 32。

78. 同上。

79. “联盟”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词在语义上也紧密相连，因为意大利语中的法西斯来源于“fascio”一词，意为“束”或者“群”。同上，p.390。

80. Hans-Ulrich Wehl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Bewegung, Führerherrschaft, Verbrechen* (Munich: Beck, 2009); Arif Dirlik, 'Mao Zedong: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ed. Jan Willem Stutje (New York: Berghahn, 2012), pp. 117–137; Richard R. Fagan,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the Leadership of Fidel Castro, Part 1',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8:2 (1965), pp. 275–284。

81. Thomas Welskopp, 'Incendiary Personalities: Uncommon Comments on Charisma in Social Movements', in Stutje,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164–179, here pp. 164, 169。

82. Welskopp, 'Incendiary Personalities', p. 165。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哲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就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他的 *Grenzen der Gemeinschaft: Eine Kritik des sozialen Radik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2 [1924]), pp. 43–48。

83.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3: Guideline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stormtrooper unit, 16 May 1922。

84.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OSAF, Decree no. 2. See also Noakes,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p. 182。

85. BArch Berlin, R 9361/II, no. 16746: Letter from Otto Herzog to the Reichsuschla, 26 August 1932。

86. Welskopp, 'Incendiary Personalities', p. 171。

87. Gehrig, *Im Diens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tumspolitik in Lothringen*, p. 33。See also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418–421, 468–474; Wacht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164–187。

88.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4, p. 2: 'Eine Dankespflicht', *Der Nationale*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Sozialist, 17 May 1930.

89. 同上: Fond 720, Opis 1, no. 44, p. 9: Extract from the 'Mitteilungen des Landeskriminalamts (IA) Berlin', 15 November 1930.

90. 同上: p. 18: 'SA-Befehl Nr. 6', *Völkischer Beobachter*, 6 May 1931.

91. 同上: p. 22: Proclamation of the NSDAP Leipzig (typescript), April 1931.

92. 其中一位女性是玛丽·冯·特罗塔，她经常在波美拉尼亚格罗斯莫伦（今波兰梅尔诺）的海滩度假别墅接待冲锋队员。冲锋队员给她写的一些信件收藏在柏林的德国联邦档案馆: BArch Berlin, NS 26/326。

93.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4, p. 26: Ernst Röhm, Order from 12 March 1931.

94.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OSAF, Erlaß Nr. 2. 共产党人采用非常类似的策略: 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431: Typescript of 'Communist Fighting Principles' (1931/1932).

95. 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p. 115.

96. 此前的两年，冲锋队的所有装备都必须从慕尼黑的所谓冲锋队“经济基地”订购，该基地由纳粹党员罗滕贝格管理。参见: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Extract from the *Lagebericht* of Berlin Police, no. 128, 20 February 1929.

97.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Extracts from the *Lagebericht* of Munich Police, no. 77, 7 May 1929.

98. BArch Berlin, NS 26/372: Letter from the Danzig HJ to Rudolf Schmidt, 31 August 1930.

99. 早期冲锋队电影明显利用了这一方面，特别是1933年的 *S.A. Mann Brand*。

100. 他正式加入的日期为1931年4月1日，编号为508889。参见: Elisabeth Timm, *Hugo Ferdinand Boss (1895–1948) und die Firma Hugo Boss: Eine Dokumentation* (Metzingen: 1999), http://www.metzingen-zwangsarbeit.de/hugo_boss.pdf, p. 4.

101. 除非另做说明，本段的所有信息取自: Roman Köster, *Hugo Boss, 1924–1945: Die Geschichte einer Kleiderfabrik zwischen Weimarer Republik und 'Drittem Reich'* (Munich: Beck, 2011), pp. 24–33.

102. 根据1942年的一次调查，德国纺织工业的大约半数犹太人所有的。四年之后，这些公司只占该行业的不到1%: Köster, *Hugo Boss*, p. 39.

103. Irene Guenther, *Nazi Chic? Fashioning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4).

104. Timm, *Hugo Ferdinand Boss*, p. 31; Köster, *Hugo Boss*, p. 30.

105. Petra Bräutigam, *Mittelstandische Unternehm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und soziale Verhaltensweisen in der Schuh-und Lederindustrie Badens und Württembergs* (Munich: Oldenbourg, 1997), pp. 147–150.

106. 早在1924年，共产党日报《红旗》刊登了“阶级斗争”牌香烟的广告，并承诺共产党自卫组织“红色助手”将从每月销售额中得到“一定比例”。遗憾的是，关于这项短命的商业政治融合努力没有进一步的信息。1924年11月2日第147期《红旗》上刊登的这则广告在下列书籍中重现: Gert-Joachim Glaessner, Detlef Lehnert, and Klaus Sühl (eds), *Studien zur Arbeiterbewegung und*

Arbeiterkultur in Berlin (Berlin: Colloquium Verlag, 1989), p. 11.

107. Sandra Schünemann, 'Bilderwelten, Markengesichter und Marktgesetze: Werbung und Produktpolitik der Reemtsma Cigarettenfabriken zwischen 1920 und 1960', in *Wirtschaft – Kultur – Geschichte: Positionen und Perspektiven*, ed. Susanne Hilger and Achim Landwehr (Stuttgart: Steiner, 2011), pp. 111–132, here pp. 116–118, 123–124.

108. 同上, P.118。

109. 这种情绪在汉斯·法拉达1932年的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反映: *Kleiner Mann, was nun?*,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Little Man, What Now?*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33).

110. Schünemann, 'Bilderwelten', pp. 119–121.

111. Holger Starke, 'Dampfschokolade, Neumünchner Bier und allerfeinster Korn', in *Dresdner Geschichtsbuch*, ed. Stadtmuseum Dresden (Altenburg: DZA-Verlag, 1995), pp. 119–150, here pp. 137–142.

112. Thomas Grosche, 'Arthur Dressler: Die Firma Sturm – Zigaretten für die SA', in *Braune Karrieren: Dresdner Täter und Akteur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 Christine Piper, Mike Schmeitzner, and Gerhard Nader (Dresden: Sandstein, 2012), pp. 193–199, here p. 193; Erik Lindner, *Die Reemtsmas: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Unternehmerfamilie*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2007), pp. 69–70; Grant, *Stormtroopers and the Crisis in the Nazi Movement*, pp. 99–106.

113. 冲锋队参与商业活动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它的财政无法独立于纳粹党。每个冲锋队员都应该加入纳粹党并支付党费, 纳粹党用一部分党费支持冲锋队的财政。参见: Lindner, *Die Reemtsmas*, p. 70.

114. Grosche, 'Dressler', p. 193. 贝滕豪森在之前数十年通过生意兴隆的连锁车站书店致富, 这个连锁企业是在前哈布斯堡王朝和德意志帝国之下运营的。鉴于纳粹党在1929–1930年的边缘化地位, 他的债务似乎很高且危机重重。但是, 这在以后得到了多种形式的回报: 贝滕豪森的公司是第三帝国报纸与杂志的主要分销商, 纳粹甚至委托他组织波兰被占领土的图书销售行业。参见: Christine Haug, *Reisen und Lesen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Die Geschichte des Bahnhofs- und Verkehrsbuchhandels in Deutschland von seinen Anfängen um 1850 bis zu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pp. 155–157.

115. Grosche, 'Dressler', pp. 193–194.

116. Lindner, *Die Reemtsmas*, p. 70.

117. Grosche, 'Dressler', pp. 194–196.

118. Lindner, *Die Reemtsmas*, p. 70.

119. 同上, pp. 78, 81。

120. 参见1932年夏季和秋季写给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多份地区报告: BArch Berlin, NS 23/474.

121. BArch Berlin, NS 23/474, p. 105,070: Report of the SA-Gruppe West, 21 September 1932; *ibid.*, p. 105,188: Report of the SA-Untergruppe Oberschlesien, 22 September 1932.

122. BArch Berlin, NS 23/474, p. 105,178: Letter from the Gruppenführer of the SA-Gruppe Schlesien to OSAF, 22 September 1932.

123. GStA PK, XX. HA, Rep. 240 B 31 c, pp. 191–201, here p. 191: Typescript of 'Wie kam es nun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zum 1. August 1932?'.

124. 这个公司的品牌实际上由格拉的马哈勒西香烟公司（由保罗·罗特尔领导）制造，名为“施皮尔曼”（3.33芬尼）、“突击队”（4芬尼）、“中队”（5芬尼）和“新战场”（6芬尼）。参见：BArch Berlin, NS 23/474, p. 105,144: Letter from SA-Standartenführer Heinrich Löwenstein, Kassel, to Sturmbann I – V/83, 14 July 1932; *ibid.*, p. 105,151: Letter from NSDAP Gera, 20 May 1932.

125. BArch Berlin, NS 23/474, p. 105,174: Letter from SA-Mittelschlesien Süd to OSAF, 26 September 1932.

126. Grosche, 'Dressler', p. 194.

127. Thomas Grosche, *Die Zigarettenindustrie in Dresden –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 MA diss. (unpublished), TU Dresden, 2009, pp. 71–72. 我很感谢托马斯·格罗舍提供给我一本他的著作。

128. 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 Dresden, *Chronik*, <http://www.dresden.ihk.de/150jahre/chronik.html>.

129. Lindner, *Die Reemtsmas*, pp. 91–92.

130. 同上, pp. 72–141, 特别是pp. 88–90。

131. 同上, pp. 92, 114–19. 根据纳粹党的信息来源, 仅1932年, 最大的德国香烟制造商就在党报及杂志的广告上投资了300万马克; BArch Berlin, NS 23/474, p. 105,123: Letter from the Führer of the SA-Gruppe Franken, W. Stegmann.

132. 更多的参考信息见: Grosche, *Die Zigarettenindustrie*, pp. 76–77.

133. Grosche, 'Dressler', p. 198.

134. Schunemann, 'Bilderwelten', p. 125.

135. 关于基督教会与纳粹冲锋队之间的关系, 参见: Bergen, *Twisted Cross*, in particular pp. 70–81; Gailus, *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Klauspeter Reumann (ed.), *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Kirchenkampfes in den evangelischen Landeskirchen Schleswig-Holsteins* (Neumünster: Karl Wachholtz, 1988); Siemens, *The Making of a Nazi Hero*, pp. 126–127.

136.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423, p. 79: Pruss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Notation from 20 August 1931 (signed Dr Gräser).

137. 参见他1932年4月写给东普鲁士大区领袖科赫的冗长投诉信: GStA PK, XX. HA, Rep. 240 B 27 d+e, pp. 168–177. 关于纳粹对中央党的“极度仇视”, 参见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p. 112; 关于争取天主教选民的问题, 参见: Falter, *Hitlers Wähler*, pp. 177–188.

138. 根据历史学家里夏德·施泰格曼-加尔的说法, 1930年, 德国的18000名新教牧师中, 只有大约120人是纳粹党员。但他提出, 支持者的数量肯定高得多, 特别是因为教会“劝阻他们的教士正式加入任何政党”; Steigmann-Gall, *Holy Reich*, p. 76.

139. 本段的所有事实和引用取自特劳蒂希关于符腾堡新教的杰出研究著作: *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 pp. 55–67. 贝内迪克特·布伦纳最近阐述, 这种宗教战争的“男性”辞藻甚至在1945年后的二十年里充斥于新教神学家的自传中; Benedikt Brunner, 'Geschlechterordnung

im Kirchenkampf: Konstruktion von Gender in der autobiographischen Verarbeitung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ichtbar unsichtbar: *Geschlechterwissen in (auto-) biographischen Texten*', ed. Maria Heidegger et al.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5), pp. 103–117.

140. 教区长恩斯特·希曼诺夫斯基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后来将姓氏改成了比贝尔施泰因。在管辖的巴特塞格贝格教区，他在整个冲锋队单位面前举行教堂礼拜活动，并在这些场合穿上褐衫。他甚至向不顺应其观点的其他牧师施加压力，派遣冲锋队员干扰他们的活动。参见：Stephan Linck, 'Eine mörderische Karriere: de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Theologe Ernst Szymanowski/Biberstein', in Manfred Gailus and Clemens Vollnhals (eds), *Für ein artgemäßes Christentum der Tat: Völkische Theologie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6), pp. 239–259, here pp. 244, 246.

141. Heinrich Rendtorff, '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evangelische Hamburg* 25 (1931), pp. 166–7 (first published in *Mecklenburgische Zeitung*, 23 April 1931).

142. Trauthig, *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 pp. 60–61. 乌尔姆是20世纪德国新教的核心人物。关于二战后他对盟国“去纳粹化”进程的强烈反对，参见他的 *Memorandum by 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Germany on the Question of War Crimes Trials before American Military Courts* (Waiblingen–Stuttgart: Stürmer, 1949); Jon David K. Wyneken, 'Memory as Diplomatic Leverage: Evangelical Bishop Theophil Wurm and War Crimes Trials, 1948–1952',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19:2 (2006), pp. 368–388.

143. Manfred Gailus, '1933 als protestantisches Erlebnis: emphatische Selbsttransformation und Spaltun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9:4 (2003), pp. 481–511.

144. Kurt Hutt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Christentum* (Stuttgart: Evangelischer Volksbund, 1932), p. 31. 关于1930–1934年新教对纳粹的普遍欢迎态度，也可参见：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Viertes Band: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unich: Beck, 2003), pp. 797–804.

145. Hansjörg Buss, 'Für arteigene Frömmigkeit – über alle Konfessionen und Dogmen hinweg'. Gerhard Meyer und der Bund für Deutsche Kirche', in Gailus and Vollnhals (eds), *Für ein artgemäßes Christentum der Tat*, pp. 119–133, here pp. 121, 124.

146. Ralf Czubatynski, 'Domprediger Ernst Martin (1885–1974) im Spannungsfeld von Politik und Kirchenpolitik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achsen-Anhalt: Beiträge zur Kultur und Landesgeschichte* 15 (Halle: Mitteldeutscher Verlag, 1999), pp. 101–124, here pp. 112–113; Hattenhorst, *Magdeburg 1933*, pp. 120–123.

147. Czubatynski, 'Domprediger Ernst Martin', pp. 114–123.

148. Franz Tügel, '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evangelische Hamburg* 26 (1932), pp. 52–56, here pp. 53–54.

149.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26–32, 220–223.

150. Stehn, 'Über die politische Betätigung der Pastoren', *Das evangelische Hamburg* 25 (1931), p. 357.

151. 符腾堡新教教会于1932年9月29日暂时禁止牧师参加政治党派活动；Trauthig, *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 p. 58. 1932年11月，这家自由主义媒体报道，作为对这些命令的反应，罗

姆已经要求德国的每个冲锋队区队任命一名“冲锋队牧师”，以供奉党旗，为冲锋队员提供教牧关怀。报纸报道，这些牧师必须是党员，由臭名昭著的反犹太分子、前新教牧师路德维希·明希迈尔管理，此人从1930年起成为了纳粹国会议员。不过，两周之后，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否认了这些传言。随着不久之后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党不再需要依靠专门挑选的牧师了。尽管有一些正直的反对者，但当地教士此时都很高兴地为纳粹党提供服务——这也是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前几年里引起许多新教牧师共鸣的另一个标志。参见：‘Pfarrer als Sturmbannführer’, *Vossische Zeitung*, 4 November 1932, p. 2; Kater, ‘Ansätze zu einer Soziologie der SA’, p. 807. On Münchmeyer, see Gerhard Lindemann, ‘Typisch jüdisch’: *Die Stellung der Ev.-luth. Landeskirche Hannovers zu Antijudaismus, Judenfeindschaft und Antisemitismus 1919–1949*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8), pp. 136–220.

152. 在慕尼黑以南的集镇霍尔茨基兴，当地教士报告，他的信徒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民族社会主义者；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p. 157。

153. 同上，p.168。

154. 同上，pp. 166–169, 177。

155. Hastings, *Catholicism and the Roots of Nazism*, pp. 107–142, 168–170. See also idem, ‘How “Catholic” Was the Early Nazi Movement? Religion, Race, and Culture in Munich, 1919–192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6:3 (2003), pp. 383–433; Thomas Forstner, ‘Braune Priester – Katholische Geistliche im Spannungsfeld von Katholiz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Täter und Komplizen in Theologie und Kirchen 1933–1945*, ed. Manfred Gailus, 2nd ed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5), pp. 113–139.

156.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pp. 164–165.

157. 4月28日，冲锋队参谋长罗姆也出现在教堂里，他至少遇见主教两次。参见：Faulhaber–Edition, *Critical Online Edition of the Diaries of Michael Kardinal von Faulhaber (1911–1952)*: http://p.faulhaber-edition.de/exist/apps/faulhaber/dokument.html?collid=1933&sortby=year&doctype=bb&docidno=BB_06393_0542r; http://p.faulhaber-edition.de/exist/apps/faulhaber/dokument.html?collid=1933&sortby=year&doctype=bb&docidno=BB_09263_0030s.

158.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11, pp. 275–285; Hans Georg Hofmann (ed.), *Pflichtenlehre des Sturm-Abteilungsmannes (SA-Katechismus)* (Die ß en: Huber, undated [1934]), p. 10.

159. Werner Betcke (ed.), *Der kleine Katechismus Dr. Martin Luthers für den braunen Mann* (Gütersloh: Bertelsmann, 1934), pp. 4, 24.

160. 克林奇的父亲、牧师约翰内斯·保罗·克林奇死于1920年9月11日，终年59岁。霍斯特·韦塞尔的父亲、牧师路德维希·韦塞尔死于1922年5月9日，终年42岁；Stadt Lübbenau, Letter to the author from 8 May 2015; Siemens, *Making of a Nazi Hero*, p. 27.

161. Walsdorff, ‘Hans Ulrich Klintzsch’, p. 1,257; LKA Stuttgart, A 127, no. 1293 (personnel file of Hans Ulrich Klintzsch). 他被符腾堡路德派福音教会任命，部分资金来自美国路德派福音教会的捐赠。克林奇于1952年退出了“问答者”的工作，得到了官方的退休金，他于1959年8月17日死于柏林。

162. 埃米尔·莫里斯1934年6月3日写给盖托夫牧师的信，引用于：Sigmund, *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p. 29.

163. 安德鲁·瓦克尔富斯在他的汉堡冲锋队案例研究中同样强调了宗教信仰对理解冲锋队心态的重要性。参见: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218–223.

164.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4: Police report from the NSDAP's Christmas Party in the Bürgerbräukeller, 18 December 1922. 在这一场合, 著名的巴伐利亚幽默作家魏斯·费尔道也为该事件名声大噪起了作用。

165. 同上。

166. Joseph Berchtold, 'Auferstehung', *S.A.-Mann*, March 1929, 引自: StA München, Pol. Dir. 6805: Extracts from Munich's Police *Lagebericht*, no. 77, 7 May 1929. 贝希托尔德的传记参见: Hein, *Elite für Volk und Führer?*, pp. 42–43, 69–70.

167. 参见: Jürgen W. Falter, 'The Young Membership of the NSDAP between 1925 and 1933: A Demographic and Social Profile',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Supplement 25 (2013), pp. 260–279, here pp. 271–272; Jörg Thierfelder and Eberhard Röhm, 'Die evangelischen Landeskirchen von Baden und Württemberg in der Spät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zu Beginn des Dritten Reiches', in *Die Machtergreifung in Südwestdeutschland*, ed. Thomas Schnabel, pp. 219–256, here p. 229.

168. Otto Wagener, *Hitler: Memoirs of a Confidant*, ed. Henry Ashby Turn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9–21, as cited in Steigmann–Gall, *Holy Reich*, p. 66.

169. 同上。

170. 参见: Charlotte Tacke, *Denkmal im sozialen Raum: Nationale Symbole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5); Rudy Koshar, *From Monuments to Traces: Artifacts of German Memory, 1870–199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Berkeley Press, 2000), pp. 35–40.

171. 20世纪上半叶, “强身派基督教”在美国和西欧同样很流行。德国支持者通常将这种思想称为“基督教信仰德国化”。参见: Clifford Puttney, *Muscular Christianity: Manhood and Sports in Protestant America, 188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rthur Bonus, *Von Stöcker zu Naumann: Ein Wort zur Germanisierung des Christentums* (Heilbronn: Salzer, 1896); Rainer Lächele, 'Protestantismus und völkische Religio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 *Handbuch zur 'Völkischen Bewegung' 1871–1918*, ed. Uwe Puschner, Walter Schmitz, and Justus H. Ulbricht (Munich: Saur, 1999), pp. 149–163. 这些思想甚至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中形成共鸣; 参见: Forstner, 'Braune Priester', pp. 131–133. 新教牧师古斯塔夫·冯·博德尔施文格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案例, 他以类似的论据招募冲锋队的新教神学学生, 参与他在比勒费尔德附近丁内的定居项目。参见: Ulrich Rottschäfer, 'Gustav von Bodelschwingh und die Gründung des Sammelvikariats in Dünne', *Jahrbuch für Westfälische Kirchengeschichte* 89 (1995), pp. 216–247, here pp. 223–231. 我很感谢唐格明德的约翰内斯·吕贝克指引我阅读这篇文章。

172. 参见如下书籍中的有益资料: Matthew Feldman and Marius Turda (eds), *Clerical Fascism in Interwar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73. 最新的文献参见: Dylan Riley, *The Civic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Europe: Italy, Spain, and Romania, 1870–1945*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以及Alejandro Quiroga

and Miguel Angel des Arco (eds), *Right-Wing Spain in the Civil War Era: Soldiers of God and Apostles of the Fatherland, 1914–1945* (London: Continuum, 2012).

174. Rory Yeomans, 'Militant Women, Warrior Men and Revolutionary Personae: The New Ustasha Man and Woman in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 1941–1945',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83:4 (2005), pp. 685–732, here p. 705.

175. 引自：Stephen Fischer-Galati (ed.), *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Pall Mall, 1970), p. 330. 对罗马尼亚及克罗地亚法西斯运动中宗教成分的对比调查，参见拉杜·哈拉尔德·迪努的优秀研究著作：Radu Harald Dinu, *Faschismus, Religion und Gewalt in Südosteuropa: Die Legion Erzengel Michael und die Ustaša im historischen Vergleich*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3), pp. 204–252.

176. Hofmann, *Pflichtenlehre des Sturm-Abteilungsmannes*, p. 11. 不管是否有这些承诺，纳粹政权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很快变得很复杂。

177. Bergen, *Twisted Cross*, p. 71.

178. 版画家施瓦茨科普夫1893年4月11日生于波恩，20世纪10年代受教于杜塞尔多夫实用美术学校，1933年任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教授。1937年，他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讲师联盟领导人，并被选为马尔卡斯滕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任职到1945年）。1956年他再次成为该联合会主席。施瓦茨科普夫于1963年5月31日在杜塞尔多夫去世。关于他的传记和作品，参见Dietrich Grünewald, 'Der Totentanz bei Rethel, Ille und Schwarzkopf', *Deutsche Comicforschung* 5 (2009), pp. 21–32, here pp. 30–32; Sabine Schroyen, *Bild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Künstlervereins Malkasten in Düsseldorf. Künstler und ihre Werke in den Sammlungen* (Düsseldorf: Grupello, 2001), pp. 34–36, 316–318.

179. 参见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重建：... wurde die SA eingesetzt: *Politische Soldaten erzählen von wenig beachteten Frontabschnitten unserer Zeit* (Munich: Eher, 1938), pp. 43, 55, 91.

180. 详见：Grünewald, 'Der Totentanz bei Rethel'; Alfred Rethel, *Auch ein Todtentanz*, 11th edn (Leipzig, Schlicke, 1879); Hans Jürgen Imiela, 'Alfred Rethel und der Tod', in *Der Tod in Dichtung, Philosophie und Kunst*, 2nd edn, ed. Hans Helmut Jansen (Darmstadt: Steinkopff, 1989), pp. 371–379.

181. Grünewald, 'Der Totentanz bei Rethel', p. 27.

182. *Der Kampf der SA: Eine Bildfolge nach 6 Holzschnitten von Prof. Richard Schwarzkopf* (advertising brochure), in LArch Ludwigsburg, PL 505 Bü 12. 生命战胜死神的早期版本参见：Grünewald, 'Der Totentanz bei Rethel', p. 32.

183. 除了《德意志受难记》之外，该系列还被称为《冲锋队的战斗》和《冲锋队的死之舞》；Schroyen, *Bild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Künstlervereins Malkasten*, p. 35.

184. Fest, 'Ernst Röhm und die verlorene Generation', p. 190.

185. 同上，pp. 191, 193。

186. Emre Sencer, 'Fear and Loathing in Berlin: German Military Culture at the Turn of the 1930s', *German Studies Review* 37:1 (2014), pp. 19–39, here p. 22. 实际上，战争的最后两年，这种权威开始销蚀。

187. Horst von Metzsch, 'Nie wieder ein solches Jahrzehnt!', *Militär-Wochenblatt*, 4 July 1929, 引

自: Sencer, 'Fear and Loathing in Berlin', p. 23.

188. 1928年之前, 国防军与纳粹党的关系很疏远——部分是1923年11月未遂政变之后双方长期相互敌对的结果, 另一部分原因是魏玛民主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得以巩固。1928年12月5日, 希特勒甚至正式禁止该党成员加入国防军, 从而间接地承认军队“高于政治”的自我意象。

参见: Peter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ß: Der Hochverrat der Ulmer Reichswehroffiziere 1929/30*, Militärgeschichtliche Studien 4 (Boppard am Rhein: Boldt, 1967), p. 9.

189.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ß*, p. 11.

190. Timothy S. Brown, 'Richard Scheringer, the KPD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Nation in Germany, 1922–1969',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4:3 (2005), pp. 317–346, here pp. 323–325;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ß*, pp. 110–113.

191. Sencer, 'Fear and Loathing in Berlin', p. 25.

192. 卢丁传记以及后来职业生涯的详细讨论, 参见下面的注释和第10章。

193.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ß*, p. 130; Brown, 'Richard Scheringer', pp. 323, 337.

194. Ernst Niekisch,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Revolutionärs. Erster Band: Gewagtes Leben 1889–1945* (Cologne: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74), p. 185.

195. Eckart Kehr, 'Zur Soziologie der Reichswehr', *Neue Blätter für den Sozialismus* 1 (1930), pp. 156–164, here p. 163.

196. 关于德国贵族与冲锋队的复杂关系, 参见: Malinowski and Reichardt,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

197. Peter Hoffmann, *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und seine Brüder* (Stuttgart: DVA, 1992), p. 101. 关于“格奥尔格圈子”以及格奥尔格的“秘密德国”思想, 参见: Thomas Karlauf, *Stefan George: Die Entdeckung des Charisma* (Munich: Blessing, 2007); Robert E. Norton, *Secret Germany. Literary Modernism and Visual Culture: Stefan George and His Circ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8. Hoffmann, *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p. 103. 埃伯哈特·泽勒在他的施陶芬贝格传记中同样提到这个人对舍林格尔、卢丁和温特的同情, 但坚称这种同情不应该看成是对纳粹党的政治背书。参见: Eberhard Zeller, *Oberst Claus Graf Stauffenberg: Ein Lebensbild*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8 [1994]), p. 25.

199. Hans Roschmann, *Erinnerungen eines 'Kämpferischen Schwaben'* (Überlingen: self-published, undated [1985]), pp. 37–38.

200.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 201: Röhm, SABE (SA-Befehl) from 13 January 1931. 关于国防军与冲锋队在边防工作上的合作, 参见: IfZ Archive, ED 414, vol. 181: 'Stabschef Röhm im Kieler Hitler-Prozeß', *Hamburger Tageblatt*, 11 July 1932, p. 12.

201. 详见: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7, pp. 352–362: 'Material zur Frage der Militarisierung der SA', September 1931.

202. GStA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11, pp. 25–26: Report from the Berlin Police President to the Regierungspräsident in Düsseldorf, 4 February 1932.

第4章

1. Ernst Röhm,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ters* (1928), 翻译并引用于: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p. 237.

2. Erich Koch-Weser, 'Der deutsche Mensch', *Vossische Zeitung*, 1 February 1933 (morning edition), pp. 1–2.

3. Gustave Le Bon, *Psychologie des foules* (Paris: F. Alcan, 1895); 英语版本参见: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ndon: Unwin, 1897).

4. 科赫-韦泽的宣言之后多年, 英国历史学家以很类似的论据解释德国人的心理。1941年, 刘易斯·B·纳米尔写道: “正是因为德国人缺乏道德上的勇气、自信和独立, 使他们通过国家与民族寻求安全感、自我肯定和至高权力, 这也使他们超越感觉与理智的一切极限来美化这些概念。” Lewis B. Namier, 'Both Slaves and Masters', *Time & Tide*, 5 July 1941, 引自: Jörg Später, *Vansittart: Britische Debatten über Deutsche und Nazis 1902–1945*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3), p. 220.

5. 这一主题的文獻很详尽。最新的出版物可参见: Wachsmann, *KL*, pp. 23–78; Irene Mayer-von Götz, *Terror im Zentrum der Macht: 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 (Berlin: Metropol, 2008); 以及 Nikolaus Wachsmann and Sybille Steinbacher (eds), *Die Linke im Visier: Zur Errichtung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4); Hördler (ed.), *SA-Terror als Herrschaftssicherung*. 1933年政治史的概述参见: Andreas Wirsching (ed.), *Das Jahr 1933: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oberung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9); Richard Bessel, 'The Nazi Capture of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2 (2004), pp. 169–188; 以及如下注释中提到的文献。

6.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98), p. 17.

7.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720, Opis 1, no. 43, p. 80: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Adolf Wagner, to the Reich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6 April 1933 (typescript); BArch Berlin, R1501/20234: 'Reichsbanner nun auch in Sachsen verboten', *Der Montag*, 13 March 1933.

8. GSt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14, pp. 2–3: SA-Gruppenführer Schlesien (Edmund Heines), Gruppenbefehl no. 32, Breslau, 24 April 1933, and draft of a telegram from the Prussian Minister President sent to all SA, SS, and *Stahlhelm* formations in East Prussia, Silesia, and the Grenzmark, undated;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Political Archives (PAAA), R 99246, p. 90: Order of Ernst Röhm on matters of 'Auslandsdeutsche' in the SA, 27 November 1933.

9. Klaus Schwabe and Rolf Reichardt (eds), *Gerhard Ritter: Ein politischer Historiker in seinen Briefen* (Boppard am Rhein: Boldt, 1984), p. 66.

10. Alexander Mitscherlich, *Ein Leben für die Psychoanalyse: Anmerkungen zu mein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p. 111, as quoted in Tobias Freimüller, 'Verdrängung und Bewältigung: Alexander Mitscherlich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in Freimüller (ed.), *Psychoanalyse und Protest: Alexander Mitscherlich und die 'Achtundsechzig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8), pp. 118–132, here p. 121.

11. 引自: Fritzsche, *Turbulent World of Franz Göll*, p. 147.

12. 罗姆没有批准这些要求，因为他认为这是在冲锋队保护伞下牟取私利的企图。参见：BArch Berlin, NS 23/510: Oberster SA-Führer, Circular Letter on 'Sondergliederungen', 5 July 1933.
13. BArch Berlin, NS 1/388, pp. 126–128, here p. 126: Letter from Elfriede Conti to Martin Bormann, 3 March 1933.
14. LArch Berlin, A Rep. 003–04– 01, p. 101: Letter from Karl Ernst to the Staatskommissar of the capital city of Berlin (Julius Lippert), 26 July 1933.
15. Detlev Humann, '“Alte Kämpfer” in der neuen Zeit: Die sonderbare Arbeitsvermittlung für NS-Parteigänger nach 1933',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98:2 (2011), pp. 173–194, here pp. 174–175.
16. 同上, pp. 176–177。
17. 同上, pp. 178–183。
18. Ulrich Klein, 'SA-Terror und Bevölkerung in Wuppertal 1933/34', in Detlev Peukert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Peter Hammer, 1986), pp. 45–61, here p. 56.
19. Christian Meyer, *Semantiken des Privaten in autobiographischen Deutun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9/1940*, PhD diss., Bielefeld University, 2015, pp. 154–157.
20. 根据官方报告，1934年春季，冲锋队失业率已经下降了80%。例如，可参见：Humann, '“Alte Kämpfer” in der neuen Zeit', pp. 185–186, 192. 西南部的情况较不乐观，因为那里只有三分之一的失业“老战士”在1933年底找到了工作；Gunter Ma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 Zum Verhältnis von Arbeiter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1:4 (1981), pp. 573–613, here p. 601.
21. Humann, '“Alte Kämpfer” in der neuen Zeit', p. 185.
22. 弗兰克·巴约尔将纳粹党称为“有组织自怜”的党派；参见：Frank Bajohr, *Parvenü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1), pp. 13, 22–24.
23. 关于冲锋队福利营及其资金筹措，参见：Detlev Humann, 'Verwahrnstanalten mit Fantasiegehältern?: Die Hilfswerklager der SA für arbeitslose “alte Kämpfer”',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97:4 (2010), pp. 425–436; Fischer, *Stormtroopers*, pp. 130–3.24. Peter Schyga, *Goslar 1918–1945: Von der nationalen Stadt zur Reichsbauernstad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ielefeld: Verlag für Regionalgeschichte, 1999), p. 137.
25. “奥地利军团”的冲锋队员在这方面尤其声名狼藉；参见：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p. 174–205; Humann, 'Verwahrnstanalten mit Fantasiegehältern?', p. 426, n. 4.
26. 广告原件包含在BArch Berlin, NS 23/204中。
27. BArch Berlin, NS 23/204: Letter from Müller to Rudolf Hess, 23 April 1934.
28. 关于冲锋队领导层与“普通”冲锋队员的社会鸿沟，参见：Kater, 'Ansätze zu einer Soziologie der SA'. 第三帝国的普遍腐败参见：Bajohr, *Parvenüs und Profiteure*, 其中pp. 17–34与冲锋队有关。
29. Fritz Tobias, *Der Reichstagsbrand: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Rastatt: Grote, 1962); Hans

Mommsen, 'Der Reichstagsbrand und seine politischen Folge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2:4 (1964), pp. 351–413.

30. Hett, *Burning the Reichstag*, pp. 318–323. 黑特的书是有关所谓“国会纵火案”的最新书籍，20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对此案件的争论特别激烈。对托拜厄斯/莫姆森派系的关键干预，参见：Hans Schneider (ed.), *Neues vom Reichstagsbrand?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BWV, 2004); Alexander Bahar and Wilfried Kugel, *Der Reichstagsbrand: Wie Geschichte gemacht wird* (Berlin: edition q, 2001); Jürgen Schmädke, Alexander Bahar, and Wilfried Kugel, 'Der Reichstagsbrand in neuem Lich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9:3 (1999), pp. 603–651. 正如预料的那样，黑特的著作激起了持“单一罪犯”论点者的辩论；参见 Richard J. Evans, 'The Conspiracists', *London Literary Review of Books* 36:9 (2014), pp. 3–9；也可参见黑特和埃文斯后续的回应，均在《伦敦文学书籍评论》36:11（2014）上发表。

31. Häberlen, *Vertrauen und Politik*, p. 186; Hermann Weber, 'Zum Verhältnis von Komintern, Sowjetstaat und KPD', in Hermann Weber, Jakov Drabkin, and Bernhard H. Bayerlein (eds), *Deutschland, Russland, Komintern I: Überblicke, Analysen, Diskussionen. Neue Perspektiven auf die Geschichte der KPD und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1918–1943)* (Berlin: de Gruyter, 2014), pp. 9–139, here p. 102, with further references.

32. 特别可怕的案例可参见：GSt PK, XX. HA, Rep. 240 B 29 a–g, p. 153: Letter from Fräuling Itzig, the daughter of a Jewish cattle dealer, to Hermann Göring, 15 March 1933. 关于反犹太抵制行动，参见：Hannah Ahlheim, 'Deutsche, kauft nicht bei Juden!' *Antisemitismus und politischer Boykott in Deutschland 1924 bis 1935*, 2nd ed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2), pp. 241–262; Christoph KreutzMüller, *Ausverkauf: Die Vernichtung der jüdischen Gewerbetätigkeit in Berlin 1930–1945* (Berlin: Metropol, 2012), pp. 123–145, 219–238.

33. BArch Berlin, NS 23/409: 'Schacht Issues Debt Warning', *Evening Sun* (New York), 7 April 1933.

34. Johannes 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der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Wolfgang Benz and Barbara Diestel (eds), *Instrumentarium der Macht: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7* (Berlin: Metropol, 2003), pp. 9–26, here p. 11; Karin Orth, *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ine politische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1999), p. 23; 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 p. 68. 逮捕行动的高潮出现在1933年春季。仅当年2月到4月之间，就有45000人被监禁。

35. 不同类型早期集中营的概述参见：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der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pp. 13–15; Jan Erik Schulte, 'Das KZ-System in der Region: Konzentrationslager im Rheinland und in Westfalen 1933–1945', in his (ed.), *Konzentrationslager im Rheinland und in Westfalen 1933–1945: Zentrale Steuerung und regionale Initiative*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5), pp. xi–xli. 关于达豪作为“模范营”的重要性，参见：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 pp. 133–135; and Christopher Dillon, *Dachau and the SS: A Schooling in Viol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6. Irene von Götz, '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 in *Bürgerkriegsarmee*, ed. Müller

and Zilkenat, pp. 131–146, here p. 132.

37. 冲锋队在柏林暴力活动的一个极端例子是所谓的“科佩尼克杀人周”（也称“科佩尼克血腥一周”）。1933年6月21日到26日，冲锋队逮捕了500人，并杀死其中的至少23人。参见：Stefan Hördler, 'Ideologie, Machtinzenierung und Exzess: Täten und Täter der Köpenicker Blutwoche', in Stefan Hördler (ed.), *SA-Terror als Herrschaftssicherung*, ed. Hördler, pp. 83–104. 关于莱茵兰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早期集中营的局部知识，也可参见：Schulte, 'Das KZ-System in der Region', p. xxiii.

38. 例如，采石工胡戈·拉彭赫纳的案例，他从冲锋队波茨坦监狱获释后上吊自杀；BArch Berlin, NS 23/889: Report from the Oberstaatsanwalt Cologne to the Prussian Minister of Justice, 13 December 1933.

39. Irene von Götz, 'Die Errichtung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 1933: Entfesselter SA-Terror in der Reichshauptstadt', in *Die Linke im Visier: Zur Errichtung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 ed. Nikolaus Wachsmann and Sybille Steinbach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4), pp. 70–83, here p. 73.

40. Sascha Münzel and Eckart Schörle, *Erfurt Feldstraße: Ein frühes Lag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rfurt: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Thüringen, 2012), p. 50.

41. Julia Pietsch, 'Stigmatisierung von Juden in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n: Die "Judenkompanie"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Oranienburg 1933/34', in Marco Brenneisen et al. (eds), *Stigmatisierung–Marginalisierung–Verfolgung: Beiträge des 19. Workshops zur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Berlin: Metropol, 2015), pp. 99–120, here pp. 109–113; Veronika Springmann, *Gunst und Gewalt: Sport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n*, diss., Carl von Ossietzky University of Oldenburg, 2015; Will Greif [Peter Blachstein], 'Juden', *Freies Deutschland*, 6 April 1939, as reprinted in Peter Blachstein, *'In uns lebt die Fahne der Freiheit': Zeugnisse zum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Burg Hohnstein*, ed. Norbert Haase and Mike Schmeizner (Dresden: Stiftung Sächsische Gedenkstätten zur Erinnerung an die Opfer politischer Gewaltherrschaft, 2005), pp. 126–128.

42. Gebhard Aders, 'Terror gegen Andersdenkende: Das SA-Lager am Hochkreuz in Köln-Porz', in *Instrumentarium der Macht: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7*, ed. Wolfgang Benz and Barbara Diestel (Berlin: Metropol, 2003), pp. 179–188, here p. 184.

43. Norbert Haase,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Hohnstein 1933/34 und seine Überlieferung in der deutschen Emigration', in Blachstein, *'In uns lebt die Fahne der Freiheit'*, pp. 8–22, here p. 15; Mike Schmeizner, 'Diktaturerfahrung und politische Konsequenz: Zur Biographie des deutsch-jüdischen Sozialisten Peter Blachstein, 1911–1977', in *ibid.*, pp. 23–55, here p. 33.

44. 1939年之前，女性在第三帝国所有囚犯中的比例从未超过10%。参见：Jane Caplan, 'Gend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n Jane Caplan and Nikolaus Wachsmann (eds), *Concentration Camps in Nazi Germany: The New Hist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82–107, here p. 83; 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 p. 7.

45. Häberlen, *Vertrauen und Politik*, p. 186.

46. 另见卡普兰的开创性文章：“Gend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特别是pp. 86–95。

47. 分析1938年11月9日之后被拘禁在德国的犹太人所采用的策略时，基姆·温施曼观察

到了类似的效应，布里安·费尔特曼最近确认了德国战俘在一战之中与之后的相似过程。参见：Kim Wünschmann, 'Die Konzentrationslagererfahrungen deutsch-jüdischer Männer nach dem Novemberpogrom 1938: Geschlechtergeschichtliche Überlegungen zu männlichem Selbstverständnis und Rollenbild', in Susanne Heim, Beate Meyer, and Francis R. Nicosia (eds), *'Wer bleibt, opfert seine Jahre, vielleicht sein Leben': Deutsche Juden 1938–1941*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0), pp. 39–58; Brian K. Feltman, *The Stigma of Surrender: German Prisoners, British Captors, and Manhood in the Great War and Beyon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48. Pietsch, 'Stigmatisierung von Juden in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n'; Kim Wünschmann, 'Cementing the Enemy Category: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of German Jews in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8/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5:3 (2010), pp. 576–600; Jürgen Matthäus, 'Verfolgung, Ausbeutung, Vernichtung: Jüdische Häftlinge im System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in Günter Morsch and Susanne zur Nieden (eds), *Jüdische Häftlinge im Konzentrationslager Sachsenhausen 1936–1945* (Berlin: Hentrich, 2004), pp. 64–89; Caplan, 'Gend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p. 87. 关于沃尔齐格的犹太福利院，参见：Claudia Prestel, *Jugend in Not: Fürsorgeerziehung in deutsch-jüdischer Gesellschaft (1901–1933)* (Cologne: Böhlau, 2003), pp. 313–340, 冲锋队1933年3月发动的袭击及其后果参见pp.336–337; 另见犹太中央联盟的详细报告，英语版本见于：Jürgen Matthäus and Mark Roseman, *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 vol. 1: 1933–1938 (Lanham, MD: AltaMira, 2010), pp. 75–77.

49. Gerhart Seger, *Oranienburg: Erster authentischer Bericht eines aus dem Konzentrationslager Geflüchteten, mit einem Geleitwort von Heinrich Mann* (Karlsbad: Graphia, 1934), 重印于：Irene A. Diekmann and Klaus Wettig (eds),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Augenzeugenberichte aus dem Jahre 1933: Gerhart Seger, Reichstagsabgeordneter der SPD; Max Abraham, Prediger aus Rathenow* (Potsdam: Verlag für Berlin–Brandenburg, 2003), pp. 15–89. 几个月以后，野心勃勃的奥拉宁堡集中营指挥官维尔纳·沙弗尔以*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Das Anti-Braunbuch über das erste deut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Berlin: Buch- und Tiefdruck-Gesellschaft, 1934)一书回应。参见保罗·穆尔的文章：Paul Moore, '“The Truth abou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Werner Schäfer's Anti-Brown Book and the Transnational Debate on Early Nazi Terror', in *German History* 34 (2016), advanced access, published 3 October 2016.

50. Diekmann and Wettig,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pp. 62–65, here p. 64. 塞格尔对看守的负面描述至少帮助他保持了自己的男性身份。关于这种心理应对机制，另见：Wünschmann, 'Die Konzentrationslagererfahrungen deutsch-jüdischer Männer nach dem Novemberpogrom 1938', pp. 49–50.

51. Diekmann and Wettig,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p. 65.

52. Will Greif, 'Handwerker', *Freies Deutschland*, 27 April 1939, as reprinted in Blachstein, *'In uns lebt die Fahne der Freiheit'*, pp. 132–134.

53. Diekmann and Wettig,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pp. 64–65; Will Greif, 'Rekruten', *Freies Deutschland*, 23 March 1939, as reprinted in Blachstein, *'In uns lebt die Fahne der Freiheit'*, pp. 121–123.

54. Günter Morsch and Agnes Ohm (eds), *Terror in der Provinz Brandenburg: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34* (Berlin: Metropol, 2014), p. 70; Haase,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Hohnstein 1933/34', pp. 13–14.

55. Volker Bendig, 'Unter Regie der SA: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Börnicke und das Nebenlager Meissnershof im Osthavelland', in *Instrumentarium der Macht*, ed. Wolfgang Benz and Barbara Diestel, pp. 97–101.

56. Eike Wolgast, 'Die Studierenden', in Wolfgang U. Eckart, Volker Sellin, and Eike Wolgast (eds), *Die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eidelberg: Springer, 2006), pp. 57–94, here p. 60; Axel W. Bauer, Karin Langsch, and Wolfgang U. Eckart, 'Die Universitätsklinik und Poliklinik für Mund-, Zahn- und Kieferkrankheiten', in *ibid.*, pp. 1,031–1,041, here pp. 1,033–1,034.

57. Julia Deinert, *Die 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im Dritten Reich*, PhD diss., Universität Rostock, 2010, pp. 72–73. 冲锋队公开展示其俘虏的其他例子参见: 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 pp. 32–34.

58. Volker Friedrich Drecktrah, 'Die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der Marine-SA Cuxhaven von 1933 und deren Ahndung nach 1945', in Alfred Gottwaldt et al. (eds), *NS-Gewaltherrschaft: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Forschung und juristischen Aufarbeitung* (Berlin: Hentrich, 2005), pp. 118–134, here pp. 131–133.

59. 举一个例子, 1935年7月22日, 在上西里西亚城镇博伊滕, 一群冲锋队员将一名与犹太男子订婚的基督教女美发师游街示众。这名女子不得不携带一个标志, 自称为“种族亵渎者”; 她的头发被剪短, 据说身上还涂了沥青。参见: RGVA, Fond 721, Opis 1, no. 2604, p. 2: Letter from the CV-Verein, Landesverband Oberschlesien, to CV-Verein, Berlin, 23 July 1935. 类似的例子参见: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2* (1935), p. 811.

60. Dorothee Wierling, *Eine Familie im Krieg: Leben, Sterben und Schreiben 1914–1918*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3), pp. 394–395.

61. Julie Braun-Vogelstein (ed.), *Otto Braun aus nachgelassenen Schriften eines Frühvollendeten*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19). 该书在1931年之前多次重印, 售出约10万册; Wierling, *Eine Familie im Krieg*, pp. 380, 383–389.

62. 关于利滕, 参见: Hett, *Crossing Hitler*; on Kronheim, see Andrea Löw and Hubert Schneider, 'Dr. Walter Kronheim', in Bochumer Anwalt- und Notarverein (ed.), *Zeit ohne Recht: Justiz in Bochum nach 1933* (Recklinghausen: Bitter, 2002), pp. 140–141; Schmidt, *Überwachen und Dienen*, p. 327. 对首都犹太律师的概述, 参见: Simone Ladwig-Winters, *Anwalt ohne Recht: Das Schicksal jüdischer Rechtsanwälte in Berlin nach 1933*, 2nd edn (Berlin: be.bra, 2007).

63. 据阿尔弗雷德·维尔纳说, 路德维希·弗德拒绝在追求权利与正义上妥协, 于1933年逃离德国, 暂时住在布拉格, 1934年春季, 他和他的妻子“被人发现在癫狂状态下四处游荡”。弗德后来移民巴勒斯坦, 在与世隔绝中死去。他的妻子在荷兰德占区被捕, 死于犹太人大屠杀中。对弗德政治活动的深入了解, 参见他的两本小册子: *Antisemitismus und Justiz* (Berlin: Philo, 1924)和*Die Stellung des Centralvereins zu den innerjüdischen Fragen in den Jahren 1919–1926: Eine Denkschrift für*

Vereinsmitglieder (Breslau: Volkswacht, 1927)。关于弗德的生平，参见：Joseph Walk, *Kurzbiographien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1918–1945* (Munich: Saur, 1988), p. 94; Alfred Wiener, 'In Memory of Ludwig Foerder', *AJR Information* 9:8 (1954), p. 4; 以及 "Dr. Foerder, Wife Return to Health" 一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1日，引自：JTA Archive, <http://www.jta.org/1934/06/01/archive/dr-foerder-wife-return-to-health>.

64. Abraham Ascher, *A Community Under Siege: The Jews of Breslau under Naz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6–77.

65. 到1934年4月30日，有574名犹太法官与检察官离开工作岗位。仅在普鲁士，1933年底就有七百多名犹太律师得不到上庭许可。参见：Wolfgang Benz, 'Jüdische Jurist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gime: Von der Entrechtung zur Verfolgung und Vernichtung', in *Justiz und Judentum*, ed. Gerhard Pauli (Düsseldorf: Justizministerium des Landes NRW, 1999), pp. 19–36, here pp. 23–26.

66. Stephan A. Glienke, *Die NS-Vergangenheit späterer niedersächsischer Landtagsabgeordneter: Abschlussbericht zu einem Projekt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für Niedersachsen und Bremen im Auftrag des Niedersächsischen Landtages* (Hannover: Niedersächsischer Landtag, 2012), p. 64.

67. 详见：Uwe Lohalm, '“Bis in die letzten Kriegstage intakt und voll funktionsfähig”: Der öffentliche Dienst in Hamburg 1933 bis 1945', in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and Steffi Kaltenborn (eds), *Stadtgeschichte in der NS-Zeit: Fallstudien aus Sachsen-Anhalt und vergleichende Perspektiven* (Münster: Lit, 2005), pp. 53–65, esp. pp. 55–56.

68. 维尔纳·冯·费希特是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之孙，“维京联盟”前领导人，他的小传参见：Münzel and Schörle, *Erfurt Feldstraße*, pp. 23–24.

69. Ted Harrison, '“Alter Kämpfer” im Widerstand: Graf Helldorff, die NS-Bewegung und die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5 (1997), pp. 385–423, here p. 395.

70. Glienke, *Die NS-Vergangenheit späterer niedersächsischer Landtagsabgeordneter*, p. 65.

71. Klein, 'SA-Terror und Bevölkerung in Wuppertal', pp. 47–48.

72. 黑尔多夫后来加入了克劳斯·申克·格拉夫·施陶芬贝格领导的军事抵抗组织，1944年被处决，关于他的情况参见：Harrison, '“Alter Kämpfer” im Widerstand'.

73. Schmidt, *Schützen und Dienen*, pp. 323–332; Götz, 'Die Errichtung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p. 70; 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der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p. 12.

74. 'Röverstaat Oldenburg!', *Vorwärts*, 31 July 1932; 'S.A.—Leute werden Polizisten', *Vorwärts*, 29 July 1932, both in GSt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no. 311, pp. 418–420. 利用这一行动，勒韦尔几乎将原来仅有320人的常规警察部队增加了一倍。

75. Abraham Ascher, *Was Hitler a Riddle?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2.

76. Schmidt, *Schützen und Dienen*, pp. 324–325.

77. 根据帝国专员弗朗茨·冯·埃普的命令，巴伐利亚甚至推出了两种辅警：“政治辅助警察”专门从党卫队队员中招募，“安全辅助警察”由冲锋队及钢盔团成员组成。参见：BayHStA

IV, Stahlhelm, no. 392: The Commissarial State Minister of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n 'Einberufung und Verwendung von Hilfspolizei in Bayern', 27 March 1933.

78. 参见: Michael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 (Bonn: Dietz, 1999); idem, 'Verfolgt, unterdrückt und aus dem Land getrieben: Das Ende der Arbeiterbewegung im Frühjahr 1933', in Wachsmann and Steinbacher, *Die Linke im Visier*, pp. 31–51, here pp. 43–6; Schmidt, *Schützen und Dienen*, pp. 332–336.

79. Frank Boblenz and Bernhard Post, *Die Machtübernahme in Thüringen 1932/33* (Erfurt: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Thüringen, 2013), p. 36.

80. BayHStA, StK, no. 5256: Bavarian Ministry of Finance, Letter on 'Sonderbeauftragte bei den Bezirksamtern und Sonderbevollmächtigte bei den Regierungen', undated.

81. 参见: Wolfgang Edler von Zander, *Das SA-Feldjägerkorps: Eine vergessene Einheit der Geschichte* (Wolfenbüttel: Melchior, 2014), p. 26.

82. Schepura,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pfälzischen Provinz*, p. 282.

83. 例如, 参见: Klein, 'SA-Terror und Bevölkerung in Wuppertal', pp. 47–48.

84. BayHStA, StK, no. 5256: Letter from Hanns Günther von Obernitz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 July 1933.

85. 关于马丁的传记, 参见: Grieser, *Himmlers Mann in Nürnberg*.

86. BayHStA, StK, no. 5256: Letter from Dr Benno Martin to the Bavarian Minister President, 20 July 1933.

87. 1933年之前, 纳粹领导人曾威胁在夺权之后对警察实施严厉报复。马格德堡-安哈尔特大区领袖威廉·勒佩尔甚至在1932年夸口道, 不遵循该党路线的警察将“死于国防军的大炮之下”; Schumann,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 345.

88. Schyga, *Goslar 1918–1945*, pp. 139, 142–146; Ingo von Münch, *Gesetze des NS-Staates: Dokumente eines Unrechtssystems*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4), p. 93.

89. Schyga, *Goslar 1918–1945*, p. 147.

90. BArch Berlin, NS 23/708: Letter from Röhm on SA-Feldpolizei, 11 August 1933.

91. BArch Berlin, NS 23/708: Letter from Röhm on Feldjägerkorps in Prussia, 31 October 1933; GSt PK, I. HA, Rep. 84a, no. 12004, pp. 134–136: OSAF on Feldjägerkorps in Prussia, 7 October 1933; Schmidt, *Schützen und Dienen*, pp. 328–329. 与“战地猎兵军团”相关的一组文件参见: Zander, *Das SA-Feldjägerkorps*.

92. 多名目击者后来称, 瓦尔特·弗里奇直接卷入1934年6月30日到7月2日在柏林执行的处决; 更多参考信息见: Rainer Orth, 'Der Amtssitz der Opposition?': *Politik und Staatsumbaupläne im Büro des Stellvertreters des Reichskanzlers in den Jahren 1933/1934*, diss., 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 2016, ch. 6.3.1.

93. BArch Berlin, NS 23/708: Letter from Röhm on Feldjägerkorps in Bavaria, 27 February 1934.

94. 同上: SA-Gruppe Hansa, 'Standort-Befehl 14/35', 8 March 1935.

95. 同上, NS 23/708: Letter from Lutze to the Reich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23 May 1935.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96. Klaus Wisotzky,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Opposition: Aspekte des Arbeiterverhalten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Anselm Faust (ed.),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im Rheinland und Westfalen 1933–1945* (Cologn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92), pp. 137–51, here p. 140. 冲锋队在喝醉后展开袭击的倾向更加重了这种耻辱感；参见：Monika Hinterberger, 'Menschen wie wir', in Marlene Zinken (ed.), *Der unverstellte Blick: Unsere Mütter (aus)gezeichnet durch die Zeit 1938 bis 1958: Töchter erinnern sich* (Opladen and Farmington Hills: Barbara Budrich, 2008), pp. 106–110, here p. 108.

97. Häberlen, *Vertrauen und Politik im Alltag*, pp. 9–12, 50–62, 82–92.

98. 这种辩论早在1931年就 very 常见了。例如，参见：Knickerbocker, *German Crisis*, p. 46.

99. 关于冯·帕彭周围人士的策略，参见：Orth, 'Der Amtssitz der Opposition?', and Roshan Magub, *A Life Cut Short: Edgar Julius Jung (1894–1934): Political Theorist and Man of Ac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Camden House, forthcoming).

100. 后面关于伯梅和冲锋队在开姆尼茨实施暴力行为的段落，基于我的文章：'SA–Gewal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und Staatsräson', in *Die Linke im Visier*, ed. Wachsmann and Steinbacher, pp. 191–213.

101. 参见：Albrecht Böhme, *Psychotherapie und Kastration: Die Bedeutung der Psychotherapie als Erziehungs- und Ausscheidungsmethode für sexuell Abwegige und Sittlichkeitsverbrecher, dargestellt an Fällen aus der Kriminalpraxis, unter Heranziehung der Graphologie als Hilfswissenschaft; mit Einführung in das Sterilisations- und Kastrationsrecht sowie in Fragen der Vorbeugung gegen das Verbrechen, mit Ausblick auf Fragen der Gesetzgebung und Strafrechtspflege* (Munich: Lehmanns, 1935).

102. 更多参考信息参见：Siemens, 'SA–Gewal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und Staatsräson', pp. 195–196.

103. Albrecht Böhme, *Wider den Rechtsbruch der Staatsführu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unich 1958, pp. 9, 21.

104. World Committee for the Victims of German Fascism (ed.), *The Brown Book of the Hitler Terror and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ord Marley* (London: Gollancz, 1933), pp. 341–351.

105. Siemens, 'SA–Gewal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und Staatsräson', p. 197.

106. IfZ, Archives, F 92, pp. 98, 101; Albrecht Böhme, Polizeilicher Gesamtbericht über die Vorfälle in Chemnitz für die Zeit von April bis Mitte Juni 1933.

107. Siemens, 'SA–Gewal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und Staatsräson', pp. 202–206.

108. 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格1933年4月写给一位犹太医生的信，引自：Barbara Degen, *Bethel in der NS-Zeit: Die verschwiegene Geschichte* (Waldkirchen: VAS, 2014), p. 262.

109. 另一位显赫的新教代表人物马丁·涅莫勒立场非常相似，参见：Matthew D. Hockenos, 'Pastor Martin Niemöller, German Protestantism,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1933–1937', in John Carter Wood (ed.), *Christia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onflict,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6), pp. 113–130, here pp. 115–118.

110. GSSt PK, XX. HA, Rep. 240 B 27 d+e, pp. 88–89: Typescript of three Easter cards, April 1933.

111. 所有引文出自: Trauthig, *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 pp. 296–298. 对新教教会1933年所持立场的深入讨论另见: Hermann Beck, 'Anti–Semitic Violence "From Below": Attacks and Protestant Church Responses in Germany in 1933', *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 14:3 (2013), pp. 395–411, esp. pp. 407–409; Gailus, '1933 als protestantisches Erlebnis'.

112. 关于这种矛盾心理, 参见: Peter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des Dritten Reiches: Gewalt und Faszination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Hamburg: Ellert & Richter, 2006 [1991]).

113. Schwarz, 'British Visitors', pp. 499–500.

114. Ascher, *Was Hitler a Riddle?*, p. 42.

115. BayHStA IV, Stahlhelm, no. 181: Report from the SA special representative in Bad Aibling to the SA, Brigade Chiemgau, 24 August 1933.

116. BayHStA IV, Stahlhelm, no. 108: Letter from the Stahlhelm–Ortsgruppe Rosenheim to Bezirksführer Willmer in Prien, 20 June 1933.

117.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500, Opis 4, no. 268, p. 6: Letter from the SA–Gruppe Berlin–Brandenburg to the Geheime Staatspolizeiamt, 20 October 1933.

118. Lothar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Ära Grüttner* (Munich: Oldenbourg, 1988), p. 329; Michael Grüttner, *Brandstifter und Biedermänner: Deutschland 1933–1939* (Stuttgart: Klett–Cotta, 2015), p. 101. 德国当局直到1935年才得知这一法令的准确措辞。关于法令对一般公众隐藏的问题, 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889: Letter from the lawyer and 'SA–Rechtsberater' Walter Luetgebrune to Ernst Röhm, 5 March 1934.

119. BArch Berlin, NS 23/889: Typescript of Röhm's decree from 31 July 1933.

120. Reichsjustizministerium und Statistisches Reichsamt (ed.), *Kriminalstatistik für das Jahr 1932*, p. 12.

121. 这方面有启发性的是: GSt PK, I. HA, Rep. 84a, no. 12004, p. 49: Hellmuth Türpitz, 'Etwas vom Recht der SA', *Deutsche Zeitung*, 6 January 1934. “冲锋队纪律法案”的计划最终于1934年夏季放弃。1934年7月20日, 德国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通知德国法律机构, “特殊的冲锋队司法制度根本不存在, 也不会推出”; GSt PK, I. HA, Rep. 84a, no. 12,004, p. 115.

122. 关于舍内另见第2章。

123. 对谈判及幕后发生的指责, 详见: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pp. 337–345.

124. GSt PK, I. HA, Rep. 84a, no. 12004, p. 5: Letter from Heinrich Schoene to the Oberlandesgerichtspräsident Kiel, 10 July 1933.

125. 同上, p. 6: Letter from Heinrich Schoene to Hanns Kerrl, 10 July 1933. Both letters are also quoted in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p. 339.

126. BayHStA, StK, no. 5256: Decree of the Prussian Minister President from 30 October 1933, printed in *Ministerialblatt für die Preußische Innere Verwaltung* 1933, Part 1, no. 56, pp. 1,303–1,304; *ibid.*: OSAF, Decree of 12 March 1933.

127. BayHStA, StK, no. 5256: Confidential Order of Röhm, 20 March 1933.

128. 同上: Extract from *Schwäbischer Merkur*, 30 May 1933.

129. 普鲁士的这一发展详见: Schuster, *Die SA*, pp. 261–264.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130. BayHStA, StK, no. 5256: Letter from the Reich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to the Länder governments, 16 August 1933.

131. 同上: Letter from OSAF to the Bavarian Minister President, 9 March 1934.

132. 1933年9月1日前, 他们被称为“特别专员”, 参见: Hoser, ‘Sturmabteilung (SA)’。

133. BayHStA, StK, no. 5256: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Finance on ‘Sonderbeauftragte bei den Bezirksämtern und Sonderbevollmächtigte bei den Regierungen’, undated.

134. 同上: Protocol of the Meeting of Siebert, Wagner, Frank, Himmler, and Röhm, 20 October 1933.

135. BayHStA, StK, no. 7579: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State Bank, Munich branch, to the directorate of the Bavarian Staatsbank, 5 July 1934.

136.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159, 184.

137. 钢盔团的历史, 参见: Anke Hoffstadt, ‘Eine Frage der Ehre – zur “Beziehungsgeschichte” von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und SA’, in *Bürgerkriegsarmee*, ed. Müller and Zilkenat, pp. 267–296; Joachim Tautz, *Militaristische Jugend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Jugendorganisationen des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Jungstahlhelm und Scharnhorst, Bund deutscher Jungmannen* (Regensburg: Roderer, 1998); Remco Schauman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in Bielefeld und im Regierungsbezirk Minden 1918–1935’, *Jahresberich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die Grafschaft Ravensberg* 83 (1996), pp. 139–198. 贝格哈恩的开创性研究仍然无可替代: Berghahn, *Der Stahlhelm*; ‘Das Ende des “Stahlhelm”’,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3:4 (1965), pp. 446–451.

138. Berghahn, *Der Stahlhelm*, pp. 55–63; Schaumann, *Der Stahlhelm*, p. 139.

139. Schaumann, *Der Stahlhelm*, p. 164.

140. Hoffstadt, ‘Eine Frage der Ehre’, pp. 273–277.

141. BArch Berlin, NS 23/474: Report from SA–Standartenführer Gottlob Berger, SA–Untergruppe Württemberg, from 21 September 1932.

142. ‘Ein Sündenregister: Düsterberg über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Berliner Tageblatt*, 8 February 1933, as quoted in British Library (London), *Stahlhelmberichte 1933*, vol. 2, unpaginated.

143. 关于塞尔特1933年的职业生涯, 参见: Rüdiger Hachtmann, ‘Seldte, Franz’,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24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10), pp. 215–216.

144. BayHStA IV, Stahlhelm, no. 99: Letter from Major Mündel, Constance, to Franz Seldte, 18 April 1933. 反过来, 纳粹怀疑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地方“钢盔团”中; 参见BArch Berlin, NS 23/409: Note of the SA–Untergruppe Hamburg, 4 July 1933.

145. Schaumann, *Der Stahlhelm*, p. 167.

146. BayHStA IV, Stahlhelm, no. 365: ‘Bundesbefehl für die Neugliederung des Stahlhelms, B.d.F.’, 18 July 1933.

147. 鉴于二战后的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 从钢盔团转入SA–R I和II是可以选择的。参见: BayHStA IV, Stahlhelm, no. 109: Letter from the Landesamt to the Stahlhelm Ortsgruppe Vilsbiburg, 20 August 1934.

148. BArch Berlin NS 23/510: Der Oberste SA–Führer, ‘Betr. Gliederung der gesamten SA’, 6

November 1933; Hermann-J. Rupieper and Alexander Sperk (eds), *Die Lageberichte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zur Provinz Sachsen 1933–1936*, vol. 2: *Regierungsbezirk Merseburg* (Halle: Mitteldeutscher Verlag, 2004), p. 121. 1936年, 所有18–45岁的男子都属于“现役”冲锋队的一部分, 分为“现役SA I”(18–35)和“现役SA II”(36–45)。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510: Oberste SA-Führung,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A, 15 December 1936. 1935年的最新说法中, SA-R II指的是冲锋队预备队(SA-L); 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510: Der Oberste SA-Führer, 'Aufgaben und Gliederung der SA', 22 January 1935.

149. “钢盔团”的看法参见: BayHStA IV, Stahlhelm, no. 109: Letter from the Stahlhelm Landesverband [Bavaria] to the Bavarian Political Police, 3 October 1934.

150. Patrick Leigh Fermor, *A Time of Gifts: On Foot to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Hook of Holland to the Middle Danube*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p. 31.

151. 同上, P.33。

152. 同上, P.34。

153. 关于冲锋队在大学的活动, 参见: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Giles,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Stefan Rückel and Karl-Heinz Noack, 'Studentischer Alltag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1933 bis 1945', in Christoph Jahr (ed.), *Die Berliner Universität in der NS-Zeit*, vol. 1: *Strukturen und Personen* (Stuttgart: Steiner, 2005), pp. 115–142. 关于1933年5月的焚书活动, 参见: Hans-Wolfgang Strätz, 'Die geistige SA rückt ein: Die studentische "Aktion 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 im Frühjahr 1933', in Ulrich Walberer (ed.), *10 Mai 1933: Bücherverbrennung in Deutschland und die Folg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3), pp. 84–114.

154. 关于本内克担任冲锋队大学办公室负责人时期的情况, 参见: Peschel (ed.), *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übernahme'*, pp. 17–18.

155. BayHStA, StK, no. 7350: Letter from the Chef SA-Ausbildungswesen, Krüger, to the Minister President of Bavaria, 14 September 1933.

156. BayHStA, Minn, no. 81589: Speech of Adolf Hitler from 28 July 1922, as quoted in the Supplement of the *Völkischer Beobachter*, no. 63/65, *Freistaat oder Sklaventum?*

157. Deinert, *Die 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pp. 329–330.

158. 卡尔·根恩巴赫是一名典型的纳粹激进分子。他于1911年11月9日出生在普福尔茨海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 18岁加入纳粹党, 此前不久他刚刚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及荣誉奖。此后, 他在慕尼黑学习法律与政治学。根恩巴赫很快就成为该市最具影响力的学生干部之一, 是1933年5月焚书事件的组织者。1934年夏季, 在冲锋队大学办公室任职结束后不久, 他加入党卫队和帝国保安部。1939年起, 根恩巴赫在帝国保安总部担任领导职务, 是帝国保安部驻德占荷兰的代表。1944年1月25日, 他死于车祸。参见: Volker Bendig and Jürgen Kühnert, 'Die Münchner Bücherverbrennung vom 10 Mai 1933 und der NS-Studentenführer Karl Gengenbach', in Christine Haug and Lothar Poethe (eds), *Leipziger Jahrbuch zur Buchgeschichte 18*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9), pp. 347–364, esp. pp. 349, 358–364;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pp. 88, 380–391, 511, and *passim*.

159. BayHStA, StK, no. 7350: Letter from the leader of the SA University Office in Munich to the

Minister Hermann Esser, 24 January 1934, and further correspondence in file.

160. 简单的介绍参见：Monika Marose, *Unter der Tarnkappe: Felix Hartlaub: Eine Biographie* (Berlin: Transit, 2005).

161. 费利克斯·哈特劳布1934年4月29日写给父亲的信，引自：Felix Hartlaub, *Aus Hitlers Berlin 1934–1938*, ed. Nikola Herweg and Harald Tausc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4), p. 104. 他在1934年3月写给父亲的信另见：Erna Krauss and G. F. Hartlaub (eds), *Felix Hartlaub in seinen Briefen* (Tübingen: Rainer Wunderlich Verlag, 1958), p. 134.

162.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p. 252–260.

163. 德语版本曾在BayHStA, MK, no. 11247中引用：‘Wetzt die langen Messer / Auf dem Bürgersteig! / Lasst die Messer flutschen / In den Judenleib / Blut muss fließen knüppelhageldick / Wir scheißen auf die Freiheit der Judenrepublik / Kommt einst die Stunde der Vergeltung / Sind wir zu jedem Massenmord bereit // Hoch die Hohenzollern / Am Laternenpfahl / Lasst die Hunde baumeln / Bis sie runterfallen! / Blut muss fließen . . . // In der Synagoge / Hängt ein schwarzes Schwein / In die Parlamente / Schmeisst ne Handgranate rein! / Blut muss fließen . . . // Reisst die Konkubine / Aus dem Fürstenbett / Schmiert die Guillotine / Mit dem Judenfett / Blut muss fließen . . . //’

164. 对这首歌不同变种的详细分析，参见：Michael Kohlstruck and Simone Scheffler, ‘Das “Heckerlied” und seine antisemitische Variante: Zur Geschichte und Bedeutungswandel eines Liedes’, in Michael Kohlstruck and Andreas Klärner (eds), *Ausschluss und Feindschaft: Studien zu Antisemitismus und Rechtsextremismus* (Berlin: Metropol, 2011), pp. 135–158.

165. BayHStA, MK 11247: Letter from the General Vicar of the Archdiocese of Munich and Freising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9 June 1934; Letter from the SA–Sturmführer Springer to the Directorate of the Bavarian Academy for Agriculture and the Brewing Trade in Weihenstephan, 4 June 1934. See also Johänn Neuhausler, *Kreuz und Hakenkreuz: Der Kampf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egen die katholische Kirche und der kirchliche Widerstand: Erster Teil* (Munich: Verlag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Bayerns, 1946), pp. 316–317.

166. BArch Berlin, NS 23/1239: Letter from SA–Gruppenführer W. C. Meyer to SA–Brigadeführer Paul Ellerhusen, 31 May 1929. 我们从迈尔的信中唯一了解到的是，歌词中有 ‘Und wer kein Haar am Arschloch hat, der ist noch kein Soldat’（意为“屁眼周围还没长出毛来的家伙就不能叫作战士”）。

167. BayHStA, MK 11247: Letter from the SA University Office Munich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19 June 1934.

168. 同上：Letter from the SA–Hochschulamt Munich to the Reichs SA–Hochschulamt, 31 August 1934.

169. 参见：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2 (1935), p. 704, and vol. 3 (1936), p. 214.

170. 这方面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天才法学家恩斯特·福斯特霍夫，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公开转向民族社会主义，于1933年和1935年分别得到了法兰克福和汉堡大学的教授职务。参见：Florian Meinel, *Der Jurist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Ernst Forsthoff und seine Zeit* (Berlin: Akademie, 2011), pp. 48–54.

171. Christoph Corneliß en, *Gerhard Ritt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Droste, 2001), p. 164.

172. Emanuel Hirsch, *Die gegenwärtige geistige Lage im Spiegel philosophischer und theologischer Besinnu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34), p. 4.

173. Deinert, *Die 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pp. 336–338; Matthiesen, *Greifswald in Vorpommern*, p. 403.

174. Nicola Willenberg, ‘“Der Betroffene war nur Theologe und völlig unpolitisch”: Die Evangelisch–Theologische Fakultät von ihrer Begründung bis in die Nachkriegszeit’, in Hans–Ulrich Thamer, Daniel Droste, and Sabine Happ (eds), *Die Universität Münst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Kontinuitäten und Brüche zwischen 1920 und 1960*, vol. 1 (Münster: Aschendorff, 2012), pp. 251–308, here pp. 269–270. 另见: Ulrich Rottschäfer, *100 Jahre Predigerseminar in Westfalen 1892–1992* (Bielefeld: Luther–Verlag, 1992), pp. 102–111.

175. Willenberg, ‘“Der Betroffene war nur Theologe und völlig unpolitisch”’, pp. 270–272.

176.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 442.

177. Deinert, *Die 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pp. 338–339. 次年, 马丁·博尔曼颁布法令, 从1938年7月起, 教士在纳粹党及其组织担任领导职务不可接受, 这样的人应该立刻被“合适的代替者”替换。GSt PK, XX. HA, Rep. 240 A 1 a–e, p. 77: Secret Decree of Martin Bormann (no. 104/38), 27 July 1938.

178. 到20世纪30年代末, 加入冲锋队的学生数量只占全部学生的10%。另见: Deinert, *Die 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pp. 330–331.

179. UAK, Zugang 244: Wehner, Report on his activities as ‘SA–Verbindungsführer’ in the winter term 1937/38.

180. 尽管如此, 学生所负的义务并不少: 帝国劳动军团、义务参加国家主办的体育活动、常规兵役(1935年推出), 从1937年起, 还要完成工业或农业辅助工作。参见: Deinert, *Die 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p. 74, n. 48.

181. Morsch and Ohm, *Terror in der Provinz Brandenburg*, p. 40.

182. Klein, ‘SA–Terror und Bevölkerung in Wuppertal’, p. 59.

183. Fischer, *Stormtroopers*, p. 111. 书中关于“冲锋队及其财政来源和福利援助”(pp.110–142)的章节详细分析了1935年为止冲锋队的财政状况。

184. 同上, pp. 113–135.

185. BArch Berlin, R2/11913a, vol. 1: Rechnungshof of the German Reich, ‘Bericht über die Prüfung der Vereinnahmung der Obersten SA–Führung (OSAF) vom Reichministerium des Innern im Rechnungsjahr 1933 [. . .] überwiesenen Reichsgelder’, 8 June 1934.

186. 同上: Rechnungshof of the German Reich, ‘Bericht über die Prüfung der Einnahmen und Ausgaben der SA–Gruppe Berlin–Brandenburg’, 30 June 1934.

187. 同上: Letter from the Rechnungshof of the German Reich to the Reich Minister of Finance, 8 August 1934.

188. 同上：Letter from the Reich Treasurer Schwarz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ich Court of Auditors, 23 July 1934.

189. 同上：Letter from the Reich Treasurer Schwarz to the Reich Ministry of Finance, 8 August 1934.

190. BArch Berlin, SA 400003178 (Personal SA File of Erich Reimann): Letter from Lutze to the Reich Treasurer of the SA (Georg Mappes), 4 November 1938.

191. 这方面最有启发的是：BArch Koblenz, ZSG 158/40: Erich Bandekow, 'Über steuerliche Korruptionsfälle von Reichsministern, Reichsleitern etc', 2 July 1945. 更新的概述参见：Bajohr, *Parvenüs und Profiteure*.

192. BArch Koblenz, ZSG 158/40, p. 8: Bandekow, 'Über steuerliche Korruptionsfälle'.

193. BArch Berlin, R 43 II/1206, pp. 50–54: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utze's testamentary executor Bodo Beneke and Hans Lammers, the head of the Reich Chancellery; BArch Koblenz, ZSG 158/40, p. 4: Bandekow, 'Über steuerliche Korruptionsfälle'.

194.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Archiv der sozialen Demokratie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228. 班德科很有可能将捐赠日期误写成1939年。

195. 卡尔·卢策于2015年10月14日向作者提供的信息。

196. 罗姆的讲话引自米夏埃尔·卡迪纳尔·冯·福尔哈贝尔（1911–1952）日记的网络版本；参见：EAM, NL Faulhaber 09263, p. 40, http://p.faulhaber-edition.de/exist/apps/faulhaber/dokument.html?collid=1933&sortby=year&doctype=bb&docidno=BB_09263_0040s.

197. Fest, 'Röhm', p. 204.

第5章

1. 托马斯·曼（1933–1934年日记），1934年7月4日，彼得·德·门德尔松编辑（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77），P.458。

2. 英语世界中将这些事件称作“长刀之夜”，而德国历史学家通常称其为“罗姆清洗”或者“罗姆事件”。这三个术语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德语标签“罗姆清洗”呼应当局的观点，模糊了这一事件是对罗姆及其追随者的清洗、而非他们发动的清洗这一事实。即便是“对冲锋队的清洗”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冲锋队只是这一场合受害者中的一部分。更详细的讨论参见：Eleanor Hancock, 'The Purge of the SA Reconsidered: "An Old Putschist Trick" '?',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4:4 (2011), pp. 669–683, here pp. 682–683.

3. 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讨论，参见：Brown, 'SA in the Radical Imagination', pp. 248–274; Udo Grashoff, 'Erst rot, dann braun? Überläufer von der KPD zu NS-Organisationen im Jahr 1933', in Günther Heydemann, Jan Erik Schulte, and Francesca Weil (eds), *Sachs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4), pp. 215–236.

4. BArch Berlin, NS 23/431: Circular letter from OSAF on KPD infiltrations, 8 December 1932.

5. Rudolf Diels, *Lucifer ante portas: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50), p. 207.

6. 格拉斯霍夫指向如下事实：据称在1933年加入冲锋队的5万名共产党人只占冲锋队总人数的1.7%，但约占共产党总人数的15%；Grashoff, 'Erst rot, dann braun?', pp. 230–234。

7. Kirstin A. 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Hitlers erster Feldmarschall. Eine Biographie*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6), p. 135.

8. Hancock, 'Purge of the SA Reconsidered', pp. 673–678; idem, *Ernst Röhm*, pp. 141–151.

9. 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pp. 136–137.

10. 1934年春季这些发展的总结参见：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629–644; Evans, *Third Reich in Power*, pp. 20–31; Karl Martin Graß, *Edgar Jung: Papenkreis und Röhm-Krise 1933/34* (Edingen: Self-Publishing, 1967), pp. 156–198; 另见记者海因茨·赫内精心研究后写出、在许多方面都很可靠的流行书籍：Heinz Höhne, *Mordsache Röhm: Hitlers Durchbruch zur Alleinherrschaft 1933–1934*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84)。同时代人的分析参见：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1 (1934), pp. 261–271.

11. Linder, *Von der NSDAP zur SPD*, pp. 168–189. 海姆塞特对同性恋的兴趣参见他的医学论文：*Hetero-und Homophilie: Eine neuorientierende An-und Einordnung der Erscheinungsbilder, der 'Homosexualität' und der 'Inversion' in Berücksichtigung der sogenannten 'normalen Freundschaft' auf Grund der zwei verschiedenen erotischen Anziehungsgesetze und der bisexuellen Grundeinstellung des Mannes* (Dortmund: Schmidt & Andernach, 1924)。尽管罗姆因为被迫对公众隐瞒同性恋这一事实而饱受折磨，但他成为了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的同性恋游说组织“人权联盟”的成员。

12. Andreas Dornheim, *Röhms Mann fürs Ausland: Politik und Ermordung des SA-Agenten Georg Bell* (Münster: Lit, 1998), pp. 117–141; Hancock, *Ernst Röhm*, pp. 115–116.

13. John Wheeler-Bennett,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6* (London: Macmillan, 1954), pp. 320–332. 对这些论点的批判性评估，参见：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pp. 137–139.

14. 罗姆和他的追随者很快风闻这些计划。1934年5月16日，罗姆在写给冲锋队领导人的密信中声称，“冲锋队的敌人”已经在行动，但此时无法对其进行直接干预。不过，为了日后的报复，罗姆要求所有冲锋队旗队收集关于“对冲锋队敌意”的证据。对于接到这封信的冲锋队员来说，罗姆所指的明显是国防军的活动；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42: Typescript of Röhm's letter from 16 May 1934.

15. “卑贱者统治”也是埃德加·J·荣格代表作的书名，该书于1927年首次出版，1930年再版做了修订和扩充。

16. 关于这一组织及其活动，参见奥尔特的论文 '*Der Amtssitz der Opposition?*'。另见即将出版的如下书籍：Roshan Magub, *A Life Cut Short – Edgar Julius Jung (1894–1934): A Political Biography* (Lake Placid, NY: Camden House)。下面的书籍里有陈旧但仍令人印象深刻的总结：Graß, *Edgar Jung*, in particular pp. 199–236。

17. 冯·帕彭1934年6月17日在马格德堡的讲话摘要英文翻译版本参见：Roderick Stackelberg and Sally A. Winkle (eds),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An Anthology of 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70–172, here p. 171.

18. Orth, 'Der Amtssitz der Opposition?', ch. 6.1.4.

19.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42: Minutes of the meeting in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19 June 1934. 施密特的妻子是犹太人，1938年11月，在数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成员公开要求下，他被迫辞职。参见：Horst Romeyk, *Düsseldorfer Regierungspräsidenten 1918 bis 1945*, *Rheinische Vierteljahrsblätter* 44 (1980), pp. 237–299, here pp. 285–286. 吕林克在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图谋失败后被处决。

20.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121: Confidential report of U.S. ambassador William E. Dodd on the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Germany from 20 June 1934.

21. 对相关文献中立场的最新总结，参见：Hancock, 'Purge of the SA Reconsidered'.

22. Kurt Gossweiler, *Die Röhm-Affäre: Hintergründe – Zusammenhänge – Auswirkungen* (Cologne: Pahl-Rugenstein, 1983 [1963]), here p. 417.

23. 一些书籍中提出了此类指控，例如：Roschmann, *Erinnerungen eines kämpferischen Schwaben*, pp. 37–38.

24. 果不其然，罗姆的对手后来尽其所能地掩盖对其指控的编造性质，而是强调后者所谓的革命决心。典型例子是维尔纳·冯·布隆贝格采用的策略，他在1945年9月24日接受美国第7集团军审讯中心审问时将罗姆称为“为权力而战的无政府主义者，既不捍卫某个特殊的理想，对德国政府也没有任何精确的计划。他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对军队的控制。因此，他曾计划消灭我和其他一些将军，甚至可能包括希特勒”；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42: Extract of the interrogation of Werner von Blomberg, 24 September 1945.

25. 除了已经提及的辅助文献之外，还可以参见：Evans, *Third Reich in Power*, pp. 31–41;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319–344; Otto Gritschneider, 'Der Führer hat Sie zum Tode verurteilt...': *Hitlers 'Röhm-Putsch' - Morde vor Gericht* (Munich: Beck, 1993); Susanne zur Nieden and Sven Reichardt, 'Skandale als Instrument des Machtkampfes in der NS-Führung', in Martin Sabrow (ed.), *Skandal und Diktatur: Öffentliche Empörung im NS-Staat und in der DD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4), pp. 33–58; Charles Bloch, *Die SA und die Krise des NS-Regimes 193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pp. 96–116; Max Gallo, *The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Hitler's Purge of Roehm and the S.A. Brown Shirts* (Godalming and Surrey: Fontana, 1972).

26. 维克托·卢策的政治日记现存于波恩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FES）档案馆。这本日记落户于此的经历就值得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二战的最后阶段，住在贝沃根的卢策家人将日记交给了住在韦尔讷的朋友（据说是担心被盟军抄没），后者答应为其照管。但是，1945年11月，日记为前往德国报道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过程的美国记者威廉·切斯特所得。由于不确定日记的真实性，切斯特在同月向被盟军监禁的原纽伦堡警察局长、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本诺·马丁展示了日记，马丁在笔记本空白页上提供了手写的“专家意见”。1957年，日记的上述摘要发表于《法兰克福评论》。后来，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IfZ）档案管理人员安东·霍赫试图代表研究所的图书馆购买日记，与此时住在多哥的切斯特取得联系，出价1000美元。但是，IfZ的所有努力都没能成功。1959年初，切斯特将日记交给法国驻多哥高级特派员乔治斯·斯佩纳尔。11年以后，已成为法国国会议员的斯佩纳尔前往波恩，将日记交给FES。此后，日记成为FES档案馆的特殊收藏品，只

能在维克托的侄儿卡尔·卢策（代表家族利益）许可下翻阅。参见FES关于维克托·卢策的说明文件。其他信息由卡尔·卢策及FES的安雅·克鲁克提供。

27. 卢策的传略参见：Marcus Weidner, 'Lutze, Viktor', in *Die Straßenbenennungspraxis in Westfalen und Lippe währe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atenbank der Straßenbenennungen 1933–1945*, http://www.lwl.org/westfaelische-geschichte/nstopo/stnam/Begriff_211.html.

28. Bloch, *Die SA und die Krise des NS-Regimes*, p. 155.

29. 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 358.

30. Niekisch, *Das Reich der niederen Dämonen*, p. 167.

31. Hans Rudolf Wahl, 'Antisemitismus in der NS-Wochenzeitung *Der SA-Mann*', in Michael Nagel and Moshe Zimmermann (eds), *Judenfeindschaft und Antisemitismus in der deutschen Presse über fünf Jahrhunderte: Erscheinungsformen, Rezeption, Debatte und Gegenwehr*, vol. 2 (Bremen: edition lumière, 2013), pp. 671–690, here p. 676.

32. 一天之前（6月21日），希特勒在诺伊德克庄园会见了布隆贝格将军和德国总统兴登堡。他们很有可能在这次会面中讨论和协调了对冲锋队的决定性打击行动。参见：Orth, 'Der Amtssitz der Opposition?', ch. 6.3.

33.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p. 31–35.

34. 根据卡尔·施赖尔战后的证词，罗姆早在1934年6月26日就已经听到了希特勒计划以卢策代替他的流言，但被后续报告的虚假安全感所迷惑。参见：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42: Letter from Karl Schreyer to the Munich Police about the events of 30 June 1934, 27 May 1949.

35.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p. 28–30. 卢策对罗姆的结论基本上是负面的。在卢策眼中，“除了性取向之外”，罗姆“过于注重武力”，不足以成为一名政治家。他认为罗姆是威胁纳粹阵营政治团结的麻烦制造者。

36.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p. 39–41.

37. 同上，pp. 41–51.

38. 关于处决罗姆的情况，参见：Hancock, *Ernst Röhm*, pp. 160–161; Gritschneider, 'Der Führer hat Sie zum Tode verurteilt', pp. 29–36.

39.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42: Letter from Karl Schreyer to the Munich Police about the events of 30 June 1934, 27 May 1949.

40.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p. 59–79.

41. 同上，P.65。7月1日夜间到2日凌晨，卢策任命埃里希·赖曼为自己的副官，赖曼后来成为冲锋队“统帅堂”旗队指挥官；参见：BArch Berlin, SA400003178 (Reimann, Erich): Erich Reimann, Curriculum Vitae, 21 March 1942.

42. 卢策声称亲眼见过这些名单，这为希特勒1934年6月30日的最终生杀决断提供了基础。参见：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62.

43. 在这一段中，我遵循奥尔特对事件的详细重现：Orth, 'Der Amtssitz der Opposition?', chs 6.3.1 and 6.3.2. 关于计划中对保罗·舒尔茨（他于1934年勉强逃过处决，这不是第一次了）“私

刑”的案例研究，参见：Anke Hoffstadt and Richard Kühl, ‘“Dead Man Walking”: Der “Fememörder” Paul Schulz und seine “Erschießung am 30. Juni 1934”’,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34:4 (2009), pp. 273–285.

44. 引自：Mathilde Jamin, ‘Das Ende der “Machtergreifung”: Der 30. Juni 1934 und seine Wahrnehmung in der Bevölkerung’, in Wolfgang Michala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Schöningh, 1984), pp. 207–219, here p. 212.

45. ÖstA/AdR, Bürckel/Materie, Karton 206, Mappe 4605: Decree of Adolf Hitler to Chief of Staff Lutze, 30 June 1934 (typescript).

46.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121: Werner von Blomberg, Order to the Army, translated by the *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 1 July 1932.

47. 发表于《帝国法律公报》1934年第1号，p.529。另见：Gritschneder, ‘Der Führer hat Sie zum Tode verurteilt’, pp. 46–51.

48.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p. 66–68. 关于“罗姆清洗”中冲锋队与党卫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参见：BArch Berlin, NS 26/2540: Report of the SA–Sturmführer Hermann Baecke about the comportment of the SS man Fritz Völker on the night of 30 June–1 July 1934.

49.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121: Report from Jacob W. S. Wuest, U.S. Military Attaché in Berlin,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 July 1934.

50. BayHStA, StK, no. 7579: Bavar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ituational report, 2 July 1934.

51. Dietmar Schulze, ‘Der “Röhm–Putsch” in der Provinz Sachsen’, in *Hallische Beiträge zur Zeitgeschichte*, ed. Jana Wüstenhagen and Daniel Bohse (Halle/Saale: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2005), pp. 9–33, here pp. 9 and 21.

52. StA München, Bestand Polizeidirektion München, Personalakten, Nr. 10007 (Otto Ballerstädt): Testimony of Paul Zell, 18 June 1949.

53. BayHStA, StK, no. 7579: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Minister President, 5 July 1934. 罗姆的母亲死于1936年1月6日。

54.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88. See also Gritschneder, ‘Der Führer hat Sie zum Tode verurteilt’, pp. 38–39.

55. Orth, ‘Der Amtssitz der Opposition?’; idem, *Der SD-Mann Johannes Schmidt* (Marburg: Tectum, 2012), pp. 102–112.

56. Schulze, ‘Der “Röhm–Putsch” in der Provinz Sachsen’, pp. 25–26.

57. BArch Berlin, NS 23/475: List of the victims of the ‘Röhm purge’, undated.

58. 关于西里西亚的“罗姆清洗”，参见：Schmidt, ‘Der SA–Führer Hans Ramshorn’, pp. 233–235.

59. 曼在1934年7月5日和11日的日记：Tagebücher 1933–1934, pp. 460–461, 467. 布洛赫的书充实了这一推理：Bloch, *Die SA und die Krise des NS-Regimes*, pp.165–172. 另见：Hett, *Burning the Reichstag*, pp. 122–139.

60. 关于威廉·施密德的案例，参见：Gritschneder, ‘Der Führer hat Sie zum Tode verurteilt’, pp. 37–39.

61. Ludecke, *I Knew Hitler*, p. 554.
62. Nikolai Tolstoy,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p. 145.
63. BArch Berlin, NS 23/434: Letter from SA–*Obersturmbannführer* Lothar Schiedlausky, with two anonymous reports attached, 9 August 1934. 另见如下文献中的详细信息: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42: Letter from Karl Schreyer to the Munich Police about the events of 30 June 1934, 27 May 1949.
64. BArch Berlin, NS 26/2048: Article in the *Lübbener Kreisblatt*, 18 or 19 August 1934.
65. BArch Berlin, NS 23/204: Letter from Walter Buch to the Führer's deputy (Rudolf Hess), 2 August 1934.
66. BArch Berlin, NS 23/508: Letter from the Silesian SA to the OSAF, 26 July 1934.
67. 接下来的几年中,“道德缺失”仍然是对冲锋队成员实施的许多纪律行动常见的指控。参见: Campbell, 'SA after the Röhm Purge', p. 660.
68. 引自: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vol. 1: *Triumph, Erster Halbband 1932–1934* (Munich: Süddeutscher Verlag, 1965), pp. 423–424.
69. BArch Berlin, NS 23/508: Report of SS–*Hauptsturmführer* Helmut Willich, Stettin, 21 August 1935. 贝塞尔的书也使用了这一文件: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pp. 144–145.
70.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24, pp. 25 and 45.
71. BArch Berlin, NS 23/508: 'Geflüster um das Morden', *Neuer Vorwärts: Sozial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no. 57, 15 July 1934. “希特勒青年团员克纳克斯”引用了故事片《希特勒青年团员克纳克斯》。这部宣传电影改编自作家卡尔·阿洛伊斯·申津格的小说,1933年9月首演并在德国院线大获成功。参见: Kurt Schilde, '“Hitlerjunge Quex” – Eine Welturaufführung am 11. September 1933 in München: Blick hinter die Kulissen des NS–Propagandafilms',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59:10 (2008), pp. 540–550.
72. BArch Berlin, NS 23/508: Der Führer der Leibstandarte [König], Munich, 30 June 1934.
73. 最新的例子参见: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 323.
74. 其他同性恋冲锋队领导人的名单,参见: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679–680.
75. 引自: Hancock, *Ernst Röhm*, p. 107.
76. Linder, *Von der NSDAP zur SPD*, pp. 135–189.
77. Helmuth Klotz, *Der Fall Röhm* (Berlin–Tempelhof: Self–Publishing, 1932).
78. 这次事件的详细重现以及公众的反应,参见: Laurie Marhoefer, *Sex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German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5), pp. 146–173;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200–8. 引用的绰号根据: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71. 另见: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681–682.
79. 媒体报道的详细分析参见: Marhoefer, *Sex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pp. 160–173. 与马赫费尔不同,苏珊·祖尔·尼登和斯文·赖夏特提出,主流媒体对“罗姆丑闻”的报道普遍采取了反同性恋的论调; Susanne zur Nieden and Sven Reichardt, 'Skandale als Instrument des Machtkampfes in der NS–Führung', pp. 37–38. 汉斯·鲁道夫·瓦尔强调了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30年代企图“揭露”纳粹

是“真正的同性恋运动”；Wahl, 'Männerbünde, Homosexualitäten und politische Kultur', pp. 221–222.

80. Ignaz Wrobel [Kurt Tucholsky], 'Bemerkungen: Röhm', *Die Weltbühne*, no. 17 from 26 April 1932, p. 641.

81. Marhoefer, *Sex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p. 154; Alexander Zinn, *Die soziale Konstruktion des homosexuellen Nationalsozialisten: Zu Genese und Etablierung eines Stereotyps*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7); idem, 'SA, Homosexualität und Faschismus', p. 410; Andreas Pretzel, 'Schwule Nazis: Narrative und Desiderate', in *Homosexuel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 Michael Schwartz (Munich: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14), pp. 69–76. 在第三帝国初期出版的许多早期反纳粹小说中，对冲锋队高层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占据主导地位。参见：Jörn Meve, '“Homosexuelle Nazis”：Zur literarischen Gestaltung eines Stereotyps des Exils bei Ludwig Renn und Hans Siemsen', *Forum Homosexualität und Literatur* 11 (1991), pp. 79–100.

82. 马赫费尔的作品也推崇这种观点：Marhoefer, *Sex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p. 155。另见 Wahl, 'National-Päderasten?'，瓦尔对这一方面做了认真的讨论，假定只有两种相互排斥的立场：同性恋是或不是冲锋队的标志。相反，本书提倡的观点是，应该将冲锋队看成其中包含同性恋者的组织，但男同性恋亚文化对该组织的影响不像瓦尔所说的那么大。

83. 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 pp. 163–209.

84.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 683. 关于第三帝国对男同性恋的迫害，参见：Stefan Micheler and Patricia Szobar, 'Homophobic Propaganda and the Denunciation of Same-Sex-Desiring Men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1: 1–2 (2002), pp. 95–130；以及耶洛内克的开创性研究：Burckhard Jellon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0).

85. 对于这一连串事件，参见：Claudia Bruns and Susanne zur Nieden, '“Und unsere germanische Art ruht bekanntlich zentnerschwer auf unserem Triebleben . . .”：Der “arische” Körper als Schauplatz von Deutungskämpfen bei Blüher, Heimsoth und Röhm', in Paula Diehl (ed.), *Körp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ilder und Praxen* (Munich: W. Fink, 2006), pp. 111–128. 对布吕厄在冲锋队影响力的批评观点，参见：Reichardt, 'Homosexualität und SA-Führer', p. 739.

86. 详细讨论参见：Jason Crouthamel, '“Comradship” and “Friendship”：Masculinity and Militarisation in Germany's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Gender & History* 23:1 (2011), pp. 111–129, esp. pp. 118–126. 另见：Marhoefer, *Sex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pp. 151–152，以及上述文献的第4章。

87. 关于1934年夏季之前西里西亚冲锋队中的同性恋网络，参见：Schmidt, 'Der SA-Führer Hans Ramshorn', pp. 226–7；关于卡尔·恩斯特及其“随从”，参见：Wahl, 'National-Päderasten?'；关于冲锋队同性恋网络的更全面介绍，参见：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 680.

88. 另见：Pretzel, 'Schwule Nazis', p. 69.

89.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121: Letter from George S. Messersmith,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William Philipp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18 August 1934.

90. 维尔纳·奥托·米勒-希尔1944年7月21日的日记，引用于他的 *Man hat es kommen sehen*

und ist dennoch erschüttert': *Das Kriegstagebuch eines deutschen Richters 1944/45* (Munich: Siedler, 2012), p. 59.

91. 'Hitler: Ich warte nicht bis 11.00 Uhr', *Frankfurter Rundschau*, 14 May 1957, p. 3.

92.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1 (1934), pp. 191–195.

93. Jamin, 'Das Ende der "Machtergreifung"', p. 215.

94.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127: Manuskript 'Betr.: Adolf Hitler', Kopenhagen, 17 March 1949, p. 6.

95. 托马斯·曼1934年7月13日的日记, 收录于他的 *Tagebücher 1933–1934*, p. 470。希特勒的下一讲讲话参见: Domarus,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pp. 410–424.

96. Bösch, *Das konservative Milieu*, p. 138. 类似的例子见: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p. 143.

97.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42: Maximilian Fretter-Pico, Memorandu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hrmacht and the Nazi Party.

98. Carl Schmitt, 'Der Führer schützt das Recht', *Deutsche Juristen Zeitung*, 1 August 1934, pp. 945–950, here pp. 946–947.

99. 同上, p. 947。

100. Carl Schmitt,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chtsstaat',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63 (no. 12/13, 24 and 31 March 1934), pp. 713–718.

101. 同上, pp. 716–717。

102. Ernst Fraenkel, *The Dual State: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Dictatorship*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9), p. xiii.

103.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Allan Lane, 2006), p. 101. 戈斯魏勒也提倡“罗姆清洗”是压制德国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抵抗的第一次和最重要尝试这一观点: Gossweiler, *Die Röhm-Affäre*, pp. 523–524。

104. BayHStA, StK, no. 5256: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to the Bavarian Minister President, 14 August 1934.

105. 同上: Decree of the Bavar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Adolf Wagner, 19 July 1934.

106. Carsten Schröder, 'Der NS-Schulungsstandort Lockstedter Lager: Von der "Volkssportschule" zur SA-Berufsschule "Lola I"', *Informationen zur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Zeitgeschichte* 37 (2000), pp. 3–26, here p. 12.

107.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121: Confidential report of U.S. ambassador William E. Dodd, 13 July 1934; BArch Berlin, NS 23/508: 'Das Schicksal der SA', *Neuer Vorwärts: Sozial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Karlsbad), 15 July 1934.

108. 这一观点参见: Jamin, 'Das Ende der "Machtergreifung"', p. 207.

第6章

1.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2 (1935), p. 610.

2.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34: Letter from SA–*Obersturmbannführer* Wilhelm Blessing, Schönlanke, to SA–*Gruppenführer* Siegfried Kasche, 24 November 1934.

3. 关于这种“纳粹道德”，参见：Wolfgang Bialas, *Moralische Ordnun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4), 特别是：pp.9–62; Raphael Groß, *Anständig geblieb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ral*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10).

4. GSt PK, I. HA, Rep. 90 Annex P, Geheime Staatspolizei, no. 79/1, p. 84: ‘Lagebericht für die Provinz Berlin–Brandenburg’, October 1934.

5.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p. 148.

6. 同上：Hochstetter, *Motorisierung und ‘Volksgemeinschaft’*, p. 73.

7.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1 (1934), pp. 761–767, here p. 762.

8. Jürgen Matthäus and Frank Bajohr (eds), *Alfred Rosenberg: Die Tagebücher von 1934 bis 1944*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15), p. 182 (entry from 27 April 1936).

9. 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öhne, no. 183: J. C. White, Chargé d’Affaires ad interim at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Berlin,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the S.A. 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31 December 1934.

10. 参见：Karl Joachim Warnecke, *Rechtliche Entwicklung und 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urmabteilungen (SA)*, inaugural diss., Georg–August Universität zu Göttingen, 1935, p. 28.

11.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222–223. 从1935年3月起，这个法庭被称作“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纪律法庭”。参见：Jamin, ‘Zur Rolle der SA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p. 344.

12. Jamin, ‘Zur Rolle der SA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pp. 344–353.

13.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 223.

14. 有启发性的一些案例参见：Oberste SA–Führung (ed.), *Das Jahr der SA: Vom Parteitag der Ehre zum Parteitag der Arbeit* (Munich: Eher, 1939), pp. 70–80;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3 (1936), p. 851. 冲锋队官方披露信息参见：Viktor Lutze, *Wesen und Aufgaben der SA: Rede des Stabschefs vor dem Diplomatischen Korps und den Vertretern der ausländischen Presse am 24 Januar 1936* (Munich: Eher, 1939), in particular pp. 20–21. 关于冲锋队“民族共同体小卫士”的角色，参见：Frank Werner, ‘Die kleinen Wächter der “Volksgemeinschaft”：Denunzianten, Boykotteure und Gewaltakteure aus Schaumburg’, in Frank Werner (ed.), *Schaumburger Nationalsozialisten: Täter, Komplizen, Profiteure* (Bielefeld: Verlag für Regionalgeschichte, 2009), pp. 521–583.

15. OSaF (ed.), . . . wurde die SA eingesetzt, pp. 12, 30–33, 37.

16. 例如，参见索帕德提供的信息：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2 (1935), pp. 946–948.

17.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pp. 530–531.

18. Schafranek, *Söldner*, p. 361.

19.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34: Letter from SA–*Gruppenführer* Siegfried Kasche to Adolf–Heinz Beckerle, 18 November 1940.

20. Eugen Kogon, *Der SS-Staat: Das System der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Munich: Alber, 1946).

21. 引自: GSt PK, I. HA, Rep. 90 Annex P, no. 36/1, pp. 19–22: Letter from the Regierungspräsident in Stade to the Prussian Minister President, 21 August 1935. 德语原文为: 'Die Roten sind bezwungen / Am Boden liegt das ganze Bonzenpack / Und schon erhebt sich frech der fette Spießer / Der nie gekämpft und nie geblutet hat // Ihr Spießer und Bonzen, wir sind auf der Wacht / Wir sind die Alten noch heut / Wir haben geblutet, gekämpft und geschafft / Für Deutschland, doch niemals für Euch // Drum vorwärts, drum vorwärts, die Straße frei / Ihr Spießer, schert Euch nach Haus! / Ihr Spießer, schert Euch nach Haus! / Wir schlagen Euch sämtliche Knochen entzwei / Und räuchern die Tempel Euch aus!' 索帕德的书中提供了另一首当时的冲锋队激进歌曲: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2 (1935), p. 608.

22. Fritz Stern, 'Five Germans I Have Known', *European Review* 10:4 (2002), pp. 429–445, here p. 432.

23. Gottfried Oy and Christoph Schneider (eds), *Die Schärfe der Konkretion: Reinhard Strecker, 1968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bundesdeutschen Historiografie* (Essen: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4), 42–43. 关于“声音历史”这一繁荣的领域, 参见最新的专著: Huw D. Hallam, *National Socialism and Its Musical Afterlife*, PhD diss., King's College London, 2013, esp. pp. 50–87.

24. Marlene Zinken, 'Ein dehnbares Haus', in Marlene Zinken (ed.), *Der unverstellte Blick*, pp. 30–9, here p. 33. 冲锋队游行转为对路人暴力袭击的例子, 参见: GSt PK, I. HA, Rep. 90 Annex P, no. 36/1, p. 34: 'Ereignismeldung', 12 September 1935.

25. 上一段中的所有信息取自: BayHStA, MInn, no. 73686: 'Bericht über die Vorfälle in Weildorf', undated. 地方冲锋队安装《冲锋队员》展示架的情况很常见; 参见: GSt PK, I. HA, Rep. 90 Annex P, no. 36/1, pp. 48–50: 'Auszug aus dem Lagebericht des Regierungspräsidenten in Wiesbaden vom 30 August 1935'.

26. 约瑟夫·格鲁伯、马克特·泰森多夫2015年5月27日写给作者的信提到了维尔芬格书中的记录: Rainer Wilfinger, *Heimatbuch Teisendorf: Markt und Land* (Teisendorf: Markt Teisendorf, 2001), p. 456. 这里的“抵抗”是根据开创性的“巴伐利亚计划”中的定义, 该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以自下而上的角度分析了纳粹统治下的生活。参见: Michael Wildt, 'Das "Bayern-Projekt", die Alltagsforschung und die "Volksgemeinschaft"', in Norbert Frei (ed.), *Martin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und die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7), pp. 119–129.

27. 参见 Friedemann Bedürftig, 'Hitlers braune Bataillone: Vom Kampfverband zum Parteifluchtweg', *Die Zeit*, 1 December 1989, p. 55.

28. Alan E. Steinweis, *Kristallnacht 1938* (London: Belknap, 2009), p. 4. 关于描述这些事件的竞争性用词(“水晶之夜”、11月大迫害、德国大迫害之夜)问题, 参见该书pp.1–4。

29. 对此的概述参见以下杰出研究著作: Wildt, *Volksgemeinschaft als Selbstermächtigung*; Ahlheim, 'Deutsche, kauft nicht bei Juden!', pp. 319–403; Saul Friedländer,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 (Munich: dtv, 2008), pp. 129–191;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0–89; 以及下面讨论的更专业性文献。

30. BArch Berlin, NS 23/515: Report of the Breslau Police President to the District President of

Lower Silesia, 9 July 1935.

31. LArch Berlin, A Pr. Br. Rep. 030, tit. 95, no. 21617: Kripo-Tagebuch Berlin-Schöneberg, 'Zwischenfall mit SA-Angehörigen', 10 October 1935. 根据1934年夏季盖世太保的报告, 冲锋队员的罪行中, 80%-90%是在酒醉状态下实施的: GSt PK, I. HA, Rep. 90 Annex P Geheime Staatspolizei, no. 76/2, p. 24: 'Lagebericht für die Provinz Berlin-Brandenburg', July 1934.

32. LArch Berlin, A Pr. Br. Rep. 030, tit. 95, no. 21638: Berliner Schutzpolizei, 'Ungerechtfertigtes Verhalten von Volksgenossen gegen Polizeibeamte', 22 July 1935.

33. 韦尔特的著作最有力地确证了这一论点: Wildt, *Volksgemeinschaft als Selbstermächtigung*. 对韦尔特论证范围的批判性讨论, 特别是与农村环境相关的讨论, 参见: Jill Stephenson, 'The *Volksgemeinschaft* and the Problems of Permeability: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Attitudes in Württemberg Villages', *German History* 34:1 (2016), pp. 49-69.

34. Lutze, *Wesen und Aufgaben der SA*, p. 16.

35. 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 pp. 168-210; Faludi, *Die Juni-Aktion*, pp. 35-54.

36. 引自: Paul Jandl, 'Statt zu bezahlen, wurde ausgespuckt', *Die Welt*, 26 October 2013, p. 26. 另见: Vilma Neuwirth, *Glockengasse 29: Eine jüdische Arbeiterfamilie in Wien* (Vienna: Milena Verlag, 2008).

37. Michael Wildt, 'Einleitung', in: Hans Reichmann, *Deutscher Bürger und verfolgter Jude: Novemberpogrom und KZ Sachsenhausen 1937 bis 1939*, ed. Michael Wildt (Munich: Oldenbourg, 1998), pp. 1-37, here p. 17.

38.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 Amt V (ed.), *Vorbeugende Verbrechensbekämpfung* (Erlaßsammlung), Berlin, undated [1943], pp. 81-82.

39. Christian Faludi, 'Die "Juni-Aktion" im Kontext der Judenpolitik 1938', in Christian Faludi (ed.), *Die 'Juni-Aktion' 1938: Eine Dokumentation zur Radikalisierung der Judenverfolgung*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3), pp. 9-102, here p. 64.

40. Franz Alfred Six, 'Report on the "Jew Action" in Berlin between 17 June and 21 June 1938', in Faludi, *Die 'Juni-Aktion' 1938*, pp. 298-301, here p. 299.

41. 巴黎报纸1938年6月14日-16日的不同文章参见: Faludi, *Die 'Juni-Aktion' 1938*, pp. 225-227, here p. 226. 柏林东区遭到劫掠的犹太商店照片参见: Christoph KreutzMüller, Hermann Simon, and Elisabeth Weber (eds), *Ein Pogrom im Juni: Fotos antisemitischer Schmierereien in Berlin, 1938* (Berlin: Hentrich & Hentrich, 2013).

42. Faludi, 'Die "Juni-Aktion" im Kontext der Judenpolitik 1938', pp. 65-67.

43. Hans Reichmann, *Deutscher Bürger und verfolgter Jude*, p. 75.

44. BArch Berlin, NS 23/1174: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Adolf Wagner, to the Gauleiter Wächtler, Streicher, Helmuth, Wahl, and Bürckel, 31 October 1938.

45. Götz Aly et al. (eds), *Die Verfolgung und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durch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933-1945*, vol. 2: *Deutsches Reich 1938-August 1939*, ed. Susanne Heim (Munich: Oldenbourg, 2009), p. 415;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5 (1938), p. 1,187; Stefanie

Fischer, *Ökonomisches Vertrauen und antisemitische Gewalt: Jüdische Viehhändler in Mittelfranke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4), pp. 286–287.

46. 关于“水晶之夜”及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的背景有许多书籍。最新的出色调查可以参见：Steinweis, *Kristallnacht 1938*. 关于妇女与儿童的参与情况，参见：Aly et al. (eds), *Die Verfolgung und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vol. 2, p. 377;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5 (1938), p. 1, 191. 目击者的叙述参见：Matthäus and Roseman, *Jewish Responses*, vol. 1, pp. 341–378; Uta Gerhard and Thomas Karlauf (eds), *Nie mehr zurück in dieses Land: Augenzeugen berichten über die Novemberpogrome 1938* (Berlin: List, 2009). 关于暴力行动的视觉特征，参见：Christoph Kreutzmüller and Bjoern Weigel, *Kristallnacht? Bilder der Novemberpogrome 1938 in Berlin* (Berlin: Kulturprojekte Berlin, 2013). 该事件的国际反响参见：Colin McCullough and Nathan Wilson (eds), *Violence, Memory, and History: Western Perceptions of Kristallnach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

47. BArch Berlin 23/515: Joachim Meyer-Quade, Report of the SA-Gruppe Nordmark on the action of the night of 9–10 November 1938. 其他信息取自：Christa Geckeler, ‘Novemberpogrom in Kiel’, <https://kiel.de/kultur/stadtarchiv/erinnerungstage/index.php?id=95>.

48. 参见：Frank Bajohr and Christoph Strupp (eds), *Fremde Blicke auf das ‘Dritte Reich’: Berichte ausländischer Diplomaten über Herr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1), pp. 501–520.

49. Monika Hinterberger, ‘Menschen wie wir’, in Zinken, *Der unverstellte Blick*, pp. 106–110, here p. 108.

50. Bernd Wagner, *Psychiatrie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Moderne: Geisteskrankenfürsorge in der Provinz Westfalen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Regime*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6), p. 460.

51. Peter Schyga, *NS-Macht und evangelische Kirche in Bad Harzburg* (Wolfenbüttel: Landeskirchenamt, 2013), pp. 98–99.

52.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124.

53. Aly et al. (eds), *Die Verfolgung und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vol. 2, p. 387; Fischer, *Ökonomisches Vertrauen und antisemitische Gewalt*, p. 285;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5 (1938), p. 1, 198; ÖStA/AdR/ ‘Bürckel’ – Nachträge: Karton rot 5: Letter from the Ortsgruppenleiter Untere Donaustraße/Vienna to the Gestapo, 9 February 1939.

54. Aly et al. (eds), *Die Verfolgung und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vol. 2, p. 401.

55. Gerhard Ritter, Letter to his mother, Freiburg, 24 November 1938, in *Gerhard Ritter: Ein politischer Historiker in seinen Briefen*, p. 339. 外国外交官多次注意到，许多德国人为这次族群迫害而惊骇；参见：Bajohr and Strupp, *Fremde Blicke auf das ‘Dritte Reich’*, pp. 503, 509–512. 新加入的苏台德地区居民中普遍的负面反应参见：Volker 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NS-Staat: Politik und Stimmung der Bevölkerung im Reichsgau Sudetenland (1938–1945)* (Essen: Klartext, 1999), pp. 106–107; Jörg Osterlo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m Reichsgau Sudetenland 1938–1945* (Munich: Oldenbourg, 2006), pp. 218–221.

56. 详细介绍参见：Thomas Vogel, ‘Wilm Hosenfeld – ein deutsches Leben’, in Wilm

Hosenfeld, *'Ich versuchte jeden zu retten': Das Leben eines deutschen Offiziers in Briefen und Tagebüchern*, ed. Thomas Vogel and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Munich: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2004), pp. 1–146, 特别是 pp. 21–36. 关于纳粹党对德国小学教师的号召力, 参见: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pp. 421–432. 乡村教师及牧师对冲锋队的重要性另见: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2 (1935), p. 611.

57. Hosenfeld, *'Ich versuchte jeden zu retten'*, p. 208. 奥特马尔·韦尔克1940年成为德国兼并的洛林地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约瑟夫·贝克尔曼的副官, 他以同样的正面态度回忆自己1931–1935年担任冲锋队中队长的日子; 参见: Gehrig, *Im Diens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tumspolitik in Lothringen*, pp. 29–36.

58. 关于11月7日开始的黑森州族群迫害, 参见: Steinweis, *Kristallnacht 1938*, pp. 22–35. 霍森费尔德这段时期内对犹太人的评论很少, 其中之一是1936年11月25日: “今晚, 我参加了关于犹太人的一次政治会议, 很温和的一次讨论”; Hosenfeld, *'Ich versuchte jeden zu retten'*, p. 217.

59. Hosenfeld, *'Ich versuchte jeden zu retten'*, pp. 210, 219, 234.

60. 同上, pp. 214–215, 229, 235–236。

61. Ernst Klee, *Die SA Jesu Christi: Die Kirchen im Banne Hitler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9); Siemens, *The Making of a Nazi Hero*, pp. 132–134.

62. Riley, *The Civic Foundation of Fascism in Europe*, pp. 72–112.

63. 更受欢迎的只有足球和田径, 参见: Henning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flege der 'Volksgemeinschaft' und Vorbereitung auf den Krieg (1933–1945)* (Münster: Ardey, 2010), p. 20.

64. “德国屈夫霍伊泽联盟”是由各老兵组织形成的联盟组织, 1929年有250万名成员。参见: Frank Bösch, 'Militante Geselligkeit: Formierungsformen der bürgerlichen Vereinswelt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Wolfgang Hardtwig, *Politische Kulturgeschichte der Zwischenkriegszeit 1918–1939*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5), pp. 151–182, here p. 164.

65.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p. 18–23; Bösch, 'Militante Geselligkeit', here p. 159.

66. Bosch, 'Militante Geselligkeit', p. 172.

67. 详见: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p. 29–39. 谢伊恩曼也强调“冲锋队体育”的吸引力: Szejnmann, *Nazism in Central Germany*, pp. 151–152.

68.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 41.

69. 冲锋队的“群众体育”建立在魏玛时代的“军事体育”基础上。体能训练, 特别是拳击和柔道, 以及滑雪、手球和自行车都很受欢迎; 参见: Christiane Eisenberg, *'English sports' und deutsche Bürger: Ein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1800–1939*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9), pp. 327–330, 389–391; Berno Bahro, *Der SS-Sport: Organisation – Funktion – Bedeutung*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3), pp. 27–2, 37–38; Michael B. Barrett, *Soldiers, Sportsmen, and Politicians: Military Sport in Germany, 1924–193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1977; Arnd Krüger and Frank von Lojewski, 'Ausgewählte Aspekte des Wehrsports in Niedersachsen in der Weimarer Zeit', in Hans

Langenfeld and Stefan Nielsen (eds), *Beiträge zur Sportgeschichte Niedersachsens*, vol. 2: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NISH, 1998), pp. 124–147. 区域研究显示, 冲锋队在1933–1939年对群众体育的影响力在各地相差很大; 例如, 参见: Florian Lueke, *Geschichte des Sports in Lippe: Menschen – Vereine – Politik: Eine vergleichende regionalgeschichtliche Studie* (Lage: Lippe Verlag, 2015), pp. 302–307.

70.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 48.

71. Eisenberg, 'English sports' und deutsche Bürger, p. 393.

72.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 50.

73. 关于冲锋队骑兵突击队, 参见: Schuster, *Die SA*, pp. 171–172; Bahro, *Der SS-Sport*, p. 225; GSt PK, I. HA, Rep. 77 titl. 4043, vol. 311, p. 321; Racliffe (Polizeimajor), 'Denkschrift über Kampfvorbereitung und Kampfgrundsätze radikaler Organisationen'. 冲锋队与党卫队在这些骑兵单位上的争斗参见: Christiane Rothländer, *Die Anfänge der Wiener SS* (Vienna: Böhlau, 2012), pp. 160–162.

74. *Deutsche Reiter Zeitung*, no. 7 (1934), p. 122. 引自: Nele Maya Fahnenbruck, '... reitet für Deutschland': *Pferdesport und Politik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Verlag die Werkstatt, 2013), p. 238.

75. 《冲锋队员》等出版物将对“职业体育”的既有偏见以及反犹太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 声称“外来种族”控制了德国马术活动, 尤其是赛马, 参见: Fahnenbruck, '... reitet für Deutschland', pp. 238–239; Bayer, *Die SA*, pp. 26–27.

76. 在这方面, 我遵循法嫩布鲁克的诠释, 不同意巴罗的看法, 他在对党卫队体育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有些自相矛盾。巴罗强调, “帝国体育领袖”与党卫队在1936年之前驳斥了冲锋队对领导权的声索, 仅仅两页之后, 他又承认冲锋队在分发“骑手执照”上的“数量优势”。1935年, 冲锋队组织了88000名骑手, 而党卫队仅有12000人; Bahro, *Der SS-Sport*, pp. 231, 233, 236。

77. Fahnenbruck, '... reitet für Deutschland', p. 240.

78. 同上, pp. 246–247。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试图在战争时期保持对乡村马术俱乐部的影响; 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98: Note of SA-Obergruppenführer Max Jüttner, 5 November 1940.

79.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34: Report on 'Veranstaltung der SA-Gruppe Hansa und der Schützenvereine des Standortes Groß-Hamburg', 1 December 1938.

80. 这是博格格雷费、法嫩布鲁克和博施在各自的研究中一致得出的结论: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p. 53–56, 96–102; Fahnenbruck, '... reitet für Deutschland', pp. 157–158; Bösch, 'Militante Geselligkeit'.

81. 冲锋队在1938年4月10日(虚假的)国会选举中对非犹太裔德国人实施暴力行动的多个例子, 参见: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5 (1938), pp. 415–424.

82.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p. 47–53, 81–86.

83. 斯文·赖夏特甚至声称, 对于冲锋队来说, 这是“反对各种中产阶级文化的性格测试”; 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 pp. 643–646. 但是, 对城市“老战士”来说似乎可信的道理, 对生活在小城镇和乡村的人来说不那么有说服力。

84. Hosenfeld, 'Ich versuchte jeden zu retten', p. 219.

85. 同上, P.236。20世纪30年代末, 巴拉丁奈特的冲锋队单位被召集来进行类似的收集工作;

参见：Schepua,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pfälzischen Provinz*, p. 284.

86. Hosenfeld, 'Ich versuchte jeden zu retten', p. 234.

87. Fritz Otto Böhmig, *Briefe aus dem Felde 15.8.1939–15.8.1943* (unpublished typescript), p. 18. 我很感谢伦敦的斯蒂芬妮·伯德提供这封信的副本。

88. 同上, P.69。

89. Hosenfeld, 'Ich versuchte jeden zu retten', pp. 429 and 696.

90. 同上, P.754。

91. 这段错综复杂历史的概要介绍参见：John T. Lauridsen, *Nazism and the Radical Right in Austria 1918–1934* (Copenhagen: Royal Library, 2007), 特别是pp. 296–312; Bruce F.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A History of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1). 对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政治暴力的全面分析, 参见：Gerhard Botz, *Gewalt in der Politik: Attentate, Zusammenstöße, Putschversuche, Unruhen in Österreich 1918 bis 1938* (Munich: Wilhelm Fink, 1983). 更多文献参见 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p. 19–23.

92. 最近的全面调查参见：Florian Wenninger and Lucile Dreidemy (eds), *Das Dollfuß-Schuschnigg-Regime 1933–1938: Vermessung eines Forschungsfeldes* (Vienna: Böhlau, 2013); Ilse Raither–Zatloukal, Christiane Rothländer, and Pia Schölnberger (eds), *Österreich 1933–1938: Interdisziplinäre Annäherungen an das Dollfuß-/Schuschnigg-Regime* (Vienna: Böhlau, 2012). 1934年7月的政变参见：Jchafranek, *Sommerfest mit Preisschießen*; Hans Schafranek and Herbert Blatnik (eds), *Vom NS-Verbot zum 'Anschluss': Steirische Nationalsozialisten 1933–1938* (Vienna: Czernin, 2015). 关于奥地利纳粹分子被关押的情况, 参见：Pia Schölnberger, 'Ein Leben ohne Freiheit ist kein Leben': Das "Anhaltelager" Wollersdorf 1933–1938', in Raither–Zatloukal, Rothländer, and Schölnberger, *Österreich 1933–1938*, pp. 94–107. 非法纳粹分子的观点参见：Edgar Traugott, *Elisabethpromenade 7/9* (Brunn: Rohrer, 1940).

93. Rothländer, *Die Anfänge der Wiener SS*, pp. 451–457.

94. 这方面有启发性的资料是：ÖStA/AdR, MGH Wien, MHv 61/34, pp. 7–39: Verdict of the Vienna Military Tribunal against the Viennese SA leader Fritz Hamburger, 13 February 1935.

95. 这个数字是1933年到1938年之间五年的总和, 包括长期的军团成员, 以及短期加入“奥地利军团”的人。因此, 在任何一个时刻, 军团成员的实际数字都低于1万人。详见：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p. 46–60.

96. ÖStA/AVA, Justiz, Allgemein, Sig. 6 A 3236 (NSDAP, Österreichische Legion 1934–1936): Bundeskanzleramt, Information on the Austrian Legion, 23 March 1936.

97. 关于奥地利军团, 参见沙弗劳奈克详尽的专题著作：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idem, 'Die steirischen Angehörig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Legion: Regionale und lokale Herkunft, Alters- und Berufsstruktur, NSDAP- und SA-Mitgliederentwicklung, Führungspersonal (Biografien)', in Schafranek and Blatnik, *Vom NS-Verbot zum 'Anschluss'*, pp. 83–124; idem,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sozialisten in der Illegalität 1933–1938: Ein Forschungsbericht', in *Das Dollfuß-Schuschnigg-Regime 1933–1938: Vermessung eines Forschungsfeldes*, ed. Wenninger and Dreidemy, pp. 105–137. 民

族社会主义的官方历史参见: Otto Bokisch and Gustav A. Zirbs (eds), *Der Österreichische Legionär: Aus Erinnerungen und Archiv, aus Tagebüchern und Blättern* (Vienna:Österreich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1940).

98. 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 168.

99. 同上, pp. 193–205 (例子在p.199)。

100. 同上, pp. 132–146, 156–158。

101. 同上, P.157。

102. ÖStA/AVA, Justiz, Allgemein, Sign. 6 A 3627, Mappe 6682: Letter from the BKA in the criminal case of Josef Artur Fischer, born 25 November 1914 in Wolfurt. 1936年7月11日德奥达成的协议促进了这些回归; 参见: 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p. 315–319.

103. BArch Berlin, NS 23/892: 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SA-Brigade 2.

104. ÖStA/AdR, NS-Vermittlungsstelle, Karton 43, Mappe 200: Letter from the NS-Vermittlungsstelle to Dr Hammerschmid, 25 August 1938; SA Austria, 'Lagebericht über die Liquidierung der Österr. Legion', 22 June 1938.

105. 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p. 351–358.

106. Bajohr and Strupp (eds), *Fremde Blicke auf das 'Dritte Reich'*, pp. 481–482; 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 42.

107. ÖStA/AdR, Gauakt 245.169 (Kurt Barisani): Claim to the NS-Betreuungs- und Wiedergutmachungsstelle des Gau's Wien, 1 December 1938; ÖStA/AdR, Gauakt 92.698 (Alexander Cseri): Letter from the Polizeidirektion Wien to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en, 4 April 1948.

108. ÖStA/AdR, 'Bürkel'/Nachträge: Karton rot 9, Nr. 60 (Korrespondenz Oberste SA-Führung 1938–1939: Anonymous letter from an 'SA man of Sturm III', May 1938).

109. 维也纳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安置局1939年3月10日写的一封信在这方面特别有启发。该局在信中支持冲锋队员威廉·瓦利切克的“雅利安化请求”，理由是瓦利切克工作能力有限，“强烈建议通过雅利安化为他提供新的生存手段”；ÖStA/AdR, NS-Vermittlungsstelle, Karton 43, Mappe 197: Letter from the NS-Vermittlungsstelle Wien to Vermögensverkehrsstelle Wien, 10 March 1939; Schafranek, *Söldner für den 'Anschluss'*, pp. 390–391.

110. 'Mitteilung der Gruppe (Legionsdienstanzrechnung)', in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no. 14/15 (July/August 1941).

111. 冲锋队在1938年3月之前对破坏奥地利稳定所起的作用和其后几个月的表现都得到了肯定，但他们对1938–1939年吞并苏台德地区和梅梅尔地区做出的贡献却很少被提及（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是: Dölling,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walttätigkeit'）。从冲锋队的角度看，这些地区的活动表明了冲锋队在国内的相对复兴，并在海外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准军事活动的增加不仅使许多德国冲锋队员开始感到厌烦的该组织宣传重新受到信任，还促使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东部。

112. 关于该地区的早期纳粹组织，参见: Dölling,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walttätigkeit', pp. 242–244.

113. 下列书籍当中可以看到典范性的评论：Günther Wolff, *Großfahrt vogtländischer Jungen zu den deutschen Siedlungen in Ostgalizien. Sommer 1936* (Plauen: Das junge Volk, 1936), pp. 5 and 35; as well as Andreas Peschel, 'Die Bündische Jugend', *Dresdner Hefte: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26 (2007), pp. 35–42, here pp. 40–41.

114. 参见施密特1938–1933年的大量信件：BArch Berlin, NS 26/370–372。关于苏台德地区早期冲锋队，参见布鲁克斯的阿尔伯特·乌姆劳夫1929年9月18日的来信：BArch Berlin, NS 26/372；关于海外冲锋队的制服问题，参见施密特1931年2月13日给阿尔弗雷德·金策尔的信：BArch Berlin, NS 26/370。关于这些学生旅行的持续性，参见：Elizabeth Harvey, 'Emissaries of Nazism: German Student Travellers in Romania and Yugoslavia in the 1930s',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22:1 (2011), pp. 135–160.

115. 尽管有这一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亨莱因的家园阵线1935年之前独立于德国的纳粹党。德国“第五纵队”的流行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后编造的，过分简化了德国阵营内部的紧张关系。参见：Mark Cornwall, '“A Leap into Ice–Cold Water”: The Manoeuvres of the Henlein Movement in Czechoslovakia, 1933–1938', in Mark Cornwall and R. J. W. Evans (eds), *Czechoslovakia in a Nationalist and Fascist Europe 1918–19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3–142. 这方面的概要介绍参见：Ronald Smelser, *Das Sudetenproblem und das Dritte Reich, 1933–1938: Von der Volkstumspolitik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ßenpolitik* (Munich: Oldenburg, 1980).

116. Caitlin Murdock, 'Central Policy and Local Practice: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Saxon–Bohemian Borderlands after 1933', *Zeitschrift für Osteuropa-Forschung* 53 (2004), pp. 184–199.

117. 关于“德意志人体育协会”的发展，参见：Andreas Luh, *Der Deutsche Turnverband in der ersten Tschechoslowakischen Republik: Vom völkischen Vereinsbetrieb zur volkspolitischen Bewegung* (Munich: Oldenburg, 2006). FS的创立参见：Werner Röhr, 'September 1938: Diversion und Demagogie bei der Erzeugung einer Kriegspsychose durch den Hitlerfaschismus und seiner Fünften Kolonne in der CSR', in Dietrich Eichholtz and Kurt Pätzold (eds), *Der Weg in den Krieg: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Vorkriegsjahre (1935/36 bis 1939)* (Cologne: Pahl–Rugenstein, 1989), pp. 211–277, here p. 218.以及 'Der "Fall Grün" und das Sudetendeutsche Freikorps', in Hans Henning Hahn (ed.), *Hundert Jahre sudetendeutsche Geschichte: Eine völkische Bewegung in drei Staaten* (Frankfurt am Main: Lang, 2007), pp. 241–256, here p. 245.

118. Detlef Brandes,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Krisenjahr 1938*, 2nd edn (Munich: Oldenburg, 2010), pp. 252–287.

119. Dölling,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walttätigkeit', pp. 247–248.

120. 这一公告的文本包含在：'Die sudetendeutsche Befreiung: Vom Nürnberger Parteitag bis zum Münchner Abkommen', *Nation und Staat: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das europäische Nationalitätenproblem* 12:1 (1938), pp. 33–43, here pp. 36–37. 关于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参见：Röhr, 'Der "Fall Grün"'; Dölling,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walttätigkeit'.

121. BArch Berlin, NS 23/477: Letter from the SA–Gruppe Sachsen to the Erziehungshauptamt of the SA, September 1938; Stefan Dölling, *Henleins Bürgerkrieger: Das Sudetendeutsche Freikorps zwischen*

Eigenmobilisierung und Fremdsteuerung durch das 3. Reich, unpublished MA diss.,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2010, pp. 12–13.

122. Dölling, *Henleins Bürgerkrieger*, p. 1.

123. 许多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领导人加入党卫队；参见：Dölling,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walttätigkeit’, p. 260.

124. 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NS-Staat*, p. 127.

125. 托尼·桑德纳就是一个例子，他从1938年秋季起担任弗朗茨·迈的副官。由于此前在“德意志家园阵线”中的角色，他也得到了“冲锋队体育管理员”的职务；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NS-Staat*, p. 127.

126. Osterlo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m Reichsgau Sudetenland*, pp. 209–210; 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NS-Staat*, p. 104; Ralf Gebel, ‘Heim ins Reich!’ Konrad Henlein und der Reichsgau Sudetenland (1938–1945) (Munich: Oldenburg, 1999), pp. 69–80.

127. 弗朗茨·迈1903年1月24日生于苏台德瓦恩斯多夫，当时那里还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1920–1923年，他在哈雷–维滕贝格大学就学。作为一名经过训练的园林建筑师，他于1935年代表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进入捷克国会。大约同一时间，他秘密开始为德国国防军间谍机关阿勃韦尔工作。迈在1939年之前的经历参见：BArch Berlin, SA 4000002816 (May, Franz)。他在二战期间的活动参见第8章。从捷克斯洛伐克监狱获释后，迈在巴伐利亚州生活，致力于德意志族被驱逐者组织（苏台德德意志人同乡会及被驱逐者联盟）。

128. BArch Berlin, SA 4000002816: Letter from Konrad Henlein to Viktor Lutze, 22 November 1941.

129. 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NS-Staat*, p. 128, n. 57.

130. 1918–1919年立陶宛的政治与军事发展详见：Tomas Balkelis, ‘Demobilization and Remobilization of German and Lithuanian Paramilitaries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0:1 (2015), pp. 38–57.

131. 参见：Ernst-Albert Plieg, *Das Memelland 1920–1939: Deutsche Autonomiebestrebungen im litauischen Gesamtstaat* (Würzburg: Holzner, 1962)。遗憾的是，托马斯·巴尔克里斯的叙述（*The Making of Modern Lithuania* [Basingstoke: Routledge, 2009]）结束于1918–1919年。

132. Lithuanian Central State Archive (LCVA), Collection no. 383, inventory no. 7, no. 1773, pp. 146–54: Memo of the Lithuani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tasys Lozoraitis, to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uozas Urbšys, 26 January 1935.

133. 民族社会主义报刊以其特有的方式提到了“战争状态”。参见：BArch Berlin, NS 23/227: ‘SA–Appell und Marsch der SA’, *Memelwacht* (Tilsit), 11 January 1940.

134. ‘Die Lage: Litauen’, *Nation und Staat: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das europäische Nationalitätenproblem*, 12:4 (1939), pp. 245–251, here p. 248.

135.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Stuttgart: DVA, 2000), p. 228.

136. Martin Broszat, ‘Die Memeldeutschen Organisation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3 (1957), pp. 273–278, here p. 274.

137. Broszat, ‘Die Memeldeutschen Organisationen’, pp. 274–275. CSA和SOVOG之间的复杂关

系详见：PAAA, R 84874, pp. 64–90: 'Anklageschrift in dem Verfahren gegen Dr. Neumann, v. Saß und Genossen (deutsche Übersetzung)'.

138. 'Dr. Ernst Neumann †', *Memelländer Dampfboot: Die Heimatzeitung aller Memelländer*, no. 11, 5 June 1955, pp. 3–4.

139. PAAA, R 84874, pp. 58–112: 'Anklageschrift in dem Verfahren gegen Dr. Neumann, v. Saß und Genossen'.

140. Broszat, 'Die Memeldeutschen Organisationen', p. 275; PAAA, R 84874, pp. 105–138: 'Anklageschrift in dem Verfahren gegen Dr. Neumann, v. Saß und Genossen'.

141. LCVA, Collection no. 383, inventory no. 7, no. 1773, pp. 146–154, here pp. 151–152: Memo of the Lithuani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tasys Lozoraitis, to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uozas Urbšys, 26 January 1935; PAAA, R 84875: 'Aufzeichnung v. Grundherr für das Auswärtige Amt vom 27 Oktober 1934'; PAAA, R 84874, pp. 39–45, 56–58: 'Anklageschrift in dem Verfahren gegen Dr. Neumann, v. Saß und Genossen'.

142. 德国人对这一审判的看法参见：Helmut Jenkins, 'Der Neumann–Sass–Kriegsgerichtsprozess in Kaunas 1934/35: Aus deutscher Sicht', *Annaberger Annalen* 17 (2009), http://annaberger-annalen.de/jahrbuch/2009/6_Jenkins.pdf. 立陶宛人的看法参见：Algimantas Taskunas, 'The World's First Nazi Trial', *Lithuanian Papers* 22 (2008), <http://jloughnan.tripod.com/lithuania.htm>.

143. BArch Berlin, NS 23/227: 'Memel–SA steht am 30. Januar 1939', *Der Alemanne* (Freiburg), 20 January 1939.

144. 同上：'Die braune Uniform in Memel', *Stuttgarter NS-Kurier*, 26 January 1939.

145. 同上：'Memeldeutsche Sicherheitsabteilung gebildet', *Königsberger Allgemeine Zeitung*, 10 January 1939.

146. Broszat, 'Die Memeldeutschen Organisationen', p. 278.

147. 'Die Lage: Litauen', *Nation und Staat* 12:5 (1939), p. 299.

148. 有许多迹象表明，即便是同时代的消息灵通人士也不知道两个组织的确切差别。参见：BArch Berlin, NS 23/227: 'Kowno fragt: Wird die SA gefährlich sein?', *Preußische Zeitung* (Königsberg), 12 January 1939.

149. Ralf Meindl, *Ostpreußens Gauleiter: Erich Koch –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Osnabrück: Fibre, 2007), pp. 243–244.

150. 引自：'Der Wortlaut des Abkommens zwischen Litauen und dem Reich über die Rückgabe Memels', *Nation und Staat: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das europäische Nationalitätenproblem*, 12:8 (1939), pp. 560–561.

151. Broszat, 'Die Memeldeutschen Organisationen', p. 278.

152. 参见：Gö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153. 类似的评估参见：Campbell, 'SA after the Röhm Purge'.

154.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5 (1938), p. 849.

第7章

1. Sopade, *Deutschland-Berichte*, vol. 2 (1935), p. 1,498.

2. 参见: Müller, *Hitlers Ostkrieg*; Czesław Madajczyk (ed.), *Vom Generalplan Ost zum Generalsiedlungsplan* (Munich: K. G. Saur, 1994); Mechthild Rössler and Sabine Schleiermacher (eds), *Der 'Generalplan Ost': Hauptlini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lanungs- und Vernichtungspolitik*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3); Lumans, *Himmler's Auxiliaries*;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Hartenstein, *Neue Dorflandschaften*; Heinemann, 'Rasse, Siedlung, deutsches Blut'; David Blackbourn, *Die Eroberung der Natur: Ein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andschaft* (Munich: Siedler, 2006), pp. 319–339; Heinemann and Wagner, *Wissenschaft – Planung – Vertreibung*; Lenig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tumsarbeit' und Umsiedlungspolitik*; Wolf, *Ideologie und Herrschaftsrationalität*. 德国东部扩张主义政策学术先行者的有关情况, 参见: Piper, *Alfred Rosenberg*, pp. 448–456; Eduard Mühle, 'Putting the East in Order: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ir Attempts to Rationalise German Eastward Expansion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in Robert L. Nelson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o the East: 1850 Through the Pres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95–120; Beyrau, 'Eastern Europe as a "Sub-Germanic Space"'; Ulrich Prehn, *Max Hildebert Boehm: Radikales Ordnungsdenken vom Ersten Weltkrieg bis in die Bundesrepublik*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3).

3. 参见阿明·诺尔岑的文章《二战中民族共同体的组织: 纳粹党与纳粹占领地区的德意志族人》, 这篇文章交由《种族灭绝研究日报》特刊“生存空间和民族共同体”发表(预计2017年出版)。

4. Ute Peltz–Dreck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iedlungsbau: Versuch einer Analyse der die Siedlungspolitik bestimmenden Faktoren am Beispiel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Minerva, 1978). 关于冲锋队定居点作为小规模定居点子类的情况, 参见: Jörn Düwel and Niels Gutschow, *Städtebau in Deutschland im 20. Jahrhundert: Ideen – Projekte – Akteure* (Stuttgart: Teubner, 2001), pp. 96–105.

5. 'Gesetz über die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14 June 1933, in *Reichsgesetzblatt* 1933, vol. 1, p. 517.

6. Heinz Franz, *Der Mensch in der Siedlungsbewegung*, university diss.,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of Heidelberg, 1937, p. 40. 关于纳粹党在德国农村的策略, 参见: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Hempe,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in der Krise*; Otto–Morris, *Rebellion in the Province*.

7. BArch Berlin, NS 23/222: 'Im Kampf gegen die Landflucht: SA schafft neues Bauerntum', *NSK*, Series 164, 15 July 1939, p. 1; 'Richtlinien für die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1 June 1935, in Gustavo Corni and Horst Gies, *'Blut und Boden': Rassenideologie und Agrarpolitik im Staat Hitlers* (Idstein: Schulz–Kirchner, 1994), p. 121.

8. 关于作为生活改革运动一部分的德国殖民运动, 参见: Anne Feuchter–Schawelka, 'Siedlungs–und Landkommunebewegung', in Diethard Kerbs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Handbuch der deutschen Reformbewegungen, 1880–1933* (Wuppertal: Hammer, 1998), pp. 227–244.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殖民运动, 参见: Uwe Mai, 'Rasse und Raum': *Agrarpolitik, Sozial- und Raumplanung im NS-Staat*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2); Corni and Gies, *'Blut und Boden'*; Roland Baier, *Der deutsche*

Osten als soziale Frage: Eine Studie zur preußischen und deutschen Siedlungs- und Polenpolitik in den Ostprovinzen während des Kaiserreichs und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Böhlau, 1980).

9. 此时，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与帝国营养局早期的不和已经得到克服。参见：BArch Berlin, R 43 II, no. 207, p. 118ff: Letter from the SA's Führungsamt to Darré, 24 May 1934, as quoted in Corni and Gies, 'Blut und Boden', p. 121. 1935年起，帝国劳工部的指导方针已经规定，“战争老兵与民族革命战士”将在定居点分配上得到优待；Peltz-Dreck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iedlungsbau*, pp. 139–140.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1937年之前的冲锋队成员将从国家赞助的小型居住区建设中得到不对称的益处。

10. BArch Berlin, NS 23/222: 'Sturmabteilungsmänner packen an', *Bremer Zeitung*, 27 November 1939;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no. 41, pp. 59–77, here p. 70: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hinsichtlich ihrer Beteiligung bei der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这份文件也包含在 BArch Berlin, NS 23/688.

11. SA-Oberführer Holtz, 'SA-Dankopfersiedlung "Glaubensstatt"', *Die SA* 2:17 (1941), pp. 14–16.

12. 关于冲锋队和德国射击协会之间的紧密合作，参见博格格雷费的著作（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以及本书的前一章。

13. Barbara Wolf, 'Wohnungs- und Siedlungsbau', in Michael Cramer-Fürtig and Bernhard Gotto (eds), 'Machtergreifung' in Augsburg: Anfänge der NS-Diktatur 1933–1937 (Augsburg: Wißner, 2008), pp. 179–88 (quotation on p. 180).

14. BArch Berlin, NS 23/222: 'Zinsfrei und kapitallos', *NSK*, Series 77, 5 April 1937, p. 1.

15. 同上，P.2。

16. Holtz, 'SA-Dankopfersiedlung "Glaubensstatt"', p. 14.

17. Jan (Johannes) G. Smit,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Innere Kolonisation im Dritten Reich: Fallstudien in Schleswig-Holstein* (Kassel: Gesamthochschul-Bibliothek, 1983), p. 184.

18. Wolfram Pyta, '“Menschenökonomie”: Das Ineinandergreifen von ländlicher Sozialraumgestaltung und rassenbiologischer Bevölkerungspolitik im NS-Staa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73:1 (2001), pp. 31–94, here p. 39; Franz, *Der Mensch in der Siedlungsbewegung*, p. 30; Müller, *Hitlers Ostkrieg*, pp. 11–12.

19. Smit,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p. 186.

20. Klaus Kiran Patel, 'The Paradox of Planning: German Agricultural Policy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1920s to 1970s', *Past and Present* 212:1 (2011), pp. 239–269, here p. 245.

21. 关于德国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真实情绪，参见：Timothy W. Mason, *Arbeiterklasse und Volksgemeinschaft: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1936–1939*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5), pp. 865–867; J. E. Farquharson, 'The Agrarian Policy of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Robert G. Moeller (ed.), *Peasants and Lords in Modern German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pp. 233–259.

22. R. Walther Darré, 'Bauern und Soldaten', in *Der SA-Führer* 8 (1938), reprinted in R. Walther Darré, *Um Blut und Boden: Reden und Aufsätze* (Munich: Eher, 1942), pp. 158–161.

23. 关于“男性同志情谊”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及第三帝国中的重要性，参见：Thomas Kühne, *Belonging and Genocide: Hitler's Community, 1918–1945*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 Smit,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p. 185. Darré in October 1939 made a very similar argument; see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Biographie* (Munich: Siedler, 2008), p. 450.

25. 目前为止的历史研究仅提到卡舍作为德国驻克罗地亚公使的角色（1941–1945年）。最新研究参见：Alexander Korb, *Im Schatten des Weltkriegs: Massengewalt der Ustaša gegen Serben, Juden und Roma in Kroatien 1941–1945*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13).

26. 关于卡舍的传记，参见他在1945年3月7日被拘禁时对南斯拉夫当局提出问题所做的详细回答：Croatian State Archives, Zagreb (HDA), HR–HDR–1561, Sg 013.0.47 (Slavko Kvaternik), III DIO, pp. 280–281. 另见：BArch Berlin, R 9354/601: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Agram/Kroatien: SA–Obergruppenführer Kasche',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 14 August 1941.

27. Prestien, 'Die SA bei der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Die SA* 2:17 (1941), pp. 10–13, here p. 11.

28. BArch Berlin, NS 23/222: 'Zinsfrei und kapitallos', *NSK*, Series 77, 5 April 1937, p. 1.

29. BArch Berlin, NS 23/688: Siegfried Kasche, 'Richtlinien für die Beteiligung der SA bei der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8 September 1938. See also Kasche,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pp. 59–60.

30. BArch Berlin, NS 23/688: 'Merkblatt betreffend den Erwerb des Neubauernscheins' (1938).

31. 同上：Siegfried Kasche, 'Besondere Anordnung Nr. I', 4 November 1940.

32. Kasche, 'Richtlinien für die Beteiligung der SA'.

33. Alexander Prusin, '“Make This Land German Again!” The Nazi Population Policies in the Wartheland, 1939–1941', in Aleksandr Dyukov and Olesya Orlenko (eds), *Divided Eastern Europe: Border and Population Transfer, 1938–1947*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pp. 74–91, here pp. 75–77; Smit, *Neubildung deutschen Bauerntums*, pp. 30–60.

34.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no. 34: SA–Oberführer Udo von Alvensleben, 'Die Bedeutung der Grenzlandsiedlung: Vortrag vor den Neubauernsiedlungsreferenten und der Obersten SA Führung am 12 Mai 1939 in Schlochau'. 阿尔文斯勒本生于1895年5月4日，是1933年之前就受到纳粹主义吸引的东埃尔夫贵族。一战之后，他最初加入“钢盔团”，但在1930年9月成为纳粹党员，很快被提升为当地冲锋队旗队长。1933年，他被任命为施洛豪/波美拉尼亚地区当局负责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试图将当地习俗、宗教传统与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协调一致。关于他的传记及政治观点，参见柏林联邦档案馆中他的冲锋队个人文件：BArch Berlin, SA 4000000027 (Alvensleben, Udo von)。

35. Christoph Dieckmann, 'Plan und Praxis: Deutsche Siedlungspolitik im besetzten Litauen 1941–1944', in *Wissenschaft – Planung – Vertreibung*, ed. Heinemann and Wagner, pp. 93–118, here p. 94.

36. Prusin, '“Make This Land German Again!”' pp. 75–76. 关于殖民幻想与经历对纳粹统治的影响，参见：Patrick Bernhard, 'Hitler's Africa in the East: Italian Colonialism as a Model for German Planning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1:1 (2016), pp. 61–90; Benjamin

Madley, 'From Africa to Auschwitz: How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Incubated Ideas and Methods Adop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Nazis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5:3 (2005), pp. 429–64; Jürgen Zimmerer, 'Die Geburt des "Ostlandes" aus dem Geist des Kolonialismu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roberungs- und Beherrschungspolitik in (post-) kolonialer Perspektive', *Sozial.Geschichte* 19:1 (2004), pp. 10–43.

37. Kasche,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pp. 62–64.

38.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pp. 449–451; Robert L. Koehl, *RKFDV: German Re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 Policy 1939–1945: A History of the Reich Commission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Germa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49–70.

39. BArch Berlin, NS 23/688: Kasche, 'Schreiben betr. der Beteiligung der SA'.

40. 与上西里西亚的情况不同，1939年底，关于瓦尔特大区及但泽地区乡村定居点没有详细的计划。

41. BArch Berlin, NS 23/688: SA-Obersturmbannführer Prestin, Summary of all important questions on the settlement of new peasants (*Neubauernsiedlung*) in the former Polish territories, 8 December 1939.

42. BArch Berlin, NS 23/688: Circular of the leader of SA-Gruppe Hessen, 4 December 1939.

43. Kasche, Letter on the SA's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formation of German peasantry.

44. BArch Berlin, NS 23/688: Siegfried Kasche, 'Besondere Anordnung', 20 January 1941; Kasche,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p. 73. 值得注意的是，卢曼斯的书（Lumans, *Himmler's Auxiliaries*）中没有提及卡舍。关于德意志族人及其经历的研究很多，特别推荐以下著作：Doris L. Bergen, 'The "Volksdeutschen" of Easter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onstructed Ethnicity, Real Genocide', in Keith Bullivant et al. (eds), *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1999), pp. 70–93; idem, 'Die Volksdeutschen in German Propaganda', *German Studies Review* 31:3 (2008), pp. 447–470.

45. 参见卡舍的个人文件，这些文件战争最后几个月里保存在柏林的保险箱里，现存于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另见德国联邦档案馆关于冲锋队殖民政策的大量文件。

46. BArch Berlin, NS 23/510: OSAF (Jüttner), Urgent letter [*Schnellbrief*] on the set-up of the SA in the German territories of the former Polish state, 30 October 1939.

47. Kasche,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pp. 61 and 75.

48. 同上，P.75。

49. BArch Berlin, NS 23/98: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the SA Reich Treasurer, 13 September 1940.

50. Kasche,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p. 75. 布沃涅城堡是后来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的出生地。关于安德斯，参见：Joanna Pyłat et al. (eds), *General Władysław Anders: Soldier and Leader of the Free Poles in Exile* (London: Polish University Abroad, 2008).

51. BArch Berlin, SA 4000001265 (Hacker, Heinrich): Letter from Hacker to Viktor Lutze, 25 September 1941; BArch Berlin, NS 23/98: Note from Siegele (Oberführer) on a meeting with SA-Obergruppenführer Litzmann, Berlin, 9 October 1940. 根据哈克尔的说法，国防军和党卫队也已经表达了对弗赖胡芬的浓厚兴趣，那是“整个瓦尔特大区最有利可图的乡间地产”。

52. BArch Berlin, NS 23/688: Siegfried Kasche, 'Besondere Anordnung Nr. 3', 8 January 1941.
53. 同上: Beauftragter des Stabschefs für die Beteiligung der SA bei der Neubauernsiedlung, Merkblatt 1, 2 January 1940.
54. BArch Berlin, NS 23/688: 'Zahlenmäßige Aufstellung über die Neubauernbewerber in den Gruppen nach dem Stand vom 20. Juni 1940'.
55. Kasche,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p. 67.
56. 同上, P.68.
57. 关于卡舍与希姆莱的恶劣关系, 参见: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 *Ein General im Zwielicht: Die Erinnerungen Edmund Glaises von Horstenau. Bevollmächtigter General in Kroatien und Zeuge des Untergangs des Tausendjährigen Reiches*, ed. Peter Broucek, vol. 3 (Vienna: Böhlau, 1988), pp. 188–189.
58. Kasche,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p. 68.
59. Joachim Wolschke-Bulmahn, 'Gewalt als Grundlage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tadt- und Landschaftsplanung in den "eingegliederten Ostgebieten"', in *Der 'Generalplan Ost'*, ed. Rössler and Schleiermacher, pp. 328–338, here p. 330.
60. 参见: Heinemann, 'Rasse, Siedlung, deutsches Blut'; and the ongoing project on the SS by Jan Erik Schulte.
61. Siegfried Kasche, 'Besondere Anordnung Nr. 3', 8 January 1941. 对调和“民族共同体”实现与德国贵族精英主义自我认识这一普遍问题的全面讨论, 参见: Malinowski, *Vom König zum Führer*, pp. 531–552. 关于1934年之前担任冲锋队领导职务的德国贵族, 参见: Malinowski and Reichardt,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 pp. 146–149.
62. Ernst Jünger, *Der Arbeiter: Herrschaft und Gestalt* (Cotta: Stuttgart, 1981 [1932]), p. 246.
63.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pp. 401–411, 427–432.
64. 关于德国在战争中常常不尊重国际化规范的情况, 参见: Wolf, *Ideologie und Herrschaftsrationalität*, pp. 76–90.
65. Christopher R. Browning, 'Unterstaatssekretär Martin Luther and the Ribbentrop Foreign Offi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2:2 (1977), pp. 313–344. 罗森贝格与冲锋队领导人的良好关系参见: Piper, *Rosenberg*, p. 471; Matthäus and Bajohr, *Alfred Rosenberg*, pp. 181–182, 237.
66. Siegfried Kasche, 'Besondere Anordnung Nr. 3', 8 January 1941.
67. 这与原国防军成员在新征服的东欧地区上的定居实践惊人的一致, 真正移民那里的人同样只是例外情况。大部分“国防农民”在最终取得军事胜利之后才能得到土地。尽管如此, 许多军人在战争期间表现得像殖民者。详见: Müller, *Hitlers Ostkrieg*, pp. 25–48.
68. 马克斯·奥托·卢伊肯1885年10月16日生于下莱茵省韦瑟尔。他在1905–1920年是名职业军人, 20世纪20年代初积极参与萨克森州的埃舍里希组织和黑色国防军, 1926年进入农业领域。1929年, 卢伊肯加入纳粹党。此后, 他领导埃森大区冲锋队和冲锋队下莱茵地区总队, 1934年秋季转调到冲锋队库法尔茨地区总队。1937年初起, 他担任慕尼黑冲锋队帝国领导力学校校长及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教育与训练总监。1939年9月起, 卢伊肯在国防军服役, 军阶为少校。1940年底,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他退出现役，帮助建立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冲锋队单位。卢伊肯的传记参见：BArch Berlin, VBS 1/1070053842 (Luyken, Max); BArch Berlin, SA 4000002767 (Luyken, Max); Joachim Lilla, 'Luyken, Max', in Joachim Lilla, *Staatsminister, leitende Verwaltungsbeamte und (NS-) Funktionsträger in Bayern 1918 bis 1945*, <http://verwaltungshandbuch.bayerische-landesbibliothek-online.de/luyken-max>.

69. Karl Rothmann, 'Das Reich der Zukunft – ein Bauernreich: Was der SA-Mann über die Neubauernsiedlung wissen muß', in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no. 22/23 (March/April 1942), pp. 2–3.

70. BArch Berlin, NS 23/688: 'Führungsbefehl der Obersten SA-Führung, Bestandsübersicht über Neubauernbewerber', 20 February 1943.

71. 同上: Circular of the leader of the SA-Gruppe Hessen on 'Neubauerntum. Mitarbeit in der Propaganda', 1 April 1942.

72. 同上: 'Führungsbefehl der Obersten SA-Führung', 15 August 1942.

73. 同上: Der Oberste SA-Führer, 'Schnellbriefetr. Stillegung der Inspektion für Neubauerntum und Volkstumpflege', 16 February 1943. 大约同一时期，卢策在日记中忧郁地写道：“纳粹党中的一些人和机构不再能容忍冲锋队这个词了”；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302.

74.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 69: Personal Notes of the Ambassador Adolf-Heinz Beckerle I, 4 October 1941; 'Memorandum of a meeting of Hitler, Rosenberg, Göring and Field Marshal Keitel in the Führer's Headquarters on 16 July 1941', i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d.),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D (1937–1945)*, vol. 13: *The War Years, June 23–December 11, 194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pp. 149–156, here p. 154; Alex J. Kay, *Exploitation, Resettlement, Mass Murd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 for German Occupation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1940–1941* (New York und Oxford: Berghahn, 2006), p. 182; Götz Aly et al., *Biedermann und Schreibtischtäter: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Täter-Biographie* (Berlin: Rotbuch, 1987), p. 137.

75. Kay, *Exploitation, Resettlement, Mass Murder*, p. 85.

76. 卡舍绝不是唯一被视为（或被任命为）东欧德占区要职人选的冲锋队领导人。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卡尔-西格蒙德·利茨曼于1941年底出任爱沙尼亚总专员，长期任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冲锋队领袖的全国副总指挥海因里希·舍内就任沃里尼亚-波多利亚总专员。而且，不少于5名冲锋队将领在1940–1941年被派往东南欧任公使——除了卡舍之外，还有曼弗雷德·冯·基林格、戈特弗里德·冯·雅戈、汉斯·埃拉德·卢丁和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这些冲锋队外交官的详情参见第9章。

77. 多伊希勒小传参见：Hans-Peter de Lorent, 'Gustaf Adolf Deuchler, Ordinarius in SA-Uniform', *HLZ: Zeitschrift der GEW Hamburg*, 12 (2007), pp. 38–42 (part 1) and 3–4 (2008), pp. 46–50 (part 2).

78. IfZ Archive, ED 149, vol. 2, pp. 10–13: Gustaf Deuchler, 'Denkschrift-Entwurf: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und die Aufgabe eines Kolonialsturmes (K.-Sturmes)'.几周后，多伊希勒甚至幻想新的

“殖民教育机构”，据说计划将在汉堡大学成立；IfZ Archive, ED 149, vol. 2, pp. 14–15; Letter from Gustaf Deuchler to Siegfried Kasche, 26 July 1941.

79. 'Planungsgrundlagen der SS für den Aufbau der Ostgebiete (April–Mai 1940)', in Madajczyk (ed.), *Vom Generalplan Ost zum Generalsiedlungsplan*, pp. 3–14, here p. 5.

80. 同上, pp. 3–5。

81. 同上, pp. 6–7。

82. Note from Alexander Dolezalek from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of the SS–*Ansiedlungsstab* Litzmannstadt on the *Generalsiedlungsplan*, 19 August 1941, in Madajczyk (ed.), *Vom Generalplan Ost zum Generalsiedlungsplan*, pp. 19–20, here p. 19; Prusin, '“Make This Land German Again!”'; Birthe Kundrus, 'Regime der Differenz: Volkstumspolitische Inklusionen und Exklusionen im Warthegau und im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4', in Bajohr and Wildt, *Volksgemeinschaft*, pp. 105–123. 关于“德国东部”产生的有限刺激，参见：Mai, 'Rasse und Raum', pp. 319–331.

83. Mai, 'Rasse und Raum', p. 320.

84. Geraldine von Frijtag Drabbe Künzel, 'Die niederländische Ostkolonisation (1941–1944)', in Friso Wielenga and Loek Geeraedts (eds), *Jahrbuch des Zentrums für Niederlande Studien*, vol. 22 (Münster: Aschendorff, 2011), pp. 81–101 (quotation p. 89).

85. 参见：Elizabeth Harvey, *Women and the Nazi East: Agents and Witnesses of Germanis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Sonke Neitzel and Harald Welzer, *Soldaten: Protokolle vom Kämpfen, Töten und Sterb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11).

86. Patel, 'The Paradox of Planning', p. 245; Müller, *Hitlers Ostkrieg*, p. 8.

87. 详见：Pyta, 'Menschenökonomie', pp. 46–52. 皮塔强调这一计划在1943年做好了实施的准备，但我认为那时已经不再有任何可能推进这样的措施，因为“大后方”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早在1941年11月，纳粹党总理府就通知该党官员，旧帝国农民的“再安置”只能在战后实施。参见：GSt PK, XX. HA, Rep. 240 B 8 a–e, pp. 105–106: Gauleitung Ostpreußen, Supplement to the information on 'Settlement of the new territories in the East', November 1941.

88. Sven Oliver Müller, 'Nationalismus in der deutschen Kriegsgesellschaft',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and Jörg Echternkamp (eds), *Die Deutsche Kriegsgesellschaft 1939 bis 1945: Zweiter Halbband: Ausbeutung, Deutungen, Ausgrenzung* (Munich: DVA, 2005), pp. 9–92, here pp. 67–69; Harvey, *Women and the Nazi East*; Helmut Heiber, 'Dokumentation: Der Generalplan Ost',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3 (1958), pp. 281–325, here pp. 288–289; Blackbourn, *Die Eroberung der Natur*, pp. 320–324.

89. Herbert Backe, 'Die Neubildung des deutschen Bauerntums im eroberten Europa', *NS-Landpost*, 7 July 1942, as quoted in Corni and Gies, 'Blut und Boden', p. 207.

90. Karl Rothmann, 'Das Reich der Zukunft – ein Bauernreich: Was der SA-Mann über die Neubauernsiedlung wissen muß',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22/23 (March/April 1942), pp. 2–3.

91. Michael Wild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New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Lecture at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25 May 2014).

92. 卡舍的“冲锋队工作报告”（P.72）同时使用了这两个词。

93. 同上，P.77。

94.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in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pp. 349–375.

95. Kasche, '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 p. 72.

96. 参见前一章的详细分析。

97. Barbara Wolf, 'Wohnungs- und Siedlungsbau', in *'Machtergreifung' in Augsburg*, ed. Cramer-Fürtig and Gotto, pp. 179–188, here p. 180.

98. BArch Berlin, NS 23/501, pp. 114–120: Typescript 'Die Wehrschützenbereitschaft im Gen[eral]–Gouvernement', probably from October 1942, here p. 120.

99. 同上：'Die SA als Vorbild im Generalgouvernement', *Krakauer Zeitung*, 21 April 1942; 'Die Aufstellung der SA–Einheit General–Gouvernement' (Typescript).

100. 详见：Bergien, *Die bellizistische Republik*, pp. 82–97, 107–120.

101. Christoph Rass, '“Volksgemeinschaft” und “Wehrgemeinschaft”', in *'Volksgemeinschaft als soziale Praxis'*, ed. von Reeken and Thießen, pp. 309–322.

第8章

1. BArch Berlin, NS 23/515: Wilhelm Schepmann, 'Weltanschauliche Ausrichtung für den totalen Einsatz' (topic 3: 'Jeder SA–Mann ein fanatischer Träger des äußersten und totalen Widerstandswillens'), 6 December 1944.

2. 目前为止与冲锋队这些方面历史相关的研究数量有限。参见：Campbell, 'SA after the Röhm Purge'; Longerich, *Geschichte der SA*, pp. 237–345; Jamin, 'Zur Rolle der SA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pp. 353–358; Müller, 'Wilhelm Schepmann'; Müller/Reiner Zilkenat, '... der Kampf wird über unserem Leben stehe [sic!], solange wir atmen!' Einleitung, in idem (eds), *Bürgerkriegsarmee*, pp. 21–24.

3. 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8;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pp. 634–635.

4. Wilhelm Rehm, 'Willensträger deutscher Wehrgemeinschaft!', in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13 (May 1941). 他的下列著述中也用略有不同的措辞表达了相同的论调：Wilhelm Rehm, 'Zwei Jahre Kriegsbewährung der SA', in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16/17 (September/October 1941). 关于雷姆对DC的重要性，参见：Helmut Baier, *Die Deutschen Christen Bayerns im Rahmen des bayerischen Kirchenkampfes* (Nürnberg: Selbstverlag des Vereins für bayerische Kirchengeschichte, 1968). 雷姆的小传参见：Nora Andrea Schulze (ed.), *Verantwortung für die Kirche: Stenographische Aufzeichnungen und Mitschriften von Landesbischof Hans Meiser 1933–1955*, vol. 3: 1937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0), p. 1,069.

5. 关于舍普曼的传记，参见：IfZ Archive, ED 467, vol. 51, pp. 1–24: Testimony of Wilhelm Schepmann in the Landgerichtsgefängnis Lüneburg, 6 May 1949; Müller, 'Wilhelm Schepmann'.

6. BArch Berlin, VBS 264, no. 4001006602 (Sponholz, Hans): 'Programm der 2. Arbeitstagung der Dienststelle Berlin der Obersten SA-Führung vom 4–6 März 1944 in Posen'.

7. 同上：'Merkblatt für die Tagungsteilnehmer', Posen, 3 March 1944.

8. 关于冲锋队体育徽章（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下辖的冲锋队教育办公室颁发），参见：Eisenberg, 'English sports' und deutsche Bürger, pp. 390–391; Bahro, Der SS-Sport, pp. 96–99.

9. 从形式上说，防卫队成员并不会自动成为冲锋队成员，即便冲锋队希望从中招募人员。因此，冲锋队防卫队身着便装训练，而没有穿着传统的纳粹褐衫。参见：Max Jüttner, 'SA an allen Fronten', *Die SA* 2:2 (1941) (10 January), pp. 9–10.

10. BArch Berlin, NS 23/98: Letter from OSAF, Georg Mappes, to the Oberkommando des Heeres on the budget for the Wehrmannschaften (classified), 18 July 1939.

11. 同上：Note from SA-Oberführer Siegele on a meeting with the Oberkommando des Herres on 26 October 1939.

12. 'Täglich wächst Deutschlands Wehrkraft', in *Die SA* 1:25 (1940) (12 July).

13. Borggräfe, *Schützenverei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p. 88–89. 因为战争相关的审查，仅有的统计数字由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编辑和发布。因此，这些数字难以验证。

14. BArch Berlin, NS 23/166: Max Luyken, 'Bericht über den 6. Sonderlehrgang in Schliersee'.

15. 对这种组织结构创立和后果的叙述中，最好的仍然是梅赛施密特的著作：Manfred Messerschmidt, *Die Wehrmacht im NS-Staat: Zeit der Indoktrination* (Hamburg: R. v. Decker's Verlag, 1969), pp. 226–232. 另见：Rudolf Absolon, *Die Wehrmacht im Dritten Reich, Band IV: 5 Februar 1938 bis 31 August 1939* (Boppard am Rhein: Boldt, 1979), p. 35.

16. 这一讲话的摘要参见：Volker Dahm et al. (eds), *Die tödliche Utopie. Bilder, Texte, Dokumente, Daten zum Dritten Reich* (Munich: IfZ, 2008), p. 272.

17. 《纳粹党通信》(NSK) 甚至报道，冯·布劳希奇已经自行推动这些发展；Messerschmidt, *Die Wehrmacht im NS-Staat*, p. 227.

18. 奥托·赫尔佐格1900年10月30日生于巴拉丁奈特的蔡斯卡姆，曾于1917年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接受军事训练。战后，他加入了埃普自由军团，后成为国防军和“帝国军旗”组织成员。赫尔佐格参加了1919年5月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并受重伤。1923年，他参加了希特勒发动的未遂政变。1926年6月，他加入纳粹党及冲锋队，1930年11月晋升为冲锋队威悉-埃姆斯旅队长，1933年8月晋升冲锋队北海地区总队长，1934年7月任冲锋队西里西亚地区总队长。赫尔佐格的传记参见：Werner Vahlenkamp, 'Herzog, Otto', in Hans Friedl (ed.),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s Landes Oldenburg* (Oldenburg: Isensee, 1992), pp. 308–309; 他与卢策的密切关系参见1932年7月15日写给卢策的信：BArch Berlin, SA 4000001586 (Herzog, Werner).

19.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p. 125–126.

20. 同上，P.126。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21. Messerschmidt, *Die Wehrmacht im NS-Staat*, p. 229;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p. 126–127. 格奥尔格·冯·诺伊富维尔生于1883年10月27日，出身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参谋部的成员，后率领一支自由军团部队并加入钢盔团，1933年5月1日成为纳粹党员。诺伊富维尔是赖歇瑙的门徒，冲锋队最初对他极端怀疑，认为他是为个人利益而及时倒戈的旧精英代表人物。详细的传记参见他的冲锋队文件：BArch Berlin, SA 400002962 (Neufville, Georg von)，以及：Tobias Picard, 'Neufville, Familie de', in Wolfgang Klötzer (ed.), *Frankfurter Biographie: Personengeschichtliches Lexikon*, vol. 2: M–Z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Frankfurt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19/2) (Frankfurt am Main: Kramer, 1996), pp. 94–96.

22. Messerschmidt, *Die Wehrmacht im NS-Staat*, p. 231.

23. BArch Berlin, NS 23/515: Letter from SA-Gruppenführer Lehmann to OSAF Dienststelle Schrifttum, undated (probably spring 1941). 1943年9月，冲锋队声称，它超过75%的成员正在国防军服役，参见：BArch Berlin, NS 23/518: NSDAP 'Aufklärungs- und Redner-Informationsmaterial on "Feldherrnhalle"', September 1943.

24. SA-Standartenführer Speer, 'Unsere größere Pflicht!',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35/36 (September/October 1943).

25. BArch Berlin, SA 400002962 (Neufville, Georg von): 'Oberst v. Neufville gefallen', *Fränkische Tageszeitung*, 24 November 1941.

26. BArch Berlin, NS 23/515: Letter from Max Jüttner to SA-Obergruppenführer Mappes, 29 April 1941.

27. BArch Berlin, NS 23/98: Brigadeführer Kömpf, judge at the Oberste SA-Gericht, on 'Aufklärungsdienst der SA' (classified), 3 October 1941.

28. BArch Berlin, NS 23/166: 'Der Einsatz der SA im Kriege'.

29. 由于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是多达一百万具有不同背景、社会经历和野心的人，不可能在详细的实证调查之前概括此类问题。而且，为公平地评论这一非常庞大的群体而提供清晰、有代表性的情况，超出了本书的范畴。不过，根据少数现存的案例研究以及我在档案中的发现，可以得出超越一般假设的结论。借用劳尔·希尔贝格的构想，这些结论可以看作“从理论上的整体浮现出来的碎片”，因而可以从中辨别出轮廓，洞察可从理论上想象的更广泛现象，尽管尚未能完全得到实证。参见：Raul Hilberg, 'Review of *Entscheidungsjahr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4 (1967), pp. 1,425–1,426, here p. 1,426.

30. Christoph Rass, 'Menschenmaterial': *Deutsche Soldaten an der Ostfront: Innenansichten einer Infanteriedivision 1939–1945*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3), pp. 122–123.

31. 同上，pp. 124–125。

32. 同上，pp. 125–126提供了类似的结论。

33. 详情另见：'Verein zur militärhistorischen Forschung e.V.'，<http://www.lexikon-der-wehrmacht.de/Gliederungen/Infanteriedivisionen/253ID.htm>。

34. 许多冲锋队将领对1939年1月19日法令的混乱反应详见：BArch Berlin, NS 23/166: Max Luyken, 'Bericht über den 6. Sonderlehrgang in Schliersee'。

35.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35: SA-Oberführer Moock, Report, 15 September 1939. 关于20世纪20年代底起对“前线经历”的美化, 参见: Matthias Schöning, *Versprengte Gemeinschaft: Kriegerroman und intellektuelle Mobilmachung in Deutschland 1914–1933*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9); Sprenger, *Landsknechte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36. 20世纪40年代冲锋队员意识形态及历史观念的描述可以在如下文件中找到: BArch Berlin, NS 23/166: Obersturmführer Karl Bauer, 'Menschen und Mächte deutscher Geschichte: Eine Rede zur Weihnachtsfeier des SA-Sturmes 21/16 L', 20 December 1941.

37. 例如, 可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166: Letter from Viktor Hölscher to Hans Sponholz at OSAF, 15 June 1942. 更广泛的讨论参见: Hensch, 'Wir aber sind mitten im Kampf aufgewachsen'.

38. GSt PK, XX. HA Rep. 240 B 8 b, no. 21, pp. 88–91: 'Förderungsbestimmungen für Politische Leiter und Gliederungsführer'; 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1212, Opis 2, no. 68: 'Ausbildung ungedienter SA-Führer und SA-Unterführer durch das Heer', 17 March 1939. 我很感激伊夫·米勒指点我参阅后一个文件。

39. 同上。

40. Konrad H. Jarausch and Klaus Jochen Arnold (eds), *'Das stille Sterben . . .': Feldpostbriefe von Konrad Jarausch aus Polen und Rußland, 1939–1942*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8), p. 187 (diary entry from 7 March 1940).

41. 冯·布劳希奇于1940年1月下令, 此前在冲锋队的服务将登入兵役记录。参见: GSt PK, XX. HA Rep. 240 B 8 b, no. 21, pp. 88–91: 'Förderungsbestimmungen für Politische Leiter und Gliederungsführer'.

42. 详见: SA-Obersturmbannführer Jaeger, 'Der Einsatz der Danziger SA', *Danziger Vorposten*, 5 September 1940; 'So kämpften Danzig's Soldaten', *Danziger Vorposten*, 19 September 1943. 我很感激扬·达尼卢克体贴地为我提供了这些文章的副本。

43. BArch Berlin, NS 23/166: 'Der Einsatz der SA im Kriege'.

44. 数字取自: Sponholz, *Danzig – deine SA!*, p. 5.

45. BArch Berlin, NS 23/166: 'Der Einsatz der SA im Kriege'.

46. 'Tagesbericht über den 7./8. September 1939 (nachts)', in Stephan Lehnstaedt and Jochen Böhler (eds), *Die Berichte der Einsatzgruppen aus Polen 1939: Vollständige Edition* (Berlin: Metropol, 2013), pp. 62–64, here p. 64.

47. 施罗德最初的行动之一是任命1935年起的波森大区领袖乌尔里希·乌勒为德意志族部队的领袖; Lehnstaedt and Böhler, *Die Berichte der Einsatzgruppen aus Polen*, p. 127. 这说明, 登记波兰被占领土德意志族人的工作更多的是由党卫队而非冲锋队执行, 特别是因为冲锋队最初被禁止在该地区建立合适的基础架构。

48. Jochen Böhler, *Der Überfall: Deutschlands Krieg gegen Polen*, 2nd edn (Frankfurt: Eichborn, 2009), pp. 137–140.

49. 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238: 'Stabschef der SA Lutze in Pressburg', *Grenzbote: Deutsches Tagblatt für die Karpathenländer*, 69. Jg., no. 286; BArch Berlin, NS 23/166: 'Der Einsatz der SA im Kriege';

Max Jüttner, 'SA an allen Fronten', in *Die SA* 1:2 (1940) (9 March). On Leo Bendak, see Luh, *Der Deutsche Turnverband in der Ersten Tschechoslowakischen Republik*, p. 432. 关于作为集中营看守的冲锋队员，参见1946年8月14日对马克斯·于特纳的审问：<http://avalon.law.yale.edu/imt/08-14-46.asp>.

50. BArch Berlin, NS 23/166: 'Der Einsatz der SA im Kriege'.

51. Georg Wagner, *Sudeten SA in Polen: Ein Bildbericht vom Einsatz sudetendeutscher SA-Männer im polnischen Feldzug* (Karlsbad and Leipzig: Adam Kraft Verlag, 1940).

52. SA-Gruppenführer May, 'Preface', in Wagner, *Sudeten SA in Polen*, unpaginated.

53. 关于这一地区的文献很稀少，特别是两战之间的资料。有关德意志裔少数民族的情况，参见：Nikolaus G. Kozauer, *Die Karpaten-Ukraine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Esslingen: Langer, 1979).

54. StA München, Bestand Staatsanwaltschaften München, Nr. 34835, vol. 1, p. 8: Verdict of the Bratislava People's Court, 22 June 1948, p. 4.

55.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159.

56. 士兵、冲锋队员库尔特·普福尔在他的战争日记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战争的第一天（9月1日），普福尔满意地写道，他所在部队于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村庄活活烧死了所谓的波兰狙击手。参见：Udo Rosowski (ed.), *Glückauf zum Untergang: Die Kriegstagebücher des Feldwebels Kurt Pfau 1939–1945* (Brüggen: Literates, 2012), pp. 19–20. 关于德军在波兰作战的总体情况，参见：Jochen Böhrer, *Auftakt zum Vernichtungskrieg: Die Wehrmacht in Polen 1939*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6); Michael Alberti, '“Niederträchtige Perfidie, gemeine, unermessliche Gier und kalte, berechnende Grausamkeit . . .”: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m Reichsgau Wartheland', in Jacek Andrzej Młynarczyk and Jochen Böhrer (eds), *Der Judenmord in den eingegliederten polnischen Gebieten 1939–1945* (Osnabrück: Fibre, 2010), pp. 117–142, here pp. 118–120. 关于对波兰人经济上的剥削，参见：Lehnstaedt, 'Das Generalgouvernement als Mobilisierungsreserve'.

57.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p. 160–1.

58. 在著作中提到这支冲锋队特殊部队的学者不多。最详细的叙述来自：Erich Jaineck, *Standarte Feldherrnhalle: Bewährung an den Brennpunk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Rosenheim: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1997). 雅伊内克原属该旗队，本身就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他的书中有过度的悔罪倾向，但对于确定“统帅堂”作战行动的轨迹、深入探究其成员世界观很有用。关于该部队组织与部署的基本信息，参见：BArch Berlin, NS 23/518: 'Übersichtsblatt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Standarte Feldherrnhalle' (classified), 1943; Georg Tessin, *Verbände und Truppe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und Waffen-SS im Zweiten Weltkrieg 1939–1945*, vol. 8: *Die Landstreitkräfte 201–280* (Osnabrück: Biblio, 1979), pp. 302–306; Rudolf Absolon, *Die Wehrmacht im Dritten Reich*, vol. 5: *1. September 1939 bis 18. Dezember 1941* (Boppard am Rhein: Boldt, 1988), pp. 27–28.

59. Rudolf Absolon, *Die Wehrmacht im Dritten Reich*, vol. 4: *5. Februar bis 31. August* (Boppard am Rhein: Boldt, 1979), p. 40.

60. BArch Berlin, NS 23/518: Recruitment guidelines for the SA-Wachstandarte, 20 April 1936.

61. Absolon, *Die Wehrmacht*, vol. 4, pp. 41–42; Deutsche Dienststelle, Berlin (WASSt), Personal–

Kartei M-1334/024 (Herbert M.). 根据雅伊内克的说法, 1936-1945年存在7-12个“统帅堂”分支单位; 参见他的*Soldaten der Standarte Feldherrnhalle*, p. 32。

62. Oberste SA-Führung (ed.), *Das Jahr der SA*, p. 53.

63. 由于这一背景, 戈林在1923年曾作为冲锋队领袖的功绩已经不值一提。

64. Absolon, *Die Wehrmacht*, vol. 4, p. 42.

65. Karl-Heinz Golla, *The German Fallschirmtruppe 1936-1941: Its Genesis and Employment in the First Campaigns of the Wehrmacht* (Solihull: Helion, 2012), pp. 39-40, 42.

66.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122.

67. Letter from Erich Reimann to Viktor Lutze, 5 May 1940, in BArch Berlin, SA 400003178 (Reimann, Erich). 埃里希·莱曼从1938年6月20日起任统帅堂旗下属团级指挥官。他1903年6月17日生于柏林, 1925-1930年在汉堡警察部队中服役, 1935-1936年再次入役。1926-1930年, 他是钢盔团成员, 1929年因为被怀疑卷入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的政治爆炸事件而面临纪律诉讼。赖曼被逐出警察部队, 于1930年5月1日在阿尔托纳加入冲锋队, 当时他的经济情况恶化, 不得不接受巡回推销员的工作。1934年7月1日, 卢策任命他为副官。参见赖曼的冲锋队文件: BArch Berlin, SA 4000003178 (Reimann, Erich); Absolon, *Die Wehrmacht*, vol. 4, pp. 42-43.

68. Golla, *The German Fallschirmtruppe 1936-1941*, p. 45; Wilhelm Rehm, 'Zwei Jahre Kriegsbewährung der SA',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no. 16/17 (September/October 1941).

69. BArch Berlin, NS 23/166: 'Der Einsatz der SA im Kriege'.

70. 同上: 'Männer der Standarte "Feldherrnhalle" über Kreta', in *Die SA* 2:30 (1941) (25 July), p. 4. 关于克里特岛战役, 参见: Golla, *The German Fallschirmtruppe 1936-1941*, pp. 403-536; Anthony Beevor, *Crete: The Battle and the Resistance* (London: Penguin, 1991).

71. 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德国空军从1943年6月开始准备组建“统帅堂伞兵团”(第2伞兵团), 从冲锋队志愿者中招募人员。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518: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on Division Feldherrnhalle, 21 June 1943.

72. Werner Präg and Wolfgang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in Polen, 1939-1945* (Stuttgart: DVA, 1975), p. 292 (entry from 18 October 1940).

73. 'Aus Dienst und Leben der SA', *Die SA* 1:40 (1940), p. 14. “统帅堂”部队在克拉科夫守卫瓦维尔宫, 德国占领期间, 那里是总督弗兰克的总部。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501, pp. 173-175, here p. 173: 'Die Aufstellung der SA-Einheit General-Gouvernement'; Präg and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p. 386 (entry from 17 July 1941).

74. Stephan Lehnstaedt, *Okkupation im Osten: Besatzeralltag in Warschau und Minsk* (Munich: Oldenbourg, 2010), p. 251.

75. 我很感谢斯特凡·伦施泰特提供了这一结论的摘要。

76. 弗里德里希·弗罗姆的参谋长在他的作战日志中给出了统帅堂成员有700人这一数字(1939年9月2日)。1939年起, 弗罗姆在国防军中担任陆军军备负责人和后备军总监。以波茨坦大学的伯恩哈德·克勒纳为首的一批军事历史学家计划在2016-17年出版他的参谋长的日记, 以下称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为“弗罗姆的作战日志”。感谢亚历山大·克兰茨向我提供未发表的手稿摘要，并提供了进一步的建议。

77. 奥古斯特·拉本1892年12月2日生于塔明-加德。他是一战中的战斗机飞行员（“拉本中队”指挥官），后来为非洲水果公司工作，在喀麦隆度过了一段时间。1940年6月15日，他在该团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之一中死于巴斯特-马林塔尔，当时他是营长（少校军衔），葬于尼德布龙莱班的德国军人墓地里。参见：Thorsten Pietsch, *Frontflieger: Die Soldaten der Deutschen Fliegertruppe 1914-1918*, <http://www.frontflieger.de/3-r-f.html>.

78. 冲锋队参谋长卢策在前线和德国国内多次会见“统帅堂”成员。参见卢策的报告：‘Besichtigungsfahrt an der Westfront’, *Die SA* 1:9 (1940) (29 March); ‘Mit dem Stabschef an der Westfront’, in *Die SA* 1:10 (1940) (5 April).

79. 赫伯特·伯梅1898年4月21日生于下西里西亚拉特维茨，1943年12月27日死于东线。参见：BArch Berlin, NS 23/1408, pp. 19-21, here p. 19: ‘Liste der Ritterkreuzträger, welche der SA angehören bzw. der SA angehört haben’; ‘Kurznachrichten’, in *Die SA* 1:25 (1940) (12 July); Jaineck, *Soldaten der Standarte Feldherrnhalle*, p. 22.

80. Jörg Ganzenmüller, *Das belagerte Leningrad 1941-1944: Die Stadt in den Strategien von Angreifern und Verteidigern*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5);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Siege of Leningrad* (London: Seckler & Warburg, 1969). 这两本书都没有明确提到第271团。

81. ‘Des verpflichtenden Namens würdig’, in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no. 24/25 (May/June 1942); BArch Berlin, NS 23/518: ‘Das Regiment “Feldherrnhalle” hält in zähem Späh- und Stoß truppkrieg einen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Hauptlinie in der Sumpfhölle am Wolchow’.

82. Tessin, *Verbände und Truppen*, vol. 8, p. 303.

83. BArch Berlin, VBS 264, no. 4001006602 (Sponholz, Hans): Typescript of Hitler’s order from 4 May 1943 to integrate the SA-Regiment Feldherrnhalle into the 60th Infantry Division (mot.); Jaineck, *Soldaten der Standarte Feldherrnhalle*, pp. 25-32. 此前的损失用来自步兵第203补充营（驻扎在柏林-施潘道）的人员补充，1942年起则用来自步兵第9补充营的人员补充，该营由冲锋队区队长奥古斯特·埃伯莱因指挥，驻扎在波茨坦。详见：<http://www.lexikon-der-wehrmacht.de/Gliederungen/InfErsBat/InfErsBatFHH-R.htm>.

84. 他后来于1938年3月13日（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那一天）获得了纪念勋章，说明他可能在事件前刚刚加入了冲锋队。

85. 卡尔·A的传记参见：Deutsche Dienststelle, Personal-Kartei A-259/0553.

86. 赫伯特·M的传记参见：Deutsche Dienststelle, Personal-Kartei M-1334/024.

87. 大约同一时间，只有20岁的库尔特·M同意在国防军无限期服役。由于他仍然不到年龄，他父亲——一位会计——不得不同意这个决定。

88. 库尔特·M的传记信息，参见：Deutsche Dienststelle, Personal-Kartei M-1643/588.

89. OSAF对统帅堂的描述在这方面很有启发。一方面，它的宣传者坚称统帅堂对所有18岁以上、身体健康、种族合适且没有受到过起诉（除了“政治动机”的控罪之外）的男子开放。另一方

面，他们反复强调“统帅堂”的政治教育有意地采用简单“纯朴”的方式，因为纯学术方法只能在“心思与感情简单”的“统帅堂”成员中造成混乱。Oberste SA-Führung (ed.), *Das Jahr der SA*, pp. 49–50.

90. Carola Tischler, 'Von Geister-und anderen Stimmen: Der Rundfunk als Waffe im Kampf gegen "die Deutschen" im Großen Vaterländischen Krieg', in Karl Eimermacher and Astrid Volpert (eds), *Verführungen der Gewalt: Russen und Deutsche im Ersten und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Fink, 2005), pp. 467–506, here p. 467.

91. Brown, 'SA in the Radical Imagination', pp. 258–268. On the KPD's infiltration tactics, see also BArch Berlin, NS 23/431: Circular from OSAF 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24 April 1933.

92. Tischler, 'Von Geister-und anderen Stimmen', p. 473; Fritz Erpenbeck, 'Hier spricht der Sender der SA-Fronde . . .',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undfunks: deutscher demokratischer Rundfunk* 4 (1974), pp. 7–15, here pp. 8–9. On GS1, see Jerome S. Berg, *On the Short Waves 1923–1945: Broadcast Listening in the Pioneer Days of Radio*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7), p. 220.

93. Patrick Merziger, 'Humour in the *Volksgemeinschaft*: The Disappearance of Destructive Satire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Martina Kessel and Patrick Merziger (eds), *The Politics of Humour: Laughter,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2), pp. 131–152.

94. Erpenbeck, 'Hier spricht der Sender der SA-Fronde', pp. 12–14.

95. 同上，pp. 13–14。不可能验证这些叙述的真伪，但鉴于我们知道德国人战时的心态，它们似乎不完全是夸大。

96. 关于这种（大体上不成功的）策略，参见如下著作中的档案：Hermann Weber, Jakov Drabkin, and Bernhard H. Bayerlein (eds), *Deutschland, Russland, Komintern. II: Dokumente (1918–1943): Nach der Archivrevolution: Neuerschlossene Quellen zu der Geschichte der KPD und den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Berlin: de Gruyter, 2015), pp. 989–995, 1,080–1,081, 1,097–1,100.

97. Annette Weinke, *Die Verfolgung von NS-Täter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en 1949–1969, oder: Eine deutsch-deutsche Beziehungsgeschichte im Kalten Krieg*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2), pp. 63–75. 从这些政治活动中特别受益的是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这些人往往成为原东德的坚定追随者；参见：Thomas Ahbe and Rainer Grie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als Generationengeschichte', in Annegret Schüle, Thomas Ahbe, and Rainer Gries (eds), *Die DDR aus generationengeschichtlicher Perspektive: Eine Inventur*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06), pp. 475–571, here pp. 502–518.

98. BArch Berlin, NS 23/510: Die Oberste SA-Führung, 'Aufbau der SA im deutschen Gebiet des früheren polnischen Staates', 30 October 1939. 在于特纳1939年11月10日的命令中，冲锋队苏台德地区总队失去了在行动中分担的任务。相反，冲锋队西里西亚地区总队成为了唯一得到许可在上西里西亚行动的组织。

99. BArch Berlin, NS 23/510: Der Oberste SA-Führer, 'Betr. Gliederung der SA im deutschen Gebiet des früheren polnischen Staates', 25 January 1940.

100. BArch Berlin, NS 23/98: Note from SA-Gruppenführer Georg Mappes, 18 November 1939.
101. 海因里希·哈克尔1892年6月16日生于法兰克福尼亚维尔茨堡，上完初中后在一战中的德国陆军服役，后在维尔茨堡大学就学至1922年被迫放弃学业——据说是财务原因。接着，他成为一名轻石与皮料销售员。他最初是钢盔团成员，后又加入“前线联盟”，1925年加入纳粹党但很快离开。1929年，他再度成为纳粹党员，同年被选入巴伐利亚州议会。从1931年起，哈克尔领导冲锋队弗兰肯次级地区总队。1933–1934年，他担任冲锋队驻巴伐利亚特别代表，接着领导冲锋队第6旅队直到1939年。哈克尔的传记参见：BArch Berlin, SA 4000001265 (Hacker, Heinrich); ‘Kurznachrichten’, *Die SA* 1:8 (1940) (22 March).
102. Wilhelm Rehm, ‘Aufbau im deutschen Osten’, *Die SA* 1:2 (1940) (9 February); Baumgärtner, ‘Sturmdienst im Wartheland’, *Die SA* 2:28 (1941) (11 July); ‘Bassarabiendeutsche in den SA-Wehrmannschaften’, *Die SA* 2:20 (1941) (16 May).
103. 历史学家伊夫·米勒会对冲锋队加以研究，志在更详细地阐明这些波罗的海德意志族人在德国新兼及占领地区冲锋队里所起的重要作用。
104. Baumgärtner, ‘Sturmdienst im Wartheland’, *Die SA* 2:28 (1941) (11 July). 南施蒂利亚冲锋队同样向其队员教授德语、历史和地理；参见：Franz Glatzer, “‘Sie bauen das Morgen’”, *Wehrmannschaftsdienst in der Untersteiermark*, in *ibid*.
105. BArch Berlin, SA 4000001265 (Hacker, Heinrich): Note of SA-Gruppenführers Lehmann, 2 September 1941. 关于格赖泽尔，参见：Catherine Epstein, *Model Nazi: Arthur Greiser and the Occupation of Western Po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6. BArch Berlin, SA 4000001265 (Hacker, Heinrich): Letter from Hacker to Lutze, 25 September 1941. 哈克尔对冲锋队在东部使命的看法参见他的论文：‘Pioniere des Ostens’, *Die SA* 2:25/26 (1941) (20/27 June), pp. 1–3.
107. Jill Stephenson, *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 191.
108. FES, Viktor Lutze Papers, Political Diary of Viktor Lutze, p. 171. 卢策在这一场合的公开讲话在德国电台实况转播；参见：‘Kurznachrichten aus Dienst und Leben der SA’, *Die SA* 1:5 (1940) (1 March).
109. BArch Berlin, NS 23/510: OSAF, ‘Änderung des Anschriftenverzeichnisses’, 17 May 1940. 冲锋队在西线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发展复制了前波兰领土的组建经历，但不如那里成功。1941年2月起，建立了两个冲锋队旅队（北阿尔萨斯旅队基地在斯特拉斯堡，南阿尔萨斯旅队总部在科尔马），它们属于冲锋队下莱茵地区总队，最初包含8个常规旗队、两个骑兵旗队和一个海上旗队；BArch Berlin, NS 23/510: Oberste SA-Führung, Gliederung der SA im Elsaß, 19 February 1941. 1941年3月27日，驻梅斯的一个冲锋队旅队归属洛林，成为库法尔茨地区总队的一部分；BArch Berlin NS 23/510: Die Oberste SA-Führung, Neuaufstellung von SA-Einheiten in Lothringen, 27 March 1941. 最后，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批准建立两个卢森堡旗队，于1941年4月1日生效。它们成为了冲锋队韦斯特马克地区总队（总部在科布伦茨）的一部分；BArch Berlin, NS 23/510: OSAF on ‘Neugliederung’, 25 April 1941. 另见：Lothar Kettenack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tumspolitik im Elsaß* (Stuttgart: DVA, 1973), pp. 207–216; Dieter Wolfang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itik in Lothringen (1940–1945)*,

university diss., 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 (Saarbrücken), 1976, pp. 84–86.

110. Zilich, 'SA im Protektorat', in *Die SA* 2:1 (1941) (3 January), p. 18.

111. Präg and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p. 292 (entry from 26 October 1940).

112. BArch Berlin, NS 23/510: Letter from the leader of the Wehr- und Schützenbereitschaften in the General Government, Peltz, to OSAF, 7 November 1941.

113. Dieter Schenk, *Krakauer Burg: Die Machtzentrale des Generalgouverneurs Hans Frank 1939–1945* (Berlin: Links, 2010), p. 136.

114. 更多参考资料见: Daniel Brewing, '“Wir müssen um uns schlagen”: Die Alltagspraxis der Partisanenbekämpfung im Generalgouvernement 1942', in *Gewalt und Alltag im besetzten Polen 1939–1945*, ed. Böhler and Lehnstaedt, pp. 497–520.

115. 关于弗兰克和希姆莱之间的竞争, 参见: Schenk, *Krakauer Burg*, pp. 130–133.

116. 1944年春季, 佩尔茨被召到国防军, 替代者为冲锋队旅队长威廉·屈内蒙德。

117. Gerhard Eisenblätter, *Grundlinien der Politik des Reichs gegenüber dem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5*, inaugural diss.,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1969, pp. 241–242; BArch Berlin, NS 23/98: Hans Frank, Decr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hrschützenbereitschaften, 19 December 1941.

118. BArch Berlin, NS 23/510: NSDAP and Arbeitsbereich General Gouvernement (Stahl), Anordnung 17/42 (SA, SS und NSKK–Einheiten im Generalgouvernement), 23 April 1942; Eisenblätter, *Grundlinien der Politik*, pp. 255–256.

119. BArch Berlin, NS 23/98: Letters from SA–Oberführer Peltz to OSAF, 21 March 1942, and to the General Government, 5 May 1942.

120. 弗兰克的立场详见: Präg and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pp. 474–475 (entry from 17 March 1942).

121. BArch Berlin, NS 23/510: Hans Frank, 'Erlaß über die Überführung der Wehrschützenbereitschaften in SA–Wehrbereitschaften', 16 April 1942; BArch Berlin, NS 23/510: Die Oberste SA–Führung (Jüttner), 'SA im Generalgouvernement', 18 May 1942. 作为回报, 弗兰克承诺为OSAF提供总督府辖区内的两个康复中心; 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98: Cable from SA–Obersturmbannführer Schänzlin to Georg Mappes, 18 April 1942.

122. BArch Berlin, NS 23/501, pp. 114–120, here p. 120: 'Die Wehrschützenbereitschaft im Gen[eral]–Gouvernement', undated, presumably from October 1942.

123. Eisenblätter, *Grundlinien der Politik*, p. 257.

124. BArch Berlin, NS 23/510: Die Oberste SA–Führung (Ohrt), 'An den Aufbaustab der SA im Generalgouvernement', 16 September 1942. 这些冲锋队旗队分别驻扎在克拉科夫、华沙(华沙旗队、南华沙旗队、华沙郊区旗队)、拉多姆、卢布林、伦贝格、赖希斯霍夫、新桑德茨、凯尔采和彼得库夫–托马肖夫。

125. Eisenblätter, *Grundlinien der Politik*, pp. 257–258.

126. 关于1942–1944年的安全问题, 参见: Präg and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pp. 642–647, 686–691 (entries from 15 April and 18 June 1943); Brewing, 'Wir müssen um uns schlagen', pp. 502–518; Stephan Lehnstaedt, 'Deutsche in Warschau: Das Alltagsleben der Besatzer 1939–1944', in *Gewalt und Alltag im besetzten Polen 1939–1945*, ed. Böhler and Lehnstaedt, pp. 205–228, here pp. 223–227.

127. Präg and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p. 624 (entry from 22 February 1943).

128. Central' nyj archiv Minoborony Rossii (CAMO), Collection 500, Finding Aid 12450, File 161, p. 11: stenograph of a meeting of Hitler, Keitel, and others on the Berghof on 8 June 1943, <http://wwii.germandocsinrussia.org/de/nodes/2297-akte-161-stenogramm-der-besprechung-bei-a-hitler-in-berghof-uber-die-behandlung-der-kriegsgefa#page/1/mode/grid/zoom/1>.

129. BArch Berlin, SA 4000003047 (Peltz, Kurt): Letter from Kurt Peltz to Leonhard Gontermann, 22 December 1943.

130. Eisenblätter, *Grundlinien der Politik*, p. 298. 根据一份冲锋队内部文件，战争期间来自19个冲锋队地区总队的队员参与警察行动。5个冲锋队地区总队还参与了边境管制活动。参见：BArch Berlin, NS 23/166: 'Der Einsatz der SA im Kriege', undated. See also BArch Berlin, NS 23/501, pp. 176–178, here p. 177: Report of Hauptsturmführer Behrenbrock about his journey to Vienna, Kracow, and other places, August 1944.

131. 参与佩尔茨冲锋队档案中的对应文件：BArch Berlin, SA 4000003047 (Peltz, Kurt).

132. BArch Berlin, SA 400003178: Letter from Reimann to the Rei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3 April 1940.

133. BArch Berlin, NS 23/98: Note of SA-Oberführer Siegele, 9 December 1939.

134. Präg and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pp. 643, 704 (entries from 15 April and 16 July 1943); Władysław Bartoszewski, *Der Todesring um Warschau 1939–1944* (Cracow: Interpress, 1969), pp. 189–190.

135. Präg and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p. 898 (entry from 5 August 1944).

136. 冲锋队在这一地区暴力活动的著名例子之一是1944年9月杀害切尔纳修道院院长；参见：Präg and Jacobmeyer (eds),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p. 915 (entry from 26 September 1944). 另见IMT于1946年8月14日（早间）对马克斯·于特纳的审问，<http://avalon.law.yale.edu/imt/08-14-46.asp>.

137. 'Der Dienst der SA im Grenzland',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no. 12 (March 1941), p. 4; Helmuth Ruschnig, 'Bericht über fünf Monate Arbeit des Kärnter Volksbundes', as printed in Tone Ferenc (ed.),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ntnationalisierungspolitik in Slowenien 1941–1945 / Viri o nacistični raznarodovalni politiki v Sloveniji 1941–1945* (Maribor: Založba Obzorja, 1980), document no. 168.

138. BArch Berlin, NS 23/234: SA-Obertruppführer Schmidt, 'Die Südmark im deutschen Freiheitskampf'.

139. 'Sie haben ihre Aufgabe restlos erfüllt!',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no. 13 (May 1941), p. 1.

140. Schm[idt], 'Grenzwacht gegen Banditen',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 (Feldpostausgabe), no. 31 (1942).

141. Lorenz Ohrt, 'Grundsätzliche Weisung Nr. 1 der SA-Gruppe Südmark für die Organisation und Ausbildung der Wehrmannschaften in den besetzten slowenischen Gebieten', 25 June 1941, in Ferenc,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ntnationalisierungspolitik in Slowenien*, document no. 94.

142. 阿尔萨斯的类似举措参见: Kettenack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tumspolitik im Elsaß*, pp. 163–84. 懂两种语言的冲锋队员公开讲法语足以成为正式的警告。一名洛林冲锋队领导人推断, 对冲锋队员来说“使用法语是没有价值的”; BArch Berlin, NS 45/162: Circular from SA-Standarte Metz on the use of the French language, 28 May 1941.

143. Hans Baron and Franz Tscheligi,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Southern Styria', 1 May 1942, in Ferenc,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ntnationalisierungspolitik in Slowenien*, document no. 218.

144. Ruschnig, 'Bericht über fünf Monate Arbeit des Kärnter Volksbundes', in Ferenc,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ntnationalisierungspolitik in Slowenien*, document no. 168.

145. Joachim Höslér, 'Sloweniens historische Bürd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46 (2006), <http://www.bpb.de/apuz/29421/sloweniens-historische-buerde?p=all>.

146.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35: SA-Oberführer Moock, Report, 15 September 1939.

147.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Allen Lane, 2013), pp. 327–338; Jörg Friedrich, *Der Brand: 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 (Berlin: Ullstein, 2004), pp. 192–195.

148. BArch Berlin, NS 23/227: Gustaf Deuchler, 'Die Bewährung der SA bei der Gro ß -Katastrophe Hamburgs', 16 December 1943.

149. Hans Erich Wagner, 'SA-Kameradschaft im Kriege',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no. 18/19 (November/December 1941); Wilhelm Rehm, 'Zwei Jahre Kriegsbewährung der SA',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no. 16/17 (September/October 1941).

150. 例如, 可以参见: NS 23/227: 'SA an der Front', *Essener Volkszeitung*, 10 October 1939; 'Aus Dienst und Leben der SA', *Die SA* 2:23/24 (1941) (6/13 June), p. 26.

151. 这些数字(但没有提到冲锋队)参见: Christian Kretschmer 'Kriegsgefangene im Visier von Werkschutz, Kriminalpolizei und Landwacht: Bewachung, Fluchtprävention und Kriegsfahndung', in 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ed.), *Polizei, Verfolgung und 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remen: Edition Temmen, 2013), pp. 147–155. 富有启发的研究参见: NS 23/227: SA-Sturm 14/5 in Hirschaid/Franconia, Report on the murder of an SA-Rottenführer, 8 June 1943.

152. BArch Berlin, NS 6/857: Decree of the OSAF (Jüttner), 24 April 1942; Letter from his deputy Ohrt, 25 June 1942.

153. BArch Berlin, NS 23/227: 'Zwölfhundert Herde wurden geborgen', *Hannoversche Zeitung*, 15 December 1943.

154. Wilhelm Rehm, 'Zwei Jahre Kriegsbewährung der SA',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16/17 (September/October 1941).

155. BArch Berlin, NS 23/227: Gustaf Deuchler, 'Die Bewährung der SA bei der Groß-Katastrophe Hamburgs', 16 December 1943.

156. 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34: Letter from SA-Sturmführer Fritz Hancke to SA-Gruppenführer Siegfried Kasche, 25 August 1941.

157. BArch Berlin, NS 23/166: Letter from Viktor Hölscher to Hans Sponholz, 15 June 1942.

158. BArch Berlin, NS 23/234: Hans Sponholz, secret mood report from Munich, 23 September 1942.

159. 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起, OSAF将冲锋队美化为“传统男性美德”的承载者, 据称这种美德是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显著差别。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238: Radio speech by Viktor Lutze, 3 July 1939.

160. Ma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 here pp. 600–2. 纳粹与共产党工会会员临时合作的著名例子之一是柏林公交公司工人1932年秋季举行的罢工; 参见: Klaus Rainer Röhl, *Nähe zum Gegner: Kommun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im Berliner BVG-Streik von 1932*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4).

161. 详见: Humann, 'Verwahranstalten mit Fantasiegehältern?'

162. 关于这些学校历史的概述, 参见: BArch Berlin, NS 23/70: Herbert Merker, 'SA-Berufsschulen'; Martin Kipp, 'Privilegien für "alte Kämpfer": Zur Geschichte der SA-Berufsschulen', in Manfred Heinemann (ed.), *Erziehung und Schulung im Dritten Reich*, vol. 1: *Kindergarten, Schule, Jugend, Berufserzieh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0), pp. 289–300. 洛克施泰特营地的学校早在1931年就为诺德马克冲锋队成员提供训练; Schröder, 'Der NS-Schulungsstandort', p. 9.

163. BArch Berlin, NS 23/515: Public Notice of the SA-Berufsschule Lockstedter Lager, October 1939.

164. 关于冲锋队职业学校另见: Kipp, 'Privilegien für "alte Kämpfer"'; Volker Herrmann, *Vom Arbeitsmarkt zum Arbeitseinsatz: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anstalt für Arbeitsvermittlung und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1929 bis 1939*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3), p. 291.

165. Schröder, 'Der NS-Schulungsstandort', p. 12.

166. 同上, 详见pp. 15–17.

167. BArch Berlin, NS 23/70: Letter from the Reichsarbeitsministerium to OSAF, 24 January 1939; Letter from the Reichsarbeitsministerium to OSAF, 16 April 1940.

168. Kipp, 'Privilegien für "alte Kämpfer"', p. 298; 'Kurznachrichten', *Die SA* 1:8 (1940) (22 March); 'Kurznachrichten aus Dienst und Leben der SA', *Die SA* 1:13/14 (1940) (26 April).

169. BArch Berlin, NS 23/70: OSAF decree from 15 October 1942; Schröder, 'Der NS-Schulungsstandort', p. 13.对韦斯特施泰德的计划包括一个电影院和大会堂, 被视为“典范”。为舒立茨也规划了类似的建筑物。

170. Kipp, 'Privilegien für "alte Kämpfer"', p. 297.

171. 财团与冲锋队之间的合同于1941年签署；参见：BArch Berlin, NS 23/70: Protocol of the meeting of the *Industriegemeinschaft* and OSAF in Berlin, 22 January 1942.

172. BArch Berlin, NS 23/515: Letter from the *Einstellungszentrale* for the SA professional schools, 12 December 1941.

173. BArch Berlin, NS 23/70: Protocol of the meeting of the *Industriegemeinschaft* and OSAF in Berlin, 22 January 1942.

174. 至少在理论上，上学期间等于见习期，成功毕业就将自动被冲锋队接受为常规成员。但是，这些原则在实践中是否应用，应用到什么程度，都不得而知。还曾经有计划创建“冲锋队船厂突击队”，在工作时间里集合。参见：BArch Berlin, NS 23/70: Protocol of the meeting of the *Industriegemeinschaft* and OSAF in Berlin, 22 January 1942.

175. BArch Berlin, NS 23/515: Letter from the head of the SA-Gruppe Nordmark, October 1939.

176. BArch Berlin, NS 23/70: Letter from the OSAF to Middendorff, 4 June 1942.

177. 冲锋队还将学校看成增加预算的一种手段，要求造船工业向冲锋队支付3.2马克/天/人，而学徒每天只得到0.5马克。参见：BArch Berlin, NS 23/515: Administrative directive of the SA leadership, 14 July 1941.

178. BArch Berlin, NS 23/70: Report from the OSAF's 'Inspektion Erziehung und Führerausbildung' (Merker), 4 July 1942.

179. 同上：Letter from Middendorff to the OSAF, 25 June 1942。

180. 同上：Report from the OSAF's 'Inspektion Erziehung und Führerausbildung' (Merker), 4 July 1942.

181. 赫伯特·默克尔1901年6月15日生于波茨坦附近的伯恩施泰特，1925年加入纳粹党。他此前曾是许尔森自由军团（1919年）、钢盔团（1922–1923年）和“前线联盟”（1924年）成员，1925–1925年担任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纳粹领导人，此后返回家乡所在地区。1930年9月25日，他被提升为勃兰登堡的“组织领导人”，随后几年担任其他纳粹党职务。1931–1933年，他被指控多项政治犯罪，1934年6月30日到8月3日被囚禁于臭名昭著的柏林哥伦比亚监狱，因而侥幸逃过了“罗姆清洗”，1937年2月28日被提升为冲锋队旅队长。参见：BArch Berlin, SA 4000002858 (Merker, Herbert).

182. 引自：'Befehl ausgeführt!',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13 (May 1941).

183. 名称从“学校”改为“营地”是因为内部竞争，也是如下事实的结果：由于招募的强制劳工越来越多，学校的性质已经从“营地”变为“监狱”。参见1942年夏季和秋季关于这些事务的来往信件：BArch Berlin, NS 23/70.

184. 同上：Report from the OSAF's 'Inspektion Erziehung und Führerausbildung' (Merker), 4 July 1942.

185. 戈培尔在日记中评论，舍普曼的讲话“不幸”只有次要价值，即使元首也已经得知他的失败。“冲锋队极端不走运。在它存在期间，从没有一位有地位的领导人”；戈培尔1943年10月27日的日记，引自 Müller, 'Wilhelm Schepmann', p. 525, n. 61.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186.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舍普曼被任命为参谋长后不久，就正式禁止在冲锋队通信和宣传中使用“冲锋队精神”一词。他同样解散了“冲锋队文化圈”，理由是不存在特殊的冲锋队文化，只有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德国文化。

187. 同上，关于舍普曼对希姆莱的“奴颜婢膝”，另见：Müller, 'Wilhelm Schepmann', p. 524.

188. 这一数字由雅明提供：Jamin, 'Zur Rolle der SA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p. 357.

189. BArch Berlin, NS 23/515: Wilhelm Schepmann, 'Weltanschauliche Ausrichtung für den totalen Einsatz', 6 December 1944, here topic 6, 'Kampf gegen Nörgler und Gerüchtemacher'.对这一点的更详细讨论参见：Wagner, 'Die letzte Schlacht der "alten Kämpfer"', pp. 31–40.

190. Müller–Hill, 'Man hat es kommen sehen und ist dennoch erschüttert', p. 28 (diary entry from 5 April 1944).

191. 关于任命之前的发展及其后果，参见：Franz W. Seidler, 'Deutscher Volkssturm': Das letzte Aufgebot 1944/45 (Munich: Herbig, 1989), pp. 35–47; Müller, 'Wilhelm Schepmann', pp. 528–530.

192. BArch Berlin, NS 23/227: 'Zweiter Gro ß einsatz des Volkskriegs', *Front und Heimat* 49 (October 1944).

193. Willy Timm, *Freikorps 'Sauerland' im Deutschen Volkssturm: Südwestfalens letztes Aufgebot 1944/45* (Unna: Hellweg, 1993), pp. 22 and 29.

194. BArch Berlin, NS 23/510: Decree no. 3/44 from the leader of the SA–Brigade 94 Oberdonau, SA–Standartenführer Faller, 21 September 1944.

195. Seidler, 'Deutscher Volkssturm', pp. 142–145.

196. BArch Berlin, NS 23/227: 'Die Bedeutung der SA im Volkssturm', *Nürnberger Neueste Nachrichten*, 21 October 1944.

197. Timm, *Freikorps 'Sauerland' im Deutschen Volkssturm*, p. 34.

198. BArch Berlin, NS 23/515: Wilhelm Schepmann, 'Weltanschauliche Ausrichtung für den totalen Einsatz', 6 December 1944, here topic 8, 'Der SA–Mann ist immer im Dienst'.

199. 舍普曼于是遵循官方的宣传口径，敦促领导人们尽可能经常地引用这一历史类比。参见：Seidler, 'Deutscher Volkssturm', pp. 261–263.

200. BArch Berlin, NS 23/515: Wilhelm Schepmann, 'Weltanschauliche Ausrichtung für den totalen Einsatz', 6 December 1944, including topic 3, 'Jeder SA–Mann ein fanatischer Träger des ä u ß ersten und totalen Widerstandswillens'.

201. 另见：Saul K. Padover, *Lügendetektor: Vernehmungen im besetzten Deutschland 1944/45* (Munich: Econ, 2001), 尤其是pp. 278–279 (1946年第一次出版英文版，题为*Experiment in Germany: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

202. 例如，可参见：'SA Geist schlägt den Bolschewismus', *Die SA* 2:34 (1941) (22 August), p. 4; Walther Nibbe, 'Den Kampf, den Horst Wessel begonnen, im braunen Gewand der SA . . .',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16/17 (September/October 1941), pp. 1–2. 关于1941年起纳粹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诠释为末世之战的情况，参见：Behrenbeck, *Der Kult um die toten Helden*,

pp. 534–48.

203. 参见发表的（所谓）战争信件引语：‘Feldpostbriefe’,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16/17* (September/October 1941); ‘Streiflichter aus dem Sowjetparadies’,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18/19* (November/December 1941); ‘Streiflichter aus dem Sowjetparadies’, *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üdmark 20/21* (January/February 1942).即便那些不支持如此廉价纳粹宣传的军人（如教师康拉德·贾劳施）也坚称“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分子”截然不同。贾劳施称，普通苏联民众“仍然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而“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犹太分子”必须无情根除。参见：Jarausch and Arnold, ‘Das stille Sterben’, pp. 330–331, 335.

204. BArch Berlin, NS 23/515: Wilhelm Schepmann, ‘Weltanschauliche Ausrichtung für den totalen Einsatz’, 6 December 1944, including topic 3, ‘Jeder SA-Mann ein fanatischer Träger des äußersten und totalen Widerstandswillens’.

205. 关于1944–1945年普遍的厌战情绪，参见：Keller, *Volksgemeinschaft am Ende*; Kershaw, *The End*.关于疯狂的纳粹分子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实施的暴力行动，参见：Wagner, ‘Die letzte Schlacht der “alten Kämpfer”’, and Jens-Christian Wagner, ‘Kriegsende und Befreiung 1945 in Niedersachsen’, in his (ed.) *70 Tage Gewalt, Mord, Befreiung: Das Kriegsende 1945 in Niedersachse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5), pp. 6–12.

206. Patricia Heberer, ‘The American Military Commission Trials of 1945’, in Nathan Stoltzfus and Henry Friedlander (eds), *Nazi Crimes and the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3–62, here pp. 46–48. 关于冲锋队员实施的私刑另见：Overy, *Bombing War*, pp. 480–481.

207. BArch Berlin, NS 23/515: Wilhelm Schepmann, ‘Weltanschauliche Ausrichtung für den totalen Einsatz’, 6 December 1944, here topic 5, ‘Verhalten gegenüber Fremdvölkischen’.

208. Heide Nowitzki, *Wer waren die Zwangsarbeiter in der Herforder Landwirtschaft 1939–1945? Eine exemplarische Untersuchung*, unpublished MA thesis, Bielefeld University, 2016, pp. 30, 42–43.

209. Wagner, ‘Die letzte Schlacht der “alten Kämpfer”’, p. 38.

210. 不无讽刺的是，1946–1947年，数百名犹太难民临时住在这一建筑物中。参见：‘Schliersee – Jüdisches DP-Lager’, [http://www.after-the-shoah.org/index.php?id=25&tx_aftertheshoah_aftertheshoah\[object\]=160&tx_aftertheshoah_aftertheshoah\[action\]=show&tx_aftertheshoah_aftertheshoah\[controller\]=Object&cHash=209684030cd2f4f5f097c0aa9c4098f4](http://www.after-the-shoah.org/index.php?id=25&tx_aftertheshoah_aftertheshoah[object]=160&tx_aftertheshoah_aftertheshoah[action]=show&tx_aftertheshoah_aftertheshoah[controller]=Object&cHash=209684030cd2f4f5f097c0aa9c4098f4).

211. 这个冲锋队学校的详情参见：Friedrich, *Spur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bayerischen Oberland*, pp. 56–71.

212. 1945年2月之前，舍普曼和他的家人住在德累斯顿。“因为轰炸而无家可归”之后，他们搬到波茨坦附近的卡普特，4月初抵达施利尔湖；IfZ Archive, ED 467, vol. 51, p. 5.

213. Wagner, ‘Die letzte Schlacht der “alten Kämpfer”’, p. 27.

214. Jens-Christian Wagner, ‘Kriegsende und Befreiung 1945 in Niedersachsen’, p. 7.

215. Daniel Blatman, *The Death Marches: The Final Phase of Nazi Genocide* (Cambridge and London: Belknap, 2011), pp. 228–233; Eleonore Lappin-Eppel, ‘Die Todesmärsche ungarischer Jüdinnen

und Juden durch die Steiermark', in Heimo Halbrainer, Gerald Lamprecht, and Ursula Mindler (eds), *NS-Herrschaft in der Steiermark: Positionen und Diskurse* (Vienna: Böhlau, 2012), pp. 385–410, here pp. 401–410; idem, *Ungarisch-jüdische Zwangsarbeiter und Zwangsarbeiterinnen in Österreich 1944/45: Arbeitseinsatz – Todesmärsche – Folgen* (Wien: Lit, 2010).

216. Biddiscombe, 'End of the Freebooter Tradition', pp. 70–71. 自由军团在绍尔兰地区军事行动的详情（包括对平民实施的暴力行动）参见：Timm, *Freikorps 'Sauerland' im Deutschen Volkssturm*, pp. 49–69.

217. Biddiscombe, 'End of the Freebooter Tradition', pp. 71–72. 这一夜的死亡总人数为16人。关于“彭茨贝格杀人夜”及其背景，另见：Tenfelde, *Proletarische Provinz*, pp. 369–382.

218. 引自：Friedrich, *Spur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p. 70.

219. 引自：Mathias Brüggemann, 'In der Weser schwammen SA-Uniformen', *Neue Westfälische*, 6 April 2015, http://www.nw.de/lokal/kreis_hoexter/hoexter/hoexter/20424355_In-der-Weser-schwammen-SA-Uniformen.html.

220. 类似的想法参见托马斯·屈内2015年6月在汉诺威“‘民族共同体’所在的地方”大会上的发言，这里引用的话根据如下著作：Johannes Hürter and Matthias Uhl, 'Hitler in Vinnica: Ein neues Dokument zur Krise im September 1942',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3:4 (2015), pp. 581–639, here p. 598.

221. Blatman, *The Death Marches*, p. 419.

第9章

1. SA-Rottenführer Schwalke, 'Wir sind das ordnende unter den Völkern', *Die SA* 2:28 (1941) (11 July), pp. 1–2.

2. 这个饭店位于威廉广场，也曾是希特勒1933年之前数年选择的柏林居住地。

3.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ersonal Notes of the Ambassador Adolf-Heinz Beckerle I: 20 July 1941–16 February 1943), pp. 1–2 (entry from 20 July 1941).

4. Klaus Thörner, 'Der ganze Südosten ist unser Hinterland': *Deutsche Südosteuropapläne von 1840 bis 1945*, university diss., University of Oldenburg, 2000, pp. 421–425, 447, 496–497, <http://oops.uni-oldenburg.de/409/1/442.pdf>.

5. 这些人的传略参见如下著作的对应条目：Auswärtiges Amt (ed.),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s deutschen Auswärtigen Dienstes*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0–8), vol. 1, pp. 88–89 (Beckerle); vol. 2, pp. 414–415 (von Jagow); vol. 2, p. 480 (Kasche); vol. 2, p. 532 (von Killinger); vol. 3, p. 131 (Ludin). 关于贝克勒，另见：Susanne Meinl, 'Adolf Heinz Beckerle, Frankfurter SA-Führer, Polizeipräsident und Diplomat', http://www.ffimhist.de/ffim33-45/portal01/mitte.php?transfer=t_ak_beckerle_01. 对具有冲锋队背景的德国公使的总体介绍参见：Eckart Conze et al.,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unich: Blessing, 2010), pp. 165–166; Sebastian Weitkamp, 'Kooperativtäter – die Beteilig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an der NS-Gewaltpolitik jenseits der "Endlösung"', in Hürter and Mayer, *Das Auswärtige Amt und die NS-Diktatur*, pp. 197–217, here pp.

213–215; Browning, 'Unterstaatssekretär Martin Luther', pp. 327–328; Weinke, *Die Verfolgung von NS-Tätern*, pp. 258–286.

6. 最近对1945年前后德国外交持续性和变化的最新争议，参见：Conze,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Martin Sabrow and Christian Mentel (eds), *Das Auswärtige Amt und seine umstrittene Vergangenheit: Eine deutsche Debat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13); Johannes Hürter and Michael Mayer (eds), *Das Auswärtige Amt in der NS-Diktatur* (Berlin: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14); Thomas W. Maulucci, 'German Diplomats and the Myth of the Two Foreign Offices', in David Messenger and Katrin Paehler (eds), *A Nazi Past: Recasting German Identity in Postwar Europe*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15), pp. 139–167. 这四本著作中对冲锋队外交官都仅在少数脚注中提及。

7. 这方面值得牢记的是，对希特勒和他那一代人来说，一战期间两名最高军事指挥官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确立的军事独裁制度形成了他们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因素。希特勒一贯试图避免可能导致军队获得更大独立性、损害纳粹意识形态目标的局面。

8.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 98 (entry from 13 November 1941). 路德在1942年被提升为冲锋队旅队长。关于路德及其在外交部的核心作用，参见：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A Study of Referat D III of Abteilung Deutschland 1940–1943*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8); idem, 'Unterstaatssekretär Martin Luther'; Hans-Jürgen Döscher, *Das Auswärtige Amt im Dritten Reich: Diplomatie im Schatten der 'Endlösung'* (Berlin: Siedler, 1987), pp. 205–207; idem, 'Martin Luther – Aufstieg und Fall eines Unterstaatssekretärs', in Ronald Smelser, Enrico Syring, and Rainer Zitelmann (eds), *Die braune Elite II*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3), pp. 179–192.

9.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 9 (entry from 27 July 1941). 对早期职业外交官对“纳粹党雇佣兵”的批评，另见：Maulucci, 'German Diplomats and the Myth of the Two Foreign Offices', p. 146.

10. 战后，贝克勒强调其家庭、宗教及爱国背景，参见：Weinke, *Die Verfolgung von NS-Täter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p. 264.

11. 例如，可参见他在1942年1月25日、2月5日和1943年3月6日的日记：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p. 143 and 150; idem, vol. 59/3 (Personal Notes of the Ambassador Adolf-Heinz Beckerle II: 17 February 1943–9 August 1944), p. 9. 与之类似齐格弗里德·卡舍有一个金色笔记本，记录了他的格言和思想，涵盖了1938–1944年；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24.

12. Heinz Edelmann [Adolf-Heinz Beckerle], *Wir wollten arbeiten: Erlebnisse deutscher Auswanderer in Südamerika* (Frankfurt am Main: Diesterweg, 1942).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人命运的故事，同时描绘了同时代的总体政治发展：主角在收到希特勒出狱的消息时决定返回德国。

13. 亨宁·冯·雅戈2015年4月5日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4. 这些旅程中，陪伴冯·基林格的是后来成为对手的埃德蒙·维森迈尔及冲锋队同僚威利·勒德尔，勒德尔后来成了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和布加勒斯特的左右手，还在罗马尼亚建立了“德国信息服务三处”分支机构，该机构是冯·里宾特洛甫在外交部内的个人情报机构。参见：Igor-Philip Matić, *Edmund Veesenmayer: Agent und Diploma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xpansionspolitik* (Munich: Oldenbourg, 2002), pp. 91–94; Khristoforov, *Oberführer SA Villi Redel*, pp. 48–55.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15. 严格地说，冯·基林格只是部分属于因为政治原因而在1940–1941年得到任命的冲锋队外交官，他似乎已经是个隐退者，是一位需要合适职务以便远离政治的资深纳粹党领导人。冯·基林格生于1886年，因此比其他冲锋队将领的平均年龄大15岁。他在魏玛时代出版的书记证明了唯利是图的本性；参见：Manfred von Killinger, *Ernstes und Heiteres aus dem Putschleben* (Berlin: Vormarsch, 1928); idem, *Die SA in Wort und Bild* (Leipzig: Kittler, 1933)。冯·基林格20世纪30年代在萨克森的政治生涯详见：Andreas Wagner, *Mutschmann gegen von Killinger: Konfliktlinien zwischen Gauleiter und SA-Führer während des Aufstiegs der NSDAP und der 'Machtergreifung' im Freistaat Sachsen* (Beucha: Sax, 2001)；关于他生活的其他方面，参见博特·瓦夫齐内克详尽但过分同情的描述：Bert Wawrzinek, *Manfred von Killinger (1886–1944): Ein politischer Soldat zwischen Freikorps und Auswärtigem Amt* (Preußisch Oldendorf: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2003)。

16. 因此，他们组成了特殊的“精英网络”，鲁迪格·哈赫特曼最近将其称为“纳粹体系的润滑油”。参见：Rüdiger Hachtmann, 'Allerorten Mobilisierung? Vorschläge, wie mit Schlagworten in de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NS-Diktatur umzugehen ist', in Oliver Werner (ed.), *Mobil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stitutionen und Regionen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und der Verwaltung des 'Dritten Reiches' 1936 bis 1945*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3), pp. 69–85, here pp. 79–83.

17. 亨宁·冯·雅戈回忆了他们一家与卡舍一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前往施蒂利亚旅游，以及二战后与卢丁的孩子们共度的家庭假日。埃拉·卢丁是他的教母，他还记得卡舍的遗孀后来多次造访冯·雅戈一家在康斯坦茨湖（博登湖）畔丁格尔斯多夫的住宅。

18. 参见通信集：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3.

19. 另见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凯特尔元帅1941年7月16日在元首办公室举行的会议的备忘录：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d.),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D (1937–1945)*, vol. 13: *The War Years, June 23–December 11, 194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pp. 149–156, here p. 154.

20.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 69 (entry from 4 October 1941).根据罗森贝格的日记，他最初曾推荐东普鲁士大区领袖埃里希·科赫担任这一职务。参见：Matthäus and Bajohr (eds), *Alfred Rosenberg: Die Tagebücher*, pp. 397–399 (entry from 20 July 1941).罗森贝格与卡舍于9月底在“首次未来俄罗斯帝国专员辖区说明会”上见面。同上，P.424。

21.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 73 (entry from 10 October 1941).相反，冯·雅戈的儿子亨宁·冯·雅戈生于1934年，在他的回忆中，匈牙利的岁月对父母来说是“快乐时光”。然而，因为德国大使的许多社会义务，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经常找不到父母”，主要由家庭女教师抚养；亨宁·冯·雅戈2015年4月5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2. 同上。

23. 参见：Michael Wildt, *An Uncompromising Generation: The Nazi Leadership of the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首个德语版本标题为：*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2）。

24. BArch Berlin, NS 19/2798, pp. 1–3: Letter from SS-Brigadeführer Gottlob Berger to Himmler, 17 April 1941. 这一点另见：Döscher, *Das Auswärtige Amt im Dritten Reich*, pp. 205–206;

Browning, 'Unterstaatssekretär Martin Luther', p. 327.

25. 战后，弗里茨·冯·特瓦多夫斯基于1950年被任命为联邦新闻办公室副主任，1952–1955年任驻墨西哥大使。这方面值得一看的是特瓦多夫斯基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书籍，当时他年已80岁：Fritz von Twardowsky, *Anfänge der deutschen Kulturpolitik im Ausland* (Bonn: Inter Nationes, 1970).

26. 国防军将领、前奥地利副总理及驻克罗地亚独立国全权代表埃德蒙·冯·霍斯特瑙确认了这一信息。根据冯·霍斯特瑙的说法，卢策曾向冯·里宾特洛甫抱怨，只有党卫队人员被外交部录用。此后，冯·里宾特洛甫同意任命4名高级冲锋队员作为公使。参见：Horstenau, *Ein General im Zwielficht*, vol. 3, p. 91. 关于霍斯特瑙，另见：Georg Christoph Berger Waldenegg, '“From My Point of View, I Never Ceased Being a Good Austrian”: The Ideology and Career of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 in Martyn Rady and Rebecca Haynes (eds),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Personalities of the Righ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I. B. Tauris, 2011), pp. 313–328.

27. BArch Berlin, NS 19/3872, pp. 1–2: Letter from SS-Brigadeführer Gottlob Berger to Himmler, 26 April 1941.

28. 详细分析参见第7章。

29. Horstenau, *Ein General im Zwielficht*, vol. 3, pp. 188–189.原纳粹党驻奥地利“全国督察”特奥多尔·哈比希特确认了这一看法。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希姆莱和罗森贝格有一次“公开冲突”，因为后者“偏向”冲锋队（BArch-Militärarchiv, Freiburg im Breisgau, MSg 2/12955, Diary of Theodor Habicht, entry from 7 July 1941）。感谢费利克斯·罗默为我提供了哈比希特日记的摘要。关于罗森贝格与冲锋队持续的紧密关系，另见：RGVA, Osobyi Archives, Fond 1212, Opis 2, no. 17, pp. 47–50: Protocol of a meeting between SA-Obergruppenführer Luyken and Dr Stellrecht in the Dienststelle Reichsleiter Rosenberg, 19 July 1943.

30. 这一备忘录（Nuremberg document 221-L）的英语翻译版由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全文印刷：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D*, vol. 13, pp. 149–156.

31. 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陆军元帅凯特尔在元首办公室会谈的备忘录，P.150。

32. 舍普曼与本内克的传记参见前几章提供的信息。关于曼泰的情况参见：Joachim Lilla, Martin Döring, and Andreas Schulz (eds), *Statisten in Uniform: Die Mitglieder des Reichstags 1933–1945: Ein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Unter Einbeziehung der völkischen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ichstagsabgeordneten ab Mai 1924* (Düsseldorf: Droste, 2004), p. 399. 关于德雷克斯勒，参见：Sven Jüngerkes, 'Bürokratie als Stabilisierungs- und Destabilisierungsmechanismus: Das "Reichskommissariat für das Ostland" 1941–1944', in Sven Reichardt and Wolfgang Seibel (eds), *Der prekäre Staat: Herrschen und Verwalt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0), pp. 275–298, here p. 279.

33. 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陆军元帅凯特尔在元首办公室会谈的备忘录，P.153。

34. BArch Berlin, NS 23/166: Dr Otto, 'SA-Obergruppenführer und Diplomat' (autumn 1941). 马克·马佐韦尔最近提出，应该将纳粹的欧洲“民族共同体”看成是克服国联在少数民族权

利与国家主权上制约的有意尝试，这一思路比通常声称的更深植于国际化的传统思想；Mark Mazower,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Bulletin of the GHI* 50 (2012), pp. 9–26.

35. BArch Berlin, NS 23/166: Letter from SA-Gruppenführer Thomas Girgensohn to OSAF Schrifttum, 10 November 1941.

36. 冯·霍斯特瑙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将卡舍出任驻克罗地亚公使视为“克罗地亚帝国专员”的预兆。参见：Horstenau, *Ein General im Zwielicht*, vol. 3, p. 90.

37. 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陆军元帅凯特尔在元首办公室会谈的备忘录，P.150.

38. 关于冯·雅戈1933年春季的活动，参见：HStA Stuttgart (Hauptstaatsarchiv Stuttgart), E 130 b Bü 1859.

39. 关于冯·雅戈任符腾堡“帝国专员”的情况，参见：Jill Stephenson, *Hitler's Home Front: Württemberg under the Nazis*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6), pp. 42–43; Hachmann, 'Der "Degen"', pp. 277–279. 关于贝克勒任警察局长的情况，参见：Meinl, 'Adolf Heinz Beckerle'.

40. 引自：von Horstenau, *Ein General im Zwielicht*, vol. 3, p. 90.

41. 除了如下划时代研究之外（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London: W. H. Allen, 1961]; Saul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vol. 1: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vol. 2: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 Piper, 1998]），著名的例外包括马丁·迪安等人的对比研究：Martin Dean, *Robbing the Jews: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in the Holocaust, 1933–1945*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ristopher Browning, *Die 'Endlösung' und das Auswärtige Amt: Das Referat D III der Abteilung Deutschland 1940–1943*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Eduard Nižňanský, 'The Discussions of Nazi Germany on the Deportation of Jews in 1942 – The Examples of Slovakia, Rumania and Hungary', in *Historický časopis* 59 (2011), Supplement, pp. 111–136. 另见马克斯·明茨现已被人遗忘的开创性专题，其中说明了德国对东欧盟国政策的法律后果：*Die Verantwortlichkeit für die Judenverfolgungen im Ausland währe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inaugural diss.,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zu Frankfurt am Main, 1958.

42. 特别参见：Tatjana Tönsmeier,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Slowakei 1939–1945: Politischer Alltag zwischen Kooperation und Eigensinn*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3), pp. 335–339.

43. Dean, *Robbing the Jews*, pp. 317–322.

44. Nižňanský, 'The Discussions of Nazi Germany on the Deportation of Jews in 1942', p. 112.

45. 特别参见：Browning, *Die 'Endlösung' und das Auswärtige Amt*, pp. 143–174.

46. Jozef Tiso, *Die Wahrheit über die Slowakei: Verteidigungsrede gehalten am 17. und 18. März 1947 vor dem 'National'-Gericht in Bratislava*, ed. by Jon Sekera (published 'in exile', 1948), p. 48.

47. Lotte Weiss, *Meine zwei Leben: Erinnerungen einer Holocaust-Überlebenden* (Münster: Lit,

2010), pp. 176–177.

48. Tiso, *Die Wahrheit über die Slowakei*, p. 167.

49. Dean, *Robbing the Jews*, pp. 319–320.

50.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 1, pp. 52–56, here p. 54: Testimony made under oath by Aron Grünhut, 13 January 1960; Oskar Neumann, *Im Schatten des Todes: Vom Schicksalskampf des slowakischen Judentums* (Tel Aviv: Olamenu, 1956), p. 53.

51. 卢丁1941年12月4日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见于：Nižňanský (ed.), *Holokaust na Slovensku*, vol. 4, pp. 111–112.

52. Neumann, *Im Schatten des Todes*, pp. 67, 96–98. In August 1944 the FS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Heimatschutz Slowakei*;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 4, p. 780: Testimony of Walter Postl, 23 June 1967.

53.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21808, pp. 103–105: Testimony of Ferdinand Durcansky, 28 February 1964;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 1, p. 86: Verbal note from the Deutsche Gesandtschaft Bratislava to the Slovak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1 May 1942.

54. 卢丁1942年4月6日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见于：Nižňanský (ed.), *Holokaust na Slovensku*, vol. 4, p. 127.

55. Nižňanský, 'The Discussions of Nazi Germany on the Deportation of Jews in 1942', p. 119.

56. 同上，p. 120.

57.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21808, pp. 34–36: Letter from Franz Karmasin to Heinrich Himmler, 29 July 1942.

58. 同上，p. 135: Notation of the Staatsanwaltschaft München, 10 July 1964. Wisliceny's counterpart in Slovakia was the 'Jew king' Anton Vosek, head of Department XIV of the Slovak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Neumann, *Im Schatten des Todes*, p. 65. 关于党卫队驻斯洛伐克顾问的角色——但没有提到卢丁——参见：Tatjana Tönsmeier, 'The German Advisors in Slovakia, 1939–1945: Conflict of Co-operation?', in Mark Cornwall and R. J. W. Evans (eds), *Czechoslovakia in a Nationalist and Fascist Europe 1918–19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9–184.

59. PAAA, Personalakten, no. 9246, p. 40: Cable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to Ludin, 26 July 1944. 这次会议的准确时间尚不清楚。

60. Dean, *Robbing the Jews*, p. 324;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München, no. 34835, vol. 2, pp. 257–8: Notation of the Bavarian Landeskriminalamt München, 8 January 1965.

61. 1938年10月，该党更名为“德意志党”。

62. 1945年后，卡尔玛森在德国美占区避难，最初使用假名。布拉迪斯拉发人民法院于1948年6月22日缺席判处他死刑。但是，德国当局没有将他交出，卡尔玛森在西方开启了第二段职业生涯，担任记者和苏台德德意志族人同乡会（斯洛伐克被驱逐德意志族人的组织）官员。战后德国流言称，他接受了原冲锋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汉斯·格梅林的许多帮助，格梅林是1941–1945年间卢丁在德国驻布拉迪斯拉发大使馆的副官，1954–1974年被选举为图宾根市长。卡尔玛森本人也是收复失地运动“维泰克联盟”的成员，他逃过了惩罚并于1970年6月25日以自由身去世。他的生平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详见：Lubomir Lipták, *Franz Karmasin opät na scene* (Bratislava: Vyd-voPolit. Lit., 1962), 以及慕尼黑检察院的大量文件：StA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s 1–33.

63. Wagner, *Sudeten SA in Polen*.

64.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21808, pp. 12–19; BDC—Documents of Franz Karmasin.

65. 这方面的情况另见：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 1, pp. 52–56: Testimony made under oath by Aron Grünhut, 13 January 1960.

66.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21808, pp. 34–36: Letter from Franz Karmasin to Heinrich Himmler, 29 July 1942.

67. 这种诠释与卢丁战后的辩护策略相符；参见：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 3, p. 560: Testimony of Norbert Münz, 14 October 1965. 卡尔玛森的观点参见：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 5, pp. 1,215–1,216: Testimony of Franz Karmasin, 28 October 1969.

68. 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 1, p. 86: Verbal note from the Deutsche Gesandtschaft Bratislava to the Slovak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1 May 1942.

69. 同上：vol. 6, p. 1,290: Testimony of Josef Hotovy, 14 November 1969. 与我的发现相反，卢丁的代理人汉斯·格梅林在1970年声称，季索1942年告知卢丁对犹太人进行的系统性屠杀后，他曾经威胁辞职，自愿赴前线服役。参见：StA München, Staatsanwaltschaften, no. 34835, vol. 6, p. 1,454: Testimony of Hans Gmelin, 5 March 1970.

70. Korb, *Im Schatten des Weltkriegs*, pp. 111–112. 相反的评判参见：Conze et al.,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p. 280.

71. Conze et al.,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p. 280. 但是，这些文献对比不仅限于卡舍。例如，意大利的鲁道夫·拉恩人称“外交官中的卡尔·迈”；参见：Lutz Klinkhammer, *Zwischen Bündnis und Besatzung: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und die Republik von Salò 1943–1945* (Tübingen: Niemeyer, 1993), p. 142. 希特勒和卡舍对克罗地亚政治的看法在1943年和1944年渐行渐远，参见卡舍在1943年10月29日、1944年5月30日和1944年9月16日与希特勒会面的记录：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23, pp. 5–17.

72. Conze et al.,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pp. 280–281; Korb, *Im Schatten des Weltkriegs*, pp. 195–6. 对乌斯塔沙政权反犹太性质的详细讨论：同上，pp. 136–146.

73. 对乌斯塔沙政权暴行及卡舍对克罗地亚方面宽容立场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畴。参见约若·托马塞维奇等人的出色分析：Jozo Tomasevich,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 1941–1945: 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vo Goldstein, *The Holocaust in Croatia* (Pittsburgh, PA: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6); and Korb, *Im Schatten des Weltkriegs*, as well as the more partisan account of Lazo M. Kostich, *The Holocaust in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 An Account Based on German, Italian and Other Sources* (Chicago, IL: Liberty, 1981), pp. 6–7, 43–46, 145–146.

74. 卡舍关于这次会议的看法，参见他1941年6月4日给外交部的电报：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s D, vol. XII: 1937–1941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9), pp. 796–798.

75. 进一步的参考请看: Korb, *Im Schatten des Weltkriegs*, p. 204.
76. Browning,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p. 93.
77. Münz, *Die Verantwortlichkeit für die Judenverfolgungen im Ausland*, p. 209.
78. Korb, *Im Schatten des Weltkriegs*, p. 413.
79. 同上, P.419。
80. Conze et al.,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pp. 280–281.
81. 详细的讨论(其中被驱逐以及在奥斯维辛遭屠杀的人数稍低一些)参见: Tomislav Dulić, 'Mass Killing in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 1941–1945: A Cas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8:3 (2006), pp. 255–281.
82. Gerhard Köpernik, *Faschisten im KZ: Rumäniens Eiserne Garde und das Dritte Reich* (Berlin: Frank & Timme, 2014), pp. 97–103; Andrej Angrick, 'Rumänien, die SS und die Vernichtung der Juden', in Mariana Hausleitner, Brigitte Mihok, and Juliane Wetzel (eds), *Rumänien und der Holocaust: Zu den Massenverbrechen in Transnistrien 1941–1944* (Berlin: Metropol, 2001), pp. 113–138, here p. 122; Michael Kroner, 'Ahnungslosigkeit oder Hochverrat? Manfred von Killinger in Bukarest 1941–1944', *Südostdeutsche Vierteljahresblätter: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und Kunst, Geschichte und Zeitgeschichte* 43 (1994), pp. 123–132.
83.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s D*, vol. XII: 1937–1941, pp. 11, 18–20, 140–4. 另见安东内斯库1941年2月25日写给基林格的信: IfZ Archiv, Bestand Reichsführer–SS, MA 325, vol. 1, pp. 9,017–19.
84. Wawrzinek, *Manfred von Killinger*, p. 210.
85. Ion Georghe, *Rumäniens Weg zum Satellitenstaat* (Heidelberg: Vowinckel, 1952), pp. 124–128; Kroner, 'Ahnungslosigkeit oder Hochverrat?', p. 124.
86. 根据罗马尼亚政治家们的日记, 德裔罗马尼亚历史学家米夏埃尔·克罗纳曾提出, 冯·基林格可能参与了罗马尼亚政府与盟国之间的谈判, 因此可能故意不通知外交部。但是这种论点似乎主要基于未经证实的推测。参见: Kroner, 'Ahnungslosigkeit oder Hochverrat?', pp. 124–128.
87. Münz, *Die Verantwortlichkeit für die Judenverfolgungen im Ausland*, p. 144.
88. 关于里希特、莱卡和他们的关系, 参见: Dennis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 Romania, 1940–1944*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6), pp. 113, 121–122.
89. Münz, *Die Verantwortlichkeit für die Judenverfolgungen im Ausland*, p. 164.
90. Wolfgang Benz, 'Der "vergessene Holocaust": Der Sonderfall Rumänien: Okkupation und Verfolgung von Minderheiten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Hausleitner, Mihok, and Wetzel, *Rumänien und der Holocaust*, pp. 9–13.
91. 犹太人不是这种强制同化政策的唯一受害者。多达3万名罗姆人也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 大部分未能幸存。参见: Brigitte Mihok, 'Die Verfolgung der Roma: Ein verdrängtes Kapitel der rumänischen Geschichte', in Hausleitner, Mihok, and Wetzel, *Rumänien und der Holocaust*, pp. 25–31.
92. Mariana Hausleitner, 'Großverbrechen im rumänischen Transnistrien 1941–1944', in Hausleitner, Mihok, and Wetzel, *Rumänien und der Holocaust*, pp. 15–24; Dalia Ofer, 'The Holocaust

in Transnistria: A Special Case of Genocide', in Lucjan Dobroszycki and Jeffrey S. Gurock (eds), *The Holocaust in the Soviet Union: Studies and Sources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in the Nazi-occupied Territories of the USSR, 1941–1945* (New York: Sharpe, 1993), pp. 133–154. 奥费尔也讨论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当地犹太人的命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占领的前几天被德国特别行动队杀害。

93. Münz, *Die Verantwortlichkeit für die Judenverfolgungen im Ausland*, p. 165.

94. Browning, *Die 'Endlösung' und das Auswärtige Amt*, pp. 163–164;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pp. 205–229.

95.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pp. 213–214.

96. 里希特早在1942年4月就在《布加勒斯特人报》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参见：Lya Benjamin, 'Die "Judenfrage" in Rumänien im Spiegel des "Bukarester Tageblatts"', in Hausleitner, Mihok, and Wetzel (eds), *Rumänien und der Holocaust*, pp. 139–152, here p. 141.

97. 引自：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pp. 210–211.

98. 但是在1943年春季，冯·基林格代表德国交涉，阻止犹太儿童从罗马尼亚移民；参见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p. 216.

99.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 156 (entry from 19 February 1942).

100. IfZ Archiv, Bestand Befehlshaber Serbien, MA 512, pp. 917–918: Cable from Beckerle to the Foreign Office, 27 July 1941.

101. Frederick B. Chary,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2), p. 48.

102. Stefan Troebst, 'Rettung, Überleben oder Vernichtung? Geschichtspolitische Kontroversen über Bulgarien und den Holocaust', *Südosteuropa: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59:1 (2011), pp. 97–127, here pp. 104–105; Browning, *Die 'Endlösung' und das Auswärtige Amt*, p. 172.

103. Dean, *Robbing the Jews*, pp. 335–337.

104. Chary,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p. 51 and 69.

105. Browning, *Die 'Endlösung' und das Auswärtige Amt*, pp. 172–173; Chary,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p. 72–73.

106.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 313 (entry from 16 February 1943).

107. Dean, *Robbing the Jews*, p. 339.

108. 贝克勒1943年3月3日的日记，其中总结了与丹内克尔的谈话，表明他已经得知这些驱逐计划并表示同意：“3月15日起，应该有8列火车出发，驱逐2万名犹太人（每车2500人）。由于尚有空间，应该包含2000名来自索菲亚的犹太人。我们认为最好是驱逐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他们总是给雅利安化带来麻烦。我不同意求助索菲亚，那将造成很多杂音，危及未来的整个行动。首先，送走其他犹太人，然后（我们驱逐）所有来自索菲亚的犹太人！”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3, p. 7 (entry from 3 March 1943).

109. Todorov Tzvetan,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Why Bulgaria's Jews Survived the Holocau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1), pp. 8–11.

110.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3, p. 48 (entry from 10 May 1943).

111. Todorov,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p. 13;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3, p. 80 (entry from 21 July 1943).

112. Christian Neef, 'Die schlimmste Stunde', *Der Spiegel*, 24 October 2011,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81136856.html>.

113. 'Streiflichter aus Litzmannstadt', in Rudolf von Elmayer-Veestenbrugg (ed.), *SA-Männer im feldgrauen Rock: Taten und Erlebnisse von SA-Männern in den Kriegsjahren 1939–1940* (Leipzig: v. Hase & Koehler, 1941), pp. 30–34, here pp. 31–32. 贝特勒对“犹太污垢”的偏执看法并没有阻止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搬进法兰克福的一套“雅利安化”别墅；参见：Meinl, 'Adolf Heinz Beckerle'。

114.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p. 150 and 217 (entries from 4 February and 20 August 1942).

115.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3, p. 67 (entry from 19 June 1943).

116.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p. 86 and 235 (entries from 26 October 1941 and 15 September 1942). 根据贝特勒的日记，他经常很晚才睡觉，整个白天都在天台上晒日光浴。

117. PAAA, *Personalakten*, no. 647, pp. 27–29: SD—Report to the Foreign Office on the flight of the Germans from Bulgaria, 18 December 1944.

118. 关于冯·雅戈的传记，参见哈希曼信息丰富的文章：Hachmann, 'Der "Degen"', pp. 267–287。

119. 即使在战时，1941—1944年初德国驻匈牙利外交官的生活仍然不会令人不快。1941年8月底，冯·雅戈要求额外拨款，从汉堡、里斯本或者的里雅斯特自由港口中的一个购买“大量食物、饮料和香烟”，因为匈牙利没有足够数量的奢侈品；PAAA, *Personalakten*, no. 6681, p. 15: Letter from von Jagow to the Foreign Office, 30 August 1941。

120. Hachmann, 'Der "Degen"', p. 284.

121. 德国人对这一事务的讨论也包括了财务上的考虑。艾希曼认为，部分驱逐——驱逐匈牙利的所有“非法”犹太人——需要和全部驱逐一样多的资源。参见：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 524.

122. Münz, *Die Verantwortlichkeit für die Judenverfolgungen im Ausland*, pp. 180–95. 另见维森迈尔1943年4月的备忘录：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s E, vol. XI: 1941–1945, pp. 78–80.

123. 不过，这方面有重要的例外情况，匈牙利早在1941年就驱逐了没有匈牙利公民身份的犹太人。最著名的是1941年8月的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大屠杀，德国特别行动队和党卫军部队在乌克兰杀害了2万名此前从匈牙利驱逐而来的犹太人。参见：Andrej Angrick, *Besatzungspolitik und Massenmord: Die Einsatzgruppe D in der südlichen Sowjetunion 1941–1943*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3), pp. 196–206; Randolph L. Braham, 'The Kamenets Podolsk and Délvidék Massacres: Prelude to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Yad Vashem Studies* 9 (1973), pp. 133–156.

124. Margit Szöllösi-Janze, *Die Pfeilkreuzlerbewegung in Ungarn: Historischer Kontext, Entwicklung und Herrschaft* (Munich: Oldenbourg, 1989), pp. 426 and 432.

125.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 530; Randolph L. Braham, *The Destruction of Hungarian Jewry: A Documentary Account* (New York: Pro Arte, 1963), p. 160. 这是里宾特洛甫要求加强外交努

力，开始驱逐所有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丹麦的犹太人的后果；参见卢策1942年9月24日给维扎克尔的照会，同上，P.133。

126. 同上，pp.165–171；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 530。

127. 参见维森迈尔在外交部的个人文件（PAAA, Personalakten, no. 15789）。第一次正式会见国王时，维森迈尔表达了对匈牙利与德国并肩作战，以及在“消灭所有威胁匈牙利人民及国家的颠覆分子”（指犹太人）之后最终取得胜利的期望。同上，P.30。

128. Krisztian Ungváry, 'Robbing the Dead: The Hungarian Contribution to the Holocaust', in Beata Kosmala and Feliks Tych (eds), *Facing the Nazi Genocide: Non-Jews and Jews in Europe* (Berlin: Metropol, 2004), pp. 231–61, here pp. 231–233.

129 数字来自：Szöllösi-Janze, *Die Pfeilkreuzlerbewegung in Ungarn*, p. 426.

130. 1944年春季离开匈牙利之后，冯·雅戈的妻子和7名子女（包括一名新生儿）从布达佩斯搬到巴拉顿湖畔，然后前往瓦尔特大区更为安全的格罗斯明兴。这家人居住的宅院很有可能是冲锋队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取得的地产，目的是在战后将其改造成冲锋队领导力学校（参见第7章），但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随着苏军逼近，冯·雅戈一家于1944年底或1945年初逃往柏林，1945年3月又迁至康斯坦茨。我要感谢亨宁·冯·雅戈耐心地回答关于他们家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经历的问题。

131. Erich Murawski, *Der deutsche Wehrmachtsbericht 1939–1945: Ein Beitrag zur Untersuchung der geistigen Kriegsführung: Mit einer Dokumentation der Wehrmachtsberichte vom 1.7.1944 bis zum 9.5.1945* (Boppard am Rhein: Boldt, 1962), pp. 443–444.

132. Klinkhammer, *Zwischen Bündnis und Besatzung*, pp. 148–150.

133. Hachmann, 'Der "Degen"', p. 286; Rudolf Rahn, *Ruheloses Leben: 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 (Stuttgart and Zurich: Europäischer Buchklub, 1951), p. 440; 亨宁·冯·雅戈2015年4月5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34. Moshe Zimmermann, 'Das Auswärtige Amt und der Holocaust', in Johannes Hürter and Michael Mayer (eds), *Das Auswärtige Amt in der NS-Diktatur* (Berlin: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14), pp. 165–176, here p. 173.

135. Rahn, *Ruheloses Leben*, p. 390.

136. Horstenau, *Ein General im Zwielicht*, vol. 3, p. 90. See also Döscher, *Das Auswärtige Amt im Dritten Reich*, p. 206, with further references.

137. Horstenau, *Ein General im Zwielicht*, vol. 3, p. 91.

138. 对这一主题的广泛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畴。有必要时可以参见马格努斯·布雷希特肯的评论：Magnus Brechtken, 'Auswärtiges Amt, Sicherheitsdienst und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1933 bis 1942', in *Das Auswärtige Amt in der NS-Diktatur*, ed. Hürter and Mayer, pp. 151–164, here pp. 163–164.

139. 参见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的细致分析：Adolf-Heinz Beckerle, 'Die Neuordnung in Rumänien und die Legionärsbewegung Codreanu', *Die SA* 1:38 (1940), pp. 6–12.

140. Wagner, *Sudeten SA in Polen*, unpaginated.

141. IfZ Archiv, Bestand Sicherheitsdienst Reichsführer-SS, MA 650, pp. 4,982–4,988: SD-Report from SS-Hauptsturmführer Dr Börsch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lovakia, 1943.

142. 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2, p. 156 (entry from 19 February 1942).
143. 参见卡舍在1943年11月5日写给冯·里宾特洛甫的信，其中对自己的立场做了详细的辩解：PAAA, 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 vol. 23, pp. 26–30, esp. pp. 27–28.
144. 引自：Chary,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 7. 关于贝克勒天真地信任保加利亚同行的情况，参见：PAAA, Gesandtschaft Sofia, vol. 59/3, p. 4 (entries from 23 and 24 February 1943).
145. 参见：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146. Döschel, *Das Auswärtige Amt im Dritten Reich*, pp. 256–261.
147. PAAA, Personalakten, no. 9246, pp. 54–56: Göpfert to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27 October 1944.
148. Kroner, 'Ahnungslosigkeit oder Hochverrat?', p. 131.
149. 这一判决参见：USHMM, RG-57.004: *Selected Records of Trials of the National Court of Slovakia, Including the Jozef Tiso Trial, 1910–1975*. 关于这些审判，另见：Bradley Abrams,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The Trial of Jozef Tiso in the Czechoslovak Environment', in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eds),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52–289.
150. 对卡舍的判决参见：HDA, HR-HDA-1561, Sg 013.0.47, File Slavko Kvaternik and others. 起诉书由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总检察长雅科夫·布拉热维奇撰写，指控他助力“对我国人民的肉体毁灭和财产掠夺”。更具体地说，它提到了卡舍在1941年6月4日于德国大使馆举行的臭名昭著的会议中的作用，以及他在“组织对南斯拉夫犹太人恐怖袭击、逮捕和折磨”中的作用。卡舍还要为与乌斯塔沙政权勾结迫害共产党人、组建二战中与德国共同作战的所谓“志愿旅”负责。我要感谢伦敦的博扬·阿列克索夫在翻译这些文件中相关内容时给予的帮助。
151. PAAA, Personalakten, no. 647, pp. 23–24: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Swiss Embassy, 5 October 1944; 'Russians Arrest Nazi Ministers', *Manchester Guardian*, 22 September 1944, p. 5.
152. Meinl, 'Adolf Heinz Beckerle'; Neef, 'Die schlimmste Stunde'.
153. 对贝克勒的审判参见：Weinke, *Die Verfolgung von NS-Tätern*, pp. 258–286; Meinl, 'Adolf Heinz Beckerle'.
154. 冯·雅戈和卢丁家族的幸存者如今仍然保持接触。战后，卢丁的子女在冯·雅戈一家位于康斯坦茨湖畔丁格尔斯多夫的住宅度过了多个暑假，冯·雅戈一家也曾造访卢丁家族在上施瓦比亚奥斯特拉赫附近施洛斯勒霍夫的住宅（现已拆毁）；亨宁·冯·雅戈2015年4月5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55. Malte Ludin, *2 oder 3 Dinge, die ich von ihm weiß*, BRD, 2005. See also Régine-Mihal Friedman, 'All About My Mother – On Malte Ludin's Film *2 oder 3 Dinge, die ich von ihm weiß* (2005)', in José Brunner (ed.), *Mütterliche Macht und väterliche Autorität: Elternbilder im deutschen Diskurs*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8), pp. 152–181.
156. 这种“家族遗产”的长期影响另见卢丁之孙女的著作：Alexandra Senfft, *Schweigen tut weh: Eine deutsche Familiengeschichte* (Hamburg: Classen, 2007).

157. Ernst von Salomon, *Der Fragebogen*, 19th ed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2011), pp. 635–668.

158. Malte Ludin, 'Hanns Elard Ludin'. 对萨洛蒙小说及在20世纪50年代初取得成功的原因, 可参见如下详细而有说服力的分析: Parkinson, *An Emotional State*, pp. 73–111 (on Ludin, see pp. 102–3). 对这种代际现象的总体分析参见: Harald Welzer, *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有趣的是, 即使是最近的历史学界也倾向于将卢丁看成相对“温和”的人物, 无视其在斯洛伐克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关键作用。参见: Tatjana Tönsmeier, 'Von der Schutzfreundschaft zur Okkupationsmacht: Die Wahrnehmung des deutschen Einflusses durch die slowakische Elite', in Monika Glettler, L'ubomír Lipták, and Alena Mišková (eds), *Geteilt, besetzt, beherrscht: Die Tschechoslowakei 1938–1945: Reichsgau Sudetenland,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Slowakei* (Essen: Klartext, 2004), pp. 311–325, here p. 316.

159. 卡罗拉·沃尔夫博士2003年1月23日给亨宁·冯·雅戈的信, 引自亨宁·冯·雅戈2015年4月5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60. 在这方面, 恩斯特·冯·维扎克是最突出的案例。吕迪克的著作中有公正的评判: Lars Lüdicke, 'Offizier und Diplomat: Ernst von Weizsäcker im Kaiserreich, Weimarer Republik und "Drittem Reich"', in Jan Erik Schulte and Michael Wala (eds), *Widerstand und Auswärtiges Amt: Diplomaten gegen Hitler* (Munich: Siedler, 2013), pp. 225–249.

161. PAAA, B 83, no. 761: Letter from Hans Kasche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 January 1954. 感谢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安妮特·魏因克指引我查询这一文件。

162. StA München, Spruchkammerakten, K 843, p. 70: Letter from Hans Kasche to Berufungskammer München, 16 September 1954.

163. 1954年的这两个判决参见: StA München, Spruchkammerakten, K 843. 对德国当局而言, 1947年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法庭的判决并不重要。外交部通知卡舍的家人, 在这些案件中, 被告人没有“实质性的法律保障”。参见: StA München, Spruchkammerakten, K 843, p. 67: Letter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to Hans Kasche, 23 February 1954.

164. 关于基辛格在外交部度过的时光, 参见: Philipp Gassert, *Kurt Georg Kiesinger 1904–1988: Kanzler zwischen den Zeiten* (Munich: DVA, 2006), pp. 105–149.

165. PAAA, B 83, no. 761: Letter from Hans–Günther Kasche to Willy Brandt, 16 May 1968.

第10章

1. Hans Rosenthal, 'Das gibt's nur einmal – Noten, die verboten wurden', 引自: Thomas Henschke, *Hans Rosenthal: Ein Leben für die Unterhaltung* (Berlin: Schwarzkopf und Schwarzkopf, 1999), p. 161.

2. 参见: Almut Giesecke, 'Nachwort', in Hans Fallada, *Jeder stirbt für sich allein* (Berlin: Aufbau, 2013), pp. 687–699; Carsten Gansel and Werner Liersch (eds), *Zeit vergessen, Zeit erinnern: Hans Fallada und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Göttingen: V & R Unipress, 2008).

3. 即便考虑法拉达实际上在写作小说时接受了约翰内斯·R·贝歇（“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主席，1954年起为东德首任文化部长）的建议，这一点也依然成立。

4. 对战后德国这一方面的总体评估，参见：Norbert Frei, *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 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德语首版名为：*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Munich: Beck, 1996)。

5. UAK, Archives, Zugang 726 (Theodor Klefisch), File 2, no. 11: Affidavit of the merchant and former SA man Dietrich Bölken, 8 June 1946; File 3, no. 37: Affidavit of the railroad employee and former SA man Reiner Pittinger, 7 June 1946.

6. 另见本书前言。

7. 这一题目暗指欧根·科贡1946年令人大开眼界的分析，*Der SS-Staat*。

8. 尤其应该参阅布赫海姆和布罗萨特的专业意见：Buchheim and Broszat, *Anatomie des SS-Staates*, pp. 218–225, 336–351。

9. Lawrence Douglas, 'The Didactic Trial: Filter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to the Courtroom', *European Review* 14:4 (2006), pp. 513–522, here p. 514.

10. 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第6款，以及国际军事法庭宪章：<http://www.icrc.org/ihl.nsf/FULL/350>。关于“反人类罪”的法律特征，另见赛格瑟尔的详细分析：Daniel Marc Segesser, 'Der Tatbestand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in Kim C. Priemel and Alexa Stiller (eds), *NMT: Die Nürnberger Militärtribunale zwischen Geschichte, Gerechtigkeit und Rechtsschöpfung*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13), pp. 586–604.

11. 最初，只有战争结束时级别在突击大队长或以上级别的冲锋队成员被盟军逮捕并拘禁。到1944年底，这些人的总数预计为3万人左右；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Fort McNair: Supreme Headquarters of the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ed.), *Handbook for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 prior to Defeat or Surrender* (December 1944), unpaginated, http://www.history.army.mil/reference/Finding%20Aids/Mil_gov.pdf.

12. State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IMT, Geoffrey Lawrence, 30 September, in 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llied Control Authority for Germany (ed.) (hereafter 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The Blue Series (Nuremberg, 1947–8), vol. 22, p. 413.

13. IfZ Archive, ZS 251/1: Max Jüttner, 'Führung, Aufgaben und Tätigkeit der SA und Nürnberger Prozess'.

14. 同上，pp. 3–4。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在IMT面前为图林根大区领袖弗里茨·绍克尔和纳粹领导层辩护，后来还在耶路撒冷担任阿道夫·艾希曼的辩护律师；Priemel and Stiller, *NMT*, pp. 761–2。

15. IfZ Archive, ZS 251/1, pp. 11–12, 22: Max Jüttner, 'Führung, Aufgaben und Tätigkeit der SA'.

16. Dorothea Gaitner, 'Robert Gerhard Storey, a Prosecution Counsel at Nuremberg Trials', *The New York Times*, 18 January 1981, <http://www.nytimes.com/1981/01/18/obituaries/robert-gerard-storey-a->

prosecution-counsel-at-nuremberg-trials.html.

17. 罗伯特·G·斯托里1945年12月18日的陈述，参见：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 4, p. 124.

18. 同上，P.125。

19. 同上，p. 151。

20. 罗伯特·G·斯托里1945年12月19日的陈述，参见：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 4, p. 138.

21. 苏联首席公诉人罗曼·鲁坚科1946年3月2日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参见：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 8, p. 473.

22. 参见第6章。

23. 关于舍伦贝格，参见：Reinhard R. Doerries, *Hitler's Last Chief of Foreign Intelligence: Allied Interrogations of Walter Schellenber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4. 罗伯特·G·斯托里1945年12月19日的陈述，参见：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 4, p. 158.

25. 同上，P.159。

26. 格奥尔格·伯姆（1900–1952）从1929年起在纽伦堡担任律师，他的生平实际上无从考证。马丁·勒夫勒（1905年1月25日–1987年2月4日）1927年到1933年之间是德国人民党党员，1928年获得图宾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33年，他在斯图加特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并加入骑兵冲锋队。因此，他在纽伦堡做的也是某种自我辩护。二战期间，勒夫勒在国防军中服务，曾到非洲参战，此后在1944年被任命为军事法官。第三帝国垮台之后，他成为西德新闻法的权威之一。勒夫勒的传记可以参见蒙青格尔档案馆中的条目，以及他创立的律师事务所主页上提供的信息：<http://www.rae-loeffler.de/geschichte.php>。克勒菲施在IMT上担任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温德·哈尔巴赫的律师，至少到1945年11月15日；Christoph Safferling and Philipp Graebke, 'Strafverteidigung im Nürnberger Hauptkriegsverbrecherprozess: Strategien und Wirkung',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123:1 (2011), pp. 47–81, here p. 49; Hubert Seliger, *Politische Anwälte? Die Verteidiger der Nürnberger Prozesse* (Baden-Baden: Nomos, 2016), pp. 191–193.

27. 目前没有任何特奥多尔·克勒菲施的传记研究。关于他在魏玛德国的声誉，参见：Ismar Lachmann, 'Die Größen der Berliner Advocatur', *Das Kriminal-Magazin* 3:29 (August 1931), <http://www.anwalts-geschichte.de/kriminal-magazin/kriminal-magazin.html>.

28. Seliger, *Politische Anwälte?*, pp. 192–193; Statement of Geoffrey Lawrence, 15 August, in 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 21, p. 175.

29. 详见：Hoffstadt, 'Stahlhelm und SA', pp. 270–277.

30. Statement of Georg Boehm, 28 August 1946, in 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 22, p. 157.

31. 这一数字是原德国政府辩护律师库博朔克在1946年2月28日纽伦堡听证会上的估算；同上，vol. 8, p. 392。

32. 马丁·勒夫勒1946年3月1日的陈述，同上，vol. 8, p. 415。这一陈述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

话，实际上有多少冲锋队员当选，都尚不清楚。

33. 杰克逊法官1946年2月28日的陈述，同上，vol. 8, p.370。

34. 马丁·勒夫勒1946年3月1日的陈述，同上，vol. 8, p. 409。

35. 同上，P.410。

36. 同上，P.411。

37. 参见贾斯珀斯的“权威”著作：Karl Jaspers, *Die Schuldfrage*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1946)。最新的讨论参见：Barbara Wolbring, 'Nationales Stigma und persönliche Schuld: Die Debatte über Kollektivschuld in der Nachkriegszei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89:2 (2009), pp. 325–364; Markus Urban, 'Kollektivschuld durch die Hintertür? Die Wahrnehmung der NMT in der west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1946–1951', in Priemel and Stiller, *NMT*, pp. 684–718. 战后欧洲民怨的更广泛讨论，参见：Frank Biess, 'Feelings in the Aftermath: Toward a History of Postwar Emotions', in Frank Biess and Robert G. Moeller (eds), *Histories of the Aftermath: The Legac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New York: Berghahn, 2010), pp. 30–48, esp. pp. 40–42.

38. 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9月30日的判决：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 22, p. 518。

39. 同上，vol. 22, p. 519。关于考纳斯的犹太人聚居区，参见：Jürgen Matthäus, 'Das Ghetto Kaunas und die "Endlösung" in Litauen', in Wolfgang Benz and Marion Neiss (eds), *Judenmord in Litauen* (Berlin: Metropol, 1999), pp. 97–112; Christoph Dieckmann, 'Das Ghetto und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in Kaunas, 1941–1944', in Ulrich Herbert, Karin Orth, and Christoph Dieckmann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vol. 1 (Göttingen: Wallstein, 1998), pp. 439–471。

40. 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 22, p. 519。

41. Donald Bloxham, 'Prosecuting the Past in the Postwar Decade', in David Bankier and Dan Michman (eds), *Holocaust and Justice: Representation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 in Post-War Trials* (Jerusalem and New York: Yad Vashem, 2010), pp. 23–43, esp. pp. 37–39。关于评估德国人对IMT反应的方法论问题，参见：H. Krösche, 'Abseits der Vergangenheit: Das Interesse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öffentlichkeit am Nürnberg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1945/46', in Jörg Osterloh and Clemens Vollnhals (eds), *NS-Prozesse und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Besatzungszeit, frühe Bundesrepublik und DD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1), pp. 93–105。

42. 党卫队的律师们也采用类似的策略，但无法取得同样的成果，这并不奇怪。参见：Kim C. Priemel, 'Beyond the Saturation Point of Horror: The Holocaust at Nuremberg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4:4 (2016), pp. 522–547。

43. UAK, Archives, Zugang 726, File 2: Letter from Theodor Klefisch to an unknown addressee, 5 November 1946。

44. 参见拉伊姆收集的大量案例：Edith Raim, *Justiz zwischen Diktatur und Demokratie: Wiederaufbau und Ahndung von NS-Verbrechen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49* (Munich: Oldenbourg, 2013), pp. 659–944，以及鲁特尔等人的数据库：Nazi Crimes on Trial: German Trial Judgements

Concerning National Socialist Homicidal Crimes 1945–2012, ed. Christiaan F. Rüter and Dick W. de Mildt, <http://www1.jur.uva.nl/junsv>.

45. Carina Baganz, '“Milde gegen die Verbrecher wäre Verbrechen gegen die Opfer”: Die Hohnstein-Prozesse 1949', in Osterloh and Vollnhals, *NS-Prozesse und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pp. 207–220.

46. Weinke, *Die Verfolgung von NS-Täter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Andreas Eichmüller, 'Die strafrechtliche Verfolgung von NS-Verbrechern und die Öffentlichkeit in der frühen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58', in Osterloh and Vollnhals, *NS-Prozesse und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pp. 53–73, here p. 54.

47. Carina Baganz, 'Vom Wachmann zum Inoffiziellen Mitarbeiter: Täter der frühen sächs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und ihr Wirken für die Staatssicherheit', in Günther Heydemann, Jan Erik Schulte, and Francesca Weil (eds), *Sachs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4), pp. 351–364.

48. 引自: Margarete Mitscherlich–Nielsen, 'Erinnern, Vergessen und Verdrängen –Überlegungen zur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in Sibylle Drews (ed.), *Freund in der Gegenwart: Alexander Mitscherlichs Gesellschafts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Brandes & Apsel, 2006), pp. 23–34, here p. 23.

49. 许多德国人否认情感和思想上参与纳粹“计划”的倾向在1945年就已经很明显。坚定的纳粹分子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失望或痛苦的纳粹政权“受害者”，他们此时转而反对过去深爱的“元首”。对此现象的早期分析参见: Saul Padover, *Experiment in Germany: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6). 关于“民族共同体小卫士”一词，参见: Werner, 'Die kleinen Wächter der "Volksgemeinschaft"',

50. Eichmüller, 'Die strafrechtliche Verfolgung von NS-Verbrechen', p. 55.

51. 参见第9章。

52. LArch NRW–Westfalen (Landesarchiv NRW, Abt. Westfalen), Staatsanwaltschaft Dortmund, nos 1293–1305, 1542–1546.

53. LArch Hannover (Niedersächsisches Landesarchiv, Hauptstaatsarchiv Hannover), Nds. 171, no. 25522.

54. LArch Freiburg, V 1, Nr. 2473: Badisches Staatskommissariat für politische Säuberung, Verdict of the Spruchkammer Freiburg i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Dietrich von Jagow, 13 February 1950.

55. Bernhard Gotto, 'Die Erfindung eines "anständigen Nationalsozialismus": Vergangenheitspolitik der schwäbischen Verwaltungsbeamten in der Nachkriegszeit', in Peter Fassl (ed.), *Das Kriegsende in Bayerisch-Schwaben 1945: Wissenschaftliche Tagung der Heimatpflege des Bezirks Schwaben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r Schwabenakademie Irsee am 8/9 April 2005* (Augsburg: Wisner, 2006), pp. 263–283, esp. pp. 282–283.

56. 'Otto Straßer und der Solidarismus', *Arbeiter-Zeitung* (Vienna), no. 9, 12 January 1949, p. 2, http://www.arbeiter-zeitung.at/cgi-bin/archiv/flash.pl?seite=19490112_A02;html=1.

57. 'Senat stellt Strafantrag', *Hamburger Abendblatt*, 12 March 1952, p. 3. 我很感谢克里斯托弗·施特鲁普提供这篇文章的副本。

58. BayHStA, MSo, Nr. 1929: Letter from the Treuchtlingen Municipal Council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Justice, 17 August 1956. 在这个案子中，市议会要求宽大处理1933–1934年担任特洛伊希林根市长的安德烈亚斯·亨特纳。1950年，他因参与“特洛伊希林根反犹太族群迫害”被判处入狱3年半。

59. 关于格梅林所受的教育，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职业和政治生涯，参见他的冲锋队文件：BArch Berlin, SA 4000001096；以及他在德国司法部的人事文件：BArch Berlin, R/3001/57470 and 57471。

60. BArch Berlin, R/3001/57470, p. 41: Letter from the Reich Minister of Justice to the Foreign Office, 23 April 1941. 1944年，格梅林赞扬他的上司是“不凡之士”；IfZ Archiv, MA 650, pp. 4995–5000, here p. 4999: SD note on Gmelin's lecture at a party leadership meeting in Vienna, 14 January 1944. 关于卢丁和格梅林的关系，另见：Tönsmeyer,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Slowakei*, pp. 89–90. 据格梅林的女儿说，她父亲战后“照顾”卢丁的遗孀埃及其儿女们；赫塔·道布勒–格梅林博士2015年2月26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61. 马尔堡的尼克拉斯·克拉温克尔提供的信息，他目前正在埃卡特·康策指导下撰写关于格梅林的博士论文。我还要感谢克拉温克尔提供格梅林去纳粹化文件的副本。

62. IfZ Archiv, MA 650, pp. 4995–5000, here p. 4,999: SD note on Gmelin's lecture at a party leadership meeting in Vienna, 14 January 1944.

63. BArch Berlin, R 9354/601: Letter from R. Brandt to SS–Standartenführer Leg. Rat Wagner in the Foreign Office, 4 December 1944.

64. 这些营地最终并没有“再教育”原纳粹领导人，而是为他们重现过去提供了“回音室”，有关它们的生活条件，参见：Christof Strauß, 'Zwischen Apathie und Selbstrechtfertigung: Die Internierung NS–belasteter Personen in Württemberg–Baden', in Paul Hoser and Reinhard Baumann (eds), *Kriegsende und Neubeginn: Die Besatzungszeit im schwäbisch-alemannischen Raum* (Konstanz: UKV, 2003), pp. 287–313.

65. LArch Sigmaringen, Wü13 T 2, Nr. 2108/068: Verdict against Hans Gmelin, 13 July 1948.

66. 二战后的德国政界经常表达这种论调。最著名的案例是总理威利·勃兰特，他曾是一名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流亡瑞典和挪威，后来却面对“不是爱国者”的指责而不得不自辩。参见：Mergel, *Propaganda nach Hitler*, pp. 217–218.

67. StA Tübingen (Stadtarchiv Tübingen), ZGS–1: Hans Gmelin, election speech from 24 September 1954, *Schwäbisches Tagblatt*, 2 October 1954.

68. Gerhard Ebeling, 'Wiederkeh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chwäbisches Tagblatt*, 27 October 1954.

69. 'Thema des Tages: Wiederkeh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chwäbisches Tagblatt*, 28 October 1954. 这种指控和停止当时去纳粹化诉讼的要求很常见；参见：Strauß, 'Zwischen Apathie und Selbstrechtfertigung', pp. 310–313.

70. 'Fortsetzung der Debatte über "Wiederkeh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ind wir in Tübingen schon wieder so weit?' in *Schwäbisches Tagblatt*, 30 October 1954.

71. 'Die meisten Einsender sagen: Nein', in *Schwäbisches Tagblatt*, 2 November 1954.

72. 格梅林战后的生涯另见汉斯-约阿希姆·朗很有启发性的叙述：Hans-Joachim Lang, 'Die rechte Hand des Botschafters', *Schwäbisches Tagblatt*, 28 April 2005.

73. 但是，批评者认为格梅林涉及犹太大屠杀，应该阻止他贴上“荣誉市民”的标签——1975年图宾根市议会授予他这一称号。参见：Gerlind Strasdeit, 'Stellungnahme für die Fraktion DIE LINKE in Tübingen', 18 December 2014, http://www.die-linke-bw.de/nc/magazin/aus_den_kreis_und_ortsverbaenden/detail/zurueck/magazin/artikel/solange-hans-gmelin-ehrenbuerger-von-tuebingen-ist-bleibt-die-scheefstrassen-umbenennung-ein-ink.

74. 赫塔·道布勒-格梅林博士2015年2月26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75. 关于本内克在冲锋队中的活动，参见本书第4章，以及：Peschel, *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übernahme'*, pp. 7–22。德累斯顿理工大学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院的米凯·施梅茨纳目前正在准备研究本内克的生平，将提供更多他在1945年前后的生活细节。

76. 来自IfZ内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与原高层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合作很常见。例如，包含该机构与本内克来往信件的文件中，也包含了与原党卫队重量级人物维尔纳·贝斯特和戈特洛布·贝尔格的类似通信，语气极端客气。与IfZ合作的研究人员通常将目标定为从这些人物那里取得内幕信息，用于重要的历史学术研究，在许多情况下都取得了成功。不过，分析原纳粹分子是否、何时、为何能将他们对纳粹过去的偏袒观点打上学术成就的印记，似乎也很重要。参见：Nicolas Berg, *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3), pp. 270–321; Hett, *Burning the Reichstag*, pp. 283–308. 关于IfZ的建立，另见：Winfried Schulz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 (Munich: Oldenbourg, 1989), pp. 229–242; John Gimbel, 'The Origins of the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Scholarship, Politics and American Occup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0:3 (1964–5), pp. 714–731.

77. 例如，可以参见本内克与原冲锋队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纳粹作家汉斯·措贝尔莱恩的谈话：IfZ Archive, ZS 177 and ZS 319。本内克关于冲锋队大学办公室的备忘录参见：IfZ Archive, ZS 1685–1, pp. 21–24。

78. IfZ Archive, ID 200/177: Letter from Anton Hoch to Heinrich Bennecke, 25 May 1962; IfZ Archive, ID 300/23: Internal note by Thilo Vogelsang, 17 November 1958.

79. IfZ Archive, ID 200/177: Contract signed by Bennecke and Helmut Krausnick, director of the IfZ, 5 July 1963.

80. 保存下来的文件没有清晰地解释这一决定，但认定任命原纳粹官员有可能损害机构的声誉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的。IfZ Archive, ID 300/23: Internal note of the IfZ, 8 May 1963. 同样的文件也包含在：IfZ Archive, ID 103/85, p. 127。

81. Heinrich Bennecke, *Hitler und die SA* (Munich and Vienna: Olzog, 1962); idem, *Die Reichswehr und der 'Röhm-Putsch'* (Munich and Vienna: Olzog, 1964). 《希特勒与冲锋队》出版后，本内克打算寄给IfZ所长克劳斯尼克一本，并题上“献给克劳斯尼克博士，深深感谢当代研究所的帮助”；IfZ Archive, ID 300/23: Letter from Bennecke to Thilo Vogelsang, 2 November 1962. 在写给克劳斯尼克的一封信中，本内克称他的书“根本就是在研究所里写成的”：IfZ Archive, ID 103/85, p. 128: Letter

from Bennecke to Krausnick, 25 November 1962.

82. IfZ Archive, ID 200/177: Internal note from the IfZ, 13 February 1963.

83. Peschel, *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übernahme'*, pp. 23–77. IfZ文件中包含联邦档案馆与本内克的一份未签署的合同草案，内容是有关纳粹掌权之前冲锋队在萨克森州活动的研究；IfZ Archive, ID 200/177.

84. IfZ Archive, ID 300/23: 'Entwurf eines Vorworts'. 本内克将冲锋队历史分成“4个各不相同的时期”：1923年之前，1926年到1932年4月，1932年6月到1934年6月30日，以及1934年6月30日之后。

85. Peschel, *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übernahme'*, p. 21.

86. Bennecke, *Hitler und die SA*, pp. 28–30.

87. 同上，P.194。

88. 这方面有启发性的著作是：Schmerbach, *Der Kampf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pp. 118–120.

89. Bennecke, *Hitler und die SA*, pp. 197–200.

90. 关于这些相互矛盾的评论参见：Bennecke, *Hitler und die SA*, pp. 78–82.

91. 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明晰讨论，参见：Habbo Knoch, 'Review of Nicolas Berg, *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 H-Soz-Kult*', 4 February 2004, <http://www.hsozkult.de/publicationreview/id/rezbuecher-2433>.

92. 参见格罗斯-克拉希特著作中的例子：Klaus Große-Kracht, *Die zankende Zunft: Historische Kontroversen in Deutschland nach 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5)。

93. Höhne, *Mordsache Röhm*.

94. 关于长期流传的“干净国防军”这一神话，参见：Ben Shepherd, 'The Clean Wehrmacht, the War of Extermination, and Beyond', *Historical Journal* 52:2 (2009), pp. 455–473; 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Hannes Heer, and Birgit Otte (eds), *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1944*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1996).

95. Karsten Wilke, *Die 'Hilfsgemeinschaft auf Gegenseitigkeit' (HIAG), 1950–1990: Veteranen der Waffen-SS in der Bundesrepublik* (Paderborn: Schöningh, 2011).

96. 汉斯·赫尔曼·卡尔·施蓬霍尔茨1902年4月9日生于科尔贝格，一战的最后一年，16岁的他自愿参加家乡的“青年突击队”。在战俘营身染重病之后卧床两年。施蓬霍尔茨的余生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921–1923年，他是“民族主义战士联盟”的成员，1924–1931年归属钢盔团。1931年7月1日，他在弗拉托夫加入冲锋队，3个月后加入纳粹党。施蓬霍尔茨被豁免了常规冲锋队勤务，但使用语言非常有效地参加斗争。他不算太成功的小说难以维持生计，于1934年1月15日成为全职的冲锋队领导人。1937年起，这位五个孩子的父亲住在慕尼黑，成为冲锋队首席宣传者。关于他的小传参见：BArch Berlin, VBS 264, no. 4001006602 (Sponholz, Hans) and SA 4000003627 (Sponholz, Hans)。

97. Hans Sponholz, 'Naturschutz in der Defensive', *Natur und Landschaft: Zeitschrift für Freunde und Schützer der Deutschen Heimat* 41:9 (1966), pp. 191–193, here p. 193. 关于二战后西德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中“褐色遗产”的更多信息，参见：Joachim Radkau and Frank Uekötter (eds), *Naturschut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3); Franz-Josef Brüggemeier and Jens Ivo Engels (eds), *Natur-und Umweltschutz nach 1945: Konzepte, Konflikte, Kompetenz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5).

98. Michael Seeholzer, 'Hans Sponholz – von Nazivergangenheit eingeholt', *Merkur*, 5 October 2013, <http://www.merkur.de/lokales/ebersberg/ebersberg/hans-sponholz-nazi-vergangenheit-eingeholt-3148688.html>. 关于洛伦茨和国家社会主义参见: Benedikt Föger and Klaus Taschwer (eds), *Die andere Seite des Spiegels: Konrad Lorenz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Vienna: Czernin, 2001).

99. 'Hans Sponholz', in *Wikipedia.org*, https://de.wikipedia.org/wiki/Hans_Sponholz, date accessed: 28 October 2015.

100. 典型的陈述和自我批评的反思参见: Hannes Heer and Volker Ullrich (eds), *Geschichte entdecken: Erfahrungen und Projekte der neuen Geschichtsbewegung*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85) and Alf Lüdtke, *Alltagsgeschichte: Zur Rekonstruktion historischer Erfahrungen und Lebensweis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9); idem, 'Arbeiten und Dabeisein: Wie Alltagsgeschichte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erklärt', in Axel Lubinski (ed.), *Historie und Eigen-Sinn: Festschrift für Jan Peters zum 65. Geburtstag* (Weimar: Böhlau, 1997), pp. 75–86.

101. 这一地点的发现及早期勘测, 参见: Kurt Schilde, Rolf Scholz, and Sylvia Walleczek (eds), *SA-Gefängnis Papestraße: Spuren und Zeugnisse* (Berlin: Overall Verlag, 1996). 更新的研究参见: Irene von Götz and Petra Zwaka (eds), *SA-Gefängnis Papestraße: Ein frühes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 (Berlin: Metropol, 2013). 关于柏林纳粹恐怖统治核心反思机构“恐怖地带基金会”的更多信息, 参见: Reinhard Rürup (ed.), *10 Jahre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Berlin: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1997).

102. “科佩尼克血腥杀人周”的历史梗概参见: Yves Müller, 'Vom Traditionskabinett zur Gedenkstätte Köpenicker Blutwoche', in *SA-Terror als Herrschaftssicherung*, ed. Hördler, pp. 232–245.

103. 参见: Stephan Buchloh, 'Pervers, jugendgefährdend, staatsfeindlich': *Zensur in der Ära Adenauer als Spiegel des gesellschaftlichen Klima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2), pp. 142–145, here p. 144.

104. 特别参见: Nationalrat der Nationalen Front des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 (ed.), *Braunbuch: Kriegs- und Naziverbrech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Staat, Wirtschaft, Armee, Verwaltung, Justiz, Wissenschaft* (Berlin: Staatsverlag der DDR, 1968); 1959–1981年有多个书名稍有不同版本。

105. *Der Spiegel*, no. 34, 5 May 1968, quoted in Varon, *Bringing the War Home*, p. 39.

106. Lorenz Jäger, *Adorno: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92.

107. 《柏林早邮报》1967年11月11日对恩斯特·弗伦克尔的采访, 引自: Thomas Pegelow Kaplan, '“Den mörderischen Alltag bei seinem richtigen Namen nennen”: Linke Protestbewegungen, jüdische Remigranten und die Erinnerung an Massenverbrechen in den 1960er Jahre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62:7/8 (2014), pp. 600–619, here p. 612. 反过来, 最激进的学生们斥责弗伦克尔“反动”; 同上, 以及: Simone Ladwig-Winters, *Ernst Fraenkel: Ein politisches Leb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9), pp. 318–325.

108. Uwe Siemon-Netto, 'The 68er Regime in Germany', *Orbis* 48:4 (2004), pp. 641–656, here p. 645.

109. *Berliner Extra-Dienst*, April 1968, quoted in Varon, *Bringing the War Home*, p. 40.

110. 这些事件的总结(包括对施马尔茨-雅各布森著作的引语), 参见: Human Rights Watch

Helsinki (ed.), *'Germany for Germans': Xenophobia and Racist Violence in Germany* (Helsinki: Human Rights Watch 1995), <http://www.hrw.org/reports/1995/Germany.htm>.

111. 对当前新纳粹的实际情况概述和历史参考, 参见: Alexander Häusler and Jan Schedler (eds), *Autonome Nationalisten: Neonazismus in Bewegung* (Wiesbaden: VS Verlag, 2011); Ulli Jentsch and Frank Metzger, 'Die "Blutzeugen der Bewegung" im Blick des heutigen Neonazismus', in *Bürgerkriegsarmee*, ed. Müller and Zilkenat, pp. 417–432.

结 语

1. Peter Sachse, *SA-Männer von Leipzig: Ein Beitrag zur Rassenkunde Deutschlands* (Leipzig: Werkgemeinschaft, 1934), pp. 7–12, 21, 29, 50, 55, 60. 正如萨克塞告诉读者的那样, 他的论文导师奥托·雷歇在1932年春季推荐了这一主题, 恰逢当局取缔冲锋队。因此, 他破坏了政府削弱冲锋队公众注意力的企图。雷歇还负责取得纳粹帝国领导办公室的同意, 并于1933年设法得到了新任萨克森州总理、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的赞助。

2. Gerhard Wolf, 'Negotiating Germanness: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isation Policy in the Wartheland',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forthcoming; idem, *Ideologie und Herrschaftsrationalität*.

3. 在这方面, 考虑新“德国种族”的早期概念很有启发, 这一概念是1932–1934年由冲锋队员、学者弗里德里希·默肯施拉格和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卡尔·萨勒提出的。两人质疑所谓“纯粹北欧”人种的优越性, 倡导“种族混合”。他们并不觉得德国种族是一个绝对概念, 而是一种只能通过允许不断变化来维持的脆弱平衡。参见: Cornelia Essner, *Die 'Nürnberger Gesetze' oder Die Verwaltung des Rassenwahns 1933–1945*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2), pp. 62–75. 感谢柏林的斯特凡·博贝格指导我查阅这一研究著作。

4. Jonsson, *Crowds and Democracy*, p. xvi.

5. 关于“个性”和“品格”, 参见萨斯曼的先锋著作: Warren I. Susman, '“Personality” and the Making of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 in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d. John Higham and Paul K. Conki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12–226; 关于纳粹“民族共同体”中个人赋权的重要性, 另见: Moritz Föllmer, *Individuality and Modernity in Berlin: Self and Society from Weimar to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esp. pp. 105–131.

6. Steuwer, 'Was meint und nützt das Sprechen von der "Volksgemeinschaft"?', p. 520.

7. Stefan Kühl, *Ganz normale Organisationen: Zur Soziologie des Holocaust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4), pp. 102–103.

8. 参见: Harold D. Lasswell,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4 (1941) 4, pp. 455–468, here p. 461.

9. 参见第8章。

10. Loewenstein, 'Militant Democracy', p. 418.

11. Pendas, 'Explaining the Third Reich', p. 595. 对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参见: Robert Gellately,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对纳粹“民族共同体”吸引力的一种较为怀疑的观点参见: Geoff Eley, *Nazism as Fascism*, pp. 13–58, here p. 28.



德国冲锋队推进了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的夺权行动,从20年代起,这些也被称作“SA”或者“褐衫军”的“普通人”就在整个德国发动了一场结构松散、极具威胁的野蛮战役。人们往往认为,冲锋队的故事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之后就停止了,这一事件中,希特勒下令处决了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和许多其他冲锋队领导人。但是,这真的是冲锋队的末日吗?

在这本深入研究的历史著作中,丹尼尔·西门子不仅探索了冲锋队的起源、崛起和迅速的“斩首行动”,还研究了它在此后的转变:作为拥有百万之众的纳粹组织,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占区和“犹太人大屠杀”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西门子描绘了冲锋队成员及受害者的形象,研究他们所处环境、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

冲锋队对德国公民及德国的总体命运产生了毁灭性影响,本书对此做了重要同时姗姗来迟的重新评估。

冲锋队的权威研究著作,提供了真正的新观点,整合了人们熟知的冲锋队暴力活动和该组织1934—1945年的重要历史。简言之,是这一主题的最佳著作。

——理夏德·贝塞尔,《德国1945》作者

对纳粹德国的大量文献做了杰出的整理与分析,在一丝不苟的研究基础上,丹尼尔·西门子的著作不仅最为全面,而且是各种语言版本的希特勒褐衫军历史中最好的一部。

——罗伯特·格瓦特,《希特勒的刽子手》作者



上架建议:历史/政治

定 价:78.00元

ISBN 978-7-5142-2896-0



9 787514 228960 >